



---

# 寻觅真实的 刘格平

---

刘格平传记编委会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宁杨锁题

刘格平传记编委会 编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 刘格平传记编委会编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77-0587-1

I. ①寻… II. ①刘… III. ①刘格平 (1904-1992)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7979号

书 名: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著作责任者: 刘格平传记编委会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587-1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29.5 彩插22页

字 数: 465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5.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zch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cheerfulreading@sina.com](mailto:cheerfulreading@sina.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 编委会

**主任：宁杨锁** 甘肃省晋商联合会会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曾任兵器部214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甘肃省膜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副主任：刘德峰**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主编：李敏杰** 军旅作家，曾任新华社兰州军区分社社长、青海省西宁军分区副政委、兰州军区军史编研室主任、《晋商》杂志总编

**执行主编：郑怀盛** 军旅作家，国史学会理事，正编审，曾任《中国民兵》杂志主编，《中国国防报》副社长

**副主编：喻俊民** 曾任中共山西省永济县委宣传部长、永济市电力开发公司经理

**编审：杨留记** 曾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老战士天地》杂志总编

**赵仕枢** 曾任兰州军区某部政治委员、《中国老年报》甘肃记者站副站长

**许玉冰** 原兰州军区驻甘肃省临夏市某医院护理部主任





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刘格平1967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并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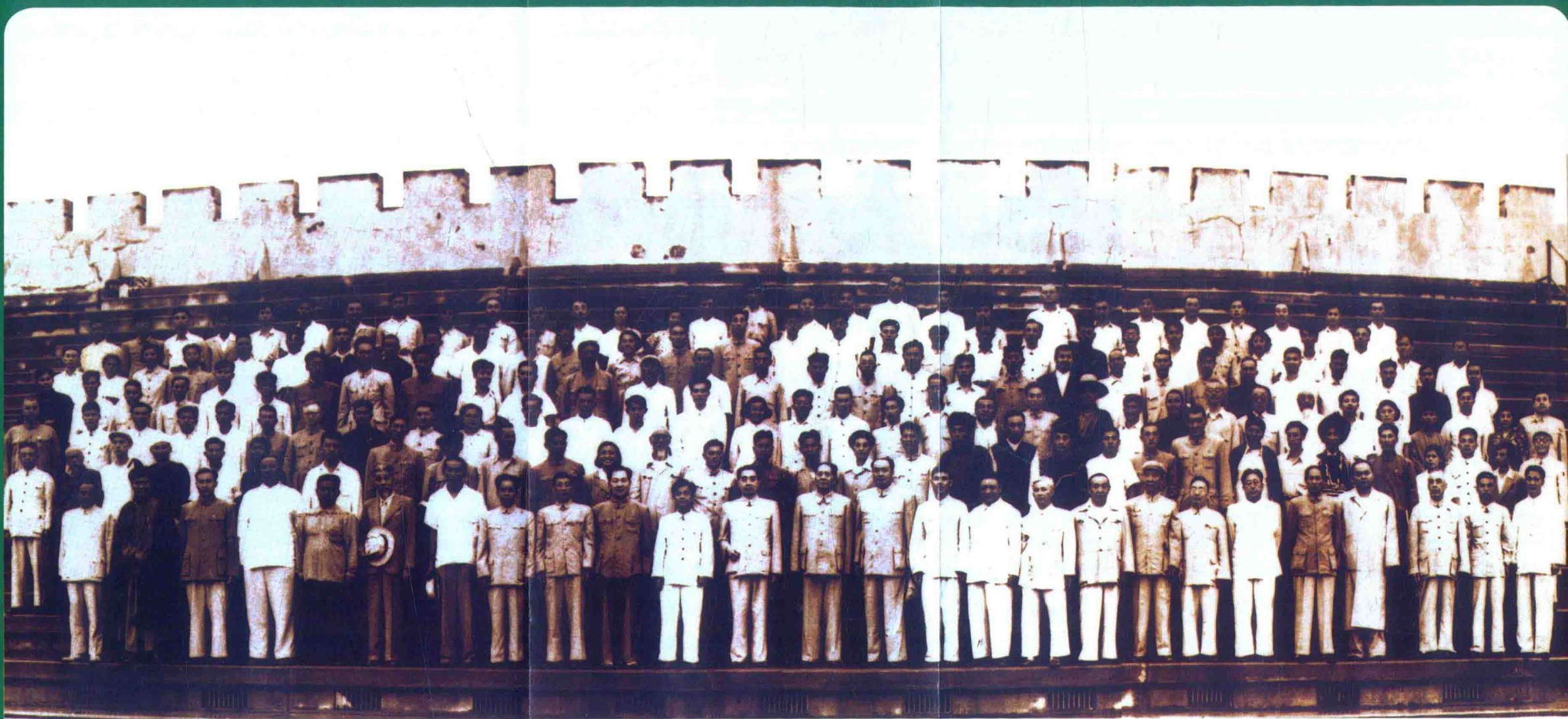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刘格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与委员合影（后排左1为刘格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合影。后排左起为天宝、刘格平、多杰才旦、杨静仁、白寿彝、朱早观。前排左起为朱德海、王国兴、奎璧、张冲、吴鸿宾、金汉文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在青岛参加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合影（前排左第10人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刘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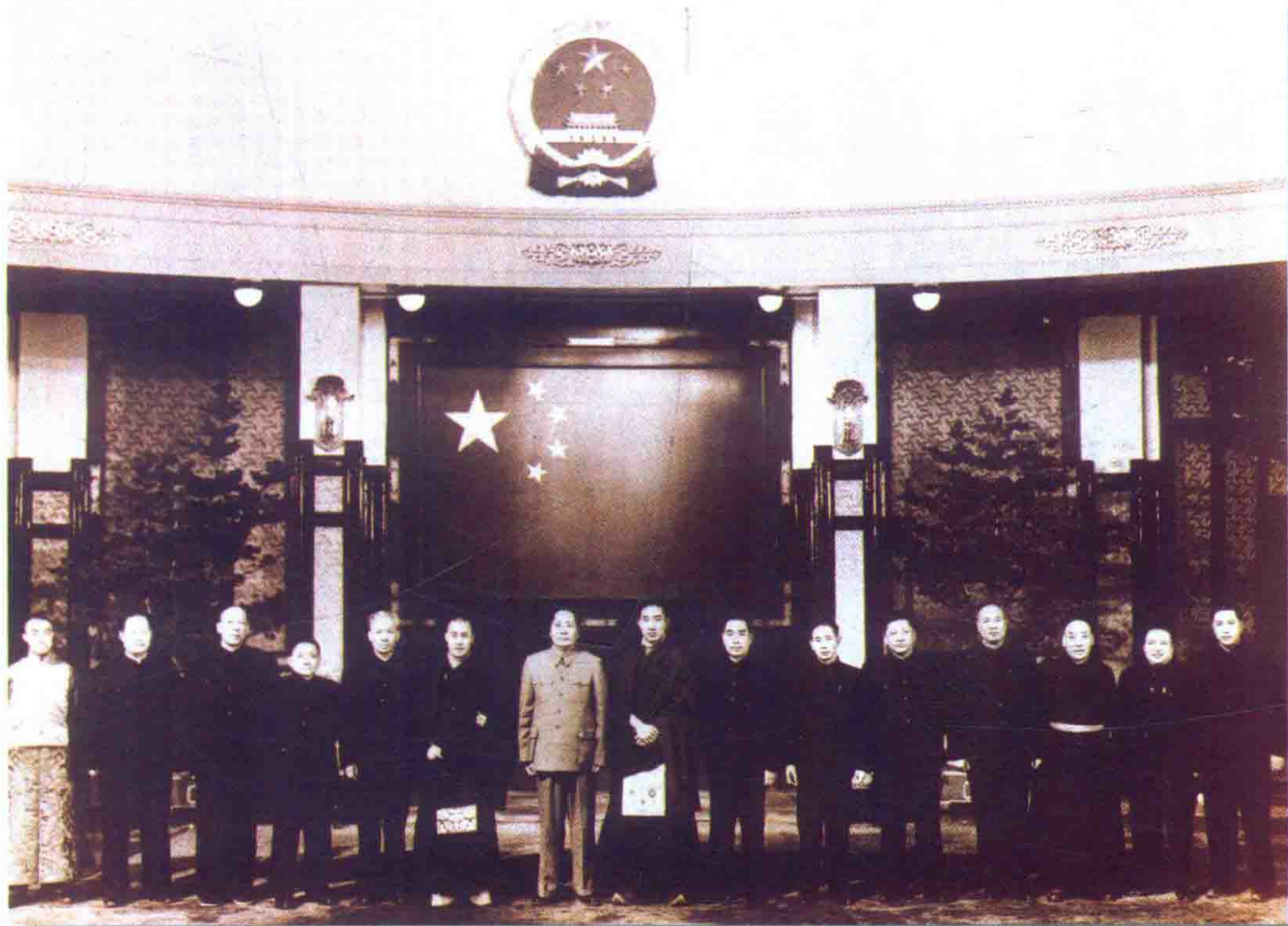


1967年，刘格平（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前排右起第7人为刘格平）



1950年4月30日，林伯渠（前排左5）、乌兰夫（前排左6）、刘格平（前排左4）在毕业典礼上与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合影





1954年9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达赖、班禅时合影（左第2人为刘格平）





1958年10月，中央代表团林伯渠团长（右7）、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刘格平主席等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部分人民代表合影





1984年，刘格平（左5）在宁夏和铁道兵的老同志相聚，右3为丁毅民





1986年，刘格平到宁夏会见原回民支队在银川的部分老同志





1992年3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向刘格平遗体告别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向刘格平遗体告别





2002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刘格平逝世10周年座谈会





彭冲同志为纪念刘格平逝世10周年在画家们创作的《青春常在》巨幅画卷上签名留念





亲历五四运动时



关押10年终出狱



战斗在渤海军区



在西南民族访问团



主政塞上江南宁夏



1949年9月1日，刘格平作为国内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并在大会发言



# 目录

## CONTENTS

### 不平凡的一生

引 言 .....	3
诞生在传统的回民世家，沐浴中华民族文化。从小性格倔犟，三次离家出走寻求救国之路.....	11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发展壮大，革命火种撒遍津南大地。第一次被捕，刘家倾家荡产，哥俩被营救出狱.....	23
深入河南国民第二军开展兵运，在天津组织工人武装起义，虽败却是共产党在北方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尝试.....	35
农民自卫军奋战失利，张隐韬慷慨就义，激励刘格平排除万难，踏着英烈的血迹前进.....	55
创建中共津南特委，积极迎接北伐；领导穷人借粮、吃大户，百姓称之为“穷党借粮”，当局称之为“赤党作乱”；机智灵活应对镇压.....	73
积极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占领庆云县城，打响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武装斗争第一枪；叛徒放军阀部队进城，刘格平化装脱险.....	87
第2次被捕入狱，把牢房当作宣传和发展组织的阵地；3年刑满出狱，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98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 只身赴晋陕开展兵运，又下麻城寻找红军，取“经”不成，开阔眼界经受了锻炼..... 108
- 重返津南领导农运，组织马颊河农民暴动，惨遭镇压血洗，刘格平第3次被捕入狱..... 116
- 落入虎口，绝不屈服，面对审讯，机智应对，在回族抗日将领吉鸿昌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下，组织狱友进行绝食斗争..... 124
- 铁窗锤炼志更坚，《反共启事》拒绝签，在弄不清上级指示是否真实的情况下，甘愿把牢底坐穿..... 136
- 担任中共天津临时工委书记和山东回民协会主任，被新华社誉为回民领袖，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150
- 担任中共华东局民运部长，指导渤海区鲁中区镇压敌特工作，搞好土地改革，组织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支前..... 160
- 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干部渡江，南下组建新政权；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5000多名学子奔向各级党政军建设岗位..... 175
- 被陈毅推荐参加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被毛泽东称为回民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首届中央人民政府65个委员刘格平位列其中..... 186
- 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川康云贵开展解放初期民族团结工作，为新中国民族关系的确立和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基础..... 196



- 全职主持民委工作，协助习仲勋贯彻中央在新疆和藏族地区的民族政策，稳定了祖国西部民族团结大局.....208
- 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实质，以维护祖国统一为己任，接待首次进京的达赖、班禅，并为藏区的稳定和进步贡献力量.....219
- 上书中央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组织大规模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党的八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239
- 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的创建，为各地党政军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使各民族学子的梦想在这里起航.....247
- 难忘回汉人民的支持和奉献，为自治区的筹备和建设呕心沥血，成绩显著在塞上传为佳话.....254
- 被诬陷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干部和支宁人员受到牵连，给宁夏回汉人民带来的伤痛刻骨铭心.....271
- 临危受命被卷入文化大革命漩涡，为稳定山西局势殚精竭虑，终因力不从心难挽狂澜，被诬反军乱军失去为党工作机会.....291
- 下放唐山陶瓷厂劳动改造，屡遭困厄不失共产党人本色，遇地震妻受伤女儿不幸遇难.....319
- 党组织审查证实：刘格平“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79岁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329



## 回忆与纪念

- 痛悼我革命的启蒙导师刘格平（王连芳） .....353
- 怀念格平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丁毅民） .....360
- 悼念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格平（刘树生） .....369
- 刘格平同志是新中国民族工作奠基者之一（底润昆） .....374
- 缅怀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者刘格平（胡振华） .....391
- 忆刘格平同志（江山） .....397
- 悼念坚贞不屈的狱友刘格平同志（韩培义） .....402
- 刘格平豪气永存（李毓堂） .....405
- 忆格平往事（丁磊） .....406
- 纪念格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喻俊民） .....416
- 革命老人刘格平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梁运安） .....428

## 刘格平年谱（1904—1992年）



# 不平凡的一生

寻 觅 真 实 的 刘 格 平







## 引 言

刘格平，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由团转党，是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是回族中最早的觉醒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格平之名少见经传，知道他的人也并不多。但对他关注的人中，则对他褒贬、毁誉不一。

贬毁他的人，说他是“民族宗教上层在党内的代理人”，是“政治野心家”，还给他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甚至从个性上诋毁他，说他“隔涩”，脑子“迂腐”。

褒誉他的人，称赞他“气节高千古”，“为民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民族解放的先驱”。渤海解放区的群众还称他为“山东回民领袖”。著名作家张承志曾书赠刘格平一幅墨迹，内容是“红色的革命和绿色的回回都永远怀念您”。

他去世后，经中央批准的悼词对他盖棺定论：“刘格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者之一。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他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他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虽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刘格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sup>①</sup>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关注他的人中，不论对他是褒是贬，又都对他有诸多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92年3月29日第15968期1版。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疑惑。比如：当年在国民党《反共启事》上签字的人，在后来共产党的政权中都很红，可为什么拒绝签写《反共启事》的刘格平却销声匿迹？是否确实是因为他脑子迂腐？有人心存疑问，刘格平虽然资历很老，具有‘回民领袖’的誉称，是开国时首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5个委员之一，但是从建国以后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来看，充其量不过是省部级，其行政职务最多不应该超过5级，但为什么却能跻身于屈指可数的行政三级高位行列？……

我们也正是带着这些疑惑，循着刘格平一生的足迹，试图去寻觅一个真实的刘格平。

尽管，滋生在这个时代的诸多治史者，受浓厚应时色彩和功利观的驱使，能为我们提供出的有效资料乏善可陈，但我们还是辗转查访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与刘格平生平、战斗、事件有关的当事人。好在有刘格平自己留下的回忆，有亲朋对他的访谈录，我们以此为基础，钩沉蛛丝马迹的史料加以佐证，以力求准确并使之条理。

纵观刘格平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战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他1904年出生在一个回族地主家庭，家里的经济来源殷实丰厚，可以说过得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他的家族中不乏当时社会的上层名流，按照父亲的安排，自己的前途应是一片光明，但他却在1922年18岁时，毅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放弃了似锦的前程和舒适的生活，投入了力量弱小又前程未卜的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从此融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洪流之中，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早在大革命时期，刘格平就已经是津南地区回汉群众中广为传颂的“红毛子”，他是中共津南地区党的创始人，并同时创建了第一个回族党支部。从他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中，走出了刘子芳、胡恒熙、马振华、刘建勋、王俊峰、刘震寰、王连芳、刘树生、贾震等许多党的骨干和共和国的栋梁。他多次受党派，奔赴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开展对旧军队的兵运工作。他为争取国民二军史可轩及其部队投入革命怀抱做出了重要贡献，史可轩后来成为北方著名共产党人，他的部队成为陕西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他多次组织民众暴动，建立了在北方最早的以讨伐军阀为目的、由共产党掌握的民众武装，对中国共产党



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武装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当1937年日军大举侵入中国大地之际，刘格平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播撒的革命火种，他为党发展的基本力量如薪火堆砌，抗击日军侵略的烽火遍布津南，尤其是一支支回民抗日武装，谱写出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抵御外敌入侵的曲曲壮歌。

1934年，刘格平在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时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狱中，他同难友们携手与敌顽斗争，以宁把牢底坐穿的气概拒绝签写《反共启事》，留下了共产党人忠诚共产主义事业、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

1944年刘格平出狱后，即刻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党的任务，转战冀鲁，先是担任中共天津临时工委书记，后又调任中共华东分局、渤海区党委担任领导，参与和领导了华东解放区的土改、镇反工作。他还积极组编、扩建了鲁中、鲁南、渤海的多支回族武装，使之投入到淮海战役及解放武汉、贵阳等战役中，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

1949年2月，刘格平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大批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并组建起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来，刘格平还亲自领导了培养新中国少数民族干部的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时，刘格平被确定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成为共和国开国者中的一员。在发言中，他发自内心的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呼吁。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都面临重重困难，刘格平受命跋山涉水奔赴祖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希望，沟通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后，刘格平担任民族工作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多次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派遣，解决和处理新疆危机、甘孜民族纠纷、民族识别等棘手的问题，奉命接待和陪同首次进京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还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刘格平积极参与筹建广西、新疆、西藏自治区，并亲身投入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之中，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1958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刘格平被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政府主席。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刘格平结合中国的实际不懈地探索，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理论和认识。早在建国之初，他就积极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讨论和制定。作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他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联邦制，为确定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不尊重不热爱自己民族的干部，就不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献身；他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既是阶级问题，更是社会发展问题；他主张，民族工作应该提倡和形成以汉族同志为主，少数民族同志为辅的格局。

1967年，刘格平受命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委托，投入“文革”漩涡之中，做出无私奉献，身体力行地争取山西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正常。在1967年底，刘格平就向中央提出“文化大革命应该收尾，‘三支两军’工作可以结束”的建议，他对“四人帮”用极左思潮、打击老干部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林彪集团利用军队支左削弱党的领导、乱党乱政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纵观刘格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又是近乎悲剧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老资格共产党员，但他经受的磨难也同样是屈指可数的。

在刘格平70年的革命生涯中，战争年代曾被捕三次，他始终维护组织的崇高形象，对党忠贞不渝而遭敌人囚禁达13年之久。然而，在革命胜利后，他却两度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前后经受了19年的审查和批判，先是受到了降职的处理，后则被彻底剥夺了工作权利。

在解放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刘格平都莫名其妙地受到打击和迫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后，刘格平先是成为“四人帮”、林彪两个集团的打击对象，继而又被有关人士视为异己加以排斥，受尽了精神上的摧残。一个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浴血奋斗了大半生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晚年，朝思暮盼的竟是他视为母亲的党组织的政治结论。

1970年，刘格平被“发配”到唐山边劳动边接受审查，期间行动没有自由，看病还须向组织请示，1976年险些蒙难于唐山大地震。

唐山地震后，刘格平心爱的女儿被地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夫人丁磊差点



遇难，刘格平也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家。一个为建立新中国而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做出毕生奉献的老革命，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无家可归，成为无家、无户口、无单位的“三无”人员，刘格平觉得自己像在大海波涛中漂泊的一叶小舟，难以预料今后的命运。她的夫人丁磊，在长期处于压抑、委屈的绝境中，发出悲愤的质疑和呐喊：“为什么一个建党初期就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被敌人关押监狱13年而拒不屈服，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最后却背着‘反党、乱军’的罪名被审查达19年！”

我们试图寻找这其中的原因。

对刘格平种下最大祸根的一点，就是他1936年拒绝签写《反共启事》。曾操持党内审干生杀大权的康生，勾结“四人帮”，把当年签写《反共启事》的一批人打成叛徒，从而形成了格格不入的两大集团。但在刘格平的问题上，这两大集团却高度的一致。康生说：刘格平拒签《反共启事》，因为他是回民，他信奉的是古兰经。而一些签了《反共启事》的人，则给刘格平扣上民族宗教代理人的帽子，指责他迂腐、隔涩，也说什么：当时只有刘格平一人没有签字，因为他是回教徒。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刘格平是回族，但与信奉古兰经完全是两码事。再者，没有签字的也不仅仅是刘格平一人，而是一批人，这一批人紧紧团结在刘格平周围，在狱中继续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有的牺牲在狱中，有的出狱后又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而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刘格平去世时尚活着的，有一机部韩培义，他撰写《悼格平同志》长诗一首：“……坚信共产主义胜，为了革命不觉冤。战士自有战士愿，愿捐身躯为明天。铁窗十年出牢狱，昂首挺胸气凛然。惊闻大哥突然去，悲痛欲绝顿失颜……”其情其义，苍天可鉴。而那些堂堂的所谓“共产党人”，竟然对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以自己的生命所坚守、所捍卫的气节和党性，进行如此践踏和亵渎，难道不令人蹊跷且耐人寻味吗？今天，我们即使退一万步，设定刘格平在“文革”中犯有错误，也不能说他在草岚子时期是“立场或者思维有问题”，否则那才真是迂腐透顶。有人曾这样认为：即使其他人都是叛徒，只有刘格平坚守了忠诚，但他却永远是“少数”、“异类”。最为蹊跷的是，那些签写《反共启事》的人，进入“后文革”时代的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治纠错之后，却多数成为实权派，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他们可以施展整人的本领，什么污泥浊水，都向已经失势者的头上倒，这恰恰是刘格平的悲剧所在，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有人在刘格平个性上对他进行诋毁，说他“隔涩”和“迂腐”，这实在是难以站得住脚。在性格方面，刘格平的确如有些人所说，缺少圆通。但凭心而论，难道去签写《反共启事》，难道任由康生等人的利用去对他人落井下石，难道舍弃那些与自己并肩战斗甚至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和同志们，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权力和名利，就不“隔涩”，不“迂腐”了吗？实际上，刘格平在许多时候都完全可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只要在敌人拟好的自首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获得自由；——只要听从权势者的安排，对一些本来就将自己视为“异类”的人去落井下石，就能权倾一时；就会在名和利上获得双收……。但刘格平的一次次抉择，却都是将自己陷入绝境。

今天，只要我们的思维正常，只要我们不“隔涩”或者“迂腐”，就都不会认定刘格平的抉择是错误的。问题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让一部分人的性格发生了扭曲、对一些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进行了颠覆，从而出现了另外一种结局——刘格平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被人加害，刘格平没同意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捺手印，却成了问题和错误，不但受到同僚们的奚落，而且被一次次以反对组织，不服从组织的罪名，去接受着那些当年对组织动摇、失去气节人的审查。

纵观刘格平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反思。

刘格平胸怀坦荡，为人正直清白。他1944年出狱后，在陈毅、康生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赛福鼎等人共事，都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但他们的交往都是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刘格平所选择的信仰，造就了他的人生价值观，造就了他把信念和理想作为第一生命的历史唯物观，也给了他生活的力量。他在性格上坚韧不拔，绝不随波逐流。他淡泊权势，重名节而轻利益。作为一个回族士绅家庭的“三少爷”，他原本可享荣华富贵，但却背叛家庭投入革命事业。他曾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党内唯一没有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行政三级干部，但他为了党的事业，顾全大局，毫无



怨言，表现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他曾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从不向强权低头。1981年，他给中央上书，坚持认为“在任何组织中都会受到不耻的对敌变节行为，在今天竟被颠倒黑白，这岂不是自取其辱？这些年来，每想至此，总感对不起那些维护党的尊严，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而宁死不屈的无数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从这一点上说，我的申诉更是为了他们。至于我个人，如今已近80高龄，能够仍然享受着无数同志和战友用生命及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已感足矣！唯想唯愿无愧党性无愧良心。”

1983年2月9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的王鹤寿到北京医院北楼，探视了正在生病住院的刘格平。王鹤寿告诉刘格平，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对刘格平的专案审查。习仲勋对刘格平说：“格平同志，你和马骏<sup>①</sup>都是回族中最早的觉醒者，马骏同志牺牲了，你活了下来。咱们都经过了那么多磨难，能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呀！”这话刘格平在解放初期曾听周总理说过，感觉无比亲切。如今落难之后再次听到，更觉心潮汹涌。

刘格平的最大贡献，就是努力去实践自己的诺言——对党忠诚和服从，坚守党的原则和信仰。他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但他坚信这是一条光明的路。

这种坚定的信念，是这一代人的特征，从他在青少年时期背叛自己的家庭开始，就日日的在升华，从而改变着他的一生。他说：“我们既然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自己的志向，即或不能遂愿，也要竭尽所能去为之奋斗，不能为私心私利而违背自己神圣的誓言而求得苟活！如果这样，岂能对得起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又如何去面对那些被自己吸收进组织、仍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同志？倘此，阴影和黑暗将永远笼罩在自己的心间？倘此，马骏、吉鸿昌岂不是白白牺牲？”他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正是这个信仰，让他面对诱惑却视之为粪土；面对苦难而毫无惧怕；受尽刑辱

<sup>①</sup>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回族。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与周恩来等在天津发起组织觉悟社。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恢复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的工作。1928年2月15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也决不向邪恶屈服。

令刘格平胸中永远不能释怀的，是对战友和同志的一腔情感，这也是他那一代人的特征。回族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刘格平永生难忘。对故去的战友和同志，刘格平常怀感念之情。他在无权无势时仍四处奔波，最终为革命先烈、自己革命的引路人张隐韬昭雪。

纵观刘格平的一生，必然提出一个尖锐的、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刘格平对组织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守是否值得？对于这个问题，刘格平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我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从跨出的第一步起，每前行一步都充满了暗道险阻，荆棘丛生，这是必然的。在这条路上，每前行一步都是战友和同志用鲜血甚至生命铺垫的，没有再回头的路。至于这条路上拥挤着许多的政治过客和既得利益者，即是在所难免又是和我们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我怎么可能因为他们而怀疑自己选择的道路！”刘格平对他自己一生的评论，既不同意“悲剧”说，也不认可“愚忠”说。他说：“如果说我受一些委屈和坎坷，就说是悲剧，那么无数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和同志又算什么？如果想一想浴血奋斗到胜利前夜而牺牲的同志，说我‘愚忠’我感到欣慰。我能活到今天，能够看到胜利，享受到胜利成果，已经足矣。”这个回答所展现的，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气度和胸襟，他让我们深深地感悟到，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固执的挚守者又何止刘格平一人，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都是这样艰难前行但矢志不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格平一生所经过的革命岁月，与党的历程一脉相承，他的生命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寻觅真实的刘格平，不正是寻觅更真实的历史么！



## 诞生在传统的回民世家，沐浴中华民族文化。从小性格倔犟，三次离家出走寻求救国之路

旧中国的津南大地，军阀混战，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统治，经济上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上贫瘠的盐碱地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广大回、汉族人民在饥饿、寒冷和痛苦中呻吟。尤其是回族人民，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加之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制约，生产门路狭窄，生活十分艰难困苦。

漫漫长夜，津南回、汉族人民的出路在哪里？他们在苦难中，盼望着那缕曙光。这时候，一批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与革命者，向那个万恶的社会发起了进攻。在那个革命队伍中，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回族青年，他就是刘格平。

刘格平出生于河北省沧县大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回民地主士绅之家。孟村原属沧县，解放后属于孟村回族自治县。它北靠京津，南接山东，东临渤海，西依石家庄，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回民孟氏家族应诏迁来定居，故以其姓氏命名为孟村。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这一带就逐渐发展成为为了回民较为集中的聚居区。

孟村虽然地广人稀，但人杰地灵。据明史记载，明代吏部尚书王翱，刚正廉洁著称



1919年，刘格平（右）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时与同伴合影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于世；清代回族武师丁发祥力挫俄国大力士，被康熙皇帝御封为“铁壮士武侠”；吴钟创立中国“十大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使孟村享誉海内外；爱国大阿訇海思福学识渊博，被阿拉伯国家誉为“东方第一人”；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任教的张皋如，周恩来、邓颖超曾是他的学生。其后数得着的便是津南党组织的创始人——刘格平。在刘格平的影响下，威名远扬的“渤海回民支队”成立于新县清真寺，刘震寰、王连芳、刘树生等一大批革命者从这里走出。

解放前，孟村回族聚居区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饱经风霜、历尽沧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旱、涝、碱三大自然灾害之苦，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这一带曾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苦海沿边穷孟村，  
千顷碱洼紧相连；  
毛驴破车难耕种，  
亩产粮食二斗三；  
丰年歉年都难过，  
糠菜饼子蘸硝盐。

这首民谣形象地描述了孟村群众生活的艰难，是当时孟村群众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

在孟村回民聚居区有一个大堤东村，它北依黄河古道南岸，西傍战国时古迹“齐堤”。这里地势低洼，土地盐碱，自然条件更差。但风景秀美，“齐堤”上生长着一排排迎风婆婆飘舞的杨柳，常常引得不少文人、墨客迷恋陶醉其间，欣欣然而忘返，所以“古堤烟柳”便是著名的“盐山八景”之一。

在大堤东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回族地主士绅之家，是当地的一个殷实大户，拥有300亩耕地和3个长工、3户佃农，家庭还经常有两三个来打短工的。1904年的8月8日，刘格平就诞生在这个家庭中。

回族世家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亲戚套亲戚可以套很远，所以这个家族中不乏当时社会上有头脸有名望的上层人士，而回族特有的生活习惯和习俗又令刘格



1984年，80高龄的刘格平重返沧州故里受到欢迎



平在这个特定的群体中游刃有余。

刘格平的父辈有兄弟3人，他的大伯叫刘余三，字慧安，是有名的八极拳弟子，习武成名，乡试中的武秀才。经乡绅举荐沧州知州聘任他为管辖沧（县）南（皮）盐（山）庆（云）三角地带158个村社会治安的民团总座。孟村是中国八极拳的发祥地，始创于清雍正年间，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是回族人民的传统武术项目。它汲取了太极、八卦、形意等拳术的长处，充分利用人体头、肩、肘、手、胯、腰、足、尾这八大部位的攻防能力，具有刚猛爆烈、近身突击、长于实战的特点，被列为全国武术比赛十大拳种之一，以其崩撼突击、贴身迸发、拳路多变，在中华武林中独树一帜。刘格平的大伯拳术高超，侠肝义胆，在当地威望很高。

刘格平的父亲，排行第三，故名垣三，字云镜。年少时一心只想考举人、进士，可在那个腐败的大清帝国，没有门路是很难考上的。好在他心地善良又好交际，在周围几个县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不少还都是中上层人士。聪明伶俐的他眼看科举无望，便靠自学成才，通晓了一些中医之道，立志悬壶济世，经常出入附近村寨，给群众看病抓药，体察民情，得到了百姓的赞赏和爱戴，在乡亲中威望很高。他大哥刘余三卸任后，大家又一致推举他接替继任民团团总。后来，由于经常目睹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和政府的腐败无能，40岁时，他不愿再为旧政府卖命了，便弃官经商，去天津等地做买卖，逐渐地在天津与人合伙开了花布工厂、轧羊毛厂等，赚了点钱，还在沧县开了栈房，从此家庭状况逐渐殷实、富足了。刘格平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在沧县坐监狱和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都是靠他父亲的这些关系作掩护，靠父亲开办的这些工厂、栈房赚来的钱来维持活动经费的。

刘格平的母亲姓史，是在盐山县的海边上出生的，也是渔业寨主家的千金，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由于刘垣三常年奔波在外，她勤俭持家，操劳一生，深得丈夫信任和亲戚邻里的敬重。他们共养育了刘格平兄弟3人。老大叫刘重霄，读书识字，沉稳踏实，主要帮父母管家。老二叫刘济安，机灵聪明，学校毕业后先是在天津铁路上当了一名会计，由于不喜欢这份工作，又上了4年医科学校，传承了父亲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解放战争时期，也受了弟弟刘格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影响，便投奔革命，来到了渤海解放区工作。解放后，任山东省惠民医院的中医科主任，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

刘格平在刘家兄弟中排行第三，被尊为“三少爷”。6岁时就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启蒙的先生名叫王嵩高，是个秀才。教授的都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课程。王先生是个严师，刘格平若背不过书，他使用戒尺打手掌，有时甚至还用藤棍打身体。虽然大堤东村是个偏僻的农村，但刘格平幼年喜欢听父亲刘垣三给他们讲述一些历史故事。父亲也经常和王先生交谈一些外边的时事：什么光绪被囚、慈禧病死呀，什么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呀，什么孙中山革命、袁世凯称帝呀，虽然这些事情对少年的刘格平来说是听不大懂，但是他觉得很新鲜、很好奇。1918年，学校搬得离家远了，父亲为14岁的刘格平又重新聘请了一位先生，这时外边的新鲜事也听不到了。刘格平很苦闷，从此书也读不下去了，总想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体验一下外边的大风大浪。

于是，他不辞而别地第一次离家出走了。刚到辛店镇，就被人认了出来，拦了半天，经好说歹说才被放走。在旧县镇住了一宿，刚到沧县城就被刘家栈房的雇员迎上了。在自家的栈房里住了两天，雇主就用车把刘格平送回了家，第一次出走就这样失败了。回到家，父母、哥嫂虽然没有责备他，但是那种若无其事地、蔑视的眼神实在让他受不了，也使他更气愤，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出走闯天下的决心。

过了几天，他听说离家20多里的盐山县城招新兵，还招学生，刘格平又偷偷地溜走了。来到盐山县，不费吹灰之力，那个招兵的军官就把他留下了。这时，父亲刘垣三听到信儿也追到了盐山县，但没能拦住刘格平，当天他就被送到沧县城，上了火车。看着父亲的背影，刘格平高兴他这次成功了，虽然他还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到底“世界”有多大！

火车上的乘客，大都是褴褛不堪的贫民，他们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才出来当兵的。和刘格平在一起的是一位年纪相仿、衣冠整洁的田姓青年，他是一个店铺的学徒工，因忍受不了“掌柜的”欺压而跑出来当兵的。时近9月，天气渐冷，他们都还穿着破旧的单衣，没有被褥。吃的也只会有一些杂粮馍馍和咸菜。



刘格平有自己带的吃食和衣物，所以情况要比他们好一些。

火车走了三天，终于到了南京。一下车，当官的就把他们这些新兵们送到了三牌楼营房，刘格平被分到江苏督军直系军阀李纯部队的三旅一团一营四连九班，田姓青年被分到了三连，不过住房挨着。每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军事训练，很累、很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田姓青年就开小差走了，他出来当兵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上军事学校，然后当军官；一看达不到目的，就拍屁股走人。刘格平还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是想出来闯一闯，开阔眼界，虽然军队不自由，但总比家里的封闭空间、沉闷气氛要好一些。

不久，刘格平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所随营军事学校。每个队约有140多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上过大学的，有中学毕业的，但大多数和刘格平一样是高小程度。学习和操练的功课有数学、步兵操典、兵制学、兵器学、制图学、城建学、旗语学等等。教官大半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大多不愿涉及政治，只有他们班的班主任，姓陈，是广东人，毕业于南京一所军官学校，主教制图，脾气很不好，有时发起火来，会把粉笔摔一地，教科书也扔了，但他对学员很好，从来不发脾气。他上课爱谈谈形势，经常痛骂现政府的无能。他崇拜拿破仑、岳飞，他也谈到俄国的“红党”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坏。他还给大家谈“二月革命”。学员们悄悄猜测他是国民党党员。陈教官教了刘格平他们一年多，因和团长兼随营学校校长意见不合便离开了，去了南方政府，有个别同学也追随他走了。

随后，刘格平的队领导换成了姓杨的教官。杨教官和另外一个教官，经常在夏天带学生们到野外去画图。随身带着画板、指南针、米尺，软、中、硬的红蓝铅笔，半天即可画一张军用略图。有一次，他带学生们到清凉山上去测图，测了一会儿，就到山上庙里的素茶座歇息、喝茶去了，想喝啤酒，于是掏出两元钱，派刘格平下山去买。

刘格平在炎热的天气里下山步行了3里多路。走得鼻子都流鼻血了，身上又没带纸，只得用手帕擦，不一会儿，鲜血就把手帕染红了。这时，从汉西门方向迎面走来两位大学生。其中一位较小的从书包中拿出几张白纸，递给刘格平擦鼻血。那个大一点儿的学生说：“不要给这个大兵，如今兵匪一家，他们可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厉害啦！”年轻一点儿的说：“看他流着鼻血多可怜，人都有恻隐之心！”他一抬头看到刘格平的领章说：“你也是个军校的学生吗？！”大一点儿的学生说：“反正兵匪一家！”他们蔑视地站在面前，刘格平真是又气又恼，没等说话，年轻一点的学生说：“你不要理他，他只知道看现象。”刘格平说：“没有关系，他不懂世事。”那位年轻一点的大学生拦住刘格平，要告诉他的名字，并要刘格平以后可到“师大”找他。刘格平“哼”地一声走开了。来到汉西门买了啤酒和几包花生米，就回到了清凉山上。

这段遭遇和那两位学生的对话，给刘格平很大的刺激，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下决心要离开这个腐败的、不作为的部队。在这个队上，刘格平结交了两位好朋友，一个是沧县的迟麟贞，另一个是盐山县的张鉴堂。他们两个比刘格平功课好。一起共同订阅《申报》、《东方杂志》，从上面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情况。后来两位朋友觉得在这个腐败的军队里当军官，没有关系往上升也很难，于是就离开部队走了。刘格平则继续坚持在班里晋升为下士，每月供给7元多钱。除2元钱的伙食，还剩下5元多钱，除去买零食和学习用品、日用品外，每月还得需要5元钱才够，但家里每月只供给他两三元钱，经济比较紧张，只得减少外出。

1919年5月4日，北平学生组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游行，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五四运动波及南京，各学校的学生都涌上街头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军队中也有一部分军人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斗争。而刘格平所在的军事学习班却被压制着不许行动。离营房不远，有个农业学院。这个学院的学生有时趁天黑，他们把宣传、抵制日货的传单包上石子，扔到军事学校的营院里，但也没有鼓动组织起来。这时的南京已没有历史上的繁华，只有二三十万人。特别是两次抗袁战争，张勋兵进南京，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大学也不多，有外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中国人自己办的师范大学、农业学院等。工业底子很薄，只有铁路工厂、电厂、兵工厂等，工人力量较小。国弱民穷遭人欺。流经南京的长江里经常有外国的兵舰、商船在江上横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各派政治



势力都登上了舞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格平在南京，距离上海这个革命中心咫尺之遥，或听或看（包括阅读），接触了武力统一中国和各省自治联治等主张。

刘格平坚持到1921年底军校毕业了，队里也只剩下五六十人，大部分人中间都走了。毕业后，刘格平被分回到驻扎在江北小营子的部队里。来到营区里，正好碰到一个军医官，原来是刘格平的一个亲戚。部队让这位亲戚征求刘格平的意见，是留在这里当排长，还是走呢？刘格平说：“我决心离开这里。”他说：“我赞成你走，你可以找你的表哥，到铁路上去工作。”这位亲戚说的刘格平的表哥叫吴毓麟<sup>①</sup>，是直系军阀政府的要员，后来曹锟当总统时任交通总长。于是他们就给刘格平办好护照，送刘格平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刘格平来到天津，找到了在津浦铁路总局任会计的二哥刘济安。见到阔别几年的弟弟，刘济安高兴极了，拍着刘格平的肩膀说：“呵，几年不见，长高了，也更帅了。”

刘格平显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哥，我这次来天津是想找点事干的，你可得帮我啊！”

“行，哥明天就带你找找咱们的亲戚，帮你尽快找到事干！”

第二天，刘济安就领着刘格平来到了他们的二表姐家，见到了二表姐的儿子王忠。这个王忠20来岁，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就是因为有他舅舅吴毓麟这个关系，所以才做了津浦铁路的一个段长。可他不知道珍惜这份工作，一天不务正业，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有一次，他看到属下一个铁路警官的肚子大，就用随身佩带的洋刀，戳伤了那个警官的肚子，引起了大家的愤慨，警官把他告到了吴毓麟那里，民愤极大，吴毓麟无奈，就把王忠撤职了。

刘格平哥俩一踏进二表姐的家门，就看到斜倚在床上吸大烟的王忠，他的媳妇也躺在对面陪他吸着。看见刘氏兄弟进来，这个小女人赶紧站起来打了招

<sup>①</sup> 吴毓麟（1871-1944），回族，安徽歙县人。清同治年间，因歙县遭蝗灾，其家迁往回民聚居之沧州。吴毓麟早年曾赴德国浮尔底造船厂学习。1923年出任交通总长，为直系保定派代表人物。1944年秋病逝于天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呼就出去了。王忠懒洋洋地抬了抬头，唉声叹气地先给刘格平他们哭诉起自己被撤职的事，说他原本是想将铁路上整顿整顿，却被不明真相的总长舅舅撤了职，一副很冤枉的样子。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起了现在的大烟味道怎么不好、哪个妓院的姑娘好。他还不满地说：“我原先去找姑娘，一天花几百元，现在我没有差事了，去了她们也不欢迎我。”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谈起戏来，也不知道他是真懂还是装懂，评论这个角儿演得好，那个角儿演得不好。刘氏兄弟只是应付性地和他谈谈，问他：“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王忠仰起头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干啥了。不，不，我要干，我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他们瞧瞧！总长要我到长江航运局去，但要给我个局长当当，至少也要是个副局长，否则我不干！”他们谈话的时候，刘格平坐在旁边椅子上一言未发，看着王忠那个地痞无赖样子，他真是有点如坐针毡，巴不得赶紧离开。出来后二哥刘济安问刘格平：“你看怎么样？”

刘格平说：“我真是受够了王忠那个赖皮样子，怎么和这种人见面，真让人受不了。”刘济安说：“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除非你不想吃饭，就不用求人了……”

刘格平恼怒地说：“天下之大，难道真没有个干净的地方！”

“这个世道，是不可能有的。”说完，刘济安又陪着刘格平看了几家，都是在吴总长下面当官的，所谈的都是些低级、下流的事情，不是谈女人，就是吃喝穿戴，要不就是哪里能弄到钱，能弄到女人。

急于工作的刘格平又去一家亲戚拜访，这位亲戚是铁路上的总务处长。他家从家具、吃用，到小孩玩具，都是走个账目从单位报销领钱。每年他在机关里能顶替上百个空账，仅此一项，一月下来能收入近千元。刘格平走了一圈，看了这些官亲，实在使他作呕厌恶，同时也领悟到了社会、政府黑暗透顶，腐败没落的本质。以后怎么办？他苦苦地探索着、思索着。

刘格平在二哥刘济安那里住了十几天，在走访一些亲戚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生活非常艰难的工人。他们有的当临时工，辛辛苦苦一天才挣5角钱，这点钱仅够一个人吃饭的，但他还要养活家里的三四口人。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职业，只能靠在车站帮人拿行李，或者和警察衙门里的什么人认识，帮人说情打官



司，从中间赚取点零钱糊口。

12月末的一天早晨7点多钟，寒风刺骨，刘济安带着刘格平到三不管清华池的一个大澡堂去洗澡。从他们居住的清华池到十字路口的澡堂子只有半里路远，沿途看去街道两边就躺着五六具冻死的尸体。往东走，在日租界旭街的新旅社门前还有一具尸体，在高级妓院所在的巷子里，还有两具女尸。死的大都是出名的妓女，因为衰老，痛苦中又吸上了海洛因，从此再也没有嫖客光顾，寒冬腊月就被老鸨赶了出来，只有流落街头、冻饿而死。

刘格平还到海河东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给中国的租界区。所谓租界，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军事、政治、经济、文教都不属于中国。这些外国人横行霸道，勾结中国的军阀、官僚、买办，在中国修铁路、开工厂、开矿山、开洋行，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租界是帝国主义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转运栈，经过它，把中国的大量金银财宝，运回他们国内。

刘格平在天津住了十几天，增长了见识，看到了当时帝国主义利用租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也见到军阀、官僚，还有一些汉奸走狗崇洋媚外，对外国人毕恭毕敬，摇头摆尾，唯唯诺诺，当哈巴狗的丑态。但他们欺负起自己的中国同胞来，却凶恶万分，实在令人气愤发指。天津之行，刘格平不但没有找上工作，还增加了他对旧社会黑暗现象的厌恶和痛恨。

春节快到了，二哥刘济安也放了假。他便和二哥于春节前一起回到了离别4年的家乡。“儿行千里母担忧”，善良的父母亲，看到刘格平兄弟俩回来了，非常高兴，一下子宰了三头大绵羊。刘格平的归来，给家里平添了很多欢乐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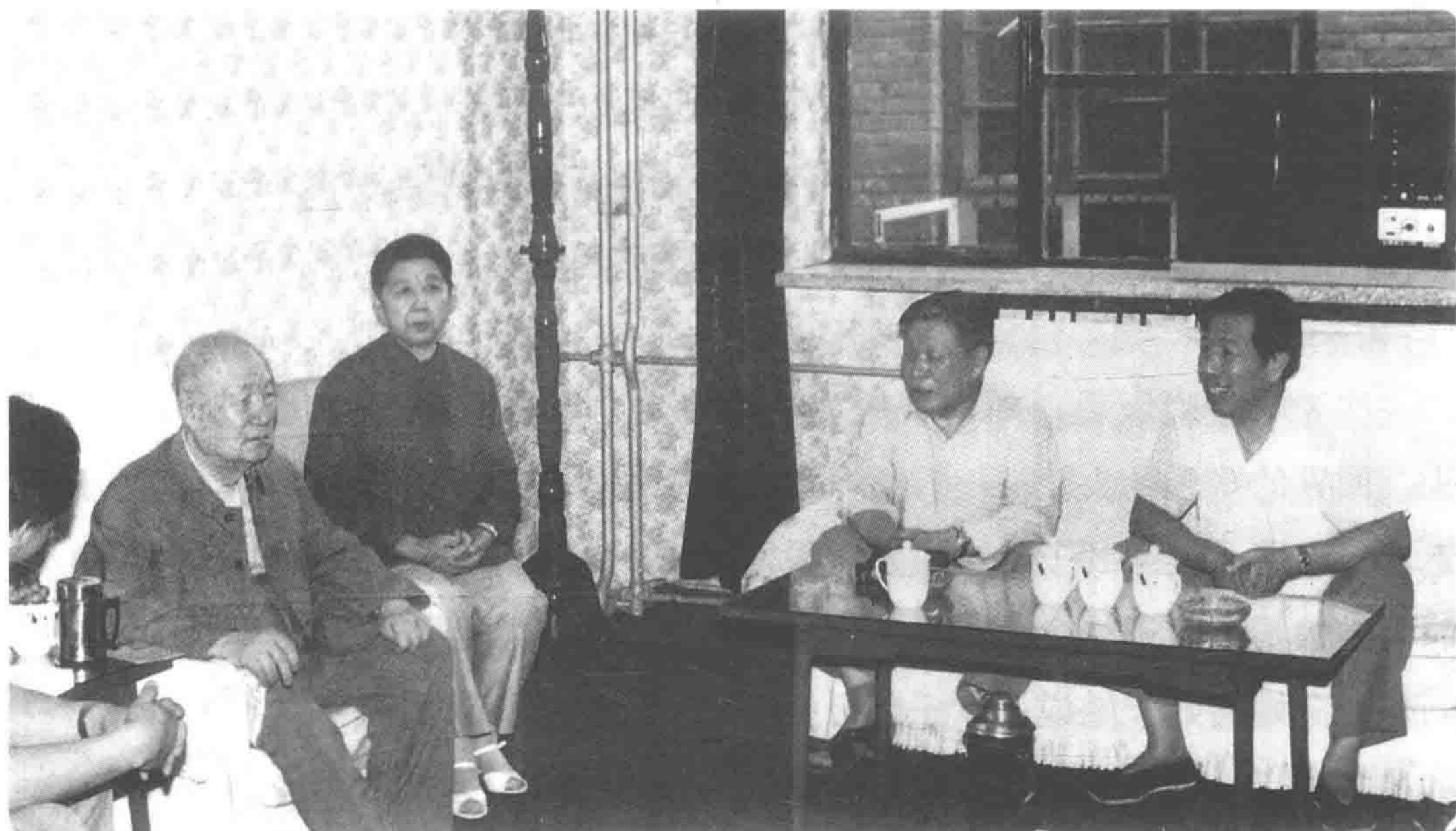
这天吃过晚饭后，刘格平想去街上走走，看看家乡的变化。可一走上街头，回家的欢乐劲头就被一扫而光了。家院周围的一切，还是老样子。刘格平走着、走着，便来到了从小格外疼爱他的堂四姐家。堂四姐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却还没有出嫁，而且脸色苍白，眼圈发黑。刘格平向她问好，她说：“三弟可好嘛！”随即便流下泪来：“能见着你，我真是太高兴了。”堂姐一直是孤零零一个人过活，只有一个老保姆陪着她。刘格平在她屋里坐了一会儿，堂姐总是找话题和他谈，想让他多坐一会儿，多陪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她聊聊，她实在是太寂寞了。刘格平感到非常难分难舍，因为在家时，堂四姐最疼爱他，好多的衣服都是她给做的，有病时，也是她精心地照顾着的。刘格平一直是把她当作亲姐姐来看待的。可是刘格平看着堂姐的生活现状，觉得很凄惶、很沉闷，想安慰她，又觉得言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就说：“我以后再来您！”她渴盼地说：“你常来呀！”离开堂四姐家，刘格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想是可恶的封建社会、是害人的旧制度把她害成了这个样子。

过春节时，母亲派人专门去新县镇买了几串鞭炮。二哥、二嫂和父母亲都很高兴。但刘格平的大哥、大嫂却比较沉默。刘格平在南京上学时，他就对刘格平很刻薄。二哥刘济安上学，他也不能很好地给予帮助，所以刘济安中途就到铁路上去工作了。父母让大哥刘重霄掌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他不太支持刘格平外出，所以总在经济上卡压他，使他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因为经济拮据，也吃了不少苦头。

家乡的过节气氛很浓。春节前夕，家家大门口都挂上一对对红彩绸宫灯，映照寒冷的夜晚。孩子们则打着灯笼，在门外的广场上，放起阵阵鞭炮来，顿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了夜空。这是中华民族辞旧迎新的一种最独特的



1989年，刘格平再返沧州时和当地领导同志交谈



方式。家里面母亲带着女眷们拥在大门口看热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鞭炮的亮光映照着她们开心的笑脸。刘格平和二哥燃放得最带劲。除夕夜大家吃完饺子就睡了，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来，首先是兄弟三个给父母磕头拜年，然后是一起到近门亲属长辈家里拜年，到同辈家里看看。这个时候家家都有酒醉枣、点心、花生、茶水招待大家。回到家吃过饺子，就有几百个雇工、佃农，来给东家磕头拜年。东家要给每家孩子和年轻人压岁钱，大约每人二三十个铜板。接着是亲戚朋友互拜。大年初一，无论是年老、年幼，男人、女人，都要穿上新衣服，爱美的年轻媳妇和女孩子还会戴上花。真是其乐融融、喜气洋洋。

走到街上，总听见人们见面多是双手抱在胸前弯腰作揖，嘴里说着：“恭喜发财！发财！”刘格平听了觉得好笑，心想在这样的社会，穷苦的老百姓能发财吗？有些佃户过年穷得都很难吃上一顿白面羊肉饺子；有的穷人为了躲债，在万家团圆的时候，却悄悄离家出走。那个年月里，一个很有本事、身强力壮的雇工，一年的工钱最多也不过三十几元钱。当小伙计，一年才给几元钱，所以很难挣到钱，更别说“发财”了。

按照习俗一般回民是不过春节的，但因为和他们大部分和汉民同住一个地方，所以也就随着汉民过年图个吉祥。在刘格平的家乡孟村，还有春节“放灯”的习俗。一到大年初一，在南广场上，几位老人用秸秆结起来，用苇箔围起来，变成一个方亭子。正北面墙上还会贴着一张集市上买来的众神像。供桌上点有两支蜡烛，一盘油条，烧上香，还有纸钱。快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时，那几位老佃农就更忙，上坟地里去收集松柏帽，回来轧成面，和上豆油，搅拌后用棉纸一个个包起来，又弄些木炭、硝、磺，和铁末儿放在里面。到了正月十四日，天还没黑，锣、鼓就敲打起来了。人们把那些包好的、插有灯芯的松帽，都一个个点上，大人和孩子们提着灯笼跟随，沿路把点着的松帽灯放在路边，十步放一个，这天放的是“鬼灯”。到了十五晚上放的就是“人灯”了，每家给些做好的松帽，点燃放在锅台后面、厕所、院子角落。春节的喜庆气氛到此就该落下帷幕了。

过了春节，大约五六天，才是刘格平自己的时间。可是没有事干，没有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纸，家里有几百部老书，他也不愿意看。于是刘格平鼓起勇气向母亲说：“我要和二哥一起到天津去，准备考大学。”母亲愣了一下说：“你刚回来又要走了，上学要花钱，你大哥他同意吗？”刘格平知道大哥刘重霄肯定不支持他，所以说：“我不管他，我也没有必要和他说，他不给我钱，有我二哥呢。”母亲流泪了，但知道刘格平决心已定，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因此没有拦着，就放他走了。

刘格平第三次离开家了，这次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家里用车把他送到沧县。刘格平当时天真地想：这回可自由了，我要好好学习，有了知识才能救国。那时的他一心只想到要找一条新路，是什么路，想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召唤着他、吸引着他，勇敢地走向前方。

刘格平幼年时即受到父亲的特殊关爱，常随父亲走亲串友，也随大伯学过武艺，还随大哥学过理财管家。他的生活本可以衣食无忧舒适安逸，他的前途也或可依父所定，混迹社会上层图个仕宦名流，或可顺其自然成为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的阔少。但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回族地主士绅家族中，形成的性格不仅仅单是倔强，还有叛逆之心，还有胸襟和视野，还有抱负与志向……因为他对现实不满而萌生出忧国忧民之使命感，因为他不安分的心而迸发出救国救民的抱负，因为他急于寻求变革的方法和真理才离乡弃家。



##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发展壮大，革命火种撒遍津南大地。第一次被捕，刘家倾家荡产，哥俩被营救出狱

1922年2月，刘格平再次来到天津，到二哥刘济安所在的河北四马路四经村住下。四经村，是曾经做过民国大总统、也是北洋军阀之一的冯国璋，筑建的上百个小院落，形成一个村子，全部用来出租，为他自己吸金赚银的。冯国璋是河北省河间县人，他家乡的村子叫诗经村，故给此村命名为四经村。刘格平和他二哥租住在这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这个补习学校是由沧县的无政府主义者兰秀山主办。主要补习英文、数学。来这里上课的，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如当时的共产党员于树德<sup>①</sup>（后任天津政法学院的教授，曾留学日本），就曾在这里补习过。这个补习学校大小有7间房子，中间最大的一间用作讲堂，一个小套间，为兰秀山的休息室。院子里的三间小房子，被一名老中医租用办了诊所。最后一间小房子，就是刘格平和二哥租住。

二哥刘济安在同事中打听到，在法租界，有一个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比较容易考取。于是，他就让刘格平在补习学校补习数学和英文，另请了一位名士张皋如为刘格平补习语文。这样，刘格平就是半天在补习学校补习，半天在张皋如那里补习。

在补习学校租住期间，有一个中等身材，略显魁梧的警察经常到这里来。他有些许书生气，身为警察却又能不像警察，第一次来这里，刘格平很讨厌人

---

<sup>①</sup> 于树德（1894-1982），字永滋，河北静海人（今天津市静海县）。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后结识周恩来并资助周恩来赴日留学。1922年6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建青年团天津地委。1923年列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改组并被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到京，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称黑狗的警察，不愿理他，可是他来了主动热情地和大家都打招呼，平易近人，好奇的刘格平看他经常给同院居住的小于子带来一些书籍和刊物，也经常从小于子那里拿走一些油印的材料。刘格平发现他话语不多，但显露出一种自信和成熟，一看就觉得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说起苏俄革命，说起革命和救国的道理，说起打倒军阀等，每次都让刘格平听得入神。小于子说，这个警察名叫张宝驹（后改名张隐韬）。

刘格平常去小于子的房间串门，小于子对爱学习的邻居刘格平也很热情，慢慢熟悉了，就给他借阅《新青年》及一些宣传苏俄的材料、小说等，刘格平如获至宝地去阅读着。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新青年》上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及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材料。在这里补习半年，刘格平的学习成绩虽然进步不大，但他却看到了一些从来没有看到的東西，知道了一些从来没有告诉他的救国道理。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刘格平心中萌芽。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在北方，除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保持半独立状态以外，冀、鲁、豫、湘、鄂、苏、皖、赣等省，都属于直系势力范围。直系的代表人物是曹锟、吴佩孚，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川东、两广也有一部分军阀和直系勾结起来，反对孙中山。

通过阅读先进刊物，渴望新思想的刘格平逐步认识到：自己现在这样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改造中国也不能用改良的方法。只有像苏俄一样，无产阶级联合广大贫苦工农起来闹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沙皇，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当时在中国的进步力量中，国民党成分复杂，有军阀、官僚、资本家、知识分子等，是一个缺乏严密组织的政党；共产党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新生革命力量，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刘格平思考着，似乎从困惑中看到了方向。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小于子倾诉着、探讨着……这时，张隐韬<sup>①</sup>成了刘格平最渴望见到的人，因为他会给他讲许多他不理解的事情，讲很多他愿意听的革命道理，每到

---

<sup>①</sup> 张隐韬，又名张宝驹，号“仁超”。1902年出生于南皮县唐家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天津五四运动，1922年初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沧州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3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推荐入黄埔军校学习。在上海由毛泽东接待进行补考后，与徐向前、左权、宋希谦等人成为该校第一期学员。1926年2月5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时年24岁。他是刘格平的革命引路人和挚友。



这个时候，都是刘格平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

大约在9月的一个晚上，“格平，你来！”小于子很神秘地叫刘格平到他房里去，刘格平随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想一定有什么好事，便随小于子来到他的房里，抬头一看，屋里坐着一个神情严肃又和蔼的陌生人。小于子没有介绍他的姓名，只是把刘格平推到一个小凳子边坐下。刘格平也不便问，估计来者一定是个党团领导人。陌生人向他俩点点头，先说了几句家常客套话，然后就谈起了国际上的问题，重点是苏联把帝国主义所组织的14国联军都给打败了，白军有的被红军消灭掉，有的被赶跑，流落在周边各国成了白俄。他接着又谈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80多年来的许多罪恶事实；谈到军阀混战、杀人放火，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农民被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劳苦大众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谈到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最后他又特别强调地讲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当前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又谈了要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要让所有人知道不革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都没有出路，没有活路。陌生人系统详实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告别走了。刘格平回到自己房里，仔细琢磨着他刚才的讲话，革命有了方向，但是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要到工农里面去，要组织武装。怎样迈开步子去搞呢？许多问题回荡在他的脑海里，让他长时间思索。这个人是谁呢？他讲的是多么的深刻啊！

1922年6月，中共第一次以“对于时局的主张”向社会各界公开亮相，公开了自己的政治态度；7月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所以，这个严肃而又和蔼的陌生人，向刘格平他们说了党的“二大”精神。这其中最吸引刘格平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消除内战，打倒军阀，建设和平，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刘格平后来才知道，把自己领上革命征途的这个严肃而又和蔼的陌生人名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叫于方舟<sup>①</sup>，是当时天津地下党员负责人之一，小于子正是他的本家弟弟。于方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天津两次被捕入狱，和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在五卅运动时，于方舟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游行，冲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面对日本军队的刺刀、机枪，他毫不畏惧地站在数万群众前面，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在直隶省党团建设中，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2年9月，越来越赏识刘格平的张隐韬，介绍刘格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的刘格平，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党的刊物《向导》等一些宣传革命的资料。他的思想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先一个空想的世界，转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走上了一条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坎坷不平的革命之路，努力成为一名革命者。

1922年冬天，父亲来到天津，要他回去，找一位老先生再补习一年功课。刘格平想想也好，借此可以到家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协助张隐韬一起建立更多的团组织。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隐韬和小于子，他现在是一个有组织的人了，他得遵守组织纪律。过了几天，张隐韬告诉刘格平，组织上已经同意他回家乡去开展革命活动，并给他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

这次回家乡，刘格平的心情是和上次不同。这次他是肩负着革命的重担，回到家乡撒播革命的火种，因此心情格外的激动。

回到家乡的刘格平，革命激情高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懈怠，利用冬闲的时候，便和一些熟悉的佃户青年谈心，宣传革命思想。但是他们总是疑团很多，有时会问他：“你们家能把地公出来吗？”又说：“就是你愿意，他们也

---

<sup>①</sup> 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1900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宁河县），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刘格平的革命挚友和引路人之一。1920年底创建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2年9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受蔡和森指派，在天津二次建党并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1924年1月受党指派参加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春，当选首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委员长，曾多次领导天津工人举行反对军阀的罢工斗争。1927年秋，根据中共北方区领导蔡和森的指示，发动京东农民大暴动，一举攻占玉田县、遵化县。失败后，又发动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1927年10月底暴动再次失败被俘。1928年1月14日夜晩，于方舟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28岁。解放后，于方舟故乡宁河县政府为其建立衣冠冢。李瑞环题词为“津门之光”。



不会同意！”刘格平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一提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不是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于是，经过筛选，他发现家乡有个盐帮手枪队是一支可发动的革命力量，因为这支手枪队都是由一些家境贫困的回族中青年组成，而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和自卫能力。

刘格平的家乡大堤东村，位于沧县东南面，距天津约120公里。沧县有回族几万人，回族群众大都很穷，土地又少，只能做点小买卖，又赚不了多少钱，生活都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就只有借高利贷买驴去贩卖私盐。如被抓住，只有倾家荡产。民国初年，反动军阀视回民为“土匪”，把回族聚居的地区划为特别区，时常是大兵压境，名曰“剿匪”，实则为镇压贫苦的回族农民的不满和反抗。而且，还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压迫回族。回族群众若被抓去，就会遭到百般侮辱。如能拿些钱来，还可以赎回去，否则，就被杀死。刘格平家所在的村子，有100多户人家，平均一户就有一个人被杀。于是，村民们就自发组织起来，组成了盐帮队，集体行动贩卖私盐，一是为了自保，二是为了赚钱。为了免遭官兵的扣押抄收，保护盐帮队，他们还置买了20余支手枪，成立了盐帮手枪队。领头人是刘子芳<sup>①</sup>、刘景泉。二人在率领盐帮队贩盐时，如遇盐警劫掠，便抽枪还击，使盐警望而却步，闻风胆怯，不敢轻易侵犯他们。

刘景泉，比刘格平大13岁，是他的同族哥哥，自幼家境贫寒，童年曾随父亲到河间扛活放牛，因伤了东家的牛而被赶回家乡，来到古北口讨过饭，又南下到山东枣庄煤矿当工人，生活始终困苦不堪。后来又回乡给地主护院。因看到穷哥儿们贩盐常遭抢劫，便借枪给盐帮队打过两次盐警，使盐警以后不敢再贸然侵犯。成立盐帮手枪队后，他理所当然地被伙伴们推举当了队长。刘景泉为人正直、实干、重义气，不满国家现状，爱讲三国故事，且有胆有智，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刘子芳是刘格平的堂兄，沧县高小毕业，在奉军马良部当过兵，有胆识，

<sup>①</sup> 刘子芳、刘景泉、王俊峰都是津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刘子芳，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第一个回族党支部——大堤东村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1927年春，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兼堤东区委书记。七七事变后，发起建立津南抗日救国总会并兼任该会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经常出没于阳信、无棣、惠民、南皮、东光、盐山、庆云、乐陵等地，不断打击日伪。1939年去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任八路军某部副团长兼炮兵大队副大队长，赴山东抗日前线。1945年夏，作为八路军代表与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谈判时被特务刺杀。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有阅历，为人正直。到他这一辈时，自己的地主家庭已经败落，受族人排斥。于是，刘格平先是千方百计接近刘子芳。但他家和刘子芳家结有宿怨，那是因为刘子芳的父亲刘玄山因刻薄寡嫂和侄女，刘格平的父亲愤愤不平，出面干预，被刘子芳父子失手所伤，致使两家结下了冤仇，多年不说话、不来往。因此，当刘格平去刘子芳家时，自然遭到慢待和讥讽。但刘格平为了革命事业，毫不介意。坐在他家的炕头上，和刘子芳的家人拉家常，讲故事，非常同情他家的境遇。去的次数多了，刘子芳也就转变了对刘格平的冷淡态度。

刘格平给刘子芳讲述苏俄十月革命；讲述他在外面见到的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种种实例；讲述在天津外国租界里中国人是如何地受欺侮；讲述在家乡地主的封建压迫、穷人的生活苦难等等。慢慢地刘子芳也听出了门道，问刘格平：“三弟，你在天津参加了什么道吧？”刘格平不置可否笑了笑。

他又说：“不是说苏俄十月革命是在搞共产共妻吗？”

刘格平说：“不对！那是反动派的诬蔑宣传，实际是苏俄工人农民阶级打倒了以沙皇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穷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坐了天下，保证穷人有饭吃，有房住，有地种，有工厂去做工，实现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这多好啊！”

“中国也能有这么一天吗？”刘子芳问。

“当然能有这一天。不过这得靠我们觉醒起来，组成一个革命团体去努力奋斗才行！”刘格平答道。

“行！老三，你上边有头绪，你说怎么办，我就听你的，只要我们回民群众不受歧视、压迫就行！”

之后，刘格平又送给刘子芳一些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秘密刊物，如《新青年》、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等。渐渐地，刘子芳的思想转变了，成为了刘格平发展的津南地区第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刘格平还有个表弟叫王俊峰，是山东省乐陵县杨马连村人，十四五岁，还是个学生。他也是回民，但信奉基督教。刘格平开始给他讲革命道理时，他就给刘格平讲述上帝和耶稣的事情，说耶稣也是穷人。对基督教刘格平一点也不懂，也没法反驳他，就给他一些宣传革命的书籍和资料。他看后进步很快，从



此再也不提耶稣、基督了。不久，刘格平又发展了他和刘景泉为青年团员。

1923年2月春节期间，王俊峰前来刘格平家拜年。刘格平就在刘子芳家的炕头上，主持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刘子芳任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这是刘格平在津南地区播撒的第一颗革命火种。

接着，刘格平又去了邻村北小庄找自己的同门兄弟刘义元。北小庄有“小梁山”之称，村民素来强悍，勇于抗暴，有不畏死的精神。旧官府流行的“宁闯鬼门关，不惹小梁山”就是对北小庄村民勇于抗争的真实写照。因此，发展刘义元入团比较顺利。他又召集知心好友数十人，和刘格平一起开展革命宣传。他们把宣传苏俄“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青年》、《向导》等小册子让村长韩凤奎念给大家听，大家觉得很新鲜，认为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剥削，反对苛捐杂税，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这样刘格平又陆续发展了韩殿奎、张殿奎、张树林、韩凤奎4人入团。还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小庄团支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刘格平发展了8名团员，同情革命的也有二三十人。刘格平的父亲虽然不参与儿子的活动，但同情和支持革命。有一次，在门洞里，一些雇工、佃农问刘格平的父亲：“三爷，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

“将来他们有一天要成功的，现在人心不古了，世道黑暗。”刘格平的父亲说的“将来”，是无限长的时间，其实他已觉察到了统治者本身已经摇摇欲坠，有点统治不下去了，需要有个力量把它推翻，这个力量应该就是共产党。很有威望的刘格平父亲的话传开了，有些穷人都很激动，好多人说像刘格平父亲刘云镜这样的人，都说共产党将来可以坐江山，看来革命真是有点希望了。

春节过后不久，刘云镜让三儿子刘格平到盐山县韩家集韩世亭老先生家读书。韩先生是刘云镜的好友，也是个有学问的先生。他的外祖父、舅舅都是清朝的进士，又都进了翰林院当翰林。他家是旧式两层楼房，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

韩家是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布置的古色古香，在房屋主间的北墙边放置着绘有精美绝伦的山水画的八扇屏风。东墙上挂着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靠东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有张硬木的藤芯单人床，供老先生在午间休息。院子里很宽阔约有一亩多地大，铺的地砖。靠南边，都是种的花，还有两缸荷花。刘格平在东跨院的三间客厅里读书学习。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外加练习书法写字。老先生对于书法有研究，虽然不是专家，但那老一套写法，那些基本功是很有造诣的。只是在他家，除了他的孙子韩进外，刘格平很少能和其他的人接触，无法开展青年团的工作。但刘格平总是想着如能在太行山、恒山、北平燕山、山东泰山等地，各建立一部分武装，一起起来包围北平，占领北平，那样革命，不是就能很快成功了吗？那时这些纯属梦想，武装从哪里来？兵源怎么办？刘格平都没有想到。但是这种想法，促使他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屡搞武装，认为革命是不能离开武装斗争的。但是缺乏用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来指导武装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更是认识不足，所以多次尝试搞武装斗争都失败了。

刘格平每隔十天、半月回到家乡一次，召集团支部开会。他带领团支部开展的斗争主要是反苛捐杂税。1923年春节时，在堤东、帽圈、刘石桥、杨石桥等地，他们撒播传单，反对牲畜宰杀税。农历腊月廿五日这天，是新县镇春节前的最后一场大集，人山人海，赶集的人特别多，牛肉、羊肉和大肉的卖肉案子就有200多个。收税的有十几个人，每人手持一根棍子。刘子芳领着十几个人向收税的走去，走到跟前，问：“你收什么税？”那人恶狠狠地说：“要你管闲事，我们收的是屠宰税！你是干什么的？”刘子芳趁那人没注意，上去抡了他一巴掌：“我就是要打你这收屠宰税的！”接着又有两人上去把领头收税的那个税官撂倒。这一下子，双方就动手打起架来。不一会儿收税的被刘子芳打得落荒而逃了，背的钱搭子也丢了一地。消息传开后，周围集镇，再也没人敢收屠宰税了。

在这次艰苦斗争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中，刘格平和几位同志在大、小堤东又发展了王锡山、刘树林、张凤臣等十几个回族青少年入团，不仅有学生、手枪队员，还有长工、佃户的子弟。

正当刘格平把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3年6月，黎元洪被直系军阀驱赶下台。为了使曹锟当上总统，直系军阀指派部下积极筹措贿选活动经费。曹锟指令直隶省长王承



斌一人派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邢台、广平一带，逮捕制毒犯百余人解到天津，令其缴纳千元至数万元的费用，就将其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个县，每县筹措1万元至3万元不等。9月，王承斌又向议员提出，在选举前发给每张选票5千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持票兑现。10月5日，曹锟当上了大总统。趁此世称“贿选总统”的混乱时机，刘格平在王帽圈也建立了团小组。11月，他和刘子芳一起在韩石桥、杨石桥、王石桥、新县、挂甲林等村也都建立了团小组。使津南地区的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壮大和发展，把革命的火种撒遍了津南大地。

192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小于子约刘格平来到法租界中国广告社的楼下一个很狭小的房间里，屋里已挤着七八个人。到七八点的时候，于方舟轻轻地走了进来，讲述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方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按照组织安排作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他讲了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益于共产党的发展，也可以帮助国民党改组；他还谈到了孙中山和廖仲恺、邓演达“左”派和国民党邹鲁、谢持、张继等右派的斗争，这些右派反对和共产党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谈到了吴稚晖在会场上表演的丑态。于方舟又谈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将其损失转嫁到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中国名义上是协约国、参战国，可是战胜德、奥以后，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青岛原为德国占据，现又被日本夺去，台湾仍被日本占领，沿海一带英、法、日租界仍旧存在，享受着什么领事裁判权、在中国驻军等等特权。特别是帝国主义支持军阀连年打内战，日本支持张作霖，英、美支持吴佩孚。张、吴现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我们更要加紧工作，准备组织工农，扩大党团组织，反对军阀他们打内战。在谈话中，刘格平等几个人也询问了于方舟一些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作答。如有人问：“我们能不能在奉军里面活动，要他们内部起来倒戈？”他表示：“只要有关系，当然可以。”又有人问：“农民能不能组织武装？”他举例回答：“广东海丰等县，澎湃就组织有农民自卫军。”刘格平听了以后，心里就萌生出了建立党的农民武装的想法。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也是在1924年春，刘格平的父亲刘垣三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想组织一支地方武装，便请求刘格平的表兄，时任交通总长的吴毓麟给搞一部分枪支。表兄吴毓麟给直隶省长王承斌写了一封信，说津南地区闹土匪，当地组织民团防匪，需要一部分枪支。王承斌送给刘云镜100支新进口的捷克造洋枪。这样再加上刘格平自己家看家护院的20多人和所配枪弹，就组成了100多人的民团，刘云镜自任“团总”。刘格平认为这是发展武装的一个大好机会，就于11月离开韩家集回到家里，接着又到天津找到小于子。小于子带来一个姓李的同志，刘格平就把这事向他作了汇报。几天后，李姓同志指示刘格平：天津党组织没有什么意见，让刘格平自己考虑决定。以后在小于子那里才得悉：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有的同意搞武装，有的不同意搞，说在北方搞武装的条件还不具备。刘格平在天津待了几天，也看到了一些党的文件，如《向导》，对全国的发展形势和世界形势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孙中山在南方推行“联俄、俄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好消息鼓舞着刘格平。

回到了家乡，父亲让他训练民团。刘格平就按照革命需要和军事要求，对民团团员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有意安排了一些青年团员进去。同时，他又把在南京上军校时的兵友郭有发、薛庆胜叫来担任班长。在他们的训练和带领下，民团每天上课、出操、唱歌，真还有个正规军的样子。除教练军事技术外，刘格平还抓住一切适当场合和机会，向民团团丁们讲解革命道理，灌输革命思想，指导带领他们惩处个别恶霸和为非作歹分子。

在此期间，直奉两系军阀矛盾激化，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内部的冯玉祥在热河前线倒戈反对吴佩孚，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曹锟下台，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失败而宣告结束。奉军一举入关，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命在这次交战中出力立功的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为直隶省督军，占据了省会天津。借此军阀混战之机，共产党的组织在北方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又因刘家与直系的关系，反而受到打击。

奉军在沧县、泊镇各驻着一个旅，旅长先后为胡毓坤、张宪。张宪这个人很坏，以“剿匪”为名，在泊镇大肆烧杀抢掠，搜刮民财。对回族群众更为残



酷。杀害无辜回民四五百人，将几十个回民村划为“匪区”。张宪派出一个营驻扎孟村，这个营的营长姓金。听说刘格平家操练民团的枪支是通过北京国民政府原交通总长吴毓麟和原直隶省长王承斌搞来的，并且还听说刘格平宣传“赤化”，便逐级上报，使张宪、李景林、张作霖等军阀大为恼火，必欲速除之而后快。因为吴毓麟、王承斌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跟前的红人，自然也就成了奉系军阀的冤家对头。于是，奉军就以刘格平家通匪、窝匪、宣传“赤化”的罪名进行打击。

立冬时节，刘垣三为三少爷刘格平办喜事，媳妇是刘格平的表姐杨依梅，就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夜<sup>①</sup>，张宪命金营长率兵包围了大堤东村，全部抄没了民团枪支，挨家挨户地查抄了一遍。官兵闯进刘格平的家，没说青红皂白，就把刘格平抓了起来，同时还抓了大少爷刘重霄。堤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得知奉军抓了刘格平后，迅速召集团员开会研究对策。当夜刘子芳、刘景泉等，就骑上车子、毛驴等，火速到各村送信，发动群众救人。由于刘垣三在这一带的回族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回民老乡们又很齐心，再加上青年团组织积极发动和团员带头，人们一听说要为刘家解围，都乐于相助。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到天亮时，周围二三十里的村庄，就聚集了数万人。截住奉军不让把刘格平他们带走。人们高喊着：“不准带走好人！”“不准冤枉好人！”呼喊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金营长一见群众的庞大阵势，也不敢胡来，只好拱手向大家说道：“让两位少爷跟兄弟走一趟，和长官见见面就回来，不然兄弟我交不了差，请大家一定放心，保证没有别的事！”在金营长的连连许诺下，群众让开了一条路。金营长就把刘格平和他大哥送到泊镇旅部。张宪心狠手辣，信手批了个条子：堤东民团勾结直军，通匪窝匪，鼓动“赤化”，国法难容，速送现洋1万元罚金赎人，限期半月，否则就地正法。

刘垣三在天津闻悉自己的两个儿子被抓，急忙回到了大堤东村，四处托人周旋，送银元，摆宴席，换来了足有半尺厚的各军阀师旅长、津南各县县长和当地乡绅名流的保状纸。并把它们送到了张宪的办公桌上。只认金钱、不认人

<sup>①</sup> 刘格平与杨依梅婚后没有同房，就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杨依梅与刘格平离婚没离家，守空房65年。建国后生活费一直由刘格平供给，享年89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张宪气急败坏地说：“人，我是非杀不可，我倒要看刘垣三这个回回<sup>①</sup>老头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正当刘垣三救子无门，感到万分绝望的时候，刘垣三的老朋友、南皮县郝村威望很高的前清秀才郝和斋和能说会道的律师单玉竹自告奋勇，要求面见旅长张宪，为刘垣三说理求情。张宪还是不允，说已收到几百件告刘格平“通共窝匪”的状子。

单玉竹说：“这纯粹是仇人的诬告之词，绝对不符实情。我自己就能一宿写出几百份笔迹不同谋害好人的状子来！”

张宪说：“你要能出几百份不一样的状子来，我可以不杀刘格平！”

在张宪的办公室里，单玉竹秉烛夜战，真的一宿就写出了200多份的笔迹各异的状子。但贪婪地张宪说：死罪可免，但1万元的罚金一分也不能少。

在刘格平的父亲四处托人解救刘格平哥俩的时候，当地青年团组织也在刘子芳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们通过各村的团员，以刘格平父亲刘垣三的名义，发动起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天天到沧县、泊镇等地的车站、码头上卧轨、阻船、请愿、闹事，要求释放刘格平兄弟俩，给军阀张宪施加压力。郝和斋和单玉竹二人从张宪处回来，告诉刘云镜：张宪非要收拿1万块大洋才能放人。

刘垣三觉得救出两个儿子要紧，只好豁出一切，倾家荡产，卖了200多亩地，还取出了天津布厂和钱庄的股份，凑足了大洋2万块，给了张宪及部下一万几千块，请客送礼花掉几千块，正好全部花光。张宪才不甘心地释放了刘格平哥俩出狱。刘格平在临走的时候，对看守意味深长地说：“后会有期！”

刘格平出狱后，看到民团枪没了，也散伙了，他苦心经营准备把它变为革命武装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创的家业也赔了一半多。感到在家乡闹革命难以成功，于是决定去天津找党的组织。这次被捕使刘格平受到一次洗礼，经受一次锤炼。同时也看到反动军阀对各族群众的畏惧，看到群众的力量。使刘格平更坚定了发动群众、打倒军阀的信心。

---

<sup>①</sup> 回回：旧时对回族的简称。



## 深入河南国民第二军开展兵运，在天津组织工人武装起义，虽败却是共产党在北方领导武装斗争的早期尝试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直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sup>①</sup>，因不满当局的腐败和吴佩孚的排除异己，联合第二军司令胡景翼<sup>②</sup>、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了北京并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中华民国国民军下辖国民第一军，占据北京、察哈尔一带，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国民第二军则占领整个河南省，由胡景翼统领；国民第三军占据保定以南，由孙岳统领。国民军顺应时势，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又与占据天津、山东的奉军形成对峙局面。但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第二次直奉大战一共持续了50多天，最后以直军主力全部覆没和吴佩孚的狼狈南逃而宣告结束。直系军阀垮台之后，张作霖违背他做出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军进入了北京并排斥冯玉祥，实际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把中国人民又拖进了新的痛苦的深渊。

形势的变化，需要刘格平尽快了解党的新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1925年2月，婚庆洞房夜被军阀抓走刚获释的刘格平来到天津辗转找到于方舟和李同志，汇报了津南地区工作情况以及自己被捕情况，同时请示如何继续开展革命

<sup>①</sup> 冯玉祥，1882年生于安徽巢县。清末加入淮军，民国初改投袁世凯，后又从属直系军阀，任旅长，师长。率部队入陕西，任陕西督军，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底发动反奉战争，攻占天津。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司令。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打击和清除共产党人。后又与蒋介石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被撤职，赴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美国返回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因所乘轮船失火而遇难。

<sup>②</sup> 胡景翼，1892生于陕西富平，早年同盟会会员。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为陕西护法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后被直系收编为陕军第一师。1924年10月暗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倒直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发动北京政变。11月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工作。过了几天，组织上派人通知刘格平，北方我党总的任务是配合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扫清封建军阀势力。近期主要是团结、推动国民第一、二、三军，反对奉军，尽快把奉军赶出山海关去。上级组织还要求在落实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为此，天津党的组织决定派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到国民军中搞兵运工作，希望刘格平能设法进入到河南的国民第二军去。

按照上级要求，刘格平很快到了河南开封。这时，国民军的局面又有新的变化。国民第二军司令胡景翼病故，其第二师师长岳维峻<sup>①</sup>接替了国民第二军军长职务还兼河南省督军。胡景翼属于进步的老同盟会会员，信仰三民主义，愿意和共产党接近。而岳维峻则思想偏右，缺乏政治头脑，加之吴佩孚也在战争失败后从天津逃到武汉，收集残兵败将，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河南。面对较为复杂的形势，刘格平不敢轻举妄动，他在开封行宫角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伺机行事，因为这里离回民居住区很近，吃饭方便。

1925年5月，仍没有打开局面的刘格平心中十分着急，便决定找以前在天津办补习学校的兰秀山先生帮忙。没有想到的是，刘格平在兰秀山那里碰到了也来到河南的张隐韬，这真是意外之喜！两人都很高兴。第二天，张隐韬热情地领刘格平到他的住处，介绍了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吴亦生，也把刘格平介绍给了大家。知道都是自己人后，大家便开始把谈话切入正题。张隐韬刚从黄埔军校毕业，是受南方党的组织派遣而来。他首先介绍了南方的革命情况，主要是国共合作、配合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推动北伐等等。然后，张隐韬分析了今后的形势，他特别说到，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为防止意外的变化我们要有自己的武装。张隐韬十分坚定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必备条件。”吴亦生立即表示响应，显然他们的认识是事先沟通好的。

这时，一个长脸的、看似二十五六岁的同志似乎对此表示犹豫，他说，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多做群众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与张隐韬发生了争执。那个长脸的同志有点激动地说：“枪弹是不成问题的，关键

<sup>①</sup> 岳维峻，早年中国同盟会成员，后一直追随胡景翼。胡景翼死后开始逐步疏远、反对共产党。1931年3月率部进犯鄂豫皖苏区被俘，公判后被处决，成为红军反“围剿”作战中第一个被活捉并处决的国民党军师长。



要发动群众。”又有一位30来岁、大伙都叫他老刘的同志也说：“现在有些人就怕我们在他的军队里活动，盯得很紧。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不宜过早冒险。”显然，老刘也不同意到军队中去搞兵运。

又有人指着刘格平说：“听听他的！”刘格平注意到，反对搞兵运的几个同志都是天津组织派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搞不清楚，但他们指明让自己发言，显然是想获得更多的支持，可刘格平的想法却与张隐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肯定地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为什么军阀厉害，帝国主义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有枪有炮有兵舰！另外，通过兵运发展训练有素的武装比搞群众武装要快许多。”张隐韬则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青年革命同志的情绪，他对于有人不同意搞武装是很气愤的。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得到刘格平的支持，马上就补充说：“在国民军中发展思想进步的军人参加共产党，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建立党支部，我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还激动地说：“我是一名军人，革命不搞革命武装，用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那种革命是肯定不会成功的。从南方革命的形势看，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这一要求很快也会适应我们这里的。”这样，到军队中去做好兵运工作，伺机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的想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赞成。刘格平想，当初天津地委派遣自己到国民第二军就是搞兵运，支持张隐韬与执行这个任务是一致的。

从张隐韬住处出来，走在街上，张隐韬对刘格平说：“你看出来了没有？我们党内是有人不同意搞武装的。”他特别说：“天津党的组织很乱，相互不服气，有主张搞武装的，也有反对搞武装的；有主张向农村发展的，也有人主张只依靠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张隐韬还说：“你比我好办，你这个回民圈圈别人插不上，他们也不好反对你。我呢，也不听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放手搞我们自己的武装，一定要坚定思想。”刘格平感觉到，张隐韬是有用心的，他不希望自己过多地卷入天津党内的无实际意义的争论之中，所以几次到天津，张隐韬并不太主张刘格平去直接联系天津地委。后来，天津党内的相互争斗竟发生了有人为了打击对方而去敌人那里告密的事情，刘格平认识到张隐韬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在保护自己。

在开封行宫角一家陕西饭馆里，张隐韬请刘格平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然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后又邀他到宋朝故宫遗址龙亭去游玩。俩人一面走一面谈，张隐韬介绍了南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建议刘格平应该到南方的上海、广州和武汉去看看。他最后说：“你还是先到军队里去，等一切稳妥了，我们再联系。”临分手时，张隐韬说他明天要到卫辉府（即现在豫北的汲县）国民第二军史可轩<sup>①</sup>旅长的部队去开展工作。

不久，刘格平也离开开封，到卫辉府去了。因为兰秀山给他介绍的一位在陕西曾和于佑任共过事的老国民党员刘守中<sup>②</sup>，就住在卫辉府豫北道尹公署。刘格平找到他，谈起要武装起来驱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他表示赞成，问：“你能组织多少人和枪？”刘格平说：“组织上千人，甚至上万人都不成问题。”他说：“好，我找一些能帮你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给大伙谈一谈。”

按照俩人的约定，刘格平在旅馆附近吃完晚饭，就直接去了纱厂。门口的人很快领他到了刘守中的屋里。等刘守中吃完饭，又领刘格平来到了张继的屋子，刘格平知道张继是西山会议派的人，但张继不知道刘格平的身份。刘守中向张继介绍说：“他是你的老乡。”张继问刘格平是沧县哪个村的？还问了一些个人的情况。刘格平一一回答后，张继说：“我那里还有亲戚。听刘先生说你组织武装打奉军，这很好！是个有志向的青年，我们很赞成，国民党可以帮助你，国民军也可以帮助你。”

张继是南皮县孙清屯人，和刘格平的家乡孟村距离很近。他说：“很好，今晚这里约了好些人，你可以讲讲你的打算。”这时，刘守中进来叫他们。

进入五六月间，天气逐渐开始热了，刘格平跟着他们俩来到了房子北面，这里是一片草坪，摆放着很多藤椅。有十四五个人已经在此等候了。他们当中有豫北道尹、当地驻军头目、省政府参议、秘书长等。刘守中首先介绍说：

---

<sup>①</sup> 史可轩，1890年生于陕西兴平，1926年5月经王若飞和陈家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保卫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2月，中共陕甘区委筹办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1927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召开“徐州会议”，决定反共清党。史可轩决定率部队离开西安，开往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在途经美原镇时，被驻防在那里的国民第二军师长田春生杀害。

<sup>②</sup> 刘守中（1882-1941）陕西富平人，早年同盟会员。1917年在渭北联络组织靖国军，响应护法，1920年任靖国军总指挥。1924年10月，与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后脱离政界隐居。1936年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抗战爆发后，往来于南京、武汉、重庆之间，积极主张抗战。



“这位青年，是张继先生的亲戚。他要讲讲如何打败奉军，并说可以组织一批军队在天津周围响应我们。”刘守中说完，在座的人中有人发出轻蔑地笑声，可能觉得刘格平太年轻，有点看不起。张继补充说：“他在回民中有办法，就让他先给大家讲讲。”刘格平其实事先也没有准备，就把和张隐韬在一起议论时的意见拿了出来。他说：“诸位先生，奉军入关，军纪败坏，为非作歹，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苛捐杂税特别多。当地老百姓都想起来反抗并把他们赶走。只要国民军从天津以北、以西和西南方向对军阀展开进攻，我就可以在天津以南组织大批武装进行响应。来个里应外合。”刘格平还着重介绍了津南几县群众的情况和可以组织起来的理由。张继听后只是笑，不知是赞成，还是看刘格平年轻而表示轻视和不信任。刘守中说：“你谈得很好，我们可以帮助你，你以后还可以找我。”看到他们要开什么会，刘格平就先离开了。

几天以后，刘格平在卫辉府遇到了张隐韬，就把这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张隐韬希望刘格平再抓紧和这些人联系，但也要提高警惕，这里面有些人是很坏的。他说：“我们有个同志在纱厂工人中开展活动，纱厂方面收买驻军，把我们的同志抓起来打了个半死。”他分析认为，这群人中只有刘守中还比较正派，是省政府的参议，在陕西军队里他说话也是有分量的，其他人都不可过分信任。

过了几天，刘格平又去纱厂找刘守中，可他却去了辉县百泉度假。刘格平只好再去找张隐韬，张问：“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我还想去找刘守中，要他介绍我到军队中去。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再看看吧。”刘格平说。

张隐韬说：“那你不如就到新乡史可轩那里去，那里有我们的党组织。”他接着说：“你以后要再找我，先找靠近纱厂的小学里一位姓刘的女教师。你看，说着说着，她就来了。”这时，推门进来了一位20岁左右的姑娘，亭亭玉立，秀美端庄，怀里抱着两本书。见到有外人，她有点羞涩地说：“我来送书，想再借两本。”张隐韬问：“这些书，你觉得有意思吗？”她说：“很有意思，我爱看。”说着，她从书桌上又挑选了两本书。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刘格平。他以后要来找我，先找到你，你知道我搬的新地方。”张隐韬说。那个姑娘说：“行，我一般都不会离开这个学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校。那你们俩先聊，我要走了。”说完，就自然大方地走了。

张隐韬说：“她积极要求进步，我想发展她人团！走，咱们找一家‘清真’饭馆去吃饭。”

刘格平便跟着张隐韬出了门，一边走，一边谈。“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饭馆是个盐商开的，是一个同志介绍给我的。他很好客，也同情我们。但是这些人是不会起来闹革命的。”张隐韬认为这个盐商只是关心时事，不会真心革命，只能作为党的统战对象。接着他把话题又转到了如何组织革命的军队上面。但究竟怎么个组织法，他也一时没有想出来。

在盐商刘先生家，他们吃了羊肉面条。张隐韬边吃饭，边给刘格平讲述国共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情。

从饭馆出来，他们走到十字路口，又碰到了那位小学教员刘小姐。张隐韬就和她一起走了。刘格平也回到了自己住的旅馆。

晚上，刘格平还是决定去辉县百泉。第二天，他到了小学校找到那位刘小姐，她带他到了张隐韬住的地方。张隐韬这时正在抄写一份新到的中央指示。他抄完后给刘格平看，内容是中央指示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华北各省，共产党同志可继续协助为其创设组织，但同时要特别注意发展我们党自己的力量。指示中还说，在北方军阀中，奉军应是最大的打击对象，我党同志要积极协助国民军，反对奉军。

刘格平告诉张隐韬，他决定现在去找刘守中，请他写信介绍自己到军队里去。张隐韬说：“你来的正好，中央指示要我们协助国民军，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去组织我们自己的武装。”说完，他很激动地喘了一口气，喝了一口水，又说：“你要争取到驻在洛阳的邓宝珊第七师，我去在新乡的史可轩旅，这两部分部队都比较好，里面都有我们的共产党员，你到部队后要来信，咱们要保持联系，你可用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刘格平说：“好吧，咱们能分头去这两个部队最好，我到百泉后再听听刘守中的意见。”

和张隐韬分手后，第二天一大早，刘格平就去了百泉。

从卫辉到百泉25公里，几乎全是石子路，那天的天气又很热，刘格平早晨走得匆忙，也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中间也没有休息，几个钟头的奔波真是又



渴、又饿、又累。当他走到一个卖布的小铺子时，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就拐了进去一头躺在木架凳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格平只听见有人着急地问：“先生，你怎么了？”刘格平睁开眼睛一看，问他的人大约40多岁，可能是个掌柜的。他没有力气说话，只是轻轻地摆了摆手。他们就给端来一杯开水，扶着刘格平喝了，慢慢地感到身体有劲就起来了，挣扎着问掌柜的到百泉还有多远。那个掌柜的告诉他：“还有5华里。”

刘格平又稍事休息后，便又一口气走到了百泉，找到刘守中。刘守中是个侠肝义胆的好人，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在像刘格平这样的年轻人身上，他马上给写了一封信，让刘格平去找史可轩。刘格平想：也好，能与张隐韬在一起，遇事可以商量，毕竟自己对兵运工作还不熟悉。谢过了刘守中的挽留，刘格平又上了路，在辉县简单吃了点东西，就直奔新乡去了。

天快黑的时候，刘格平赶到了新乡史可轩旅司令部，把刘守中写的介绍信递了上去。一会儿出来两个人，带他进去见到了史可轩。史可轩有30多岁，是陕西兴平人，说一口关中普通话，不久前刚调任国民第二军三旅旅长，正带着部队在河南新乡整训。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史可轩可以算是最进步的人士。1924年他在郑州当警备司令时，使二七大罢工后被破坏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得以恢复，陇海铁路工会、焦作煤矿工会、郑州纱厂工会等也在此时先后成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并结为好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表赞成，并将王若飞送给他的革命书籍视如至宝，随身携带抽空即读。但他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此刘格平对他还不能亮明真实身份，只能礼节性地打招呼。

史可轩同样施礼后，即吩咐马弁们在西院先给这位新来的刘先生找个住的地方，并安排他吃点儿饭。刘格平心想，晚上他该找我谈谈了。可是住了两三天，只接到一个上尉副官的委任状。史的司令部组织很简单，只有军需处长、副官长，少校副官各一名、上尉副官两名。

过了一个星期，史可轩才找刘格平谈话。他说：“我到开封开会去了，研究如何打奉军。按照部署，我部和邓宝珊部负责协同在冀南的国民第三军、北面的国民第一军共同攻打占据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不知你对李景林军队的具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体情况是否了解？”

刘格平说：“我知道他们只有三四万人，加上张作霖支援他们的两三万人，顶多有6万人。张作霖很明白国民军是能打仗的，国民第二军也很有战斗力，他派的部队再多也没有多少胜算。”史可轩点点头说：“你可不可以早做准备，尽快回到天津去，搞个里应外合。”刘格平略作思考后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后，他便给张隐韬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到史可轩旅所了解的情况，并请张转告党组织。

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张隐韬和河南党组织共4个人也来到史可轩旅。史可轩实际和张隐韬已很熟悉，他让张隐韬当他的副官，这个副官相当于副旅长。他还邀请张隐韬他们组织了一个军人俱乐部，对部队增加了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内容。军人俱乐部负责组织部队学习时事，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由吴亦生任组长，张隐韬任副组长。很快，张隐韬他们和部队党组织也接上了头，这里的共产党员有担任教练所所长的任警哉、担任独立营营长的许权中<sup>①</sup>。张隐韬和史可轩商议后，先派人进入到每个团去当政治教员或宣传员，还由张隐韬、吴亦生、吴天民每周给团里干部讲一次形势课，讲课的地方就在张隐韬他们的住处，是过去黎元洪办的一座废弃的铁工厂。

刘格平很快就注意到，在史可轩的部队中，下级干部对讲形势课很感兴趣，甚至有时听得入神，但团营的干部几乎没人参加。有好几个团营骨干都是吴佩孚的老部下，这些人是定时炸弹，他们反对张作霖是很积极的，但要让他们反对吴佩孚，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刘格平还听张隐韬说，他曾经想介绍史可轩参加共产党，但史可轩认为时机不到，过一段再说。现在看来，史可轩是对那些旧军人有顾虑，但他想要争取他们，想保留这支部队。史可轩采取的办法，一方面是他不公开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一方面是他为张隐韬创造活动的条件，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张隐韬与史可轩认识，是经王若飞的介绍，所以史可轩当然知道张隐韬是共产党员。但刘格平却没有暴露身份，张隐韬也让他暂时不要暴露，为了便于一旦有了情况时能保持与史可轩的联系。

<sup>①</sup> 任警哉、许权中均为我党早期党员。许权中，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国民第二军中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追随史可轩与邓小平一道创办中山军事学校，许权中任总队长。史可轩被杀害后，许权中接替其为部队总指挥。1928年，他带领部队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起义失败后，余部在陕北继续坚持斗争。



在这里，刘格平差不多每天都要和张隐韬见面，有时也碰上任警哉、许权中，他们虽然也知道刘格平的身份，但大家都很慎重，从不发生直接关系。

有一天下午，张隐韬高兴地对刘格平说：“你看，有人给我来信了，他们同意我们抓枪杆子，我正在考虑怎么搞法，还得有一定的力量，才能站得住。”

“他是省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与我一起打陈炯明的同志和战友。”张隐韬说完又咧嘴笑了。

刘格平也笑着说：“我想按照史可轩的安排到天津去，在城市内部响应；或者在天津南组织武装，配合军队袭击天津。”

张隐韬说：“我正在考虑，现在我们党在军队里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这里不像南方。南方主要军队基本都掌握在我们党手里，如第三、四、六军都由我们的骨干掌握。第五军只有5000人，军长李福林，是个土匪队伍改编起来的，战斗力差。第一军蒋介石兼着军长，他不大相信共产党，但下边却有不少共产党。”

“蒋介石不是你们黄埔军校的校长吗？”刘格平插问。

张隐韬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在教官和学生中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蒋介石借这个机会也培养自己的势力。”

最后，张隐韬又谈了谈形势。他说：“苏联发展很快，各个帝国主义也都在忙于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经济，意图下一次瓜分世界时能占据有利地位。它们都盯着中国这块肥肉，特别是日本，掌握了张作霖。我们反奉系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南边的孙传芳、吴佩孚被英国和美国所掌握。现在日本人十分猖狂，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枪杀了顾正红，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在河南国民第二军，实际不是很支持反日斗争的，他们表面上只是对反日的行动不表示反对而已。”刘格平在一旁认真地听着张隐韬滔滔不绝地讲着，直到夜里快12点多了才离开。

这时天空一片漆黑，只有几颗耀眼的星星在天空闪烁。刘格平边走边想着张隐韬刚才讲的话。没有注意，刚走到铁路桥时，忽然一辆倒车的火车冲到了他眼前，他急中生智，赶紧爬上了桥栏杆，他用双手紧紧抓着栏杆，全身都吊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栏杆上。一直等火车慢慢倒回去，刘格平使了很大的劲才翻了上来。刚才真是惊险的一幕啊！要么被火车压死，要么手没抓好栏杆掉到河里，淹不死也得摔死。虽然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可刘格平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走回司令部，他的膀子有些疼痛，但由于劳累，很快也就睡着了。

七八月间，刘格平又看到一份文件，说的是这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强调了革命中农民的重要性。刘格平从中还是没有看到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比如：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很重要，但靠什么才能发动起来？还有关于如何建立自己武装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刘格平就问张隐韬：“这怎么办啊？”

张隐韬说：“中央对有些问题难以明确，要看我们怎样去理解怎样去干。你看，文件最后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统治，这个意思就是组织武装！”他又说：“不然怎么去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他们都有兵舰和大炮，有机枪、步枪，他们绝不肯轻易放下屠刀的，我们就是要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要以牙还牙。开始搞武装，不一定很多，也不可能很多，但要组织严密，要用革命的思想来建立，要知道我们建立武装的目的，知道为什么去打仗。”张隐韬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孙中山开始时组织了好几万人的军队，比陈炯明多了两三倍，却被陈炯明打败了！可是黄埔学生军只有500人，第一次就打败陈炯明上万人，这靠的是什么呢？我一直在想，你也要好好想一想。”

刘格平每次听张隐韬的讲话都受益很大，他无比佩服地看着张隐韬，觉得他知道的事情很多，很有眼光，他为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大哥和战友感到无比庆幸和高兴，他表示完全同意张隐韬的认识。他们还一同研究究竟在平原上怎样打游击战争？为什么土匪能隐蔽活动得很好，而我们有群众支持的革命武装，隐蔽活动却那么困难？……虽然对此他俩谁也不懂，但这些困惑着他们的问题却令他们讨论起来十分热烈。

毕竟他们都还很年轻，既缺乏理论也缺乏经验，思考问题也还不全面、不成熟，没有从土地这一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去考虑。工人运动，可以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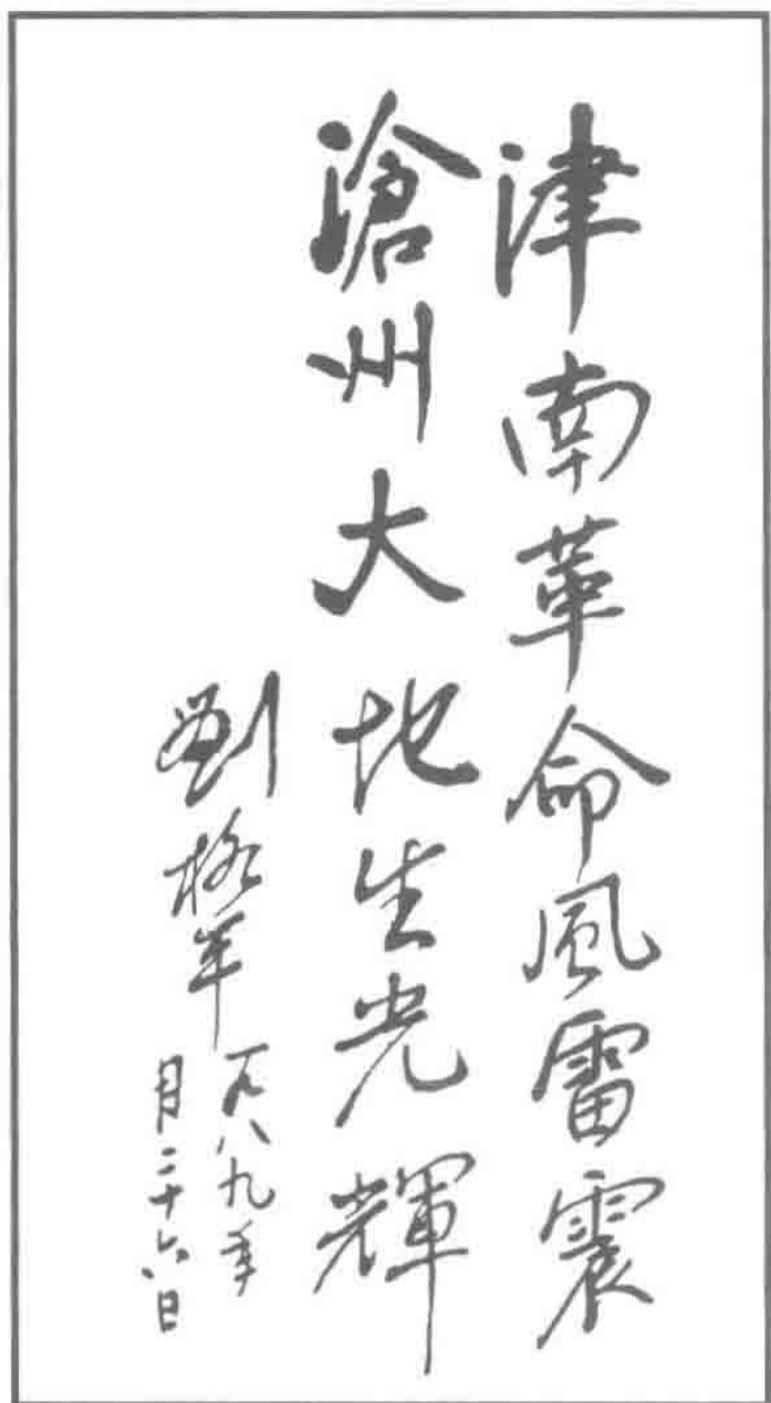
组织工会，提高工资，使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力量增强，这从二七大罢工中可以看到。但是农会在全国组织了几十万人，没有提出分配土地，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广东东江的澎湃，进行减租减息。可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也没有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央也没有给大家介绍广东的经验。显然，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随后，张隐韬和刘格平商议，由他去向郑州党组织请示一下，并到开封找几个部队去活动活动，由刘格平去与史可轩进一步沟通，然后在郑州碰面。

第二天，刘格平就找机会和史可轩谈了一次，也计划到驻在开封的别的部队去看一下。史可轩开始有点误会，以为刘格平想离开。刘格平说：“要打天津、打张作霖，光靠你这支部队几千人是不行的，必须多联合几个部队一起行动，成功的把握就会更大一些。”史可轩听后很高兴，他说：“邓宝珊有万余人，我要向岳维峻提出来，大概不成问题。也可以让邓做总指挥，你们会同意吧！”刘格平说张隐韬上郑州去，都联络好了再商谈具体的事。”史可轩意识到张隐韬是去找共产党的组织，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的考虑。

刘格平回到司令部，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就搭上了去郑州的火车，当天晚上赶到了开封，仍住在南大街行宫角的旅馆里。他先去驻扎在开封附近的骑兵旅找到了旅长马乾三。马是甘肃回民，三十五六岁，留着大胡子，他有2000多匹马。他知道刘格平也是回民，所以见了很热情。刘格平给他讲了老百姓特别是穆斯林群众，在奉军占领下的悲惨遭遇。他听后很气愤，说早就向岳督办说过，要想法子全部消灭掉军阀军队，至少也要将山东、直隶的奉军消灭掉。马乾三表示，如果他和史可轩能调在一起，一定好好合作。后来，马乾三在山东西南部打张宗昌，带领骑兵冲锋时牺牲了。他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抱负的爱国主义者，行事也十分顾全大局，刘格平对他的牺牲感到十分惋惜。

接着，刘格平到郑州找到了党组织的老李。当时吴亦生正生病。老李对刘格平说：“张隐韬在这里等了你两天，没等住就先走了。我是很同意你们去放手搞的，你们在军队工作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干就是了。”他还对刘格平



为中共沧州地委党史研究室征编辑的《津南星火》一书题词

说：“我和隐韬是黄埔同学，他很倔犟。他对于你是很称赞的。”吴亦生躺在床上，也表示赞成搞武装。

1925年八九月间，刘格平回到新乡，又和张隐韬商议了一次。任警哉、许权中没参加，教练所的另外两名军官，也是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这次研究决定：刘格平先按史可轩的安排到天津一带活动，张隐韬组织一支小队伍插到津浦路以东活动，最后和刘格平在天津或天津以南汇合。

散会后，刘格平回到司令部，找到史可轩最后落实打奉军的时间。

史可轩说：“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和邓宝珊配合国民第3军、国民第1军从不同方向向天津进攻，想派你先进天津去看看。”因为已经和张隐韬商量过，刘格平就答应先联络一下，了解清楚

那边的情况。

谈完话后，刘格平就到俱乐部找到了张隐韬，将史可轩的安排告诉他，张隐韬随即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刘格平回到司令部一会儿就接到通知，让他马上赶到车站。刘格平是骑马赶到车站的，他上了一节公事车，上面有国民党中央委员王励斋<sup>①</sup>，还有岳维峻的代表、国民第二军驻天津办事处主任彭季强，他们的任务是去和冯玉祥接头。他们在火车上简单交流了一下情况，火车到达北京站后，彭季强<sup>②</sup>对刘格平说了声：“咱们天津见！”就下了车，刘格平随即转车回到天津。他没有料到，以后在天津暴动时，真的和彭季强进行了合作。

<sup>①</sup> 王励斋，1869年生于河北高阳。清末赴日本留学，老同盟会员，积极支持孙中山讨袁，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党。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追随汪精卫反对蒋介石。1939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1年5月在成都病故。

<sup>②</sup> 彭季强，1894年生于陕西白水。少时肄业于陕西陆军小学校。早年参与陕西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1918年回国，先效力于陕西护法靖国军，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25年冬，配合国民军攻下天津，自任保安司令。1926年随国民军所部回陕，曾出任长安县长，1927年9月被军阀杀害。



到了天津，刘格平找到小于和李同志，后来又找到于方舟，谈了在天津组织暴动，协助国民军打倒奉系军阀的计划。于方舟答应，可以帮助组织一部分工人群众进行响应，他说：“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不懂得军事。”刘格平说：“那没关系，可以先组织起来，初步训练一下，有这些人当骨干再训练别人。”刘格平又找到王敬轩，因为他在北洋军队干过，让他也帮助组织一部分即在旧军队当过兵又相对可靠的人。

这时彭季强也回到天津，他主动联络上刘格平，说是把在火车上谈的情况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并受冯玉祥委派来协助刘格平的，它的任务是把一部分化了装的国民军引进天津。

人的问题刚有了一点儿着落，刘格平就立马赶回沧县去找刘子芳。听了刘子芳的汇报，刘格平觉得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展不快，便马上又召集了五六个人开会，决定王俊峰向乐陵发展，刘子芳向沧县、盐山发展，并组织了一个军事小组，由刘子芳负责。在刘格平的家乡那一带，枪是不缺的，不但地主有枪，土匪有枪，有的群众手里也有一部分枪。纸房村有个叫柏凌云的，在旧军队当过连长，经过商议和动员，他也答应组织一支武装。为避免进城时枪被敌人查出来而坏了大事，刘格平最后决定，如果天津暴动需要，津南方面只去人不带枪。

接着，刘格平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天津找彭季强商议，说：“人有了，枪怎么办？”彭季强说：“日本豪福洋行的豪福先生可以卖给我们匣子枪，只要有钱，要多少给多少。”豪福是一个日本商人，在日租界开办了一个洋行，专门从日本往中国倒卖枪支弹药，彭季强聘他兼任了办事处的顾问。刘格平说：“资金问题还有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钱来。”彭季强说：“我和他说好了先不给钱，等成功以后再说。”

刘格平一听大喜，感到大问题解决了，一下子松了一口气。他说：“对这里的情况，我需要回去沟通一下，再回来。”彭季强表示同意，说：“战事快发生了，你应速去速回。”

刘格平在天津上了火车。一路上他看到奉军在杨村一带刨挖战壕，过了杨村不远的地方，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也在挖战壕。双方剑拔弩张，战争真有一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触即发之势。到了北京，刘格平不敢停留，遂即转车回到新乡。他先跑到俱乐部找到张隐韬，报告了天津的情况，张隐韬也在积极活动。但他说：“要史可轩拿很多的钱，这是不大可能的，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刘格平说：“日本人豪福答应供给几百支匣子枪，事成后要求多给点钱，大概一支枪要多加20%。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史可轩出钱，包括军服、子弹等，彭季强都答应负责解决，他说想办法让岳维峻出一笔钱。”张隐韬又说：“我打算在史可轩这里借一部分人和枪，直接插到山东、直隶交界的地方，或者到铁路以东去。”

张隐韬当时已经意识到，即使在天津暴动成功，也很难在天津立足，因为这里是李景林、冯玉祥、张作霖几家军阀的必争之地。他打算在天津南部、胶济路以北广大地区搞一支武装，就在这个三角地带活动、生存下来。而且，北方的混战还要一个时期，在这个空间、时间里，正好发展壮大我们自己的武装。

刘格平又到司令部找到史可轩旅长，把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

史可轩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命令。原来计划没有变，我和邓宝珊的第七师配合国民第三军，打下保定后，即从德州以北向沧县、天津进攻。你走时，我再派一个副官跟你去。”刘格平想，他们大概还是不放心，也就不管他们派什么人了。

在司令部里住了两天，刘格平又和张隐韬、任警哉、许权中接了一下头，便互道珍重返回天津。史可轩为刘格平配的那位40多岁的老副官，是旅副官长兼参谋长的亲信，是个老牌直系，在旅里是管军需的，但却一文钱都没带。走的时候，史可轩告诉他说：刘格平有钱有办法，他就跟着来了。可是此人一点作用也没有，即没钱也不会打仗，反而成了负担。他还带了一个小警卫员，三个人化装成老百姓，一路很顺利地进了天津城内的法租界，下榻佛照楼饭店。但因为这里的设备不大好，一天还要花4元钱。住了几天后，他们就搬到了中国旅馆，房子比较阔气。



天津党组织的于方舟、江浩<sup>①</sup>、李立三（李锡九）常到这里来和刘格平一起谈谈情况，他们建议：战事一起，应重点关注金刚桥和红桥，那里是天津的咽喉，离李景林的督办公署也不远。刘格平经过考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制定出一个计划。但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却让国民军钻了空子。

战争还没打起来，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在这里住了20多天，刘格平身上的钱全都用完了，没办法只有到家人那里去借，他大哥是管家，埋怨刘格平不务正业，不肯借给他钱。还好，他从父亲那里弄到些钱。可是刘格平组织的那批人，有的有职业，有的无职业，每天的生活都要开销几十元。

豪福洋行坐落在天津区即今天的和平路，是一栋两层楼房，楼房后院有宽敞的地下室。日本人豪福从卖军火赚了钱，就同意他们用这间地下室。同志们把门窗封闭好，把300多人的队伍分成几批学习装子弹、打枪，以尽快提高杀敌的本领。虽然训练的地点离旭街马路很近，但因过往的人车很多，在外面也听不到枪声。

刘格平住在旅馆，却迟迟不见国民军行动。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但没有接到改变计划的通知又没有办法。钱又花得差不多了，只好托人找了小白楼一家五金店后院去住。这里是英租界，刘格平是每天晚上需要出去活动，回来时很不方便。

终于，国民军在天津的北面、西面、西南面和奉军打起来了。可是打了十几天，国民军却没有没有什么突破。天津督办李景林自己的部队加上张作霖支援他的部队，正如刘格平所估计的，总共有六七万人。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有5万多人，第二军有2万多人，第三军有3万多人，加起来还比李景林的力量要大许多，论战斗力也不差，可就是没有很大的进展，形成了相持局面。看来是指

<sup>①</sup> 江浩、李锡九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江浩（1880-1931），河北省玉田县人，一生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事审判所所长，负责镇压反革命军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浩同毛泽东、宋庆龄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与一切假冒革命名义者坚决斗争。不久，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宣布开除其党籍并下令通缉。1931年因病逝世于海参崴，享年51岁。中国共产党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毛泽东称赞其为“象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

李锡九（1872.1.1-1952.3.10），河北省安平县人。1922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受托参与筹建中共顺直省委。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1930年任阎锡山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解放前夕，作为傅作义的秘密使者，前往西柏坡商谈北平和平解放事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刘格平一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3月10日在北京逝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挥和配合太差，打仗办法不多，只知道正面硬攻，不知道迂回或找对方一些弱点。

刘格平在五金店的后院住了十几天，发现有英国巡捕房的密探经常在附近探头探脑的，形迹可疑。就又搬到了张庄大桥义庆里40号，虽然这里还是英租界，但这里是中共天津地委的办公地点。江浩、老李立三、于方舟他们热情地来看望大家，表示欢迎。这里是个两层楼，有前、后门。刘格平着急地每天到后面的凉台上去几次，向西北面、北面翘望，期盼战事有所进展。在战争打得激烈的时候，可以看到三四十里外的黄土飞扬，可以听到轰轰的炮声。天津地委把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袁子贞介绍给刘格平做他的副指挥，带了20多位青年工人参加训练。

12月23日，刘格平又到凉台上去翘望，江浩也跟了上去。刘格平观察了一会儿，说：“国民军快到北仓了，看尘土应该在20里开外了。”江浩笑着说：“你是懂军事的，看得出来？”刘格平说：“真的，要赶快行动，敌人已快退过北仓了。”行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刘格平看到国民军已攻到北仓，就急忙赶到豪福洋行。工人们很早已经聚齐，连豪福都很着急，他把洋行的大门也关了，雇来的几十辆汽车停放在院子里，正在待命出发。刘格平先带了两个人，全副武装地驱车疾驰到义庆里40号门口，叫来袁子贞等人并给他们换好军装，挎上枪和子弹带。紧接着，刘格平和袁子贞一行又回到了豪福洋行，指挥这支穿着国民军服装、佩戴两边红中间白臂标的的工人武装冲了出去。

几十辆汽车开出了洋行大院，前面4辆轿车，每辆车挤了6个人。第5辆车是刘格平和袁子贞，第6辆车是彭季强和日本人豪福。工人武装队伍刚刚驶出日本租界地，冲在前面的同志已经把李景林督察处的30多名士兵缴了械。这时，后面的队伍出了点问题。日本租界的出路口有十几个兵站岗，而且垒着麻袋。刚冲出来时他们也没问，但一看后面跟了这么多辆的车，就拦住不让过了。经豪福跑回去找日本兵交涉了一阵子才又放行。

这支工人武装的前锋部队沿东马路一直前进，路上几十步远就有一群投降的督察处士兵。负责收枪的几辆车走得较慢，后面的车就赶到前面。一部分人



抢占了李景林侄子李树风所在的大胡同子南头的督察处，大部分工人向金钢桥方向冲击。突然杀出来的这批人让敌人懵了头，糊里糊涂就被缴了枪。只用了一个多钟头，工人武装已经缴了四五百敌人的械。

李景林的督办公署，就在离金钢桥不远的一个衙门里。当他听到督察处被工人武装占领后，慌不择路地带领少数人向东逃跑了。奉军顿时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一触即溃，又被工人武装俘虏了不少。由于工人武装的人数有限，让一小部分奉军转过红桥，顺着北马路和西马路向小站方向逃窜，奔山东方向去了。

刘格平和袁子贞带领的100多人，除派一小部分去占领红桥，堵截逃跑之敌外，大部人马从故衣街、北马路往西，一直冲到北大关。路上只遇到零星敌人的无力抵抗，一冲杀就纷纷缴枪投降了。到了北大关，碰到了敌人的大部队正往西逃。刘格平带领部队又从马路两边，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没想到国民军从天而降，纷纷投降。刘格平派人把他们送回设在督察处的司令部。然后，又率领部队追到西门。到了西南城角时，天已经黑了，这里仍有部分敌人在商店打砸抢劫，也有敌人仍负隅顽抗。刘格平挥枪击毙了几个敌人，剩下的人就老实了，都放下了武器。这时，袁子贞身体不适，看起来病得厉害，刘格平就安排人扶他上马，送他回去休息。袁子贞是位好同志，在这次天津暴动后，刘格平就不知道他的下落和情况了，据说后来牺牲了。

到天明的时候，周围还有零星的枪声，战事基本平息下来。刘格平带领的工人武装虽说也有个别人受伤，但缴获了大批的步枪、机枪和马匹。初步清点了一下，枪有3000多支，马有1500多匹，还有3门山炮。在敌人督察处，还发现了几十箱子现大洋，大约有20多万元。

这时，国民第二军驻天津办事处主任彭季强张贴布告，自命为第二军天津保安司令。刘格平查问是怎么回事，彭说是经过岳维峻和邓宝珊同意的。刘格平顾不上过多的盘问，带着几个人骑马到海河以北去查看战况，见到把守金钢桥、红桥的都是自己的人，还没有什么国民军的大部队开过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格平没有想到的是，彭季强又坐着小汽车擅自跑到韩复榘<sup>①</sup>第六混成旅司令部去炫耀，还将这支工人武装队伍不到300人的底细以及战果情况统统都给泄漏了出去。韩复榘打奉军一个多月，收缴的枪没有几支，一听这些就立刻翻了脸。他原以为是国民第二军先从南面打进来的，现在一听是国民第二军的一小部分潜伏在天津的工人武装搞的，立即就把彭季强扣了起来，把彭及警卫人员的枪也给缴了。当工人武装的骑兵走到造币厂门口韩复榘的司令部时，突然一下子从门里涌出几十名士兵，把工人武装的枪马都收了。刘格平只好亲自去交涉，质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狡辩地说，为了防止敌人还在城里活动而必须严密防范。与这些人无法讲理，只好让他们放了抓走的工人同志了事。

当刘格平再带着人返回时，看到金钢桥上的军队已经换成了国民第一军。走到大胡同南头，看到自己的司令部已经被国民第一军的几百人团团包围着，几辆卡车正在从里面往外搬东西。刘格平走进去，看到一些穿着军装的工人武装被集合在一个角落。从他们眼神中看得出诧异和吃惊，怎么国民军进来后先下了我们的武器，都是自己人么？还有几个提着匣子枪的国民第一军的人走来走去。刘格平上前去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个士兵指着他旁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人说：“这是我们的副官。”这位副官长斜着眼瞅了瞅刘格平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国民第二军的。”刘格平说。“你有证明吗？”他问道。

刘格平把身上带的国民第二军前线总指挥邓宝珊、副总指挥史可轩的证明给他看。这位副官长的神态稍有缓和，但嘴里还嘟囔着：“你是第二军派到天津的指挥？为什么跑到我们第一军这里来？”刘格平懒得与他多说废话，厉声说道：“这些武器和东西是我们缴获的，你们不能拿走，我们队伍马上也要开过来了。”那位副官阴阳怪气的说：“我们都装了车怎么办呀。再说，谁让你们二军的跑到我们一军这里来的？我们只好给你打个收条，以后让上面去评理吧。”这让刘格平十分气愤，可又很无奈。国民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嫡系，这个理是没法评的，眼下人家又是人多势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说：“这房子

<sup>①</sup> 韩复榘，1890年生于直隶省顺天府霸州胜芳镇（今河北省霸州市）。少年时投奔新军冯玉祥部，后随冯玉祥起义。民国时在国民军第一军中任旅长、师长。后出任山东省主席。抗战中，因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毙，终年49岁。



我们要用，必须留下！”那位副官长马上谦恭地答应下来，即刻指挥他的人马把缴获的东西搬完并一一写了收条，就一溜烟地全跑了。刘格平进屋一看，他们除了床铺家具没拿走外，甚至把床单、被子、桌布都拿走了，桌上、地下却扔有直隶省的详图。这群酒囊饭袋只知道抢钱抢物，却不认识地图是个好东西！刘格平赶紧把地图都收起来交给了天津地委。以后刘格平临时负责军委工作时，曾向省委要这些地图，竟然再找不到了，十分可惜。

经彭季强、韩复榘和冯玉祥第一军这样一折腾，让刘格平进一步认清了这些军阀无赖的本质。只是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武装，多数人也散去了。

工人武装配合国民军占领天津后，原来奉军督察处靠街的一面，现在改为国民军的办事处，彭季强仍为办事处主任。里面靠西面驻扎着史可轩的一个团，团长是陈贯三。东面一部分作为旅部，但史可轩没来，因此只有刘格平、张副官和几个办事人员、警卫人员住着。

几天后，史可轩到了天津。在彭季强的第二军办事处，谈起了韩复榘收枪的事。史可轩说：“我们一直在静海县一带往里打，但敌人抵抗得很硬，你们的方向与我们不一致，还花了好几万元也没给我们搞到几条枪。”听口气，史可轩十分不满。彭季强想推卸责任，避重就轻地说：“其实是我们先占领了督察处、金刚桥、红桥，可是韩复榘没有本事去缴奉军的枪，却一进来就抢我们缴的枪。”刘格平也很激动，冲着史、彭生气地说：“我们是来帮你们的，我们党的组织帮了很大的忙都没说什么。你们仗打得软、进来的晚，还有人往韩复榘门上送。”刘格平上次从天津回新乡与史可轩沟通情况时，已经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就直言不讳的这样说。彭季强心虚，一听刘格平这样说，怕被揭了老底，赶紧打起了圆场：“可轩，花的三四万元钱由军部出，我马上去办。格平专门从缴获的枪里给你留了300支，已经交给军需处了，我可连一支枪都没剩啊。”彭季强说的，是刘格平嫌史可轩派来的那位副官是累赘，早早就把缴获的300条枪交给他，打发他走了。史可轩的军需处还替刘格平偿还了从父亲那里借的3000元钱。

从这以后，刘格平就住在司令部里。但经常到官银号金桥饭店党的公开机关去请示汇报工作。他找于方舟、江浩谈，希望借势把工人武装拉起来。为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此，于方舟专门召集开了一次会，大家认真分析了几点，一是我们独自建立武装的时机还不到，特别是党的当前方针是配合国民军打击直、奉军阀，如果独立建立武装，可能会影响与国民军的合作；二是许多人都是为配合国民军打天津而临时组织的，还没有搞长期武装的准备；三是目前形势下，即使建立起武装，生存起来也比较困难，首先天津是不能待的。此事也就此作罢。

这次由刘格平直接领导的工人武装配合国民军打击反动军阀的行动，虽然公开打出的旗号是国民军，但实际上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天津组织的高度重视，在关键问题上还受到党的明确指示。可以说，这是共产党在北方最早的一次武装斗争实践。后来于方舟告诉刘格平，他就此次行动向中共北方区委做过专门汇报。而此次行动的直接影响，是使天津党内主张建立武装的同志受到鼓舞，更坚定了信心。



## 农民自卫军奋战失利，张隐韬慷慨就义，激励刘格平排除万难，踏着英烈的血迹前进

1926年的元旦刚过，刘格平忽然接到一份来自直隶省庆云县的电报。拆开一看，是张隐韬发来的，希望刘格平马上到庆云县城去找他。电报上说，已搞到了一部分枪弹，还建立了一支武装，旗号是津南农民自卫军。刘格平看到这个消息很兴奋也很激动，因为组织自己的武装一直是他和张隐韬追求的梦想。自从在新乡与张隐韬分手后，他们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联系了，忽然得到这个好消息，刘格平真是心里乐开了花。他立即去向位于天津官银号金桥饭店的天津地委进行汇报，时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的于方舟指示他说：

“你先去看一下，下一步如何动作，我们了解情况后再研究决定。”

这样，刘格平立即坐上火车南下，赶到沧县。又从沧县坐马拉轿车向东南行程35公里，途经盐山，当晚就赶到了庆云县。在庆云县城西关，驻扎着津南农民自卫队第一大队，共有300来人。刘格平见了大队领导里的几个熟人，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还有两个大队驻在旧县镇（今盐山县千童镇）。

这支农民自卫军队伍刚刚建立起来2个月，主要活动在乐陵县北部、南皮东部、盐山县南部、沧县



1989年，刘格平（前排左三）与中共庆云县委干部合影，庆云县党组织是刘格平1927年创建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东南部。张隐韬任农民自卫军总司令，陈秀福任农民自卫军副总司令。

提起陈秀福这个人，刘格平其实在国民第二军时就认识。他是庆云县后陈庄人，在国民第二军当过参议，属国民党右派，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专和北洋军阀的上层人士打交道，和劳苦大众出身的官兵们搞不拢，他对张隐韬也不很配合。现在驻庆云县城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就是陈秀福的侄子，他原来在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sup>①</sup>部当过连长。刘格平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在新乡分手时，张隐韬曾提起陈秀福给他来过信。由于当时分手比较急，刘格平只是一般性地提醒过张隐韬对此人要警惕。没有想到两个人现在成了搭档，看来当初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张隐韬的重视，事已至此刘格平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在这里，刘格平看到张隐韬组织和领导的这支津南农民自卫军组织纪律性很强，不骚扰群众。但其中一部分人是陈秀福从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部带来的，兵痞习气较重，自由散漫缺乏战斗力。还有一部分人是收编的散兵游勇和地方民团成员，估计是临时纠集而来。比较好的是张隐韬从史可轩旅带过来的一部分人，素质比较好。总体看这支队伍的致命弱点是军官骨干成分混杂，政治觉悟普遍不高，党团员就更加缺少。

因为张隐韬去天津还没回来，刘格平在庆云县城等了3天。这时，旧县镇派人送来了一封信，是陈秀福要刘格平赶快去一趟，陈秀福还安排好让自卫军一大队派了几个骑兵护送。

庆云县到旧县镇，大约有30公里，是一马平川的产棉区。沿途村庄比较稠密，大多都是土坯房，而且很破烂。时值冬末，地里没有几个人劳作，远远望过去满眼都是荒凉、贫瘠的景象。刘格平一行人几匹马沿着缺少雨水滋润的土路飞奔，带起了滚滚风尘。到旧县镇时，人人都变成全身上下浑然一色的“土人”。

见到了陈秀福，他一边命人给刘格平一行拍打身上的浮土，一边不停地说：“欢迎，欢迎！”等刘格平洗完脸，他又哭丧着脸说：“隐韬在津南南皮、盐山、庆云一带，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全国发了个《津南农民自卫军宣

<sup>①</sup> 弓富魁，国民党陆军中将，1879年生于山西原平。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大同、包头一带活动。后加入胡景翼部，随其参加“北京政变”。转任国民军第二军骑兵旅旅长兼步兵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军第六军军长、孙良诚部第二路军司令等职，1938年3月病逝于西安。



言》，把这支队伍称为农民自卫军，这不就等于公开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么？我担心队伍刚刚建立，各方面还都不成熟，真正打起来怕很难自卫吧。”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怕什么，你不是也赞成共产党吗！国民不是也都表示赞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吗！”刘格平说道。

“我叫你来，是想拜托你到盐山国民第三军门致中<sup>①</sup>那里去做做工作，防备他们袭击自卫军。”陈秀福面色缓和了些。

刘格平觉得为了自卫军的生存和发展，就答应了陈秀福。

盐山县城离旧县镇大约20多公里，途中10多公里处，就是刘格平的家乡大堤东。于是，他带着两个人骑上快马，先回到了堤东村。到村子后立即找到刘子芳，了解到这里的共青团组织已经扩大，团员发展到50多人了，附近十多个回、汉民村庄都建立了团支部。刘格平主持成立了津南堤东团工委，任命刘子芳为团工委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汉族青年长工马田为青年委员，军事训练由刘景泉负责。有人说上级来人指导较少，没有多少学习宣传的文件和资料，工作不知怎么开展。刘格平把这次回家的意图一说，大伙儿非常高兴，都凑到刘格平面前问这问那。

乡亲们原来以为自卫军与国民军是一回事。后来看到这支队伍不打扰老百姓，感到很惊奇，正纳闷这支军队是怎么一回事呢！刘格平向他们解释说：

“农民自卫军曾打过国民第二军的旗号，但不同于国民军，它是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自卫军的司令就是当年介绍他入团的黄埔毕业生张隐韬。大伙一听很高兴，有人还想去参加。刘子芳也提出是否立即到旧县镇，直接去找张隐韬联系。刘格平告诉他们说：“张隐韬去天津还没回来，现在自卫军的处境有点不利，必要时要请你们搞点人和枪去支援一下，现在自己要先作好充分的准备。”刘格平希望他们能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去配合农民自卫军。

大伙异口同声地说：“咱回回心齐，千儿八百的一招呼就来，万儿八千的也能召集起来！”刘子芳认为自己有一部分枪，加之这一带地主卫队、民团、

<sup>①</sup> 门致中（1888-1951），吉林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冯玉祥所部团、旅、师长，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抗战期间成为汪伪上将。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先遣军第九军总司令，不久避居香港。1951年病死。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警察、盐警、土匪及贩私盐帮等，仅附近几个县粗略估计一下，手里大约就有上万支枪，所以配合自卫军组织起一支武装是可能的。刘格平听后心中稍显平静了一些。

在刘子芳家吃过午饭，就骑上快马，告别家乡，赶到了盐山县城国民第三军门致中旅的驻地。

一行3人来到司令部门前，刘格平让警卫员向门岗说明是他们从旧县镇来的，这时大门口的警卫已增加到一个班，一个个端着枪，瞪着眼，真有点弓上弦、剑出鞘的样子，拦住刘格平，不准他进门。这时出来一个军官，看刘格平穿着便衣，又听说是从旧县来的，就以敌视的眼光盯着刘格平问：“你们是那一部分的？”

刘格平从容地说：“是国民第二军二师三旅的。”

“有什么事吗？”

“要见你们门旅长。”

刘格平说着就把国民第二军副官的证件递了过去！这个军官拿过证件看了一眼，转身进到里面，很快就出来了，阴郁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

“请进！”就把刘格平领进一间会客室，“请你稍候。”说着出去了。刘格平环顾四周，只见房间里摆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老式硬木家具，椅子上还铺着红坐垫，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刘格平正想看看是谁的字画，这时，进来了一个肩扛上校军衔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你好，这是我们参谋长。”先前那个军官上前介绍说。参谋长不自然地说我们还以为你是农民自卫军的人呢。刚才看了你的证件才知道是国民第二军的，快坐、快坐！咱们是友军，打天津时，我们旅还是你们旅的左翼呢。”

刘格平说：“农民自卫军和我们也一样，都是友军，都是进步的。”

参谋长说：“不是我们跟农民自卫军过不去，是你们的岳督办有通令，要收缴这部分人的枪。”

刘格平说：“这也是一支反奉系张作霖的军队，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他们一起干呢？”

看到参谋长不愿多讲，刘格平继续说：“我在那里有几个朋友，我去看过



他们。这支队伍纪律性很好，很有战斗力。”

参谋长问：“他们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那方圆几十里到处都是他们的队伍，看来人枪不少呢。”刘格平故意说给这个参谋长听。“我来，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我们一共3个人。”刘格平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参谋长面露窘色，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刘格平又对那个参谋长说：“你看，咱们目前的局面，是南面张宗昌向北攻，张作霖在东北往南打，吴佩孚和孙传芳也在蠢蠢欲动，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农民自卫军帮我们打张作霖，打奉军，我们应该是一个阵营的呀！”刘格平反复陈述利害，那个参谋长也反复解释说他们对张隐韬和自卫军原来不了解，是上级通知他们要注意农民自卫军行动。刘格平由此得到证明，国民第3军也发出了敌视自卫军的命令。但是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没有听出他们有攻打自卫军的意思，有所放心也就不打算再找门致中了。

刘格平告别出来，又返回大堤东，帮助刘子芳安排了下一步组织武装的计划，研究了如何帮助自卫军摆脱困境的办法，晚上他就赶回到了旧县镇。

正好，刘格平去找陈秀福，张隐韬也从天津回来了。他们久别重逢，显得格外高兴。张隐韬说：“我给你发了电报以后，怕你来不了，我就又去了天津，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刘格平说了他见到电报后十分焦急的心情和先去向天津党组织领导人于方舟汇报的情况。

刘格平把在天津如何组织工人武装，如何收缴奉军李景林部的枪支弹药，韩复榘如何对战利品坐享其成，国民军进天津后就解散工人武装等情况向张隐韬一一作了汇报。

张隐韬向刘格平介绍了他组织建立津南农民自卫军的过程：1925年秋天，刘格平告别张隐韬去天津不久，为配合国民军攻打天津，张隐韬便从史可轩旅借了一部分人和枪，又收留了一部分人。他还向国民第二军弓富魁的第六混成旅借了10多支枪，携同国民第二军参议、津南庆云老乡陈秀福，于10月底乘京汉线火车，离开河南新乡北上到了石家庄，然后又徒步东进，在河北藁城集结，组成了一支有四五十个人枪的小部队，打着国民第二军的旗号，继续东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进。途经晋县、深县、武强、交河等县，一路招兵买马、壮大队伍。行军半个多月，到达泊头镇时，队伍已扩大至四五百人。张隐韬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在泊头镇召开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张隐韬任司令陈秀福任副司令，举行武装起义。自卫军当场颁布了军政纲要和组织纪律，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利益”等口号。队伍浩浩荡荡向东开拔，穿过津浦路，占领了南皮县城。县城的地主民团、警察，一看这支队伍开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自卫军缴了100多支枪。初战告捷，官兵们士气高涨。

可是陈秀福总怕得罪地方上层势力，擅自出面又是说情又是妥协，最后竟然把缴获来的枪支又还给了他们。

张隐韬和陈秀福意见不一，但是为了自卫军的发展，就派人去把县长找来谈判。他向县长做了通报，津南农民自卫军的目标是与国民军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国民革命。然后与县长约法三章：第一，这支队伍的吃饭和军饷问题需要县长与其他5个县协调，从各个县里的收入中给予解决。第二，南皮这一带农民负担过重，生活很苦，身为父母官应该体察民情。今后不准横征暴敛，要取消各种苛捐杂税。第三，支持自卫军和穷苦农民起来打击土豪劣绅，不准侵犯农民利益。

说完这三条后，张隐韬双眼盯着县长问怎么样？

县长的鼻梁上架着个金丝边眼睛，阴阳怪气地说不明白什么叫横征，什么叫暴敛，也分不清什么是苛捐，什么是杂税。接着态度生硬地说：“我只知道不征不敛，不收税捐，钱不会从天而降。你们所要的经费、军饷，本人又从哪里提供！”显然，县长依仗他是由国民军委任的，上边有硬根子，根本没把张隐韬看在眼里。

县长的这种态度一下子把张隐韬惹火了，他本来就对这些依赖军阀势力搜刮民财，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员反感，加上陈秀福私下里与县长勾勾搭搭，再加上今天让这个县长给了这么个窝囊气，气更不打一处来。他站起高高的身躯，伸出大大的手掌，抓住县长的脖领子，砰呼啪啪地打了县长几个耳光。县长被打得眼镜也掉在地上。张隐韬怒气冲冲地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大声说：



“听着！你敢不照这三条办，我就枪毙了你。”

县长吓得立即就变软了，连连赔礼道歉，并急忙叫人取来5000元现大洋交给张隐韬，说是先弥补一下自卫军的支出。

自卫军在南皮县城驻了几天，继续东进，开往盐山。路过唐家务和郝庄，这里分别是张隐韬的老家及外祖父的家乡，众乡亲听说为老百姓撑腰掌驾的农民自卫军来了，隐韬当上了司令，顿时沸腾起来，纷纷拥到村头，夹道欢迎，问寒问暖。许多童年的小伙伴、小同学，见张隐韬身穿黄呢子军大衣，头戴大盖儿军官帽，腰间挎着小手枪，从高头大马上下下来，同男女老少打着招呼，真是羡慕极了，都凑到他身边，要求参加自卫军，跟他一块干。张隐韬命令副官在村头贴出募兵告示，摆上桌子和笔墨纸张，对要求报名入伍的逐个登记，择优录取了一部分乡亲入伍。

在唐家务只待了一天，张隐韬就告别了父老乡亲，带着队伍东行三四十公里，到了盐山县城，派人找来了县长。这个县长也是国民军委任的，原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旧部的政客，他视自卫军为乌合之众，视张隐韬为鲁莽之辈。当张隐韬提出约法三章之后，他蛮横地说：“什么约法三章，纯属无稽之谈！你们这帮乌合之众去喝西北风吧，我一个铜子儿也不给你们！”说完转身就走，傲慢地头也不回。愤怒的张隐韬抬手一枪，就把他送入了阴曹地府。接着，自卫军向南开进20公里，到达旧县镇，这里是河北的南皮、沧县、盐山和山东的乐陵、庆云、宁津等县的交界处，是个大村镇。自卫军分别驻在镇内各街，每天起早集合操练，整顿军容风纪。不久又进军庆云。庆云县城是驻山东的奉军张宗昌部的北部边远防地，驻有一个营的守兵。他们听说自卫军要来攻城，吓得弃城南逃。自卫军随即开进县城，收编地方民团100多人枪，庆云及东部附近的无棣等县，又有许多青年前来投军，全军发展到1000多人。

张隐韬见人马多了，武器装备也比较齐全了，便把部队整编成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手枪骑兵团，令第一大队镇守庆云，自己率第二、三大队和骑兵团，由庆云向西进发三四十公里，到达旧县镇，准备以这里为中心，在盐山南部、乐陵北部、沧县东南部、南皮东部、庆云西部一带休整发展，伺机与国民军配合。最初这支部队的管理教育仍然沿用的是军阀队伍的那一套，缺乏政治工作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和宣传工作，也没有和老百姓真正建立起联系，老百姓多是观望而不是支持。他们还谈到了陈秀福这个人，张隐韬说陈秀福从弓富魁那里借了几十个人和枪，原来不太了解，接触后感到他不太容易共事，对建立农民自卫军不大赞成。而且，他在部队中极力安插自己的势力，是一个投机分子。

农民自卫军成立几个月来，召集大会，发表宣言，严惩土豪劣绅，声威大震，轰动了整个津南地区，广大贫苦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部队走到哪里，那里的群众都热情迎送，真正把这支军队当作了为自己撑腰保驾的亲人来看待。

但是自卫军的一系列革命行动，也激起了土豪劣绅们的敌视和仇恨，他们派人上书，向国民军中他们的亲信告状，添油加醋地污蔑自卫军的正义行动，说什么自卫军宣传“赤化”、“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等等，要求国民军迅速予以剿灭。于是，国民第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命令弓富魁旅，由德州向北逼近，到达泊镇、南皮一带，伺机消灭自卫军。国民第三军也命令门致中旅，进驻盐山，对自卫军虎视眈眈。而自卫军又是刚刚成立，思想基础还不牢固，战斗力还很薄弱，这一严峻形势摆在了张隐韬和刘格平面前，他们连夜研究对策。

张隐韬谈到，这段时间使他深深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在孙中山同盟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比我们党较早的重视武装问题，而我们目前还在争论，还在摸索。我们公开拉自己武装的条件还不成熟！”张隐韬这样说。刘格平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他感觉到打出“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太仓促，许多困难和问题都没有预料到。张隐韬又说：“自卫军自成立以来，在津南打开了局面，群众很拥护。可惜力量太小，独立生存的困难很大。另外，共产党在北方的群众基础也很薄弱不如南方，特别是自卫军中只有少数几个党团员，这严重影响着队伍的整体素质。从国民军方面看，国民第二军中比较可靠的只有史可轩旅，史可轩，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同情和支持我党，是可以信赖的。特别是，这个旅有我们的党员许权中、任警哉等基本骨干。应该尽快把我们的自卫军拉到杨柳青一带，与许权中、任警哉部合编，才能得以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张隐韬说他这次到天津去，是去和史可轩联系，把这部分部队合到他们那里。那里有党的基础，更利于部队的壮大和发展。



刘格平一边听着张隐韬的分析，一边也在思索。他想不通，为什么军阀能随便拉队伍混战，祸国殃民却能横行于世，而共产党拉起的武装为民谋利却难以生存。他想起自己在天津费尽心血组织起来的工人起义军却轻而易举被韩复榘和国民第一军缴械解散，而自己是那样的无奈时，不免也感到些许悲哀。但当务之急是眼下，张隐韬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军面临生存困难，这支队伍又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刘格平想到大堤东的刘子芳他们，但觉得那里的力量也很薄弱且地理条件不利，还是无法去与岳维峻和门致中等人去抗衡的。又想到去天津找于方舟寻求天津党组织的支援，但刘格平深知，在那里我们党的力量也并不很强，五卅运动中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至今还在狱中，于方舟最多只能派给几个政治不成熟也不懂军事的青年学生，不能起多大作用。况且城市是旧军队集中的地方，会给自卫军的生存带来更大的困难。

于是，刘格平安慰张隐韬说：“不管怎么说，队伍拉起来了而且声势不小。下一步路走对了就不怕。我同意把队伍拉到史可轩那里，但是咱们已经打出了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就怕他有顾虑！”

两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也难以入睡。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一致意见还是应该去投奔史可轩。

说办就办！拂晓时刻张隐韬叫来了自卫军副司令陈秀福，他把与刘格平共同商量的下一步的打算，告诉陈秀福并征求他的意见。张隐韬还任命刘格平为农民自卫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拟把驻庆云的第一大队调来旧县镇会合后进行思想动员，准备将队伍带到泊镇，乘火车北上去找史可轩部。

陈秀福听后先是迟疑地说：“找史可轩行吗？到他那里，寄人篱下，要投也不一定去投他。恐怕队伍里也有人不同意。”刘格平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事，像他这样的政客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当初他之所以参加拉自卫军这支武装，也是冲着这个副司令来的，而且他与弓富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中肯定另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刘格平直接告诉陈秀福说：“把队伍拉到史旅长那里，是张司令同史旅长事先就说好的，早就定了的事，我们只能服从不能再犹豫！”陈秀福立即就抬起了杠：“你们是与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史可轩说好了打出农民自卫军旗号吗？”张隐韬一看发生了争执，还是想把矛盾平息下来，他扼要地讲述了把队伍拉往天津史可轩旅的理由后，便对陈秀福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了，我看这样，我和格平带一部分人先行一步，到了史旅长那里安排就绪后立即通知你。”陈秀福无奈，才勉强同意下来。

天亮后，张隐韬命令驻在县城的自卫军第一大队开到旧县镇。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各大队都到西街外广场上集合，张隐韬首先介绍说：“同志们，这是我们自卫军新来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刘格平。大家欢迎他讲话！”刘格平站起来向大家点了点头，说：“乡亲们，我们成立这支津南农民自卫军，拿起武器是为了进行自卫，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受军阀、土豪和洋人的欺负。要达到此目的，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目标和方向。张司令和我们商量后，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这个目标，共产党就是走的这条道路，走向这个目标的，所以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但是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很弱，我们首先要生存下去，去找能够收留我们的国民军是一个好办法。”接着，张隐韬针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部署和动员。按照张隐韬的安排，自卫军第一大队和手枪骑兵队作为先遣队，由张隐韬、刘格平等带领向泊镇方向进发。刘格平理解，之所以这样安排，因为陈秀福的侄子是自卫军第一大队队长，如果把他稳定在史可轩那里，就不怕陈秀福不去。

下午4点钟左右，张隐韬和刘格平率领着一支大约400人的队伍，顶着凛冽的西北风，迎着鲜红的晚霞，快速行进了9公里路，来到一个大村镇——南皮县寨子。刘格平和张隐韬肩并肩走在队伍的前面，张还给刘介绍了手枪骑兵队长，是一个20多岁的白面书生，文质彬彬，却缺乏英豪之气。让人看起来真不敢相信他能带兵打仗？

这时太阳就要落下去了，队伍开进村子。张隐韬、刘格平刚住进一个地主的庭院，警卫员就来报告说，国民第三军驻盐山的门致中旅，派人到这里来号房子了，大约有一班人。张隐韬、刘格平命令立即把他们的头儿找来。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说是奉旅部命令先来号房子，他们的部队要来这里驻防，准备还击奉军张宗昌部。他们走后，张隐韬对刘格平说：“门致中是不是要来打咱们的？咱们怎么办呢？”二人沉思踌躇了一下，张隐韬说：



“抓紧把队伍拉到泊镇上火车，到那里给史可轩发个电报，要他派人来接我们。”刘格平说：“第一大队今天从庆云县城出发，经过旧县也没休息，到这里已经徒步行军六七十华里了，太疲劳了，这里距泊头镇还有百十里地，天也太晚了。”他们想：津浦路从德州到天津，都是国民第二军的防线，一旦相遇就说是史可轩旅的，而且都有证件，估计问题不大。门致中旅虽属国民第三军，但前几天刘格平曾去盐山旅部做过他们的工作，估计也不会找自卫军的麻烦。于是，张隐韬命令部队就地宿营，休息到夜间两点再出发。

部队从南皮县寨子半夜2时准时出发，到上午10时，顺利到达了南皮县城外。经过半宿行军，已经很疲惫的官兵们，这时情绪高涨了起来，盼着能进城好好休息休息。部队打前站的是个骑兵班，只见两个骑兵策马返回，一个报告说：“前边城门关了，不让进去。我们留下3个人正在那里同他们交涉。”一个接着说：“从把守城门的士兵看，好像城里没有什么正规部队，都是些民团和警察。”张隐韬一听，十分后悔地叹了口气说：“前几月从这里经过时，本来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枪，可又叫陈秀福退回给他们了，现在他们却又不叫我们进城。”他与刘格平商议决定，准备强行冲进县城后再休息吃饭，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并加强警戒。根据前哨的情报，他们有点大意，觉得城里民团、警察最多100来人，量他们也难以抵挡自卫军进城。

于是，刘格平先以国民第二军副官的身份前去交涉。他正向城门走着，迎面尘土飞扬，又跑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队，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史可轩旅的联络副官韩光琦<sup>①</sup>带队。他说：“我是史旅长从天津派来找弓富魁旅交涉的，要他们给你们自卫军让路，以便自卫军由泊头镇上火车北进。可是怎么说弓富魁也不答应，因为他已接到军长岳维俊的命令，要消灭自卫军。现在他已派了20名骑兵赶到南皮县城防守，不准自卫军进城，后续的大部队正在由桑园向南皮、泊镇开过来，请你们务必多加防备。”

刘格平一听情况紧急，便与韩光琦打了个招呼，立即返回报告张隐韬。两

<sup>①</sup> 韩光琦（1894-1972），字威西，陕西兴平人。1925年任国民军史可轩旅副官。1927年史可轩被杀害后，跟随许权中撤至临潼，许权中任旅长，韩任参谋长。1930年后，任杨虎城十七路军上校军需处长，西安绥靖公署上校军需处处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4年初改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十七路军参谋长，1936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被迫出国后，韩也受到冷遇而转办实业。1949年春，举家迁往成都。1972年去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人很快商量决定：部队立即行动，由南关绕道县城以东，向北直奔津浦路砖河车站上车，到杨柳青下车。并商定雇辆马拉轿车，由张隐韬乘车先行赶到车站。刘格平带领部队后行。张隐韬简要介绍了一下部队情况后，便带着几名警卫出发了。大队步兵在前面前进，刘格平随手枪队、骑兵队随后。刚走出十余步远，忽然前边响起枪声，接着有人喊：“前方哪来的马队？”刘格平在马上手搭额头望去，只见3里远处有一只马队飞奔而来，后面不远还有大队步兵。

这时，刘格平的第一反应是中了弓富魁旅的伏击。他立即命令身边的骑兵队长展开队形进行迎敌，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不要浪费子弹。但他也意识到：像自卫军这样缺乏训练和打仗经验的队伍，一般打仗尚且吃力，眼下遭受到的是伏击，麻烦将要降临。眨眼间敌人的马队已冲到近处，自卫军骑兵队、手枪队一起还击，先击退了敌军前头的马队。这时相距约50米远的张隐韬跳下马车，边跑边喊：“格平，快给我一匹马！”可是敌人几十匹马队紧跟着又冲上来，其来势凶猛，自卫军队伍还没做好再次还击的准备就已经被冲散。刘格平独自一人，已经来不及去接近张隐韬。他见敌人20多匹马队冲向张隐韬，张隐韬端着两把驳壳匣枪，一连打倒了几个敌人。刘格平冲张隐韬大喊：“快往东面村子里跑，我掩护你！”他举枪打倒了两名敌人骑兵，同时策马飞奔向与隐韬相反的方向，引开了追赶张隐韬的敌人。刘格平回头看到，张隐韬已经奔跑着进了村子。这时，刘格平的马受了伤，马鞍子也被打坏了。他只好跳下马来，伏在一处土崖下回击敌人。子弹又打光了，他只好顺势滚到土崖之下的沟里，沿着崖沟跑入不远的村中，翻身跳进一家院子并把手枪扔进了水缸，然后躲了起来。

大约过了个把时辰，刘格平听到村外没什么动静了，就悄悄地爬了出来。来到村头，只见敌人的马队还把村子包围着。有位好心的村民把他藏了起来，听村民说，军队围了好几个村子，在东村还抓了一个人。从村民描述的这个人的打扮和长相，刘格平一听就是自卫军司令张隐韬。他顿时心急如焚，想着要尽快设法营救张隐韬。那天，刘格平是一身老百姓装束，所以他壮着胆子慢悠悠地走出了村子。包围村子的敌人看他是老百姓，也没盘问，他就安全脱险了。



这时，天色昏暗，太阳就要落下去了。刘格平不敢在当地久留，严峻紧急的形势，迫使他必须立即对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抉择。他首先想到去找留守待命的自卫军，但思前想后他都觉得把握不大。首先，陈秀福是这部分人的实际指挥者，而正是陈秀福反对将自卫军拉到史可轩那里去；其次，陈秀福是个投机分子，万一他落井下石情况会更糟糕；再有，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的，仅凭自卫军的战斗力很可能是以卵击石。想到这些，刘格平便离开了村子，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向北走去。他冷静思考后的决定，还是去求救于史可轩。因为从史可轩派人找弓富魁为自卫军疏通来看，去找史可轩救张隐韬把握性更大。

天越走越黑，他的心也越走越焦急。从他在天津拉工人武装，缴获了奉军那么多的战利品，到张隐韬在津南成立农民自卫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胜利来得多么快呀！可是，只两三个月过去，一切都化成了泡影。现在，自己革命的引路人、亲密的战友也落入敌人魔掌，救出他来是唯一的心愿。

当刘格平心如火燎的赶到砖河火车站时，铁路上的人告诉他，晚上已经没有火车了。万般无奈的刘格平，只好就近找了一家旅店住下。这一夜他悲愤带焦虑，翻来覆去地一夜没有入睡。

天刚麻麻亮，刘格平就又到了车站。他先是给史可轩拍了一封电报，请他立即设法营救张隐韬，随后即坐上北去的火车赶到杨柳青。见到史可轩后，简单讲述了自卫军被围剿失败的具体经过。史可轩对张隐韬是很敬佩的，他没有想到国民军竟然会对自卫军动手，还抓了张隐韬。他十分气愤，立即给弓富魁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而又恳切的信件，希望他立即释放张隐韬。后来刘格平才知道，正是张隐韬的牺牲使史可轩彻底断绝了对国民军的幻想，使他转而坚定地投向了中国共产党。

刘格平拿上史可轩的亲笔信和旅部的介绍信，一刻也不敢停留，迅即赶到泊头镇找弓富魁要人。让刘格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弓富魁哭丧着脸说：“唉呀，晚啦！我下边的人已经把张隐韬枪毙了。”

“你是旅长，没有你的命令，谁敢枪毙他！”刘格平责问说。

“你知道张隐韬是什么人吗？他是广东革命政府派来的代表！”刘格平索性亮明了张隐韬的身份，因为国民军已与广东革命政府结成打击军阀的联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弓富魁一听，更加推卸罪责了，坚决不承认这是他下的命令，还打岔说：“老弟别生气，留在我这里，先安排你干个排长，今后绝不会亏待你。”

刘格平看弓富魁指望不上，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便匆匆离开了弓富魁的旅部，去找当地群众打探，才确认了张隐韬牺牲的消息。

刘格平怀着万分悲痛赶回天津，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报告给了于方舟。于方舟听说张隐韬牺牲了，非常难过，沉默了许久后说：“张隐韬的牺牲是我们党的损失，是革命的损失。”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都很悲痛。但要革命，牺牲总是难免的。我们需要无数次的失败和锻炼，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咱们也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但更需要树立革命的信心呀！”于方舟的话，对刘格平是安慰，更是教育与鼓舞。

不久，参加过津南农民自卫军的党团员相继来到天津，他们找到刘格平，汇报了自卫军的情况和张隐韬牺牲的经过。原来，在去砖河车站的路上，弓富魁派了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在南皮县城北的王庄和徐庄之间设伏截击自卫军。两军遭遇互相开了火，刚刚一打起来，自卫军战士们就听到有人大声喊叫不准开枪，不准还击！大家一看，原来喊话的是第一大队大队长，他边喊边在前面拦阻大家，还带头跪倒在地举手投降。前边部队失去指挥乱了阵脚而冲击到后边，自卫军立即溃不成军，大部分人被敌军缴了械，少数人弃枪或携枪逃散。当了俘虏的自卫军连以上骨干，包括那个大队长，都被弓富魁下令枪杀了。这个投降的大队长，就是自卫军副司令陈秀福的侄子，他在弓富魁部当过连长，也许想凭此保住自己小命，岂知弓富魁却把他的小命送上了西天。

敌军在徐庄抓住张隐韬以后，连夜押往旧县镇。自卫军手枪骑兵队被打散以后，也在当天夜间突破门致中旅在南皮县寨子等地的截击，退回到旧县镇，同陈秀福率领的另一部分自卫军会合。这时，旧县镇内自卫军还有800多人，而押送张隐韬的弓富魁部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加上穿便衣挎手枪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特务分子和一些民团成员，总共约600人。敌人到达自卫军的土围子后，就把五花大绑的张隐韬推到前面，让他喊话叫农民自卫军缴械投降，被严辞拒绝。敌人厉声威胁道：“你不下命令叫他们投降，就枪毙你。”张隐韬面对敌人的军队、农民自卫军，还有围观的老百姓，大义凛然。他以满





1926年张隐韬、刘格平（左五）领导津南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时，张隐韬被捕牺牲。1984年刘格平到张隐韬牺牲的地方——盐山县旧县镇西门外凭吊先烈

腔悲愤的心情，把刑场当讲坛，慷慨陈词地进行了演讲。他从自己的身世说起，“我是个梦生（即遗腹子），只有母亲在天津靠着给人当奶妈子维持生计，苦苦拉巴供我上学念书，长大成人后，母亲让我要为天下穷苦人办事。”许多士兵、战士和群众听的都流下了热泪。

张隐韬接着讲到外国列强早已觊觎中国而黑暗的军阀统治却丧权辱国，相互倾轧，把中国人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的现状。他讲到孙中山的革命，讲到共产党和工农政权，讲到共产党把自己送到黄埔军校，讲到农民自卫军。最后，张隐韬怒斥了弓富魁之流攻击友军，破坏革命，助纣为虐的丑恶行径。突然，敌人从张隐韬身后开了枪。张隐韬这位年仅24岁的优秀、勇敢的共产党员倒下了，时间是192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

听自卫军战士们说，一看自己司令被俘，当时就有许多人怒火中烧，纷纷要求冲出去救回自己的张司令。当时自卫军战士的情绪是可以利用的，如果部署得当，派人化妆接近到张隐韬身边去保护他，同时突然出击先打掉敌人的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胁，还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把人救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陈秀福即不让打，也不谋划如何去救人，他推说一打就给敌人有了杀害张隐韬的借口。

就这样，在数百名自卫军战士面前，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杀害了自己的司令。面对此情此景，自卫军战士和群众，甚至还包括敌人的士兵，都不免伤心地哭泣，都发出悲切地叹息。

敌军杀害了张隐韬以后，匆匆撤走了。自卫军战士们从万分悲痛和屈辱中回过神来，满眼含着热泪把烈士抬回镇内，剪断捆绑在他身上的铁丝，拭净他身上的血污，为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并盖上鲜艳的红绸子，找了一口柏木厚棺为他下了葬。

随后，自卫军战士们围住了陈秀福，他们质问陈秀福为什么见死不救，他们指责陈秀福不仁不义。“我们不干啦！”有人这样一喊，队伍散去了一多半。

一支新生的由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农民武装，就这样被罪恶的反动派扼杀在摇篮之中。

敌军抓住张隐韬往旧县镇押解时，在他的家乡唐家务村，还抓了张云起、张仁甫去赶马拉轿车。他们二人见到张隐韬被杀害，就火速回村告诉了张隐韬的本族兄弟张宝森、张宝成，很快到天津把张隐韬的母亲接回家来。不到20岁就守寡的张母，含辛茹苦，给资本家当佣人，唯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隐韬身上。她回家后听说儿子惨遭杀害，犹如晴天霹雳，一时昏厥过去，一连好多天不思饮食，难合泪眼，哭得死去活来。

乡亲们为了寄托对张隐韬的哀思，按照他母亲的意愿，把他的灵柩从旧县镇起回家来，在他外祖父家门上出殡，糊了纸人、纸马，还用纸草扎了个下令杀害他的弓富魁，一块烧掉，最后把宝驹（隐韬）安葬在唐家务村南的窑地里，还给他娶了阴亲，他的伯弟张宝成叫儿子玉江为隐韬承嗣，为张母养老送终。

刘格平听到事件的真实情况后，悲愤之余又生出愧疚，一连几天茶饭不进。刘格平之所以愧疚，是他想，如果自己当时在留守自卫军的驻地，是完全可以设法制伏陈秀福的，况且张隐韬的演讲也为实施营救争取了许多时间。刘



格平恨不得立刻回到史可轩旅，恨不得立刻集合起自卫军余部去为张隐韬报仇，但于方舟告诉他，组织上将要给他安排新的任务。

许多年以后，刘格平提起张隐韬，对其崇敬之情仍是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说：“我们那时都很年轻，仅凭着一腔革命的热血和对党坚定的信仰去拼搏。当年，不论是组建天津工人武装还是津南的农民自卫军，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一批有信念有目标的骨干，武装拉起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与政权和群众如何去结合。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有一个地理环境问题，这都决定了我们是很难成功的。只是隐韬同志死得太早，死得太可惜。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见证和亲历过中国现代史上军阀的混战、共产党的创建、黄埔军校的征伐、开滦和正太工人罢工等众多大事，一直到亲自组建农民军，这条生于兵荒马乱时代的冀南硬汉，流淌着的是满腔济世救国的热血。隐韬同志的精神永久地激励着我，入敌人的大牢时想到他的视死如归，身处逆境时想到他的坚韧不拔，一帆风顺时想到他以命相搏来之不易。隐韬同志牺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每当我忆及历历往事时，都耿耿于怀不能安然入睡！”<sup>①</sup>

张隐韬的入党介绍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章龙，1986年曾挥毫为张隐韬的墓碑题诗：

北国之强张隐韬，  
开滦正定显英豪。  
津南起义风云壮，  
功耀千秋勃海涛。

张隐韬两本生前的亲笔日记，记载了他20年代初奔走于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的情况；记载了他与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王尽美、何梦雄、张国焘等人的交往；记载了黄埔军校的学习、战斗生活。90高龄的罗章龙说，张隐韬去天津寻母，当上见习警察的第2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并迅速波及天津。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由周恩来等在天津领导的这一爱国运动，并有幸结识了于方舟、于树德、安幸生等一批革命先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接受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了革命思想的启迪。1988年夏，罗章龙阅读了张隐韬的亲笔日记之后，抚今追昔，又题如下诗句：

六十年前仗剑游，  
沧州革命足千秋。  
云龙风虎寻常事，  
姜尚六韬永保留。

张隐韬、刘格平创建和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北方领导武装斗争最早的一次尝试，这支队伍尽管在津南大地生存的时间短暂，但他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极为壮烈的篇章，理应流芳千古。张隐韬的革命气节和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豪。



## 创建中共津南特委，积极迎接北伐；领导穷人借粮、吃大户，百姓称之为“穷党借粮”，当局称之为“赤党作乱”；机智灵活应对镇压

张隐韬的牺牲，让刘格平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他一连几天陷入极度悲愤之中。他多次找了于方舟，要求回到津南重新拉起武装，还希望能说服史可轩一道为张隐韬报仇。他很自信，如果回到津南一代特别是回民聚居区，再拉起一支几千人的武装队伍是不成问题的。而史可轩那里，刘格平凭着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感到他对革命对共产党很支持很同情，尤其是史可轩对张隐韬的倚重和较深的个人感情，再加上许权中、任警哉等同志的从中策应，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一支力量，我党还可以借此机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而像岳维峻、弓富魁、门致中之流，与军阀根本就是一路，不值得依靠，他们的实力也不经打，刘格平自信，为张隐韬报仇雪耻指日可待。

于方舟召集江浩、李锡九等人一起研究了几次，刘格平也参加了。经过认真分析，大家最后认为，北方的革命形势还十分严峻，奉系军阀随时会卷土重来，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背弃“讨奉”的承诺，转而与奉系张作霖联合起来，他们蠢蠢欲动，估计天津很快会得而复失。当前党的最首要任务，仍是团结和争取国民军，配合北伐彻底打败旧军阀，这是大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打出自己的武装旗号，甚至去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必然会影响这个革命的大局。会议决定，要求刘格平继续留在史可轩的部队，做好这支军队内党的力量与地方党的联系，保证党的方针任务在这支军队的落实。

因为几天来总想着报仇，刘格平几乎没有联系其他人。在接受了于方舟的任务后，他立即找了史可轩。史可轩一见到刘格平，就表示对张隐韬牺牲的惋惜和愧疚，他说：“我对不起朋友，没有救下他。”他们相互安慰后就说到眼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下，这一说竟让刘格平出了一身冷汗。史可轩告诉刘格平，吴佩孚公开由“讨奉”转向“讨冯”，已经向河南的国民军发动了进攻。为此，岳维峻已下了急令，要求国民第二军迅速回防河南，邓宝珊的第七师也调到了河南信阳一带。

刘格平预感到天津遭军阀反扑后可能失守。即刻来到原天津道尹公署，现在对外是国民党省党部，实际也是中共天津地委的机关所在地。在这里找到江浩，让他通知党的机关立即准备撤离。天津党的同志听后很是吃惊，他们似乎没有危险的意识，因为国民军占领天津后，我们党可以在天津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可以公开组织会议和游行，工会的活动环境也得到很大改观。此时正是1926年2月底，有谁能想到，才仅仅两个月就风云突变呢？所以，刘格平的通知是很及时的，使党组织有时间和机会尽早撤离。随后刘格平就离开天津去了河南豫东，在他离开的时候，军阀张宗昌部已经开始从沧县攻向天津。

刘格平到了兰封车站，又见到了史可轩，分手才几天，形势又进一步恶化。

史可轩的部队一到豫东就与吴佩孚的部队交上了火，战斗打得很激烈。史可轩旅共12个营5000多人，虽然拼命抵抗，但终因本部和侧翼的国民军发生倒戈而伤亡惨重，幸亏许权中带领部队拼死掩护，史可轩才得以脱身。情况紧急，史可轩托付刘格平立刻赶到新乡去，先去稳定那里的留守部队。史可轩希望把溃败下来的残部重整后一起再拉回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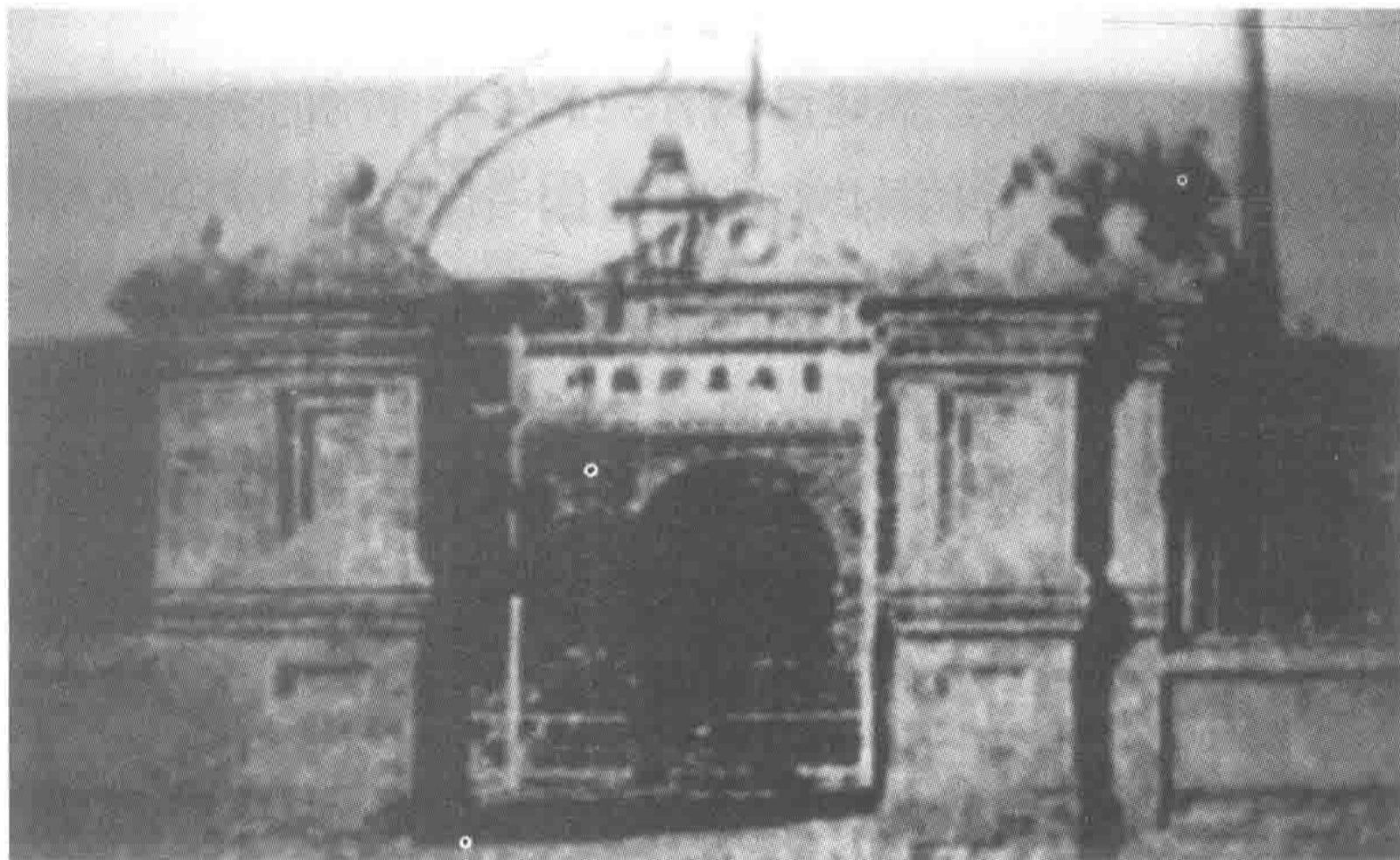
刘格平到达新乡两天后，史可轩也带着部队到达新乡。但他们没有想到，史可轩的副官长、参谋长都已经投靠了吴佩孚。部队到新乡后，原来从吴佩孚部收编来的一个团一下火车就占领了新乡城，旅司令部留守处的人或被打死或被打散逃生。史可轩、刘格平只好领着残余部队再向北边的磁县开去，又听说阎锡山出兵占领了石家庄，奉军也已进了天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史可轩一时感到束手无策。这时刘格平提出意见，希望史可轩将残余的部队交给许权中。史可轩实在无奈，只好自己带了几个警卫员化妆后进了天津。临别时，史可轩还将十几万河南币交给刘格平，让他转交给了部队。不久，国民第二军的杨虎城等部退守陕西，许权中也拉部队跟了过去。

此次重大变故，使史可轩进一步认清：什么国民军国民党，都挽救不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他决定到天津去找共产党的组织，



但由于天津党的活动已转入地下，他到达天津后不久又转向了上海。在上海，史可轩找到了王若飞。王若飞曾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那时史、王就有所交往。不久，史可轩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经党的派遣重新回到了部队，再次与冯玉祥合作在绥远五原誓师，曾担任国民联军保卫师师长。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筹办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蒋介石实行“四一二”大屠杀后，冯玉祥亦追随其后反共清党，史可轩毅然决定率部离开，途中被冯玉祥所部杀害。史可轩牺牲后，许权中率领部队参加了1928年的渭华起义并成为主力。

实际上，在史可轩让刘格平先行到达新乡时，刘格平顺便到郑州找了党的机关，向郑州党组织汇报了张隐韬牺牲的经过，同时交流了豫东战役的情况。根据刘格平的汇报，郑州党组织及时做好了转入地下工作的准备，也提醒刘格平随时注意部队的变化，与部队内党的力量配合好，尽全力争取和保护史可轩。刘格平劝史可轩暂时放弃对部队的控制而到天津去找中共组织，都是与许权中共同商量的意见。当时的情况，史可轩还没有完全投入党的怀抱，对部队还有消极影响，许权中是史可轩的下级，有些话说多了会产生反面作用而造成史可轩的疑心。<sup>①</sup>不可否认，刘格平对这支部队乃至史可轩本人投向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26年，刘格平作为天津地委特派员，到津南开辟地下党的工作。他在沧县第二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鉴于在史可轩部队搞兵运的任务已经完成，刘格平于1926年4月回到天津。在3月18日这天，李大钊、于右任等人组织北京群众10万余人走向街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及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举行示威游行，段祺瑞政府公然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了运动前沿指挥者之一、共产党人韩麟符<sup>①</sup>。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韩麟符虽暂时转到了天津但仍有很大的危险，组织上考虑韩麟符有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的经验，决定让他到新疆去，一来躲避军阀通缉，二来加强对新疆党组织的发展和领导，需要为他配备一名懂的新疆地方民族习俗的助手而一直没有人选。恰值刘格平回到天津，党组织立即让他陪同韩麟符到上海党的中央机关去接受派遣任务，然后经苏联到达新疆。于是，1926年5月初，刘格平陪同韩麟符来到上海。但他们到了上海后，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变化，党中央机关放弃了这次派遣。为策应北伐进展，党中央和上海区委准备通过选举建立起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上海市政府，党的上海区委希望刘格平能留下来，因为党的工作在上海回民中还是空白。但韩麟符不同意这个意见，尽管当时党内经常有争论甚至重大分歧，但这足以让刘格平感到为难。最后，中央决定韩麟符到广州去，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按韩麟符的要求，刘格平和他一起先去福建漳州。在从天津到上海的途中，刘格平曾与韩麟符说过福建漳州有一个叫张仲刚的亲戚，时任福建独立第一师师长。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对旧军队做争取和改造工作的，韩麟符想途经漳州去做一下对这支旧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两人在漳州前后活动了一个多月而没有结果，便向上海党的组织汇报后，韩麟符去了广州黄埔军校，刘格平则直接坐船又回到了天津。刘格平之所以没有再

---

<sup>①</sup> 韩麟符（1900-1934），祖籍山西省榆次。1920年在天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介绍云泽（乌兰夫）、奎璧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秋被聘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同年冬转去张家口参加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被选为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书记，协助李大钊加强同冯玉祥国民军的统战工作。北伐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绕道返回天津。1928年4月，任中共内蒙特别支部书记。6月，顺直省委以其违犯组织纪律，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并撤销领导职务之处分。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5年关押于北平草岚监狱。1933年3月被孙殿英以组织东北抗日需要人才的名义保释出狱，到孙部四十一军任少将政训处处长。不久，孙殿英在赤峰抗日兵败，于1934年随孙去宁夏屯垦，以图再建革命武装。不久，韩麟符再遭国民党通缉，被叛徒、国民党军统特务郑丕烈于1934年9月21日杀害于榆次乌金山镇苏村的真武庙前。



返回上海，不仅仅是因为韩麟符的意见，还因为考虑到生活上的不便以及人生地不熟等原因。实际上，上海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处于革命的中心地带。在刘格平离开上海不久，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这对于刘格平，不能不说是失去了一次重要革命实践和学习的机会。

1926年7月，刘格平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介绍，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刘格平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他在兴奋、激动之余，也默默地下定了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走，海枯石烂心不变。

这时北方的革命形势已经开始恶化。奉系军阀在1926年3月重新攻占天津后，设立了密探局，秘密搜捕大批革命党人和革命志士，使天津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挫折。作为直隶省的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后返回天津的中共党员于方舟、李锡九、江浩，在英租界张庄大桥义庆里40号，继续秘密恢复了中共天津地委的工作，同时还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他们三人既是中共天津地委的成员，又是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成员。在1926年6月，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向全国昭示了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决心。为了配合北伐，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派出4名特派员，具体任务是以国共两党特派员的身份，在直隶全省发展国共两党的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按照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精神，由天津地委所做出的决定。这4人分别是冀东区张明远，保属区翟少痴，直南区王维刚，津南区刘格平。<sup>①</sup>为了顺利工作，他们是以国民党身份做掩护，把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进行发展的。

刘格平于1926年9月初先来到沧州，他在接受任务后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先到直隶省立沧县第二中学（即现在的沧州市一中）、泊头第九师范（即现在的泊头师范）开展工作。直隶共有省立普通中学20所，师范学校10所，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进行顺序编排。第一中学、第一师范都在省会天津。沧县二中、泊头

<sup>①</sup> 张明远、翟少痴、王维刚均为大革命时期北方中共党员。张明远（1906-1998）河北玉田县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后，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第九师范这两所学校，同属津南地区的最高学府。1913年，因为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有一些改良，先是废科举，兴学堂，继而改学堂为学校，直隶沧县二中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时，二中的学生积极响应，虽然受到了时任校长刘香侯的压制，但还是走上街头声援这场波及全国的伟大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沧州古城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胜利。泊头第九师范同样也有着追求进步、支持革命的传统。1925年上海发生租界巡捕镇压反帝游行学生的“五卅惨案”时，沧县二中和泊头九师的同学们都不顾当局的封锁和压制，在自己的校园里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怎么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的条约被取消，  
收复租界汉口和九江。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  
两党合作中国就不会亡。

刘格平决定从过去接触过的关系密切、有文化、有政治头脑的青年朋友、亲戚、同乡、同学中，去物色对象。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沧县二中上学的郝树模和在泊头九师上学的郝树芬，想把这“二郝”作为第一批发展对象。

于是，刘格平从天津坐火车南下来到了沧县二中，他还是那套学生装打扮，走在校园里一点也不起眼。在校园里一打听，他便直接找到了家住南皮县郝庄的郝树模，他追求进步有正义感，又是自己义父郝和斋的孙子，有着亲戚关系。刘格平以往每次去郝庄时都与他一起畅谈，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彼此都互相信任和了解。所以，他们一见面刘格平就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到津南



建党的任务。郝树模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态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介绍了他的两位要好的进步同学，一位是盐山县旧城村（现属黄骅市）的王佩琪，一位是东光县曲庄的曲作民。

刘格平把他们邀请到县城里的一家“清真”饭馆里，边吃饭边交流思想，了解情况。刘格平向他们三人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剖析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军阀的罪行、国家的危机和青年一代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使他们深受启发，他们兴奋、急切地希望刘格平能给他们指明今后的道路。刘格平原本想先把他们三人发展成国民党党员，先通过一些基本的工作加以考查。但他们三人受到刘格平的宣讲后都一致要求直接加入共产党！刘格平见他们态度如此明朗和坚决，就决定直接发展他们为共产党员，明确由他们三人成立一个第二中学党支部，郝树模为支部书记，王佩琪、曲作民二人担任支委。同时还建立了第二中学国民党分部，仍由郝树模为负责人，确认了他们为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要求他们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同学中开展活动。从此，沧县二中开始有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组织。

沧县二中党支部活动开展得很活跃，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军阀暴政，团结带动了一批进步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多省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刘建勋，也是沧县二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还吸收了县城的戈本捷、卢冠英和宁津县的一位姓牛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刘格平因负责津南十几个县党的工作，忙得没有顾上再和他们联系。到了1927年夏天，这些学生毕业了，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回到家乡，沧县二中党的活动一度停滞。王佩琪毕业后回到了旧城，刘格平在1927年的秋末冬初时，还专程去看了他一趟。他们沿着旧城镇的城墙，边走边谈，交流思想。王佩琪对一些投机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投入国民党怀抱十分不满，表示要跟共产党走。于是，刘格平建议他在旧城建立一个党支部。很快，他就找了些进步青年聚会，刘格平还专门去给他们讲了话，布置了任务。曲作民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国民党县党部去工作了一段时间。1934年刘格平第三次被捕关押在北平监狱时，他还去监狱看过刘格平并带去了一些吃的东西。为了保护他，刘格平当时没有见他本人，后来他们共同在渤海区工作时得以见面。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格平在沧县二中建立的这个党支部，是津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它在津南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津南一带的革命策源地。

沧县二中党的支部建立之后，刘格平接着来到泊头第九师范。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气候寒冷，刘格平下了火车，来到京杭大运河的河西，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清真饭店住下。一切安排好后，便首先和郝树芬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恰逢星期日，郝树芬和傅炳瑞又召集第九师范的进步学生王建文、姜春田、息英俊、刘宪圣等，来到刘格平居住的饭店，刘格平和大伙进行了推心置腹地交谈。他讲了国家危难当头，青年人对自己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讲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程，使这些青年学生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震动，他们都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干。刘格平还讲到革命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要求大家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忠诚”二字，跟着党干不变心。他要求大伙不但积极发展党的力量，还要有受挫折的精神准备。通过一段考查和工作，刘格平在泊头第九师范发展了郝树芬和傅炳瑞等学生入党，建立了泊头九师党支部，由郝树芬任支部书记，这是津南地区第二个党支部。很快，泊头九师党支部根据刘格平布置的任务，先后在校内和校外的码头工人中发展了50多名党员，开展了大量革命宣传活动。但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泊头第九师范党支部收到上级党组织从天津法租界寄来的最后一封密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两句话：“以后别再来信，再来信有危险。”自此以后，第九师范党支部和上级失去了联系，这些学生党员先后于当年和第二年毕业离校。直到1930年（保）定特委所属的博蠡县委派党员吴建华考入泊头第九师范，才又重新建立了党组织。

当年泊头第九师范郝树芬等学生党员离校后，多数表现很好。1928年初夏，傅炳瑞在九师即将毕业时，由刘格平介绍，到天津法租界参加过党的短训班，结业后回到家乡南皮，先在马村一带搞地下活动，宣传革命，后又在县城西街办了个《莹光晶》小报，每周一刊，宣传进步思想。1931年当办到第22期时，因刊登国民党官员舞弊的消息，被当局查封，傅炳瑞因此也被捕入狱。1933年他出狱后，又办了“麟瑞阁”石印局，以此为活动中心和联络站，与南皮、东光两县在泊头九师的党员同学幸福增、王鹏、田等进行联系，相继建立



了东光、南皮联合党支部，傅炳瑞任宣传委员，后因叛徒告密，傅炳瑞又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列为“共党分子”而通缉。幸有在国民党南皮县党部的同乡报信儿，才免遭逮捕。从此，他逃到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麟瑞阁”石印局的工作，交由姜春田负责。几天后石印局被查封，姜春田隐蔽家乡当了教员。1926年在泊头第九师范入党的，还有东光的息英俊、宁津的刘宪圣，他们后来都在当地参加抗日工作，刘宪圣牺牲，息英俊当过抗日区长，后来病故。泊头九师第一届党支部书记郝树芬，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天津一家报馆任广告编辑，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当教员，20世纪70年代退休还乡，1983年逝世。

完成了泊头第9师范党支部的建立，刘格平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堤东村，介绍了团工委的三名领导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创建了中共大堤东党支部。刘子芳任党支部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他还在邻村北小庄也建立了党小组，小组长为韩凤奎，归大堤东党支部领导。大堤东党支部成立后，支部成员深入群众，积极物色和培养入党先进分子。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回族青年张凤亭、张凤臣、刘海林、刘连元、刘盛粤；汉族青年张老四、张保堂、刘世恩、马田等相继入党。党组织在大堤东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曾先后担任陈云同志秘书、中央党校副校长、北师大党委书记的贾震，就是1932年由王俊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大堤东党支部，不仅仅标志着我党在津南回族聚居地区已经扎根发芽，它还是我党在回族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史实。

这年10月，北伐军正式攻克武汉。随即挥师江西、福建，取得节节胜利。这促使北方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对革命的前途信心大增，党组织的发展难度也大大降低，在这个背景下，刘格平也摸索出了工作的窍门，提高了工作频率。他与此前已经活动在津南地区的党团骨干如刘子芳、刘清廉等人取得联系，分头工作。他们发展的党员主要是三部分人员：

一是刘格平家及其他一些地主富户的佃户和长工。盐山县前阎村的张保堂，祖祖辈辈就在刘格平家当佃户，他入党后曾担任过堤东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后来还到盐山县城附近的东刘庄，以当长工做掩护，搜集敌人情报。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对刘格平以“三爷”相称，经刘格平多次劝说，终于使张保堂改嘴叫成“三哥”。在他的带动下，佃户和长工们也都不叫刘格平“三爷”了。刘格平听着张保堂他们三哥长、三弟短的叫着，心中特别高兴。因为这不仅是个称呼问题，而是以同志关系、阶级兄弟的关系，代替了主仆关系。

二是回到乡里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旧军人。大堤东附近有个纸坊，这个村有个柏凌云，比刘格平大9岁，在皖系军阀马良部当过营长，他目睹军阀混战，国家危难，百姓遭殃，自己这个中农家庭也将近破产的情况，不满现实社会，虽辞职回到家乡，但思想却十分苦闷。他常到大堤东拜访刘格平，刘格平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引导他舍小家而顾国家，使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刘格平介绍他入了党并介绍他进了刘格平家办的民团任大队长，他们一起，除了对这支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

三是刘格平、刘子芳的回民亲戚。如孟村邻村丁庄子的丁芝兰和刘格平家是亲戚，其妻经常到刘家做零活，刘格平有意与他们接近，经过培养，发展他们夫妇入了并通过他们在丁庄子建立了党支部。丁芝兰后来还自己拉起十多人的武装，在霸县一带杀富济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被当地地主武装民团活埋了。还有刘子芳的内弟李成贵，此人在旧军队当过兵，会打一手好枪，能百步穿杨。刘子芳介绍他入了党。后来，李成贵为保卫津南特委领导人，建立革命武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刘格平风餐露宿出生入死，足迹遍布津南这片炽热的土地，先后迅速建立起了南大县杜生村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此前已经入党的刘清廉<sup>①</sup>；吴桥县莫家场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在北京入党的回乡知识青年莫子镇；故城县十里铺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在天津入党的周浩然；河间县张寺营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在燕京大学入党的山东莱芜知识青年聂嘉乐。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还有庆云县杨庄子、盐山县邸楼村、杨集、丁庄子、宁津县长

<sup>①</sup> 刘清廉、聂嘉乐、莫子镇均为大革命时期在津南或在津南活动的中共党员。刘清廉，河北献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牺牲。聂嘉乐（1905-1933），山东莱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暴动未遂刘格平被捕，聂嘉乐也受到通缉，辗转到江苏盐城县、泰州县一带活动。1933年5月遭反动势力杀害，后被追认为烈士。莫子镇，河北吴桥县莫家场村人，1926年入党，在家乡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曾在天津一带以国民党身份开展活动。后经刘格平证明其共产党员身份。



官村、献县相国庄、沧县火车站、盐山东关中学等20多个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的组织遍及津浦路东西及鲁北各县，发展的党员上百人，为津南地区革命的崛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11月，鉴于基层组织的建立已成规模，经请示中共天津地委，刘格平成立了由刘格平、刘子芳、邸玉森、刘清廉4人组成的中共津南特委筹备委员会，为推动津南地区党的斗争和发展进一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6年12月，刘格平回到天津，按照党组织安排，临时负责天津地委军委工作。翌年1月初，于方舟、李希逸、刘格平等人一同到北京汇报工作并接受任务，中共北方区委要求津冀方面向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农民运动骨干。

回来后，刘格平分别从沧县、庆云各选出一人，还有冀东、保属等区选派的农民运动骨干，一行共6人。1月中旬，天津党组织开会研究后，决定派刘格平到武汉去，输送农民骨干的同时再与武汉国民政府联系，请求给予支持组织北方武装力量以配合革命军北伐。为安全起见，刘格平安排分三路在武汉集中，他是先坐火车到达南京，又坐轮船到的武汉。

一到武汉，刘格平便直奔武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那里是临时国民政府所在地。但没想到那里门庭冷落什么人也找不到。刘格平又赶去法租界找到了也在武汉的李希逸，李希逸领刘格平到中华旅馆见到了原本已经认识的于树德夫妇。从于树德、李希逸那里，刘格平才听到了蒋介石要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还反对把国民政府设在武汉等许多新的情况。过了几天，范鸿劼<sup>①</sup>也从北京来到武汉，他告诉了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在英租界的天津地委机关已遭到奉系军阀的破坏，有10多位同志被捕。对于这些形势的变化，刘格平感到很茫然，同志们也都感到缺乏思想准备，大家一时都显得很是消沉。

为了调整情绪，刘格平说：“我到武汉后，在这里感受到了强烈的革命气氛。看到市民、工人、店员们都组织起来，拿着棍子在街上日夜巡逻，学生们也争先恐后地上街宣传北伐和革命，这些在北京、天津都是没有的！”于树德

<sup>①</sup> 范鸿劼（1897-1927），湖北省鄂州市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0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成员之一。1922年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执行委员、团地委书记。同年7月至1923年6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至1927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委委员、委员长、组织部长，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4月6日同李大钊一起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接过话题说：“武汉国民政府也有准备，想要重新组织10个师的武装。”刘格平听后十分高兴，如果政府给建制，拉起队伍来应该不成问题，当然要是经费就更好了。李希逸则说：“政府也只是想法，落实起来很难。我们党内的意见不一致，国民党也有左派和右派。”他建议刘格平先设法见到邓演达，他受命临时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日常工作。

刘格平首先找到也被国民政府请到武汉的国民党元老、左派王励斋和柏文蔚，他们联名给邓演达写了一封信函，大意是说刘格平“系我党年轻有为之同志，抱负远大且出生于回教世家，可联络回教之民众响应革命，实现中山先生五族共和之夙愿”等等。

拿着两位国民党元老的信函，刘格平找到了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据说这个讲习所是邓演达主办的，公开挂出的是国民政府的招牌，刘格平第二次去时就在这里见到了邓演达并受到很热情的接待。刘格平提出要在京津冀豫一带组织武装以配合北伐消灭军阀，希望国民政府给予建制编号和经费等要求，邓演达听完后摊开两手表示出很为难的样子。

邓演达告诉刘格平，武汉的国民政府目前实际上什么也做不成，一切正在努力走向正常，但阻力很大。他建议刘格平利用到武汉的机会帮助发动一下武汉的回民以增强革命力量，同时希望刘格平能劝说王励斋、柏文蔚向军队方面施加影响，以减少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压力。刘格平听得出来，邓演达所说的“军队”，实际就是指蒋介石。在武汉的这几天，大家几乎每晚都进行讨论，讨论的人除了于树德、范鸿劼、江浩、李希逸、刘格平外，还有一些军人、工人和学生。从大家的讨论中，刘格平看到了火热革命洪流下的武汉，也有一股股暗流涌动。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刚从广州迁来但却摇摇欲坠，特别是由于遭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的消极抗拒，政府机关还只能是临时的。在天津时的同志李希逸、江浩都到了武汉受临时机关派用，江浩被委任为特别法庭的审判长，老人很认真，白天需要上班，大家只能在晚上到他那里去。他专门审判反革命，但这必然会伤害到革命阵营中许多地主、军阀、资产阶级的代表。还有，政府的一些职权转移到工会、农会那里，虽然这是暂时的，但已足以给反动派口实，就连一些左派也是摇摇摆摆，好像墙头草。大家流露出的担忧和着



急显而易见，也不乏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者，因为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和反对革命。

刘格平看邓演达实在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空谈革命，还不如去找蒋介石。于是，刘格平又找了王励斋、柏文蔚，托他们给蒋介石写了与前次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函。

刘格平跑了几趟农民运动讲习所，意外的收获是了解了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这个讲习所名义上是邓演达以国民党名义主办，实际由毛泽东亲自为农民运动骨干们讲课。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要依靠工农，要武装工农，被压迫越深觉醒越快越要依靠等主张，深深启发和打动了刘格平的心。刘格平还了解到，仅湖南、湖北的农协就达到好几百万人，这使他备受鼓舞。他渴望见到毛泽东，他有许多问题需要向这位农民运动的领袖请教。可惜，邓演达告诉刘格平，毛泽东受湖南农协的邀请去了湖南，大约要两个月左右才能回来<sup>①</sup>。于是，刘格平按照邓演达的请求，连续几天奔波于武汉回民居住区，联系到一些回民群众，这其中有职员也有老师和学生。他们受武汉革命环境的影响，对工会、农协这样的组织很好奇。刘格平就正好借助武汉农民协会大发展的好机会并仿照农民协会的方式，在武昌组织发起成立了回民协会，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明确支持。回民协会成立大会在一个学校的礼堂召开，有当地500多名回民士绅及群众参加，李希逸代表共产党，邓演达派出的一名官员代表湖北省政府，都到会并讲了话，还各自捐出了100元活动经费。

1927年2月中旬，刘格平本着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原则，直奔南昌去找蒋介石。除了有王励斋和柏文蔚写的信函外，共产党内也借蒋介石的随从副官（秘书）、共产党员蒋先云来武汉时向他打了招呼，要求他对刘格平注意保护。

当时的形势，像王励斋、柏文蔚这样的曾经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其幕僚的元老，是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都在争取的对象。所以，刘格平找到了蒋介石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很快就见到了蒋介石。刘格平表示可以在北方组织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但希望能列入北伐军序列，先给编号，经费可以从地方筹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措。蒋介石对刘格平所谈的内容似乎没什么兴趣，他说可以让刘格平留在军中，先担任个连、排长，等北伐军打到北方后再视情况安排差事。话不投机，他们只谈了约半个多小时的话。这次谈话让刘格平深感失望，蒋先云也派人告知刘格平，对蒋介石的争取难度很大，没有必要再对其抱有幻想。因为刘格平与武汉党的组织并无直接联系，也需要尽快向天津党组织汇报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在武汉、南昌的情况，刘格平即从南昌动身直接回到了天津。

从夏天到冬天，即从1926年5月初到1927年2月底，刘格平先是受派经苏联赴新疆而未遂；再是他刚离开上海，那里就发生了由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的工人武装暴动；还有，就是在武汉错失了与毛泽东的见面。这几次经历都可能改变刘格平的一生，但在当时他是意识不到的。刘格平后来回忆说：“26年到27年间，我经历了几次大的事件，派往新疆、领受任务到上海和武汉，有几次机缘都不知不觉地擦肩而过。可能任何一次机缘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大的可能就是为革命献出生命。所以，能侥幸活到今天享受革命胜利果实是十分不易的，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一定要知足呀！”

这段肺腑之言，映射出一位历经坎坷饱受磨难的老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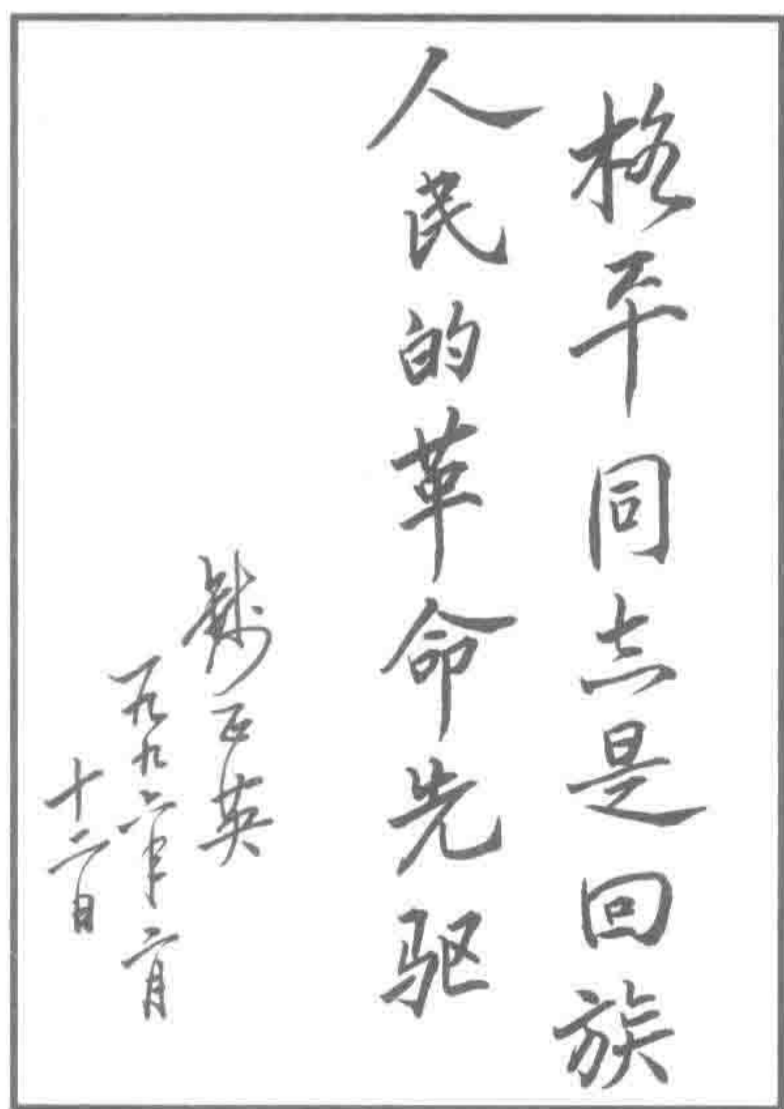
## 积极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占领庆云县城，打响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武装斗争第一枪；叛徒放军阀部队进城，刘格平化装脱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上海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大屠杀。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领导下爆发了南昌起义；9月18日，在湘赣边界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领导下，发生了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枪炮声。

其间，顺直省委的领导也意识到，敌人在农村的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津南及全省也相继组织了一些农民斗争，但都因为没有经验而失败了。他们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城市，只派少数同志下到农村去。可是在城市里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都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批批地残酷杀害了，如安幸生、王荷波等，这都是深刻的、血的教训啊。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是正确的，最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要斗争，就需要武装。那么革命的武装从哪里来呢！刘格平他们也在思索着、探讨着和寻求着。



钱正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927年11月，他们接到了省委指示，要在津南地区改造一批土匪武装。

一个夜静风清的晚上，刘格平带着和他一起在“借粮吃大户”斗争中并肩战斗的战友刘清廉，一起来到了张寺营村。

张寺营坐落在杜生村西边的偏北方向，相距约30多里，是河间东部的一个村落。这里的群众大都信奉基督教，崇拜的救世主是耶稣。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张寺营就来了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名叫聂金书，来到这里他传授基督教义，发展教徒，修建教堂，开办教会学校，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和崇敬，在这一带村庄的教徒中很有声望。从此他便搬来了妻子儿女，在这村落下了脚。可是又有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笃信耶稣的牧师，却生养了一个“大逆不道”、投身革命的儿子聂嘉乐。

刘格平1926年夏天，就经天津党组织介绍认识了共产党员聂嘉乐，也经常由北京到河间张寺营村他父亲处，利用传教布撒的机会，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20多个党员。聂嘉乐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负责，后来担任了河间、献县联合县委的宣传委员。为了掩护津南特委和河间、献县县委，秘密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他以发展教会为理由，说服他父亲，通过招收邻村学生来教会上学的机会，借机把省委派来津南特委工作的裘树凯、李怀才、徐则文等，以及他的爱人石爱慈，都安排到学校当了教员。石爱慈是聂嘉乐大学的同学，夫妻俩利用在学校工作作掩护，经常为党组织传送秘密文件，宣传党的政策。

津南特委和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也就把张寺营这里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和活动中心，经常以“传教”作掩护，来这里碰头、开会，进行党的活动。刘格平、刘清廉也经常在夜间来这里开会，少则几个人、多则上百人，都是盐山、沧县、献县周围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常常是夜聚昼散，说的可都是些革命的新鲜事。刘格平给大家“传教”时，给文化知识不多的人们常会打些形象生动的比方，很风趣生动。比如他说：“咱们中国这么多个地面，正好像个美丽的大海棠叶，可惜被家虫和野虫咬得残缺不全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把虫子消灭了，海棠叶就会长完整了。”大家自然心领神会他所说的野虫、家虫，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的官僚、军阀、贪官污吏等。刘清廉也给大



伙说：“别看这会儿咱农村很穷，农民很苦，光受气，等共产党来了，咱们就好啦，到那时有拖拉机，有养老院，还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城市一样，等着享福吧！”讲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

这天夜里，刘格平、刘清廉从杜生村来到张寺营，已是午夜时分。按约定暗号，刘清廉抓起一把土，撒向聂嘉乐住室的窗户，然后他们转身隐蔽在学校房背后。一会儿，聂嘉乐夫妇悄悄开门，听听周围没什么异常动静，就来到学校房后，“你二位来啦！快到屋里去。”说完便带着他们走进学校的一间办公室。聂嘉乐先用被子蒙上窗户，又点上煤油灯说：“坐吧，听说借粮吃大户搞得很火热，我们高兴极了！现在怎么样啦？下一步怎么搞？”刘清廉皱了下眉头说：“前两天在我村借粮时，遭到民团镇压，没借成，被抓去几个群众，也放回来了，党员们隐蔽起来了，他们一个也没抓着。”

刘格平幽默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这不，我们这两个‘逃犯’，又逃来这里请您这‘耶稣’保佑了”。接下来，他郑重地说：“从这次借粮吃大户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我们更加感到八一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做法太正确了，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太重要了。看来，我们津南的当务之急，就得考虑如何抓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了。”刘清廉说：“对！明天我们开个县委扩大会议，好好地讨论一番。”聂嘉乐看了看桌上的马蹄表，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多了，就说：“这几天你们太辛苦了，抓紧睡一觉吧！明天的县委扩大会议，我来安排通知。”

第二天夜里，河间、献县联合县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会议的都是附近几个村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张寺营的几个党员骨干。刘清廉是津南特委的组织委员，兼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书记，会议由他主持。

“今天开会，专门研究一下要不要抓武装和怎么样抓武装的问题，”刘清廉把目光转向刘格平说，“请你先给大伙好好地讲讲吧”。

“那我就先说说吧。”刘格平点了点头。

“同志们都知道，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使我们党吃了大亏，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教训真是太惨痛了！今年8月1日，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是最有力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回击，给全党树立起一面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鲜明旗帜。接着，8月7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八七会议上，强调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太重要了！在咱们津南，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对抓枪杆子的重要性，也有了深刻体会……”

“就拿这次借粮吃大户的斗争来说吧！”刘清廉激动地插话说，“前两天在杜生村，我们一发动，集合起那么多群众。大家都饿急眼啦，多么想弄到点救命粮啊！可是最终一点也没搞到手。就是因为大伙手里没枪，才被荷枪实弹的民团驱散了。事先，格平还找过杜生村民团的团座做工作，讲道理，说好话，可是人家县里有命令，政权在他们手里。所以，最终咱们的行动还是被这些名为‘民团’、实为地主官僚的看家狗们给镇压下去了。你们大家说咱们不抓枪杆子行吗？”

这个话题激起了大家热烈地讨论。缴台头村的秦国池说：“咱们党要是有了枪杆子，哪怕他们不交政权。有了枪、有了权，给地主老财们捎个信儿，他就得乖乖地把粮食送来。”张寺营的宋兴旺说：“就是这么个理！赤手空拳，光靠人多起哄是不行的。有了人，有了枪，团结奋斗，革命才有希望成功。”大伙你一言，我一语，一致认为就得拿起枪杆子干。聂嘉乐夫妇，一面同大家商议讨论着，一面端茶倒水，提醒人们“小点声儿”。最后，大家决定，在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寻求一切抓枪杆子的机会。

会后，刘格平又回到东部，在大堤东村向特委委员刘子芳、邸玉森以及各村党支部负责人，通报了西部借粮吃大户斗争的情况，和下一步抓枪杆子，发展自己武装的决心和打算。恰在这时，接到中共顺直省委的一个指示，要在津南地区改造一批绿林武装。刘格平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正确决策。决定尽快选择改造对象，积极开展工作。

津南地区东临渤海，洼大村稀，荆棘芦苇丛生，便于匪寇隐蔽。在军阀混战、非旱即涝、民不聊生的年代，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无地、少地，备受歧视、欺凌，而又勇敢好斗的回民，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因为他们多为贫苦出身，对共产党一般并无恶感，这倒是改造



绿林的一个有利条件。然而，成股的土匪，都是些乌合之众，带有流氓无产者的性质。他们“杀富济贫”，但是不分大富小富，而是见钱眼开，见财就抢，不给就杀，成为百姓责骂的匪患。他们当中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头头儿，染有吃喝嫖赌抽的恶习，而且匪性难移，这是改造他们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有些大股的武装土匪，是很难改造的。多年来，新老军阀以“剿匪”为名，为害百姓，对这样的土匪，不是不敢问津，就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所以，群众说“兵匪一家”，是很有道理的。

针对这种情况，刘格平仔细甄别，利用自己的回族亲戚关系，开始四处奔走。先是来到离堤东村较近的回族村丁庄子军阀营长马永祥家，做教育争取工作。马永祥这人重江湖义气，不愿背叛朋友上司，虽没有争取成，但他保证会暗中保护共产党，保证部下不侵害黎民百姓。接着，刘格平又来到了盐山县回族村大坟台，做另一个土匪头子的工作。这个土匪头子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张口就要多少钱，争取未果。实际走访中，刘格平认识到：改造土匪，关键是摸清他们情况，把握匪首的思想态度和性格特点。随后津南特委在刘格平的领导下，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分析，最后决定把鲁北阳信县一带的一股武装土匪作为改造对象。

这年11月，阳信这股有100多人枪的土匪队伍，西窜百余里，来到盐山南部堤东一带活动，住在附近几个村子，昼伏夜出，四处作案。他们的一号大头目，姓杨名三，是个40来岁的矮胖子，会武术，很凶悍，但重义气，好交友。人称“杨团座”，绰号“杨三阎王”。这天，他正在一个大户的洞房里吸大烟，忽听护兵来报，说是堤东大地主家的三少爷刘格平、盐帮头领刘子芳前来拜访。杨三心想，这样的人物亲自前来，这是看得起我杨某，便说了声“请他们进来”，随即起身出门迎接。双方见面，相互作揖拱手，都很尊重。随后一起来到客厅坐定。杨三吩咐左右沏茶倒水，并摆出烟枪，以大烟相让。刘格平、刘子芳一面道谢喝茶，一面解释说：“我俩都是回民，从不抽烟，请团座鉴谅。”杨三自觉冒失，遂令左右退下，捋着八字胡说：

“二位前来找我这草莽之人，有何见教吗？”

刘子芳先开口说：“杨团座，你我都是穷苦出身，我很理解你们，投身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林，绝非本愿，实属被逼无奈。对杨团座，我们久闻大名，深知你为人仗义，杀富济贫。今日慕名而来，拟共商前程大计。”

“多谢高抬！”杨三又一拱手问，“什么前程大计？二位请讲。”

“这位是我的堂兄刘格平。”

“哈哈！刘三爷，谁人不知！”

“不瞒你说吧！我俩都是共产党，格平弟他是共产党的特委书记。”

“只听说你们是共产党，今天才知道刘三爷还是特委书记。共产党，好哇！好哇！”

“请不要叫什么三爷了，就叫我格平吧！我和子芳兄这次前来拜访，想向团座介绍下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能取得贵军的同情与合作。”

“那好！那好！请讲！请讲！”

接着，刘格平和刘子芳便把共产党反对军阀官僚，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耕者有其田等等道理简要地讲了一遍。杨三听着连连点头，一个劲地说：

“该！”“对！”“好！”刘格平、刘子芳又向他仔细了解了这支队伍的状况，和他分析了怎样才能顺民心，求发展。最后，提出四个条件，与他团结合作，共图大业。这四条是：

- 一、不抢劫农民，包括富农，只抢劫地主、官僚；
- 二、只与军阀官僚、贪官污吏为敌，不滥杀无辜；
- 三、部队称“津南革命军”，派共产党员杨智荣任党代表；
- 四、从头领到士兵弟兄，要求戒掉大烟、酗酒、赌博和嫖娼。

杨三对一二三条都答应得很痛快，只是对第四条还有些踌躇。他歪着脑袋说：“这第四条，怕是弟兄们一时难以做到。”刘格平、刘子芳说，可以先讲讲道理，说明利弊，让大家一步步地改。杨三听了觉得有了余地，就拍着胸脯说：“好吧！从今以后，我杨三一切听共产党的啦！”

派往杨三队伍中的党代表杨智荣，党性强，善交友，是邸玉森发展的党员，为庆云县杨庄子人，与杨三是邻县。开始一段工作比较顺利，大多数匪兵都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由于不再滥杀乱抢，土匪性质逐步有了改变，不少贫苦群众也来报名参加，队伍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主要活动在阳信、无棣、惠



民、庆云等县。经特委研究，正式命名为“津南革命军”，委任杨三为团长。顺直省委为了加强力量，把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分配来的第四期学生中的一个叫张某某的陕西人，分派到这个独立团做军事工作。随后又陆续安排了100多农民成员入伍，队伍随即发展到400多人。编制为3个营，一个营编制100多人，每营下设3个大队，一个大队40—50人。大队下有分3个小队。营和大队设有党代表，小队设有指导员。3个营长中，有2个营长由杨三的人担任，另外一个营长由张某某兼任。大队、小队的负责人，大部分还都是杨三的人。对这支刚刚由土匪改编成津南革命军的武装，刘格平和大家认为还不能约束得太紧，主要是做些政治思想工作，慢慢改造他们的思想和认识。这支部队活动的区域虽然是在平原，但只要和广大群众关系搞好，夜间出来活动，白天在较偏僻村庄隐蔽起来，敌人也是无法发现的。津南特委准备到1928年春天，把这支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分散到3个地区，一个地区划几个县为其活动范围。

可是，在这年冬天，部队刚刚开到胶济路附近时，由于抢了山东奉军张宗昌部下一个大官僚家，还绑架了另一个大官僚的家人，张宗昌急派军队追打，津南革命军迅速撤回到冀鲁交界的阳信、无棣、庆云、盐山一带。因张宗昌部紧追不舍，不久就完全撤出了鲁北，来到沧县、盐山一带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杨智荣发现队伍里有少数几个头目，匪性难移，只想吃喝玩乐，弄到些钱就偷偷到天津下烟馆、宿妓院，一得手就顺手牵羊狂捞一把。杨三匪性虽有所收敛，但也背着杨智荣抽大烟，喝花酒，天天像个醉枣似的。而且头目之间不团结，不是为分赃不均打仗，就是为女人争风吃醋。他们各拉一伙，互相对立。虽经杨智荣与杨三多次批评劝导，但仍各怀鬼胎。一天夜间行军，来到盐山城南帽圈一带村庄时，二号头目突然叫他手下的人，把另一个头目打死了。说是枪走了火，实际是闹意气，报私仇。杨三大摆团长权威，声言要严肃处理，当夜也被他们打死了。杨智荣急忙做剩下的几个头目的工作。对他们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指使杀人的二号头目抓了起来，带到沧县东关，准备研究处理。夜里又被他的那伙人解开绳子放跑了。形势越来越紧张，眼看就要火并，有几伙人又把队伍拉走了。新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伍的一些基本群众，见他们匪性又起，也就纷纷离队回了家。这样，剩下的人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委撤回了党代表杨智荣，剩下少部分人枪，又分裂成几股。打死一号、二号头目的人，又被他们的手下人打死了。很快，特委经过5个月努力改造绿林的工作，就宣告结束了。

1928年初，津南特委总结了这次改造土匪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党的基础较好的两个地方，继续创造条件组织武装暴动，一个是以庆云县为中心，包括无棣县、阳信县和盐山县南部、沧县东南部、乐陵县北部；再一个就是在河间县东部沙河桥一带。刘格平去盐山、庆云活动，刘子芳在沧县活动，省委1927年新派来的李怀才到河间活动。

刘格平来到庆云，找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陈一新。这个陈一新就是葬送张隐韬和津南农民自卫军的国民党政客陈秀福的侄子。1927年夏天，省委曾调刘格平去抓军事，派秘书杨天然来津南任特委书记。杨天然是河南人，来津南情况不熟，口音不对，工作不便，不到两个月就调回省委了，刘格平回来又继续担任特委书记。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杨天然凭一时印象，把陈一新发展为中共党员。很快又接替邸玉森当了县委书记。邸玉森随后被派往天津，以教员为掩护，负责起特委与省委联系的地下联络站的工作。

1926年初，作为津南农民自卫军副司令的陈秀福，在旧县见死不救，致使自卫军司令、津南最早的党员张隐韬被军阀杀害。从此，陈秀福回到家乡庆云，发展国民党员，培植私人势力，成了这一带国民党右派的重要人物。陈一新正是凭借着陈秀福的势力，和当地民团的关系，在这一带从事着革命的工作，他的手里还掌握着大约40多人的民团势力。

在丁字街张寿考的货店内，刘格平组织陈一新等4人开会，研究如何改造当地民团的事情。刘格平接受上次改造土匪武装的经验教训，提出派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深入到民团里作骨干，把这支力量改造、改编成革命队伍，民团原有的建制连一个班也不留。陈一新不同意。他认为，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绕过济南，奉军张宗昌的部队正往北退，共产党自己组织武装，没什么前途，也没有必要。只有等国民党过来，一块干才有出路。刘格平对他说：“国民党和他的军队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也投靠了美帝国主义，这你是知道的。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地方革命斗争，已经像暴风骤雨般开展起来了。这股洪流，蒋介石他们是阻挡不住的。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蒋介石终归要镇压革命的，别看他现在有力量，他的结果和其他军阀一样，是没好下场的。”

可是，陈一新就是听不进去：“我受不了，再搞革命，还需要20年，我真受不了……”刘格平看到陈一新的思想很难扭转，但眼下和他决裂，对目前革命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益处，就隐忍下来。

随后，在庆云县城西关的一个清真饭店里，刘格平向胡恒熙、杨修荣及另外两个同志通报了陈一新的事情。同时决定改组县委，由胡恒熙任县委书记兼军委负责人，杨智荣负责组织，杨修荣负责宣传。胡恒熙是半年前刘格平发展的党员，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1925年考入天津水产学校，是一个不满社会现实的青年，但苦于没有出路，感到前途渺茫，在天津结识了刘格平，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时，胡恒熙由刘格平推荐，到武汉政治学校学习。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程潜部任连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拒绝国民党右派的拉拢，回到天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这时，刘格平也来到了庆云，熟人相见格外亲，在相处中，刘格平对胡恒熙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很快就介绍他入了党。从此，他眼光更敏锐，工作更热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下，机智勇敢，很快就组织起50多人的武装。

刘格平和胡恒熙商定，把胡恒熙组织的武装，同陈一新那股民团合编在一起，组成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这个方案和陈一新一谈，他也同意了。这样，既充实了骨干，扩大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经过动员，刘格平、胡恒熙带领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冲锋号一响就冲进了庆云县城。县长吓跑了，缴了城里民团大队和警察的枪支弹药，士兵愿留下的，编入支队。这是继两年前张隐韬的津南农民自卫军占领庆云之后，共产党的部队第二次占领县城。群众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又兴盛起来，纷纷前来投军，队伍一下子由10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格平、胡恒熙组织的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占领庆云后，就面临张宗昌部队的威胁。原来，1926年秋，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了奉军，奉军驻天津的李景林部败退山东，与张宗昌部合编为直鲁联军，不久又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京津。到1928年初，张宗昌的部队占领了庆云北部的盐山、西部的旧县等地，距庆云只有几十里地，说不定哪会儿就会来攻打。大敌当前，怎么办呢？刘格平与胡、陈二人商定了三条：

一、为了保存革命武装，队伍既不叫红军，更不叫白军，仍叫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性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二、队伍既不打带有镰刀斧头的旗，更不打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上边也不写什么字，但要打红色彩旗；

三、鉴于队伍刚发展起来，要守住县城，不轻易退出，以免影响士气和民心，为此，要鼓舞士气，积极备战。

庆云县城不大，城垣很坚固。过了两天张宗昌的部队果然前来攻打，约有两三千人，从北西东三面包围了县城。刘格平、胡恒熙等带领津南革命军，立即登上城墙，迎击敌人。他们从一个垛口转到另一个垛口，每到一个垛口就给战士们鼓劲壮胆。大家情绪很高，激战两天，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攻城不下，又从盐山调来1营“老毛子”，这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逃出来的白俄炮兵，他们带来10多门山炮，向县城轰击，隆隆炮声，倒很吓人，但因县城很小，白俄兵笨，炮弹没打入县城，都落到野地里了。有两发落到城郊，炸毁两间民房，也没伤着人。刘格平反复给战士们讲解敌我态势，鼓励大家再顶两天，敌人就会撤退。因为这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沿津浦路北上到了沧州，张宗昌自顾不暇，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不会在此恋战。胡恒熙、陈一新都同意这一分析和意见，当即商定，由胡恒熙带一警卫员，从东南城角偷偷溜下城墙，到堤东找刘子芳联系，拉队伍增援，内外夹击打接应。

当天上半夜，刘格平送走了胡恒熙，看到战士们情绪很稳定，他一连三天也没眨眼了，很是疲劳，后半夜便到城里一个亲戚家休息。天明他出来一看，自己的队伍不见了，张宗昌的部队已经进了县城。原来，陈一新后来辩称，本想找到刘格平，但不知住处又不能再等，就急着走了。张宗昌的队伍进城后，



到处翻箱倒柜，烧杀抢掠。抓了11个普通百姓当场就枪毙了。刘格平返回亲戚家，把长头发剪短，乔装改扮，说是盐山中学的学生，来庆云串亲，才混了过去。张宗昌的队伍进城捞了一把，没顾得吃午饭，就仓惶撤走了。事后，特委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开会研究决定，开除了陈一新的党籍。

后来，陈一新公开叛变革命，和他那个叔父陈秀福，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分子。抗战时期，陈秀福当了汉奸，在青岛当过伪教育局长。陈一新紧跟他的上司、同乡国民党中央后补委员倪嗣聪，反共到底。全国解放后，他藏在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山洞里，写反革命材料，宣传反共。被公安部门抓获后，根据其一贯罪行，判处死刑。

## 第2次被捕入狱，把牢房当作宣传和发展组织的阵地；3年刑满出狱，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28年7月，刘格平戴着镣铐，被押上沧州国民党法院的审判庭。法官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问：

“你就是刘子敏<sup>①</sup>吗？”

“是的。”刘格平回答。

“你可知罪？”法官紧追一句。

“我不知罪。”刘格平满以为这回被国民党抓住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证据，肯定被杀头了。因为自上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名为“中央北伐革命军”、实为国民党新军阀的蒋鼎文部，对共产党人是十分狠毒的，只要被他们抓住，肯定是有死无活。对此，刘格平有充分思想准备，决定在牺牲之前，利用一切时机，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在法庭上来一个反审判。他昂着头，以攻为守地说：“你们无故抓捕好人、审判好人，毫无道理，这是践踏法律，我抗议！抗议你们的暴行！”

“据公诉人公诉材料，你犯有两条罪。”法官瞪了刘格平一眼，厉声厉色地说，“其一，你私带枪支，这有实物作证，应判刑1年。”

“这是自卫用的。”刘格平争辩说，“我作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特派员，带枪自卫，何罪之有？”

“嘴硬是无济于事的。你没有携枪证件，就得判你私带枪支罪。”

“国民党的特派员带枪自卫，这是省党部规定允许的，还要什么证件，真是岂有此理！”

<sup>①</sup> 刘子敏，是刘格平解放前在对敌斗争时用的化名。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天津直隶省党部根本不承认有你刘子敏这个特派员，你是冒充的，这就是你的第二条罪，该判刑2年。”

刘格平听到这里，倒松了一口气。因为法官开场说他犯有两条罪，现在两条罪都宣布了，并未提及自己这个共产党的罪名，说明他们没证据定这一条罪。刘格平想到这里，没再说什么。

法官接着说：“根据法律规定，两罪并罚，判处刘子敏有期徒刑3年。休庭。”

刘格平由准备被杀头，结果只被判了3年徒刑，心里暗自高兴。他没再争辩，便被押入沧州监狱。

原来刘格平在沧州西部发动“借粮吃大户”之后，回到了东部家乡一带，与刘子芳一起改造民团，改造土匪，虽没搞成，但取得了抓武装的一些经验。这时，省委派到沧州西部工作的李怀才、刘清廉、聂嘉乐等，在沧县、献县、河间三县交界的杜生、景和、张寺营、缴台头、行别营等一带村庄，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截获了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一些溃军散兵的10多支大枪。聂嘉乐还通过同学关系，打入国民党肃宁县党部，搞到几支手枪，拉起了几十人的武装队伍。李怀才来大堤东村向刘格平汇报了这些情况，讲了特委委员刘清廉准备伺机起事的想法。刘格平和刘子芳商定，把东部的力量拉到西部，与刘清廉、聂嘉乐组织的力量合起来，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刘子芳从盐帮手枪队里，挑选了他的妻弟挂甲林村的李成贵，和小堤东村的张凤亭等5名精悍队员，各带一支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先陪同刘格平、李怀才去西部筹备安排。

到西部去要途经沧州，国民党的“北伐军”已驻扎在这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分头出发，李成贵等5名手枪队员，化装成做买卖的农民，先行一步。刘格平和李怀才随后同行。

这天，刘格平、李怀才起了个大早儿，从堤东村出发，当天下午来到沧州东郊八里屯附近，看到各路口都有国民党驻军站岗，正盘查行人。他二人商量如何通过，刘格平说：“我带着手枪，不便隐藏，干脆咱顶着风上，亮出我这个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特派员的牌子，反正他们刚从南方过来不久，还不了解北方的底细，也许会平安通过。”李怀才说：“好！可是我呢？”刘格平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那好办，就说是我在天津的老同学，来找我在沧州谋个职业。”二人商定后就向前走。两个站岗的一拦，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刘格平说：“本人是省党部的特派员，来沧州联系公务。”站岗的一听，既不敢拦阻，又不敢放行，就说：“请二位到村里我们团部里去一趟吧！”刘格平说：“那好，我正想面见你们团长呢！”说着，由一个站岗的带路，刘格平二人来到团部，一见团长作了自我介绍，说：“我叫刘子敏，是直隶省党部的津南特派员。”团长一听很客气，点头哈腰，递烟让茶，然后亲自把他二人送出防地。

刘格平和李怀才来到沧州，天已傍晚，便住进南门附近义兴德回民饭店。把李怀才安顿好，刘格平就去城里他五姑家，她那里有个党的小组，顺便了解些情况。接着，又找到火车站检票员吴振邦，他是前些年由他同村同族任曹锟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吴毓麟，安排到车站混事做的。后经刘格平发展为中共党员，并由他在火车站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吴振邦任支部书记，成了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刘格平从这里了解到，国民党的沧州驻军，有两个军团，一个是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是蒋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一个是陆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是方振武。方原是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下的一名师长，后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赞成国共合作北伐，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此人来沧州后，多次讲话表示爱国、革命，军队纪律较好，和群众的关系也好。沧州城关主要是他的部队驻防。他还派人任沧县县长，此人姓涂。根据吴振邦提供的情报，刘格平决定当晚走访涂县长，同他谈了很长时间。他虽不了解刘格平共产党员真实身份，但在同刘格平的谈话中，态度很明朗。他说：“方振武将军是恨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最恨他们不敢碰一下在胶济路和济南的日本军队。一个月前，日本鬼子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屠杀了1万多中国同胞，杀害了17名外交人员，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蒋介石连个屁都不敢放，命令我们部队不准抵抗，撤出济南。方将军谈起这件事非常气愤。他对革命、爱国，是热情支持的，你们放心活动吧，在沧州有我们，保证百事皆无。”刘格平听了很高兴，决定明天再到沧县第二中学，找学生党员戈本捷、聂冠英等，给他们讲一讲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应如何开展工作。



第二天，刘格平来到沧县二中，见学校挺冷清，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因他穿着学生服装，也没阻拦。刘格平进了校园，见到宁津县籍的两个学生，一个姓毕，一个姓刘。他们告诉刘格平，因为国民党军队来沧州，要驻学校，提前放了暑假，大部分同学都走了，只他们少数同学没回家，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这两个学生认识刘格平，听过刘格平在学校演讲。他们对刘格平很热情，特别是那个姓毕的，把刘格平领到他们宿舍，打来水，请格平洗脸、喝茶、休息，一切安排好后，他俩就出去了。不多时，进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气势汹汹地问：“你是什么人，来这干什么？”刘格平说：“我是省党部的津南特派员，来学校找老同学的，一会儿就走。”“请你先在这儿休息吧！”经刘格平一解释，那两个穿军装的人，虽然态度缓和了，但是语气很肯定地说，“你不能走，也走不了。”两个来小时后，那两个学生回来了，问刘格平休息得怎样，还留他在学校吃午饭，显得很客气，很殷勤。刘格平把来人盘问的情况，向他们说了。他一摸裤口袋里装着50粒手枪子弹，就对两个学生说：“为防不测，你们把这些子弹先藏起来，找个地方埋了就行，以后我来取。”两个学生说行，那个姓毕的接过子弹，如获至宝，说了声“马上埋掉”，就一溜烟地走了。又过一会儿，来了几个士兵，什么话没说，进屋就把刘格平两只手拧到背后捆上抓走了。接着又从义兴德回民饭店抓来了李怀才，搜出了刘格平的手枪。经过审问，释放了李怀才。同时给天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打了个电报，查询有没有叫刘子敏的特派员。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叫王南复，是刘格平的老乡，沧县涨沙村（现属孟村）人，到日本留过学，在天津政法学校当过教员，国共合作北伐时，他表现积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投向国民党怀抱，坚决反共。他接到电报后，未加思索，当即令人回电，回答没有叫刘子敏的特派员。后来他听说刘子敏是刘格平的化名，后悔莫及。一次他见到刘格平的二哥刘济安，拍打着屁股说：“唉！那时我接到电报，头脑太简单了，也没问问刘子敏是哪的人，多大岁数，什么长相，就回电说没有个刘子敏。结果没除掉他这个祸害，只判他3年，太便宜他了！”

刘格平被判刑入狱之后，一方面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免遭杀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仍有机会继续革命而高兴，另一方面又很纳闷儿——姓涂的县长说过，沧州的驻军多为方振武的人，蒋鼎文的部队不多。而方总指挥支持革命、爱国，叫自己放心活动，保证百事皆无。怎么一到第二中学就被捕了呢？怎么姓涂的也不露面了呢？莫非上了这个家伙的当了吗？

刘格平被押进监狱的第二天，涂县长来探监了。一见面涂就惋惜地说：“事出预料，叫你受苦了。”刘格平以为姓涂的故作姿态，更怀疑是他搞的鬼。就以轻蔑的目光盯着他说：“怎么抓捕我在你预料之外？不会吧！”姓涂的咧嘴一笑说：“请别误会，抓捕刘先生绝非我们所为，而是……”接着涂县长讲了事情的原委。

涂县长告诉刘格平，前几天第二中学有两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沧县县政府，要面见县长，说有要事报告。他们见了涂县长就说：“学校里去了个姓刘的共产党，20几岁，高个子，白面皮，特来报告！”

“你们怎么知道此人是共产党呢？”涂县长严肃地说，“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可不要无根据地随便给人乱加罪名呀！”

“那错不了，”其中一个学生说，“这个人前年、去年都到我们学校去过，给学生们讲过什么国民革命，学习苏联等等，肯定是个赤化分子。”

“放肆！无稽之谈！”涂县长一听此人的年龄、长相，分析可能是自己见过的那位刘子敏，便一拍桌子说，“孙中山先生就主张联合苏联，学习苏联，蒋总司令遵照总理遗嘱，推进国民革命，怎么讲讲国民革命、学习苏联，就是赤化分子呢？岂有此理！”

这两个学生，就是在沧县二中“殷勤”接待刘格平的那两个人。他们找涂县长打小报告，闹了个大窝脖，就灰溜溜地走了。但他们立功升学心切，又找到国民党驻军第三军团蒋鼎文的司令部，求见蒋总指挥。蒋鼎文听说第二中学有赤化分子，即刻派人审查。接着，那个姓牛的学生又送来50发手枪子弹，便下令把刘格平、李怀才抓了起来，要法院判刑处决。但法院认为定“共党赤化罪”证据不足，就只判了刘格平3年徒刑，李怀才找同学谋职业，无罪释放。那两个学生，因检举“共党嫌疑分子”有功，得到蒋鼎文的赏识，当即给教育部门写了个条子，使他们顺利地上了大学。全国解放以后，那位姓牛的在国家地



质部工作。此人顺风转舵，看共产党得势了，就吹嘘他在沧县二中上学时，受到刘格平的影响，倾向革命，积极参加学潮斗争，等等。地质部派人找到刘格平，了解此人当年的情况，刘格平说：“20年代我是在沧县二中活动过，但当时对姓牛的这个人并不熟悉，是后来才了解他的。也许他有过革命的表现，但我同他直接接触只有一次，就是1928年夏天，我在沧州被捕时，是他告发和出卖的。”后来这个姓牛的被公安部门逮捕了，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涂县长探监时，最后对刘格平说：“营救刘先生出狱，现在还有机会，请设法给府上捎个信儿，抓紧来人保释，多少破费个钱，我们第四军团再帮助周旋一番，是能够出狱的。越快越好，因为蒋介石要调我们部队去南方“剿共”、打内战，也许近几天就开拔了。”

刘格平被捕判刑的信儿传到家里，他父母愁得唉声叹气，埋怨他不听话，不该在泊头刚赎回家来几年，又胡折腾。特别是他大哥刘重霄气愤地说：“活该！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叫人家枪崩了才好呢！除了这个祸害、败家子儿，也去了咱家的这块大心病。”刘格平的母亲听了，哭哭啼啼，责骂大儿子不仁不义，没有一点同胞的情义，央求老伴赶快想法去救。刘格平的父亲刘垣三，捻着胡子，度来度去，沉思良久，才对老伴说：“暂时不救也好。眼下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听说从南方到北方，越来越厉害了。咱花些钱把三儿救出来，这倒应该，总是亲生亲养，谁不疼呢？可是他出来以后，如果再不听话，还胡折腾，再被国民党抓起来，定个共产党的罪，那可就有死无活了。在监狱里叫人家管束着点，倒也不错。”

“那就叫三儿在大狱里活受罪啦？”格平的母亲心急火燎，擦着眼泪，盯着老伴，质问了一句。

“顶大就是坐3年呗！咱花上些钱，找些亲戚朋友帮个忙，到沧县衙里衙外、监狱上下，该打点的就打点打点，也许坐不了3年就出来了；就是不给他减刑，在狱里蹲上3年，拢拢他的野性子也好，免得出来再惹是生非。反正咱花些钱，别叫三儿在里头受大罪就是了，这还是能办到的，这个世道，有钱买得鬼推磨，哪有不认钱的呢！”

刘格平的父亲一番话，把老伴说服了，大儿子刘重霄只好顺从。于是筹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款、托人，买通了监狱上下，对刘格平这个罪犯给予了特殊照顾。刘格平的母亲爱子心切，不断托人给格平捎钱、捎吃的、用的。尽管如此，老母还是放心不下。3年刑期虽不算长，但对老母来说，那真是度日如年。由于忧思过度，没等爱子刑满回家，见上一面，老母便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刘家不惜钱财，贿赂监狱人员，本意是不叫刘格平在狱里吃苦，拢住他革命的“野性子”，岂知这倒给身陷囹圄的刘格平继续开展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他首先向看管他的两个狱警开展工作，主动热情地接近他们，一有机会就和他们攀谈。日子长了，得知他们家里都很贫寒，为了找生活出路，才当的狱警。刘格平很同情他们，不断用家里搞来的钱周济他们，逐步与他们建立了感情。接着，就给他们讲中国内忧外患，世道黑暗，百姓没出路，穷人挨欺负、受剥削。两个狱警听刘格平讲的都是实事儿，都很在理儿，就越听上劲儿了，主动找刘格平接着讲，问中国还有没有出路，眼下该怎么办。

刘格平说：“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按共产党的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闹革命，奔向共产主义。现在南方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领导工农革命，建了苏区根据地，咱们北方也要这么办！”

“北方有共产党吗？”狱警故意问。

刘格平微笑着说：“我看你二位都很诚实可靠，我就实话实说吧，咱们北方，咱们津南，咱们沧州，已经有共产党啦，看我像不像个共产党员？”

两个狱警听了，并不惊异。因为刘格平一进监狱时，他们的上司就向他们交代过，说这个犯人是“共党嫌疑分子”，要他们严加防范。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他们估计十有八九刘格平就是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由于他们为刘格平所讲的道理所折服，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当即要求刘格平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刘格平对他们鼓励了一番，表示可以考虑接收他们入党。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到1929年初，便介绍他们入了党。从此，两个狱警成了刘格平联系狱外党员，开展秘密活动的得力助手。为此，曾引起沧州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幸好他们始终没有被暴露。

全国解放后，刘格平曾找过当年这两个狱警，可惜由于时间长，他们的名字和住址都忘记了。后来想起一个叫毛德兴，就通过沧州的老党员李光明，打



听到他的下落。毛德兴是沧州北郊三里庄人，解放前就已经去世了。刘格平得知后很惋惜，就给他的女儿寄去100元，表示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

刘格平在狱中播下的毛德兴这颗火种，在沧州市郊燃烧起来。毛德兴在狱中入党不久，就发展了本村小学校长高景昌入了党。接着，高景昌又发展了周松山、高玉珍等五名党员，建立了三里庄地下党支部，后来扩大为三里庄区委，领导附近一些村庄，开展革命斗争，搞得很有起色。

刘格平在沧州监狱，还在一个偶然的机遇，结识了一个人。那是1931年春节后的一天下午，“当啷”一声，刘格平的牢房门被打开了，两个狱警推进一个人来，此人20多的年岁，不高不矮的个头儿，浓眉大眼，长得十分精神。他戴着手铐，怒目瞪着狱警，嘴里一个劲儿地直嘟噜，狱警刚一回身出门，他就大声说：“真他娘的欺负人，这算什么社会呀！”

“老弟，别生这么大气，”刘格平对这个人说，“先坐下歇歇，消消气，来到这个鬼地方，生气着急没用！”

“啊！这么面熟呀！”刚进狱的人惊异地说，“咱在那里见过，你是不是大堤东的呀？叫刘……”

“我叫刘子敏，”刘格平立即打断他的问话，“我是大堤东的，老弟你是哪的？怎么被抓来的？”

“我是王庄子的，到你堤东也就是十几里地，咱是老乡呀！”刚进狱的人接着说，“夜晚在俺村小茶馆里，我们几个人闹着玩，推了几把牌九，被集镇民团局子的几个小子抓了赌，他们抢我们的钱，我不给他，和他们争吵了几句，他们就把我抓这来了，真他娘的仗势欺人！”

从此，刘格平和这个新罪犯住在一个牢房，日子长了，了解了这人的身世。此人叫冯寿常，时年25岁，比刘格平小两岁，出身贫寒，兄弟二人，他是老大。由



1928年，刘格平被国民党关进沧州监狱，1931年出狱。这是出狱时留影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于父母疼爱，苦巴苦拽地供他上学，1926年高小毕业后，又去武汉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叛变革命以后，冯寿常十分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一甩袖子回家来了，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员。

刘格平和冯寿常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发现冯寿常对黑暗社会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为国家、家庭和个人没有出路，十分苦恼。刘格平耐心开导教育，使他思想开朗起来，认清了革命前途。看他思想成熟了，刘格平就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党员身份告诉了他。冯寿常感慨地说：“我早估计你就是刘格平了，对你我是久仰了。老子说过‘祸兮福所倚’，我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呀！要不是被抓来坐大牢，谁知何时才能得到你这位明人指点迷津呀……”当即要刘格平介绍他入党。

1931年6月，刘格平刑满出狱。他先回到了堤东村与党组织又建立了联系。一个月后回到天津，找到了在《大公报》工作的王云生，才知道省委已经转移到北平。刘格平即刻赶到北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北平，党组织向刘格平介绍了从南方来的共产党员潘莫和（原名潘漠华）<sup>①</sup>。潘莫和是浙江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刘格平听其口音已经有所改变，一看就知其到处奔波多年。潘莫和先是在家乡开展党的活动，家乡党组织遭到破坏后，随北伐军进入河南，又以教师名义在开封活动，再遭反动当局通缉后辗转到达了北京。党组织考虑他留在京津仍有危险，正值刘格平到来，党组织希望刘格平能帮助潘莫和，给予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1931年8月，潘莫和拿了北京一位文化人的信函，刘格平又通过父亲和亲戚的联系，将他安排在了沧县二中教国文。安排好后，刘格平向潘莫和介绍了当年在沧县二中开展活动的情况，潘莫和听后十分高兴，他没有想到这里有那么好的工作基础和革命传统。潘莫和的到来使沧县二中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还发展了一批党团骨干。解放后曾在多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就是1931年底由潘莫和

<sup>①</sup> 潘莫和（1902-1934），原名潘漠华，浙江武义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多次被捕。1931年8月再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化名潘模和，转移到沧州市立二中任教。在沧州二中，他恢复了党团支部并介绍多名青年学生入党，引起了学校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密切注意，任教仅半年即被解聘。1933年底在天津被捕，因坚决拒绝向敌人屈服，1934年底被敌人用开水活活烫死，时年32岁。



发展的共产党员。

安排好潘莫和后，刘格平按照省委的指示和要求，书写了有关材料，汇报了自己在狱中的斗争和有关工作。此时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为了支持抗战，省委派刘格平去山西、陕西开展兵运工作。刘格平欣然接受，立即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

### 只身赴晋陕开展兵运，又下麻城寻找红军，取“经”不成，开阔眼界经受了锻炼

1931年10月，刘格平到了晋南解县，冯玉祥旧部刘汝明<sup>①</sup>的部队退入山西后就驻扎在那里。刘格平有个表叔叫李振翌，是刘汝明的秘书长。对刘格平的到达，表叔最初显得很高兴，因为大战败后，何去何从正困扰着他们。表叔马上报告了刘汝明，但刘汝明让表叔先探明来意再说。刘汝明对共产党存有顾忌，但又不想招惹，它主要听冯玉祥的。这样一来，表叔对刘格平的活动也很注意，恐怕惹出什么乱子。几天的接触，刘格平从表叔那里掌握了基本情况。原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后，阎锡山要经大连上日本，冯玉祥的部队已经分崩离析所剩无几，分别被张学良、杨虎城收编，只有刘汝明等少数几个冯的铁杆还跟着冯，实际也惶惶不知所向。特别是，宣称要出洋日本的阎锡山已经潜回山西，暗中仍遥控着山西大局。冯玉祥就住在临汾，是寄人篱下，并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表叔告诉了刘格平更糟的消息，在阎锡山遥控下，山西徐永昌政府在太原抓了一大批共产党，表叔也暗示刘格平赶快离开。刘格平判断表叔所说是实，需要立即向省委汇报，便又回到北平找到省委。省委的老刘同志说，也刚得到消息，山西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被连锅端了。因为出了叛徒，实质还是对阎锡山抱有幻想而麻痹所致，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但希望渺茫。老刘还说，根据得到的确切消息，阎锡山已再次投蒋而冯玉祥转向亲共，省委的意思还是要派刘格平再去山西。于是刘格平于11月又回到三晋大地。

这时，刘汝明部已被改编后调驻沁县。在沁县，他又找到了表叔李振翌，

<sup>①</sup> 刘汝明（1895—1974），河北献县人，民国陆军上将，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对冯玉祥的忠诚矢志不移，冯玉祥下野后，败退到山西的冯军残部被张学良整编为第29军，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为副军长。后成为抗日名将。1975年4月28日病故台北。



刘格平给他讲当前的整个革命形势，特别介绍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老百姓是不会饶恕他的等等。刘格平还送给表叔一些进步书籍，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经表叔介绍，刘格平又乘长途汽车到了晋城，接触了一支由马英图为首的民间武装。这支武装在太行山里活动，山里还有红枪会、会道门等土匪，他们专等收编，先要官，后要钱，骗过不少军阀，每人手里接到的委任状有一大堆。刘格平回到沁县，把了解的情况给李振翌讲了，李振翌听后感到共产党确实值得追随，他强烈表示也想秘密加入共产党。于是，刘格平就作为他人党的介绍人，发展他成为党员，并向他交代了伺机在军队开展工作、争取军队的任务。

之后，刘格平乘长途汽车到了晋南运城，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先生<sup>①</sup>。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党无派，他都肯帮忙，你想找谁，他都可以介绍，1925年在国民第二军时刘格平就与他认识。这次见面，景先生格外热情，他们谈了许多北平、山西及全国各地抗战活动的情况。他问刘格平：“你要去抗日吗？”刘格平说：“我想搞一些武装，光杆子去了没有用处。”景说：“不能指望阎锡山这种人，他朝亲暮叛，完全靠不住。”景梅九写稿子骂阎锡山，阎还送钱给他。他说：“除了阎锡山，你到哪里去，我都可以写信”。刘格平说自己想要到陕西去。随之，景梅九就给杨虎城、冯钦哉、吴勉之等每人写了一封信，这些人正是刘格平此番想找的对象。刘格平告辞景梅九后，从沁县坐长途汽车到了太原。果不出所料，太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阎锡山已经公开表示拥蒋悔过，杀害了阴凯卿等一批共产党人，却释放了所抓的国民党人。阴凯卿的牺牲很可惜，他才27岁。

这时，党在山西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还没有得到恢复。刘格平想到，在北平时省委老刘转达省委的意思，是否想让他留在山西呢？想来想去，他认为不能留下，这倒不是因为害怕白色恐怖，而是因为刘格平感到自己难以适应山西工作的特点。刘格平对阎锡山没有丝毫好感，这是因为在一系列问题上，阎

<sup>①</sup> 景梅九（1882-1961），山运城人。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同盟会，回国后编辑出版《国风日报》。1930年拒绝国民政府高官厚禄避居家乡。1947年，在山西民众推戴下，率请愿团赴南京要求撤换阎锡山。后赴上海，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首届民革中央监委。新中国成立前夕，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联名邀其赴京共商国是，但因病未能成行。1961年在西安去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锡山的出尔反尔。他先是唯奉系之命是从，后又出兵讨奉；表态拥蒋不足三个月，又公开反蒋；他把冯玉祥骗到太原后扣押起来，接着又联合冯玉祥向蒋介石开战，战争失败后又向蒋介石悔过而打击冯玉祥。但有一条，阎锡山反共却是由来已久持之以恒的，丝毫也不手软。同是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贺昌以及国民党元老景梅九对这一点就都看的十分清楚，但在山西我们党内却有一部分人对阎锡山抱有很大幻想。刘格平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天津就有因为党内分歧而被敌人钻空子连锅端的教训。于是，他在太原花了8元钱，雇了一辆人力车走了好几天，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事实证明，刘格平的正确判断是正确的。至于后来我们党与阎锡山搞统一战线，那是因为抗日大局及八路军主力栖身于山西的需要。实际上，阎锡山同样先是抗战，后来又秘密与日本人勾结。

刘格平过黄河后先到潼关见到吴勉之。他们在国民第二军时就相识。吴勉之是杨虎城部冯钦哉师的一个旅长，1926年时曾任国民第三军骑兵支队的司令。国民军被吴佩孚、张作霖联军打垮后，是共产党将他送到苏联学习，回来又当了旅长。可他见到刘格平后却说：“过去，我是要革命的，现在不行了。”刘格平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了东北。如今又要向上海进攻，它的企图是要吞并整个中国。‘树欲静，而风不止’，阁下想苟安一隅，可能么？”他点头表示赞同。这时，刘格平觉察吴勉之身体状况不好，脸面暗淡，显得很疲乏。所以简单谈了些往事就告辞了。刘格平随后一个人乘长途汽车来到了西安，住在东大街的长安饭店。

这时的西安城约有10万人，鼓楼以东的全是土路，鼓楼以西是石条铺的路，很窄，且路面高低不平。西安有个新城，在清朝时，曾是满族人住的地方，现在是杨虎城司令部所在地。它的东面是孤零零的民乐园，其余就是一片面积很大的空地。第二天，刘格平赶到新城去见杨虎城。出来接待他的是杨的大秘书王菊人，他问刘格平有什么事，刘格平说：“我一来是拜访；二来是受河北省民众委托，想请求杨先生出兵抗日。”

他说：“我可以转达刘先生的意见。抗日是个大事情，听候中央和国民政府政府的命令。”

刘格平说：“抗日是每个国民的责任，尤其是军人，更有捍卫国家的责任。”



他说：“我可以转达先生的意思。先生，你住在哪里？”刘格平留下了住址后就告辞了。可王菊人再也没有找过他。

等了几天，没有王菊人的音信。后来刘格平才知道王菊人也是共产党员。刘格平又找到韩光琦，他曾是史可轩的副官，与刘格平是老相识，现在是杨虎城的亲信，时任军需处长。他知道刘格平是共产党，说：“我们欢迎在共产党中不干了的人，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刘格平听后没有搭话。从韩光琦那里，刘格平才知道许权中已经去了苏联。刘格平在陕期间，韩对他在经济上给予很大接济。

1932年初，刘格平到大荔县冯钦哉部独立营，找到时任营长的景行之。他是史可轩的副官李子五的家乡同学，是李子五介绍他们认识的。见到刘格平，他很高兴，当即把他安排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后来他们谈起冯钦哉的情况，他说：“我们师长，你找他可以给你个副官当，他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不在我们部队捣乱，都可以兼容并蓄。”

刘格平说：“你怎么个看法？”

他说：“我的力量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我是倾向你们的。杨虎城对冯钦哉不怎么看得上眼。还希望你在韩光琦面前多美言几句。”

刘格平说：“韩光琦还有点儿力量吗？”

他说：“韩是杨的惟一心腹人，他掌握着经济大权。”

刘格平住了几天后又回到了西安，见到韩光琦，问了杨、冯的关系，他很不自然地表示说：“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是多年的朋友。”

刘格平说：“我也是随便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同时，把景行之问候他的话也说了。他说：“噢，原来你们熟悉呀！他已提为团长，是冯师长的得力部下。”

在陕期间，刘格平经常来往于西安、华阴、潼关等地，时常到韩光琦、吴勉之、景行之那里去。吴勉之比较活跃一些，他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起来革命。景行之则顾虑力量单薄。刘格平到陕西，是受组织委派搞军运的，为了安全，上级并不通知当地党组织。是否与当地联系，完全由个人掌握。这期间，因为北平的党组织几番遭到破坏而联系不上，刘格平考虑后，还是联系上了陕西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 委贾拓夫等同志

西安国民省政府的秘书中有一个左派分子是王仲一的弟弟，他是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成员。通过他，刘格平认识了秘书科的科长张子明，后又和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联系上了。当时，杨虎城司令部的秘书长王义山、办公厅主任陈子坚、秘书王菊人等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主要和南汉宸联系。杨虎城也是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但他又不敢惹国民党反动派，他对共产党在西安的活动，视而不见，不予干涉。赵寿山是杨虎城部驻扎在陕南的一个旅长，和共产党有联系。当时，陕甘地区的形势是好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多次组织起来进行抗税斗争。这时，国民党的大批要人也经常到西安来活动，如张继、褚民谊等等。还有一些是国民党中的大人物，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他可是蒋介石反动理论的制造者，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当时住在靠近碑林的一个寺庙里，周围戒备森严。陕西省教育厅，通知各个学校的师生去民乐园，听戴季陶作报告。刘格平和大家连夜商议，趁这个机会闹一下，杀杀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刘格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贾拓夫。

1932年4月12日上午9时，会场上座无虚席，戴季陶在教育厅长的陪伴下走上讲台，他在大谈“安心读书”、“读书救国”等陈词滥调时，台下学生们的条子像雪片似地往上递，内容是：“请戴先生讲讲当前如何抗日？”“请讲讲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抗日？”“请讲国民政府的抗日国策”等等。条子越递越多，教育厅长坐不住了，他和戴季陶耳语了几句后，对台下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希望现在不要递条子了。请在散会后，有条子的直接送到教育厅，我保证转给戴先生，再给答复。”台下的人们马上高喊：“不行！不行！马上答复！”喊声震天。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轰他走！”于是砖头、瓦块像雨点似地飞上讲台，打得戴季陶等人抱头鼠窜，狼狈不堪，连爬带滚地逃下台去。愤怒的群众还把停在民乐园大礼堂前的小轿车推倒，放火烧了起来。民众越聚越多，然后又组织了示威游行，群众自发组织到省政府、杨虎城司令部请愿，要求抗日，希望得到满意的答复。

4月13日，刘格平他们带领群众又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他们高呼：“驱逐戴季陶！”“打倒亲日投降派！”“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等口号，参加的有市民、师生、店员、人力车夫等。但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镇压，打伤了一个学生，在武力逼迫下，游行队伍不得不四散而去。后来警察局长张胖子由于镇压爱国运动，反对群众抗日，被撤了职。从此以后，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活跃了。这时，刘格平和南汉宸也熟悉了，彼此交谈中，知道杨虎城是很苦恼的，受两面夹击，陕西群众起来，直接烧到他，蒋介石也给他施加压力。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把西北的军队和西北群众联合到一起，抵抗蒋介石的压力。要把陕、甘、青、宁四省的各族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但在1932年春，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刘格平和北平的党组织也联系不上，接不上头。

在陕西开展兵运工作期间，刘格平得知冯瑞生是一位进步回族开明人士，很有声望影响，便以回族身份与其接近，遂成至交。在刘格平进步思想影响下，冯以陕西回教公会名义，组织回族青年成立了“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冯瑞生主持大会，刘格平向到会回民作抗日爱国宣传。大家公推刘格平为救国会会长。在西安条板街基督教青年会，刘格平与马明德、苏玉涛、苏玉、马昌英、马俊英、冯坤亮、安友兰、安惠生、刘志善、白逸安等回族青年开会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印刷传单，上街游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刘格平倡议和冯瑞生支持下，“陕西回族青年读书会”在西安市东大街青年会成立。刘格平每周向救国会青年读书会的成员讲解国内形势及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听者无不感动，对抗日救国的认识茅塞顿开，大大激发了回族青年抗日爱国热情。7月31日晚，刘格平和进步青年们在中山小学礼堂，举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活动时，遭到警察的干涉。西安抗日游行高涨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陆续派人到西安，加强省党部的力量，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西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刘格平就离开了西安，准备寻找红军，寻找革命队伍去。

1932年8月下旬，刘格平只身来到湖北汉口，准备到鄂豫皖苏区寻找红军，向他们学习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到汉口后，他先是住在了张文华家里。张文华是中山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准备继续考大学深造。刘格平因寻找红军心切，在他家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告辞，然后乘坐小火轮，辗转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到麻城，去找一个姓李的朋友。他的这个朋友原在国民党西北军吉鸿昌部队供职，自吉鸿昌将军因倾向革命被蒋介石逼迫离职，军长换成张印湘后，又在张印湘手下当参事。刘格平准备先找他住下，再做下一步打算。

在麻城街头，刘格平沿着马路一路寻找、打听，只见城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哨所，警戒森严。但可能因为他十分沉着、冷静，又是城里人的打扮，没有受到过多的盘问，便很快来到司令部，并找到了那位李参事。李参事见了刘格平，虽然没说什么，把他留在司令部里暂时住下，但明显表现的是不热情、不欢迎。刘格平住下后，几次发现张印湘曾在他的住房门口徘徊，欲进又退，看来李对他是有所怀疑。因此，刘格平在这里只住了两天，就决定离开了，继续他的南寻行动。

离开张印湘司令部后，刘格平迅速出了麻城，向大别山方向走去。大约走了5公里路左右，就进了山，他沿着山道继续前行。路过一个山村时，听到有说话声。但没有异常情况，他就继续向深山里走去，路上人迹罕至，只有青山依旧，凉风习习，山影伴着他“沙沙”的脚步声一路前行。

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见到了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刘格平喜出望外，赶紧凑了过去，和老人家亲热地打招呼，坐在一起聊了起来。聊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老人家看出刘格平不是一个坏人，是真心找红军的，才告诉他：红军已经走了几天了，但是究竟上哪去了，他也不知道。听了老人的话，刘格平的心凉了半截，只好告别了老人，怀着遗憾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往回走，直到天色黑了，才走出了大山。

这一带由于经常打仗，沿途的村庄都是又残又破。路过的人家，往屋内瞅瞅，都是空空洞洞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虽然有些镇子能看到一些人，但没有一个是女的。天黑尽了，当刘格平走到一个看着还算像样的村子投宿时，有个村公所的人，领他到一个空房子里安排住下，还给他送来了晚饭。原来他们把穿戴还有点模样的他当成官府的人了。这家住所很简陋，没有桌椅，只有矮矮的床，床上只铺有一个草席子，在墙上挂着一个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光亮。尽管走了一天的路，身体很疲乏，刘格平躺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了很多。这个地方周围有这么好的地形，村庄、人口看来还都不很少，而



且右可对准武汉，左可对准南京，南有长江天险，大别山东西南北约有1000公里，真是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地形，为什么红军要离开这么好的地区，退出鄂豫皖苏区呢？唉，左思右想，他真是疑惑不解。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造成的。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以前，张国焘被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的几次战役重大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轻敌，不继续做反“围剿”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导致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张国焘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他不敢执行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对红四方面军摆脱困境提出的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个地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第四次“围剿”的正确建议，反而提出了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带领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寻找红军没有结果，刘格平又回到武汉。看到国民党的报纸宣传，证实了红四方面军已撤离鄂豫皖地区，向陕南前进的消息后，他想，这次虽然没有找到红军，但是总算到了苏区，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既然红军已转移撤走，那他也只好返回了。随后，他便乘坐平汉的列车，回到了北平。

回到北平后，已经是1932年的8月底。为了尽快参加斗争，开展工作，刘格平又找到了在省委工作的王佩轩，要求组织尽早分配给他工作。当王佩轩问他有什么打算时，考虑到自己对津南比较熟悉，还是回津南地区工作比较合适，刘格平就如实地向王佩轩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过了两天，王佩轩告诉他说：党组织已同意他回津南，并告诉说组织上已派去了一个姓廖的同志（廖华）负责津南工作。这时省委领导人已换得很多，有的被捕了，有的已调任他处。但刘格平还是从坚持组织原则出发，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把他这一段的经历和坚持斗争情况简单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然后他就满怀对革命斗争的渴望和豪情，信心百倍地踏上了重返津南的征途。

### 重返津南领导农运，组织马颊河农民暴动，惨遭镇压血洗，刘格平第3次被捕入狱

1932年9月上旬，刘格平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回津南工作。他和先期到达的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为了尽快恢复各地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各项斗争，经过特委积极工作和努力，先恢复了庆云、盐山、沧县等县委，后相继在乐陵等县建立了县委一级的工作委员会。9月中旬，刘格平主持召开了盐山、庆云、沧县等县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发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决议》的行动大纲，布置了发展党的组织、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创造苏区的任务。11月，刘格平在高湾组建中共高湾区委员会。指定杨正泉任书记，傅仙坊为特派员。

1933年4月，根据河北省委4月2日的指示信，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村沈士敏家中成立。廖华主持会议，组织分工是：书记俞思荣，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刘格平，宣传委员吴建华，青年委员贾树清，交通委员邸玉栋。会议确定刘格平、吴建华分别负责津浦路东、西各县党的工作。5月28日，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由刘格平、廖华、沈士敏等组织津南18名党员去北平参加河北省委举办的地下干部训练班。会上，河北省委针对津南党组织发展迅速的形势决定：将中心县委改为特委，原中心县委成员分工基本不变，仅是吴建华改为组织委员，刘格平改为军事兼宣传委员。此期间，省委曾调唐山李学先任书记，这是贯彻中央党在白区的书记必须是工人的精神。因津浦路东党的工作量大，设津浦路东中心县委，又名盐（山）庆（云）中心县委，始由刘格平负责，后由胡恒熙任书记。刘子芳、冯景恩、贾震、刘万春等分别担任沧县东南、无隶、乐陵、惠民等县工委书记。8月，刘格平在盐山西隅刘玉章梨园主持



召开津浦路东中心县委成员和部分党支部书记会议，要求继续组织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反对苛捐杂税；从1925年张隐韬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始，到1927年改造土匪队伍，1928年武装占领庆云县城后与围城的奉军张宗昌部步炮兵血战3天最后撤出，虽然几次搞武装斗争都失败了，但是地方武装中大部分进步力量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革命武装方面，既总结出了失败的教训，又取得了组建革命武装的初步经验，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认识上越来越明确。于是，会议决定，各县建军委，抓武装，搞武装暴动。后来，因为津南出了叛徒，廖华、沈士敏均遭敌人杀害，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刘格平侥幸逃脱后不得不暂避天津。

1934年4月初，刘格平从省委回到津南后，经过盐山到了庆云县，正碰上国民党县政府急如星火地催促老百姓挖马颊河。这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自西向东，流入渤海，数百里长的河道，大部分流经山东鲁北地区，只有二三十里河段经过隶属河北省的庆云县境南部。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时正值麦苗返青，也是农村送肥整地准备春播的大忙季节，老乡们送粪的送粪，整地的整地，都在为生存忙碌着。可是国民党县政府发布的挖河命令，要每户必须去1人，如不去人，每户每日必须交1元钱，加之挖河要加宽加深河道，不但要毁掉大片麦田，而且要毁坏相当大的一部分河滩好地，使得连年遭受灾荒，无粮糊口，生活十分困难的穷苦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怨声载道，叫苦不迭。而县里、区里的大小官吏，却可借此机会，大发横财，不但将征收的钱装入腰包，还可以借修河名义向上面要一部分钱、粮，这对他们来说，是县区可以互相分肥的美差，横竖还是老百姓倒霉。

面对国民党县政府的暴政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群情激愤的广大百姓，庆云县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团结一心，搞一场抗暴政、抗河工、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当时，庆云县党的力量在津南铁路以东各县党组织中是最强的。县委主要成员是：县委书记胡恒熙，组织委员邸玉栋，宣传委员范廷俊，军事委员胡泮河，团委杨德然。县委下辖5个区委：城西杨庄子区委，区委书记杨德然兼；城北区委，区委书记胡林晓；城东区委，区委书记张玉峰；城东南区委，区委书记武大风；城南区委，区委书记张笃骞。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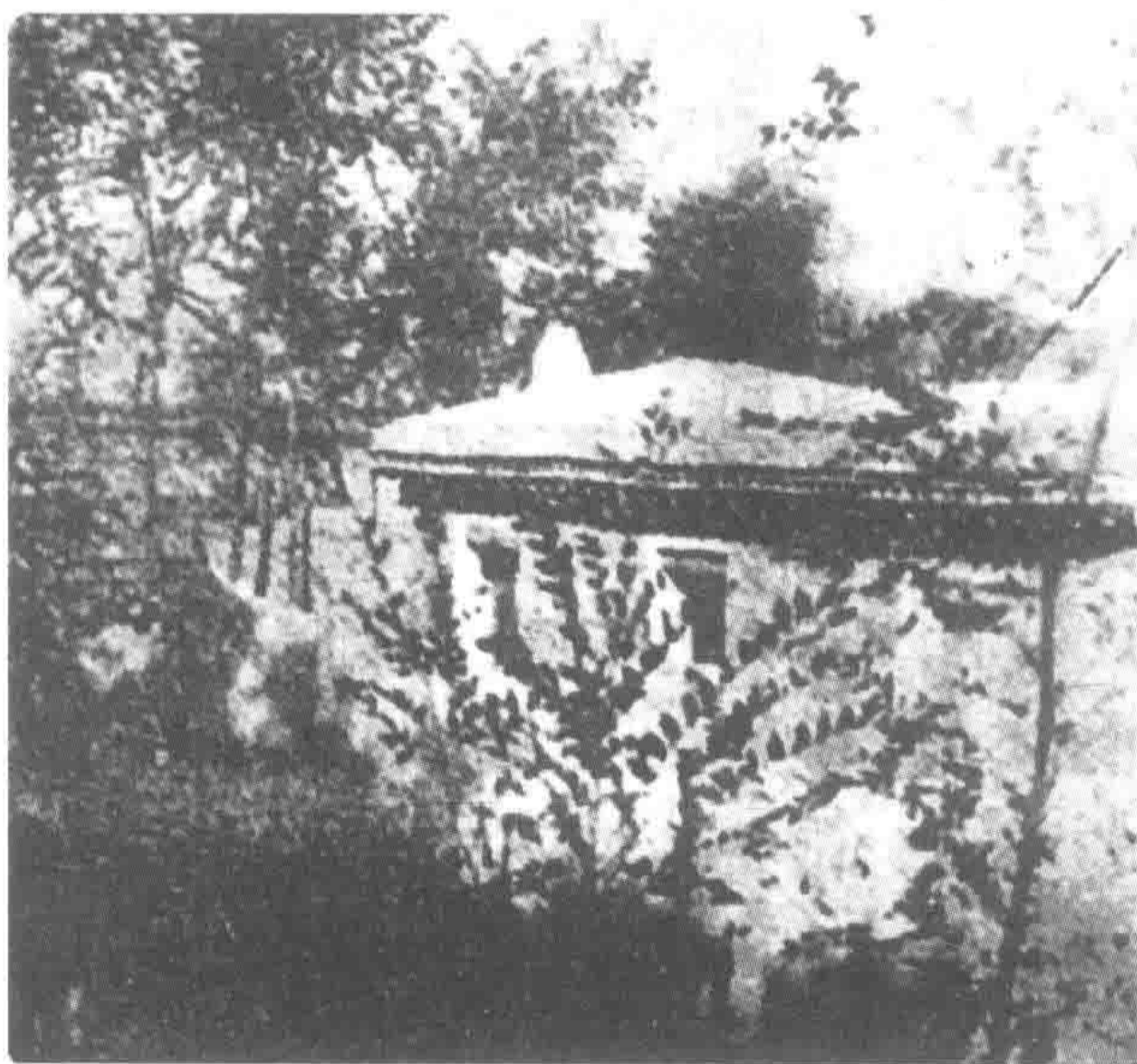
为了领导好这次抗河工斗争，4月16日晚，县委在庆云县城东区张家村张玉峰家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有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上海战争，在北面则步步逼近平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怒涛席卷中国大地。就在靠近津南地区的冀中高阳、蠡县先后发生农民暴动，同年保定第二师范发生学生暴动；在大江南北、西南、西北的苏区根据地，英勇的红军在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当时在庆云，国民党县政府把各族百姓逼上梁山，眼看一次大的反抗运动就要爆发。现在群众反抗情绪高昂，似如干柴，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一点儿火星就着。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形成了如下决议：

第一，马颊河大部分在山东境内，挖河对山东有好处，山东省应该拿钱赔偿河北省河段被毁掉的两岸麦田和土地损失，并花钱雇佣劳动力挖河；

第二，如果河北省同意挖河，应该由省里拿钱；

第三，要问庆云县老百姓要不要挖河，那只有很简单的一个答复：“不挖！”

会议最后还决定4月18日，在庆云县城东北东林店庙会（正在演戏祭神）



1934年，刘格平等领导庆云县人民进行罢河工、抗暴政的马颊河暴动之前，在张家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这是开会时的旧址

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要求各区委通知党员带头都去。联络办法是采用了传鸡毛信的方式，即写一个条子上面粘上一根鸡毛，每个接信人见到就另多写几张，用同样方法散发出去，只需半天功夫就可以传遍全县。

随着鸡毛信的秘密散发，广大群众的奔走相告，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斗争气氛越来越浓厚，同时也惊动了庆云



县反动当局，他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密谋对策，开始了镇压。17日，他们先在城南板打营村附近逮捕了张笃骞，18日拂晓又在城北龙王庙村抓走了胡恒熙，并把他们两人关进城里监狱。

东林庙会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集会，距庆云县城15公里，一不靠村，二不靠镇，是在一个大漫洼中，但规模不小，赶会的人很多。18日早上，刘格平和庆云县委已经得知胡恒熙、张笃骞被捕的消息，上午便在庙会的一个卖包子棚里，召集区以上负责人开了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决定首先组织发动群众到城里去请愿，把胡恒熙、张笃骞二同志救出来，要求取消挖河，取消苛捐杂税等；并以刘格平的名义写了通知，派邸玉栋通知各县委、工委要做武装暴动的准备。根据各地的力量，如果庆云县发展成暴动，收缴了全县民团、警察的武器，就可有300多支枪，再加上盐山县委、沧县县委，很快可有上千支枪；如果隐蔽活动，就在胶济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活动起来，让反动当局摸不清底细。为了开好大会发动群众，会议又决定派庄科村党的负责人萧卓子去和庙会会头交涉商量，临时把戏停下来，利用戏台召开群众大会。

此时，庙会上已有100多个民团在民团团长胡振国指挥下，将会场团团包围起来。刘格平见状立即布置了一个反包围，对每一个民团，设3至5人围住他、监视他，谁要敢动，就立即下他们的枪，缴他们的械。同时又在戏台的上、下组织了20多个小伙子，推举胡林晓上台讲话。胡林晓刚上台讲了几句，带着十几个兵围在戏台下的胡振国就跳上戏台，进行阻挠，不让胡林晓讲。正在这时，一个同志带着几个壮小伙子涌上戏台，一膀子就把胡振国扛到了一边，他那几个喽啰兵，也被一群大汉包围起来。这时台上的同志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从不该挖河的理由，讲到要来开群众大会的两位代表胡恒熙、张笃骞被国民党县政府的无理逮捕，以及武装民团包围会场企图阻止开会的反动行径等等，群众越听越气愤，群情振奋，齐声高喊：“把人给我们放出来！不能欺负好人！”台上的同志看到群众已被初步发动起来了，便又进一步进行号召：

“除去做买卖的留下外，其余人都到县里去把人要出来！走！”随着台上一声“走！”真是一呼百应，台下群众满腔愤怒如火山爆发，再也压抑不住，众人高喊着：“走啊！走啊！”像大海里被台风刮起的浪潮般，朝着县城方向涌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去。

看着黑压压、怒不可遏的人群，胡振国所带的100多民团被吓得不知所措，谁也顾不得谁，人人拖着枪拼命向县城鼠窜而逃。

刘格平、胡林晓接着又组织了几十辆自行车，到去县城沿路附近各村继续动员群众进城。将近中午，人们到了县城西门外。这时逃进城的民团，把城门关得紧紧的。进城的群众组织了约300人的敢死队，来到城门跟前，“一、二、三”一叫号儿，一齐用力一推，七八寸厚包着铁板、里面横着直径1尺的门栓，还有二三十个民团顶着的城门被撞开了。愤怒的人们缴了几个阻挡前进的民团的枪，如决了口的江河，一涌而进，势不可挡，直奔县府而去。

庆云县城只有东西两门，进城后刘格平、胡林晓在两门各派20个大汉，他们走家串户找来木棒作武器，把守城门，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在警察局、民团总部都派了四五十个大汉持棒把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余大部分人都涌向县政府，两三万群众将县政府三面包围起来，并进入县衙院内。这时院子里大堂门口，仍有几十个警察守着，大批的小伙子就都紧贴他们身边，使他们想动也动不了。请愿的人们当场提出了8个条件：一、立即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并向其道歉；二、取消挖河；三、取消印花税；四、……其他等等。群众要县长出来谈判，县长吓得早已藏起来，有个科长，出来冒充县长。反复几次交涉，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许多人手持扁担、棍棒，恨不能闯进衙门内院，打它个人仰马翻。县政府的人看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也顾不得多考虑了，马上答应了8个条件，并签了字，盖了章，立即释放出胡恒熙、张笃骞二位同志。

胡、张二同志被释放了，请愿条件答应了，抗河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两三万情绪高涨的请愿群众扛起刚被释放的胡恒熙、张笃骞，由敢死队维持着秩序，列队一面游行，一面高喊着口号，兴高采烈地到西门广场开庆祝大会。在临时会场上，早有人在临街铺子里，架出几张方桌作为临时讲台。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振奋、扬眉吐气的老百姓人人喜笑颜开，挺起了腰板。国民党县党部里的“要员”们不敢露面，都躲在房里从窗缝往外偷看。大会在总结庆贺抗河工斗争胜利的同时，再次号召全县人民要团结起来，并订出各村相互增援联



络方法，即军警到哪个村抓人，哪村击鼓报警，各村都要派人增援；取消警报，以鸣锣为号。大会最后做出了第二天去板营镇马颊河集合，到河道工地游行的决定。

19日这天，板营镇人头攒动，人声沸腾，来参加大会的有城南、城北各村的群众，有扛着铁锹、扁担在马颊河挖河的民工，约有四五万人。平日倍受警察欺压的百姓，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不但全部收缴了镇上警察的40多支枪，还把巡官揪出来打了个半死。这次大会是由胡恒熙以全县罢河总指挥身份亲自主持召开的。他向群众传达了昨天打进县城的胜利和国民党县政府答应的8个条件，并进行了一番演讲。此时马颊河两岸人山人海，欢声雷动，群众情绪随着大会主持人的演讲，愈发高涨激昂。最后大会宣布了20日上午在城北阎家务集上开大会的决定。仍沉浸在兴奋之中的广大百姓，欢笑着、议论着，带着胜利的喜悦，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离开会场，各回家园，期待着一场新的斗争的到来。

经过18日、19日两天的抗河工斗争、请愿、集会和游行，广大群众的斗争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进一步搞好下一步的斗争，19日晚上，刘格平和庆云县委在城北马刘家村召开了区以上党员负责人会议。会上大家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形势，许多同志认为目前群众情绪高涨，已经发展到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了，你不动手，反动当局就要动手了。这个估计是对的。此时探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已调遣了两连骑兵，十万火急向庆云县城开来，县委遂决定举行武装暴动，连夜缝制红袖章、红旗，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并要在第二天阎家务大会上，将袖章发下去。同时大家还分析研究了当时有利于武装暴动的因素和条件：阎家务有40个民团成员，队长姓王，和我们地下党有关系，可以利用；除驻守城里的以外，分散在全县的民团、警察还有200多支枪，他们居住得很分散，驻地都在群众包围之中，而且民团中有一部分党团员同志和一些同情分子，武器容易被收缴；另外，我们地下党在反挖河、抗河工斗争一开始，就已估计到有发展成武装暴动的可能，所以已令特委交通邸玉栋即刻通知铁道东各县，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其实，在东林庙会召开大会，撞开城门冲进城，包围旧县政府，从监狱要出胡恒熙、张笃騫，强迫县政府答应8项条件等等，实际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上即已开始了暴动。现在要在一个县里举行暴动，周围如果积极响应，开展活动，至少可以起到牵制作用。仅在刘子芳手里，就可很快集中起很能打仗的100多人枪，阻击敌人。

4月20日早晨，当刘格平和胡恒熙带着暴动队伍正向严家务方向前进时，刘万春迎来说，城里的民团、警察已集合起来，配合上边派来的骑兵要进行镇压，最好别往那边去。刘格平说今天不去不大好，如果我们早到了，把旗帜、袖章早点儿发下去即分散，敌人去了就会扑空。当时商定就在当夜开始行动，把城外民团、警察的枪收缴了，先在几个地方集合，最后集中到庆云县和无棣县边境。因为无棣县属山东省管辖，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还没有打听到他那里有什么行动，只有河北敌军有调动。

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暴动队伍加快步伐，赶紧集合到了严家务村。严家务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集市也很大。刘格平将会场设在靠村子西面的小学前面，到会的人都是各区的骨干分子，本村的民团关着门没有出动。就在暴动队伍刚开始散发旗帜、袖标时，在村外放哨的两个人急匆匆跑回来告诉，敌人来了！说话之间传来枪声，是敌人的自行车队开了枪。这时暴动队伍只有少数手枪，绝大部分人赤手空拳，而敌人全副武装的大约有200多人，已跑步跟在车子队后面围上来。面对敌情，刘格平赶紧把参加大会的群众往东西集市疏散。待到参加会的五六千群众疏散完了，多数同志也跟在群众后面分散隐蔽了，剩下的人再想躲避隐藏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有几个人躲到小学里面去，刘格平和胡恒熙简单商议了一下，决定进村子隐蔽。大家分头行动，往村子里撤去。敌人见暴动队伍没有还枪，便一窝蜂似地尾追而来。刘格平翻墙越屋，穿街走巷，从街中间一直跑到村西头。当他跑到一家农院里时，一位30多岁的农民赶紧把刘格平叫进到屋内，并立即脱下他身上的衣服让刘格平换上，想把他掩护起来。但是，穷追不舍的敌人很快从四面包围了这所院子。穷凶极恶的敌人闯进来，照着刘格平就打了一枪，正打在刘格平的左手上，一个手指头被打掉半截，两个手指头被打伤，只连着一点儿筋皮，鲜血直流。刘格平负伤被捕了。

这一次在严家务，暴动队伍一共9个人被逮捕，有7个党员，1个团员，还有



1个非党的进步村长；其中有3个人受了伤，除刘格平之外，胡林晓被打伤左胳膊，杨德然被打伤头部。由于刘格平和胡林晓受伤较重，敌人要了两副担架，把他俩和其他被捕的人一块押回了县城，分别关进了公安局和县监狱。

第二天，反动当局又在城南大肆搜捕，抓来8个人，其中有7人是农民积极分子，另一个小商人打扮的则是青县派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这样，在敌人的武力镇压下，暴动队伍有17人落入敌手，被捕入狱，轰轰烈烈的马颊河农民抗河工暴动惨痛地失败了。

## 落入虎口，绝不屈服，面对审讯，机智应对，在回族抗日将领吉鸿昌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下，组织狱友进行绝食斗争

1934年4月20日晚上，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把马颊河农民暴动的领导人和骨干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胡恒熙等17人押回庆云县城。将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3个受伤者单另押在县公安局里，而其他人都被关进了县城大牢。

当天晚上，胡林晓、杨德然就被提走进行了审讯，但他们什么也没说，恼羞成怒的当局给他们每人灌了一桶凉水，也没有得到半句口供。胡、杨两位同志被押回来后，虽刚刚受过酷刑，但脸上却都闪耀着胜利的彩光，一进门就蔑视地说：“没有什么！再厉害一些也不怕！”是的，只要一心为党、为国家、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切以马列主义为武器，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为着千千万万人民幸福而忘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不怕流血的。不管敌人手段多么狠毒，刑法多么残酷，他们等闲视之、坦然相对。



1934年4月，刘格平在庆云县组织领导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了这一消息

因为刘格平受伤较重，流血不止，当晚没有被审问。第二天下午当局开始了对刘格平的审问。审问者说自己是“县长”，实际上是一个科长冒充的；另一个就是县里的民团大队长胡振国。胡振国和刘格平是“老相识”了，他在1928年3月中共津南特委组织暴动占领庆云县城与张宗昌部激战时，



被委任为大队长，后带着几个叛徒夜里偷跑掉，成为国民党县里的民团大队长，至今已6年。这次就是他带队包围了东林庙会群众大会会场，又带着几百人在严家务抓捕了多名共产党人，今天他又坐在了审判桌前，真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刘格平知道他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胡恒熙底细的，心中已有了对付的办法。胡振国一开口就说：“啊，刘书记，你好啊！”刘格平没有理睬他。他又让那位假县长进行威逼利诱，说承认是共产党就受优待，不承认就关进大狱。但是刘格平只是一口咬定是去赶集玩的，并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无辜？”这位大队长看样子有点儿胆怯，因他以前是当过抢掠杀人的土匪，他这个官还是1928年特委组织庆云暴动时委任的，后来背叛革命，现在他还有什么说的？结果最后把刘格平等受伤的3个人都送进了大牢里。

大牢里关押的是在这次马颊河农民暴动中被捕的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一共是17个人，这里面有7个党员、1个团员，另外几个群众有的是老农民，有的是小商人装扮，他们受到敌人的挑拨，个别老农有点儿牢骚。针对这种情况，刘格平等几个党团员分别开展工作，和他们深入谈心，真诚帮助，耐心开导，帮助他们坚定信心，战胜敌人。在党团员的团结帮助下，这些同志表现的都很好，一直共同战斗到大部分被释放出狱。

当局把这17个人都关押在死牢里，除刘格平因伤重给戴上8斤半的铁镣外，其他人都给戴上“木狗子”，这“木狗子”是敌人特制的一种刑具，就是用两根硬木头，大概是枣木的，中间挖上两个洞，夹在腿上，两头钉上铁钉子，致使血脉不通，走路困难，走平常的一步，这样就得磨蹭20步，真可谓一步挪不了二指，几乎是不能行动。敌人把这17人逐个审讯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捞到。

“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无奈。”就搁了几天没有再审讯。这天，省里忽然来了两个官审问，刘格平等抓住机会，给他们讲了县里怎样坑害老百姓，并再三表明：“我们是好老百姓，他们是无辜抓好人，好到上面去请功。”这两个官看着这些人的样子，都是一些农民打扮，也就半信半疑。他们小声地告诉说：

“庆云县政府和县党部给省里去了电报，说抓的这些人聚众持枪暴动，要求立即枪毙；我俩就是于学忠主席派来调查情况的。”他俩临走时又说，回去一定如实向于主席报告。这俩人走后，刘格平与几个同志研究分析：于学忠原是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佩孚的亲信，吴佩孚失败后又把他介绍给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被日本人赶出东北，他和蒋介石国民党的矛盾是很深的，估计他不会同意国民党庆云县党部枪毙我们这些人的意见。果然猜对了，于学忠没有批准就地枪毙这些人，而是下令尽快押送上解。

又过了几天，当局把这17个人经过盐山押送沧县，当天晚上押在沧县监狱里。监狱警察里有一个同志，想帮助刘格平逃出魔爪，但为了不连累其他同志，刘格平谢绝了。因为1928年到1931年，刘格平曾在这个监狱坐过3年牢，所以监狱看守都很熟悉，也很照顾。刘格平估计下一步会被上解到省里，可在沧县监狱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即转乘火车，被押送到了地处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监狱。

这里是有名的阎王殿。第三团是有名的刽子手团，团长是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副团长姓杨，狱友们称他为“杨缺德”，是个大刽子手。他们把平津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把无数进步青年送到南京雨花台杀头。可是，当“杨缺德”一看到押送来的这些脸黑如包公，两手有老茧、土里土气、老实巴交模样的人时，就不满地骂了起来：“妈的！你们给送这帮子穷光蛋来干什么？”

负责押送的那两个姓胡的头头赶忙说：“我们也是奉命送到这里来的。”

“杨缺德”又问：“他们情况怎么样？”

“我们只知道送人，别的不知道。”二胡回答完，还回头看了看刘格平。刘格平心中暗喜，押送者没有把暴动时的旗帜、臂章、传单、宣言等一起送来，而且在庆云县开庭审讯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批东西，大概是里面有内线的同志把它们偷走或是销毁了，这对自己和战友们的这场官司打赢是很有利的。

“杨缺德”虽然不满，但也无法，骂骂咧咧地说：“真不像话。”最后无可奈何地把解差二胡打发走了。之后他把这些人押进了牢房。这屋里是又黑又脏又臭又潮湿，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干草。17个人虽然早已商议好，此时又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不管敌人如何刑讯逼供，都一口咬定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是赶集的庄稼汉，什么都不知道。这17个人中，只有刘格平、胡恒熙、杨德然、刘全禄、刘全政和青县来庆云联络工作的老张6人不是农民，但长期工作和



活动在农村，身着打扮、言语行动也已全部农村化，估计冒充农民，敌人也是不会看出破绽的。

两天后，审讯开始了。一个一个地单个审问，什么也没问出来。狱警把胡林晓打了一顿，没有结果。又审问胡恒熙，这个硬汉更是只字不说，残暴的狱警把几根粗香扎成一把，点着后对着胡恒熙又烧又烤，整个上半身都快被烧焦了，但坚强的胡恒熙仍然没吐半个字。

有一天，牢房忽然推进一个人来，刘格平抬头一看，是原来的津南特委共青团团委贾树清，刘格平知道他在被捕后已自首了。他一转身看见了刘格平，紧跑几步凑到了刘格平跟前，惊讶地问：“你在这里？！”

刘格平问他：“你怎么来了？”

他说：“是他们要我来咬你的。”

刘格平十分气愤，指责他：“你年轻轻的，竟干起这种事来！”

小贾慌忙连声说：“我不干，我不干，我可以装不认识你。”过了一会儿，他就被押到别的牢房去了。

果然，当天下午“杨缺德”叫小贾和刘格平对质，要小贾指认。小贾连连否认：“不是他，他年轻，他一点儿胡子都没有。”

过了一天，“杨缺德”又提审刘格平，故意让他看了小贾的口供，又阴险地问：“你认识他吗？”

刘格平装作不懂地反问他：“谁呀？”

杨说：“昨天证你的人。”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刘格平继续和他装糊涂。

“他说了你很多的事情”，“杨缺德”见刘格平没言语，接着又说：“你应该认识他。”

刘格平针锋相对地反击说：“我只知道在家种地、过日子，被捕坐牢是因为去赶集遭的横祸。”

“杨缺德”被噎得好大一会儿没说出话来，用眼狠狠地瞪了刘格平半天，只好无奈地让手下把他押回牢房。

就在刘格平等人在狱中与当局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同时，庆云县、盐山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党组织的同志们也在紧张地活动，开展营救。他们联合了一些开明士绅、上层头面人物，组织了一些被捕者家属，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到张学良司令部去告状，说庆云县民团乱抓好人，促使北平军分会不得不过问此案。宪兵第三团认为这批人都是些农民，没有多大油水可捞，加之北平军分会又要这些人，所以赶快推出了事。就这样，这17个人在宪兵三团待了一个多月就被转到北平军分会去了。

转监之前，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了两个军官，在“杨缺德”配合下，最后审讯了刘格平一次。为了获得口供，他们也是准备了几根粗火香，绑成一把，准备对他动用香烧酷刑。但是由于刘格平手伤自入狱后他们不给治疗，伤口恶化，流脓不止，臭气熏人，而且浑身上下的衣服肮脏无比，里外全是虱子，所以刘格平一进审讯室的屋门，他们就都立即捂上了鼻子，皱起了眉头，恨不得离刘格平尽量远些。

刘格平进得屋来，先瞅了瞅市里来的这两个国民党官员。他们一个胖乎乎的，说话粗声粗气凶得很；另一个虽然装成斯斯文文的样子，但也是暗藏凶相。

“你知道你们暴动是什么罪？”胖子开始发问了。刘格平没有理他。以后凡是他问话，刘格平都装作听不懂他的南方口音，不是瞎打岔，就是不理他。气得这个胖子像只跳蚤，起来、坐下，又起来、又坐下，几次想拿火香烧刘格平，却见他手伤化脓，嫌他臭气熏天，又无奈地放下了。

这时，那个假装斯文的登场了。他故意用和气的语气问刘格平：“你说，你们是怎么一回事？”

“县里民团大队长是个土匪头头，他经常随便绑架人，我就是无辜被绑架的。”刘格平不慌不忙地回答。

他们问来问去，什么也没得到，就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开始对刘格平动刑了。那个胖子使劲将刘格平推倒在一把椅子上，刘格平霎时感到浑身上下麻如针扎，痛苦难忍，浑身一点也动弹不了。过了一会儿，身上忽地又像松了绑一样，身体乏得要命，一点劲儿也没有。原来毫无人性的敌人对刘格平动用了电刑。“说！说实话！”胖子一边动刑，一边暴跳如雷地逼问。刘格平咬紧牙



关，强忍痛苦，就是不理他。他气急败坏，像疯狗一样狂吠不止，“杨缺德”在一旁也是龇牙咧嘴，帮腔做势，但是回答他们的仍然是沉默。

凶狠的胖子连动了3次电刑，足足折腾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使刘格平屈服。可能是刘格平腐烂流脓的伤手散发出的难闻气味，使他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他们只好捂着鼻子结束了这场没有丝毫结果的审问。刘格平在被国民党追捕时遭枪击，他扬手躲避时，子弹正好打在了无名指上。打掉了半截指头，被捕入狱后很长时间国民党不给治疗，血糊糊的，腐败感染，流淌着脓水……他只有忍着，疼痛钻心，觉也睡不着。后来肉烂了，骨头露在外面，刘格平一咬牙就用剪刀把这半截指头从指根上剪了下来……。骨头没有了，就向狱警要酒，用酒搽也算是消毒，用手把肉往一块捏，后来就慢慢长在一起了。刘格平高兴地抚摸着这只缺指头的手说：“这是我给自己作的手术，也是一个胜利啊！”

在宪兵第三团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刘格平等人被送到了北平军分会，被关押在一个大牢房里。这个牢房用木板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牢房内只有一尺高钉死的木床，白天见不到阳光，晚上见不到灯亮，每天生活在黑暗中，真像活人躺在棺材里一样。

来到北平军分会，开始审问了几次，刘格平等人都是以民团大队长是土匪、无辜乱抓好人为由，提出要他来北平对质，但始终也没调来，以后军分会也就不再审问他们了。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转眼到了11月份。有一天，突然获悉监狱里又押进了几个重要犯人，一打听原来是抗日将军吉鸿昌，和他一同押来的有一个叫任应岐的，他原来是个师长，还有一个商人李汉三，他们是一起在天津法租界被捕的，后被引渡转解到北平来的。据说还有一个人，被当场打死了。

吉鸿昌是河南省扶沟县人，1913年投笔从戎，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师长、国民党政府第二十一军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1931年因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曾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避入天津法租界，联络同志继续从事抗日救国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蒋介石授意指使下，天津国民党当局派特务勾结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等逮捕，后解往北平，押进了刘格平等被关的监狱。但是不久，吉鸿昌和任应岐又都被转押到北平陆军监狱，那个商人被释放了。在陆军监狱，吉鸿昌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同月24日，他和任应岐一起被秘密枪杀在陆军监狱内，为抗日和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吉鸿昌和任应岐都是反蒋的，所以蒋介石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的被捕和被害都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面对死亡，吉将军面不改色，从容不迫，视死如归，泰然处之，并给家属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亲笔遗书：“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然后高呼口号，英勇就义。任应岐一言不发，很沉默地也被害了。当时吉鸿昌和刘格平等押在一起的时候，难友们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个抗日爱国将领。他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着刘格平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操证明了自己不愧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是党的优秀儿子，他的英名和他那首气贯长虹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英雄诗篇，流传百世，永远教育着后人。

北平军分会的法官，都是张学良的部下、东北人，都有着亡省破家之恨，所以审问刘格平这批人时，没有再用刑罚，态度也不那么恶劣可憎。在这里，可以往外通信，可以向家里要钱，有钱也可以买些吃的进来，但就是不让和外面的人见面。这样待了将近10个月，大家都还平安无事，这时胡恒熙忽然得了痢疾，本来这不是个很严重的病，但是看守所那个班长说他有偏方，结果给吃了病就厉害了。这个班长眼看人不行了，才慌忙给送到陆军医院。到医院不久，胡恒熙同志就病故了。他的死与看守班长给吃得那付偏方是有关系的。胡恒熙同志的牺牲，使共产党又失去一位英勇有为的骨干力量，是津南地下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1935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派何应钦与日本派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



郎，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协定中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制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根据这个协定，宪兵第三团被调到陕西（团长蒋孝先、副团长“杨缺德”在西安事变时都被镇压了），国民党党部被取消，北平军分会被撤销，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被调到陕西去“剿共”，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则调来北平，把冀察变成了特别区。这时刘格平等人被押在军分会看守所已经一年多了，军分会撤走以前，匆忙草率地把他们一一判决了。他们先审问了同案的刘全政。

法官问刘全政：“你是村长，你要说实话，刘格平是不是共产党？”

刘全政回答道：“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什么。”

法官又问：“刘格平是不是你们的头头？”

刘全政还是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他们没办法，只好再审理刘格平。

“你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问道。

“我是赶集去玩，民团的人乱打枪，我举起左手不要他们打枪，他们却开枪打伤了我的手。”刘格平还是按以前的“口供”回答。

法官接着问：“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刘格平肯定地回答。他们草草问了几句，审问就结束了。只有两三天的功夫，就把刘格平等人定案判决了。无罪释放了4个人，有县团委（团委书记）的杨德然，县军委（武装部长）的胡浅河，团员刘子贞，青县以商人身份来联系工作的老张。除了刘格平和胡恒熙外，其他11个人都是按刑事犯判，最多的判了3年有期徒刑，有的两年，也有少数的两年半。那时候，凡军事法庭判决的，坐一天牢算作两天，这样大部分人从被捕关押在本县，到转解到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时，已经



1934年至1944年，刘格平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判刑。这是他在北平陆军监狱留影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年零1个多月了，所以在军分会就被释放了。剩下少数人被送到陆军监狱后，最多的也只待了几个月就都被释放了。只有刘格平和胡恒熙是按政治犯判的，刘格平被判为无期徒刑。胡恒熙被判了10年（判时胡恒熙正在陆军医院），不久就被折磨死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地为党和人民奋斗而牺牲，当局恨他，党和人民爱他，他永远活在津南人民的心中！

在北平军分会看守所草率宣判后，这批犯人被送到了北平陆军监狱服刑，和普通犯关在一起。几个月后一起被捕转来的几个人刑满也被释放了，只剩下了刘格平一人。

这个监狱共押着1000多犯人，有强盗、杀人犯、盗墓贼，这3种犯人是重刑犯，一般的都要被枪毙。还有小巡官、盗窃犯以及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人，其中盗窃犯最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穷苦百姓，因生活所迫没有办法，被逼无奈，铤而走险，结果被抓进了监狱。另外监狱里有30多个政治犯，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有个姓杨的同志，是在唐山煤矿进行党的活动而被捕的。他曾在苏联读过中山大学，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头脑很清楚。被捕后，他仍没有停止党的工作，和刘子令、胡云先等几个河北阜平县的共产党员联系，开展活动。刘格平也常和他接触。只是杨的身体状况很差，长了一胸脯不知是什么病名的脓疮。他和外面的组织没有联系，社会上也没有一点儿关系，只能靠狱中其他同志帮助。他一开始不大赞成对监狱进行公开斗争，可是当时监狱对犯人剥削得很厉害，犯人生活水平极差，所有犯人都吃不饱，一顿饭只给两个玉米面小窝头和一碗见不到半点儿菜叶的“菜汤”，虽然有些人靠外面接济，但大多数是没有办法，只能挨饿，实在难以忍受。

面对如此的非人待遇，刘格平及其他几位同志和老杨商议，要发动犯人一起起来和监狱斗争，抗议他们的虐待行为。老杨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大伙的意见。

老杨和刘格平首先把政治犯团结起来。在政治犯中，除有两人被监狱调去当工作人员待遇略好一些外，其余同志都和普通犯人一样，条件好些的就靠外面家庭、亲友接济点，没条件的在里面就靠互相帮助。所以大家一听说要和监狱斗争，都很心齐、坚决，斗志也很高昂。



为了保证斗争的胜利，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并分头进行联系、发动。有个姓王的犯人，因为杀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是个比较有头脑的人，加上过去老杨对他进行了不少的马列主义教育，思想比较进步，表现很坚决。解放后他在河北省工作，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干部。还有一个煤矿工人，因为打伤了矿上的负责人，被判了几年徒刑。这个人是见义勇为的，经过狱中党员同志给他讲革命道理，进行革命教育，他进步很快，不但非常崇拜共产党，而且斗争很坚决。



1949年，刘格平与当年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的难友寻访北京陆军监狱时，在大门口留影

或因刘格平是回民，或因监外乡里们的活动，监狱专派了一位姓温的狱警管刘格平。这个狱警也是回民，大约30多岁，但却是个老狱警，狱中都称他为“温老回”。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温老回便主动找机会与刘格平接触。原来，几年以前马骏就是他管理过的犯人。马骏也是回民，是著名共产党人。当年马骏刚从国外回来时，刘格平在北京见到过他，但那时李大钊已被军阀杀害，为了马骏的安全，组织上严格限制与他接触的人。温老回多次向刘格平翘大拇指，对马骏十分钦佩。听温老回说，敌人就让马骏签写一份声明表示悔过，就可以放了他，可马骏宁死不屈。他为回民中有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感到自豪，受马骏的感染他一直想秘密参加共产党。刘格平最初对他十分警惕，接触当中感觉他是出于真心的感情，刘格平就通过他获得许多狱方的情况。就在临时党支部暗中酝酿之际，从温老回处获知狡猾的敌人好像嗅到了什么，还给冯明新和那个煤矿的同志戴上了手铐、脚镣。由于大家事先知道，商量了对策。正好利用这一导火索，犯人们早就压在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全监狱1000多犯人一齐进行了绝食。这下监狱当局可慌了手脚，大小官吏惊慌不已，赶紧采取各种办法，想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他们先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把政治犯集中到两间大房子里，并给收拾得干净一些，但是风波难以平息，接着又把戴上手铐脚镣的两个同志放开，还是不行。这时绝食斗争已经是第3天了，监狱头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无可奈何，他们只好答应了犯人们提出的条件：第一，保证犯人吃饱饭；第二，不准虐待犯人；第三，改善卫生条件，厨房窗子安纱窗，菜洗干净。绝食斗争终于胜利了。只是不久那位老杨同志疮病恶化，浑身腐烂，病痛而死。这样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因为有病得不到治疗，而含冤死在监狱里，真是太可惜了。让刘格平更可惜的是，温老回告诉刘格平，在马骏被敌人杀害前，将利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纸和笔写的几页日记交给过温老回，刘格平本想出狱后一定联系这位温老回找到先烈的遗迹，没想到监狱一坐近十年。后来，温老回讲述的马骏的坚贞不屈，是激励刘格平拒绝签写敌人悔过书的精神动力。

有一天，听说宋哲元要派人来视察监狱，临时党支部便研究组织了人员提意见。因为经过上次斗争，吃饱的问题只是对政治犯好一些，其他犯人伙食依旧很差，卫生条件也谈不上。后来，在宋哲元派了他的最高法院院长来察看监狱的时候，有的犯人便提了意见。不久宋哲元为给他母亲做寿，从轻发落政治犯，并给在押服刑犯人减刑。这样监狱大部分人员都减了刑，刘格平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

1935年过去了，转眼到了1936年。1月的一天，30多个政治犯突然都从牢房里被提出，集合到东院里。这个东院是个空院子，有时就用作刑场，在这里枪毙人。据说吉鸿昌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刘格平等人被押到这个院子时，看到院子周围布置了几十个警卫兵，个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枪都上着刺刀，枪口直对政治犯，整个院子显得阴森森的，四处渗透着杀机，看架势好像马上就要处决这批政治犯。

死，对革命者来说，早已抛至九霄云外，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面对敌人的枪口，这些共产党人没有畏惧，没有悲伤，只有对敌人的憎恨。刘格平率



先气愤地质问他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要说清楚！你们摆这架势吓唬谁！”

刘格平的临危不惧、大声质问，让他们事先没有料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敌人正不知如何回答刘格平的质问时，冯明新又发话质问。紧接着，不少同志纷纷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质问敌人。

政治犯原以为为革命献身的最后时刻到了，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狱方却是把他们统统装上了大卡车，离开北平陆军监狱，向西城西什库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疾驰而去。

### 铁窗锤炼志更坚，《反共启事》拒绝签，在弄不清上级指示是否真实的情况下，甘愿把牢底坐穿

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地处西城西什库（今北京图书馆西北）的草岚子胡同西段，所以又名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成立于1931年9月初，1932年3月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设在南京）。这座监狱是一个大院子，周围是装了刺铁丝网的高墙，里面有一幢砖木结构的灰色二层楼房，那是监狱当局的办公楼。楼后院有一个长筒形的大房子，那就是关押犯人的监房，中间有一个宽约4米、长约8米的过道，把监房分为南监和北监，又叫南号筒和北号筒。南北两号筒各有24间牢房，每间能关押4个人。北号筒有8间单身囚室，叫独居号。院内北边临墙有一间重病犯人住的病号房，南边有一间平房是浴室，监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监狱四周和大门外右侧都设有岗楼，昼夜有岗哨，戒备森严。

刘格平被转押到军人反省分院，见到了一些很熟的同志。也知道了军人反省院的所谓“反省”，就是要你“悔过自新”，改变政治信仰和立场，向当局屈服投降，自首变节，在报纸上登反共启示，否则就甭想出狱。另外，军人反省院就是由军队管辖，可以不按一般法律程序，对政治犯进行任意迫害，军法从事。所以，送刘格平这些政治犯到军人反省院监禁，并不是优待，而是要在肉体和精神上对政治犯进行长期残酷的摧残和迫害。但是不管怎样，刘格平都暗下决心，要在监狱这个特殊斗争环境中，坚定革命信念，振奋革命精神，不屈不挠，斗争到底！

来到草岚子监狱不久，党组织就和刘格平接上了关系。第一个找刘格平谈话接头的是安子文。安子文是陕西省子洲县人，曾任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年



3月，设在天津的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他和大批党的干部、党员以及党的同情者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草岚子监狱等处，并曾担任狱中秘密党支部支委。他与刘格平在军分会看守所被押时见过面的，因此也比较熟悉。他一见刘格平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随后他又认真地询问了一下刘格平，和他一同转押来的人的情况，刘格平一一进行了介绍。安子文把军人反省院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在这里关押的政治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很坚决的，绝不登什么启事出去的，这是大多数。这大多数同志，在不久以前，即1934年12月，为了粉碎敌人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通过斗争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全体参加绝食的同志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到胜利，开始了一场用顽强的革命意志去压倒敌人气焰的战斗。经过7天的艰苦绝食斗争，敌人终于答应了政治犯们提出的条件，被迫同意重病号下镣，一般政治犯换小镣；监房门早开晚闭，政治犯可在各监房自由走动；监房外过道设3个大火炉；改善伙食；每周洗澡一次；允许订阅公开出版书报；增加放风次数，延长放风时间等条件。对于狱方答应的一些条件，大多数政治犯都认为可以，因为我们搞绝食并非要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坚持狱中长期艰苦斗争。只是有几个同志对敌人实行先复食后，逐步履行绝食提出的条件不满，不愿复食，要求对方马上都答应才成。后经过党支部耐心说服，细心工作，大家统一了认识，取得了绝食斗争的巨大胜利。在了解了反省院的情况后，紧接着刘格平就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和安子文直接联系。

刘格平从被转押到草岚子监狱就一直和安子文他们一块被关在北监筒，但是不久安子文被调到南监筒去了，虽然挨着，可是不在一起放风，也不准随便来往。北监筒由留下的大老冯经常传阅进步书籍，有时也会看到党内文件，如中共中央北方局刊物《红旗》，从法国寄来的由留法中国共产党人办的《和平报》，甚至还有中共中央文件。这时看守班长和有几个看守都被通过做工作争取过来了，所以才能在敌人的魔窟里看到党的指示、文件。不久大老冯也调到南监筒去了，北监筒这时大部分是从陆军监狱一块转来的人，另外还有贺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平，再是每天练写大字的刘锡五，再有一个是北京人闲之敏，还有胡雪炎、刘子令、李有山等七八个人成立了一个北监筒党支部，安子文指定刘格平为党支部书记。还有韩培义等人为外围组织。此外还有5个人，他们为要求出狱，正准备登什么启事。对于他们，刘格平按照安子文告诉的，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这样北监筒将近40人左右，南监筒有50人左右。

一天，北平陆军监狱的院长忽然来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假惺惺地说什么是来看曾在他那儿关押过的人的，并来到关押刘格平的独监牢房。刘格平看穿了他的鬼把戏，没有搭理他，这使得他很恼火，便在反省院说了刘格平一些坏话，要反省院注意整治刘格平。

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刘格平在独监内正伏在放在床铺上的一个炕桌上看从看守所借来的古书，忽然发现监狱里一个姓郭的管理员在牢门上的小门洞外鬼鬼祟祟地向内窥视。刘格平假装没看见，不动声色，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姓郭的管理员在牢外偷看了一会儿，突然把看守喊来，打开了刘格平的牢房门。

“你出来！”他声色俱厉地大声喊道。

“有什么事？”刘格平不慌不忙地反问。

“这小桌是谁给你的？”他气冲冲地质问。

“是通过你们借进来的。”刘格平冷淡的这一句话，噎得他半天没答上话来。他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命令看守：“给他搬出去！”

刘格平据理力争，要他讲明搬出小桌的理由。

他耍起了蛮横，对刘格平吼叫：“我说搬就搬，你给我出来！”

刘格平毫不示弱：“出来有什么事？！”

“我要打你！”他气急败坏，抡起手棍向刘格平长袍上打来。

“打人啦！打人啦——你怎么半夜跑来打人？！”刘格平故意高喊，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出很远。

“谁打人？为什么打人？为什么打人？”南北各个牢房的人都听到了刘格平的喊声，都在牢房小门上伸出头来齐声呼喊。当听到刘格平说是郭管理员打人时，大家的情绪更激愤了，“郭管理员为什么打人”的质问声从各个牢房里



传出来。

看到激起了众怒，大家矛头又都对准了他，郭只好说：“陆军监狱院长说刘格平表现不好。”

刘格平一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立即反击说：“我是坐监狱的犯人，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虐待犯人，我们当然要向上面来的人给他提意见，这有什么错？”

郭管理员被驳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政治犯们余怒未消，纷纷要求郭管理员回来答话。在姓牛的看守班长劝说下，大家才各自回了牢房。

刚回监，正好宋哲元部的军法院长来了。牢房门上小门一开，刘格平就给反省院的郭管理员提了一大堆意见。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刘格平那位名叫李振翌的表叔，他原是刘汝明师的秘书长，现在成了宋哲元军事法院的院长。但他也无力解决把刘格平放出反省院的问题，因为从反省院出去要登“反共启事”。

听了刘格平提的意见，李院长对反省院的人们问道：“郭管理员打人有这么回事？”见到许多犯人承认，他点点头走了。

下午郭管理员又来了，他哭丧着脸对刘格平等说：“我也要反省了，我真受不了。”连连认错道歉，并叫看守把刘格平的看书小炕桌马上送回来了。

到了1935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向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侵略，并在1935年1月，扶持老官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汉奸殷汝耕任委员长，并组织了冀东保安队，使得从通县到冀东地区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平津、华北均已岌岌可危。日本妄想吞并整个中国，在中国大地上胡作非为，横行无忌，把中国破坏得满目疮痍。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英勇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根据外面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狱中经殷鉴、张友清等研究决定，由杨献珍起草，写了一份要求出狱抗日的意见书交给监狱当局，要求把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出去参加抗日。意见书虽然陈词恳切，送上去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其实并不奇怪，蒋介石怎会同意释放政治犯去前线抗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呢？这样大家只有继续加强学习，除学习马列的书，还经过和监狱当局斗争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北平晨报》，一份是《大公报》，虽然都是敌人的报纸，但大家都认真地阅读，透过报纸上的反宣传，来判断它的实质。如南方红军长征到陕北，大伙认为可以鼓舞华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抗日高潮的掀起。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红军愿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到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但是，红军的抗日行动遭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的阻拦。他们派遣大批国民党部队阻拦红军的前进道路，阻止红军东进抗日，蒋介石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为了保持抗日实力和表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补充了部队7000多人以后，将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红军抗日先锋军，于5月初全部回师河西。正当驻华北日军猖狂侵略，华北国土危在旦夕的时候，红军东进虽然受阻，但对河北、对平津震动很大，而且在全国影响也是很大的。刘格平等知道在蒋介石、阎锡山极力拦阻下，红军很难开进平津，但大家和广大华北人民一样，心里总有个希望，翘首切盼红军。特别是在反省院的同志们请求出去抗日，而宋哲元却不予答复。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朝不保夕的华北，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非常焦急。在此时刻，中共中央领导的敌后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抗战形势一触即发。

到了1936年七八月间，有一天中午，刘格平跟大家一块儿到饭堂吃饭时，突然有人对他说：“我们要出去！”好像很肯定。刘格平知道关于出去这个问题在狱里早有所酝酿，但是认为那只是一般地说说，很难变成事实，要不登《反共启事》就很难出去，除个别的同志因病保外就医的以外，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出去的。而大家对于登《反共启事》是深恶痛绝的，进行过普遍的反“反省”教育，坚决不能登《反共启事》出去。遂问那人：“怎么出去？”

他说：“登一个一般的启事，就说年幼无知，交友不慎，如出去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等。你怎样？”



刘格平说：“我感觉太突然，考虑一下再说。”

过了两天，南监筒的人受反省院指使，派了4个人来北监筒动员大伙儿出去。有几个年轻的同志跑来找刘格平，很激动地问：“你知道不？他们来动员我们履行手续出去？”

刘格平说：“我知道。”

他们又问：“你出去不？”

刘格平说：“我还没有想清楚出去的问题。”

有一天，黄健纯（即殷鉴）找刘格平，给他看了一封信，说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写来的，信上面说抗战急需干部，狱中的同志可以履行一个手续出去。刘格平一听是要迎合国民党当局规定的手续，就说：“弄不清上级指示是真是假，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殷鉴说，抗战急需干部，并以很严厉的声调问：“你到底出不出去？”刘格平仍果断地回答：“我们必须考虑清楚。”

其实，从刘格平进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那天起，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通过对共产党人的所谓“感化教导”，使其悔过自新、改变其政治信仰和立场的地方。《反共启事》是敌人已拟就好的：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在这个《反共启事》上签字，是表示悔悟的必须程序，履行了这个程序即可被当局释放获得自由。

对此，刘格平早已经不知想了多少次。在北平陆军监狱时，听狱警温老回讲，敌人就是让马骏发表一个自愿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而遭到马骏的严词拒绝。同样，吉鸿昌只要表示悔过既可获得自由，但他大义凛然，绝不屈服。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虽仅寥寥数字，但如果被敌人登报公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节问题，它会给党的形象造成多么大的诋毁，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刘格平还想到，虽然自己没有马骏、吉鸿昌那样的影响，但当初加入共产党时的誓言，就是要永远保持对党的忠诚，于方舟、张隐韬曾多次以此教诲，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自己更是无数次向被吸收加入组织的同志强调。如今，于方舟、张隐韬用生命实现了这个誓言，自己怎么能违背这个神圣的誓言而求得苟活？如果这样，岂能对得起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又如何去面对那些被自己吸收进组织、仍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同志？倘此，阴影和黑暗将永远笼罩在自己的心间？倘此，马骏、吉鸿昌岂不是白白牺牲？……先烈们的榜样向刘格平昭示，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如果去走敌人设计好的路，生不如死；恪守共产党人的气节，追求心灵的光明，虽死犹荣！他抱定了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捺手印的决心。

从1936年8月底至1937年上半年，狱友们陆续在减少，但留下来的人都以为是同志们转了监狱。很大一部分同志离开反省院后，监狱方就把剩下的30多名政治犯集中起来搬到了南监筒。这样，原来在北监筒住独监的刘格平，又和刘子令、韩培义等同住在一个大监牢里。留下来的同志们继续坚持着狱中斗争。

刘格平回忆，当年在狱中党的骨干同志中基本形成的共识是，签写《反共启事》是一种变节行为。至于中央或北方局的指示，刘格平当时见到的，只有殷鉴拿出的一封信，大家都认为真假难以确定。刘格平并不知道，当年狱中有61人签写了《反共启事》，并作为国民党改造共产党人的成功案例刊登在《华北日报》和《益世报》上。

1956年初，在党的“八大”会议之前，毛主席曾经找刘格平询问过当年狱中的情况。但问的含蓄，刘格平仅以为这是对自己在狱中情况的调查，压根也没有往别处想。即使在1966年底，康生指使南开大学红卫兵找到山西刘格平的家中，手拿着刊登《反共启事》的报纸时，刘格平仍不敢也不愿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刊登一些假的东西也是敌人惯用的伎俩。

后来有人说，刘格平的行为是无视中央的指示，是不顾抗日的大局。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刘格平这个人的个性很“轴”。更有甚者，竟有曾在党内担任很高领导职务的人说，因为刘格平是回民，是古兰经在起作用。当刘格平听到或看到这些说法时，只是淡淡一笑说：“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过是党的同路人而已。”

1937年春，因为反省院有大批人出去，所以犯人们吃饭都在一个食堂。但是伙食越来越差，大家非常气愤，纷纷提意见，要和反省院进行斗争。至于采



取什么方式进行斗争，提什么意见，由谁当代表等具体事项，大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和酝酿，最后决定在第二天午间趁吃饭时，由张连云为代表向狱方提出条件。

第二天中午，所有犯人连病号都去了食堂。开饭时间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吃饭，要求管理员前来对话，管理员来到饭堂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事？”

被推为代表的张连云站起来，向管理员提出了大家的要求：

“第一，伙食下降了，要求提高；第二，放风时间半小时太短，要求延长到一个小时；第三，蒋介石在西安答应要释放政治犯，请反省院放我们出去。”

管理员听罢，只是说：“你们先吃饭，我们研究后再答复。”

但是等大家吃完饭回到牢房后，反省院却把张连云叫到外面，关进了病号房。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更加气愤，遂决定开展绝食斗争，以示抗议。一天，两天，三天，连续三天，每天食堂送饭是怎么送来怎么拿走，先是看守劝大家不理，以后班长来劝大家还是不理，最后管理员亲自来劝，还是毫无结果。监狱当局一看实在无法，最后只好答应前两条：吃饭伙食改好，放风时间延长，至于第三个条件，你们自己写一个呈文，由狱方代为转递。这样，在进行了3天半绝食之后，斗争基本上是胜利了。

紧接着，大家又就如何起草呈文报告进行酝酿讨论，并一致推举刘格平写。刘格平用了两天时间写出了草稿，交给大家再进行讨论修改。大家口头提了一些意见，也有人动手就在草稿上修改，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刘格平又修改了一次，由一个名叫闲子敏的北京人抄写后，每个人都签上名，然后由监狱转送宋哲元，但以后也杳无音信。此时国内形势风云日紧，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中国东北、华北等领土上横行无忌，而且向华北及北平周围大量增兵，新的侵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全北平人民都纷纷起来援助抗战，狱友们闻讯后立即进行商议，怎么办？大家研究的结果是全体一致向反省院提出要求，放我们出去抗日。反省院管理员答复：“你们可以写一个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申请书，具结画押。”大家一商量，便立即写了一个题目为“请缨抗日”的报告，他们说给转上去。同时，全体同志进行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到了第3天，反省院当局拿出一个具结材料，要大家签字，但绝大多数人没有签字，因为里面有反共内容，只有两三个人签字出去。就在这时候南京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电，释放政治犯。

狱友们随即提出要求，要狱方按南京国民党通电释放政治犯。狱方同意了，先将名叫王灿之、赵子厚的两个人释放出去，但马上又变了卦，说是日本军队已进了北平城。原来，日军在丰台攻占了南苑，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虽奋勇抵抗，师长赵登禹战场牺牲，但未能挡住日军猛烈攻势，后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撤出北平。北平落入日军之手。在这种形势下，反省院当局借高等法院的名义对大家说：“为着保护你们，暂时送你们到北平市看守所。”

不久，刘格平等政治犯又被送到了北平第一监狱。到了监狱，大家才知道受骗了，当局不但不释放这批政治犯，而且把宋哲元在陆军监狱给减的刑也不算了。大家又开始了漫长的监牢生活。

这个北平第一监狱，又叫什么“模范监狱”，周围的院墙很高，上面安有电网，院子是很大的，中间有个高大的大厅，里面有办公室，有个直接管看守员的主任在那里值班，还有暗室，是专门关押犯人的。里面没有光线，也缺乏空气，又黑暗又潮湿，没有床铺，没有座位，犯人关在里面，一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再是从这个大厅中间，可将监狱一眼望穿，放眼望去，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8个监筒尽收眼底。每个监筒横着有一溜儿房子，那是监狱里的工厂，普通犯人都要去劳动，磨面粉、做鞋、纺线织布、烧水做饭，干什么活儿的都有。

刘格平被关在南监，一块儿从反省院送来关在南监的有10人。这里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风半个小时，犯人们都到院子里转一个大圈散步。开始让犯人一块儿散步。刘格平等人就两个人并肩齐走，或三五个人一起走，边走边讨论形势。看守们觉得这样怕出事，以后就改成一个人、一个人的放风。利用放风时间进行讨论交流的法儿行不通了，刘格平他们就是通过个别看守互相通信的办法交换意见。如果要和北监交换消息，一个方法是，利用每到半月洗澡的机会，



事前约好把纸条放在一个小洞里。因为这项工作做得秘密慎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问题。

在这个监狱里，犯人的生活是很差很差的。如果缺乏外面帮助，很难维持生命。监狱伙食差得要命，一顿饭给一碗咸水，也就是所谓的“菜”，里面有几片菜叶或几根豆芽，普通囚犯只给两个小窝头，这样大概只要有两三个月的功夫，犯人们就会两手发黑，肉瘦血缺，悲惨地死去。能去做工的人生活稍好一些。在这里，政治犯不准做工，都被独间关押，窝头可以给吃够，刘格平和大伙就利用机会藏些窝头，帮助照顾个别普通囚犯维持生命。

1938年年底，汪精卫正式投降日本，不久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并对在日本统治区的监狱犯人实行所谓“大赦”，刘格平又被改判为15年。一年后，在伪政府进行一周年纪念日，又给他改成10年徒刑。只是其他狱友执行一半刑期就都相继被释放，可是到了刘格平这里，监狱就是不按一半执行，其实刘格平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就应该获释，真不知道监狱当局想搞什么名堂。

1939年以后，监狱里的政治犯包括原来的，有些病死了，大部分都释放走了，剩下的少数政治犯，监狱当局也过多干涉他们的活动了。刘格平等人就利用这个时机，加紧了在狱中的读书学习活动。那时，难友们暗藏有100多本社会科学书籍，有一部分是进步小说。这些书都是那些已出狱的老同志、老难友们留下来的，有些从狱外通过进步看守送转的。也通过看守在外面给买了一部分书。书是有了，但是这些书放在哪儿，怎样保存、隐藏是一个难题，万一被日本人查出来就不好办了。为了防备敌人检查，刘格平便想法儿在牢房内挖坑藏书。他先利用放风在外面拾了一个大铁钉，在牢内床底角上坚持挖坑，把挖出来的土，填在牢房里土地上低洼的地方，既使挖出的土有了去处，又垫平了地面，真可谓一举两得。坑挖好了，里面还确实不小，也很干燥，把书都放进去，坑口离地面还有半尺深呢。放好书后，坑中间再放上一个碗，然后在上面蒙好土进行伪装，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才安下心来。

在狱中为了加强身体的锻炼，除去每天利用放风出去运动两次，每次半小时，刘格平还坚持在牢房内散步或做体操，以保证有个健壮的身体，在敌人监狱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坚持学习、生活、斗争。刘格平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念，每天有规律地坚持锻炼、看书、学习，并请看守给买了铅笔、毛笔、纸张、墨、砚。为了陶冶自己的情操，增加兴趣，他还利用每晚时间练着写点儿起了小说，每写成万儿八千字，就交给以后被发展成中共候补党员的看守张正身，请他代为保存。可惜写的这些素材后来都丢失了。

刘格平等这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不能出去参加抗日，为党做工作，只有在狱中加紧学习，以备出狱后到革命工作岗位上去应用。再就是对看守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这也会在敌占区起一点儿小作用，因为中国多数人还是爱国的，绝大多数人民身在敌占区，心在解放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卖国贼的还是极少数人。对那些极少数的反动分子要，则进行必要的反击。

就在皖南事变刚发生，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闹得正凶的时候，监狱里新来了一个看守。他是个大高个儿，面带凶气，说话蛮横，刘格平便对他多加小心，处处提防着他。有一天，刘格平正在看鲁迅的小说，大高个儿来了，劈头就问：“你看的什么书？拿来我看看！”

刘格平不动声色，把书交给了他。他翻了翻，看样子是看不懂，就拿着书走了。大概是拿到监狱值班主任那儿去被顶回来了，一会儿他就回来把书还给了刘格平。

“我看的书有什么问题吗？”刘格平知道他碰了钉子，故意反问他。

他无法回答，只是喃喃地说：“没有什么，我只是看看。”说完赶紧溜了。

刘格平明白，这个看守是想找碴儿，只是没有得逞。不行，得把他逼走，不能让他在这里妨碍、破坏难友们的活动。刘格平和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定出了一个计策，让监狱自己把他弄走。

有一天下午，刘格平先把他喊来，以要缝补衣服为借口，请他给找针线用用。他不知是计，痛快地到办公室给刘格平拿来了针线。不一会儿，又有第二个人要用针线，紧接着第三个人又喊他也要用针线。那看守见这么多人都要用针线，就来催促刘格平：“你快缝，别人等着用呢！”

刘格平故意一边慢慢地缝衣服，一边慢腾腾地说：“你别着急呀！”这时，那两位同志一直在不停地喊他，直喊得他心烦意乱，眼看着火气就冒出来



了。

果然，大高个儿不耐烦了，加大了嗓门对刘格平吼道：“你听不到别人急着要吗？”好，他果然上钩了。刘格平趁机又激了他一下：“你态度好一点儿。”

他一听，急了，嗓门也更大了：“我就这样！”

刘格平继续激他，故意惹他发火：“你想干什么？”

“我想揍人！”他终于发怒了，吹胡子瞪眼的，一脸凶气。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刘格平见状立马大喊起来：“怎么，你还要想打死人呀？！”他这一喊，那两个同志也连声喊了起来：“要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监狱里顿时乱了起来。

看守值班主任听到喊声，马上跑过来问刘格平：“怎么啦？”

刘格平指着那位看守，在他的上司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位先生喊着要打死我，他五大三粗的，一拳就能要我的命，我的生命真是没有一点儿保障！”

值班主任问他：“你说打人了么？”

刘格平不等那看守答话，抢先说：“这里面好多人都听见了，不信你问问。”听完刘格平的话，那边几个同志你一言、我一句地纷纷证明。看到这种情况，那个看守愣住了，站在那里呆呆地、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

值班主任见看守无端给他惹了乱子，十分恼火，大声训斥他：“谁叫你乱来，你给我滚，滚出去！”从此后，这个看守再也不见了。

由于监狱里生活恶劣，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难友们就自己想办法调剂生活。从1940年以后，刘格平就在夏天利用炎热的天气自己做臭豆腐。他托看守买来豆腐装在盆子里放上四五天，发酵后再放上一点儿盐，就成了味道不错的臭豆腐，在那时可以说是很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1941年至1942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监狱里犯人的伙食更差了。不知监狱当局从哪里弄来了一些臭麸子，喂猪猪都不吃，真是很难下咽。他们把麸子里面放上一些烂土豆，这就是犯人们吃的饭。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刘格平和难友们在每次开饭时，就故意多要一些，把臭麸子悄悄扔在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马桶里，找出烂土豆，剥去坏的那部分，将剩下的那点儿好的吃了，勉强填饱肚子。有时监狱还弄些烂黑豆给犯人吃，虽又苦又臭，但也得勉强吃一点儿。据说外面粮价天天飞涨，收入菲薄的市民们，叫苦连天，毫无收入的穷苦百姓就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讨饭的和饿死的人每天都有很多。也就在1941年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与美英之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一面在太平洋战场进行恶战，一面将大部分兵力都压在中国战场上，妄图消灭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摆脱它多面作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到1942年后，经过5年的日中战争和一年多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兵力消耗是很大的，为了补充兵源，日本凡是十五六岁到50岁的男子都被征兵送往战争前线，疯狂地继续进行它的侵略战争。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将会遭到国际正义力量的谴责和抵抗、遏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被卷入战争。以美、英、苏、中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国家，签署了共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宣言，正式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对日抗战，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1943年，战争形势更加好起来。2月，苏联军队完全收复了斯大林格勒，取得了消灭几十万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胜利，此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节节败退，苏联红军步步胜利。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已不好过。经过1941年至1942年抗战最残酷、最困难时期和艰苦斗争的锤炼，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八路军、新四军更加发展，更加强大，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刘格平通过监狱看守偷偷获得了新的消息，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已到了北平市周围，西山就有八路军游击队在活动。难友们听后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欢悦和高兴。

这时，刘格平从庆云县农民暴动被捕，已经在监狱度过了9年。回想这几年的经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被捕，先被关在庆云公安局、县大狱，后又上解北平，一路经过盐山县大狱、沧县大狱的临时关押，最后被押送到北平。在北平，先在宪兵第3团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受刑讯，又转押军分会被判刑，再转陆军监狱服刑，半年后又被送到军人反省院。七七事变日军进城后，又被转押到北



平市看守所待了将近月余，最后到了第一监狱坐了7年牢。到1943年4月，刘格平的刑期还有一年左右，也就是说到1944年按刑期就可以获释了。

也就是1944年4月20日期满获释，至于在看守所的一年多时间，两天刑期算一天，刘格平上诉到北平高等法院，要求在看守所的刑期应按法律实际计算，一天算一天，结果上面同意了。但到了释放刘格平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对刘格平进行审讯、问话，仍然是继续劝降。刘格平故意装作耳聋，听不清审讯人的话，胡乱打岔说：

“我已是个残废人，耳朵聋了，眼睛也坏了，走路都很费劲，浑身都是病，我完全残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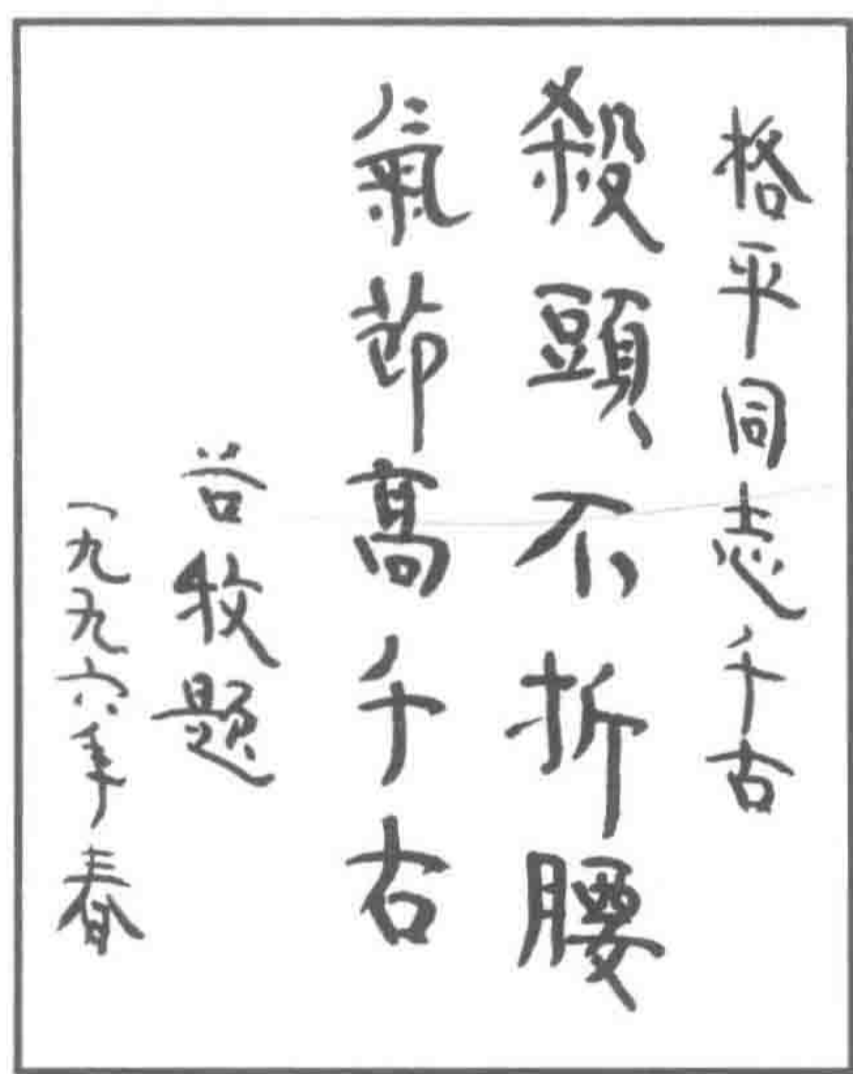
“你不能做事了吗？”他问道，刘格平装着没听懂。又说了两三遍，直到声音最后大了，刘格平才表示听懂一点儿。

“我什么也干不了啦，我坐了10年监狱！”刘格平回答他。

那人不说话了，埋头津津有味地看起桌上摆着的《金瓶梅》来，过了半天才对刘格平一挥手说：“你回去吧！”

刘格平回到监狱，又待了3天后，那天天已很晚了，才被放了出去。漫长的10年牢狱生活终于结束了。

这10年的牢狱之苦，锤炼了他的意志，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可身体却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损害。



谷牧<sup>①</sup>，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① 谷牧（1914—2009），山东荣城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分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十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 担任中共天津临时工委书记和山东回民协会主任， 被新华社誉为回民领袖，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1944年4月出狱后，刘格平在北平义妹家住了两天，第3天就和专程来接他的二哥刘济安回到天津他的家里。嗨！他家里真热闹！和刘格平一起因马颊河暴动而被捕入狱的杨德然，也特地从家乡来接刘格平，还有杨修荣等人也都在，已上高中的刘格平的侄女刘秀江与朋友们也都来看望刘格平。在铁路当小职员二哥刘济安，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上了4年西医夜校，一面跟着身为老中医的父亲学习了四五年中医，加上十几年的临床实践和经验，也有了点儿名气，拥有了不少病人，有的病人还成了二哥的好朋友。这些人听说刘格平来到天津，也都前来看望。来看望刘格平的人，绝大部分是爱国分子，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日的同胞。



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关押10年的刘格平，  
1944年出狱后任天津临时工委书记时留影

过了几天，为了安全起见，二哥把刘格平介绍到一位姓董的保长家里去住。这位董保长同情革命，又是二哥的好朋友。他在楼上给刘格平收拾了两间大房子让他住下，并且摆放阔气，以便于掩护。为了更保险更安全，他不但给刘格平搞到了一张广东中学教员身份的假证明，还说刘格平是他的亲戚，凭借关系花钱为刘格平报上了户口。有了户口和住处，刘格平就算初步站住了脚，便逐渐开展起了活动。开始没有以组织的名义，只是以个人名义交结朋友，谈论形势等，这样也联络了不少人。



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尽快恢复组织关系，刘格平决定还是回渤海区去找中共党组织。1944年5月初，刘格平离开了天津，在一个早晨到达沧县。他丝毫没有耽搁，下了火车就直奔汽车站，买好车票就上车了。由于不知道这边敌情怎样，汽车到达距盐山城9公里的辛店镇，刘格平便下了车。他先到了附近的挂甲林村，在一个亲戚家待了多半天，并问了问情况，直到天快黑了，才告辞动身。亲戚一直把刘格平送到离盐山城5公里左右的地方才回去。刘格平继续摸黑朝前走。当走到距城一两公里的地方，突然听到城上的枪声不断，原来是守城的日伪军为了夜间壮胆而胡乱打枪。从城边看来是过不去了，刘格平又试着绕过去，但周围的村子里也在不断打枪，看来这天晚上是走不了。这时，看到路边有几张破苇席子，上面躺着几个推小车的庄稼汉，看样子也是不能往前走的。没办法，刘格平也只好在破席子上躺了下来，心里在盘算着明天怎么办。

不知什么时候，他睡着了，再睁眼一看，太阳已有一竿子高了。刘格平又看了看周围，昨夜和他一同露宿的几个推车人，早已都走得无踪无影了。刘格平弹了弹衣服上的尘土，把夏布白大褂抻拉了一下，就大摇大摆地向盐山城走去。这时城门上有两个伪军岗哨，看到刘格平的衣着打扮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连问都没敢问。刘格平就慢慢地、装作若无其事地从盐山城南门外横穿过去，然后向南，朝着他的家乡——大堤东村快步走去。

堤东村，距盐山县城只有10公里。走在熟悉的乡间路上，刘格平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就这样，他一边走，一边想，10公里的路程不知不觉地就走过来了，转眼到了村边，他终于回到了离别很久的家中。

回到家里，家人和乡亲们都非常高兴，大家纷纷来到刘格平家，问长问短，嘘寒问暖，真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叙不尽的骨肉情。刘格平的心一直热乎乎的，非常感动。

这时期，在堤东村周围还没有什么日伪军的岗楼据点，只有距村一两公里的地方有个叫纸房的村子设有一个小据点，驻着二三十个伪军，平常也不敢出来，所以这一带还算比较安稳。过了两三天，四处活动的共产党领导的沧县县大队来到了堤东村附近的刘庄，县大队长张厚智听说刘格平回来了，通知刘格平赶快来报到。刘格平接到信赶紧前往，但到了那里，张队长不知有什么任务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已经走了，可惜没有见到面。又过了两三天，时任八路军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周贯五派人给刘格平送来一个条子，要刘格平去他那儿。刘格平正为前几天未和组织接上头而感到焦急，接到这个通知，自然十分高兴，立即动身，按条子上的地址去寻找，结果又没找到，使他再次陷入到焦急之中。

正当刘格平万分焦虑的时刻，回民支队的同志来了，把刘格平接到了支队，见到了刘震寰、李安民等。刘震寰是赵河人，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是军委负责人，李安民是区委书记，还有的人过去是青年团员，现在都成了军队干部。战友重逢，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可想而知，说呀，笑呀，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最后，刘震寰说：“我们立即给渤海区党委发报，把您在我们这里的消息报告给他们。”

只隔了一天，渤海区党委就回了电，要回民支队立即护送刘格平去区党委报到。这时盐山往东已无敌人的据点，回民支队派了一个班护送刘格平去渤海区党委驻地——山东省利津县境内。

一行人先到了狼坨子，这里恰巧是刘格平外祖父家的寨子，而他外祖父家是这个寨子的寨主。见刘格平来了，有些表哥就发起牢骚来：“现在渔民也不听话了，减租，原来我十分分三成五，现在我只分一成五，他们还不满意。”听到他们的抱怨，刘格平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只想多分到一些，但你们想没想到，海味是渔民们用劳动换来的，而你们不费劳力，是白吃白占的。”表哥本希望刘格平给他们撑腰，没想到刘格平却为渔民们说话，觉得这个表弟



1944年，刘格平（后右1）在渤海区工作时与吴耀南（前右1）、李安民（前右2）、王连芳（后左1）、刘震寰（后中）等在一起

太不讲亲情了，便默默地再也不言语了。

护送刘格平的队伍继续出发走到大口河，夜里乘船到了利津县靠岸，当天即赶到区党委，见到了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王卓如分管组织部，刘格平便把自己被捕以及受审、坐牢的情况详细



向组织作了汇报。王卓如也问了一些问题，进行组织审查，然后就告诉干部科科长朱凝，恢复了刘格平的党籍。

党组织找到了，党的关系接上了，刘格平向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和副书记王卓如汇报了前些日子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告诉说在天津已发展了一批人员和组织，要求组织给他们分配工作，并建议是不是先送一些进步学生到解放区。区委领导听了刘格平的汇报和请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大城市工作的指示，渤海区党委决定成立天津工作委员会，考虑到刘格平熟悉天津的情况，就派刘格平前往天津组建。派干部科科长朱凝任天津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协助刘格平到天津开辟工作。

朱凝是王卓如的爱人，也是个老同志，革命斗争经验是很丰富的。尽管她在解放区待了七八年时间，对城市生活有些生疏，但她还是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刘格平与朱凝决定乘火车进天津。一路上，为了方便起见，朱凝进行了化妆，打扮成一个城市人模样。因为沧县火车站是个大站，日本宪兵卡得很严，检查很细。他们便选择了沧县以北20公里的一个小站——兴济站上车，以避免日伪的检查。到了兴济，上车前刘格平嘱咐朱凝，要紧跟着他，以免人挤走散。但上车时因人太多，刘格平稍没注意，就把她落到后面去了。她使劲往上挤，被站上的日本宪兵推倒了。刘格平听到动静，回头一看，被推倒的原来是朱凝，赶紧挤回来扶起她，向日本宪兵大声质问了两句：“你怎么随便推人啊！”日本宪兵看刘格平说话很冲，又看到他的衣着打扮大概是个上等人，便往后退了两步，也没说什么，就这样刘格平他们就马马虎虎地过了关，顺利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火车快到天津时，刘格平考虑到在天津东站下车的人多，而在西站下车人少，不如在西站下车，所以就在西站下了火车。哪知道在这儿下了车麻烦就来了。别看这西站下车人少，凡是下车的旅客，都被日本宪兵勒令排成两队，一个个检查后方能出站。但是还有一个出口不检查，一些上层人士可以自由出站。朱凝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错走向了检查的出口。她既没有农村“良民证”，又没有天津居民证，一检查不就麻烦了吗？刘格平赶紧跑过去，把她拉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到不检查的出口出站。当时宪兵也没敢干涉，但当出了站，日本宪兵却拉出洋狗，追上他们，朝着刘格平的小腿咬了一口。刘格平气愤极了，立即捡起石头打跑了洋狗。随后，两人立即雇了两辆人力车进城了。刘格平虽然受了点儿伤，但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天津市，回想一路上所见所遇，可真是危险啊！

到达天津后，为了保证朱凝的安全，刘格平把她安置在一个工作关系所在的织袜厂里。这里确实很保险，她既可以以织袜女工身份作掩护，又可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只是她由于没有居民证，不好四处活动。朱凝对于自己只能隐蔽无法出去工作的处境，非常着急，也很苦恼，虽然有刘格平经常去商量工作，但她仍为不能广泛接触群众开展工作而苦闷。刘格平十分理解她的心情，却又不能不为她的安全着想，总怕出什么问题，无法向区党委交代。最后考虑再三，经请示区党委同意，借送一批学生去渤海区学习之机，护送朱凝返回了渤海区工作。

1944年8月，根据党的指示，中共渤海区党委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刘格平任书记，成员有：胡子炎（金钢桥附近一个小学校长）、刘家经（《华北新报》记者）、冯××（在老车站附近开诊所）、张宝瑞（刘格平的外甥，在河北大经路摆烟卷摊），机关设在市内河北北站附近。工委组成后，每个委员都单线联系并开始工作，在学校、医院、小商贩、洋车夫中团结和发展了不少工作关系，联系了不少群众（大部是青年学生），也发展了个别党员。



1944年，刘格平（前右1）在渤海区工作时与刘秀江（前右2）、张英达（后右1）、李安民（后右2）、韩道仁（后左1）等人在一起

另外，临时工委还组织成立了天津市救国会，刘格平任主任，胡子炎任副主任，刘格平的侄女刘秀江任组织部长，文又生任宣传部长。在开展工作中，通过读书会、办刊物等形式影响和联系周围的群众。刘格平还通过回民亲朋和



老一辈世交关系做一些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在市立第二女子中学读书的刘秀江，是刘格平的侄女。经常介绍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到临时工委来，刘格平便向她们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陆续发展了一些学生入党，先后联系了几十个进步学生。

为使进步学生更进一步了解革命，了解解放区，尽快投身于革命事业，天津临时工委先后分批输送了不少青年学生和社会在职人员、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伊斯兰教的阿訇和文化界人士）去渤海区学习。在每次护送过程中，刘格平都化装成上层人士，把天津的学生、知识分子亲自护送到姚官屯，吃过饭后，雇两三辆骡马轿车，再把他们护送到区党委设的秘密联络点——阁上村，由区党委派人来接走。第二天，刘格平坐轿车回到姚官屯，再乘火车返回天津。这样大约送了七八次，都没发生问题。这些人被送到解放区后，参加了由渤海区党委城工部领导的青训队，在进行了政治和业务（业务以城市工作为主，如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和方法等）的具体培训后，有不少人又受党的委派返回了天津，开展地下工作。

在天津，党的工委不但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工作，还在各阶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通过那个董保长，联系了十几个保长。这些保长都是被强迫出来干的，还都有点儿爱国思想。另外在工厂也联络了一大批工人，以不断扩大爱国群众的基础。尽管当时日军对天津统治很严密，但是天津人民抗日的热情依然高涨，抗日群众基础也越来越扩大和加强、巩固。

在这期间，文又生不幸被捕了。他原先在解放区工作，到天津养病期间积极要求工作。通过其本家哥哥迟鸿文介绍给刘格平，担任了天津市救国会的宣传部长，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被捕到沧县，看来根源还是在沧县那边。他被捕时刘格平一点儿也不知道，被捕后没几天他又被放出来了，据说敌人没有抓到他任何证据，他在天津又是只身一人，等于出来避难，所以只好把他放了。文又生被释放后来到刘格平的住处，讲明了情况。刘格平觉得敌人这次虽然放了他，但已引起了注意，如果抓到任何一点儿证据、把柄，都会下毒手的。为了党组织的安全，也为了文又生的安全，刘格平让他立即返回解放区去，一来怕敌人放长线钓大鱼，二来他已被捕过，也不好再在天津活动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渤海区党委也很担心刘格平的安全，通知他赶快回去，因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刘格平即刻把工作交给了胡子炎，并在离开天津时，临时开了一个会，研究了工作分工，由胡子炎担任临时工委书记，张宝瑞为组织委员，刘家玺为宣传委员，冯××为秘书。

1944年10月下旬，刘格平回到了渤海解放区，同年底他又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

1944年底，刘格平来到山东分局报到，见到了中共山东分局第二书记黎玉，他主要来负责地方工作，同时还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亲切地接待了刘格平，还审查了刘格平参加革命的经历，并经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后，刘格平留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他先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学习。在党校，刘格平与曾在反省院一起坐过牢的难友贺致平编到了一个组，并且是他的组长。同一个小组的还有侄女刘秀江。连队指导员是谢有法，连长姓刘。在党校的学习、整风，主要是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作自我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个人写好自我检查，在小组会上念，然后是大家帮助，可以质问，可以提意见。刘格平在反省院的一段经历，由贺致平同志做了证明。侄女刘秀江提了许多意见，如批评刘格平在天津写了一篇小说，写得比较灰色一些，投到一个刊物去刊登，尽管刊物没给登，但刘秀江提出不该投稿。

因为日伪军“扫荡”，党校暂时解散，人员各回原处。刘格平回到分局后就分散到西集村。这个村是个回族聚居村寨，住的都是回民。这时敌人的“扫荡”方向正好向着这个村子，刘格平和刘秀江以及彭林荷带着他和抱着刚满月孩子的妻子，一千人朝着东边距村七八华里的山里转移。在敌人的“扫荡”中，大家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被敌人追了一天才算脱身。晚上，疲惫不堪的同志们在树林里找了一户人家住下，才算歇了一下脚。

在第二天的转移中，又遇上了一批建国大学的学生，便结伴走了一天。这次“扫荡”是伪军的最后一次“扫荡”，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有日军1000多名，伪军5000多名。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末日来临，但仍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做垂死挣扎。几天后得知敌人退走的消息，一行人又回到了西集村。

不久，党校恢复，刘格平他们又到党校集合，继续学习。在党校期间，为



了开展回民村庄的工作，刘格平亲自到回民聚居村——代成庄去了一趟，还和刘秀江一同去了一趟。乡亲们非常热情，不但组织了秧歌队，村里的姑娘们还专程跑一趟来看望刘秀江，充分体现了军民一家、干群一家、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亲密关系。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

在全国抗日军民欢庆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刘格平接到了通知，立即返回分局。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山东军区迅速组建整训部队，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率领30个团的干部，挺进东北。黎玉给刘格平布置的工作任务是，把山东的回民组织起来。接受任务后，刘格平便着手准备组织建立全省的回民协会。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刘格平先调来了李安民，以后又把张英达、韩道仁等调来，共同筹备建立回民协会。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1945年8月下旬，召开了山东省回民代表会议，对有关问题、事宜进行了几天的充分讨论，并由刘格平作了一个工作报告，印发全省。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回民协会，刘格平被推举为省回民协会主任。这时，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及大部分主力部队北移山东，新四军管辖的地区一些回回民间组织，与山东省回民协会及山东渤海回民救国会都合并到一起。不久，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机关和华野司令部都驻在临沂。回民协会则驻在南关回民一条街一个逃跑的回民地主家里。这时，广大回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日，保国保教，抗击日军。在1933年，由李安民、刘震寰建立了军事小组。1940年7月20日，成立了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冀鲁边区回民大队，王连芳任回救总会主



1945年，刘格平（左2）在渤海区党委工作时与王卓如（左1）、于修（左3）、周贯五（左4）、张晔（左5）、廖容标（左6）在一起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任，刘震寰任回民大队大队长，王连芳任政治委员。1941年9月，回民大队扩建为回民支队<sup>①</sup>。经过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战斗洗礼，回民支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在与日军和伪军、汉奸的英勇斗争中，立下了不朽战功，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到抗日战争胜利时，这支民族武装已发展到3000多人，在山东军区奉命组建部队进军东北时，罗荣桓把这个回民支队带到东北去了。这个支队后来扩大到一个师，在东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奋力杀敌，许多回族指战员英勇牺牲，以后又改编为铁道兵的一个师。全国解放后，国家又把该师的几百名回民干部都调出来，分配到甘肃、宁夏等省，去开展回族地区的工作。

山东回民协会成立后，全省回民工作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有了明确的纲领，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组织起了将近10万回族群众，90%以上回民地区获得解放，贫苦回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参政，有的建立了自治村、街、乡，有了回民的镇长、区长、副县长。经济上，在翻身中得到了土地、粮食及其他的物品，政府给予合作社、搭犋组、纺织、皮革业各种贷款和有计划的帮助，生活得到改善，已获得饱食足衣。文化上，回民享受到平等待遇，有了上入各级学校的自由，并成立了回民学校。建立了回民自己的支队、大队各种武装。回民的风俗、习惯、宗教，到处都得到尊重和照顾。

山东回民协会成立后，即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回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同时不断发布山东回汉人民团结生产和支援前线的新闻报道，给当时各根据地回民以极大的鼓舞。在刘格平领导下，还把山东各战区的回民抗日武装和回民支队组织在一起，进行整顿和训练。这些部队随着回民地区减租减息和参军运动的开展，不断得以壮大，成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一些领导同志曾考虑在此基础上成立回民纵队，只是由于中共中央为了爱护和尽最大限度保存这批回民骨干力量，才取消了这一打算。

渤海回民支队随北上大军挺进东北后，刘格平带领山东回民协会，积极发动回民群众参军。上级把山东鲁南滨海一个回民大队调到渤海区，和渤海区的

<sup>①</sup>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冀鲁边回民支队又更名为渤海回民支队。



回民武装合编了一个回民团，马杰为团长，彭林柏为政治委员。该团驻扎在渤海第2分区，担负堵截阻击济南国民党军队北上的任务。战斗中全团指战员团结一心，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战斗打得很激烈，虽然牺牲很大，但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现将当时《晋察冀日报》等有关刘格平组织领导回民工作情况的报道，转载如下：

（新华社山东电）山东回民领袖刘格平、王连芳、李敬渔及李微冬、彭林柏、彭林鹤等发起组织解放区山东省回民协会，并于8月23至28日召开临时筹备会，公推刘格平、刘振环、王连芳、李敬渔、李微冬、张六漾阿訇、马次唐、阎伸泰、韩道仁、张英达、彭林伯、张长期、彭林鹤、未式明等为解放区山东省回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以刘格平为主任。该会议除拟就告同胞书和组织章程草案外，并决议已组织起来之回民协会，“回教救国会”，应使工作逐步巩固与深入，并进行会员登记。未组织回民协会之地区，应广泛普遍的组织，以适应目前新形势，最后决议待山东完全解放后，各地回民协会再行选举代表，以便正式成立解放区山东省回民协会之领导机关。按山东全省回民共有150万左右，主要散居在济南、青州、徐州等地。回民们在共产党、八路军帮助下组织了数支抗日武装，最近在山东军区统一指挥下，由马次唐、张长期、李敬渔、彭林柏、阎伸泰分头率领，与八路军并肩向大城市进军（原载《晋察冀日报》1945年9月14日第1版）。

## 担任中共华东局民运部长，指导渤海区鲁中区镇压敌特工作，搞好土地改革，组织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支前

为了适应根据地建设的新形势，中共华东局加强了民运工作。1945年9月，华东局组织部长李林传达了组织任命，任命刘格平担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从此，刘格平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就在准备到鲁中泰安附近去工作时，刘格平闹开了痢疾。早晨出发时还不觉得怎样，但到了下午，他骑在马上却下不来了，病情非常严重，是被警卫员背进驻在山沟村庄的野战医院里的。到了医院后，刘格平浑身无力，一点也不



刘格平（中左3）在渤海区党委工作时与彭康（前左1）、周贯五（前左3）、廖容标（前右1）、李广文（中左1）、孙汉青（中右2）、张晔（中右1）等在一起



能动了，就像完全瘫痪了似的。多亏了医院里的医生和一名叫宫月莲的护士，每天细心治疗和护理，除了打针吃药，还每天用酒精擦全身，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刘格平才慢慢地好了起来。当时野战医院还有两个护士是回民，她们都是代成庄人（一个叫刘博，另一个姓名不详），刘格平在医院住院时，也得到了她们的照顾。

当刘格平恢复到能去村外散步活动时，他便要求出院了。医院安排了一副担架。按要求把他送到了莱芜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刘格平到了靠近济南的历城县，见到了华野敌工部的副部长黄源。在那里，刘格平给原泰安道尹吴中轩（是他的一个表侄）送了一封劝降信，劝他弃暗投明，动员他率部起义，但他没回信就被吓跑了。这时，刘格平接到华东局电报，要他到峰县去。刘格平立即动身，又转到鲁南峰县，见到了黎玉。黎玉把刘格平介绍给陈毅后，陈毅便问他：“你沿路听没听说对我们部队有什么意见？”

刘格平说：“群众认为新四军和山东部队合起来，力量大了，不怕蒋介石顽固派了。”

陈毅接着又追问了一句：“群众对于部队有什么意见？”

刘格平想了想回答：“由于新四军生活习惯和当地不一样，群众可能有些误会。”

陈毅听到这里，脸上表情立即严肃起来，很急促地继续追问：“什么具体问题？”

“比如说，‘老板，借借你的门板子搭搭铺’，这句话在南方是句很平常的话，但在山东，叫‘老板’不是好意思，认为是对妓女院老鸨子的称呼，‘门板子’也是对妇女一种不好的名词。”刘格平把了解的情况如实作了回答。

陈毅笑了笑说：“你了解的还有什么情况都说出来，我们通知部队注意。”

黎玉这时插话道：“群众是可以谅解的。”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陈毅对于军民关系极其关心，对民运工作是极为重视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峰县，刘格平参加了团以上军人干部大会。大会由饶漱石主持，黎玉讲了话，最后陈毅做了总结。会议结束后，刘格平回到临沂。古琅玕是一座石城，当时也算个大城市，住有两三万人，这里的规模是很大的，现在城垣只剩下土陵子了。这次来后，刘格平住在城南关外一条回民聚居街上的一个逃亡地主家里，这家内外共两个院，外面院子是李安民、张英达、韩道仁等人居住兼办公，刘格平和刘秀江还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里面院子里。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军政大学半年内培养五千名干部的决定》。与此同时，也要求在职干部抓紧学习。

刘格平在这一段时期，先后认真阅读学习了毛主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等17篇著作，受到的教育，悟出的道理是前所未有的，是非常深刻的。刘格平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回忆过去20多年革命工作中，参加的七八次规模较大的革命行动，其中6次搞武装斗争，之所以最终失败，都是由于没有获得这样明确的英明领导，而且自己也没有经验所致。学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再对照自己已经过的革命生涯，真是心胸开阔，头脑清醒，思想激奋，劲头倍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毛主席的这些文章，不愧为经典著作，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永为革命者的法宝，是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这么多革命经验的总结，在今天和将来对于革命工作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946年六七月间，华东局饶漱石去中央开会，陈毅主持华东局的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把刘格平和王力叫了去，严肃地对他俩说：“你们两个到渤海去



一下。”

刘格平知道准是有新的工作等待去做，赶紧问：“有什么任务？”

陈毅没说话，表情严肃地递给他俩一份渤海区党委拍来的关于敌人派特务到解放区搞暗杀、破坏活动的电报。看了电报，他俩仿佛看到了敌特的血腥暴行，感觉到了各项工作遭受的损失，沉重、愤怒的心情骤然充满胸膛。

这时陈毅加重语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去了，对敌特要坚持镇压，绝不能让它泛滥，不惜一个村子杀一个大坏蛋。”

原来，国民党政府肆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派遣大批特务、土匪潜入解放区，杀人、放火、投毒、抢掠，无恶不作，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地方治安，使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各项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剿匪反特已成为当时一项迫在眉睫、极为重要的工作。

刘格平、王力接受陈毅军长的指示后，肩负着领导赋予的重任，立即动身上路了。他俩先经过鲁中，了解了一下敌情，得知敌人已把胶济铁路占领了，要想去渤海，只有通过泰安越过津浦铁路，从津浦路西绕过去。这样，他俩又到了泰安。也就是这次在泰安，刘格平邂逅了自己的爱人丁磊。

泰安的一位同志请求刘格平给大家做一场形势报告，刘格平爽快地答应了。那位同志很高兴，闲聊中说到当地回协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回族“老干部”，她资历老、年纪轻，是个相貌秀美，性格开朗、泼辣能干的回族姑娘。这次她也来听报告，不妨认识一下……

听领导作报告是很经常的事情，丁磊是第一次听刘格平作报告。刘格平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精瘦、皮肤白皙、约30来岁（实际上40多岁），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讲话带有沧州口音，声音不高，但有力且层次清楚，理论水平很高，经验丰富。当时，每次听完领导报告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并认真贯彻和落实。她尊重刘格平，把他当作上级领导，从没有想过，这个人能和自己扯上什么瓜葛。她庆幸自己能听到时任省回协主任、华东民运部副部长的刘格平，来给大家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

丁磊听完报告刚刚离开，有人通知她，说首长找她谈话。她一边走，一边心里十分纳闷：“我刚调到回协，时间还不长，领导找我能谈什么话？谈工作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吧，自己了解的又不多，其他方面又有什么好谈的？”她心里这么想着，脚不停地走着，不一会儿来到刘格平所在的房间，警卫员将她到来的消息告诉刘格平，刘格平正等着她。刘格平站起身热情地招呼她坐下，让人给她倒水。丁磊从小生长在东里店，南来北往什么人都见过，她从来不发怵。可这次不同，这么大的一个领导找她单独谈话，她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定主意问啥说啥不能乱说。所以她没敢多看首长，只是低着头等待着首长发问。

刘格平开门见山地说：“丁磊同志，我叫刘格平，我是去渤海执行任务路过泰安，顺便来了解一下鲁中、惠民干部情况的。今天专门找你谈一谈，希望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回协的工作，和我本人的工作有意见也可以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丁磊这时心里想：“我又不了解你，有什么可批评的。”又想：“这是人家谦虚，说明人家水平高……”她心里想着，可嘴上并没有说出来，只是点点头礼貌地表示回应。刘格平让她喝水，丁磊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这时刘格平便开始提问题：家里几口人？过去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参加革命的等等。总之，把丁磊和家里的情况问了一遍。丁磊以为刘格平是在审查干部，什么都是一五一十如实回答。她知道刘认识自己的哥哥丁毅民，他问这么多是不是想了解她和哥哥两个人，她始终有些糊涂，只是感到问得太细，有些啰唆，不像是组织上考察干部。

刘格平称赞丁磊一家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说她父母开通，能让三个儿女中的两个孩子参加革命。同时，他对丁磊的父母为支持革命遭受到特务、汉奸的追捕、迫害而始终不动摇表示赞赏，并表示认识了丁磊很高兴。还称赞丁磊，说大家对她的反映非常好。丁磊小小年纪，听到领导夸奖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自然心中高兴，慢慢放松了自己紧绷的弦，说话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拘谨了。后来，刘格平又介绍了自己一些简单的情况。在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年龄出身都是保密的，一般都不说，别人也不便问。谈了半夜，丁磊也不全清楚刘格平的家庭情况和年龄。他主要谈的是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国家的前途等。总之，给丁磊的印象是他对打垮蒋家王朝，把劳苦大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尔虞我诈的美好社会充满了信心，等于给丁磊上了一堂共产主义的教育课。



这次谈话刘格平给丁磊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架子，印象还不错，但也没有多想什么。实际上刘格平却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回族中女干部极少。刘格平出狱后组织上对他的个人生活问题极其关心，也曾介绍过几个不错的女同志，只是他一心要找个回族女同志做终身伴侣。有人早就把丁磊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他感到不错，为了进一步加强了解、加深感情，才有了这一次的深夜谈话。丁磊是个单纯的女孩，做梦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一档子事。

第二天，刘格平、王力越过铁路，到了路西，找到一个分区，他们派了一个连队护送二位到了禹城县城。这时天已经黑了，城里的气氛很紧张，根本找不到县里的干部，而且在当晚靠近他们住地的旁边，供给人们馒头吃的一家饭店就被特务抢了。

为了尽快和当地党组织接上头，第二天一早，刘格平和王力就分头出城去找县里的组织。刘格平出得城来四处打听，有群众告诉他说：“前面有个炮楼，里面就是区里的人。”刘格平带着警卫员顺着方向找去，果然看到前面有个炮楼。他真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心里也在纳闷，我们的同志为什么竟会住在炮楼里，为什么不住在群众家里，依靠群众？

刘格平一边思忖一边往前走，走到离炮楼不远的地方，便听到炮楼上面有人大声喊：“干什么的？”

“我们是华东局的，到渤海区党委去，我叫刘格平。”刘格平也大声回答。

听了刘格平的回答，炮楼的门一会儿被打开了，有人邀他们进去。刘格平实在不愿意进炮楼，便说：“我不进去了，请告诉你们县委书记，到城里我们住的地方来找我。”刘格平在和警卫员往回走的路上还在琢磨，怎么这里搞得这么紧张。到了下午，县委书记李逸民急急忙忙地来了。他一进门就说：“你看我们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反过来住进了炮楼。”

刘格平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敌特的气焰很嚣张，在这个县杀了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300多人，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就是在这个县被敌特打死的，宣传部长陈放也被敌人打伤。”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王力插问：“特务这么猖狂，你们就不管？”

刘格平也问他：“你们抓到了杀人犯没有？”

“有几十个在押的特务，有的至少杀过我们两个人以上。”李逸民愤愤地说。

刘格平又问了一句：“能真正肯定一个特务杀过我们两个人吗？”

李肯定地说：“那绝对没有错！”

刘格平和王力都说：“先杀一批，凡是证实杀害我们两个人以上的特务要坚决镇压掉！”

第二天，经县委研究决定，这个县枪毙了几个血债累累的特务。

刘格平、王力二人离开了禹城，第二站到了商河县，见到了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肖锋、政委曾旭清和商河县委书记叶尚志等同志。在了解情况时，听他们谈到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不但暗杀干部、积极分子，还对我们的部队进行瓦解、拉拢、造谣、破坏。仅110人的警卫连，战士家属在特务威胁下来拉战士回家的就有104人，甚至有的是拖着机关枪逃跑的，真是骇人听闻！

“我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对付的办法。”曾旭清和肖锋都为难地说。

刘格平说：“不能枪毙好人，这是个大原则。要枪毙杀人的反革命。敌人竟敢杀害我们的同志，瓦解和破坏我们的军队，我们为什么不能镇压这些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呢？”

刘格平和王力把禹城的情况向他们谈了一遍，也谈到了在镇压敌特上李逸民是怎样搞的。

叶尚志听后说：“我们这里和禹城情况差不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往往就在分区司令部和县委跟前杀我们的人。一个特务杀过我们两个人以上的，押着的至少有好几个，今晚县委就研究，明天我们就处理。”

肖锋、曾旭清二同志也都表示：“赞成！赞成！有华东局来的同志支持，我们敢干！”

他们都很激昂，微露的怒气也一扫而光。

刘格平说：“这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陈毅军长亲自指示的，我们是奉命传达，当然我们也敢于负责。”



第二天，商河县委经过研究，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特务。这一行动，镇压了敌特的凶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和情绪，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开展。

刘格平、王力二人回到了渤海区党委后，区党委早已接到了报告。在区党委会议上，刘格平向区党委详细汇报了经过第二军分区的情况，并对处决敌特问题作了解释。

开完会回来，刘格平和王力商议，要把这里的情况写个材料报告给华东局。王力也从各方面了解了一些情况，掌握了一些材料，便由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刘格平看后认为很好，又送到区党委，请他们过目。王力找到新华社渤海分社给发了出去。

之后，为了从各方面多了解一些情况，刘格平到了第一地委，见到了地委书记李广文、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地委副书记燕明等，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情况。随后，刘格平又到了盐山、庆云等县，见到了盐山县委书记周化南、庆云县委书记傅爱农，还有曾因马颊河农民暴动一起坐过牢的刘全禄等不少老同志，既了解了情况，又重叙了同志情、战友谊，真是一举两得。这个时候，第一地委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津浦铁路线上，从济南到天津中间，只有沧县还没有解放。

刘格平回到区党委后，区党委通知他到桓台县开会。据说这个县，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养马的地方。刘格平乘坐区党委的一辆大卡车，来到桓台县住下。

安排好住处，刘格平和王力来到开会的华东局同志的住处去看了一下，看到饶漱石、张鼎丞和黎玉等同志都来了。到了晚上，华东局的负责人都到了，渤海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公安局长也到了。

会议先由王力作报告，然后是渤海区党委公安局长作报告，最后饶漱石做了大会总结。会议结束后，刘格平和王力觉得已经完成了任务，随后就回到了华东局。

这时已经到了1946年的九十月份，华东局又派刘格平到鲁中第三地委去，据说那里的特务闹得很厉害。接受任务后，刘格平先到了鲁中区党委，见到了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在互相通报了情况后，刘格平就当前的形势、镇压敌特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重要性和工作重点讲了意见，指出面对敌特杀害我干部群众，扰乱解放区的猖狂破坏活动，我们必须坚决打击镇压，以牙还牙，对敌特绝不能手软、讲仁慈。随后，高克亭派了鲁中行署公安局长，陪刘格平一起到第三地委去帮助工作。

到了第三地委，刘格平向地委书记霍士廉说明了来意，得到了地委同志的欢迎和支持。霍士廉还召集了一次会议，要刘格平作了一次报告。然后他便深入到靠近昌（乐）、潍（安）一带的潍安县了解情况。这里的敌人驻扎在昌乐、潍县，派遣特务到附近解放区，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其手法和渤海区敌特一样，不过这里的敌人夜来昼去，不太容易被抓到。敌人的疯狂暗杀、肆意破坏，闹得解放区工作不好开展，干部群众感到人人自危。刘格平通过了解情况，发现敌特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各村都有他们的内线，而要想彻底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就必须先把他们的内线搞掉、掐断，使他们成为瞎子、聋子。

刘格平和行署公安局长在潍安县听取了县委书记的汇报后，针对这个县特务活动相当严重的状况，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先动员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力开展锄奸反特，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对已逮捕的特务分子，公安人员帮助核对材料后，经群众讨论，该杀的杀一批；第二，各村把民兵搞起来，修好地堡，敌特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打；第三，相邻3个县的区队加紧靠近敌特驻地的活动，他们一出来就打。这样，一个县镇压了一批特务，极大地震慑了敌特，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敌特再也不敢出来活动和破坏了。附近有的县也仿照这个办法搞了，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地委书记霍士廉检查工作时，对这种做法表示很赞同。

工作告一段落后，刘格平请行署公安局长回去向鲁中区党委汇报，自己径直回到华东局，向饶漱石报告了在鲁中的工作情况，饶表示“很好”，刘格平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刘格平从鲁中回到华东局，已经是1947年春天，这时中共中央机关已暂时撤出延安，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作战。在华东战场，由华中、山东两



支野战军合编的华东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领导下，于2月20日至23日，发动了莱芜战役，共歼国民党军5.6万多人，并俘虏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等高级将领，全歼其两个军、7个师，创造了一次歼敌7个师的战例。

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陈毅带领的华东野战军，继莱芜战役之后，又于5月13日至16日，在孟良崮消灭蒋军王牌队伍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取得了击毙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歼敌3.2万余人的孟良崮战役巨大胜利。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军经过整顿，又以重兵向山东进行重点进攻。7月，邓子恢、张云逸等领导同志率领华东局、华东军区部分机关分别从鲁中、胶东转移至渤海区黄河以北惠民一带，同时，一部分党政干部及野战军的兵站、医院、后勤机关、荣军学校、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队及部分民工群众，加上转移到黄河以北的部队总计40余万人，暂时撤至渤海区。渤海区成为整个华东区的可靠后方和后勤供应基地。

丁磊随着党政军干部也到了渤海区工作。刘格平对丁磊的印象极好，单纯、可爱是他对丁磊的直觉。能和丁磊有个革命的家庭非常欣喜，希望把自己的意思尽快告诉丁磊，他只有得到丁磊的同意后心里才能踏实。

第二次见面，刘格平直截了当谈了自己的想法：“小丁同志，经过华东局组织部的批准，让我们两个结成革命的伴侣，看你有什么意见没有？”丁磊一听此话，脸腾地一下子红了，羞得一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生平第一次有人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向自己求婚，而且先声明已经经过组织上批准。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是七上八下的，心里像是打翻五味瓶子。在她长成大姑娘的这些年里，父亲对自己的婚姻问题算是十分的操心。1941年在柿子峪逃难时，有人给她说媒，她坚决反对，父亲和自己是一致的。她出来参加了革命，这件事就算摆脱掉了。一个漂亮女孩到了已婚的年龄，这是难免的。旧社会讲的是父母之



青年时期的丁磊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命、媒妁之言，现在革命战士讲究的是自由恋爱，可是作为回民女孩，自由也只可以在回回圈子里，没有其他选择，何况自己是做回民工作的，必须尊重回民的规矩，否则自己没有脸面去面对回族父老乡亲。刘格平是个回民老干部，应该是具备了回回和革命者双重条件，作为自己一个刚刚踏上革命道路的女孩子，没有拒绝的理由，何况他对刘格平的印象也是很好的。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功夫。另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组织上已经批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决定，正应了“一切服从党安排”的誓言。面对着眼前一个文质彬彬，一双热切期望的眼睛，看着自己、等待着自己的答复。她经过短时间的沉默，果断地点了点头。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还得问问我爹和我娘。”刘格平一见丁磊答允，一块石头落了地，兴奋地说：“咱俩的事今天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回去和组织上汇报，你也和你父母说一说，我一定会去看望他们。”一言定终身。从此，她的命运就和刘格平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通信，加深了感情。刘格平又专程带着礼物到刘家庄去看望丁磊的父亲丁长才和母亲黄家玉，当然也有提亲的意思。同时，见到了丁磊的嫂嫂郝文芳、妹妹丁文美与两个小侄女大战和小战。这凸显出刘格平的质朴的人品，他尊重丁磊的老人，礼节十分的周到，没有以自己的资历而摆官架子。那时的刘格平和一般的干部就已经不一样，出门骑马，有挎着匣子枪的警卫员跟随，随时保护他的安全。丁长才自然明白刘格平的身份，既然是共产党的干部，是真正的回回，又是组织上介绍的，他的爱女能够找这样一个人也算是出息，心中自然是乐意的。黄家玉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是不了解，看本人还可以，只是觉得年纪大了一些，可这不是理由。大家热情地接待，给刘格平的印象也极好。刘格平给大家的印象也不错，高瘦的个子，白净的面容，有文化，有涵养，对人有礼貌，颇具大家风范。用农村人的话说，看上去就是个贵人。

在和丁磊的交往中，刘格平表现得办事考虑周到，十分细心，对丁磊关怀备至，只要有机会就去看望丁磊。两人互相倾慕，感情越来越深。当然，解放战争的形势不允许两个人朝朝暮暮，每次都是急匆匆相见，又急匆匆的离去。

在这期间，刘格平到渤海区党委参加“三查三整”，住在李家桥。正巧丁



磊也在李家桥工作。在战乱年代难得两个人有相聚的机会，何况刘格平已经接到上级的指示随时准备南下，如果错过机会，很难预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刘格平征得组织的同意，征求了丁磊的意见，于1947年10月10日，在李家桥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来的客人很少，既无华丽的被褥，也无铺张的宴请，最珍贵的就是花生、大枣和栗子。这是老百姓结婚必不可缺的食品，寓意着早生贵子，而且要男女花着生。共产党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但不可以信奉宗教。信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就要打破对宗教的



1947年冬，刘格平与丁磊于渤海区何家坊结婚留影

信仰。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真正的回回，但只能举行革命的婚礼，不允许举行宗教仪式，这也是与回回和回教的区别。从婚礼举行过这一时刻起，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革命成就了他们，党成就了他们，回回民族成就了他们。从这一天起，丁磊的命运就和刘格平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结婚当天，刘格平接到指示马上出发转移，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的爱妻。丁磊年纪小，她这么开朗活泼的人，在婚姻上却是非常的矜持害羞。用丁磊的话说：“虽然结了婚好长时间，可都没有敢正眼看过他。”刘格平走后，她就像是做了个梦，立马又投入到工作中。她仍然住到原来的集体宿舍，仍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刘格平任渤海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城工部长，在何家坊有了相对稳定的住处，刘格平才有可能偶尔接她去团聚一下。

在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及后勤部门向渤海区大转移中，刘格平随局机关从胶东高崖乘木船过海，到达了地处小清河出海口的羊角沟，然后换乘大卡车，继续向渤海区党委驻地进发。不料在路上翻了车，把同志们的衣服都搞湿了。后来在当地村干部帮助下，同志们才被送到渤海区党委。

在区党委，刘格平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一个惠民县竟要枪毙1000多特务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报道，心里既吃惊又着急。正好碰上王力，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去找邓子恢，向他反映这个情况，并请他看了报纸的报道。邓子恢真火了，大发脾气：“谁搞的？快下命令停下来！”这样告诉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下了“刀下留人”的紧急命令，乱关乱杀的状况才立刻停止下来，如再稍晚就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947年7月9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参加了会议。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整党和土改两大问题，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着重反对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同时结合土改，整顿党的队伍，并通过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张晔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回来后，渤海区党委于10月召开了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在邓子恢主持下，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负责同志，区党委机关科以上干部及各地委委员、专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妇救会主任共5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结合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进行了整党。11月6日，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康生带领徐冰、张学梅、毛岸英、于光远、高文华、曹逸欧等一大批人员来到渤海区，参加土改整党会议。报请华东局党委批准后，华东局党委任命张晔、刘格平和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3人为渤海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王卓如、廖容标、周贯五等为常委。渤海区的土改在1947年秋冬即完成了，翻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但有的地方对于中农有些伤害，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当作富农把土地给分了，光看到富裕中农有剥削，却忽视了是否超过25%这个界限，往往把剥削计算高了。对于富农，也没有注意做到只能把封建部分没收，也伤害到不应伤害的部分。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以后进行的几次复查中，才逐步得到解决。

在此之后，华东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率部赴鲁途中经过渤海区，住在渤海区党委驻地阳信县何家坊村。在这里，陈毅向渤海区提出要征集1万新兵补充部队，区党委研究后，决定立即在第1分区动员，完成这次参军任务。

渤海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城工部长刘格平到了第一分区，向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燕明、袁成隆等同志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详细布置了



这次动员参军工作。地委领导同志都表示一定要广泛深入开展动员，保质保量圆满完成这次参军任务。随即在第一分区发动了一次大参军运动。刘格平跑了几个县，看到各县的翻身农民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报名，踊跃参军，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事迹。党的各级干部，更是勤奋工作，深入群众，广泛动员，保证了参军任务的顺利完成。在盐山县旧县镇，精明能干年轻的女区委书记、李广文的爱人阎瑞云，不怕劳苦，日夜工作，亲自走家串户，动员青年参加解放军，有力地推动了参军运动的开展。在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参军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共有1.6万人光荣入伍，几乎超过任务一半。参军任务完成后，刘格平回到渤海区区党委不久，陈毅便率领华野大军，跨越铁路，渡过黄河，进军中原，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起转入外线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47年12月31日，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提到：“部队补兵最好的比例是翻身农民占4/10，解放战士6/10。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这12万翻身农民中有1.6万来自渤海区，占13%，可见渤海区在兵源方面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之大。

1948年夏天，区党委派刘格平到第一分区去，因为在陆续开展的整党运动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左”的偏向，在不少农村施行一种名为“搬石头”的做法，对当地原来的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予信任，把他们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农村党支部、农会、青年团、妇联会、民兵、识字班、儿童团等所有的组织都解散了。幸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偏向，毛主席并于1948年4月1日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及时作了纠正。

刘格平来到第一分区后，当时天正下着大雨，既要动员民工出去防洪，又需要派大批人员去支援前线，而且后方的农活也不能耽误，需靠广大妇女来干，工作是很多、很繁重的。刘格平正好借此机会，把党团、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恢复起来，广泛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依靠他们去开展完成各项工作。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快就被调动起来了，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冲天的干劲投入工作，很快完成了各项任务。幸亏“搬石头”这个政策搞得时间不太长，只有三四个月，但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在农村组织都解散的情况下，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工作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状况，有时真是没法干。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干部群众真好，他们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党的领导绝对信任。在那种状态下，尽管组织被解散了，职务没有了，但对党布置的各项任务却仍积极认真地尽力完成。这不能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觉悟是很高的。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渤海区人民以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支援前线作战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区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大批的民工自带口粮，有的推着胶轮小推车，有的带着担架，在县、区、乡派出的强有力干部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赴前线，运送粮草及战备物资，还从事战场救护，抢救伤员，人欢马叫，车轮滚滚，保证了战时担架、运输和粮食供应，涌现了大批支前模范集体和个人。在支前工作中，有时一个县要动员几千人，派干部少者四五十，多者上百个，但是有着高度思想觉悟和博大胸怀的渤海干部群众，每次都积极踊跃，干劲百倍地去完成任务，在解放战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 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干部渡江，南下组建新政权；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5000多名学子奔向各级党政军建设岗位

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和祖国大片领土被解放，到1949年二三月间，战线已经推到了长江岸边，渤海区已经离前线越来越远。

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了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政权准备所需要干部的工作，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3年内，准备好3至4万干部，以便第4年内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解放区。根据中央这一会议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初冬召开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解放大军渡江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会议要求每一个战略区抽调干部各组成一套区党委的机构（包括党政军民各机关）和下属若干个地、县、区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架子随军南下；要求渤海区除组建一个区党委（相等于省一级）的架子外，另组建4个地委的架子。被抽调的干部集中学习整训，做好准备，随时随军南下。

渤海区党委认真研究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问题，并报华东局批准，确定由刘格平负责筹备组建一个区党委班子，准备随大军过江，他们当中有：宣传部长陈放，秘书长冯乐进，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刘冠英，行署主任李文，军区司令员周贯五。另外，还抽调干部组建了5个地委班子：第一地委书记燕明；后因第一地委干部多，摊子太大，奉上级指示又分出一个地委，称为第五地委，地委书记周化南；第二地委书记李代耕；第三地委书记王乐三；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在组建县委班子时，原来按渤海区40个县，每一个县抽调干部组建一个县委班子，后因第一地委分成两个地委，又多分出10个县来，所以，渤海区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共组建了1个区党委、5个地委、5个军分区、5个专员公署、50个县的架子，共抽调干部5000多人。按照序列，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由渤海军区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

春节前后，全体南下干部在党校集中进行了整训学习。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理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文件，还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饶漱石、刘瑞龙、刘格平和周贯五等还给大家作了报告。总之，这次集中学习整训，使广大南下干部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自觉性，坚定了信心，为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从1949年3月上旬开始，经过短期集中学习整训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所属第二、三、四等大队即第二、三、四地委（其中第一大队作为渤海区首批南下干部，先期行动，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奉命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当时出发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没有考虑好，一个5000人的大队伍，后勤工作是个大事情，但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秘书长手里只有10元钱。第二是牲口太少了，每个地委都没有带牲口，区党委也只有刘格平、周贯五、李文每人一匹牲口，其他负责人都是徒步。整个南下队伍分两批出发，各部先后步行到济南，然后乘火车经泰安、曲阜抵达华东局党校所在地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与先期到达的渤海南下干部第三支队一大队会合。

刘格平和周贯五是乘华东军区派的四轮卡车送到济南的。在济南刘格平去看望了陈毅，见了面他第一句话就问道：

“你给我存的书记呢？”

刘格平是给陈毅保存了一批书，见他这么着急，就赶紧回答：“有，都保存得很好。”



陈毅听了，更加迫不及待，连催刘格平说：“你快写信，我派参谋去取。”

刘格平立刻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他的参谋。这些书是陈毅司令员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他非常爱惜，视如珍宝，能够都取回来，完璧归赵，陈毅司令员一定是很高兴的。

在国民党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毛主席党中央不仅操心“打天下”的问题，同时还在考虑如何“守天下”和“治天下”的问题。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山东分局的安排，刘格平率领南下干部纵队火速奔向长江南线，但发现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首先，前线部队挺进神速，每天都要忙着解放大量国土、人民和城市，至于解放之后怎么办他们是不管的，至少考虑的并不多。其次，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缺的是打仗的队伍，南下纵队因属非战斗部队而受不到重视，很难见到管事的领导人。再者，前方浴血奋战的人对后方来的这批干部有一定抵触，甚至有的人一听“接管”，就认为是“摘桃子”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下纵队经常被冷遇。

华东南下干部继续向南开进，乘坐敞篷火车先到滕县，在那里再集中等车。从滕县上了火车，转到陇海铁路，过了邳县，到了一个叫新安镇的小车站。这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共有4个支队：鲁中南作为一个支队，胶东作为一个支队，渤海作为一个支队，华东局成立了一个直属支队，统一由刘少卿和温阳春带队。华东局催着这批约有两万人的干部队伍，要赶紧向长江前进，争取在4月20日夜解放军大部队过江之前赶到江边，以便和大军一同过江。接到命令，大家克服一切困难，不停地沿着向南的一条石子马路疾速前进，经过沭阳，到达淮阴。

淮阴是韩信的家乡，也是韩信被刘邦封侯之地。可是谁也无心参观这个地方，5000多干部都自觉遵守纪律，一股劲儿地只顾行军、赶路，那一天行军也不下40公里，但同志们无一人叫苦，咬紧牙关，坚持不掉队。特别是那些女同志更是艰苦，既无车辆，又无牲口，无法照顾她们。她们就和男同志一样步行，始终跟着队伍同步前进。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大概走了一星期到10天左右，队伍到达了扬州这座名城附近，并作了短暂停留。

扬州的国民党军和行政机构大部分已逃亡江南，只有一个团留守在那里。只打了一阵儿，敌人就退过江去了。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利用小船、木筏及各种渡江工具悄悄开始了渡江，等到敌人发现，为时已晚，所向披靡的解放军勇士们枪炮齐鸣，一举登上岸去，杀得敌人溃不成军，除被俘虏一大部分外，其余敌军都狼狈地继续往南逃窜。

南下干部队伍到达江边后，4月21日这一天都在到处寻找过江工具，仅有的几只木船，已不济事，仅仅山东4个支队就两万多人，着急赶着过江随军建立党政军政权，因地方上不可一日没有政权，人民的事情要有人管，新解放的城乡要有人管，军队的吃住要有人管，地方的散兵游勇要有人清理，土匪特务要剿灭肃清，这一切一切，都急需南下干部队伍去办理，所以过江真成了燃眉之急的大事。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在去镇江方向，找到一只约有3000吨的轮船，船上的工人都很好，都乐意帮助解放大军运输、过江。21日夜，南下干部渡江开始，等到大部分干部队伍过江时，天已经亮了。正当刘格平带队再要登船时，临时纵队政委温阳春因怕天亮敌机来了同志们安全无保障，就和刘少卿发生了争执，不同意白天过江。而刘少卿则更着急：“白天不过江，就无法赶上大部队，而前方又要干部赶紧到位，不过怎么办？”

他们两个各执己见，都希望说服对方，后来又都把目光转向了刘格平。鉴于当时的紧急情况，刘格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白天是有危险，但是必须尽快过去。”

温阳春见刘格平也同意过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下令上船。最后剩下的5000多人都上了船，只是马匹没能上去，留在了后面。

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因刚刚发生过战事，商铺的门面都紧紧地关闭着，街上冷冷清清，大清早看不到一个行人。

在镇江，接到命令，要南下干部纵队火速开到丹阳。但是几千人还没有吃早饭，需要立即解决早餐问题。这下忙坏了后勤的同志，他们费尽周折，找到一些做饭的地方，仍旧用在老解放区的办法，自己不带锅灶、炊具，不带粮



食，走到哪里，借用哪里老百姓的炊具，吃粮用各村的储备粮，吃完后打一个借条，由政府和管粮秣的同志和村里结算，但现在到了这里，情况有了变化，粮食得到粮店去买，做饭得挨门挨户去求市民帮忙。这里还有个难题，就是城市居民和农村老百姓不一样，一家一口大锅，做饭很快，而是一户户地都使用小饭锅，用这样的小饭锅，做了够一个班的人吃是算不错的了，可也没别的办法，只好一锅锅地快做，总算把这顿早饭对付了过去。

这时，鲜红的太阳已高悬在天空，放射出万道金光，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各铺面门市也都开了门。许多市民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一看天下已变了颜色：满街都是身穿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和红旗。那些横行无忌的国民党官兵们，可恨的宪兵、特务、伪警察们，一夜之间都完蛋了、垮台了。回想蒋介石政权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起，到今天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苟延残喘存在了22年之多，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受尽了欺压，如今人民翻身解放当了主人，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人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黑暗的被压迫剥削的日月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照片

新华社4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出通稿，由上级电报转发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以电报形式转发的毛主席这首诗，气势磅礴，号召全军要继续乘胜前进，奋勇追击；要坚定信念，将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渤海区南下干部组建的这个新区委班子，是原来准备分配到皖南工作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行军到达淮阴的会议上，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宣布，渤海南下干部纵队的大部分人要分配到浙江去工作。渡过长江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和吴宪来接收了第一、二、四、五共四个地委班子到浙江去。随后在路上，第三地委又有3个县被调到福建。这样，剩下的只是3地委的7个县和行署、区党委直属单位和军区，共计有1000多人。

到达丹阳后，华东局组织部长兼三野十兵团政委张鼎丞当面通知刘格平和周贯五说：“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任命舒同为校长，刘格平为副校长，但日常工作由刘格平负责。”刘格平知道，因为舒同的主要工作是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所以自己必须要多挑担子。

接着，张鼎丞转身又问周贯五：“你怎么样？”

周贯五则表明了自己仍想在部队工作的态度。

遵照上级指示，刘格平积极筹备建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上报批准的学校领导班子的任命是：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任校长，刘格平任副校长，冯乐进任秘书长，李文任组织处处长，陈放任教务处处长，刘冠英任副秘书长。校部设有教务、组织、秘书、行政、卫生5个处。学校下面编成3个大队，除华东军区的同志另行分配工作外，把渤海区党委的干部、行署干部、原第三地委书记王乐三和第三地委的全体干部，将近千余名，编为第三大队，下面再分若干中队、班等。除了集训现有干部，准备进到上海后，接收训练大批失业工人、失学的知识分子，作为新解放区培养干部的来源。当时，上级给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任务是训练10万人，并让找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刘晓商议要些干部，参加学校的管理和训练工作。刘格平找到刘晓说明了来意，但刘晓却说：“那些同志对于你们没有什么帮助，他们革命热情有，但作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不成。”刘格平看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配备现有的干部先干起来。

5月上旬，校领导班子和全体办校人员乘火车到达了苏州城北的陆墓镇。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此宣布正式成立。这个镇子大约有5万多居民，南面紧挨一条小河，河中船只来往不断，真是江南水乡，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名不虚传，何况背靠有名的苏州，更是风景甲天下。可是由于学校刚成立，很多工作还等着去做，所以校领导一点儿想参观的心情也没有，一门心思抓学校



建设。当时上海还没有打下，因国民党军在上海周围修建了许多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坚固易守，使我军的第一次攻打未能成功。第二次打上海时，我军先用重炮一个一个打掉这些碉堡炮楼，使敌人没有力量来掩护和抵抗，解放军在猛烈的冲锋下，很快打进市内，解放了上海。

在陆墓镇期间，为了使这些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干部，能够在人称“大染缸”的上海这座帝国主义经营多年的十里洋场中一尘不染，站稳脚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全体人员集中进行了学习整训。主要学习了入城纪律12条、约法8章、城市管理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教政策等文件。还专门组织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著，特别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请上海的同志介绍了上海人民一般的日常生活方式。经过学习整训后的全体干部，有了较好的精神准备，对办好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完成上级党交给的光荣政治任务充满了胜利信心。

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于6月也由苏州陆墓镇搬进上海。校部先在多伦路一个逃亡人家的房子里临时住下，刘格平也住在了这里。这所住宅是3层楼，大小有七八间房子，和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原住处同一个巷子里。鲁迅先生的住处在巷子的尽头，房子样式和校部住的这家房子一模一样，其中3楼过去瞿秋白也住过。刘格平的爱人丁磊带着女儿立华奉命南下，一家3口人在这里临时安了家。丁磊没顾上休息，立即投身到华东革命大学的招生、开学筹备等各项工作中去。解放军一进上海，就立即把鲁迅先生的这一原住处保护起来。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人员全部迁入上海后，整个校部设在位于四川北路同济大学，同时也在那里设了招生处。在贴出招生简章后，即开始招生报名工作。当时第一期招生简章是这样制定的：

一、宗旨：本校以适应目前形势发展，培养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干部为目的。

二、科别：本校分设本科及预科两种。

三、报考资格：

1.品质优良，思想纯洁，愿为新民主主义建设而服务者。

2.具有高中毕业以上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3.年龄一般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者。

4.身体健康无病疾和无不良嗜好者。

5.不分性别，男女兼收。

四、名额，第一期暂定5000名。

五、报名手续：

1.交检毕业证书（或肄业证明书和社会服务证件）。

2.填写登记表。

3.交一寸半身相片两张。

4.依时到本校指定地点报名。

六、考试科目：1.语文；2.数学；3.社会科学常识；4.自然科学常识；5.口试；6.体格检查。

七、报名地址时间和考试日期：

1.报名地址在上海。

第一报名处：四川路底复兴中学。电话：（02）62022。

第二报名处：永康路务本女子中学。

第三报名处：梵皇渡路圣约翰大学。

2.报名日期：由7月10日起，到7月25日止。

3.考试时间地址：另行通知。

八、修业期限暂定半年：

1.预科或本科主要按学历程度及考试成绩为分科标准。

2.一般的（1）高中毕业至大学一年级或同等程度者入预科。（2）大学肄业一年以上或相当政治文化程度者入本科。（3）预科修业期限3个月时，或成绩优良者，可转入本科。

九、学习课目：

（一）必修课目：1.教育方针；2.改造学习；3.革命人生观；4.知识分子问题；5.社会发展史；6.中国革命基本问题；7.新民主主义政策；8.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二）本科：除以上科目外，另加哲学、政治经济学及马列主义学说。



(三) 上述课目除依次上课讨论外，另拟组织专题报告，如有关形势问题及政治、经济、军事、文艺、教育、新闻、财政、金融、工商、城市接管、工运、学运、妇运、青运、农运、新民主主义政权、外交、法律、交通等专门课目，由本校聘请专人讲授。

十、修业期满，按学习结果，分别介绍到各地各部门分配适当工作。

十一、待遇：经考试录取者，除被帐及日用品自备外，一切膳宿、服装、学习用品，均由本校供给。

十二、校址：上海。

招生简章一贴出，哎呀！真是不得了，应招报考的人太多了，仅大学生、留学生、同等学力的知识分子，经过四五天紧张的考试，就招了5000多人，借用了复旦、同济、光华等大学，还有几个中学做校舍，都用稻草搭地铺，挤得满满的。就这样，应考的人仍旧很多，再招收1万人，生源也不是问题。但因实在没有地方，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校方只好都婉言谢绝。好在二野在南京成立军事大学，招收大批知识分子，上海有些知识分子就跑到南京去应考，一般的都被收下了。在上海有几万失业的知识分子，具有各种的知识才能，对建设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很有用的人才。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招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开学了。8月上旬，学员入校，注册报到，中旬，正式开始学习。因是暂借的校舍，学习设备一无所有，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每人只印发了十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学习参考资料，其中有《改造我们的学习》、《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论自我批评》、《中国职工运动与当前任务》、《农业建设问题》、《论工商业政策》等等。

开学典礼是在学习开始后举行的。8月28日下午，虽然天下着蒙蒙细雨，但是在光华大学附中广场举行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届开学典礼却隆重庄严，气氛热烈。全校5000多名师生冒雨集中在操场上，和华东局领导同志及文化界有关知名人士共同庆祝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建立和开学。会上，华东局有关领导饶漱石、舒同、冯定、范长江等同志先后讲了话，要求大家参加革命学习，要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理论与实践一致，勇于自我批评，树立老实作风，过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好政治关、组织关、思想关，要经得起考验，向工农兵学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勤务员。舒同校长在讲话中不但着重讲了学校的性质、任务和方针，而且指出了学员们应采取的正确学习态度，要求学员们在学习上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过学校短期训练，还要到工厂、农村学习，在实践中锻炼、考验自己，熟悉工农生活，考验学习的东西是否正确。在具体工作中去贯彻党的政策，再回到学校来进行学习和总结。这样，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大会最后还由第九兵团军乐队和学校文工团演出了精彩节目，整个会场欢声雷动，掌声迭起，群情激奋，热气腾腾，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开学典礼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钟，才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开学典礼结束之后，饶簌石找刘格平，刘格平看到舒同也在。饶簌石说：“根据中央指示和毛主席的部署，我华东三野准备随时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台湾解放后，台湾的政权需要立即接收，华东局向中央提出的解放台湾后的政权接管人员名单已经中央同意，由舒同担任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台湾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班子，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进行组建，这是给你们的新任务。所以，你们要侧重从这方面开展工作。”原来，早在1948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就电令华东的第三野战军，必须把解放台湾列为重要的作战目标之一。1949年初，中央又要求华东局，必须考虑台湾解放后的全面工作。这件事对刘格平来说，虽然感到十分突然，但他没有丝毫犹豫，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只是，后来因种种原因，解放台湾的意图未能实现。

接受新任务后，刘格平安排学校对全体学员的政治情况进行了摸底。为了加强对这些学员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政治学习的内容选了若干毛主席的文章，如《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学风不正的主观主义，党风不正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不正的党八股，以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还有些是有关时局的文章。这些在学员们看来都是很新鲜的，因而都学习得很认真，都能结合自己的思想，通过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比，思想上有了明确认识，觉悟也明显提高。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暴露了大量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学员们的学习和进步，刘格平特地请来陈毅市长为师生们作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形势报告。陈市长在报告中，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革命大学的宗旨以及青年人的前途、责任和自我思想改造，并对广大师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指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在各大学的基础上，进行短期的革命训练，学一些必需的知识、理论、政策，使学员到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人才，以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要求。陈市长最后号召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方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在不久到农村、工厂、军队、学校参加的实际工作中，进而反复的学习与工作，逐步提高本领，为人民造福。陈市长的报告，联系实际，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富有风趣，使广大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顿感耳目一新，心胸开阔，解决了许多糊涂认识，坚定了革命信念，对新中国的前途和建设充满了信心。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从5月开始筹备办学，到8月正式开学，都是借用各大中学校校舍，那是因当时战事紧张，各大中学校都放了假。可是到了8月底9月初，各学校都要开学了，借用的校舍就必须搬出来。但是，这么大个学校，这么多人，搬到哪里去呢？刘格平找到三野暨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要求解决这个问题。饶漱石批示副司令员粟裕给解决房子。粟裕很为难，说他们也没有空闲房子。是啊，军队那么多人，哪会有闲房？让刘格平到苏州去找韦国清想办法。刘格平便和警卫员带着行李乘火车到了苏州。到苏州已是晚上，城门已关，不让进城。刘格平又找不到住处，无奈只好又回到哨亭，请哨兵给韦国清司令部拨了个电话。他们说是参谋长接的电话，说房子不好办，也是表示没有办法可想。这样，刘格平就在那个哨亭坐了一夜，第二天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刘格平又去找了陈毅市长，陈毅说，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一定要解决好。其间，陈毅又询问了刘格平的家庭状况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年底，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1期5000多名学员毕业，奔向各级党政军建设岗位。

**被陈毅推荐参加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被毛泽东称为回民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首届中央人民政府65个委员刘格平位列其中**

就在刘格平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千方百计解决校舍问题的时候，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刘格平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8月下旬，在赴北平的火车上，刘格平随陈毅同行，说起创办学校之事，陈老总开玩笑地对刘格平说：“你把为学校找房舍的难题交代清楚了吧？革命自有后来人，他们会办好这桩事的。这次你到北平，可能要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了。”



1952年，中共中央任命刘格平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这是刘格平在中央民委院内留影

是陈毅推荐刘格平为回族代表。在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有人反映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太少了。陈毅觉得在山东时新华社报道就对刘格平有回民领袖之称，他又是老党员，于是向中共中央推荐刘格平为少数民族代表。

刘格平是陈毅的老部下，他审查过刘格平的历史，知道山东回族群众夸刘格平是“回民领袖”，但他并不是山东人，而是河北沧县人。刘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回民大地主、开明人士。他于1922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受党团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秘密发展组织，建立了津南第一个团支部。1928



年6月，在进行地下工作时，因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密刘格平被捕，被判刑3年。在监狱里，他英勇不屈，还发展了好几名地下党员。1934年4月，他在发动武装暴动时再次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以政治犯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再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于1944年4月因减刑为10年而出狱。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后，他出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7年10月，刘格平被华东局任命为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城工部长。刘格平率南下干部一路支前参加渡江战役，直到上海，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表现都很优秀。在经历过3年游击战争、8年敌后抗战的陈毅看来，刘格平是一个很忠诚、有骨气的共产党员，一个有影响力的回族革命干部。

陈毅对刘格平的了解和考察是深透的，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刘格平也是有印象的。特别是对于他的革命经历、在狱中的



1953年，朱德（前排右6）、彭泽民等领导视察民委工作时，与民委干部合影（右4为刘格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斗争和在回民中的威望是了解的。这次筹备新政协会议，中共中央接受了陈毅的建议，提议由刘格平担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选。毛泽东听说代表中有蹲过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几个同志，马上约刘格平等谈话。

9月初，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已齐聚北平。

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刘格平开始算共产党员山东省的代表，和其他山东代表一起住在前门大街内一个小旅馆里。几天后，又将他改为少数民族代表，搬到了东城区大佛寺大街“大取灯儿”胡同3号。这里原是清朝僧格林沁亲王的府邸，日本侵略中国时，大汉奸齐燮元住过，临解放前，又住过一个国民党的什么要人。房子是古色古香的，红大门，进门往左一拐就是走廊，第一层是客厅，里面已经现代化，有卫生间，有暖气；再往内院走，是一个四合院，这是给少数民族代表住的地方。赛福鼎·艾则孜和新疆另外一个代表住在正面前厅。刘格平住在北面四合院靠近西头比较好的房子里，外面两间，是个客厅，既可接待客人，又可以办公，里面是卧室，旁边是卫生间。

除刘格平和新疆的两个代表住在这里外，乌兰夫、奎璧住在大佛寺大街内蒙办事处，天宝（藏族）、覃应机（壮族）、朱德海（朝鲜族）、田富达（台湾高山族）、张冲（彝族）、载涛（满族）住在北平家里，扎西（藏族）、朱早观（苗族），还有杨静仁（回族），住在外面一些地方。

来北平参加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同志，不论是从上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都是穿着又大又肥的2尺半军衣，级别职务高一些的干部穿的是细布军衣，也有的还穿着粗布军装，但都是一副标准军人的装束。刘格平穿的是一套细布黄军装，脚上穿着丁磊亲自给他做的一双绷着黑包头的布底黄布鞋，穿起来很舒服。到北平后，中央给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发了一套粗哗叽衣服。刘格平自己又花了两元钱买了一双皮鞋，这样穿起来，虽然比不上民主人士，但在大城市中也不算凑合了。其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刚到上海时，那里的妇女穿绸缎旗袍的很多，可以说是普遍的。可是到了他离开上海时，虽然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不但妇女穿旗袍的少了，男人穿西服的也见不到了，可以说上海的男女在衣着上都向共产党靠拢了，都“八路化”了，可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变化呢！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刘格平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主席团，而且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

第一次主席团会议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开的。在主席团会议上，刘格平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心中非常激动。特别是领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在和刘格平握手时，亲切地说：“你是回民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问他：“你是回民，不吃猪肉吧？”<sup>①</sup>

“不吃，是习惯问题。”刘格平恭恭敬敬地回答。

“要注意保持回民的生活习惯，要告诉我们的回民共产党员允许他们不吃猪肉。”毛主席的高声话语使大家都笑了。

通过参加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最后阶段的筹备工作，刘格平知道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全过程。

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应该说是从1947年10月就开始了的。这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主席多年来的一贯主张，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2月，毛主席在他对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再度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并且清晰地指出了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必然胜利的前途，申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与政策。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后来各党派响应中央提出的1948年“五一”口号奠定了基础。

自从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迅速变化，发展是很快的，可以说是比预料的更快。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经济日益破产；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成

<sup>①</sup> 《刘格平文集》，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9页。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功，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的高涨，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已达到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出了号召，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提议，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划时代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5月5日，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几个党派组织，联合致电毛泽东同志，表示拥护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自1948年8月起，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与中共中央共同进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从国民党区和香港进入解放区哈尔滨的各民主人士，对于成立新政协及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获得了共同的协议。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人民解放军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大进军的命令，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新政协筹备会于6月15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历时5天。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人。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的整个进程，充分显示出和谐团结的气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选出了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均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条例；（三）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四）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



对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与人选问题，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和拟定的。

1949年8月下旬至9月初，新政协委员们分组对会议的主要文献和决定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协商。在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时，不知谁提出了对其中的民族政策部分有意见，中央便把少数民族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开会座谈，征求意见。先是朱德到会谈了一些意见，随后少奇也来谈了一些意见，接着便征求大家的意见。刘格平便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四条内容都是好的，关于民族政策方面基本东西都有了，但是《共同纲领》只是个大框框，不可能搞得很详细，会后各地可以依据这四条拟制细则。刘少奇表示同意刘格平的看法，随后又询问了别的同志，见没有谈什么，便又给大家讲了一些道理。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少奇的意见，结束了这次座谈会。大家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民族代表的意见，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优良作风，体现了统一战线、民主建国的思想。

主席团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共同纲领》，有时也讨论人事安排。每天都参加会议的刘格平学习到不少东西。有的问题，往往一直会讨论到深夜。在讨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包括人事安排时，中共中央考虑得是很周到的，不但是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主，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个不同学派都考虑到了。如张东荪被列选为人民政府委员，清朝海军元老萨镇冰被选为政协委员，起义人员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国共和谈代表张治中、黄绍竑等也都给予了安排。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从各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到、细致，从共同纲领，到人事安排，既有原则性，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7个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只占4个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高岗；民主人士占3个：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执政的共产党只多了1个人。在中央人民政府65个委员中，共产党也是只多了1个人。刘格平作为回族共产党员，也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即使如此繁忙，李维汉仍多次抽出时间，来到少数民族代表的住地看望代表。他还特别拿着《共同纲领》的讨论稿，就涉及民族方面的条款逐条向刘格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平进行讲解。李维汉自1947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可以说是民族、统战工作的专家。他在延安亲自主持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对回回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刘格平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特意将此书在渤海区翻印。这次他们相聚北京，共商中国未来发展大计，对刘格平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李维汉对于民族问题可谓是呕心沥血，他很认真地向刘格平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发展构想，然后诚心诚意地听取刘格平的意见。刘格平在华东局党校学习时，就曾对党的民族政策做过研讨。他知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在建党初期，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党早期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是主张联邦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这次听了李维汉的讲述，他们对一些大的问题进行了反复沟通和探讨，往往一直会到深夜。最后，他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期间，李维汉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也向中央提出：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分多，居住分散且人数多寡悬殊，不宜学习苏联的联邦共和国制度，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毛主席和党中央认真听取并考虑了李维汉、刘格平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共同纲领》之中并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获得通过，其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国家又发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刘格平亲历了这一重大决策的全过程。他切身体会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民族代表的意见，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优良作风，体现了统一战线、民主建国的思想。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60年，有人竟指责刘格平“过分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分裂祖国的行为”，并以此作为他“反党”的罪行之一。在北平开会期间，除东北、华北地区全部解放外，在西北、西南、华东、



华南的部分地区还在进行着解放战争，西南大部还没有解放。毛、刘、周、朱等一面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一面还在指挥着战争，不断取得一个个胜利，解放一座座城市，每天都会收到从前线传来的捷报，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扩大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名表名。额。

历时3个月的筹备工作胜利结束，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会议。

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热望的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9年9月21日晚7时于北平宣告开幕了。这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盛会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门前，悬着墨绿色飘带的五颜六色的气球，为大会增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门两侧，迎风招展的数面彩旗，欢舞着迎接各位代表的光临。会场更是布置得庄严隆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巨幅会标横悬在主席台上方，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悬挂在主席台的后幕上，会徽下方悬挂着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再看会场内，灯火齐明，如同白昼，玻璃灯、水银灯等各种灯光交相辉映，瑰丽多彩，耀眼夺目。整个会场内外，张灯结彩，布置得既庄严又喜庆，到处焕然一新，使得怀仁堂这座古老的建筑，显得富有朝气，生机勃勃，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

晚7时，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随着军乐队演奏的那高昂激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会场外惊天动地的54响礼炮，心情激动的全体代表在起立中热烈鼓掌，共同庆贺大会的胜利召开，掌声经久不息，长达5分钟之久，可见当时会场内的热烈程度。

接着，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毛主席首先指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并扼要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



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会议上讲话

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详细地一一叙述了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之后，以他那清晰洪亮、令人精神振奋的声音宣布道：“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席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最后，毛主席代表全中国

人民信心百倍地、不容置疑地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主席在这篇开幕词中，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当前及今后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激动人心，令人鼓舞。这个不太长的讲话，常常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据有人统计，整个讲话代表鼓掌竟高达41次之多，有的掌声长达4分钟。刘格平当晚把双手都拍红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日开幕，9月30日闭幕，历时10天。它不愧为新中国的开国盛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崭新的组织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在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专门制定了一章4条为“少数民族政策”（第六章），为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制定了方向。其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第5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



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51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53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格平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的身份发了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全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基础上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主平等的时期，我们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真正平等地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先生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这次政协会议的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三个文献中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少数民族在内）长期斗争所得到的成果，我们觉得这三个文献是中国人民的灯塔，我们各少数民族要百分之百地、全心全意地拥护它，执行它。”

各个少数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整个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的。

10月1日，刘格平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

从1948年底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覆灭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速消灭着已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通电起义。全国大陆除个别地方外都已解放了。

### 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川康云贵开展解放初期民族团结工作，为新中国民族关系的确立和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后，根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任命李维汉（罗迈）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和赛福鼎·艾则孜为副主任委员，还有22名委员，共同担负民族事务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如何让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偏僻山区、边疆大漠的少数民族，感受到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成为毛主席考虑的重要问题。1950年春节过后，毛主席就找李维汉、刘格平征询意见。最先提出来的想法是邀请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代表团进京观摩以加深感情、促进了解。但刘格平觉得，如果仅仅请少数代表来京，可能多数仍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难以惠及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有一定效果但不会很大，他直言不讳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很认真地听完意见，当时并没有表态。不久，刘格平接到中央的通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组建民族访问团前往祖国西南、西北边陲，宣传民族政策，慰问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同胞。派遣民族访问团，是建国之初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做出的重大决策之一，它为新中国民族关系的确立和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基础。

1950年1月初，刘格平率中央民委工作组赴山东回族聚居区了解回民生产、教育情况。2月1日，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研究班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副主席、



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和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到会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民族政策，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4月30日，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研究班结业典礼上，林伯渠、乌兰夫、刘格平到会讲了话。6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目前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宗教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

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格平在参加会议期间与毛泽东主席相遇，一见面，毛主席即热情地问道：“首席代表先生<sup>①</sup>，这次有劳你了，准备得如何呀？”因为刘格平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曾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的身份做过大会发言，所以毛主席这样称呼他。刘格平知道，毛主席说的是民族访问团这件事。他向毛主席表示，一切准备得很充分了，大家精神饱满，信心很足，一定能圆满地做好这项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起初，刘格平以为毛主席不过是随便问一下而已，谁知几天以后，在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临近闭幕时，毛主席亲切会见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及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副主任，他在听取了李维汉主任关于民族工作方面的汇报及刘格平关于访问团的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与我们有隔阂，对我们有误解，加上西南残余国民党匪帮的捣乱和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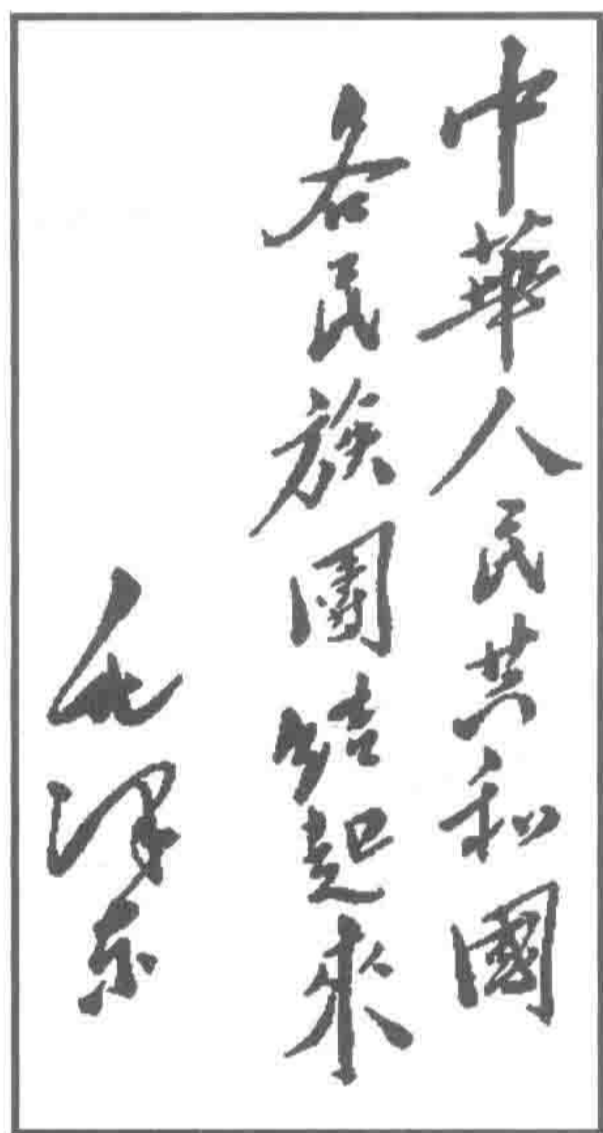


刘格平受中央委托，于1950年组织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遍访西南各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转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怀。这是刘格平团长向康定喇嘛赠送毛主席像

<sup>①</sup> 《百年华诞刘格平》（马鼎辉主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版。1994年7月21日，刘格平作为国内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你们不可掉以轻心。毛主席还说：你们又是很光荣的，因为你们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希望你们能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作一个良好的开端。毛主席指示：访问团一是要依靠当地军政领导；二是一切工作要坚决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三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犯下的罪恶，要赔礼道歉，要说对不起。毛主席担心大家不理解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我们既然有勇气从反动派手中接过整个国家这个烂摊子，当然也要有勇气接受欠债了。要向少数民族兄弟说



应刘格平的请求，毛泽东为中央派出的西南访问团的题词

一声：‘对不起’，要把过去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的历史宣告结束。”毛主席的一席话，展示了人民领袖的博大胸襟和气魄，使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都豁然开朗。

过了几天，周恩来总理又亲自来到了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访问团领导研究了工作原则和一些具体问题，最后确定了访问团出发的时间。周总理还特别带来了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14个大字，苍劲有力，渗透着毛主席对祖国的挚爱和对各族人民的寄托。

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出发之前，文教委、民委、文化部先后为访问团举办了欢送晚会。李维汉、王维舟、邓颖超、郭沫若、沈雁冰（茅盾）等领导出席了晚会。

1950年7月2日，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访问团一行120人，其中还有文工团、医疗队，大家带着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嘱托，满怀激情地出发啦！同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社论《送西南访问团》。一行人先乘火车到武汉，再乘船到重庆。

团员的组成是多样化的，年轻人多，少数民族多，是一批满怀激情和热情的有生力量。当时，如胡松华，只有十几岁，是蒙古族歌唱演员；再如马国华



是回民干部，也只有十几岁。团员中有丁磊的名字，这是组织上专门研究确定的。因为她有双重身份，首先是一位有一定资历的少数民族干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她泼辣、能干，虽是女同志但她能吃苦耐劳，一定能完成艰巨的访问任务。另一个身份，她是团长夫人，团长刘格平已不算年轻，牢狱生活使他身体受到摧残，生活上需要有人细心照料，丁磊是最合适的人选。组织上把照顾刘格平作为首要任务交给她。丁磊这时也只有24岁，她那开朗、活泼的性格，很快得到大家的喜爱，在团里结识了不少朋友。

访问团第一站目标是重庆。行程刚开始，大家异常兴奋，一路上欢歌笑语。很多同志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坐轮船，不乏有人晕车、晕船。随团医生准备了晕车、晕船药。但由于路途遥远，那时蜀道难，四川和重庆连一寸铁路都没有。从北京到重庆足足走了半个月，每个人都感到劳累疲乏。

当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委主任王维舟率领的当地党政军各部门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团部就驻在西南民委，其余人员分散在各学校。第二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王维舟等领导会见了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人，并设宴款待了大家。宴会席间，邓小平起身举杯，朗声提议：“大家举杯，预祝圆满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干杯！为民族大团结干杯！”访问团的同志们一起举杯相应，情绪十分高涨。

此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邀请访问团参加完会议再开展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为民族访问团的到来，专门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即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也使访问团同志深受教益<sup>①</sup>。

重庆是世界闻名的山城，抗战时期曾是中国的陪都。丁磊心目中的重庆是神秘而厚重的。在重庆，国共两党都曾留下深刻印迹。红岩村在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著名共产党人都在此生活和工作过。国民党在重庆关押和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我党无数的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的江姐江竹筠就是其中之一。建国

<sup>①</sup> 《中国档案报》彭清一：悠悠岁月，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赴大西南的难忘日子。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后，回到各族人民手里，大家都有想深入了解它的一份期待。尤其刘格平、丁磊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共产党员感触更深，对国民党反动派刻骨铭心的恨、对革命先烈的崇敬、爱戴交织在心头。

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交给的任务，刘格平抓紧时间、召集全体团员做了访问前动员报告，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刘格平首先传达了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指示：一、要依靠当地党政领导；二、一切工作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愿做和不喜欢的事；三、对于反动统治者过去对少数民族所犯的罪恶，要赔礼道歉，说声“对不起”。刘格平再次阐述访问团肩负的使命就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意见，试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反复强调每个人要牢记党的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发扬红军长征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圆满完成任务。还要注意安全，不要单独行动，一定要在胜利完成任务后，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地返回北京。

访问团的队员们都是第一次到西南地区，对困难的想象仍有不足。刘格平就怕大家掉以轻心，出现纰漏。

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结束后，访问团分为3个分团：第一分团去西康，刘格平兼任分团长，冯乐进为秘书长；第二分团去贵州，费孝通兼任团长，杨辛为分团副团长；第三分团去云南，夏康农兼任分团长，王连芳为分团副团长。其余人员分成三部分，随各分团分别出发活动。

刘格平亲率第一分团离开重庆时，在两路口雇了两辆商车，警卫人员坐在车顶上，团员坐在车内出发了，目标是西康。在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车辆行至简阳地区出了车祸。汽车走在狭窄的路上，拐弯时方向盘失灵，汽车翻到沟里，这正是刘格平所坐的车。幸好，刘格平没事，被从驾驶室里甩了出来。车里其他同志受了伤，刘格平顾不上管自己，爬起来、爬出沟、跑到路上去拦车。正好来了一辆军车就赶快把伤员抬上车，送往医院抢救，其他人员进城待命。刘格平送完伤员先进了城，见团员们还没到，他一直站在城门口等着。团员们的车赶到时，远远看见他焦急地在城门外等候，大家见到他，首先关心团



长有没有受伤，也更担心受伤的同志有没有生命危险。晚上刘格平辗转反侧，丁磊也一夜难眠。丁磊是怕刘格平受了内伤忍着不说，问他：“到底怎么样啊？从那么高处摔下去，真让人担心死啦！”刘格平安慰她说，真的没事，骨头肯定没断，又没有出血，没事，摔了身



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在雅安召开回族人士座谈会

上疼是正常的，千万别小题大做。后来，全体团员休整一个星期。除去送医院治疗的，其他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刘格平还和往常一样，丁磊这才放下心来。

8月9日到达成都。成都是天府之国四川省的省会，是西部工商业城市和文化化的中心。商业繁荣、气候湿润、风景美丽。有著名的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古迹，民风淳朴，喜欢喝茶，唱川剧和摆龙门阵。饮食喜欢麻辣烫，文化底蕴深厚。12日，在成都的一个清真寺里，上千的回族群众集会举行了欢迎会。20多位访问团员参加了欢迎会。头戴小白帽的穆斯林对这些来自北京，来自毛主席身边，和身穿中山装、列宁服的访问队员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欢迎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刘格平赠送了中央领导同志题字一套，毛主席纪念章40枚。

8月17日从新津渡过岷江，过邛崃等地到了雅安，雅安是西康省府所在地，省委书记是廖志高。省委想借访问团之东风，在康定地区成立一个自治区，在西昌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机关政府。因此刘格平等把康定地委书记苗逢



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向喇嘛回敬哈达



1950年11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代表中央在四川康定藏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上致贺词

澍找来，研究在康定地区建立自治区的问题。刘格平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废寝忘食，他被安排住在半山上的的一座别墅里，一下车就忙着做访问工作和建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早饭后开始接见来访代表，同时分别派人到各处去慰问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赠

送礼品，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吃饭，这是最繁忙的一天。

8月23日，刘格平等访问团的负责同志到西康军区司令部参加中共西康省委会议，听取了西康省委领导关于康定地区的情况汇报。

9月3日，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继续参加中共西康省委会议，讨论了西昌、康定两个地区的工作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西康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问题，具体研究了西康省所属藏族地区建立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步骤及相关工作。9月7日，刘格平又一次到会，参加讨论西康、康定两个地区的工作问题。

9月12日，刘格平率访问团，从雅安爬过二郎山前往泸定。这时《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已经流传：

二呀（那）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那）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那）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二呀么二郎山呀，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  
誓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不怕（那）风来吹呀，不怕那雪花飘，  
起早（那）睡晚忍饥饿，个个情绪高。  
开山挑（那）土架桥梁，  
筑路英雄立功劳（那个）立功劳。

二呀么二郎山呀，满山（那）红旗飘，  
公路通了车，运大军，守边疆，  
开发（那）福源呀，人民（那）享安康。

前藏（那）和后藏呀，处处（那）遭灾殃，  
帝国（那）主义国民党，狼子野心狂。  
人民痛苦（那）深如海，日日夜夜盼解放（那个）盼解放。

中国（那）共产党呀，像那红太阳。  
解放军，真坚强，下决心，进西藏，  
保障（那）胜利呀，巩固（那）国防。

……

访问团一行约40人，亲身经历了二郎山的巍峨、险峻、行走困难、气候多变。上到山顶，全体访问团员合影留念。这是人生的骄傲，终生的纪念！

在泸定，访问团集中精力深入调查研究。刘格平6次接见少数民族代



西康藏族群众向刘格平团长献花

表，还分别接见了机关团体代表和工商业代表。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掌握第一手资料。团员们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调查的各种资料。记载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种类。有的民族居住集中，形成自然的自治形式，往往由土司、族长、老爷等统治，一般百姓受多层的剥削、压迫。各少数



刘格平团长向康定喇嘛庙赠送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题词

民族之间有的摩擦不断，生灵涂炭。加上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甚至还存在着农奴制。了解了这些，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民族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更加体会到毛主席、中共中央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英明决策。

访问团往西进发，继续翻山越岭，一路上人烟稀少，几乎一天见不到一个人。8月23日，刘格平率访问团到达康定，受到了康定党政军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时，康定正在筹备召开康定藏族自治州筹备会议。一部分团员留康定，刘格平带领一部分团员赴甘孜访问。甘

孜在康定的偏北方向，在成都的西北，居住的大多是藏族，离西藏最近，是通往拉萨的主要通道。深入甘孜地区是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更多情况，团结藏族上层人士，有利于康定藏族自治区的成立。

访问团配合中共西康省委经过1个多月共同努力工作，建立了一个专区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康定藏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颁布了“组织条例”，选荐桑吉悦希（天宝）为自治区主席。1950年11月21日，康定藏族自治区代表会议在康定山城隆重召开。天宝致开幕词，刘格平代表党中



1950年，西昌成立了康定藏族自治区联合政府，刘格平（右2）团长参加了联合政府的成立大会并与当地领导同志合影

央讲话、祝贺。整个会议隆重而又热烈。访问团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慰问表演，康定藏汉各族人民充满了喜悦，到处敲锣打鼓，游行庆贺，热闹了一天。在康定，刘格平、丁磊夫妇熟识了天宝。天宝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藏族干部，1937年，到延安民族学院



学习，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后来，刘格平和天宝之间情深谊长，多有交往。

进入12月份，天气转冷。访问团圆满完成在康定的任务后又转向南，到西昌访问。12月1日出发，再次经过泸定、雅安、荥经、汉源、富林、泸沽等地，18日到达西昌。这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乘汽车，有时骑马，有的地方马也上不去，只有步行。一行人历尽了千辛万苦。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带来的艰难，还要提防土匪、特务的破坏、枪杀。这一带曾有不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被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袭击和杀害。

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刘格平率领访问团于12月18日到达西昌。进城后，访问团同志弃马乘车在西昌街上绕行一圈，受到沿街群众的欢迎，锣鼓声、欢呼声，还夹杂着彝族人的吼叫声，响成一片，盛况空前。访问团在西昌休息了一夜，次日便开始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在西昌专区人民代表筹备会议上，访问团的干部坐在来宾席。刘格平团长首先讲话，讲述中央的民族政策，传达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慰问和关怀。会间，少数民族代表对访问团的礼品袋十分喜欢，特别是女同志对礼品袋里的各色丝线和小梳子、小镜子等物品反复把玩，爱不释手。

12月21日上午，刘格平参加彝族及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向代表们进行了慰问，传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宣传了党的政策，并集体合影留念。晚上又参加了中共西昌地委会，研究了西昌专区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讨论研究了区域自治、联合政府和剿匪、反霸等问题，刘格平讲了话。这次会议宣布了西昌专区联合政府的成立。

1951年的新年，刘格平和丁磊是在西昌度过的，正是联合政府成立的日子，到处充满了喜庆。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的活泼、开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团文艺工作者赞扬她有副好嗓子，模样俊秀，应该从事文艺工作，当个演员。丁磊和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等成了好朋友，跟他们学唱歌、跳舞。他们也把她当大姐和朋友（此后许多年，丁磊夫妇和胡松华等访问团员都有联系）。虽然，大家行军、工作艰苦而紧张，可是有了这批年轻的文艺活跃分子，无论多么累，可心情总是愉快的。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丁磊还是十分留恋和访问团



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在四川凉山，向彝族人民群众转达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关怀

队员们相处的日子。她说：“那时，我们都那么年轻，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荒山野岭行军的时候，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一家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那么纯洁！”

西昌会议结束后，访问团在西康的任务基本完成，但尚未进入彝族中心地区，看看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为此，刘格平又带领一部分访问团的同志，越过几座大山，于1951年1月9日直抵昭觉县城。昭觉城是清代宣统2年修建的，是全国兴建最晚的一座县城，也是最小的一座县城。城垣纵横不过百米，城内只有十几户汉民居住，彝族群众住在周围山上。县府在县城中间，有前后两排房屋，中间为一个院落。房屋为县府人员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庭院为开会的场所。在县府住下的第2天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刘格平团长在会上讲述中央的民族政策，传达毛主席对彝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第3天，召开了彝族人民代表会议，有200余人参加，最远有7天路程赶来的。会议进行3天，访问团和县府同志及彝族代表讲了话。会议决定成立调解委员会，订立了《大凉山彝民团结公约》。会上还有访问团赠旗、赠礼等活动。在庭院开会时，群众在门外旁听，连对面城墙上也蹲满了人。会内会外，秩序井然，连咳嗽声都没有，可见彝族文明的特殊风采。

1月17日，刘格平率10余人离开昭觉，先期返回西昌，访问团第1分团其他同志继续在彝族聚居的昭觉等县访问。22日，应中共中央西南局邀请，刘格平



乘飞机经昆明到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2月，刘格平从重庆到昆明，会合访问团第2分团同志，一起在云南进行访问。

后又乘汽车到达贵阳，同第3分团一起，在贵州进行访问。3月，第1、3两个分团会合，同乘汽车抵长沙，换乘火车返京。因为刘格平急于回北京开会，遂乘飞机先期到京。

自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刘格平和费孝通、夏康农以及冯乐进、王连芳、杨辛等组成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深入艰苦的云、贵、川、康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历时8个月的访问工作。在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支持下，访问团向西南各族人民转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问候，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解决各族群众的一些生活困难，极大地鼓舞了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西南地区各族人民，为民族团结、对敌斗争、边防巩固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解放初期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原来的封闭状况或者由土司统治的割据状态，进而成为各级党政领导下的一部分，通过派驻工作组、医疗组等，办好事，交朋友，原来有些民族间相互不信任、相互对峙，很快就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新型民族关系。访问期间，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动植物学家，以及民族干部，不仅在艰苦的工作实践中完成了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期望与重托，而且自己也得以锻炼成长，成为民族工作的领导和骨干，为中国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打下了组织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在访问中，刘格平率访问团在西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康定藏族自治区”（地级），并制定了“组织条例”。访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同时，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分布数量、生活习俗等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为我国最后确定55个少数民族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访问团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做了详细的工作总结和汇报，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是成功的。”

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还为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一些干部，如曾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的王连芳和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刘树生等等，都为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

## 全职主持民委工作，协助习仲勋贯彻中央在新疆和藏族地区的民族政策，稳定了祖国西部民族团结大局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新中国制定出一系列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标志着中国各族人民从此结束了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的痛苦历史，迎来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繁荣发展的崭新时代，也为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按照中央安排，解放初期民族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等同志。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担任国家民委主任的李维汉，其主要工作职务还有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只能每两个星期到民委一次。国家民委副主任中，乌兰夫还兼任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并且依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许多时



习仲勋（右）与刘格平参观清真寺

间不在北京。赛福鼎则在中共新疆分局、新疆省、新疆军区都担任重要职务，毛主席曾专门嘱咐他，要协助王震解决新疆的诸多棘手问题，更不是常在北京。这样，在民族工作上，只有刘格平是全职，主持民委的日常工作，身负重任十分辛苦。那时，不论是乌兰夫还是赛福鼎，每次来到北京，都立即与刘格平联系。乌兰夫还多次向刘格平说：维汉和我不能常在民委，日常工作请你大胆负责。<sup>①</sup>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除了这几位在中央的领导外，刘格平联系较多的，一位是西南的王维舟，他资格很老，是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委主任，有很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毛主席曾亲自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王维舟比刘格平大近20岁，刘格平率领民族访问团到西南，曾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还有一位是西北的习仲勋<sup>①</sup>，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实际上，1950年底，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习仲勋成为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曾对刘格平说过，西北的民族问题最复杂，丝毫不敢懈怠。1953年习仲勋担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秘书长后，对民族工作更加关心，刘格平与他的联系也更多了。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他们配合默契，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他们协助毛主席、中共中央处理新疆和西藏的问题，都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典范。

1949年4月23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解放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这时，新疆的问题也摆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面前。

新疆的问题比较特殊。早在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区的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建立起了民族军和三区根据地，新疆历史上称为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一度曾想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后来又与国民党组成新疆联合政府，

<sup>①</sup>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派到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参加领导两当兵变。1933年后，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参加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和政委。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事件受到立案审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兼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947年新疆联合政府破裂，三区革命一方与国民党一方形成对峙局面。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共派人秘密潜入新疆，首先与三区革命政府取得联系，转达了毛主席的愿望：希望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以使400万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火之苦。还特别邀请三区革命领导人，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又共同策动新疆的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举行起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在取得了解放兰州、西宁、银川的胜利后，以十万大军分兵多路集结于酒泉、张掖、安西一带，直逼新疆。1949年9月，新疆宣布和平解放。这个胜利是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的，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疆和平解放后，一小撮民族败类秘密勾结，四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并裹胁数万牧民，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并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和甘肃。为此，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总部迅即组织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对叛乱进行了坚决的肃清和镇压，保证了新疆局势的稳定，巩固了新疆的胜利成果。

10月1日，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主席还特别批准了赛福鼎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刘格平清楚，在毛主席心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从几次会议和民族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新疆取得的的成绩都表示十分满意。因为，毛主席原来预想，由于新疆问题涉及到的方面很多，解决起来可能并不会很快很顺利。而现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真是令人欣慰。毛主席高瞻远瞩，他由此想到，新疆问题解决了，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指日可待，他同样希望西藏也能走和平解放之路。所以，毛主席曾特别强调，要全力保存新疆和平解放取得的成果，维护好民族团结。对新疆宗教上层人士的利益，暂时不要触碰，新疆的土地改革和牧区改革也暂不进行。毛主席说，我们可以等三年，三年不行就等五年（大意）。毛主席的意思十分明确，在新疆问题上做给西藏看，以我们的宽仁和大度换取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

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1950年4月，赛福鼎在参加完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后，向乌兰夫、刘格平表示，对新疆分局在处理民族宗教方面问题的一些



做法有意见，这影响到新疆的大局，但他感到自己说了不好。而且，那时他的汉语表述能力不是很好，怕说不清楚还会引起误会。乌兰夫和刘格平都知道，一方面，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民族宗教方面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毛主席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毛主席有着周密的考虑。另一方面，以王震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党中央和中共西北局领导下，带领新疆人民和驻新疆部队，使叛乱逐步得到平息、社会逐步趋于稳定、经济建设得以恢复，成绩是巨大的。如今，赛福鼎提出意见，这可是一个难题，但又必须要重视。为慎重起见，他们立即找了到北京参加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新疆分局的同志，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于4月14日向中央提出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中央的批示到达西北局后，西北局十分重视，专门组织了少数民族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纠正了新疆分局的一些做法。

新疆的稳定，推动了西藏问题的提前解决。旧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被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农奴主可以设立监狱或私牢，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刑罚，极为野蛮残酷。西藏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联络西藏地方政府，比照新疆的办法，希望他们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事宜。但西藏极少数上层僧侣和贵族受某些外国势力的唆使，在西藏东部昌都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遂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迫使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均委派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自此，西藏宣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2月，党中央批准将原中共西南局西藏工作委员会和原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合并，组建了统一的西藏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党在西藏的领导机构，进驻拉萨开展工作。

1952年，随着新疆、西藏逐步趋于稳定，在我们的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情绪。1月10日，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就藏族地区土改问题向中央发出电报，大意是说入藏干部要做好民族工作以及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宜进行土改，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报告中还提出：在游牧地区不应该提“反恶霸”口号；在半农半牧地区也暂不进行土改。毛主席见到电报后立即召见了李维汉和刘格平征求意见，李维汉和刘格平都认为习仲勋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还特别指出，应该强调，“暂不宜进行土改”不是不土改，只是条件不具备，少数民族地区有农区，有牧区，也有半农半牧区，情况各有不同，在土改的具体做法上也应有所不同。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政教分开、废除民族歧视压迫制度。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统一称“民主改革”更为妥当，建议中央对此问题能给予进一步明确。毛主席经过考虑后，对习仲勋的电报做出如下批示：“请李维汉、刘格平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sup>①</sup>

在新疆，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为了使新疆的建设发展的更快一点，新疆分局于1952年4月23日致电西北局，提出为促进新疆经济建设工作，在新疆进行土改的同时，也要在牧区进行改革。报告中说，分局拟抽调干部组成牧区改革工作团，在伊犁集中后开赴牧区。实际上，新疆分局在致电西北局的同时，对牧区改革已经开始了行动。

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同日，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西北局复电中指出，目前，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也暂缓减租反霸。

但是，新疆分局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继续向中央陈述和请示的同时，新疆分局又于5月26日发出了《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



定在全疆减租反霸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指示的依据是：一方面广大牧民迫切要求从残酷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农区改革，某些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逃到牧区，甚至与牧区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煽动叛乱，遂使牧区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因此，《指示》同时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牧民群众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还必须在发动牧民的基础上，组织牧民协会与改造牧区的区乡政权。指示发出后，使新疆趋于稳定的局面又出现了波动。当时刘格平所看到的材料显示，有一部分牧民跑到了国外，也有一部分牧主开始煽动闹事，更严重的是，部分驻新疆的部队竟对牧区的哈萨克族人进行了驱赶，这已经完全越出了改革的范围。

因为牧区改革而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混乱，当然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6月中旬，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之前，刘格平接到中央通知，说毛主席要召见他。刘格平赶到毛主席那里时，李维汉、习仲勋已经先到，毛主席正在发火，而且火发得很大，这是刘格平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发火，他悄悄坐在了李维汉旁边。毛主席说：不请示，不听话，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打起仗来要掉脑袋。把我们努力的结果都葬送了，比掉脑袋更严重。能打江山不会做江山，给党脸上抹黑，不是共产党……刘格平听出来，这是在说新疆的问题。毛主席让先开小会，把问题搞清楚，定出解决办法，甚至说出开除党籍这样的重话。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6月18日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新疆分局在接到中央电报后，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通知，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6月19日，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赴会并讲了话。之后，周恩来亲自通知刘格平，请他参加中共新疆分局常委会。刘格平知道，新疆分局的会本来是李维汉参加的，但不知为什么换成自己，而且是总理亲自通知。事后刘格平才知道，参加这个会是与会后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新疆进行善后相联系。

6月28日，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央指派刘少奇、习仲勋、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指出，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还采取粗暴、强词夺理等错误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已经发展到无中央之天、无党纪之法的地步。新疆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与会同志还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再次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按照中央的决定，这次会议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进行了改组。确定由王恩茂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会后，中央委派习仲勋、刘格平到达新疆，与新疆分局的领导一起，传达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检查总结前一段的工作，研究土地改革工作问题及牧区改革的错误善后工作。中央还特别要求，要对牧区进行切实的安抚工作，《人民日报》要给予报道以挽回影响。

7月15日至8月5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由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张宗逊、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副主任刘格平等领导以及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上，习仲勋做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刘格平做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及军队生产、统一战线工作、财经建设、文教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在肯定新疆分局两年多来工作成绩的前提下，批评了新疆分局的工作，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制定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与穷苦牧民的生活”的牧区工作总方针，和“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

在会议期间，习仲勋、刘格平即驱车700公里前往伊犁专署驻地伊宁市，在那里召开了《共同纲领》座谈会，听取了民族宗教人士和工商业者的意见，还到哈萨克族居住区赠送了物资，进行了抚慰。新疆第二届党代会一闭幕，习仲



勋、刘格平又赶赴天山牧场慰问了那里的哈萨克族同胞。<sup>①</sup>

这次与习仲勋同赴新疆，加深了刘格平对习仲勋的了解，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同志情谊。

本来，新疆之行习仲勋可以不去。因为他已经接到调往中央的通知，按照中央尽快到任的要求，他需要回去，去告别自己生活、战斗、工作多年的地方，去交接工作，还要举家搬迁，时间十分紧迫。但他认为，新疆出现的问题他有责任，不能因为工作调动就不管这件事了，不能给接替工作的同志留下麻烦。与之相比，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不过就是个工作变动，还会常来常往的。所以，他坚持一定要亲自去新疆把问题处理好，不能留下遗憾。通过这件事，刘格平从习仲勋身上看到了他敢于担当、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新疆工作完成后，习仲勋邀请刘格平一同到西安，他希望刘格平能再给西北的同志讲讲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其实，刘格平清楚，这不过是习仲勋的谦虚而已。西北地处祖国边陲，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包括藏族问题，也涉及到西北。习仲勋是大西北走出的领导干部，自然对民族工作十分熟悉，从他几次对西藏、新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功底和水平已是一看即知的。但既然习仲勋邀请，刘格平也就答应下来，他笑着说：“真是应了恭敬不如从命这句话。”

8月上旬，习仲勋、刘格平在从新疆返回途中，又顺便检查了沿途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在甘肃省，他们发现定西地区靖远县一个回汉杂居乡，存在不让回族群众当民兵，回族不能当干部等严重的民族歧视现象，当即对此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不久，中共定西地委就此问题向甘肃省委写了一个检查报告，甘肃省委马上将这个检查报告呈报了西北局。习仲勋回到西安后，即刻将这一检查报告向西北五省省委进行了转发并上报给了中央。中共中央于同年9月将其作为《中央批转甘肃定西地委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附件，批转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南局，要求他们通知所属有关地区的党委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检查各有关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较少地区必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52年8月开始直到1953年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2年8月5日、8月29日。



1954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格平任主任。这是刘格平在民族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从这件事上，刘格平再一次看到了习仲勋果敢的处事风格。从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是十分倚重和信任的。

刘格平陪同习仲勋，于8月中旬到达西安，8月14日习仲勋就安排刘格平为西北军区做了一次民族工作报告，刘格平从民族的4个特征、中国民族发展历史、怎样开展民族工作以及民族

政策等方面，深入浅出的讲述，使西北军区的官兵受到了一次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

关于这次习仲勋、刘格平的新疆之行，后来有一些走了样的说法。这些说法把当年对新疆分局主要同志的处理说成是“不适当地夸大了新疆工作中的错误”、“批判过了头”、“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困难”等等，甚至说毛主席并没有要撤换人的意思，言下之意是习仲勋、刘格平在刻意整人。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去衡量当年。当年新疆的极左行为，不仅仅给少数民族带来一定伤害，还打乱了毛主席、党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整体部署，也在国际上（前苏联）造成不良影响。第二，没有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撤换一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的，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最简单的道理。第三，几乎在习仲勋、刘格平赴新疆的同时，即8月9日，毛主席就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紧跟着，在8月22日，新疆举行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正式成立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是包尔汉，副主任是高锦纯、赛福鼎、安尼瓦尔·加库林。这一举措大大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投入新疆建设的积极性，不存在“挫伤干部



积极性”和“后来的工作困难”问题。第四，习仲勋有极强的原则性，但又为人朴实。在新疆问题的处理上，即使有同志多次来找，但习仲勋、刘格平还是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批评从严，使之觉悟”的原则的。但新疆的任务完成之后，在返回西安途中，习仲勋就考虑到，还要做好新疆分局这位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这也是为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解忧。他对刘格平说：“这个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水平低而反映在工作上。人家也是个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咱可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你说是不是？”刘格平也同意他的看法。所以，两人说定，到北京后还要共同向中央陈述这件事情。习仲勋9月一到北京，两人就找了毛主席。他们向毛主席表示，这个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是深刻的，他希望在哪儿栽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刘格平只是明确表示，不一定让这个同志再回新疆了。习仲勋和刘格平去说这件事，是有一定分量和作用的，这其中的道理是因为，新疆的问题，一开始反映出来的，是西北局与新疆分局的分歧，而实质则属违反党的纪律和严重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问题发生后，中央又是派的此二人赴新疆去善后，如果他们不表态，中央即使有想法也肯定是会感到为难的。这才是事实的真实情况。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格平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席此次盛会的有两位最年轻的代表，那就是达赖·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达赖19岁，班禅16岁，他们是西藏选区的代表。他们联袂来京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件大事。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右3）、陈毅副总理（右2）在成都接见达赖时合影（左2为刘格平）



1955年正值藏历木羊年，刘格平（左）、张国华（右）向正在北京参观访问的达赖、班禅致新年祝贺人。

中央专门成立了接待达赖、班禅小组，负责人是中央统战部长兼民委主任的李维汉，还有政务院和各部门的有关同志参加。有关事宜直接请示政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接待组下分几个小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安全保卫、外出参观等等都作了研究和详细安排。民委选派了精明强干、有经验、懂政策的负责人员进行接待和陪同。刘格平被指定为接待和陪同达赖喇嘛的负责人。

1955年3月12日，刘格平和丁磊又陪同达赖一起离开北京，一边参观，一边往四川进发。一路上刘格平给达赖讲社会发展史，讲中国革命史，讲马列主义。达赖很认真地听，同时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格平也结合实际讲解了我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毛泽东主席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殷切希望。

丁磊的任务首先是陪好达赖的亲属，对她们的生活起居予以关照，同时也有政治任务。一路上只要有机会便给他们讲解党的民族政策。达赖的家人非常喜欢丁磊，对她十分亲切，想干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要问她。

这一时期的达赖和班禅，不但在大会上举手赞成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有关政策，通过参观，还表示愿意向先进地区学习，希望中央帮助西藏更快地发展。在成都告别时，达赖对参观访问和刘格平的帮助，都表示收获很多，十分感谢。



## 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实质，以维护祖国统一为己任，接待首次进京的达赖、班禅，并为藏区的稳定和进步贡献力量

民族工作是一项难度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其中，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最为复杂。其共同之处是，两地同处祖国边疆，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而受宗教影响较大；新疆和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却时时刻刻都想着把它们分裂出去；在这两个地区内，既有农区也有牧区，大都处于农牧主统治下的奴隶制社会；新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稳定，对保证祖国的领土完整，最终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共和国，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性。

新疆的民族成分达几十个。在少数民族中，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居多，但回族、哈萨克等族也占很大比例，还有蒙古、柯尔克孜等十多个世居的民族。另外，新疆有三区革命的基础，又受苏联影响很大。

在西藏，藏族占少数民族的绝对优势。公元7世纪传入的印度佛教与当地宗教和文化融合后的藏传佛教，成为藏族主要的精神信仰。明末清初，在朝廷的帮助下，西藏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统一，达赖·丹增嘉措和班禅两个集团，也借助中央政权的支持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把西藏带入了政教合一的时代。清政府册封两个活佛系统，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有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意思。

原本，几代达赖与班禅互为师徒，关系较为密切。到了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列强入侵，中央政权势微力衰，英美帝国主义觊觎西藏的野心日甚，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挑拨下，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关系恶化相互失和。九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世班禅被迫于1924年逃至内地，因返藏受阻，即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自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14年，至1937年12月圆寂。1949年6月，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确认并批准，在青海访得的灵童继任十世班禅，取法名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8月10日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但是，同样经国民政府认可，于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此却一直不予承认，十世班禅仍不能回到西藏。这是当时西藏的现状，也是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好西藏问题，就摆在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面前。

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同苏联特使米高扬谈话中，就谈到西藏问题。他说：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为解决西藏问题，毛主席与党中央采取了多项举措。

毛主席首先想到要做好班禅的工作，以防止国民党将班禅拉拢胁迫至台湾。1949年8月6日，毛主席明确指示正在西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尊重班禅及甘肃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1949年9月，针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分裂的举动，毛主席亲自改写并授权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强决心。

同时，中央采取坚决镇压反革命叛乱并审慎进行民主改革的策略，以确保已经先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新疆的稳定，从另一个角度策应了西藏问题的解决。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以中央政府名义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渡过金沙江，一举解放了昌都。昌都的解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在西藏引起极大震动。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和共产党政策的宽大，加之争取外援无果等因素，迫使跑到国外的达赖不得不派出谈判代表，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预想，走向了和平解放之路。在进行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中，毛主席要求，首要的是必须解决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及十世班禅返藏问题，努力恢复班禅与达赖之间旧有的正常关



系。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中，在确定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改编藏军、中央统一管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等多项原则基础上，还特别设立了“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的条款，并指明“其固有地位和职权，是指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这一切，促使达赖下决心靠向了中央人民政府，更使班禅深感震撼。班禅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时，就向毛泽东和朱德发来贺电，公开表明了政治态度。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班禅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中央政府和达赖政权签署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1951年10月24日，达赖也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至此，西藏和平解放的努力宣告成功。

西藏问题与新疆问题一样，一切都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中。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党中央于1951年12月批准将原中共西南局西藏工作委员会和原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合并，组建了统一的西藏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领导机构，进驻拉萨开展工作。西藏工委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在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西藏工委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又作出周密安排，促进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进行相互间的沟通。1951年9月，十四世达赖通过张经武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返藏回寺，并同意在其进入西藏后沿途各地派乌拉做好运输工作，从而顺利解决了班禅的返藏问题，1952年4月底，十世班禅回到西藏，距离九世班禅当年出走，已经相隔了整整29年。这一举措的成功，解决了半个世纪未能解决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间发生的地位与职权之争，确定了达赖与班禅“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关系原则，实现了藏族人民多年的愿望，令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班禅返藏之后，在关于进一步统一西藏的策略问题上，西藏工委乃至在北京的决策层内，都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达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和班禅的问题上。一种意见主张，应该把班禅集团统一到达赖集团之下，以达赖为主；另一种意见认为，达赖、班禅两个集团代表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大小不同的并列政权，班禅比达赖进步，更应该依靠班禅。

1952年，在办理毛泽东主席与达赖互赠礼品事宜时，毛主席曾问刘格平，你们民委怎么看这个问题？刘格平知道毛主席所问的，是关于对西藏问题的分歧，他作为国家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经常会接触到这些分歧，尤其是自班禅返藏后，西藏工委与中央往来的电报明显增多，其中时有争论。刘格平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深的研究，但毛主席既然问起，只能向毛主席表述自己初步的看法。他分析认为，这两种意见实际代表着西南、西北两个方面的工作，因为西南局方面接触达赖多而西北局方面接触班禅多，这也是历史原因所致。所以，中央做好协调工作十分重要，一切还是听主席的。许多年以后，刘格平回忆：“毛主席听完我的话后，笑着说：就好比下棋，走好前一步，就为后一步打下了基础。和平解放的‘十七条’不是与达赖一方的，班禅也是完全赞成的，它包括统一的西藏。我们促成班禅返藏，是要团结，不是要分治，将来的自治更不是分治，我们有的同志误解了，当了歪嘴和尚。西藏实行前、后藏两个区域分治，搞两个政权，那是过去。今天，我们要用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比清政府做得好，比国民党政府做得好。毛主席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见地，那种神态和口气，展现出的是大政治家的胸襟、是领袖的气魄，也说明毛主席对西藏的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从刘格平的回忆中，流露出他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折服和钦佩。

此后，在毛泽东主席对西藏，对达赖和班禅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讲话中，都可以深深体悟到毛主席为了西藏的统一，高瞻远瞩，用心良苦。在致达赖的信以及西藏问题的讲话中毛主席多次表示，我们可以对西藏和平解放时协议中已经明确的事情，延缓实行。对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毛主席明确指出，“目前几年不实行改革”，“要各方面条件成熟，方能实行”。1952年10月8日，毛主席在接见西藏致敬代表团时说：“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毛主席还说：“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在协议上规定的，但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



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但是，毛主席特别强调，不能破坏《十七条协议》，也就是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否则“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的西藏。”<sup>①</sup>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以恪守统一、爱国为原则，对其他诸多问题作出让步，显示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4年，中央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年6月1日，西藏工委请示中央，希望能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以及已经上报的西藏出席会议的人选尽快确定，以争取达赖、班禅早做准备。6月3日，毛主席做出批示：“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启程，9月5日前（最好是9月1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做部署。”<sup>②</sup>4日，中央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电示西藏工委：尽一切可能争取达赖、班禅同时来京，中央欢迎他们来。（《西藏工作35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6月12日，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拿着西藏工委给中央的回电通知刘格平，中央研究，达赖、班禅进京后分别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副书记范明陪同，请民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并以民委的名义给西藏回电。西藏工委的电文大意是：达赖、班禅同意来京。中央民委遂于6月14日分别致电达赖、班禅，表示欢迎他们来京，同时与西藏工委进行了联系。从这时起，刘格平正式参与了达赖、班禅联袂进京的接待工作。

7月上旬，李维汉、习仲勋又告诉刘格平，中央对达赖、班禅进京后的接待工作重新进行了研究，决定改由中央民委为主，还具体点名由刘格平陪同达赖。这时，达赖、班禅在西藏均即将启程，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刘格平经受这种突然的变动已经不止一次，1952年处理新疆分局的问题，本来是李维汉去的，也是突然变动。凭经验，一定是又有什么棘手的事情，他的心中纳闷却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刘格平想到，我们许多同志在认识上的分歧倒不算什么，因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文稿》第三册692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496页。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为毕竟有毛主席挡着。但还需要熟悉掌握的东西太多，尤其是西藏的宗教和达赖、班禅的承袭情况，还有国内国际的背景情况，对西藏问题的各种认识等等，这与管理工作和协助接待是完全不同的，稍有差错则非同小可。随后，他得知了事情的大致原委：按照西藏工委的安排，分别由张经武陪同达赖，由范明陪同班禅进京。但中央考虑，觉得张经武与达赖接触得多而范明与班禅接触得多，虽然他们都对西藏的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接触的方面不同角度不同而难免在认识上有所偏颇。所以，中央觉得有必要借这次达赖、班禅进京的机会让他们对工作对象进一步加深了解，便决定把他们二人的工作交换一下，由张经武陪同班禅，由范明陪同达赖。当中央把这个想法通知西藏方面后，从西藏反馈回来的情况是，达赖对这件事情有看法，他认为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政务院就这个问题向毛主席直接请示，毛主席考虑后明确：不管是达赖、班禅还是西藏工委的同志，到了北京就都是客人，客人要由主人接待。而且，西藏工委的同志到北京后还有别的事情。于是，接待和陪同的事最后就全部确定给了民委。习仲勋还特别传达了毛主席对此次接待工作的指示，大意是：达赖、班禅不是普通的人民代表，这次他们联袂进京，有着极大的国际影响，更直接关乎着西藏的安定、祖国的统一，必须用最高的规格进行接待。毛主席还强调，这两位活佛虽都属贵族阶级，但都很年轻，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主要的不是反对封建而是反对帝国主义，通过对他们的教育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认识，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不仅仅是为这次接待工作明确了具体方针，而且对当时的整个民族统战工作，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了解了这次变动的原委，刘格平心存的纳闷也就消失了。他认为这次变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对民委的信任，便立即着手，除安排少数同志承担民委的日常工作外，将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投向了达赖、班禅的接待准备之中。

随后，按中央要求，习仲勋牵头成立了专门接待达赖、班禅的两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民委以及政务院各相关部门的同志参加，达赖接待组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副主任刘格平负责，班禅接待组由民委副主任刘春负责。中央要求，有关接待达赖、班禅的重大事宜，直接请示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具体协调由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这两个小组在一起，对可能发生的所有事宜，



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安全保卫、外出参观等，都作了详细研究和安排。其间，刘格平还抓紧准备陪同工作，他安排专人翻阅了许多资料，起草了一份注意要点及对达赖、班禅讲述的内容提纲，因为他意识到与达赖、班禅说什么，还是慎重一些为好。要点和提纲经李维汉审阅同意后也送给了刘春一份，提纲中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精神，主要包括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我国近、现代历史两方面内容，其中，民族政策依据的主要是《共同纲领》和1952年初经政务院第125次会议通过后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为了更好地把握接待和讲话的分寸，刘格平还亲自就佛教问题向赵朴初请教，从多次接触中与赵朴初结下了深厚友谊。刘格平去世后，他的家乡为他修建陵园，赵朴初还专门题写了“刘格平陵园”门匾。

1954年7月11日，达赖由张经武陪同，自拉萨启程，经康藏线赴京。7月1日，班禅自日喀则启程，7月9日到达拉萨后，遂由范明陪同，于7月16日离开拉萨，走青藏线赴京。两位活佛分别带领着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团，达赖一行183人，班禅一行131人，这其中还不包括保卫和运输人员。

1954年8月2日，中央向各省发出“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宣传方针”的电报：“达赖、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进一步靠拢祖国和中央的表现，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汉藏间的民族隔阂仍然很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仍在尽力挑拨西藏和中央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捏造中央扶班禅，压达赖，并且准备以班禅代替达赖），而达赖、班禅两集团间很不和好，并且彼此都怀疑中央有偏袒。因此，在有关达赖和班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的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且适当的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sup>①</sup>中央的这个电文，已经将此次达赖、班禅进京的背景、意义以及对西藏工作的原则方针阐述的清清楚楚，完全贯彻了毛主席的意图。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9月版。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对于达赖、班禅的接待，首要的是安排好他们的住宿。班禅的住处先确定下来，在北京动物园内西侧的畅观楼，是原国民党要员的官邸。这所住宅造型美观、环境幽雅，是接待贵宾的好去处。达赖的住处就不怎么好找，找遍了北京也没有合适的，都不如畅观楼那么可心。有人提议，北京市委在台基厂有一座楼叫御河桥，是日伪时期的日本领事馆，解放后是北京市委的交际处，刘格平立即带人前去考察。这里和畅观楼相仿，都是二层小楼，面积也相差无几。在建筑风格上，畅观楼为日式，御河桥偏欧式，都无须再进行大的装饰，也全都是闹中有静，有花园流水等室外园景。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达赖的住所也很快确定下来。经政务院批准，还专门打开了故宫的库房，从库缎中选了明清皇帝御用上好黄色锦缎，对选中的这两处住所进行了布置。

中央明确，达赖、班禅一行在北京的饮食不定标准，享受一级警卫待遇，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了专门保健医生和护士随侍左右，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考虑达赖、班禅的出行方便和舒适，政务院还特别给他们各配了一辆当时屈指可数的吉斯轿车。总之，一切都很快地准备就绪。

达赖和班禅于9月1日在西安相会后，稍作短暂的休息便一同乘火车，于9月4日到达北京。中央为他们特别准备了专列。

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的阵容很大，除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陈叔通、郭沫若、邓小平、贺龙、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负责接待工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刘春等，还有黄克诚以及章伯钧、吕正操、李德全等各部部长，邵力子、罗隆基、章乃器、许广平、许德珩、马寅初等著名民主人士。因为达赖他们带了家属和许多随从，同时考虑下一步的陪同工作，总理事先批准相关人员可以携带夫人同去，刘格平是携夫人丁磊一道去参加欢迎的。

随行达赖来京的有其母亲、姐姐、弟弟等人，女眷自然由女同志迎接陪同比较方便。刘格平夫妇亲自把达赖和其家眷送到御河桥寓所，并一一介绍了陪同他们的官员以及驻地的情况。因为都是初次见面加之语言不通，彼此都按正常的礼节行事，相互之间只是不停地点头、微笑表示友好和礼貌。

9月5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了达赖、班禅。中南海



是毛主席的住地，远处有巍峨的景山，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高低错落的五座亭台；北海的白塔挺拔多姿，秀立琼岛；中南海景色怡人，一湖绿水碧波荡漾，绿荫中时隐时现的琉璃瓦和红墙与之相映衬，置身其中如入仙境。两位活佛从未见过这么秀美的景色。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宴会的阵容与火车站迎接的阵容又有不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迎在门外。参加这次宴请的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邓小平、贺龙、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黄克诚、甘泗琪、张执一等党政军负责人。两位活佛看到这样的情景，受宠若惊地慌忙下车，快步走上前去，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致意，献上了藏族最尊贵的哈达。过去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所遇到的只是成千上万顶礼膜拜的信徒。而今天见到的，竟是这么多在脑海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的高官，心中的滋味真是难以形容。他们在各自的讲话中，诚挚地表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和各位官员的敬意。宴会气氛热烈而隆重，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各位领导，以及中南海迷人的风景和美酒佳肴，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永生难忘的记忆。

1954年9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达赖和班禅。在1951年庆祝西藏和平解放时，班禅到北京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而达赖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向他们亲切地问候，表示欢迎，并接受了他们献上的哈达及珍贵的礼物，达赖向毛泽东敬献的礼物，一是镶有毛泽东画像的金边镜框，一是雕花金法轮，金法轮上刻有“荣誉无比的毛主席万寿无疆”“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副金轮，藉表无上颂祷”的铭文。达赖还送上了他在拉萨用藏文写的一首诗《毛主席颂》，诗中称毛主席“是由前世多生培福修德而出现的转轮圣王，我早有心想写一个赞文来祝贺他的事业宏广，长寿无疆”“您是普照世界的太阳”“您是抚养我们的慈母”“您伟大的思想如同九霄云层，您的号召如同天的雷鸣。从这里降下一视同仁的平等的甘霖”“愿您的福泽永远普及大地，愿大地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愿伟大的领袖世界的明灯，千秋万世把人间照亮”。这次接见，毛主席与达赖、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要坚定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要搞好团结，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随同毛主席接见的还有刘少奇、宋庆龄、张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澜、李济深、李维汉、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刘格平等，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第二天、在首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达赖和班禅的大幅照片。

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那天，出席此次盛会的有两位最年轻的代表，那就是达赖和班禅，达赖只有19岁，班禅才16岁，他们来自于西藏选区。达赖喇嘛在16日的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班禅额尔德尼能返回西藏和我相会，也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各民族间与各民族内部应该团结的政策，在西藏业已出现了和平友爱的气象。”他还说：“在敌人的各种挑拨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发言的最后，达赖表示：“在先进的汉民族的帮助下，在我们各民族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我们有坚定的信心，遵守宪法，执行十七条协议，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次日下午，班禅也作了大会发言。

9月27日，达赖喇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格平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暨盛大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达赖·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出现在天安门检阅台的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之中。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的庆祝我国五年来的光辉成就；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庆祝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选出；庆祝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国庆过后，中央有意安排达赖、班禅在北京共同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以促



进他们的沟通和友谊。这些活动包括：拜访佛教协会副主席赵朴初并到雍和宫参观、讲经、参加法事活动；参观中国-苏联展览馆；参观和视察中央民族学院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参观视察工矿企业；游览中山公园等等。这期间，中央还特意安排了几次重要的活动，一次是10月10日，刘格平陪同达赖、班禅共赴中南海，专门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汇报了对西藏工作的想法和意见，再次聆听了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设想和指示，毛主席对二位年轻活佛的谆谆教诲令他们久久难忘，一连几天，达赖还在向刘格平咨询毛主席谈话中的用词和意思。还有两次活动，分别是从10月19日到月底，刘格平陪同他们参加了接、送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活动，以及周总理为尼赫鲁举行的欢迎宴会和送行宴会；12月上旬，刘格平又陪同两位活佛参加了缅甸总理吴努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相关活动。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的这些安排，对外昭示了新中国的博大胸襟和强大感召力，对达赖和班禅则是一次最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达赖，他对自己能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接待印度、缅甸的国家领导人，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深深感受到大国风范，从内心迸发出无比的自豪。

参加完接待吴努的活动，12月16日，刘格平、刘春陪同达赖和班禅同赴天津进行参观视察后，又回到北京。

12月21日，达赖、班禅共同出席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12月25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至此，他们两人都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之前，习仲勋曾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达赖当选了副委员长，但班禅还需要等几天，为了使班禅减少疑虑，对达赖、班禅的职务称谓，要等政协会议后再改口。现在政协会议已经闭幕，达赖、班禅的随行人员，应该改口称“副委员长”、“副主席”了，开始时很不适应。但达赖和班禅之间互相“副委员长”、“副主席”地叫个不停，连达赖的母亲、姐姐都不停地叫，大家都在逗笑中很快地适应过来。

1955年元旦一过，刘格平夫妇陪同达赖到华东、东北进行视察。他们的大致日程是：1月3日离开北京，4日到达南京并顺路游览了无锡；12日从无锡到达杭州；18日自杭州到达上海，在上海过的春节，共停留了10天。达赖于1月底到达沈阳，班禅也于2月2日到了这里。按照中央要求，他们汇合在一起，在沈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视察后，于1955年2月下旬藏历木羊年前一起回到了北京。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除夕，当天下午和晚上，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分别会见了达赖和班禅。两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在祖国内地参观视察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他们为祖国的飞速发展而喜悦和兴奋。藏历正月初一（1955年2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庆祝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早早来和两位佛爷聊天。这一天，完全是按藏族的传统习惯布置安排的。两位佛爷身穿黄缎长袍，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宴会开始后互祝新年，热烈而喜庆，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时刻。毛主席在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说：“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班禅喇嘛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该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sup>①</sup>

通过几个月的相处，刘格平夫妇和达赖一家彼此间已经比较熟悉，或许还有出于礼节的因素，在藏历新年过后，达赖突然提出想拜访刘格平的家庭。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刘格平拟在景山东前街3号院设家宴招待达赖喇嘛一家。在家招待活佛可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少数民族的神职首领、活佛，大家都非常陌生，家人即不知他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习惯好恶，可得精心做一番准备。刘格平家，楼前过廊上的大红柱子和顶棚上的花纹，都重新进行了油漆和描画，4根大红立柱前又配上4个鼓形瓷墩，显的典雅、高贵。客厅里摆设了新的沙发和茶几，铺设了崭新的地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还专为此增配了厨师。为了迎接达赖，丁磊把家中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进行了分工以各司其职，就连丁磊的母亲、嫂嫂也都换上漂亮的衣服，防备万一见面时，总要体面些才好。总之，整个院子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达赖来到的家中那一刻，大家都想一睹活佛的风采，不能正面迎接贵客的后勤工作人员，也想方设法从后面、侧面偷看一眼，负责前面招待的工作人员更是以能见到活佛为荣。当然，主要都是因为好奇心，听说有人九死一生赴西藏，期盼着能见到活佛，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46页。



能让活佛摸顶更是毕生所求，可仍有人终生不能如愿，如今却就在眼前。想象中的活佛应该是像庙里的菩萨那个样子，谁知竟然是个毛头小伙子。达赖身穿闪光的花锦缎长袍，腰里扎着宽腰带，约1.80米的个头，显得魁梧高大、十分精神，真不像个19岁的青年。达赖的弟弟也穿着藏袍，相貌相像，只是完全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这场家宴，最忙的人当属女主人丁磊，她即要在前台观察客人的需要，还要陪伴达赖的母亲和姐姐。达赖的小弟弟喜欢和刘格平只有4岁的、可爱活泼的小女儿秀华一起玩耍，两个孩子玩得十分开心，成了好朋友。秀华剪了个整齐的娃娃头，圆圆的脸蛋儿就像个大苹果，身着漂亮的花衣服，十分招人喜欢。达赖的母亲和姐姐总想抱她，可她总是跟在大哥哥的身边跑来跑去。真没想到，达赖的弟弟和刘格平的女儿，两个孩子竟大大活跃了气氛，营造出浓厚的家庭氛围。在达赖离去之后，满院子的人议论了好几天，似乎都对这个小活佛产生了兴趣。

3月份，北京已是春意盎然。屈指算来，达赖和班禅离藏已经八个月了，他们即将要踏上返藏之途。3月8日，毛主席亲自来御河桥为达赖送行，再次与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陪同会见的还有刘格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将军。3月9日，毛主席又去畅春园看望班禅，同样热情、亲切地同班禅进行了谈话。3月10日，周恩来总理又在中南海再次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两位活佛。这又是一场盛大的宴会，除了总理外，还有董必武、李济深、黄炎培、彭真、陈叔通、李维汉、彭德怀、邓小平、陈毅、习仲勋、傅作义、张治中、张鼎丞、甘泗淇，还有各部的部长，北京市的领导，佛教协会的领导等。

按说，毛泽东主席已经分别同二位活佛辞行过，可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插曲。3月11日上午，在与刘格平、张经武等人一起研究了离京事宜后，达赖留下了刘格平。他对前一日在宴会上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十分遗憾，他对刘格平说：“刘部长，我还想去向毛主席辞行，我去而不要让他来，就请您帮助联系和安排一下。”刘格平吃了一惊，忙问道：“还有什么重要事情吗？”达赖说：“没有，就是辞行，就是想再见一次毛主席。”达赖表示，来一趟北京见毛主席很不容易。在藏人看来，是毛主席拯救了他们，所以毛主席与他一样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是菩萨的化身，达赖还说，毛主席待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所以他临走之前一定要争取与毛主席再相见一次。达赖这时候提出这样一个让刘格平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要求，让刘格平感到十分为难。陪达赖转了大半个中国，刘格平对达赖已经基本了解，看达赖的神气是那样的认真、殷切，如果一口回绝肯定不妥。可是两位活佛的一切活动都是经中央讨论决定，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毛主席的日常工作又安排得非常紧，有时连自己也做不了主，就剩一天时间了，怎么办才好？刘格平思来想去，觉得这件事必须上报和请示。他想，如果能满足达赖的要求，那当然比较完美，万一不行自己就承担责任！于是，他对达赖说：“请您等一下，我马上去请示。”为了不让总理为难，他决定直接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中午饭过去了，办公厅没有答复。晚饭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刘格平心急如焚、七上八下。这时，他感到事情更加麻烦，如果到最后中央都无答复，那对达赖如何交代是好？从达赖表情和举动上也表现出十分失望的样子，一会儿诵经，一会儿又向刘格平表示懊悔，觉得自己太唐突。大约晚上九点，刘格平估计中央那里是不会有回复了，于是劝达赖早些休息，第二天就要起程，自己也回家去做些准备。刘格平已经知道第二天是副总理陈毅、邓小平及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到车站去送行，他想到的最后办法，是见到他们后再商量怎么办。

回到家中，丁磊见刘格平闷闷不乐，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刘格平讲了事情的经过，并说可能有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丁磊听后安慰他说：

“中央对西藏这么重视，接待两位活佛采用了最高规格。达赖临别时表示出的这个心愿没有错，你请示中央办公厅也没有错。明天就要走了，不必想得太多，视情况再说吧。”刘格平说：“我很担心，不要因为我们的最后一点疏忽，造成不好的影响，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可担心归担心，实在也没什么办法。

达赖这里，送走刘格平后，他便焚香祝祷、静坐诵经，这是他多年遵守的规则。身边陪他的，只有一个“寝官”，藏话叫“麻木”，还有一个西藏工委派的保卫科长。两人必须在达赖上床、熄灯后才能离开。

忽然，门卫风风火火地进来喊道：“快！快！毛主席来了！”达赖一愣：



“什么？”门卫忘了规矩和往日的礼节，赶忙说：“毛主席来了！”达赖如梦方醒地慌忙起身，出门迎接。毛主席已经进了客厅，他亲切地拉住达赖的手，一起坐到沙发上。达赖安排快叫刘主任，快叫翻译。这时，保卫科长成了临时翻译。毛主席对达赖说：“实在对不起，我是刚刚接到报告，说你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你是客人，明天要走，理当我给你送行。这么晚了，没影响你诵经吧？没影响你休息吧？”达赖十分不安，激动地说：“毛主席，真对不起，太打搅您了！”这时，达赖才注意到毛主席穿着长长的睡衣。心想：“难道主席已经休息了？”随主席来的两名工作人员，见到达赖惊异不安的表情，就插话说：“主席已经休息了，正在床上看报纸，接到报告马上就来了。”十四世达赖听后，不知是激动还是感动，两眼充满了泪水。后来在火车上，达赖告诉刘格平，他当时心潮起伏，想了很远很远。当年，五世达赖进京，顺治以安排围猎为名与其“偶遇”于郊外，以保持自己的天子之尊；十二世达赖进京，在见皇上、皇太后时，西太后非要求他磕长头、行大礼；六世班禅来内地，乾隆在避暑山庄会见，已算是“皇恩浩荡”……而眼前，毛主席对自己如此礼遇，怎能不让人激动？达赖觉得坐在他面前的是一座丰碑，一轮太阳。

这时，回到家中的刘格平刚刚洗完澡上床躺下，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小办公室响起来，他立即意识到有事。听说毛主席已经到了御河桥，刘格平赶忙穿好衣服，同时丁磊已通知了司机和警卫员，他们接上翻译，以最快的速度赶向御河桥。好在从景山到王府井大街不远，10多分钟也就到了。只见达赖住处灯火辉煌，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仅先于刘格平两分钟到达。刘格平进到客厅时毛主席和达赖正亲切地交谈，见到毛主席穿着睡衣披着外套，刘格平也十分感动，他一天的担心一下就放松了。刘格平和罗瑞卿刚坐下，毛主席就拿他说上了事。毛主席指着刘格平对达赖说，他是一个不吃猪肉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都是为了带领自己民族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幸福，用你们的话说，叫度化众生。不过，在西藏你还得当好这个喇嘛，因为你这个喇嘛在西藏还有很大的影响。一旁的保卫科长悄悄告诉刘格平，原来，达赖看到毛主席这么晚还来看他，一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竟向毛主席提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主席接着说，西藏的情况很特殊，不能太着急。当然不前进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不行，每年要有一些进步才好。你们那个制度就要改一下，那些不符合弃恶扬善的东西就不能要，它也违背你们这个宗教嘛！随后，毛主席将话锋一转，问刘格平，这次回去，进藏那段路怎么走？佛爷出门是要坐轿子的，听说来的时候改成了骑马，那很辛苦呀。达赖赶忙说，听刘主任讲，你们当年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有马骑已经很好了。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头。这时，罗瑞卿告诉毛主席，按照总理的指示，已经把军委今年从苏联进口的40辆嘎斯69吉普全部送给了西藏。毛主席说，那好啊，这回可以坐汽车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嘛。罗瑞卿又说，机场明年应该就可以使用了。毛主席听后掐着指头计算说，你们已经来了7个月了，还不算往返的时间，时间长了一点。飞机通了，以后可以常来常往，每次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了。达赖请毛主席今后去西藏，毛主席笑着说，好啊，你们不是讲缘分吗？每年有所进步，咱们就有这个缘分在西藏见面。这最后的一面，他们谈得十分融洽，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在刘格平和罗瑞卿的多次暗示下，达赖起身双手合十，希望毛主席注意保重身体，回去休息。毛主席也起身与达赖手牵手走出客厅，两人在车门旁紧紧地握手后，毛主席才坐进汽车。几十年后，担任翻译的图旺和担任保卫科长的居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们清楚地看到，达赖的眼睛里噙着晶莹的泪珠，双手合十，一直目送着远去的车子消失。刘格平回忆，这应该是自1949年以来毛主席第一次穿着睡衣公开出门，时间是1955年3月11日晚。他所知道的毛主席另一次穿睡衣参加活动，就是在1972年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了。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的7个月时间里，毛主席同达赖、班禅的会面、交谈达12次之多，平均一个月近两次。这种情况，在党内、国内都是极其少有的。每次会见刘格平都在场，他亲历了毛主席和达赖在北京接触的全过程，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受益匪浅。

毛主席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但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我们的同志给你讲中国近代历史，是要让你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受帝国主义凌辱、列强瓜分、人民受难的历史。所以我们要起来革命，我们自己要当家作主，不能再听他们的。西藏这个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谁也拿不去，你们是西藏的领袖，一



且离开了西藏，怎么去当这个领袖？所以你们守土有责。在西藏这个地方，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当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就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毛主席说：在西藏，你们有些制度要改，连人都要买卖，这可不符合弃恶扬善、度化众生呀。你们回去的路上要收礼吧，我也不赞成这个东西，你们有困难中央可以帮助嘛。当然，这是个特权，让你们一下子不收，一下子变过来也不可能，先少收一点，慢慢就不收了。所以，西藏的民主改革还是要进行的，但不能着急，首先是经济要发展起来。你们说我是菩萨，我可当不了。菩萨要有脱离世俗、超然物外的修行，你们还年轻，要努力修行，眼光要看得远一些，不要只满足坐轿子，发展起来了，有汽车、火车、飞机，还有公路、铁路，许多事情就好办了。中央政府希望自治区能尽快成立起来，你们要有一个设想，中央政府给你们支持，通过几年努力让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我们的军队进去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守卫疆土，帮助你们建设发展，但他们不给你们添麻烦，吃喝拉撒都不要你们的。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民族，从历史上看，有和有分，但互相依存，和睦相处更多一些，就好比一个大家庭，有那么多兄弟，大家互相帮助，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十七条”里说，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驱逐出西藏，这即是帮助你们自己，也是帮助我们。自家的兄弟一闹起来就不好了，容易让别人钻空子。当然，汉族是老大哥，老大哥的姿态要更高一些，在西藏，要向藏族人民多学习。到了你们那个地方，你们也要多包涵，如果有问题，可以找中央代表。你们不仅是西藏的领袖，还是国家领导人，所以，不仅是你们两位活佛之间要搞好的团结，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布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的团结。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团结、进步和发展。

1955年3月12日，达赖和班禅一同离开北京，彭德怀、陈毅、乌兰夫、邓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前往火车站送行。班禅由刘春陪同先往南方视察后，经西安由青海返藏。达赖则由刘格平夫妇及张经武陪同，还要回一趟青海他的出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地，再从四川入藏。年轻的达赖接受新鲜事物特别快，人特别聪明，半年时间学了不少汉话，与陪同的人交流起来已经方便许多。他不断地提出问题，有些问题可不是容易回答的，比如达赖提出：“你们汉人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和好，而要我们藏人一定和好？”对此，刘格平不仅要讲清“和好”的基础和原则，还要讲清国共两党的不同、国共合作、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有许多，如“中国为什么与苏联关系好而与美国关系不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都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刘格平所准备的范围，让刘格平颇费脑筋。达赖还专门问刘格平，是怎么才入了共产党？为什么新疆的赛福鼎能入党而他达赖不能入党？可见，正如毛主席所料，达赖对新疆也是十分关注的。

达赖出生于青海，原名叫拉木登珠，1938年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40年经国民政府特准免于“金瓶掣签”并派人主持，4岁的拉木登珠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有15年没回出生地了，他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回一次家乡。达赖一行3月15日坐飞机到达兰州，16日至西宁，17日到青海湟中塔尔寺，22日回到他的出生地湟中县祁家川，24日离开西宁，经武汉，过三峡，达赖于4月20日从重庆抵达成都，5月5日离开成都返藏。看这个时期的达赖，对中央政府和毛主席无限崇拜，谁也不会料到5年以后，他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策反操纵，竟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刘格平认为，主要是当时达赖太年轻了，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上层的包围、策动下，他做不到毛主席所要求的“努力修行”，害怕和抵制迟早会到来的民主改革，最后铤而走险，离开了他的家乡，离开了西藏。在以后几年里，毛泽东还是希望能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第二届人大期间，毛主席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能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但是，叛逃国外的达赖却公开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距离祖国母亲越走越远，他在自己的自传中，竟然把1954年进京说成是“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其实，早在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招募特工人员，他们在西藏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活动的组织者就是达赖的两个哥哥。1955年5月，达赖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西藏分裂分子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达赖递交“请愿书”，要求达赖搞“西藏独立”。达赖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也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召集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回到拉萨后，分裂分子又赶到拉萨，要求达赖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1955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分裂分子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他们还散发大批传单，叫嚷“西藏独立”，要解放军撤出西藏。达赖在自传中就说，他们逃跑时带的电台，还有枪支弹药和经费，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供给的。

相反，班禅大师以及当年达赖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他们一直坚持爱国爱教的立场，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经常到刘格平住处，回忆当年的情景，交流民族工作的情况。他们之间保持着十分融洽和亲切的关系。

1955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拟在甘孜州农区实施以废除高利贷、清算债务，废除乌拉、差役、特权和解放安置娃子的民主改革。改革首先在丹巴县、康定等地进行试点。但改革遭到周边县、区部分农奴主和奴隶主中的顽固分子扰乱。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于1956年2月首先在色达，接着在义敦等地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叛乱武装公然攻打解放军、县工委，进而围攻县城。此后，叛乱蔓延至四川、甘肃、青海藏区，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级干部和各级分子及其家属，并狂妄叫嚣：“反对共产党，赶走汉人，不准改革。”

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连续多次开会研究对策。毛泽东主席专门指示：应听取乌兰夫、刘格平等少数民族领导的意见。为此，1956年3月18日，民委副主任专赴银川，与在那里进行调研的统战部副部长、民委党组书记刘格平交换意见，于4月3日以国家民委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坚决镇压反革命叛乱的报告和意见。毛主席于1956年7月对四川甘孜州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作了重要指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示：好，好，好！藏族人民解放的日子来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争”。为了保护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群众，奋起平息武装叛乱，保卫改革顺利进行，粉碎了一小撮农奴主和西藏反动集团妄图阻止民主改革，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

1956年10月，甘孜叛乱得到平息后，中央立即派出以王维舟为团长、刘格平、郭林祥等人为副团长的民族慰问团，前往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慰问。

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1960年，在批判刘格平的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罪行时，有人明知当年达赖进京前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出来指责刘格平，说他对达赖丧失了警惕，在达赖问题上蒙蔽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才使毛主席对达赖存有幻想。还以此指责刘格平，说他完全是宗教上层势力混入党内的代理人，因为他竟然给达赖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企图把达赖拉入共产党内。

刘格平经历了达赖进京的全过程，他的心中十分清楚，毛主席之所以将达赖奉为上宾给予最高的接待和礼节，所要的是舆论、是人心、是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当然，毛主席对于达赖这样一个年轻人，也完全尽到了仁至义尽的责任。刘格平回忆说：“给我罗列了那么多罪行，我听后感到可笑。但笑也不行，说我的态度不好。我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或别有用心，或无知到了顶点，对这些人嗤之以鼻倘觉恶心，与毛主席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相比，实在是差之千里呀！”<sup>①</sup>

---

<sup>①</sup>《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上书中央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组织大规模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党的八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14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央报告，提出《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新疆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即回教）。宗教对少数民族的束缚、毒害很大，相当地阻碍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新疆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借宗教权势干涉政治，剥削人民，亦很严重。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的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还会保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慎审，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

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在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



1955年，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成立时，刘格平（右2）亲临祝贺并在自治县调查研究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响，有的甚至被视为“神圣”，因此，对于他们的态度亦应十分慎审，目前不要去反对他们一般的宗教剥削和宗教权利，而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他们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至于勾结匪特及帝国主义的阿訇、满拉，在弄清问题取得证据之后，必须依法惩处，并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但这样的阿訇、满拉还是极少数，并应区别首恶、胁从，分别处理，不要一律逮捕。在处理时除揭露他们的罪恶外，必须向群众说明，系只治他们的叛国罪、破坏治安罪，而不要提及他们的宗教身份，以免影响多数守法的阿訇、满拉及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

此件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6月10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全文如下：

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

中央 六月十日

1951年12月14日——31日，中央民委召开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董必武、李维汉、刘格平、乌兰夫都作了报告。刘格平的报告题目为《两年来的民族工作》。



“走下去——访问、调查，请上来——促进相互了解和民族团结”，是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工作的重要一环。这是李维汉、刘格平、包尔汉等宴请来京的民族参观团

1952年8月，中共甘肃省定西地区靖远县委在检查该县打拉池乡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时，发现这个回汉杂居乡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现象。比如，不让回族群众当民兵，回族干部有职无权等。中共定西地委就此向甘肃省委写了一个检查报告。此事引起了甘肃省委和中共西北局的重视。西北局把甘肃省委的报告转发给了



西北五省党委，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同年9月将其作为《中央批转甘肃定西地委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附件，批转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南局，要求他们通知所属有关地区的党委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检查各有关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较少地区必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52年8月开始直到1953年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952年8月14日，刘格平率工作组赴西北，在西安为西北军区作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民族工作的4个特征、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怎样开展民族工作，以及几个民族政策问题等。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决定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维汉要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工作都没有成规可循，尤其是民族工作，中央应该给地方工作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按照这个指示，刘格平把中央统战部民族处的胡钧、江山等五六个同志请到景山东街自己家中住下，共同分析汇总各方面的材料，反复研究推敲，确定重点并亲自指导起草、撰写工作。最后完成了1.5万字的大会主题报告，送给李维汉审阅。这个报告对各地方的民族统战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什么要出台这份文件？刘格平强调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工作都没有成规可循，尤其是民族工作，中央机关应该给地方工作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

刘格平在民族工作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只要有时间，他就抽身去各地检查指导。1952年11月20日，刘格平率工作组赴广州参加民族工作座谈会，就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自治法的制定等问题发表了讲话。2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前排右1）接见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藏胞代表团，刘格平陪同接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民族工作会议，刘格平到会作民族政策的报告。并在后来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归纳形成民族理论。

1952年年底，刘格平受中共中央派遣率中央民族工作组赴广东、广西等地传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考察了民族工作情况。

1953年1月7日，刘格平率工作组抵达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刘格平就凉山工作问题作了讲话，就干部的培养、娃子（奴隶）问题、文字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春节后，刘格平与其他同志一起又派出中南调查组，调查某些地区出现的违犯民族政策事件。毛主席在1953年3月16日对张执一、马杰等带领的中南民族调查组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批示作为党内指示发至全党。毛主席这个指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批判大汉族主义》。在这个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判我们党内存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sup>①</sup>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格平和民委的同志进一步在全国进行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对各地宣传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起了重大作用。

5月14日，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刘格平当选为主任。会后，刘格平深入回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回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举办回族历史展览，调解处理政府难以解决的回族内部问题，编写中华回族历史。

是年，刘格平担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

持续两年多的执行民族政策情况大检查，取得了很大成绩。1954年5月20日，政务院第217次会议，批准刘格平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53年完成的几项主要工作和1954年工作要点报告》。

<sup>①</sup> 《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5页。



是年夏，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汇报，讨论审定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经中央讨论同意，1954年10月，这份总结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各地贯彻落实。总结的原名是《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汇报》，作为文件下发时被改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这个题目是毛泽东主席改定的，他对李维汉讲：“你们搞的这份材料讲清楚了问题，有纲领、有策略，策略就是政策，是很有分量的。但原有题目和内容不相称，故加以改动。”这一改动，极大地提高了文件的分量，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刘格平1955年和1956年两次派全国人大民委调查组到云南佤、景颇、傈僳等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肯定了中共云南省委提出的不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这些民族基本上都在山区，过去政治上主要受坝区傣族土司和其他民族统治者管辖。内部虽有山官头人，有些特权和轻微剥削，但社会生产水平低，还没有形成地主经济。这些地方通过民主建政和坝区傣族地区民主改革，解决了政治上的问题，内部经济上民主改革的内容不多，所以这里就不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阶段进行，而是强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走互助合作道路，逐步解决山官头人某些特权和轻微剥削问题。刘格平把调查的内容和意见报告中央和有关部门，受到肯定。后来这些地区在党组织和国家的关怀和扶持下，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同全国人民一道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作为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还参与组织民族语言调查，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1952年10月12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邵力子任主任委员，陶孟和、刘格平任副主任委员。由于刘格平是中央民委副主任，所以，他实际上是具体领导这一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到1955年为止，先后派人壮、布依、水、苗、瑶、彝、傣、傈僳、景颇、哈尼、佤、蒙古族、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的工作。

1956年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未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广泛而又最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全国共组织了7个调查工作队。



1956年春，刘格平（左1）等到机场迎接西藏参观团

分赴各个民族地区对我国各民族语言、方言、土语进行调查。北京调查组出发前，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和刘格平亲自动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长达一年的科学调查，搜集了极为丰富的

资料，为摸清我国民族语言状况，搞好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工作，开展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壮族文字方案等民族文字方案都是在这些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成果。现在我国民族语言学界的不少知名专家学者也多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1980年以后，我国出版的几十部民族语言简志也都是在这些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后来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语言文学系教授的胡振华，是当年民族语言调查第6工作队的成员，担任柯尔克孜语调查分队的分队长，与其他7位柯尔克孜、汉、回族同志一起走遍了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村庄、牧场。后来胡振华执笔编著出版并获奖的《柯尔克孜语言简志》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的全面又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是世界上少有的调查活动，在我国民族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加组织领导这一事业的刘格平和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的各族语文工作者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1956年春，彭真找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苏、刘格平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他说，最近在中央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毛主席还说，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形态、封建制形态，及这几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现在世界上还不知道其他哪个国家，都保留这几种社会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我看，这件事就请彭真主持吧，由全国人大民委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专家、干部进行调查。

1956年6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彭真的具体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成立了以刘格平为组长，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大民委。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为了弄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以便进行民主改革，从1958年至1964年，刘格平主持领导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有专家学者和民族院校学生几百人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或视察组，分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等1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这次延续六七年到民族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搜集到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诸多方面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组共写出调查资料340种，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更为重要的是，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真实图像资料，并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物。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为确认全国55个少数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民族地区适时进行民主改革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我国民族学的研究积累了宝贵史料。锻炼培养了不少民族学家、民族历史学家。后来在这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



1957年，刘格平在金沙江边与参加甘孜藏区土改试点的工作人员合影



1957年，刘格平（中）视察天津郊区农业发展情况

出版的这些各民族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都源自那次大规模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为促进我国民族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各民族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丛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刘格平主持组织的这次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科学调查。

刘格平还在中央的领导下，参与制定有关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亲赴民族地区解决平叛改革的试点，推行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牧区改革，宣扬以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对待宗教问题，帮助社会形态落后的民族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他还以诚相待，循循善诱地做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帮助并团结他们走民族团结发展之路。刘格平在民族工作中作出的优异成绩，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许。1956年3月，彭真召集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和刘格平及全国人大民委有关同志传达毛泽东主席要求进行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时提到毛主席说：“刘格平参与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政策贯彻最正常，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1956年9月，刘格平被评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党的八大会议，并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刘格平下放唐山陶瓷厂劳动改造时，他曾给身边人说过，党的八大时他是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名的。但不知后来为啥，又把他安排到主席团。<sup>①</sup>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的创建，为各地党政军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使各民族学子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教育工作，提上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已经成为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当务之急。

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明确指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应办少数民族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毛主席还强调，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成为新中国发展民族教育的根本方针。根据这个方针，1950年1月，中央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座谈会，并酝酿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同年6月，政务院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央民委副主任乌兰夫及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兼任中央民族学院正、副院长，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正式开始。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理论家、原延安民族学院副院长刘春从内蒙古调入北京，9月政务院任命刘春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参加筹办工作。根据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的指示，筹办人员首先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

两个试行方案确定后，要报送中央批准。可是如果要按正常程序报送的话，要经过中央民委报政务院，再由政务院报送中央审批。或者是经过中央统战部报告中央，由中央批准后，再经过政务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下达执行。为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了争取时间，快些把两个试行方案报上去，李维汉想出了一个主意。当时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中央准备邀请各地少数民族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担任招待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决定，在以他的名义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报送时，把这两个方案作为附件一并报上。

1950年1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接着毛泽东主席也于11月30日在这两个方案上批示说：“此件可抄送中央局、分局及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件存中央档案馆）12月28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公布了这两个方案。其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对学院办学任务、教学办法、管理体制及各相关事宜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至1951年5月底，中央民族学院有教职员工283人，其中教师14人；并招收军政干部训练班、藏语班学员合计262名，于5月28日正式开学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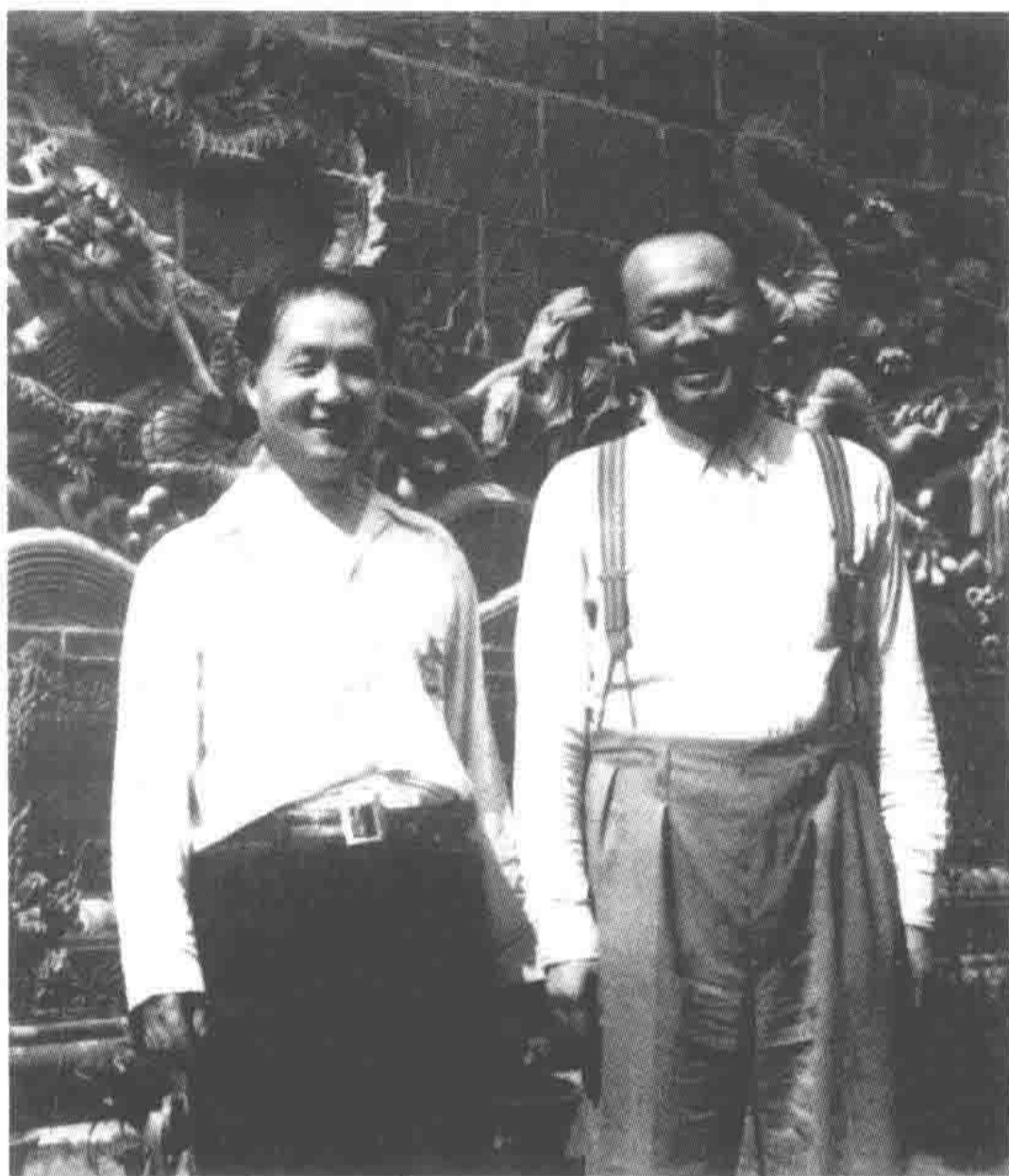
最初的学院筹备小组是在乌兰夫院长、刘格平副院长的领导下，由民委办公厅副主任朋斯克（蒙古族）具体负责。那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只在北京东城国子监附近有一个小院子，几间房子，200多名教职工，开设军政干部班、藏语文班两个训练班，260多名学员。开设藏语文班是缘于当时解放大军正向西南挺进，大好河山获得解放，川康各地军事行动十分迅速。进军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努力争取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谋求用和平方法解放西藏，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经著名学者季羨林和于道泉提议，国内若干高校的一些文科在校学生被抽调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因此这个藏语文班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就开班上课了。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临时校舍国子监院内举行隆重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刘格平等出席典礼。开学典礼



举办得很隆重，朱德、董必武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社论说：“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各少数民族的花朵在毛泽东主席民族政策春风的披拂下，将日盛一日地开放起来。”

学院创建初期有各民族学员300多人。最先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藏语文学习班，稍后开办了民族语言学习班。1952年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设蒙古、藏、维吾尔、壮、苗、瑶、布依等20多种语文专业。1953年夏建立了政治系，设有本科和专修



1954年，两位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右）、刘格平在北海公园合影

科，学制为2年。另外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预科，其中设有从小学到高中和中专的各类班级。各系、科主要招收边疆各少数民族学生，同时招收部分汉族学生，培养他们成为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

1952年，是中央民族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乌兰夫和刘格平的具体筹划下，这一年完全确定了中央民族学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社会地位。首先，这年夏季，北京西郊白石桥占地300多亩的新校舍主体工程竣工，学院迁入新校舍。新校舍由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持，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红漆大屋顶，灰砖青瓦，磨砖对缝，画梁红柱；整个校园典雅隽秀，错落有致，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美丽如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被誉为花园式学校，为北京兄弟高等院校所羡慕。众所周知，当时共和国百业待举，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这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群，可以说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渗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学院的深切关怀，也渗透着乌兰夫和刘格平的精心策划的智慧 and 心血。当年底，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办公楼、一个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均已盖好，中央民族学院就从城里搬入新校址。接着，礼堂、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图书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都陆陆续续地竣工了。其次，这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统一调整。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规定的学院办学任务的精神，在中央的同意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藏、维吾尔专业师生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

师资问题是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最为关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乌兰夫与刘格平广泛征求了党政军各方面高层人员的意见后，以中央民族学院的名义，向教育部开了很大一个名单，提出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调来一批教授，如翦伯赞（历史学家）、翁独健（历史学家）、吕振羽（历史学家）、费孝通（社会学家）等学者。翦伯赞是维吾尔族，可是燕京大学不放，只好聘他当兼职教授。费孝通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由于院系调整清华改为理工科院校，经教育部门同意，由政务院任命他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刘格平等四处活动，把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民族语言学家陆续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成为学院发展的基础和骨干。元史专家翁独健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翦伯赞担任研究部西南室主任，潘光旦成为中南民族室的负责人，翁独健也负责东北室，冯家升出任西北室的主任。吴文藻回国后，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研究室的负责人。林耀华被任命为西藏研究室负责人，林先生曾担任过多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与同事李有义、王静如、王辅仁一起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素有“北吴南杨”之称的吴文藻和杨成志两位先生先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在1949年后，先是被调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后来才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工作。民族语文教育家马学良1951年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负责筹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任系副主任。1953年，马学良正式转入民族学院，1964年，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人才济济，奠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声名大振。同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和研究部，为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学三大主干学科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整个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大批知名教授汇聚到中央民族学院，给学院的发展增添了动力。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施联朱回忆，他曾参加过1953年北京市市长吴晗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吴市长要与会人员报一下各个大学的教学阵容，他就汇报中央民族学院有30多位名教授、副教授、讲师，都是谁谁谁等等。结果吴晗一听，高兴地说：好家伙，中央民族学院藏龙卧虎呀！你们的名教授比北大还多。

学院自建立以来即开始进行科研工作，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刘格平1955年任民族学院院长，根据国家民委的指示，在刘格平的组织领导下，学院研究部的专家学者参加了50年代进行的3项较大的工作：①民族识别工作；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③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曾动员大批师生参加了这几项工作。这3次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就在新中国民族工作中都是奠基性的。一是关于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确认了新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批成员，初步奠定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格局，为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依据。二是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首次弄清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所处的社会形态，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三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首次全面了解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帮助16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了文字。通过这些工作，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写出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宏观决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中央民族学院曾参加编写关于民族问题的3套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此外，全院写出科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几百篇。参加过50年代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青年教师胡振华，后来编著出版了《柯尔克孜民族简史简志》。

著名学者潘光旦主持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这位高度近视的老人，花了4年时间，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摘录了1359张有关土家和古代巴人的卡片，写出了15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得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结论。确认一个民族需要科学根据，为解决土家族识别问题，潘光旦曾拖着残疾的身体亲自到湘西验证相关结论。一次，他要到一个土家山寨调查，因为公路被挖断，潘光旦只好弃车步行。他撑着双拐，来回走了六七公里路，拐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杖将肋下都磨起了泡，有些地方甚至渗出了血。

最初，中央民族学院计划要办成1万人规模的综合大学，每年可招收几千名学生（包括中小学在内）。因为我国虽有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而少数民族还没有一所大学。毛泽东曾主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第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他总结说：“苏联办东方大学，我们办西方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但是，少数民族的高中生要直接升大学很困难，考不上，就是降低分数，也很困难。像清华、北大都比较愿意接受少数民族学生，但考取的很少。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决定专门为他们办补习班，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按照李维汉的想法，中央民族学院不应只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还应该招收汉族学生。因为国家不仅需要能为少数民族解放和发展而工作的人才，也非常需要专门研究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人才。1952年底，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并陆续建立了民族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艺术系、汉语系、研究部、预科部等教学科研单位。具体情况是，1956年秋建立历史系，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学制5年。接着增设了民族学研究生班。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80多万册，其中少数民族文字的8万多册。

学院共设1个干部培训部（设有1年制文化班、理论班和2年制的法律、政治理论专业）和政治、历史、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数学、物理等8个系以及一个预科。

渗透着刘格平心血筹建起来的中央民族学院，如今已经走过了63年的发展历程。它坐落于北京学府林立的海淀区，南邻国家图书馆，北依中关村科技园，校园环境典雅，古朴幽美，人文氛围浓郁，堪称世界一流的民族高等学府。1993年，它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经常保持50多个民族成分的学生在校学习。56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的在这里汇聚，各民族的语言、服饰、歌舞、风俗习惯在这里交响，是21世纪我国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之一。成为我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所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一所以文科为主体，以民族学科为特色，文、理、艺、管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23个



学院，有覆盖10个学校门类的60个本科专业，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等等。自1951年6月11日正式开学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累计培养了6万多名毕业生，以其良好独特的育人环境和对素质教育的一贯重视，使少数民族人才在这里成长，使各民族学子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 难忘回汉人民的支持和奉献，为自治区的筹备和建设呕心沥血，成绩显著在塞上传为佳话

回族，是中国大地上特有的民族。公元7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从开始的客居逐步定居；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又有大批西域人迁入中国。这些外来的番客和色目人，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众多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

回族对祖国的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带来了西亚的天文学、医学、建筑学、音乐等科学文化成就，也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介绍传播到欧洲大陆。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像元大都设计者亦黑迭儿丁、明代政治家海瑞、李贽、郑和、清代抗倭英雄左宝贵等许多回族杰出代表人物。近现代时期的旧中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不但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还遭受着民族压迫的回族人民，更是积极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生死搏斗之中。

回族是刘格平的母族，他热爱自己的母族。刘格平认为，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不尊重的人，在关键时刻也不可能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他正是为着回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参加共产党，投身于革命。

刘格平记得：1949年，当他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周恩来紧握着他的双手说：“回回民族对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马骏、郭隆真同志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胜利。你和刘清扬同志还活着，你们都是回族中的先觉者。”周恩来和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都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共同创立了“觉悟社”，刘清扬



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格平深深地体悟到，周恩来这番话，是发自于他肺腑的情感。

刘格平也记得：1922年至1926年间，他在津南家乡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团支部和党支部，得到回族同胞的大力支持，那些最亲密的战友——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他们跟着自己踏上了革命道路，将满腔的热血洒在了他们热爱的土地上。刘格平在投身革命后，将回族中建立团体以加强联系这个传统，应用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中。1927年1月，他在武昌组织发起成立了回民协会，支持北伐；1932年初，他联络陕西回民著名人士冯瑞生组织成立了“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还在西安市东大街青年会成立了“陕西回族青年读书会”，有力地开展了抗日救国活动。1945年8月下旬，刘格平根据上级指示，把山东的回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山东省回民协会，积极配合减租减息，向八路军输送了大量兵员。

刘格平还记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回族同胞们纷纷揭竿而起，组织起数十只抗日武装，配合八路军作战。其中著名的有刘震寰、王连芳所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马本斋、刘世昌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彭林柏在自己家乡组织起来的滨海分区回民大队；丁毅民率领的鲁中回民大队；白振武和肖英带领的活动于青县、沧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它们都是渤海、冀中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有彭大娘，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8年抗战期间，她为团结抗日和“支前”工作，历尽艰险，做出了突出贡献，“抗大”山东分校的同志专门写词谱曲歌颂她的事迹，当时唱遍沂蒙解放区。刘格平所看到的统计，在解放战争中，仅莱芜战役和济南战役，牺牲的回民战士已经超过2000人。

回族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奉献，令刘格平的心中常怀感激，永生难忘。

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格平即以民委名义多次与内务部、文化部联系，于1951年10月在北京日坛公园为马骏烈士树立了墓碑并举行了公祭仪式。

1951年，中央决定筹建农垦部并建立屯垦部队，有人提出，要将山东的回民武装编入屯垦部队，刘格平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主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席。他向毛主席说，这支部队成立于抗战初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很大的影响，不宜轻易取消番号。他还建议，鉴于许多少数民族有特殊的生活习惯，也有必要在正规军中适当的保留一些少数民族部队。毛主席认真听取了刘格平的陈述后，让刘格平写了书面报告。1952年1月4日，毛主席做出批示：“刘格平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毛泽东1月4日。”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立即着手对同样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战功卓著的华北回民部队情况进行了调查，于1952年1月15日向毛主席提出报告，报告中建议：将1950年8月调补第68军开赴朝鲜作战的原冀中回民支队从68军调出，按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民族部队。对此，毛主席当日即做出了批示：“同意所拟办法。送刘格平、李维汉同志阅，退聂办。毛泽东1月15日。”<sup>①</sup>毛主席的批示，既体现出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毛主席对刘格平的高度信任。

1953年，走过了三年的恢复期的新中国，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各族人民都以无比热忱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刘格平根据张杰、白寿彝、马坚、达浦生等回族知名人士、学者的提议，提经中央民委研究后，以中央民委党组名义正式向党中央请示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支持，他要求民委就这两个组织的宗旨和工作，向中央作出具体说明并直接交给他。为此，中央民委在说明报告中对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表述是：“根据民族和宗教分开的原则……中国回民文化协进委员会（该会成立时改为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为回民全国性文化性质的团体。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研究发展回民文化，向回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随后，这个报告经毛主席、周总理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圈阅、批示后获得批准。

1953年5月14日，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成立，刘格平被选为回民文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



化协进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在中国回协成立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指出，之所以成立全国性回民文化团体，目的在于“协助人民政府研究和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回民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回族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学习先进民族的生产经验”，并“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逐步地改变回族人民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的状态”。经过充分讨论后，代表们一致通过了组织简章，并选出刘格平为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王兴让、吴鸿宾、白寿彝、马松亭为副主任，丁振德等97人为委员。<sup>①</sup>中国回协成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协助人民政府贯彻民族政策，研究和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调查研究回族的历史与现状，举办各种文化成就展览，开展国际友好往来，以及处理各项回民群众来信来访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刘格平的大力支持下，白寿彝先生编著了《回回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作了充分的材料准备。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回民文化协进会总结了五年多的工作，宣布根据情况的变化，结束其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各回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得到了相应保障。在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回族有350多万人，在当时已识别的少数民族中居第3位，仅次于壮族和维吾尔族。当时，全国已建立了临夏、吴忠、固原、昌吉4个回族自治州、10个回族自治县和130多个自治乡（镇）。在各级回族自治地方范围内，回族人口有130多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3。作为一个人口数量较多、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省一级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与其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成立回族自治区，一直是刘格平的愿望。早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与李维汉一起讨论《共同纲领》时，刘格平就提出，希望能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建立回族自治区。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撤销宁夏省建制时，刘格平做了希望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发言。随后，中央就召开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征求各部委意见时，刘格平再次向陈毅、李维汉提出关于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3年5月24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成立回族自治区的建议。为此，中共中央委托陈毅专门与刘格平进行了多次谈话。陈毅表示，中央也意识到，“如果不成立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同回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相适应的”。陈毅还特别转达了毛主席不要急，工作要做细的指示。通过周恩来、习仲勋的具体部署，国家民委党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1954年10月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拟在西北回族聚居区建立回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合并甘肃省的河东回族自治地方、西海固回族自治地方并划入原宁夏省的汉族地区，建立一个相当于省级的回族自治地方。”报告还指出：“建立这样一个回族自治地方，对于充分发挥回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加强回汉民族间的团结及回族内部的团结，发展回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是有好处的。同时，在国际上特别是对于中东、近东的伊斯兰国家也必然产生良好的政治影响。”中央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报告，陈毅还就此报告与刘格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56年2月，陈毅约李维汉、习仲勋、马明方、汪锋等具体商谈成立回族自治区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回族干部和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加强民族团结和发挥回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有重大意义。会后，陈毅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成立自治区的各种条件大体上已经具备，把自治区建立起来，对更进一步开展工作也较有利。”1956年2月底，中央正式倡议在甘肃省东北部回族人口较为集中且又有固原和吴忠两个连接的回族自治区的地区建立省级回族自治区。

为建立回族自治区，全国政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扩大会议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说：“成立回族自治区，可以把回汉民族这几年已有的感情巩固起来。现在大家对方案没有异议，我个人认为可以早点建立起来。”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格平被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共“八大”一结束，刘格平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工作中。他多次往来于北京、兰州、银川、呼和浩特之间，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



1957年5月2日至3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与省政协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拥护中央关于设立省级回族自治区的倡议。在自治区区划方案上，甘肃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以原宁夏省撤销后划入甘肃的地域（划归内蒙古族地区的除外）为基础，再划入邻近的一些地区，即包括银川专区9市县、吴忠回族自治区5市县、固原回族自治区3个县和平凉专区的泾源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共19市县；第二个方案：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把平凉专区各同样大的回族市县和天水专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区都划入。因为考虑到甘肃省的省会设在兰州，这两个方案中均没有将紧靠兰州的临夏（河州）回族聚居区划入宁夏，甘肃方面倾向第一方案。刘格平经过再三考虑，主张尊重甘肃的意见，他说服回族同志，不要坚持非把甘肃不同意的区域划入回族自治区。

在宁夏与内蒙古之间的区划问题上，刘格平同样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大局意识。本来，位于宁夏北部的阿拉善盟及磴口县这两个地方，属于旧宁夏省，因为1954年撤销宁夏省而将其划入了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成立时，将这两个地方仍归回宁夏是顺理成章的，它将使宁夏的版图扩大50%以上，但宁夏派往内蒙的书记甘春雷向刘格平汇报说，内蒙的同志不太愿意将这两个地方再划归回宁夏。刘格平表示：我们是统一的国家，考虑问题不能单从自己的民族出发，首先要从大局出发。我们不仅要考虑回族的意见，也要考虑其他民族的意见。回族居住分散，这是客观事实。少划入一些地区，自治区人口是较少的，面积也显得小一些；就是划入，人口虽多了一点，地方虽大了一点，但回族人口也只占全国回族人口的几分之一。自治区不要只看人口多少和地方大小，要看将来的发展。你搞好了，别的地方回族自然就会认可你。你搞不好，人再多面积再大也没有用。刘格平的表态，使宁夏与邻近省、区的划界问题，基本就按甘肃提出来的第一方案确定下来，这个方案作为甘肃省委的建议上报了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审议。

第一，这个方案尊重当地回族聚居的特点。甘肃回族虽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但在东北部的银川、吴忠、固原等地的回族人口比较集中。这里有两个回族自治区和一个回族自治区，居住在这里的回族人口占甘肃回族总人口的近一半。因此，选择这个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最为适宜。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第二，这个方案的区划范围比较现实。起初曾考虑将回族自治区的区域划大一些。平凉专区所属的泾源回族自治县与自治区毗连，应当划入自治区；隆德县虽然回族人口不多，但为了照顾自治区幅员完整，不致使泾源回族自治县成为一块突出地带，也有利于自治区管理领导，故将隆德县也划入。但如将整个平凉专区都划入，就会使自治区回族人口所占比例太小；若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划入，会使甘肃西部和陇东地区完全隔开，给甘肃省的管理和领导带来诸多不便。

第三，这个方案符合该地区今后的发展需要。这一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和经济联系，发展前景看好。在农业上，该地区北部是银川平原，黄河水资源丰富，可发展灌溉农业；中部及南部地区有广阔的牧场和大片可垦荒地，发展农牧业的潜力很大。在工业上，这里有储量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可发展具有区域和全国意义的能源、化工工业；在交通运输方面，公路网络初步形成，包兰铁路已经开工建设，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

1957年5月27日至6月初，全国政协常委会就建立回族自治区的问题连续召开了3次扩大会议，周恩来参加了5月27日的第一次讨论并讲了话。会议对在甘肃省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及其区划方案表示赞同。

6月7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1次会议上，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作了《关于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对自治区区划方案及甘肃省讨论协商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将回族自治区的名称问题提交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6月27日至7月16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周恩来在7月4日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中明确提出：

“全国回族人口有350多万，是我国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其中分布在甘肃境内的有110多万。解放以后，虽然已经成立了4个回族自治州和10个回族自治县，但是不成立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同回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相适应的。”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对回族自治区区划方案再次作了说明，指出这两个自治区的建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贯彻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的坚决性和一贯性。7月15日，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议案，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同时确定了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区、固原回族自治区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2市17县，面积6.64万平方公里，人口197万，其中回族人口为63万，占总人口的32.15%。7月15日，中国回民



1958年8月2日，包兰铁路全线通车，刘格平前往剪彩

文化协进会和北京市民政局邀请在京各界回族代表1700多人举行联欢会，庆祝全国人大通过成立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刘格平主持了这次联欢会。

在这期间，刘格平还向中央提出建议：请求中央对包兰铁路的建设重点支持和关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时间，应该在包兰铁路正式交付使用之后。包兰铁路自包头至兰州，全长990千米，穿越宁夏中、北部，纵贯银川市南北，东接华北重镇包头，与京包铁路相连；西接西北古城兰州，和兰新、兰青、陇海三条铁路衔接，是连接宁夏和内陆的重要交通干线，它于1954年10月开工，1958年7月通车，1958年10月正式交付运营。

1957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宁夏工委），任命刘格平、甘春雷等11人为工委委员。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立即同甘肃省委研究了宁夏的情况，交接了工作。1958年1月，毛主席及陈毅就宁夏的干部配备问题亲自征求了刘格平的意见。中央最初的考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邓宝珊（左1）与刘格平、甘春雷研究宁夏的发展问题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立后，拟由刘格平担任宁夏党政一把手，同时以配备西北干部为主进行工作。刘格平对此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希望中央考虑，还是委派汉族同志担任自治区的一把手，他明确提出：做好民族工作、落实区域自治，应该以汉族同志为主少数民族干部协助；第二，希望能像经济、文化那样的方式一样，在干部配备上也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一部分回族干部支持宁夏，通过干部交流互补，可以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之后，陈毅和习仲勋又几次与刘格平交谈，最后采纳了刘格平的意见。3月，中共宁夏工委由北京迁到银川市办公。4月，中央任命汪锋为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为书记处书记。中共宁夏工委的成立，为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1958年6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备委员会），任命刘格平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马玉槐、吴生秀为副主任。6月16日至19日，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刘格平致开幕词，指出：“筹委会的工作重点，除了要积极进行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准备工作外，应该集中全力搞好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会议决定筹备委员会下设办公厅、民政处、公安处、监察处、经济计划委员会、财政处、粮食处、商业处、工业交通处、邮电管理局、农业处、文教处、卫生处、人事处、宗教事务处、参事室等工作机构。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随即担负起自治区的行政领导责任，全力进行筹建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于1958年10月成立，中央派出以副委员长林伯渠为团长（右1）的中央代表团前往银川祝贺。这是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刘格平等迎接中央代表团

1958年8月2日，在庆贺包头—兰州铁路接轨和临时通车的大会上，刘格平发表讲话，他表示衷心地庆贺包兰铁路的建成，并向建设包兰铁路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职工表示谢意和致敬。刘格平在大会讲话中说：“包兰铁路的建成给



自治区的工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自治区成立之前的近一年时间，中共宁夏工委和筹备委员会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尽快建立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进行干部的调配、培养、选拔等方面的工作。根据宁夏的行政区划、人口状况



刘格平在欢迎中央代表团大会上讲话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务院决定按丙等省的编制配备人员，机构尽量精简。在中央的关怀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宁夏的各级各类干部共6557名，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31.6%，其中党团员占55%，回族干部占13%，各级领导骨干占10.4%，技术干部占23.6%。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工作经验，绝大部分都分配到自治区区级党政机关和新建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1958年撤销银川专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区建制后，共调整出2322名干部，其中大部分调配到自治区区级党政机关和工业系统，另有一部分分配到市、县。另外，还从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选拔新干部1676名，充实到各基层单位。其间共调整、选拔干部1万多名，基本上保证了建立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需要。

第二，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申报了宁夏1958年的建设项目和财政预算，争取国家的大力扶持。1958年国家财政补助超过1.05亿元，较1957年的167万元猛增62倍。同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解决宁夏干部、科技人员和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希望动员内地愿意支援宁夏的回族和一部分汉族干部职工迁入宁夏，共同开发建设宁夏。先后有数万名干部职工自愿来到宁夏参加自治区的建设。

第三，办理上海、南京等地一批工厂、企业的迁宁事宜，包括煤炭、电力、冶金、机械、轻纺、建材等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宁夏的工业基础。

第四，把改变银川市城市建设极端落后面貌作为重要任务，着重抓好基本建设的计划、设计、施工和建材生产，动员干部群众突击新建10万平方米的简



刘格平等投票选举自治区主席、副主席

易应急住房，以解决生产、办公用房和职工住宅的急需。

自治区的筹建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各省市的热情援助。中央决定从1958年起若干年内，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劳动力和各类技术人员来宁夏支援自治区的建设。从1958年初到自治区成立，从全国各地调到宁夏参加生产建设的各族干部、职工就达7万人。从北京、南京来的500多名中

学毕业生到银川市后，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农村担任小学教师。从甘肃省调来的700多名建筑工人和干部，担负起自治区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重任。在筹建一批煤矿、工厂、大型水利工程时，国家煤炭部派来2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辽宁、甘肃等省派来近千名技术熟练的建筑工人，冶金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都派来工作组帮助勘测厂址，进行工厂的设计。除了人才、技术上的援助外，大批厂矿、建设工程所需钢材、水泥、木材和机电设备也源源不断运往宁夏。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为宁夏代培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天津、大连等市的100余家企业就为自治区代培了4800多名技术工人。

为支援和发展宁夏的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协调和支持下，中



1958年10月25日，刘格平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国京剧院四团划拨宁夏，组建宁夏京剧团；上海华艺、光艺、红花越剧团选派部分演职人员组建了宁夏越剧团；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空军政治部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和杂技团、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全总文工团和话剧团、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中国杂技团、天津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刘格平在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市杂技团等艺术团体的支持下，分别组建了宁夏歌舞团、宁夏话剧团、银川市杂技团，使宁夏的文化事业初具规模。这些文艺团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自治区回汉各族人民编排了一批精彩节目，为自治区的成立和各项建设事业锦上添花。

10月16日至2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召开。出席预备会议的正式代表158人。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自治区195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195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自治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完成情况和1959年计划初步安排意见的报告（草案）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并初步酝酿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候选人名单；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名单和自治区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

10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银川市隆重开幕。应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08人，其中回族89名，占代表总数的42.79%。这



刘格平陪同习仲勋（右2）参观宁夏毛纺织厂

次会议的任务是：选举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正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有关工作报告；制定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派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为团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等为团员的代表团专程前来祝贺。同日，刘格平对《宁夏日报》记者发表题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的谈话，他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回民族才获得了彻底解放。解放以来，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甘肃省建立了临夏、固原、吴忠3个自治州（后两个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而撤销）。在新疆建立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在全国各地建立了9个回族自治县，和其他民族联合自治县1个，同时还建立了上百个的回族乡。回族人民还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在经济和文化事业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状态已经逐渐改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为回回民族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提供了条件，在鼓舞全国各地回族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



设，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0月25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35名委员组成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刘格平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马玉槐（回族）、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回族）、马腾霁（回族）、郝玉山、黄执中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韩幽桐（女，回族）当选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出刘格平、李景林、马玉槐、马腾霁、雷启霖等5人为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0月26日，《人民日报》和《宁夏日报》分别发表了题为《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和《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社论，热烈庆祝宁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0月27日，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汪锋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旗帜下，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的讲话。

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致敬电和致福建前线将士慰问电。

林伯渠在宁夏逗留期间，写下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诗篇，诗曰：“中华遍布各民族，于今团结史无先。划区自治兴宁夏，开府建基始银川。”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格平作了题为《苦干3年改变宁夏面貌》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宁夏地区的基本情况，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自治区成立后，刘格平除了开会，几乎全部时间都深入在基层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石嘴山、青铜峡、矿山、煤矿、机械厂、纺织厂、人民公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和足迹。刘格平正在规划着宁夏美好的未来。银川、



1959年，刘格平到吴忠、青铜峡等地视察

石嘴山、青铜峡等工业中心要尽快形成；银川还应该是宁夏的文化教育中心和



刘格平为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出铁剪彩

商业中心，要分批分期的兴建学校、医院、图书馆和文化馆；贫困的西海固地区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而首要的是要把铁路通到哪里；应该立即开始兴建年产5万吨钢的石嘴山钢铁联合企业，在石嘴山和石炭井建设现代化的煤炭工业基地，改变宁夏原有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状态……一张张宏伟的蓝图，

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的闪过。自治区政府成立不久，习仲勋副总理即过路宁夏视察，刘格平陪同习仲勋走遍了塞上的田野、厂矿和学校，他们期盼着能尽快改变宁夏落后的面貌，让宁夏这片土地上没有贫困和饥饿。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缺水和煤的问题，要大力兴修水利，防沙治沙，搞好环保，保持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宁夏越变越美好，让各族人民越来越幸福。

自治区成立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面貌得到基本改观。到1959年底，全区新兴办了300多个国营工矿企业。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达1亿多元，1959年达到1.5亿多元。宁夏钢厂的建立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结束了宁夏“手无寸铁”的落后状态。自治区的机械工业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已经能够生产机床皮带运输机、小型电动机、变压器、水泵、鼓风机、破碎机和其他新产品。1959年机械工业的产值，比以往历年的总和还增长1倍以上。国营石炭井煤矿改变了旧宁夏到处有煤而开采极少的情况，而且带动了整个能源工业的发展。1958年全区原煤产量达到120多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增长20多倍。当时，全区6个重点煤矿两天半的产量，就相当于1949年全区全年的原煤产量。电力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区绝大多数县市都有了电厂，有些公社也建起了小型电站。1958年全区发电量已达到1100多万度，为1949年的110多倍。随着电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青铜峡水电工程和石嘴山火电工程建成以后，自治区北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力网。轻纺工业、化工、建材、轻纺、食品等工业，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工业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有关县市的面貌。石嘴山由一年多以前只有6000多人口的小镇，发展成拥有6万多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银川、吴忠、固原、中卫等地也都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正在向工业城市的道路迈进。<sup>①</sup>

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58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15.6万斤，为1949年的两倍半，比1957年增长3成多。灌区12个县市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410斤。惠农县5万多农业人口交纳和交售的粮食，可以供应石嘴山6万多城镇人口的全年口粮。全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继续发展。山区的干旱面貌正在迅速变化。到1958年底，全区灌溉面积比1949年扩大了1倍多。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59年的牧羊增加了69万只，比上年增长了42.2%，全区牧羊相当于1949年的两倍半以上，这是全区牧业生产史上空前未有的特大丰收。生猪和鸡、鸭、鱼、兔也有了很大增长。

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包兰铁路的通车和通往北京、兰州航空线的通航，大大便利了自治区同全国各地的联系。1958年全区已有4000公里公路，比1949年以前增长两倍。全区所有县市都通了汽车，绝大部分公社都有公路和简易公路联系起来。并且做到了全部生产大队通邮，绝大部分生产大队通电话。一个通达全区的交通邮电网已经形成。

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1958年全区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达1亿多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总和。195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又比上年增长68%。两年来新装发电设备1.6万千瓦，各种机床400多台，新增煤炭年产能力250万吨，生铁冶炼能力约10万吨。基本建设队伍在逐步地成长起来。

由于各项生产建设的发展，财政收入也有所增长。1959年地方收入部分将比上年增长42%，相当于1950年地方收入的6倍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购买力不断增长。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各族人民要求学文化、学科学的强烈愿望，成为文教事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在1958年一年当中，小学生增加了11万人，中学生增加了8000多人；同1949年比较，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小学生增长了4倍半，中学生增长了12倍。1959年的小学生比上年增加7万人，中学生增加400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左右。在1958年一年之间创办了3所高等学校，结束了宁夏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的历史。在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中，许多青壮年摘掉了文盲帽子，开始掌握了文化知识。自治区和各县市都成立了科技推广站等机构，并且有几十个公社和几百个生产大队建立起了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组织，对于生产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由于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讲究卫生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风尚。医疗机构、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都大大增加，做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产院和保健站，小队有保健员和接生员。还建立起展览馆、图书馆、银川红旗剧院、银川艺术剧院等一批文化机构。<sup>①</sup>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在宁夏回汉人民的辛勤努力下，成立仅一年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自治区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也浸透着刘格平的心血。

正当刘格平全身心地带领宁夏各族人民，鼓足干劲投入宁夏建设中，一场他没有想到的灾难性运动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sup>①</sup> 李喆：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纪实，2009年《党史博览》第2期。



## 被诬陷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干部和支宁人员受到牵连，给宁夏回汉人民带来的伤痛刻骨铭心

1960年3月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会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刘格平到会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刘格平讲了七个问题：第一是要坚持工业企业中党的领导问题，他要求：“凡是企业中的重大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进行充分讨论”；第二是关于城市和工业要支援农业的问题，他指出，宁夏农业基础也十分薄弱，机关、城市居民和工矿企业都要尽最大力量在人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持农业；第三是关于自治区的工业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根据宁夏的实际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宁夏要以发展中小企业、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并注意发挥大型企业的骨干引领作用；第四是他从技术革新、提高职工素质、联合办厂、交流技术骨干等若干方面，阐述了如何依靠老企业发展新企业的问题；第五个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安排好外地来宁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第六是他从勤俭节约、提高效率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阐述了保持工业生产速度问题；第七个问题，他强调了要进一步落实好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宁夏。这个报告，反映了刘格平对下一步宁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体现出他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1960年3月1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银川召开。刘格平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他自豪地说：“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区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入60年代的第一年，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大好景象……我们相信，这次大会的任务一定会顺利完成！在这次大会以后，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跃进的更快、更好！”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这个讲话，反映出刘格平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刘格平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以来，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1960年4月起，在仅仅成立一年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始料未及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时隔许多年以后，这场运动给宁夏回汉人民所带来的伤痛，都抹之不去。当年曾经历这场运动、如今还健在的老人们提起那段往事，仍是铭心刻骨。

事情的诱因是民族服装问题。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宁夏也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全运会，开幕式上走过主席台的回族运动员代表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以此来展示宁夏的回族风情。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天安门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内蒙古、新疆、云南、西藏、宁夏、广西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游行活动。各少数民族代表身着绚丽多姿、款式新颖的本民族服装，行走在游行队伍中，宁夏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同样是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款款地从天安门走过。自治区领导在一起闲谈时，说道这两项国事活动，觉得回族的服装太单调。这时，刘格平想到，他在北京曾组织过多次少数民族活动，特别是在向毛主席献礼和国庆观礼活动中，全国其他少数民族的



刘格平（前排右3）在银川郊区参加劳动

服装鲜艳夺目、花色品种多样并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唯独回族的服饰过于单一，与其他少数民族比较起来显得逊色不少。刘格平还想到，今后宁夏参加全国性的重大活动还很多，回族也应该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可以代表本民族特色的、比较统一的民族服装。于是，他建议党委研究一下，可否由自治区政府抓一下



回族民族服装的设计和推广，以让全国人民更加了解回族，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0年初，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李景林主持的常委会研究，同意刘格平提出的关于民族服装的意见。刘格平即指示有关部门领导成立了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集体研究设计回族服装，并派人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搜集调查回族服装素材。经过反复设计，在原有的回族服饰的基础上，设计出了色彩亮丽、美观大方、样式新颖的若干套男、女回族服装，并由银川红旗服装厂的上海师傅精心制作了样服。样服制作好后，在原宁夏交际处召开了座谈会，还组织了一批回族干部试穿，刘格平夫妇到会，也各自选了一套服装试穿，还请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摄了纪录片。座谈会上，许多与会的回族同志都表示：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设计和改进民族服装，正是回族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象征，呈现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体现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自治区对回族的关怀。在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同志对新设计的回族服装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对此《宁夏日报》很快就刊发了摄影记者朱康洛拍摄的6张试穿会上的民族服装照片，还配发了文章，题目是《实用美观的回族服装》。座谈会后，经过筛选，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最终选定了几套服装作为回族少数民族服装，随后自治区派人送样品至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但时隔不久，就从北京传来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刘格平在北京受到批判，他制作民族服装是在搞地方民族主义，扩大民族差异，居心不良！”

1960年3月，刘格平到北京参加中央有关会议。会议刚结束，中央统战部和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安子文就找刘格平谈话，他们从刘格平与宁夏党委主要负责人汪锋的关系说起，对刘格平提出批评。根据当事者刘格平的回忆以及档案馆所存有关档



刘格平和夫人丁磊试穿了新研制的回族服装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案的记载，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李维汉说：“格平同志有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同党的关系怎么样，总想谈一谈，帮一下，对党，对格平同志都有益”，“据反映，格平任命的干部主要是回人，主要是从渤海地区调来的”，“格平同志与汪锋同志的关系搞得很紧张，长期难处理，汪锋同志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无论从工作、党性上说都是好同志，关系搞不好主要责任在格平”，李维汉还说：“我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刘格平同志有地方民族主义方面的东西，但党作了决定是服从的。现在看来第一句话恐怕是对的，第二句话对不对值得研究”，“我感觉格平有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安子文说：“我和刘格平是难友，一块坐过牢”，“宁夏的第一书记谁去适当，党是反复考虑了的，最后决定汪锋同志，因为他比较适当，能够看出问题，帮助格平同志，又不至于搞坏关系”。对此，刘格平作了情况说明：“对突然这样谈话，我感到吃惊。我对汪锋同志是尊重的，是我向主席、中央推荐的汪锋同志。但汪锋同志自己不愿意到宁夏，他与总理谈过这个想法。你们不好找主席、总理问，可以问陈老总、仲勋、小鹏同志。自治区成立一年多了，他作为第一书记仅来过几次，每次也只待几天。汪锋同志认为与我的级别相差太大，导致他没法工作。这些不是我的责任。”刘格平还说：“第二次全国人大宁夏只有5个名额，中央又要求少数民族人数要超过汉族。两名汉族是李景林和雷启霖，都有他们的代表性。所以，汪锋同志找我，要当人大代表，我没有办法解决。他有意见我怎么能负责？”李维汉听后说：“听了格平同志的意见，有两点：（1）事实同我们讲的有不少出入，（2）思想同我们也有很大的距离。请格平同志再想一想，以后怎么办，或者我们几个人继续谈，或者在区党委的书记处会议上把问题谈清楚，待研究后再决定”。这次谈话就此结束，但刘格平已经意识到，“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事情不会那样简单。

果然不出所料，在1960年3月30日至4月26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负责人参加，在北京召开了扩大范围的所谓“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统战部江平，中央组织部赵卓云，国家民委刘春、杨静仁，全国人大谢扶民、于超、夏辅仁，宁夏马玉槐、李景林、吴生秀、甘春雷，还有韩戈鲁、刘冠英、张杰、苏克勤等人，他们在座谈会上先后



发言，对刘格平进行批评。刘格平在会上提出：第一，许多同志并不清楚宁夏的情况，却说宁夏的事情，有的对不上号，显然是受人指使。第二，既然主要说我与汪锋同志的团结问题，为什么开始时汪锋同志不参加会？刘格平多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以至于连一些参会的同志也对这次会议的目的表示怀疑。

由于北京座谈会效果不明显，经请示，中央有关领导明确表示：人家既然提出了问题，就得搞清楚嘛！

于是，1960年5月6日至7月2日，自治区党委在原宁夏交际处会议礼堂召开了“自治区党委第一届七次扩大会议”，全区各厅局、各委办、各市县的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亲自主持大会，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以中央工作组组长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由此，一场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正式拉开了大幕。刘格平回到银川后才知道，在北京所谓“座谈会”的同时，在银川事先已经对一些人进行了批判。

宁夏党委的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定好了调子，对“以刘格平为首，王志强为副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完全违反了中央领导“搞清楚”的指示。会议从1960年5月6日至11日，要求全体区党委委员必须出席，首先由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说明会议议题后，接着组织传达了在北京关于刘格平问题的谈话纪要，却完全不提刘格平所进行申辩的内容。之后，会议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60年5月7日至11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背对背进行“揭发”。这次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完全摒弃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是先入为主，事前罗织好“罪行”，再逼迫每个人按这些“罪行”去拼凑，从自治区党委、政府到各厅局、区县，凡参会者层层过筛子，每个人都必须表态必须揭发问题。最后逼迫本人承认，如果谁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就进行轮番批斗，利诱加逼供。会议的始作俑者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或者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上纲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给刘格平等人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等帽子，会议规模开的越来越大，“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也越打越多。

第二阶段开始进行大会“揭发和批判”，还要求主要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分子刘格平、王志强、丁毅民<sup>①</sup>、王克、李微冬同志在会上作“检查”。每当刘格平作“检查”时，会议范围扩大到处级、科级以及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1960年5月23日，自治区建工局局长丁毅民在大会作完“检查”后，大会当场宣布了对他的处分决定：逮捕法办，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的主持者竟公开宣称，这是“杀鸡给猴看”，这是不老实、不与刘格平划清界限的人的下场。

会议进行的第三阶段，将与会者划分成5个小组，第一小组重点斗争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第二小组重点斗争王志强，第三小组重点斗争李微冬，第四小组重点斗争王克和丁毅民，第五小组重点斗争刘格平。直到1960年7月2日，历时近两个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届第七次党委扩大会议”才宣告结束。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届七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揪出了“以刘格平为首，王志强为副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罪行”是将原来在北京所批评的问题进一步扩大，指责刘格平等人搞“独立王国”，具体内容是：过分要求各部门配备回族负责干部、在干部问题上大搞“渤海圈”“回回圈”“亲信圈”和“亲戚圈”；片面强调在回族聚居地安排工业企业和修筑铁路；主张穿戴回族服装扩大民族差距等，甚至自治区成立时，在银川市建的南门广场上仿古的门楼式观礼台，也被说成是“小天安门”，成为想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当然，仅仅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罗织“反党”的“罪行”。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当年毛泽东主席都肯定的事情，拿出来与刘格平算总账，他们指责刘格平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反对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和剥削制度，是民族宗教上层混入党内的代理人。他们还诬陷刘格平对达赖心存幻想，企图把达赖拉入党内；诬陷刘格平热衷民族武装，反对党对这些武装的领导。他们精心编造出刘格平“指使王志强陷害第一书记汪锋”、“指使李微冬陷害第二书记李景林”、“指使丁毅民陷害书记处书记马玉槐”三大陷害案，进而达到把一大批干部均打入这个“集团的”目的。在这次所谓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一案中，受到牵连的厅级以

---

<sup>①</sup> 丁毅民，1921年生于山东沂水回民之家，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鲁中区党委回民协会副主任、鲁中回民支队政委。建国后任青年团滕县地委书记、团徐州市委书记、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秘书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工程局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顾委副主任。



上领导干部20多人，其中受到党政处分的13人。

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彻头彻尾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和自治区主席职务的处分；王志强，刘格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副主席、省委常委和银川市第一书记兼市长职务的处分；李微冬，刘格平反党集团的谋士、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和贪污分子，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区党委委员、自治区文化教育厅厅长），开除党籍的处分；王克，刘格平的亲信，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建委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丁毅民，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贪污分子，予以逮捕法办；马思义，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撤销党内外（区党委委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一切职务，停职反省；韩觉民，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区党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马世芬，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撤销商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工资降2级处分；张英达，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财政厅副厅长职务，工资降3级处分；李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撤销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职务，工资降1级处分；金晓村，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撤销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职务，工资降1级处分；马有德，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自治区冶金局局长）的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马杰，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职务，工资降3级处分，这些同志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或抗战以前参加革命的回族同志。其中，马思义在1939至1941年间，多次率领西海固回民举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暴动，最多时队伍达两万多人，在遭到国民党数万人的围剿后，马思义毅然带领余部投奔陕甘宁边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党中央批准将回民起义军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并派遣杨静仁担任政治教员。马杰，毛主席曾因为他的报告而专门写了《批判大汉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族主义》一文，他还被毛主席称赞是“懂民族政策的同志”<sup>①</sup>。李建，是汉族同志，只是在批判刘格平时，建议让刘格平坐下，随后就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处理。还有一大批干部，他们或受到批评，或被调离工作岗位，如：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罗成德，市委常委刘震寰，厅局级干部杨沧、彭林柏、金民、李安民、韩道仁等，许多人不得不说违心的话才勉强过关。

1960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也出现了问题，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许多工业停顿；“大跃进”呈报的工业、农业产值、产量水分太大，粮食亏空；紧接着又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可是宁夏有一帮人却正在整人的兴头上，继续进行着他们的恶作剧。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一结束，他们接着在宁夏发动了“反对坏人坏事”运动（即“双反”运动）。

还是在自治区成立前，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刘格平、丁毅民多次赴上海、浙江等地，争取了大批青年支援宁夏建设。因此，“反对坏人坏事”运动的重点，是把上海、浙江支宁青年作为刘格平反党集团的“毛毛根”挖除。可怜那些胸怀志向、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投入到西北开发、边疆建设的青年们，转眼间就成为“反坏人坏事”运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宁夏高层领导不顾党纪国法，竟把捕人特权下放到基层工作站和农场生产队，还指示按人口比例捕人，捕人不限数字，坏人有多少捕多少；捕人不用司法程序，先捕后报材料；要随斗、随捕、随判、随送劳改。他们胡说：“双反”运动就是对半开，四六开，成绩也是主要的，你们放手去搞，捕错了将来把人放了向他作个揖就算了……在一系列罪恶的论调指导下，宁夏大地一时间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他们为防止支宁青年逃跑还封锁交通，出行要开证明，在各车站都派人驻守，发现就抓起来押回。瑞安支宁青年黄长松逃跑被逮，当场用利器刺穿其两腿。那时，许多基层单位每晚开会点名者就是灾难降身，无情的批斗吊打，撕心裂肺的捆绑，跪煤渣坐老虎凳，经受了连续轮番审问的精神摧残和严刑毒打逼供。

罪恶的“双反”运动，从1960年9月中旬开始至12月底，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逮捕了4万多人，被迫害折磨致死的就有1.2万多人，还不计算各基层单位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



和农场生产队所设的牢监，集训队管制劳动人数和被折磨打死的人数。复员军人何传美，1955年参加人民解放军，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在部队荣立11次军功，1957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炮兵战斗训练积极分子大会，并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接见和合影留念。1960年光荣复员后就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并动员两个弟弟放弃小学教师等工作和妹妹及母亲（农村妇女干部）全家5口一起支宁，安置在平罗县国营前进农场第4队任2连连长，他工作积极能干，又被评为五好支宁青年干部，只是由于他看到“双反”运动惨无人道的批斗吊打乱捕人，出于连长的应有责任和军人的正气，在9月16日的批斗会上提出反对乱捕人，抗议迫害浙江支宁青年，就被定为“破坏双反”运动，用麻绳捆绑双手，下顶上拉，当场昏厥。被送到临时牢监后，又遭监管人员毒打搜身，没收钱物后再被强迫去挖西干渠。何传美回忆：“犯人”干的是开渠挖泥掀土的重活，又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可口粮名义上一个月只有16市斤，还要经过监管人员的盘剥。那时，几乎天天都有冻死、饿死、打死、累死的犯人，西干渠两侧成为冤死鬼的乱尸坑。何传美是个身体健壮的青年，他从五好战士受毛主席接见合影留念到响应政府号召支宁，再到沦为“双反”的阶下囚，受冻挨饿、干重活、遭毒打，被折磨的已是遍体鳞伤、全身浮肿便血，这才被放回家。他在病危中还凝视着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还在想念着离开浙江瑞安时敲锣打鼓戴大红花欢送他去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激动场面，没有想到来宁夏仅几个月，就被“双反”运动残害惨死，年仅25岁。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刘格平最初没有太在乎，他还安慰夫人丁磊：“运动嘛，总得闹哄一阵子，就当作是党对我们的审查和考验。既然许多事说的不是事实，那我们怕什么，早晚总会清楚的。”经受过大风大浪的他，心情十分平静，照样有饭就吃，有觉就睡，默默承受着这场考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意识到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已经完全到了不顾党纪国法，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不仅仅是要扳倒刘格平，还要置他于死地，他们限制了刘格平的自由，想把刘格平就地困死在宁夏。刘格平经过考虑后，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通过“红机”电话直接联系到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回到北京。童小鹏在请示了总理后，与宁夏方面进行了联系，他说：“刘格平是中央委员，有问题也是中央处理，地方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应该让他回到北京来。”这才使刘格平免遭更大的厄运。

刘格平虽然走了，可一大批干部被继续的摧残，折磨。其中最苦的要数丁毅民，因为他坚决不承认反党，被当作杀鸡给猴看的典型当场逮捕后，被领导指示要“特别改造”。在狱中，开始是在每个月改善伙食时，让他这个回族到食堂去炒猪肉，然后说他炒得不好就逼他吃猪肉，最后让他专门去刮猪皮。

1960年10月底，刘格平夫妇告别了寄托着太多情怀的宁夏，残酷批判的风尘告别了割舍不断牵挂的宁夏回到北京。当初到宁夏时，因为几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的缘故，刘格平在北京景山东街的住房，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批准得以保留，这使刘格平回到北京后还有一个栖身之所。尽管临近冬天寒气逼人格外难熬，但挨了几个月批判的刘格平回到家中，终于又享受到温暖。从上次开完会离京到这次回京，屈指算来已近半年。原来每次到京，不是办事就是开会，结束后就匆匆离开，在家几乎不做停留。这次回家，刘格平和丁磊不能把宁夏发生的事情告诉家人，因为孩子还小，更主要的是家中还有一位跟随他们生活的老人——丁磊的母亲。丁磊一共兄妹3人，唯一的哥哥丁毅民铛铛入狱，如果被母亲知道，不知她老人家会多么悲伤，毕竟他已经年过6旬且有严重的高血压呀！刘格平与丁磊商量好，对家人就说工作调动，短期不会离开北京了。这个消息让全家人倍感高兴，尤其是几个女儿，连续许多天的傍晚，一放学就围上爸妈说这说那。

经过思考，刘格平决定向中央提出申诉。他想，即使有错误，至少应该把错误揽过来而不要牵连其他同志。他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关押了10年，那时的精神是饱满、斗志昂扬的，因为那是与反动派作斗争，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而今天呢？一个不惜生命而捍卫党的尊严的人，却被说成是“反党”，许多问题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茫然无限。这时已近年底，和睦、温暖的家庭气氛令他实在不愿意总将自己置于一种郁闷甚至痛苦的思维中。一切等年过后再说，刘格平这样想。

但是还没到过年，刘格平就被习仲勋派人接到到人民大会堂。习仲勋是在



那里开会，利用会中的间隙将刘格平找过去的。两人见面握手后，习仲勋的第一句话是：“兄长啊，在宁夏受苦了。”刘格平说：“那没什么，但说我反党，想不通。”两人互致了几句礼节问候的话，习仲勋说：“组织上让我告诉你，先安排你在中央党校学习，组织和生活关系也都介绍过去。”刘格平知道，党内一些犯过错误的高级干部都是先被送往那里的，比如彭德怀。但他的心中毕竟有冤气，便说：“我还是想找主席、总理或小平同志谈一下。”习仲勋说：“格平同志，不找了吧。现在统战部正在对事情进行调查了解，最后要形成一个材料，咱要相信组织。再说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一下也不是坏事情，你回到北京来，总的先有个单位管吧。”刘格平体谅习仲勋的难处，不好再说什么。<sup>①</sup>

1961年元旦一过，刘格平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名学员。他首先去拜访中央党校的校长杨献珍，顺便想让他给推荐一些马列原著也包括民族方面的图书。杨献珍与刘格平是老熟人了，当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他们是狱友，那时就读过他编写的共产主义读本。建国以后他们也时有来往，他比刘格平大几岁，所以刘格平对他很尊重。在刘格平的印象里，杨献珍是一个性格刚直，在党内有资格、有学养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因为太忙而顾不上看文件的缘故吧，刘格平并不知道，杨献珍竟然也受到了批判并被撤销了校长的职务，他们两人又一次成了“难友”。相互寒暄之后，杨献珍告知刘格平，他马上将按照组织要求到外地去调研考察，实际上是被下放了。刘格平对杨献珍说：“那你的时间更多了，希望下去之前能给开列一些供学习的图书目录，包括马列关于民族方面的经典。”杨献珍答应下来。

这样，刘格平在中央党校安安稳稳地做起了“寓公”，而且一做就是5年，好在读读书看看文件，自己觉得倒也收获多多。像刘格平他们这类人进党校，是没有时间和任务要求的，主要是自学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央文件。因为当时粮油肉副食等都是定量供应的，他们也不例外，所以生活关系也都放在了中央党校。在党校，刘格平还真读了不少书，包括像《自然辩证法》这样的大部头经典。尤其是，他涉猎了领袖人物有关民族问题的众多著述，像马克思、恩格斯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10本书；列宁的《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提纲》；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等等，刘格平还摘抄了大量散见于各经典中的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除此外，他还按照杨献珍的建议，看一些国内的选编本，如《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共有5册）等。为了弄清一些事件、人物等情况和背景，刘格平还读了一些辅助著作，例如：列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斯大林《论列宁》，每逢周六还带一些书回家让夫人丁磊一起读。从刘格平残存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阶段，他以实实在在的努力使自己的马克思理论功底有了很大的提高。

刘格平一边学习一边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思考。然而，每到仅剩自己独自坐在书房兼办公室时，刘格平总能想起宁夏发生的事情。他想到自己的个性，可能是因为太认真太原则而得罪了一些同志，譬如那位宁夏的主要领导提出的级别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既然向自己开了口，又何必将他顶回去，更何况仅仅是向中央反映一下。为这件事情，丁磊也说了好几次，叫自己是“倔杠头”；刘格平还想到，关于宁夏的建设问题，可能是自己太急了，譬如从银川到固原的铁路建设，当时就有不同意见，尽管自己多次找李富春、习仲勋甚至周恩来去争取，但除了国家给一部分资金外还是要消耗不少宁夏的财力；至于民族服装问题，那个“白帽”、那个“盖头”本来已经在回族民间习以为常了，自己又何必去多管闲事多插上一手呢？……想来想去，感到自己还是有许多问题的。但再仔细琢磨，事情又不那么简单，人有缺点或错误在所难免，也构不成反党呀？更何况还组织了“反党集团”！修铁路只能加强内地和边疆的联系，怎么能说成是要搞“独立王国”呢？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为自己忏悔，没有完成好中央交给的任务，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他为因此而受到牵连的干部们惋惜，是自己工作的不当而给他们带来了厄运。他更为成千上万的支宁青年而痛惜，他们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告别自己的亲人和家乡，满怀激情地来到边疆建设宁夏，仅仅两年时间就沦为阶下囚甚至惨死他乡。



许多年以后，80多岁高龄的刘格平再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每见到那些因为他而被株连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同志、老部下，还有那些逝者的遗孀时，总是深深地道一声“对不起”。尽管，这3个字本不应该由他的嘴里说出！

刘格平在中央党校的几年，接触、遇到一些事情。

大约是1961年6月上旬，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来到党校找杨献珍。刘格平当年在沧县二中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刘建勋是30年代初期在沧县二中加入的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刘格平将刘建勋送上了革命道路，所以他们比较熟悉。解放初期，刘建勋先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7年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最近又刚接到中央调他主政河南的通知。这次他找杨献珍，是因为杨献珍在1959年底到河南蹲点调研时发现哪里的“共产风”、“浮夸风”十分严重，便从哲学角度对河南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批评，还写了专门文章，但没想到为此受到批判还被撤了职，刘建勋还是想听一下杨献珍的看法。不巧，杨献珍下放后还没有回来，却和刘格平在党校不期而遇，他们也就顺便扯起了河南发生的事情。

刘格平记得，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时，当时的河南第二书记突然发言，指责第一书记潘复生思想右倾，反对大跃进和大食堂，拖了河南的后腿。刘格平虽然对河南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还是感到这个发言有问题。这位第二书记是中央委员，而作为第一书记的潘复生仅是中央候补委员，两个人的认识分歧本可以私下交流沟通，怎么突然拿到中央全会上来呢？这让人感觉不舒服不对劲，有以势压人不配合工作之嫌，作为一个老同志也显得太没姿态。可是当时中央的几位领导都表态支持这位第二书记，甚至还把抱病缺席会议的潘复生又叫到会上进行了批判，这让刘格平也没有想到，刘格平也没有参加完这次会。

后来，刘格平从相关的文件上得知，这位第二书记领到了“尚方宝剑”，回到河南后就组织材料召开会议，对第一书记潘复生进行了批判，将其打成反党集团后取而代之。这件事当时思忖起来，就让人心中感到有点滑稽，现在联想到自己，在宁夏发生的事情不正是这种滑稽的重演吗？那位第二书记主政下的河南，在1959年至1960年，发生了饿死百万人口的“信阳事件”，震动全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国。杨献珍发现的河南的问题，不正是哪位取代潘复生的老同志主政后提倡浮夸和虚报造成的恶果吗？1960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到信阳调查后，明确批示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这一闹剧才最终得以平息，刘建勋正是在这个时刻受命去替换那位老同志的。然而，迟到的结果并不能挽回遭遇涂炭的百万生灵，刘格平觉得我们党似乎出了问题，但他不敢往深处想也不敢往深处说。

1961年底，杨献珍又回到党校。校长是当不成了，只是担任副校长。这使杨献珍与刘格平交流的时间也多一些。还有党校的李广文，是刘格平在山东、渤海区的老熟人。他们常在在一起，回忆战争年代的人和事，也时常讨论一些诸如工业、农业方面、中苏关系方面的问题。当然，只要杨献珍在时，讨论最多的是哲学问题。他们还经常到刘格平家中做客，李广文特别愿意吃羊肉，那时候都是供应，因为是回族，刘格平家能定期得到一些羊肉，他专门吩咐要省下来一些招待客人。杨献珍刚结婚不久，他的爱人与丁磊成了好朋友，丁磊还为她的侄女找了一个外交部的对象，做了一回媒人。当时社会上正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使丁磊，包括孩子们都成了哲学迷，又有杨献珍这样的大哲学家，丁磊找机会就问这问那，刘格平借此机会要求丁磊，也认真读起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一切，都使刘格平乃至全家的生活增添了情趣，无形中冲淡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1962年，刘格平还看到了李维汉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承认“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但不久，李维汉也因为对统战工作中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而遭受了批判和撤职。

1963年元旦刚过，中央任命贾震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贾震也是津南地区的老党员，是刘格平在津南建党时的重要骨干。在贾震来到后不久，习仲勋因为受到批判到了中央党校，但刘格平是在党校内学习居住，而习仲勋住在党校外离党校不远的一座小院里，由贾震专门负责与他联系，刘格平听说后立即去看望了习仲勋。此后，他们也时有见面。



中央党校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党不断地搞运动，不断的有犯错误的干部被送进来学习，凡来的人连同组织关系、供应关系等手续也都交给了党校。虽然看文件、阅读材料的时间有所相错，但大家难免时常碰面，见面时相互问候，再扯一些学习、时局方面的事情，对各自所谓的什么错误和问题，都是缄口不言的。

尽管如此，刘格平还是得知，对刘格平的批判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亲自批示的。在他从宁夏回到北京后，有人力主对他给予行政降级的处分，但遭到周恩来总理的劝解。周总理说，刘格平同志的级别是毛主席确定的，他是少数民族老同志，还是保留为好，先让他到党校去学习吧。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再一次保护了刘格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刘格平就被确定为行政3级。其由来十分简单：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选出了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7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经政务院提议并经中央人民政府研究确定，对公职人员的薪酬实行供给制，但也需要确定标准。63位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成为第一批实行供给制的政府公职人员，级别是1—3级。之后，毛主席提议，凡中共党员一律都定为3级，包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他自己。这样，一直到1955年进行工资改革时，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一直都是3级。

1955年工资改革，从供给制到发放货币的工资制。毛主席再次被确定为1级，但他再一次带头让级。毛主席一带头，大家就都让起来。刘格平记得，让级本是党内的事情，但当时还有党外人士提出让级，多数人当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当时，刘格平就提出让2级，定为行政5级。因为毛主席自己要从1级让到3级。但毛主席并不提倡大家都让，最后确定的原则是：3级中除个别调整外，原则上不动。中共党员的1级和2级都统一退到2级。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情况，一直没有再变化。实际上，那时的3级干部，已经基本上都是国家领导人了，因此刘格平仍然主动提出了让级的请求。原本在1954年召开全国第一次人大和二次政协时，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3名少数民族的安排是，乌兰夫担任副总理，刘格平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担任政协副主席。但因为达赖和班禅进京，对他们必须做出安排，这就涉及少数民族名额比例问题。中央委托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陈毅征求刘格平的意见，刘格平表示决不让中央为难，服从中央的安排，得到毛主席高度的肯定。所以，当1955年涉及到刘格平的级别时，毛主席说：上次作为共产党员让了职务，这次沾一回穆罕默德（少数民族）的光，级别就不要再让了。这样，在党内干部中，不是国家领导人而享受行政3级的，唯有刘格平。在当时，谁都应该明白，毛主席说这句话的意思。可后来，毛主席这句风趣的话，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成了批判刘格平的依据。

刘格平在党校学习期间，还应中央通知参加了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3月底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及1963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刘格平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但却没有让他继续履行他仍然担任的全国人大民委主任职责。

1964年夏，刘格平到北戴河度假，等再回到中央党校时，杨献珍因为“合二而一”的理论再次受到批判。1965年初，刘格平被中央抽派到河南新乡进行“四清”工作。“四清”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四清”的内容也有变化，先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农村，刘格平化名刘木，他坚持与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保持一致，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基层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65年9至10月间，中央研究对一批干部进行了重新安置。杨献珍被调离中央党校到中科院哲学所担任副所长，习仲勋被安排到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刘格平则被安排到山西省任副省长，刘格平与习仲勋、杨献珍等依依惜别。

6年后，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1960年“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就成为运动的焦点。要造“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就必然要翻1960年的案。当年2万多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坏分子，涉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宽，影响面之大，成为左右宁夏“文革”的性质和进程的关键因素。一时间，有关宁夏的“地方民族主义”案件资料、大字报、揭发材料如雪片般送到中共中央。中央对宁夏“文革”出现的情况非常重视。如果不解决1960年这一案，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无法进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无法落



实。由于毛主席、周总理要刘格平把山西的工作管起来，他在山西负有了重要的责任，宁夏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也会对山西的“文革”产生影响，刘格平在山西也难于开展工作。

1967年7月，周恩来总理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特邀宁夏的丁毅民出席。周总理在会上郑重

宣布：“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陷害案，今天给刘格平、丁毅民同志平反。其他被陷害的同志此后将逐一进行甄别。”

1967年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与中央文革等有关人员一起接见了当时宁夏各派和兰州军区、宁夏军区在北京的代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说：“丁毅民是回族同志，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党籍几年了？（丁毅民回答：8年）还坐过牢，坐了几年？（丁毅民回答：3年）这个干部原来是在山东的，你的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吧？（丁毅民回答：我要检查。）应该检查一下。今天，总理等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就不要什么文件了，有这么多人证明吗！顺便讲一下，有些同志还没有平反，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再解决。”周总理说：

“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到此，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行了解决。在宁夏，因为刘格平不久即被“打倒”，这个案子又一拖再拖，直到1979年，自治区党委才为“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中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成员的其余12名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彻底全部平反，在平反文件中还特别注明：

“刘格平的问题由中央直接处理。”



1971年，丁毅民（右3）、刘淑卿（右4）与郭爱培（右2）、郭华（右1）、李微东（右6）、王伟（左4）、丁力（左3）、丁明（左2）等亲朋合影

那么这场冤案是怎样发生的呢？直到1981年5月，刘格平在给章蕴<sup>①</sup>转胡耀邦并中共中央《我的申诉和请求》中，才披露了这场冤案的来龙去脉。现照原文摘录如下：

1960年，我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不到两年，就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头子”而受到处分，不仅被剥夺了长达5年为党工作的权利，还牵连了一大批同志蒙受冤屈。至今，我没有见到任何正式的组织结论。

那年宁夏的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反对坏人坏事运动”，完全是一些人为了个人私利所精心炮制的一桩冤假错案。

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毛主席、党中央落实民族政策的重大决策。在1954年上半年，因为撤销宁夏省，我向李维汉同志提出应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建议，李维汉很快就向毛主席进行了反映。后来，总理、陈毅和仲勋同志找我谈话，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指示。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见是：这是一个落实少数民族权益的重要问题，但是不能着急，必须先做好调研，包括选址、地域范围、工农业经济均衡情况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等，好事情要办好。几位中央领导要求我抓一下这项工作，还说几个民族自治区的前期工作都要逐步安排。我当时表示，希望能选派其他同志尤其是有民族工作经验的汉族同志来做这项工作，我一定尽力协助。总理不让我再推脱了，他说也征求了维汉同志的意见，都共同认为我是最好的人选。总理让我不要有顾虑，涉及各方面配合的问题，由仲勋同志做好协调。在我向民委党组汇报这件事情时，汪锋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提出要主动去协调西北方面。这对我来说求之不得，考虑他又刚调进北京，也正好借此熟悉工作，所以把这方面的许多事就交给了他。同时，考虑到回民文化协进会对回族工作相对熟悉，也安排他到回协做一些工作。这个机构是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主要是协助政府落实民族政策，调查研究回族的文化、历史与现状，接待回民群众来信来访。

1958年自治区成立前，毛主席找我谈干部配备问题时，我再次提出希

<sup>①</sup> 章蕴，1905年生于湖南长沙，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八大”后补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纪委常委、中纪委副书记。



望派汉族同志担任自治区的一把手，我还推荐了汪锋同志。之后，仲勋同志找我，说原来中央确定由我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同志担任第二书记，这个安排已经基本与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西北局协商确定，如果再变更第一书记，又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表态说，汪锋同志如果确定下来，李景林同志也不需要变动，请中央放心，我不会有任何意见。不久，中央基本按照我的意见确定了对宁夏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汪锋却对此大为不满，他找我发牢骚，说是本来他要到甘肃的，是我坏了他的事。我向汪锋同志解释说，看他对自治区成立的事一直很上心，以为他是想到宁夏的，因此才向中央做了推荐。汪锋同志却说：“你占着宁夏工委书记，把人都调好了再让我去，你的级别又比我高，我去了怎么干？还让回协看着我。所以，我早做了去甘肃的打算，都活动的差不多了你又插一杠子。”他这样说让我哭笑不得，只能承认是好心办了坏事，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总理当着我们的面批评了汪锋同志，我才知道他还去找了总理。（略）

1960年四五月间，我到北京开会期间，李维汉、安子文同志突然找我谈话，批评我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谈了一些宁夏的事情，我不清楚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许多与事实不符。我感到很吃惊，向他们做了解释。李维汉同志当时说：“听了格平同志的意见，事实同我们了解的有不少出入，但思想同我们也有很大的距离。”他这话虽然自相矛盾，但考虑他们代表中央，我也做了检查并表示今后工作中会多加注意，避免犯错误。

但没想到一回宁夏，等待我的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给我定的罪名，一是将我提出的各部门要注意配备回族干部的要求，歪曲为在干部问题上搞“回回圈”、“渤海圈”、“亲信圈”；二是说我指使王志强、李微冬、丁毅民政治陷害（个别）同志；三是我在国家民委曾连续几年负责国庆期间少数民族向毛主席的献礼活动，感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比较整齐而回族的服装比较乱，便与汪锋、李景林交换意见后，由李景林同志主持会议研究同意，由我负责落实把回族服装做一些改进，主要是统一起

来。于是，我指示有关部门成立了一个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在原有的回族服饰的基础上，设计制作出新式的回族男、女样服。因此给我扣上“大搞地方民族主义”、“有意扩大民族差异”的帽子；四是我因为工作忙而没有参加1958年6月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召开、李维汉同志主持的“关于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便被扣上“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反对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的帽子，还污蔑我是“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五是指责我在落后的回族聚居地安排一些工业企业，修建铁路和公路是搞“独立王国”；六是1954年中央派我全程陪同进京的达赖，并且对他做一些工作以增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后来，达赖向毛主席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被毛主席婉拒，再后来达赖逃到国外。在批判我时，说我对达赖丧失警惕，还要拉其入党，误导了中央的判断等等。因为我，一大批同志被抓、被关、被撤职。批判我时，我提出有些问题需要向中央去谈而不便在宁夏说，（有人）说，你的问题就在宁夏说清楚，不要再想回北京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打电话找了总理，总理让童小鹏同志与宁夏交涉说，刘格平是中央管的干部，有问题也是中央处理，这样我才得以回到北京。

1960年10月，仲勋同志找我到人大大会堂，他说我的问题中央清楚，统战部正在对事情进行调查，需要等一等，让我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后来我见到李维汉、安子文同志，他们都说不清楚在宁夏发生的事情。（略）维汉同志还告诉我，全国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都有扩大化问题，马上要出一个文件予以纠正。但不久，李维汉同志也受到批判，1962年习仲勋同志也被撤职进入中央党校，我的问题甄别也就不了了之。直到1964年底，中央让我到河南去搞四清，1965年底任命我为山西副省长，都是按照犯错误的干部做出的安排。



## 临危受命被卷入文化大革命漩涡，为稳定山西局势殚精竭虑，终因力不从心难挽狂澜，被诬反军乱军失去为党工作机会

1965年秋，中央任命刘格平为山西省副省长，要求即刻赴任。山西地处华北地区，因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刘格平早在1931年就到过山西做兵运工作，还差一点留在山西，几十年以后再回到山西，也算是故地重返。

刘格平在太原的新家就在省政府大院内，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据说这是阎锡山的故居。这座小楼被从中间分隔，东西各开了一个大门，刘格平住在小楼的东半边，西半边住的是早刘格平几天到太原的开国大将黄克诚<sup>①</sup>。刘格平与黄克诚彼此认识，但工作上联系不多。黄克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虽然行政级别比刘格平低一级，但在职务上是刘格平的领导，他是因为彭德怀一案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处理而“发配”山西的。刘格平经过党校的几年学习，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晰了，党内斗争是很残酷的，自己不就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党分子”吗？所以，刘格平夫妇将家草草安顿后，就立即去拜访了黄克诚。他们之间相互都十分客气，因为是邻居，也可以说是“难友”，闲时一起下下棋，政治上的事情彼此心



1965年7月，刘格平（中排左2）在山西晋东南参加“四清”工作留影

<sup>①</sup> 《黄克诚在山西的非常岁月》，载《湘潮》2014年第9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格平考察晋东南沁县农村小学

照不宣，均不谈起。

到山西后不久，按照例行程序，1965年11月，刘格平、黄克诚均被山西省人大选为副省长。12月，刘格平即被省委抽调去搞“四清”。应刘格平的要求，他被派往当年搞兵运的晋东南沁县迎春公社陈村大队。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动了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6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向全国播发了打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此鼓动下，北京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除“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在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随之又推向党政机关。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群众中成立。他们自封造反派，揪斗校长、院长并波及到普通干部和老师。8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中央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18日，毛泽东带领中央领导在天安门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号召要把运动推向全国，发动群众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

在农村进行“四清”工作的刘格平，对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和活动并不了解，思想也还跟不上趟。1966年10月下旬，刘格平由沁县农村四清点上回到太原，准备参加省“三千会”。恰巧就在这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的丁粹华回到太原。她是因为学校停课，先到了上海丁立华那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也热闹起来，串联的红卫兵很多，大字报也很多，还时有抄家、破四旧的事情。丁粹华到同济、交大看了几天大字报，决定还是回太原家中。这时刘



格平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连感性认识都没有，当粹华向刘格平介绍北京、上海红卫兵造反、揪走资派的情况时，刘格平很严肃地对粹华说：“你们还是太年轻，毛主席说造走资派的反，可不是谁的反都造，更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不要党的领导。你们既然不上课了，就到太原钢铁厂劳动、实习吧。”他把丁粹华送到了太钢去体验生活。丁粹华回到太原时，正赶上妹妹秀华要与同学们跑出去参加红卫兵“大串联”。秀华快过年了才从延安跑回来，还带回了一身虱子。回来后，家里人仍很少看到她，每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刘格平很担心，专门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跑，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她只听不說話，该跑还是跑，也不太和家里人交谈，家里谁也拿她没办法。

因为家中红卫兵的突然到来，粹华被丁磊从太钢叫回了家。

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来到太原，找到刘格平的家，一定要见刘格平。也真难为他们，不知他们费了多大工夫，因为在此之前，知道刘格平住处的人很少很少。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来访，给刘格平带来好几张《反共启事》的影印件，其中有一张为1936年8月31日国民党《华北日报》上刊登的《反共启事》，上有徐子文（薄一波）等61个人的签名，问刘格平认不认得，想找他求证。刘格平看到报纸后十分吃惊，看报上签名字的人，其中有的知道，有的不熟悉，但肯定是当时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过去他只知道党组织把一大批党员营救出狱，但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他也从没看到过这些报纸。刘格平还记得，《反共启事》是敌人拟就好的，狱中的共产党人只要签字或按手印后，就可以出狱。但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变节行为，尤其是一旦被敌人登报，损害党的形象事小，涣散人心瓦解党的组织，可就是大事。当时大家约定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去签登《反共启事》，



刘格平（左4）在山西考察水利灌溉情况



部分反共启事影印件

自己就是一直到1944年刑满才被释放的。可面对手持报纸的红卫兵，刘格平又没有办法回答，他只问了学生们查找报纸的过程，对于其他问题，先尽量推脱。

晚上，刘格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仔细地思考着，当年监狱的情况历历在目。那时，他们一批共产党人都关在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监狱分成南监和北监，每个监都有一个地下党的支部，刘格平是北监的党支部书记。监狱里的革命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来有人从外面传进话来，说北方局指示狱中的人可以

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但同志们都怀疑外边传话的真假，认为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给国民党写了悔过书，那性质就变了，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所不允许的。此后，便再也没有传来什么消息，也没人再向他提及有关的事情。他只知道1936年这一年中，有不少人陆续被组织营救出狱，但不清楚是怎样营救的。而且，经常还有转狱的人，并没有引起无关人的注意。刘格平只是想，组织没有营救自己总有一定原因，也就抱定了把监牢坐下去的决心，自己总共坐满10年，是1944年刑满出狱的。

10年的监狱生活真是不堪回首，他想到这些，脑子里一片混乱，真不清楚如今看到的报纸是怎么回事。在他脑海里，有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答案，毕竟白纸黑字摆在眼前，可是又总冒出“不会”、“不可能”的想法。他对国民党不信任，他告诉学生们，这可能是国民党的骗局，再说党组织对党员的历史问题审查是很严格的，肯定早就知道这事，希望他们不要再到处散布，因为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

但是，南开红卫兵越来越多。这些执着的红卫兵们，不达目的是坚决不走



的，他们索性就住在刘格平家。院子里，大厅内、走廊上甚至连黄克诚的院内都住上了红卫兵。到白天，他们就围住刘格平，开始喊的口号是“刘格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红卫兵开会又改变了策略，口号喊成“欢迎刘格平回到革命队伍来”。刘格平看着这群孩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通过接触，刘格平慢慢搞清了红卫兵的意图。他们说，是康老（指康生）提供线索让他们来的，主要是他们对《反共启事》上用的化名需要核实。从了解的情况和红卫兵手里的传单、材料看，他们在北京已经多次找了当年狱中的杨献珍（中央党校校长）、廖鲁言（国家农业部长）、徐冰（中央统战部长）等人，而且还分头派人到北京、东北、华北、西北去找过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长）、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等，已经大致摸清了报纸上的人名，只是想从刘格平这里得到确定的证明。因为他们担心一些人的“口供”有诈，他们只相信刘格平这个甘心“把牢底坐穿的人”。此外，他们还找了韩培义，他也是没有在“启事”上签过名，至今还活着的人。

刘格平想到，这个事情非常重大。这么多重要的领导，如果他们真是写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那么问题相当严重，肯定是一种变节行为，党是不允许的。再从自身的遭遇方面联想，因为自己没写，很明显自己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对自己会产生戒心。可是他们毕竟是自己的同志和难友，又涉及这么多的人，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刘格平觉得，自己是一个党员，应该做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中央报告，汇报自己未出狱的情况，寻找真相，请党组织揭开谜团。刘格平想方设法避过红卫兵，通过专线联系到总理办公室童小鹏，报告了大致情况。很快，童小鹏就回了电话，他明确告诉刘格平，现在形势发展变化很快，有些事情总理也不好多表态，请刘格平自己掌握，要注意“内外有别”，可以给中央写一个材料。根据这个电话精神，刘格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为了让红卫兵尽快离开，他对红卫兵早已经知道的化名和实名的名单做了确认。<sup>①</sup>

红卫兵逐步散去后，刘格平着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中将自己入狱的经过、在狱中斗争情况以及出狱的整个过程作了汇报。同时，也对眼下红卫兵

<sup>①</sup> 《刘格平访谈录》，1988年汇集。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拿来的报纸所反映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报告写完后，他让丁粹华重新抄写了一遍，于11月下旬通过绝密专线将报告送往中央。之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回音。

12月下旬的一天，忽然内线电话响起来，他拿起电话，只听到对方说：“格平吗，我是康生，你还好吗？”这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刘格平一愣，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连连回话：“好！好！康老你好吗？”刘格平虽然抗战时期在渤海区和康生一起工作过，但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和中央的领导人接触或通过电话了，康生这个“中央文革”的“顾问”竟然亲自打来电话，令他感到突然。康生的意思是说，刘格平向中央写的报告总理和他都看过了，上面说的事情，中央在此之前已经知道和掌握，现在是通知他马上去北京，中央、总理另有事情需要和他当面谈。他还想问点什么，还没开口，康生就把电话挂断了。刘格平放下电话，就喊丁磊准备起程，急匆匆赶往北京。一路上他俩心里七上八下，摸不清叫去北京干什么。到了北京有人接站，直接送他俩到京西宾馆住下，让等待通知。刘格平本以为急急忙忙赶来会马上有人找他谈话，所以一步也不敢离开住处，整天守着电话。结果等了一天、两天，足足等了一个星期，他还担心是不是周总理日理万机，把他来京的事情给忘记了。

1967年元旦刚过的一天下午，刘格平接到通知，叫他立即去人民大会堂，说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刘格平。到了大会堂也是先让他等着，直到快半夜了才叫刘格平。进到小会客厅，他见到周总理、富春、陈毅等及“中央文革”成员共十几个人。当时，周总理和刘格平虽说已多年没见，可也顾不得说多余的话，直接来了个单刀直入。周总理说：“格平同志，叫你久等啦！因为事情太多，我就长话短说：毛主席叫你站出来。山西省委已经瘫痪，山西已经乱了，问题很严重。你赶快回山西，成立一个小组，找一些没打倒的干部组成一个班子，把山西的工作管起来。要抓经济，抓钢铁，抓煤炭，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刘格平说：“我的情况您知道，到山西工作时间不长，对山西的情况和干部很不熟悉，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好办。”周总理说：“不要紧，毛主席支持你，军队支持你，我们支持你。详细情况我也不多说啦，你回去大胆工作。”说完马上又接待其他人去了。刘格平真想再多问一问怎么做，他心里实在没有底。可



总理的话就是中央指示，只有照办，慢慢去体会，加之“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又来说，他走的时候可以送他，实际上是在催促，刘格平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山西。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中央的这个批示，与刘格平的报告和刘格平上北京去，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证明了他没有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没有变节行为。这就是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情况和经过。可是，后来在山西，有人连篇累牍地渲染，说刘格平闻“文革”之风一起，便立即投书康生和“四人帮”，并与其策划于密室，祸乱山西。刘格平十分奇怪，这些人竟如此神通广大，连高层领导“策划于密室”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

1967年元月5日，刘格平回到太原。从坐在火车上他满脑子就都是周总理的那段话，想来想去光靠自己是不行的，自己对山西又不熟悉，省“三千”会议刚刚开始，省委书记卫恒就被围攻揪斗，会都开不下去。还听说多名省委常委上书中央要求罢免卫恒，还有一个地委领导被批而自杀等等。已知山西的情况如此麻烦，怎样去落实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呢？他自然想到刘贯一，因为这是刘格平到山西后，除了邻居黄克诚外，接触最多的一位副省长。刘贯一在山西时间较长，比较了解情况，根据自己的观察，刘贯一为人诚挚，和原省委领导关系一般，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少，于是决定找他商量，实心实意听听他的意见。刘贯一听刘格平介绍了去北京的过程十分兴奋，感到山西的运动将由无政府状态走入正常，他建议找一找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对袁振这个人，刘格平虽然认识但不熟悉。刘贯一给他详细作了介绍，说“文革”以来袁振受到省里的排挤，但他和群众组织关系不错，只要太原市能支持，事情就好办。刘格平同意找袁振联络，这事由刘贯一负责。后来又联系了陈守中、刘志兰夫妇，商量如何贯彻总理的指示。

此时，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得到上面指令，让省军区支持刘格平。张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清主动找刘格平联系“支左”问题。几个人开会研究以后，先按总理指示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领导小组，有事可以开会商量。领导小组有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组成，刘格平为组长。陈守中是左权将军生前的秘书，刘志兰是左权的原配夫人，也都是老革命。张日清为顾问，刘志兰为办公室主任。临时领导小组建立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争取让群众认可。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五位省级老同志商量，有人提议是否也学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的办法，大家都说这个建议可行。于是，由陈守中执笔，你一言我一语地写出了一张大字报，签上了五个人的名字<sup>①</sup>。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五人大字报”，当天就贴到了省委外面比较醒目的地方。

五人大字报刚一贴出，消息像12级台风一样传遍了四面八方，这下子犹如捅了蚂蜂窝。因为所有的人和各个群众组织都不知道刘格平是什么人，其他4个人中除了袁振，其余3个人也没听说过，尤其怀疑这几个人的目的和动机。当然，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刘格平何许人也？因为他是排在第一位的，“文革”期间的人们对文字的东西，尤其是人名的排序有一种少有的敏感。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刘格平的家开始遭到围攻，人群像车轮似的来了一拨又一拨。质问、嘲笑，甚至谩骂，说他们是下山摘桃子，企图掠夺造反派的革命成果。家里总是人满为患，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和丁磊都挡不住他们。丁磊害怕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刘格平说不要挡了，又说：“群众是好的，坏人是个别的，群众越多越安全。党的领导干部永远不要怕群众。群众是水我们是鱼，哪有鱼怕水的。”于是，他在二楼办公室接待所有来访的群众，任凭他们说什么都也是不急不躁地、不住口地讲解。

两天后，形势稍稍有了变化。可能是群众组织从北京得到消息，证实刘格平确实是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加之他们从多处了解到刘格平的资历和经历，直接接触后，又感觉“这个老头”平易近人。这时有的组织主动派人在刘格平家值班，维持秩序，把一些不明来路、不怀好意的人尽量挡在外面，这样刘格平才稍微得到一点休息的时间。

<sup>①</sup> 五人为：刘格平（副省长），刘贯一（副省长、省委常委），袁振（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何英才（省委常委、政协副主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个夺权得到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发贺电给上海造反派，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造反派的经验，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在当时环境下，中央的重大决策下来，地方必须表态支持。于是，刘格平立即在1月12日召集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刘志兰等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表态的问题。会议进行之中，许多工人和红卫兵冲进来，七嘴八舌地要求刘格平等人表态支持他们的行动。

原来在1月12日凌晨，几个大的群众组织就已经进驻了省、市党政机关和公检法，进行了夺权，还抄了卫恒、王谦等几位省主要领导的家，查抄出了“违禁”的东西和破碎的毛主席石膏像。刘格平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一问负责省委、省政府警卫工作的军区政委张日清<sup>①</sup>，才知道他当时下令撤了警卫，这说明他事先知道这件事，与会的几位同志也都认为应该明确支持这次行动。

刘格平和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并没有具体的好办法来对待这个情况，群众中还有人喊起了口号，说刘格平是假革命，混乱的局面已经由不得刘格平进行更多的思考。这时，有北京来的红卫兵说，权不能落到各派组织手里，否则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这使刘格平想到，首要的是履行好中央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和职责，必须改变各个群众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要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他即顺水推舟，提出了几点意见，他说：“这样乱哄哄的不好，请安静一下我讲几点意见。第一是事情既然发生了，应立即报告中央，请示中央的态度；第二是我们几个人的临时领导小组改为中共山西省的临时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第三是各个组织不能各行其是，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统一的组织应该接受党的临时核心小组的领导。”

<sup>①</sup> 张日清，1917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瑞金红军学校连政治指导员，信康赣雄游击司令部支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时期，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长、大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三团参谋长，第二旅六团团长，师参谋处作战科科长，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八纵队六十六团团长，第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政治委员，第十四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7年2月，刘格平被选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月12日晚，太原几个大的群众组织成立起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着手起草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3日，刘贯一征求刘格平的意见：“造反派提出让咱们参加指挥部，咱们是否参加？”刘格平十分明确地说：“我们不参加，但可以表态支持一下。”他还对刘贯一说：

“政治生活要有一个基本秩序，不能胡来。当然，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新情况，但凡事听中央的没有错。”

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发布，宣布于1月12日夺了山西省的党政大权。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轰动。至关重要是，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山西驻军第二十一军，他们宣布支持夺旧省委的权。后来，毛主席、中央军委肯定他开创了军队支持“左派”第一例。此后，驻山西的空军、海军、总后、警备区、独立师等各军兵种都表态支持刘格平。18日，周总理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1号通告，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这个通告，并为此发表了“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这公开表达了中央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肯定和支持。

2月25日，中央批准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及其上报的成员名单，并同意刘贯一兼秘书长，刘志兰兼副秘书长。后因第二十一军调往陕西，第六十九军进驻山西，增补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为核心小组成员。27日，毛主席在看到张日清给中央军委呈送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报告后批示：“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看到了，不必印发。”<sup>①</sup>28日《人民日报》和第4期《红旗》杂志都全文刊登了张日清的报告全文。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继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又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主要是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主任是刘格平，成员有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徐志远，还增加了驻山西各军兵种的领导，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人及各地市一些知名人士，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由于中央的支持，以刘格平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立即开展起工作。随后各地区、市、县和机关、团体相继成立革委会，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保障煤、电、交通、邮政、通讯等重要行业不出问题。因为各单位、部门都存在两派、三派，所以实行统一的指挥难度很大，很多单位还暂时靠群众组织在维持。但毕竟山西的“文化革命”开始步入“三结合”、“大联合”的轨道。这时的刘格平，已完全顾不上自己，他没日没夜的和各方各面接触，重点是太机、太工、太钢、电管局、交通局、重机等单位及钢铁、煤炭、铁路行业，他与这些单位的革委会或群众组织进行沟通交流，以保证生产秩序的正常。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刘格平经风雨见世面，他们希望刘格平能到群众大会上与群众见面。他们把刘格平带到一个万人大会上。当时，为了刘格平的安全，丁磊一步不离地跟着刘格平，而且安排专人，一旦发现情况有异，立即设法保护，可刘格平自己却显得很无所谓，因为他认为，越是群众多的地方就越安全。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山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毛主席和刘格平、陈永贵握手留影，询问了山西“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刘格平简要作了汇报。陈永贵说：“我代表大寨人民祝您老人家身体好！”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永贵好！好永贵！”到1967年五六月间，山西大联合的总趋势已经形成，以刘格平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受到广大群众和军队的信任支持。

1967年4月和7月，中央召开了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刘格平和陈永贵在一起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两次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主要是肯定了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委员会的成绩，强调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内部的团结，确定了山西各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方针，要求驻晋部队支持刘格平和革委会的工作，会议还对个别人违反上述原则的行为和做法进行了批评。“七月会议”的参会人员有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各地区的主要领导，有驻山西各军兵种“支左”部队的领导和代表，还有山西各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可以说是“文革”以来山西人到北京开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肯定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批评有关同志不支持刘格平，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

“七月会议”给山西的局势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但没过多久，违背会议精神的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还由于刘格平不肯在报刊上发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文章，特别是不愿意在北京批斗陈再道的会议上揭批陈再道，随后陈伯达、王洪文和军委办事组有人散布说，刘格平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光知道叫解放军支持他打派仗，是个反军乱军的糟老头子。毛主席一再强调大联合，“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落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人人嘴上喊着“听毛主席的话，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真正做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部分群众组织把刘格平、革委会视为是“下山摘桃子”，甚至与中央批准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革委会争“核心”，他们绑架了坚决维护大局，支持刘格平的陈永贵，还绑架了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拦截了刘格平乘坐的汽车。

9月初，有人向刘格平报告，山西两派在省政府西门对面的一个中学发生对峙，已经发生了互相扔东西乱砸的现象，有引发武斗的可能，还可能波及省革委会。刘格平听后，立即安排省军区的警卫部队到学校去，说服疏散学生和群众，防止发生武斗。不久，传出消息说一名女学生被打死，还抬着尸体上街游行。由此引发了一场风波，说刘格平、革委会镇压红卫兵，一直闹到北京。刘格平判断，肯定是有有人在幕后挑起事端。他要求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细致



地说服、劝解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经了解后，知道这个中学里面住着从北京来的红卫兵。为了稳定山西的局势，刘格平安排人把住在这个中学的几十名红卫兵集中，以革委会的名义将他们集体送回了北京。

10月4日，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客人访问太原，刘格平接客人的车队在途中即遭到人拦截，导致了翻车事故还撞伤了人，而负责安全的部队却无动于衷，刘格平已经判断出来者不善。事后，刘格平对那些煽风点火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不久，晋东南又发生了武斗，驻晋东南的部队在公开向中央要开枪权的同时，已经向群众开了枪。而且，部队的枪支弹药已经大批地流向社会。刘格平追查时，部队的负责人却相互推诿。

按理，在原来班子已经瘫痪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革委会，承担了原省委、政府的领导职能。军队理应对革委会全力支持和维护，绝不应该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况且，为了加强对驻晋部队“支左”工作的统一领导，4月份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和部队进行换防的同时，任命刘格平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但这时经过换防后来到山西的驻军，在个别人的操纵指挥下，却完全与革委会唱起了反调。他们制造矛盾，把山西的群众组织人为的分为“反对派”和“支持派”，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阻挠“大联合”的进程，部队的负责人到处散布，把正常的换防说成是中央对刘格平的“不放心”。后来，刘格平才知道，这是林彪利用军队“支左”在地方抢班夺权的部署，这一部署在许多省都曾上演，严重干扰了形势的正常发展。可在当时，刘格平并不知道这个背景，他只是感到换防来的军队有些步调不协调。

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如果中央真的对刘格平不放心，怎么能在部队换防、下达军队支左命令的同时，任命刘格平为北京军区政委呢？但是，人们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派性一旦被煽动起来，是很难按常理去思维问题的，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刘格平一心一意把精力用到了抓经济、促生产上。可是“抓革命”的事却紧紧缠绕着他，想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时尽量都见，后来就应接不暇。这样，有些人转而来找丁磊。刘格平说话非常注意，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多说，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想钻他空子不太容易。丁磊的性格可不一样，她说话也比较随意。丁磊还有一个特点，见面熟，对群众组织能深入进去。忙得焦头烂额的刘格平心想，按照丁磊的特点，或许可以帮助做一些群众组织的工作，无非就是让他们多支持自己。在刘格平思想上，对这个问题看的简单了，有所疏忽。

不久，刘格平不断地听到关于对丁磊的反映，社会上出现了打倒丁磊的标语，甚至听说她也参加了某一派，还有人说丁磊是山西的江青等，大字报都贴到了北京天安门。刘格平开始引起注意，他在回家的有限的时间内，又得与丁磊谈话，为此两人几次发生争吵。刘格平一气之下住到了晋祠。刘格平心里清楚，有许多人，包括丁磊和整理印刷他《踏遍青山人未老》小册子的人，他们都是好心，却帮了倒忙。果然不出所料，这些好心人的做法为另一些人扳倒刘格平提供了借口，使刘格平逐步陷于了被动。

1967年11月底至12月27日，中央再次在北京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会议之前，周恩来和康生先找刘格平就丁磊的问题谈了话，刘格平向中央领导承认了疏于管教的责任。但刘格平申辩说：“山西问题的主要矛盾和责任，绝不在丁磊身上，她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刘格平明确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应逐步考虑“文化大革命”的收尾工作；二是应尽快结束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刘格平之所以这样想，也是根据毛主席当初“文化大革命”只搞两三年的设想。这时，在刘格平的思想里产生一个极大的错觉，他认为革命委员会已成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尾声，社会秩序就会



陈永贵陪同刘格平去大寨虎头山视察

趋于正常，他希望一切都尽快正常起来。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在毛主席心中，此时却是刚刚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刘格平的建议，令“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人极为恼火，陈伯达说：“两头牛打架，拉开一头就行了。”他们想拉开刘格平这头“犟牛”，



但是被周恩来打圆场而未能得逞。

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还有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一伙，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及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齐赴京参加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对刘格平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刘格平也从中观察出中央对许多问题存在的分歧，看到周恩来尴尬的处境。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同样是周恩来主持，但“十二月会议”仅仅距离“七月会议”的4个多月，就完全翻了“烧饼”。

会议之后，刘格平遭受到群众的“炮轰”，军队与地方的矛盾更加剧烈。山西驻军各兵种的态度不一致，使各派的联合越来越困难。特别是，部队的枪支继续流向社会，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刘格平为了减少反对派栽赃的口实，说服丁磊离开山西，宁可自己的日常生活无人照料。他反反复复回顾了卷入山西“文化大革命”漩涡的全过程，特别是1967年以来，中央多次开会解决山西的问题，可是山西的混乱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而且社会矛盾仍在加剧。全国同样如此，一年来，从揪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接着反“二月逆流”，揪“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让刘格平心中生出无限的担忧和惆怅，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在哪里，中共面对这一切，刘格平已经深感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陷入一片茫然之中。

11月7日，经毛泽东主席批阅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文，以中共中央“中发（67）号文件”转发全国。<sup>①</sup>刘格平接到此件，向陈永贵了解此件产生的经过，并立即通过各种媒体传达到山西省农村每个角落。他认为此件可以把农村基层干部从“批倒”、“批臭”中迅速解放出来，狠抓了各级党政组织的贯彻执行，稳定了当时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的大局。

<sup>①</sup> 《文革回忆丛书——飞鸣镝》：陈永贵同志谈农村文化大革命一文采访经过，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12月版240~243页。



1967年12月，刘格平在大寨参加深翻耕地劳动

期间，一派群众组织发现陈永贵站到了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所致力的大联合和社会稳定，便借着大寨展览馆陈列着陈永贵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扣押过之经历，称陈永贵当过

伪代表，是汉奸、叛徒，还造谣说陈永贵是“河南逃亡地主”。为洗清泼在陈永贵头上的脏水，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怀英，对陈永贵的历史做过反复调查和审核，不仅立即向核心小组的刘格平、谢振华等成员作了汇报，证明陈永贵的历史没有问题，并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证明陈永贵的历史是清楚的，说陈永贵是汉奸、叛徒纯粹是诬陷。刘格平的心里有了数。

12月，李雪峰、刘子厚、郑维山带领河北省军区驻冀部队的有关领导干部到大寨参观，刘格平一路陪同，并介绍昔阳县及大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还对陈永贵说：“我看到了张怀英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写的有关你历史问题的材料，有人给你戴汉奸、叛徒、逃亡地主的帽子，纯属捏造。身正不怕影子斜。不用理那些谣言，好好在昔阳抓农业生产！”

1968年2月22日，山西驻军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收缴了对立的两派持有的武器。一周后，周恩来就广西韦国清电话请示可否派部队追缴广西造反派组织的武器弹药一事，作了批示：“……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照晋东南办法，逼近其工事，劝说其送回武器弹药。”实际上，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还远远没有消灭，不少地区的武斗还正方兴未艾。但这些举动已表明了中央的方针，是要依靠军人来掌控全国局面，继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刘格平回想到自己不久前曾向中央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收尾和结束军队支左的建议，预感到1968年自己可能有大的麻烦。思前想后，刘格平想离开山西，他在寻找向中央提出这个请求的机会。



1968年3月19日，在太原五一广场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刘格平和陈永贵被围在台上3个小时，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中央再次批评了刘格平，刘格平则正好借此机会提出了离开山西的请求。不久，身为山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刘格平，就被中央叫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这时，丁磊已经在北京，但中央却不准刘格平与丁磊联系。陪着刘格平的，只有他的两个秘书喻俊民和梁运安，中央给他们定的纪律，也是不准和丁磊联系。

丁磊是在春节过后带着女儿离开太原的，中央已经让北京军区给她安排了一套单元房。山西的局势并没有因为她的离去而好转，丁磊不过是这场权利之争的牺牲品而已。奇怪的是，丁磊人还没到，“打倒丁磊”的大字报已经贴进了北京军区大院。给丁磊安排的住房中，电话线被掐断了，门卫也接到通知，凡是找丁磊的人，一律不准进，这让丁磊感觉似乎是被软禁起来。后来，中央又通知丁磊离开北京到青岛去，理由是要她离开山西再远一些，实际上是怕她与刘格平联系。5个月之后，丁磊终于结束了青岛的生活又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区的总参招待所。仍然不允许他们联系。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宣布：“拒绝执行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交械，打砸抢者法办。”

又是几乎同时，周总理和康生突然找刘格平谈话。这次谈话，先是涉及到陈永贵的所谓“历史问题”，刘格平一阵见血的指出：“永贵同志的历史，山西张怀英同志做过多次调查，是清楚的。说他有历史问题，这是山西有人别有用心。目的是想在中共“九大”之前搞臭永贵同志，为自己铺路。”之后不久，周恩来明确要求山西继续上报陈永贵为参加“九大”的代表。<sup>①</sup>

<sup>①</sup> 2002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了《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引用了有些人在回忆录中记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代表等事。对陈永贵的声誉在社会上起到了极不好的负面作用。为此，陈永贵夫人和儿子陈明亮将作者吴思与《北京青年报》告到北京市人民法院。法院委托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2003年4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作者所写书中引用的关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一节的具体文章，均系他人所写的回忆录，非权威性文献记载，被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事实的存在，故对书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进而认定作者及刊载其作品的《北京青年报》均构成对陈永贵名誉的侵害。判决两被告在《北京青年报》登报道歉。并由作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万元，《北京青年报》赔偿2000元。被告不服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在这次谈话中，康生突然又提出了当年有人签写《反共启事》的问题，他要刘格平就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事情再进一步向中央报告，特别是要把一些人签写自首书后，给狱中党的斗争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揭发出来。刘格平表示，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所以也说不出什么。这时康生指责刘格平“迂腐”、“对敌斗争很坚决，但党内斗争一塌糊涂，是穆罕默德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刘格平当即与康生发生了争吵并再次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1969年4月1日，中共的九大召开。在“九大”会议上，山西刘格平、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为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从而使个别人想取而代之的妄想彻底破灭。

1969年秋天，中央又突然认定山西大联合搞不好的根子在刘格平，把山西省上万名干部调到石家庄陆军步兵学院办学习班，刘格平也被通知到了石家庄。学习班是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分成部队和地方两大部分，刘格平被编在了军队系统。学习班是由林彪牵头，由陈伯达、王洪文具体主持，还有第六十九军代军长谢振华等。学习班的规模之大，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没有进过同类学习班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学习班名义上是解决刘格平和张日清的矛盾，实际上目标是为了扳倒刘格平。在学习班上，刘格平领略了他们先定好问题的性质，再设法找证据。学习班期间，即使刘格平生病无人料理，也不许丁磊看望、照护。陈伯达等则上蹿下跳，竭尽整人之能事。特别是陈伯达，虽然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却成了北京军区一些部队的太上皇，到处乱跑乱讲，他要把扳倒刘格平作为讨好林彪集团的晋见礼。当时给



刘格平到山西阳泉煤矿视察

刘格平戴的最大的帽子是“反军乱军，挑动武斗，搞个人崇拜”。

他们所找的证据五花八门，把夺权前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造反派”擅自搞打砸抢，都说成是因为有刘格平做后台；把晋东南地区有人出了一种毛主席正面像章，有点不像硬说成是刘格平的像章，加上



群众组织搞的那本介绍刘格平《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小册子，都成为刘格平为自己树碑立传搞个人崇拜的佐证；对不同兵种的部队，因为支持刘格平，就说成刘格平拉一派打一派分裂军队等等。谁都会想到，刘格平身为中央批准的革委会主任、第一把手，最盼望的就是团结和安定，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怎么可能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对军队对他有什么好处？再说，他虽然挂着北京军区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但实际并没有实权，他有什么条件能乱了军队？又有谁听他的指挥？

《踏遍青山人未老》，是由太原工学院学生高翔（后任山西省运城市盐化局化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等，为了向来访人员介绍刘格平减少麻烦，于1961年7月搜集资料整理编写而成的。写这本小册子时，刘格平正在北京参加“七月会议”，根本不知此事。高翔在石家庄学习班将上述情况如实向学习班指导员做了陈述。指导员听后大发雷霆，批评他不老实，包庇刘格平！双方为此争执起来。最后指导员说他态度不端正，指示全连各班组轮流帮助他，并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敦促杜聿铭投降书》。名曰帮助，实为批斗，整整搞了3天，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按导员的诱导胡说，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参加学习班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是有据可查的。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山西上万人都出来参加学习班，有关工作、有关单位怎么办？实际上1969年之后，“三支”“两军”人员和军宣队已经进驻各个领域，有关重要单位都成立了军管会。军管会成员有干部也有战士，号称军宣队。军宣队可不是光动嘴宣传，他们实际上是全面掌权。如果说革委会代替党政机关行使政权的话，那么军宣队又凌驾在了革委会之上。本来这是毛泽东主席为了稳定形势才开始启用军队的，可是被林彪集团利用，成为林彪集团发生“九一三”事件的前奏。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刘格平心中无比地相信毛主席，他感觉到有人在搞欺骗，不听毛主席的话还背着毛主席在搞名堂。后来刘格平才知道，他向中央提的建议和想离开山西的想法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想把他派到军队中去，作为“掺沙子”的人选之一，因为他相对超脱。这个想法让“四人帮”和林彪两个集团都暗中抵触。在1967年4月时，恰值北京军区廖汉生被免



刘格平在山西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

职，刘格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毛主席又让刘格平参加了两次军委扩大会议，就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人的敏感。先是康生说了话，他说刘格平对61个人的问题没有揭发，因此还需要考验。这两个集团在对付刘格平的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即怕刘格平在毛主席支持下一旦得势，又想借刘格平之手去打别人。所以，在情况不明时，他们

即留有退路，又随时准备将刘格平打翻在地。1968年底那次不愉快的谈话后，康生完全有了到毛主席哪里否定刘格平的理由。于是，刘格平被送进了学习班，丁磊的“疗养”自然也就结束了。在林彪的支持下，康生等人对刘格平的排挤打击进一步升级。等待刘格平和丁磊的将是莫须有的罪名，将是残酷的斗争和被下放劳动改造！

刘格平扪心自问，从1967年到1970年初夏，总共3年半时间，而自己在1968年上半年就被挂在了京西宾馆，直到进了学习班挨了9个月的批判后被解除党政军一切职务。刘格平真正主政山西工作的时间仅1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身体力行的去落实中央和总理“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对所谓“抓革命”，他深知实际上就是毫无意义的派性争斗，自己对此既不擅长也无兴趣。但他必须去应付去适应，中央对许多问题反反复复的变化和地方上错综复杂、无休无止的派争，足以使他焦头烂额。哪成想却背负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山西，还从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现将刘格平1981年5月，在给章蕴转胡耀邦并中共中央关于“对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申诉，摘录如下：

1. 我1965年底到山西后，一直在晋东南搞“四清”工作。省上的会议许多都不通知我参加，文件也不是能及时看到。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初



的情况我并不了解。1966年冬，我太原的家中突然来了一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这是一群孩子，但他们手中拿着30年代的旧报纸，上边刊登有《反共启事》和一批人的签名。作为当时狱中的当事人之一，我知道狱中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是不同意在敌人拟好的自首书上签字的，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的签字到底是真是假？说实话，我确实感到十分惊讶，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尽快把问题搞清楚。我想，不仅仅是我，这也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会有的起码意识。我对红卫兵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红卫兵就喊口号：“谁包庇叛徒就打倒谁！”“欢迎刘格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突然。于是，我便设法与总理办公室取得了联系，请示如何处理，但因总理不在而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童小鹏同志直接给我打回电话，他传达了总理的意见，要我按“内外有别”的原则去掌握并尽快将所知道的情况向中央写出报告，这个情况可以向童小鹏同志核实。我接到这个电话后，虽然心中有了底但并不踏实，因为“内外有别”四个字太抽象笼统。毕竟，毛主席刚接见过红卫兵，而且红卫兵还口称受中央文革和康老的派遣，中央文革代表中央，是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卫兵就住在家里、院子里甚至隔壁黄克诚同志那里，满足不了他们似乎不会走。另外，我给中央写的报告分寸如何掌握？因为我并不知道中央了解多少情况和中央的态度。

我想到了毛主席当年与我的谈话，那是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前，在一次开完预备会后，毛主席专门留下我，问起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事，我对主席说：“在狱中的情况，我出狱后已经向山东分局和渤海区党委做过详细汇报。”主席则直接问我：“是不是有党的指示说可以履行在自首书上签字的手续而出狱。”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指示，但是通过殷鉴传进来过这样的精神，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靠，也都没有去签那个字，以后就没有再提到过这件事。”主席进一步问我：“如果有这样的指示，你签不签字呢？”我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变节行为，即使出去了也不好再工作，这个认识在监狱的同志中是一致的。”主席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事后，我只是将这次主席

的问话当成是对我当年入狱情况的考查，并没有想到其他方面。现在看来，事情的严重性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经过考虑后，我将在报纸上签字时用的化名与实名向红卫兵做了对号，实际上这个情况红卫兵已经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让我证实。我觉得这一点躲不过去，还要尽快向中央写出报告，必须先应付走红卫兵。

我的报告是1966年11月22日写好送中央的。报告中我回忆了监狱里的情况，也对出现签写《反共启事》的事件表示了我的态度。“对于党关于可以履行签字手续而出狱，以尽快为党工作的指示，我表示怀疑，大家也同意我的怀疑。”“我从没有见到过党的任何文字指示。”“我不知道有人1936年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还公开登在敌人的报纸上。”“我认为，这件事如果属实，代表着集体变节行为，中央应该尽快落实清楚。”上述文字是我当年的报告中所写，即是一贯的事实，也是我一贯的态度，更是当年狱中同志的共识。我不会因为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也不会因为中央表示承担责任而改变。

我的报告送出去不久，就接到康生打来的电话，让我尽快到北京去，时间是1966年12月底。那时，中央书记处工作已经瘫痪而被中央文革取代，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我很快确定行程后报告了中央，到北京后中央直接派车接我住到京西宾馆。我在京西宾馆等候一直到元旦，没有见到中央文革的任何人。期间，碰到在京西开会的老领导陈毅同志，当年他和康生一位主军一位主政，都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与陈毅同志已经几年未见，相互问候之后，向他告知了我来的经过，并说不知道为什么又等了这么多天。陈毅同志说，既来之则安之，等着吧！不在乎多等几天。我观察他的情绪不好而且还要开会，所以也没有过多去打扰他。

1967年元旦刚过，中央派车将我拉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人，除中央文革的成员外，还有总理、富春同志，陈毅同志是随后来的，大家见面握手后就开门见山进入正题。先是康生说了几句高帽子的话，他说我的报告他看了，总理也看了，中央是肯定的。接着，富春同志说：“山西有煤



炭有钢铁是经济大省，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山西经济不能垮。现在山西的班子瘫痪了，中央研究让你出来，把山西的工作抓起来。”我问：“就是我一个人还是有其他同志？”总理直接说：“应该要有一个班子，但山西省委瘫痪了，是毛主席要你站出来，所以这次就叫你来了。你回去后找省委一些没被打倒、问题少的同志，向他们交个底先把工作抓起来。”我说：“山西现在很乱，我去的时间又短，对那里的情况、特别是干部情况不熟悉。”总理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军队没有乱嘛！还要发挥军队的作用。”我听后感到惆怅，脑子里想，怎么让我去找人？中央为什么不任命？但支吾半天也说不出，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件太突然的事。晚到的陈毅同志大概看出我面有难色，接着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先要取得群众的认可以后中央才能认可。否则，群众要打倒你，不买你的账，中央也没法子。”中央领导对我的这次接见总共只有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我感到他们很忙，接着还有别的安排，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晚上，王力和关锋到我的住处，他们实际上利用开会的间隙来催促我，也只待了不到半个钟头。他们对我说，中央研究由他们负责与我联系，要我尽快回山西去，一是争取群众的支持，二是可以联系军区的张日清同志，其他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谈。他们让我确定下来走的时间以后通知他们，以便派车送我。上述基本事实和这次接见，我相信中央有案可查。

但后来为了整我，从北京到山西都有人说，是我自己擅自跑到北京去投靠康生和江青，并与康生一道，为篡夺山西党政财文大权策划于密室。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党的一种侮辱。还有，既然是策划于密室，这些造谣者又是怎么知道的？由此编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均希望能一一澄清。

2. 因为中央的催促，我不敢怠慢，1月5日便座火车回到山西。在火车上，我反复思考这次中央领导的谈话，归纳出三个要点：山西的经济不能瘫痪；要发挥军队的作用；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我到太原后立即联系了刘贯一同志，因为我只认识他，他也是副省长而且受到的冲击

小。再通过刘贯一先后联系上军区政委张日清，还有地方的袁振、陈守中等同志，我向这些同志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他们分别是军队和省、市委的领导干部，说实话我对这些同志并不了解，只是受命于中央事大，先干起来再说。通过大家的合计，认为首要的是要取得群众的支持，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毛主席，也写一张大字报。我们几个人的大字报是1月9日贴出来的，其实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其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中央的要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我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干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一个特殊阶段，为落实中央精神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后来批判我时的一条罪状，说这张大字报搞乱了山西，这真是无稽之谈。

据我所知，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山西的整体形势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山西省委在这年4月底即成立了由常务书记王大任组长的省委学术批判领导小组，成员有省委常委史纪言、卢梦、省委党校校长李慰、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等同志。这年5月中旬，省委又决定将学术批判领导小组直接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增加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同志等成员。几个月内，山西各大报纸刊登了近百篇批判《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文章，《山西日报》还公开点名批判了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等同志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太原第一书记袁振同志也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遭到批判。从6月开始，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已经因为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而被迫停课。省委、省政府的办公室被学生们占领，主要领导同志到处躲藏已经无法工作，到1966年底，卫恒同志已经被揪斗十多次，最长的一次近20个小时。这年7月中旬，在省委召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的当权派。”袁振同志紧接着以“反话”方式公开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还给自己扣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当



时就造成省、市委机关的混乱。有确凿材料显示，从这年7月至12月，山西省委决定批判、撤职、停职的省、厅级领导干部已经超过50人（略）。7月份省委向太原市委派驻了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8月份太原市委大院就贴出了驱赶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毛主席在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后，省委立即在五一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进行“表态”，支持成立了太原的首批红卫兵组织。而由国家提供交通和食宿费的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等外地来到太原的红卫兵更是超过10万人之多。我参加了11月在晋祠召开的山西省三千会，会上红卫兵唱歌、广播、辩论、刷标语，还将卫恒同志拖到五一广场进行批判，高喊“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的口号。省委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鼎、史纪言等8名常委在这年11月22日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还以省委名义发了221号、223号文件，要求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仅上述这些我后来才知道的、十分有限的实事足以说明，当时，山西的局面就已经到了中央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地步。至于毛主席和党中央选定找我谈话而授命于我是否合适，那是另外的问题。

3. 对山西发生的1967年1月12日冲击省委和政府的所谓夺权事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确实做出了支持的表态，但我是在事后才知道而表的态。所以，说这次夺权事件是由我一手策划和指挥，这是对基本事实的歪曲。由此构成我“野心家”、“个人野心膨胀”的罪名当然也不成立，恳请中央予以查实澄清。

实际情况是，这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贺电给上海造反派，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造反派的经验，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在当时环境下，中央的重大决策下来，地方必须表态支持。于是，我在1月12日立即召集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刘志兰等同志开会，研究表态的问题。会议进行之中，许多工人和红卫兵冲进来，七嘴八舌的要求我们表态支持他们的行动。原来在1月12日凌晨，一些群众组织就已经进驻了省、市党政机关和公检法，还抄了几位省主要领导的家。当时在我们与会的同志中，都认为应该明确支持这次

行动，混乱的局面已经由不得我进行更多的思考。所以，我提出来，这样乱哄哄的不好，各个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当时就有造反派认为我的态度暧昧，还有人喊口号，说我是假革命。最后，我还是坚持讲了几点意见，第一是应立即报告中央，请示中央的态度；第二是由我们几个人临时成立中共山西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第三是各个组织不能各行其是，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统一的组织应该接受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

根据当时情况，我提出的这几点意见，即使今天来看也没有错误。那天下午，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协商后，联合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刘贯一来问我，说造反派提出让我们参加指挥部，我们是否参加？我十分明确的说：“我们不参加，但可以表态支持一下。”我还对刘贯一同志说：“政治生活要有一个基本秩序，不能胡来。当然，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新情况，但凡事听中央的没有错。”

不久，当时几位主要领导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首先是张日清同志，他作为军队领导，从军队渠道向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大谈了一通军队如何支持左派，如何支持夺权斗争，这个报告我并不知道。他的报告送出后，就把我们都置于1月12日冲击省委省政府的行动之中，我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没过几天，周总理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央军委也来电表示支持张日清，还要在全军推广山西军区的支左经验，以此作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切入点。华北局也立即来电，表示支持“一一二”夺权。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中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就这样，我被捆绑着成了夺权的始作俑者，捆绑者是谁？造反派还是



张日清？亦或是华北局？中央军委？……。后来发生的事实是：1967年2月22日，中央批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并成立山西革命委员会。4月，毛主席提议并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我被任命北京军区政委。同时，我与张日清同志的之间的隔阂也在加大，因为形势的发展把他推到了正确一方。

我受中央委派主政山西，自1967年1月至1969年7月，满算起来是两年半时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实际上被无端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受到江青、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双重排挤，大多时间消耗在无聊的政治纷争中。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前，康生拉上总理找我谈话，要我就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事情再进一步向中央报告，特别是要把一些人签写自首书后，给狱中党的斗争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揭发出来。我表示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所以也说不出什么。这时康生指责我“迂腐”，还说我“对敌斗争很坚决，但党内斗争一塌糊涂，是穆罕默德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总理也批评我“糊涂”“思想不过硬”。我当即问康生：“那么党内斗争究竟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话自相矛盾。当然，我也的确感到糊里糊涂，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后来我知道，毛主席曾提出选派李德生、纪登奎、刘格平进入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政治局，对军队进行“掺沙子”，因为这几个人与各野战军瓜葛少，相对超脱。首先是康生，他想借着这件事，让我进一步按照他们的意思揭发61个人。因为我没有就范，“掺沙子”未成还导致我离开山西。后来康生还挑拨说，“在党内斗争上一塌糊涂，是穆罕默德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毛主席针对我所说。“掺沙子”这件事，更让林彪及其死党十分敏感，急欲置我于死地。早在我1967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时，恰值廖汉生同志被免职，中央又通知我参加了两次军队会议，有人就对我这个兼职政委十分敏感，对我进行排挤和打击，让我没法工作。在党的“九大”之后，排挤打击在林彪的支持下进一步升级。现在，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审判即已结束，对我的审查也应该有个结果。（略）

陈永贵同志在日伪时期当过伪村长，是为保护更多的群众而应付敌

人，组织上对此早有结论。但因为不同意谢振华的一些做法，他就暗中指使人夸大其词写信诬告，硬说陈永贵是敌伪特务。他的这种做法遭到总理的严厉批评后，竟然对一些搞派性的人煽动说：“靠刘格平保不了陈永贵，陈永贵的后台是周恩来。”还说他上了周恩来的当，周恩来说只让陈永贵当个“九大”代表，结果当成了中央委员。依他的身份和地位，实在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散布这些东西。（略）

康生、陈伯达的折腾加上山西个别别人的捣乱，我考虑在山西已经实在无法工作下去，便于1969年8月向总理、向中央正式提出离开山西的请求。10月，中央通知我到石家庄参加所谓的“学习班”，实际对我进行了残酷斗争，不但给我扣上“反党乱军”和“破坏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批判了几个月，还设立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并将我和我爱人改名放逐到唐山。1976年初，因为身体原因，经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批准我才回到北京，一直住在招待所中。几个月后发生了唐山地震，虽然我幸免于难但爱人受伤女儿惨死，可谓家破人亡。至今，这个审查已经13个年头了，我再次恳请中央能尽快给我一个正式的组织结论。



## 下放唐山陶瓷厂劳动改造，屡遭困厄不失共产党人本色，遇地震妻受伤女儿不幸遇难

1970年夏天，长达九个月的学习班终于结束了，刘格平将何去何从？刘格平早就有考虑。山西肯定是不能再回去了，他在中共“九大”之后不久，就已经向中央打过请求离开山西的报告，从学习班上更是看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恶劣，尤其是第六十九军仍然在山西“三支”“两军”，一位主官一直对刘格怀有成见，而陈永贵支持刘格平，自然会受到牵连。但陈永贵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又是山西本地人，在山西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搬倒他是不容易的。而自己呢？虽然拒绝在“反党乱军”错误结论上签字，但已被这顶大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整个大环境也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弄得不好恐怕连命也会搭进去。

于是，刘格平再次向中央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这时的北京，形势也出现了变化。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事件，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恶化，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毛主席在年底做出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决定，周总理亲自布置在京的老同志向京外疏散。这样，刘格平、丁磊



受迫害的刘格平被安排在唐山陶瓷厂接受劳动改造，这是刘格平和亲属在住房前留影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夫妇想回北京的愿望落空，于1970年底被下放到唐山陶瓷厂，进行所谓的边学习边劳动和无休止的审查。

在唐山，刘格平和丁磊分别被化名为“刘方”和“丁石”，这需要很严格的遵守，值班室的人都称丁磊为“丁大姐”，并不知“丁磊”之名，也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陶瓷厂是个虚名，其实企业与军工有关。刘格平按规定每天要在车间干半天活，是与电子管打交道，干活之外的其他时间老人家除读马列的书和写日记外，还找来一些关于电子管的书看。

唐山的住房只有30来平方米，陶瓷厂又腾出一闲杂房，专门堆放刘格平搬来的物品、书籍。唐山的住所虽然简陋，但毕竟刘格平又和丁磊团聚了。

到了唐山，刘格平夫妇把住所简单安排后，就扑下身子和陶瓷厂的工人们一起劳动生活了。下班回来，老两口挑水洗饮，生煤炉做饭，到远离住房的公共厕所方便，完全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由于唐山生活条件的艰苦，精神上的折磨，刘格平的哮喘经常犯病，基本上离不开药，每天打针，屁股都打出了一个大大的硬结来。丁磊和小女儿大勤就经常要给他热敷，还要按点吃药、喷雾。刘格平后来又得了青光眼，这种病多是因为随着年纪增大、长期精神紧张所致，如果得病不及时手术的话，眼睛就很可能失明，于是只好到唐山市人民医院做了青光眼手术，手术做完后还得每天点几次眼药进行后续治疗。刘格平还有个肠道出血的老毛病，50年代在北京景山住的时候就曾经晕倒在卫生间里，便桶中发现大量鲜血。这个毛病一直伴随着他，大便时常常会出现大量便血，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地晕倒过去了，后来这个毛病又犯过数次。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查不出原因，在唐山也曾犯过，通过救治不出血就算好了，那时唐山的医疗条件对此病无能为力。

丁磊的肠胃病也越来越厉害，刘格平建议她到天津去检查一下。丁磊也希望刘格平一起去，让他也去看看病，看看天津的医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

天津是刘格平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那里有他青年时期的回忆，他对天津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唐山一住几年，除了家里、医院，哪儿也没有去过，这次借看病的机会也可顺便再看一看天津。按照上级规定，他们



不能随便离开陶瓷厂，经过报批，领导才批准他们去天津看病，并指定了相关的医院。刘格平和丁磊一起到了天津，就像久别的孩子回家一样，对天津的一景一物都感到特别亲切。其实刘格平对天津的感情最深，丁磊受到刘格平的影响也很喜欢天津。刘格平也曾想过在天津要个房子长久地住下来，因为那儿回民多，贴近家乡沧州的生活习惯。丁磊很同意他的想法，但最终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要好于天津，他们若能回北京还是争取回北京更好些北京毕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况且，从1949年进北京后，刘格平最初的家就安在北京。



刘格平和夫人丁磊在唐山陶瓷厂并肩劳动后留影

刘格平和丁磊最关爱的几个女儿，大女儿小名“大战”，在上海解放时取名丁立华，这个“解放牌”的名字，成为她永远的骄傲和怀念。从上海进北京后，立华在“北京回民学院”（后改名为“回民中学”）第二附小上学，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学的是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在那个时代，这是绝密专业，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在国防、军工等保密单位。但后来因为受刘格平的牵连，丁立华毕业后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老师。二女儿丁粹华，在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为了不重蹈立华的覆辙，刘格平夫妇去找了当时中央监委的领导李运昌，临近开学时才收到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已经完全不是她所报的志愿。但毕竟留在了北京，也是来之不易的。丁粹华毕业后被分配到张家口宣化钢厂，最后还是离开了北京。三女儿刘秀华，中学时在北京上的女八中，后来跟刘格平夫妇到了太原，继续就读于太原七中。秀华有心眼却话不多，性格内向，对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只管自己吃饱肚子就去看书。有一次，因为她在家，家人与她招呼后临时出去购物，回来时炭火炉把水烧干了，锅底烧透了，可秀华仍在纹丝不动的看书，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真是让家人哭笑不得，可刘格平夫妇最喜欢的就是秀华。秀华1968年高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便插队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自从刘格平、丁磊到了唐山，立华、粹华、秀华三姐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唐山看望父母，给家中带来了亲情和温暖。可他们三姐妹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条件长期在二老的身边照顾他们。只有四女儿大勤陪伴在刘格平夫妇身边，并尽心尽责地照顾两位老人。

刘格平在唐山待了7年，全家不能团聚，出去必须报批，看病只能到天津。所有这一切都令他的心情很不稳定，对自己的去向和命运十分茫然。看望他的侄儿丁力曾经问他：“什么时候能出来？”<sup>①</sup>他只是淡淡地回答：“谁知道啊。”

1975年春天，经邓小平批准，刘格平回到北京治病，那丁磊就必须陪同，谁也代替不了她，同时还得有个年轻人跑腿照顾。唐山的家里也必须有人留守，当时秀华正好回唐山养病，她和大勤两个人不能同时留在唐山，也不能一起都回北京。虽然秀华也很想往北京，但因为她有病，又准备集中精力复习功课，所以她主动要求留下看家。秀华每天除了看书学习，还要熬中药治疗肝病，一个人留在家里生活上瞎凑合，丁磊不放心。所以丁磊说先去北京看看情况，如果需要秀华过去或者秀华愿意去北京再说。这样大勤就先期跟着刘格平、丁磊一起到了北京，住进了位于海淀区万寿路西街7号的中组部招待所。

197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初，因为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了所担任的党政军一切职务。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这一切，在刘格平的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

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但在那个时期，地震之初的一切消息都在封锁之中。北京，人们只是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地震的防护工作。宁夏，在地方上当领导的丁毅民，从机要那里较早的得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他悄悄告诉家人后，全家都心急如焚。他们知道秀华在唐山，但不知丁磊也已返回。他们通过家里的电话与北京、唐山联系，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当丁毅民好不容易通过机要电话与北京取得联系时，才知道丁磊也在唐

<sup>①</sup> 什么时候“出来”，这是当时对老干部获得“解放”的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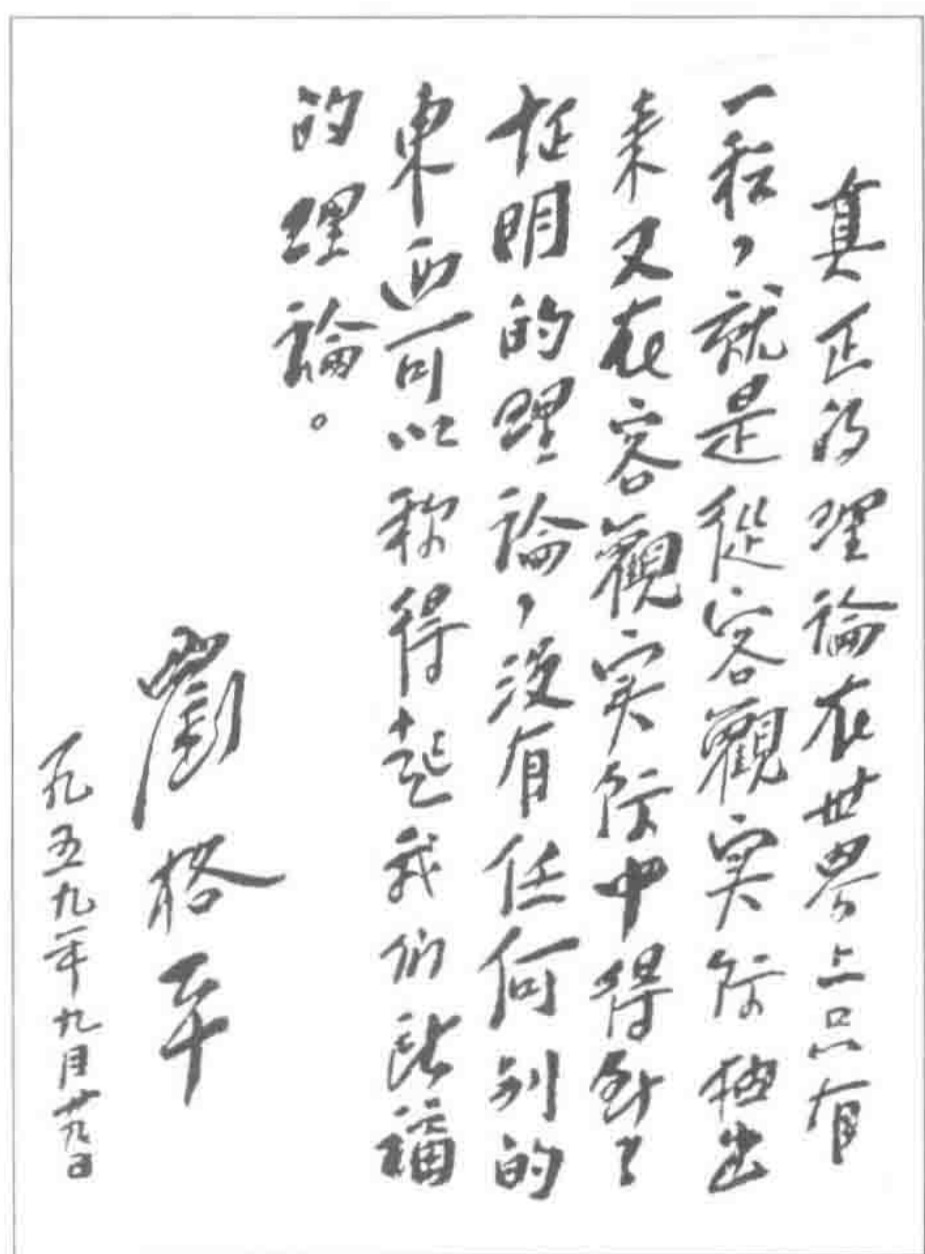


山，情况仍然不明，这更增加了大家的担心。丁毅民和全家商量，让正在武汉大学学习、放假回家的大儿子丁力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宣化，刘格平在钢厂工作的丁粹华，地震时刻正在家中的土炕上沉睡，忽然的震颤把她从睡梦中震醒，只见屋顶的吊灯胡乱摇晃，这时正是凌晨3时42分53秒。丁粹华当时认为是由于战备紧张，部队演习放炮震动所致，一点没有多想别的。她想再多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干脆起来做饭收拾东西，因为她已经买好了早8点去北京的火车票。

自从丁磊、刘格平到北京治病，丁粹华还没有去看过他们，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两个孩子，她的二女儿是1975年5月出生的，刚刚1岁，不能离人。所以她实在抽不出时间去。这次，她是特意请了几天假，准备带着大女儿宣宣乘早8点张家口到北京的火车去看望生病的二老。

他们乘坐的火车一路顺利到了丰台火车站，便停在站台上不走了，说是临时停车。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火车才徐徐开进了北京站。一下火车，她们直奔地铁站，当出了地铁口才知道雨下得特别大，下午4点多，天黑沉沉的好像到了晚上一样。她俩只管顶着瓢泼大雨沿着万寿路往北跑，路上看到的景象让人惊讶，只见大大小小的好多防雨篷挤占在人行道上，里面挤着人。因为路两边很乱，看不清楚路标，只好边走边问，人家看见她一个大人领着孩子，提着包包淋得像落汤鸡似的，都十分热情地给她指路，很快找到了西街7号的中组部招待所。

进到招待所2号楼二层，按照事先知道的房号敲门却没人答应。找人一问，才知道因为地震所有的人都躲到楼外面去了，只有在外面转着找才有可能找到。还好，很快找到了大勤。大勤一眼看到粹华和宣宣站在面前，惊讶地叫起来：“你们怎么这会儿来啦，正在闹地震，全乱套啦。”大勤领着粹华边走边说：“妈3天前回唐山



刘格平为《宁夏日报》题词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啦，还没消息，她准备把秀华换过来。这一地震可把人急坏了，老爸让一会儿给唐山打一次电话，可到现在电话也不通。”说着，她们携手来到招待所楼后面的一排车库面前。中间一间车库门是开着的，只见刘格平一个人，可怜巴巴地坐在车库中间一个木椅子上，一脸无奈地看着哗哗下着的大雨，正在发愣。他见到粹华和宣宣忽然出现在眼前，也着实吃了一惊。粹华仔细端详刘格平，明显感到他瘦了，也老了些。粹华快两年没有回家，两年中她又生了个女儿丁丁，孩子长到1岁多了，还没有来看过他们。说着话都找地方坐下，这时大勤说起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凌晨时分，整个楼房都开始摇动，全楼、全院子的人都被惊醒，当人们反应出是地震后都跑到院子里。大勤跟着人流跑出去才发现老爸还没出来，大勤不顾地动楼摇又冲了回去，推开房门，只见刘格平已经醒了，平平静静跟没事的人一样坐在床边，怎么叫他也不出去。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天亮，招待所的人来催叫数次，这才勉强把他叫出来，安排到建筑结实的车库里。粹华来时，他们已经在车库待了足足一天。刘格平还说：“地震已经过去了，不要大惊小怪的。真要是楼塌了，想跑也跑不了。”

原来，丁磊是在唐山大地震前两天又回到了唐山。她人虽在北京，可心里时时惦记着唐山。一是秀华一个人在家她实在不放心，孩子有病必须有好的营养和合理的治疗，靠她自己开药吃，太让人信不过，万一吃坏了身体那是一辈子的事；还有就是秀华已经25岁了，学习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都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关键时期。再就是她还需要拿一些衣服，有些东西还需要经常晾晒。

妈妈回到唐山，女儿秀华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她这大半年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最想的就是妈妈。虽然妈妈有时把她像幼儿玩童那样管理照料，可是没有人管的滋味也不好受，她这个很少表达自己感情的孩子，也情不自禁地抱住妈妈不愿松手，落下泪来。丁磊看到女儿简单的生活，不停地念叨：“这怎么行，你是有病的人，吃不好病怎么能好！”言语中流露出又心疼又生气的感情。秀华大大咧咧地说：“我吃得好着哩，一顿可以吃一大碗菜，饿了就吃。”“瞎胡说，整天萝卜白菜，买点好吃的也舍不得，我还不知道你！”秀



华只是看着妈妈傻笑。丁磊赶紧为秀华改善生活，娘俩一起做饭，一起干活，出出进进的整天形影不离，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毕竟秀华已是25岁的成年人了，娘俩儿谈过去，谈家庭，谈自己，话总是没有休止。丁磊这次尤其感觉女儿是这么贴心和善解人意，秀华感到妈妈对自己深切的爱，这是她过去从没有体会到的。

丁磊把自己和刘格平的意见告诉秀华，并买好7月28日早上8点的火车票，让秀华去北京。这次，秀华心里很乐意，只是妈妈不能和自己一起回去感到有些遗憾，她已经8年没有到过北京，那里是她生长的地方，有她童年的生活和无数美好的回忆。丁磊说：“你先到北京，抓紧时间检查身体，治病。返城的事你回去填表，你爸帮你联系，无论如何不能再耽误，农场你不要再回去了，能考上大学咱就上大学，考不上也没关系咱先工作，边工作边备考。我把这里收拾好很快也回北京，光靠大勤一个人也不行，我也不放心。”秀华这次完全听从了妈妈爸爸的安排。

27日晚上，唐山的天气格外的热，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床送女儿秀华上火车，丁磊本想早些睡，可是躺到床上后两人越说越兴奋，反而没有了一点睡意。说完立华说粹华，说完粹华又说大勤，总之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大约凌晨2点钟，丁磊催促秀华快睡：“明天还要起早，赶快睡一会儿。”秀华强迫自己入睡，把被单拉到头上，露着肚子、双腿、双脚。丁磊见她又蒙起了头，自己嘟囔了一句：“这孩子，大热天的不怕生痱子。”她觉得特别燥热，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等一会儿，等秀华睡着后帮她把被单揭开，可是一会儿她也迷迷糊糊睡着了。

秀华喜欢蒙头睡觉的毛病是到农场后养成的，这是个很不好的坏习惯，不管天气多热，不蒙头睡不着觉。这是因为在农场，过集体生活，睡大炕，人多不安静，她怕吵，开始蒙头睡，时间久了回到家也改不过来，谁说也没用，谁能料到，这个坏习惯，在关键时刻能使她致命。

忽然一声巨响，一道蓝色巨光闪过，丁磊从睡梦中惊醒，还没等到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被闷在沉重的物体下，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知道啦。这一时刻，正是唐山发生的7.8级大地震。这仅有的23秒地动山摇，让一座城市化为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乌有，让24万人再也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大地震过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被压死的人慢慢从废墟中爬出来，只见眼前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还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犹如噩梦，一个个都傻了。

陶瓷厂有值夜班的人，有人值班没有睡觉，亲眼目睹了这次大地摇撼、震惊的景象。天亮了，人们才明白过来是地震。看大门的高大爷告诉值班的人：

“丁大姐回来了，快去看看！”几个小伙子在几乎成为平地的废墟中确定了丁大姐卧室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块水泥板、大石头搬开，终于把丁大姐扒了出来。她只觉得浑身酸痛，定睛一看，眼前房倒屋塌已成了平地，她就躺在废墟中，只听见有人说：“丁大姐，你还活着，是大地震，天都塌啦！”她猛然想起睡在身旁的秀华，只见秀华睡觉的位置被压得实实在在，她的心提到嗓子眼，顾不得自己疼痛：“快！快！我女儿！”她焦急万分地用手去抓身旁的石头，大家又焦急地开始扒丁大姐北面的水泥、石块，秀华被找到了，丁磊爬着去赶紧掀去她脸上的被单，声嘶力竭地喊着秀华的小名：“幺子！幺子！你醒醒！”她拼命地喊呀，叫呀，只见女儿紧闭双眼，脸上毫无表情。她让人将秀华抬到雨小的地方，守着一步也不离开，喊她，叫她，一直摸着她的脉搏，试着她的呼吸，她幻想着有医生来救救女儿。她查看了女儿的全身，浑身没有外伤，他不停地呼唤着她的名字，一心只盼着她什么时候睁开眼睛，再叫一声妈妈。可是秀华始终没有醒过来。上午10点左右，秀华在妈妈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她抱着秀华呆呆地坐在雨中，丁磊觉不出是眼泪还是雨水只管往下淌，她的心在滴血，她默念着：“苦命的女儿啊！苦命的孩子啊！只差4个小时就可以坐火车去北京了啊！”

余震仍然不断，大雨一直不停地下，活着的人不停地去扒被埋在废墟里的人，亲人们互相呼喊。大地仍然在摇晃，满目是倒下的树木、砖瓦石块，平地起山丘，到处是裂缝和大坑。所有的人都像中了魔一样，不会哭，不说话，呆愣愣的像木头，又像是得了夜游症。

经过一天一夜，在风雨中的浇淋，见到大队解放军战士赶来，所有的人好像才从梦中醒过来。



丁磊见秀华已没有了生还的希望，由于天太热，她只好在大伙的帮助下，在陶瓷厂的后面地里挖了个坑，丁磊从废墟中扒出被单，亲手将秀华裹得严严实实的，将她平平整整安放在里面，仍然像是睡觉的样子。丁磊多么不想就这样让秀华离开自己啊，可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古训入土为安，这已经是唐山地震中所有亡故的人的最好的归宿。

秀华真的走啦，她把青春留在了人间，也留给亲人对她的无穷的思念。雨过之后，天特别的热，特别的潮湿，丁磊这时才感觉出自己浑身的疼痛，尤其腰疼得像断了一样，想直直不了，想弯弯不下去，她咬紧牙忍着。她这个一生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女强人，这时却像是傻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时，她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滋味。

地震第3天，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朱月华、政委王丕礼奉党中央命令，率领“万岁军”全体指战员开赴唐山救灾，同时奉命寻找刘格平、丁磊夫妇。军长、政委知道刘格平、丁磊住在唐山陶瓷厂，他们依照地图找到这一带，果真见到了死里逃生的丁磊。丁磊见到他们就是见到了亲人，在彷徨、无助之际见到救星，热泪止不住的往下淌。政委、军长派车送丁磊回北京，战士们将从废墟中扒出的一些物品也一起拉回北京。

这时，北京家中已经与宁夏恢复了联系，懵懂的知道地震的中心就在唐山。4个人的心都揪起来，更抓紧了与唐山的联系。

地震后的第3天，两辆军车风尘仆仆的开进中组部招待所，停在二号楼前。从军车上面跳下来几个解放军战士，扶着丁磊步履蹒跚着走出车来，一家老小4口立即扑着迎上去。丁磊嘶哑着嗓子有气无力的迸出一句话：“秀华走啦！”。一阵片刻的寂静后，从惊愕中回过神的粹华、大勤抱头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刘格平紧闭着嘴，一句话也没说，一切的悲痛、委屈、酸楚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可爱、聪明的秀华，仅仅25岁就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永远离开了她的家。秀华的不幸，成为她所有的亲人抹之不去的记忆，更成为刘格平心中永远的痛。

不幸中的万幸，丁磊只是受了伤，是床前的衣柜帮她挡住了下砸的房梁和砖块，捡回了她的一条命。无奈的刘格平也只能这样去想，他不能没有秀华，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更不能没有丁磊。

“七二八”大地震，使刘格平在唐山的家完全损毁，刘格平参加革命60多年来撰写的日记、工作记录本和读书笔记也大多毁于地震后下雨浸泡的废墟之中。从此，他们没有家了。命运迫使他们结束了唐山的下放劳动生活而重返北京。几天后，刘格平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太可惜了，她不是要考大学吗？”丁磊向去探望他们的领导呐喊：“一个建党初期就跟着党，坐敌人监狱13年而拒不屈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革命老人，最后却背着‘反党乱军’的罪名被发配到唐山，竟遭家破人亡之难！”



## 党组织审查证实：刘格平“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79岁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让国人万分悲痛的消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10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

毛主席的去世更是让刘格平夫妇的心中如坠云埃，他隐约感到要有大的事件发生。他们更加关注时政，每天的报纸必须按时按点的看。北京市工商局长刘金铭，钦佩刘格平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气节，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刘格平的困难。唐山地震后不久，他受丁磊之托，帮助买了一台进口彩电，那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彩色频道，可彩色电视机还是新鲜货，开关电视就成了刘格平的专利权。10数年间，这台电视成为刘格平获得时政信息和消闲的重要工具。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全国亿万军民又从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中转为欢欣鼓舞，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刘格平老两口增加了信心和希望，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剥夺了他为党工作的权利，还设立了专案对他进行审查。如今，这两个集团都已经垮台，刘格平夫妇理所当然的急切盼望着能有平反的这一天。

唐山地震他们没有了家，就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为家。中组部招待所坐落在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原本是接待组织部系统会议、出差及工作调动临时居住的，文革时期则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安排待分配、受审查无家可归或不准回家的老干部居住，实际上变成一处软禁个别人员的地方。宋任穷、陈丕显、周扬、王力、南萍等都在这里待过，刘格平也在其中。当初住进来，只是为了给刘格平治病，并无长期居住的打算，没想到却躲过了唐山地震一劫。在这里安个家可不容易，它毕竟是个招待所，吃饭就是个大问题。按理，刘格平是回族，招待所没有清真餐厅，这个情况有关部门是完全知道的。招待所院内北侧有4幢独楼，相当于现在的别墅，但那时没有别墅的概念，都叫它做“后小楼”，里边的配置好一些，至少可以自己做饭。于是，丁磊瞒着刘格平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能搬入“后小楼”内。但却被推过来推过去，得不到解决。丁磊问刘格平，革命了一辈子，而今革命胜利了许多年，竟然成为无家、无户口、无单位的“三无”人员，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刘格平内心深处的疑虑和思考，但他却给不出答案，只能保持沉默。那时，从粮食、副食到生活日用品都要票证，全靠亲朋好友们帮助。

生活方面丁磊可是个能人，她要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主食米饭馒头从食堂买，菜自己做自己炒。有关当权者把刘格平推过来推过去，可群众的良心不会泯灭。招待所的所长特批允许他们在楼道最东头支起了煤气灶，食堂统购回来的鱼蛋米面，只要他们要，就卖给他们。还有亲朋好友们的帮助，云南的刘树生、王连芳，不论是自己还是同事，只要进京开会，就从飞机上带来新鲜蔬菜和特产。定期送羊肉成了宁夏丁毅民的一项任务，有一次丁毅民让丁力买了两只刚宰杀的羊，用汽车往北京送，离开宁夏不远就发生了车祸。丁力从车中爬出后看看没大伤，立即又找来一辆车接着往北京奔。海军的军医温慕贞、王好义俩口，几乎每个月都到招待所几次，似乎自动承担起老两口的保健医生职



责，还有河北、山东、山西、天津的亲朋好友们，大家都为了一个心思，让老两口能够安度晚年。老两口也时常念叨，多亏了这些亲戚朋友，对他们也是感念不尽，每次走时都给他们买一堆食堂的白面馒头，在那个时代，这也算是稀罕之物。

丁磊还养了许多花，尤其是在那小小阳台上的一大盆茉莉，从春到夏一直开着雪团一般的花朵，不仅观赏起来漂亮，更是飘出晕晕的花香，凡过往的人都禁不住抬头仰慕，赞赏不已。话语不多的刘格平，见人也常夸赞这生物的灵性，只要用心养护，它一定会给你回报。老两口还养了一只猫，名叫“虎子”，虎子小时可爱好玩，长大后强壮机灵，同样招人喜欢。闲时，刘格平常把虎子唤到书桌上抚摸，在抽屉里还专门给虎子留着好吃的食物，猫成为他的一个不会说话的伴侣，这或许也是一种寄托吧。刘格平认为世上最可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因为与动物打交道不用费脑子，而且你善待它，他懂得知恩图报；人则不同，心思复杂，而且害你的人常常是最亲近的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十余年时间里，沦为“三无”人员的刘格平夫妇，就这样相依为命，顽强地生存着。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随即被提上了日程。

1978年春，胡耀邦来到万寿路刘格平的“家”。他表示，一是来看望，二是来谈工作。他希望刘格平能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有一个认识，同时他还想让刘格平就当年在狱中时，接到组织上“可以履行一定手续出狱”指示的情况写一份说明。胡耀邦说的直率，刘格平也回答的明确。刘格平说：“我知道耀邦同志是好意。但是，我的问题同样要实事求是。”他也向胡耀邦谈了两点：“第一，我1967年受中央指派参加文化大革命，与我谈话时不仅有中央文革的人，而且主要是总理、陈老总、富春，是总理主持的。这一点，中央都应该有记录。1969年下半年就开始对我批判，林彪是批判我的学习班主任，还有陈伯达、谢振华等在座。文化大革命我一共参加3年时间，林彪、四人帮就批判了我9个月。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认识。第二，当年在狱中，我没有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见到过组织让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也没什么情况可谈。所以，还请耀邦同志体谅。”胡耀邦说：“请格平同志不要误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指山西）揪住不放，我们姿态高一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嘛！”刘格平说：“当初让我出来是中央的决定，批判我也是中央的决定，为什么现在要推到地方上呢？”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两位中央组织部负责“六十一个人”专案组的同志，他们所谈的内容，仍然是当年在狱中时，中央或北方局的指示问题。刘格平听说已有当年狱中的同志写出的文字材料，就提出希望看一下，以便对往事的回忆有所提示。当阅读了中组部同志提供的几份材料后，刘格平十分明确的表示，这几份材料中所说事情，有的他确实不知道，有的则不是事实。这几份材料中说：当年签写《反共启事》，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刘格平之所以没有签字，是因为他被判无期徒刑，即使签了字也还是出不了狱。对此，刘格平再次申明，他没有见到过任何中央或者北方局的指示。他还申明，



降边嘉措（左），1955~1975年任周恩来总理藏文翻译，现为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他为刘格平留下了一篇篇“访谈录”



他虽被判无期徒刑，但后来被改判为15年，狱中的同志都是知道的，因为正赶上宋哲元大赦，许多人都改判减了刑。刘格平还指出，这些材料中特指我是因为无期徒刑而没签字，从而把一批没签字的同志说成是只有我一人没签字，这是在瞒天过海，是对基本事实的歪曲。刘格平对此十分激动，他表示：“这样老资格的同志，竟然对组织不说实话，这对不起没有签写《反共启事》的同志。我可以与写材料的这些人对证，上天安门，面向全国人民对证！”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刘格平是绝不会含糊的，他发出的是多么铿锵有力的抗争！

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滑稽。有人来找刘格平，先是讲，过去的事情年代久了记忆难免有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当前中央大局，我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等大道理。然后规劝刘格平主动向中央提出，因多年没有工作而请求降两级工资，这样就不用再写什么文革中问题的认识和检查了，有了这个“姿态”，中央就好考虑职务安排了。来者似乎胸有成竹——两级工资没多少钱，要安排个全国政协副主席，那可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这可是为你刘格平好呀！可来者唯独忘了一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惜生命、宁可把敌人牢底坐穿也决不屈服的老共产党员。刘格平很严厉的提出质问：“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个人的还是代表组织的？”来者无奈，只好悻悻退去。

刘格平后来知道，关于他的问题，有那么几个所谓“元老”级的人物，对刘格平是死揪住不放的。而也有一部分好心的同志，千方百计地努力，想把刘格平尽快解放出来。他对几次来找他谈问题的同志，从内心一直存怀着感激和愧疚。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5号〕文件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



刘格平为沧州泊头举办水果节题词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sup>①</sup>

刘格平夫妇很快看到了这份文件，两个人不止一遍地对文件进行阅读和研究，他们有着自己的角度和标准。文件很长，一大本子，还有很多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可是，既然说有北方局和中共中央指示，这是多么重要的文件，这不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吗，为什么附件中却没有呢？还有，既然当初延安整风时曾反复审查他们出狱的情况，那为什么不附上当时的审查结论呢？再有，如果让当年没有签字的同志出来证明，岂不是更好吗？可诺大一本子材料，竟然对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名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就连附件中刘格平曾经看到过的、涉及他的文字，也删得干干净净。不是有人提出，捺手印签字是正确的，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捺手印不签字的人是不执行中央指示，而文件中却对如此大是大非问题避而不谈，这又说明了什么？……这个文件竟是那么经不起推敲。令刘格平越看、越想、越糊涂，他的心情无法得到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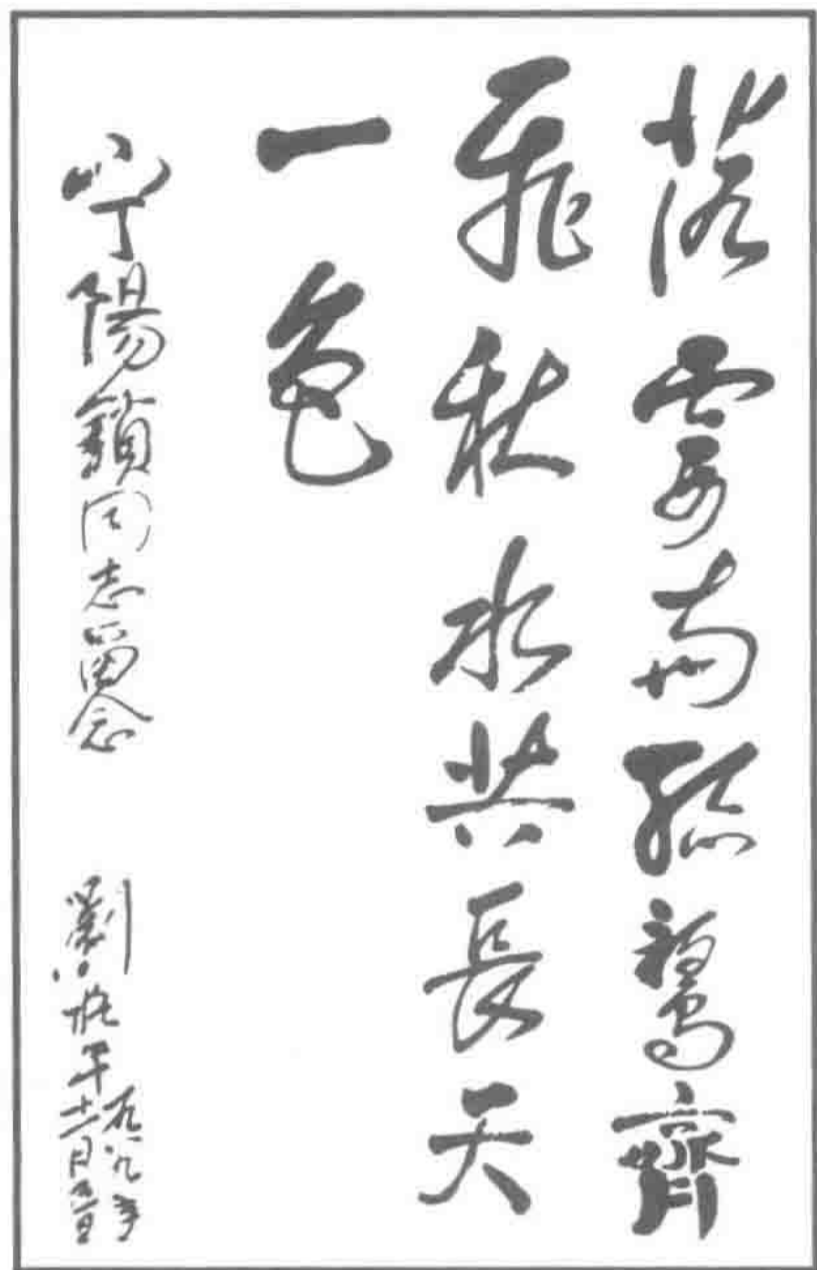
大约是1979年三四月间，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来看望刘格平。他与刘格平也算是“万寿路7号”的“难友”，他们曾在这里一起接受审查，一起度过了1976年“抗震”的日子。1977年底，宋任穷被“解放”出去，他在离开中组部招待所时，丁磊与他开玩笑说：“你终于告别了‘要饭’的日子，可不要3天不‘要饭’就打‘要饭’的。”为此，刘格平很严肃的批评丁磊“胡乱开玩笑”“乱说话”。当然，宋任穷的到来也还是有用意的，他还是想做工作把刘格平“解放”出去。宋任穷很诚恳地与刘格平说：“格平同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300页。



志，人无完人，我们总是有问题有错误的嘛，自己认识了，就主动了。”宋任穷也不可避免地谈到61个人的问题。这次，刘格平的心情很稳定，因为他对一些问题已经思考了许久。刘格平心平气和的与宋任穷说：“我知道，你及耀邦同志，你们都是好意，你们说的也都有道理。回想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错误的的确不少，甚至有些错误还很严重。但在文化大革命和签写《反共启事》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不会妥协。”刘格平说：“关于61个人问题，我服从由中央承担责任的决定，但签写《反共启事》是一种变节行为，这是当年在狱中大家的共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避呢？这样做，对拒绝签字的同志如何交代？对党的形象有无损害？如果这不是变节，又何必中央去承担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中共中央让我出来，卷入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漩涡中的，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抓工作，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党的九大以后，康生、四人帮想让我按照他们的意思揭发61个人，我没有答应。有的人又秉承林彪的旨意排挤我，怕我进到军队，办学习班整垮我，给我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我成为这两个集团的打击对象，至今家破人亡，理应得到平反而不是检查所谓‘错误’。既然中央对61个人的问题都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能对全党、全民都参加的一场运动承担责任，而任由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纠缠不休呢？这场运动的初始难道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就真的只是受害者吗？”刘格平再次对同志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的心意已决，他希望宋任穷能将他的意见转告中央：“现在又分什么‘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所谓‘走资派’又成为干部中争抢的‘红’帽子，都成了受害者，都要复仇，这种思潮仍是运动、斗争的延续，是坚决不能助长的。至于我本人，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惟愿能淡泊名利安度晚年。”

1981年，是刘格平从唐山返回北京的第7个年头，本来话就不多的刘格平，变得更加少言寡语，他每天按照自己的规律按部就班地生活——定时练字、读书看报、收看新闻和走路锻炼，一般很少见客。晚上睡觉之前，老伴丁磊向他叙述白天发生的事情，诸如来了什么客人，谈了什么事情，谁打来了电话等等，有时老两口还对当天的新闻做一番分析，或者互问一下冷暖，这样的生活，寂寞中却也渗透着些许充实。丁磊有时与来访的客人开玩笑：“我们老头



刘格平为宁杨锁题词

蹲10来年监狱，练出来的是坐功和哑语。”但是，说归说，丁磊的内心实际上比谁都心急火燎，一个从少年时期就“不安分”参加革命的人，一闲就是许多年，自由还受到限制，是谁也受不了呀！好在长期赋闲，让刘格平有了练字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中央党校自修时起，他就坚持每天挥毫练字一个小时，到山西任职后停了几年，如今正好又拾掇起来。

每天午休之后，丁磊铺纸研墨，刘格平挥毫落书。刘格平练的字是“颜真卿体”，这还是他6岁入学时姓王的先生所教授。王先生自己写的就是颜体，所以也要求他带的学生都写颜体。小的时候，刘格平只是按先生的

要求去做。参加革命后常到天津去，便抽空了解了有关颜真卿的一些情况。颜真卿是初唐的大书法家，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他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官至吏部尚书，却因受到权臣排斥，遭到贬黜，后又遭奸人谋害而死，以书法留名于世，被简称为“颜体”。唐德宗追念颜真卿一生“坚贞一志”“忠至灭身”，亲颁诏文举国悼念。颜真卿的楷书，丰腴雄浑、气势凛然、大气磅礴，即体现出盛唐风度，又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范例，这也是刘格平坚持修练颜体的重要原因。刘格平练习书写的大字，最多的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和“千锤万凿出深山，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些古诗名句。前两句是唐代诗人贾岛的作品《忆江上吴处士》中思念友人的诗句，因送别友人之时是在夏天，渭水还未有秋风，而如今长安已入秋天，秋风吹过，显现出来的是一片萧瑟景象。两行描写长安秋景之句，与诗中“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之句自然成对，如今秋风吹着渭水，黄叶落满了长安。此情此景，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深怀念之情，刘格平是否也借此寄托他对战友的无限思念呢？深植于他内心的对同志对战友的情怀，大约只能从他练就的诗句中迸射出来。后两句出自明代于谦《石



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生石灰浇上水后从一整块石状变为粉末，这就是粉身碎骨；石灰是白的，这就是清白。于谦是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要像石灰一样，不畏艰难、不惜牺牲、坚守清白的意愿，因而这首诗读来脍炙人口，成为传世名句。刘格平所推崇的，是诗人廉洁正直的高尚情操，所寄寓的，是自己追求磊落襟怀和崇高人格的志向。

这年1月，国家结束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审判。临近春节，平常冷静的家中略显人气。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还有海军的温医生两口，空军副政委刘世昌等，都登门前来看望。云南的省委书记刘树生，又托人坐飞机带来了整箱的云南特产和新鲜蔬菜。过春节时，女婿张效敏特意买了一大堆鞭炮，每次放炮时，丁磊都把刘格平穿裹得严严实实的，站得远远看。可能，这会使他回到儿时的记忆，进入到纯净的心境。

春节刚过，宁夏的丁毅民带来了一份中央文件：中组发〔1981〕5号《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作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要求，要在党的“十二大以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案件进行清理，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平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丁毅民和丁磊认为，这是一个契机，许多老同志也劝刘格平，应该要向中央提出申诉。可刘格平已经没有了这种兴趣，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他坚持说：“政治上的事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我既没有什么错，也不会表示‘永不翻案’，人家是不愿意理会的，何必去自找没趣呢？”他周围也有许多人认为，一个宁可把敌人牢底坐穿也不屈服的人，要让他今天去委曲求全，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

但刘格平的老伴丁磊却不甘心，她把说服刘格平的希望寄托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身上。刘格平对白寿彝很尊重，称他是“国宝”。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格平曾经引荐白寿彝拜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向毛主席推荐说：“这是回族历史学家。”毛主席则说：“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你们搞历史的，不要总说帝王将相，要多说人民创造历史。”这句话让白寿彝终身受益。也是在刘格平的多次关心过问下，白寿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屈指可数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周总理生前对白寿彝说：“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泱泱大国，却没有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写出来的历史。在联合国摆着的中国历史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希望在你们手里能填补这个空白，能把联合国的位置抢回来！”按照总理的遗愿，白寿彝牵头全国学者，历经20多年艰辛，终于完成了多卷本《中国通史》。

刘格平很愿意听白寿彝讲述历史，听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听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往往都是刘格平“点题”，白先生解析。这一次，可是丁磊专请白先生来“看望”刘格平的，之前他们已经通了好几次电话。白先生与刘格平从历史说到现实，再说到刘格平练字。他指着刘格平书写的于谦“留的清白在人间”的诗句，向刘格平提了两点建议：一、应利用精力还好的时候把自己的经历回忆出来，留下文字；二、应该找有关部门，要求尽快给一个政治结论。白寿彝先生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并说服刘格平的，刘格平听后虽然表面上仍然不为之所动，但却开始让学过图书档案学的侄子丁力，帮助整理、查找一些材料。

1981年5月，刘格平向中央提出并撰写了《我的申诉和请求》。这份“申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涉及刘格平主要问题的脉络和刘格平的思想认识及所受的冤屈，是刘格平就自己的事情所留下的重要文字。“申诉”写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同志，并请她转胡耀邦同志及党中央的。刘格平在华东局时与章蕴共过事，丁磊也认识她。“申诉”写好后，丁磊找到三里河章蕴家中，亲自交到了章蕴手中。

之后，有人向刘格平传递了一个信息：邓小平与胡耀邦谈，拨乱反正应是全面的，不要留尾巴，还有些人的问题也应考虑解决一下。这里所说的“有些人”，就是当时人们认识中的所谓“文革人物”，实际上也是一批老干部，像刘格平、李雪峰、潘复生、刘建勋、解学恭等，总共七八个人。这些人的情况各有不同，比如潘复生，在解放初期已是省委书记，已于1980年含冤去世；李雪峰是5级干部先后主政华北、北京，后来竟被开除党籍。这个信息对于被审查且赋闲多年的刘格平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刘格平却十分平静。他非常清楚党内斗争的情况，对眼下的形势他也看得很清



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大政方针，虽然有胡耀邦、习仲勋、万里等人的力挺力行，但干扰很大，步履艰难。特别是，有些号称元老级的人物，当着把他们从极左路线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后，他们却继续以极左的思维去处理人和事，这种思潮是十分可怕和危害巨大的。

申诉材料首先说：

最近，认真学习了1981年2月19日中组发〔1981〕5号文件，文件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案件的复查，要保质保量地尽快完成，不能拖到十二大以后。”“要认真搞好文化大革命前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处理干部的问题上，有些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对这些案件的复查，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文件中还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任何一个人的是非问题，定性和处理问题；不应该根据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一句话，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出，而应该依据党的原则，根据事实作出。”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中央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促使我再次向中央和中央领导就我的问题提出申诉和请求。

我的问题，既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涉及“文化大革命”之中。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问题的申诉。（前文已摘录）

二、对“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申诉。（前文已摘录）

三、关于“61个人”问题的了解和看法：这虽属“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问题，但因问题重大，我单列申诉。

1934年，我在家乡组织河工暴动失败，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后，被判无期徒刑。先是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1936年初转入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院内的监房是一座长筒型的大房子，中间以一条宽约4米的过道分隔为南监和北监，又称南号筒和北号筒，各有24间房，我被关在北监。南北监原来都有秘密党支部，北监的党支部书记是安子文同志。从陆军监狱转来

我们这批犯人后，狱方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调整，原来的人基本到了南监而新转来的人主要在北监，安子文便指定我担任了北监秘密党支部书记。

所谓“军人反省院”，它的主要职能就是对政治犯进行感化教育并使之悔悟，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被关押的人只要在上边签了字，就可以被保释出狱获得自由。秘密党支部的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狱中的对敌斗争，以革命的坚强意志压倒敌人的气焰。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大家都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而且还约定互相监督。党支部还带领大家为改善关押条件而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比如通过绝食，卓有成效的使狱中犯人的伙食得到改善，还争取到4人一个监房、对关押的病人下镣等。党支部还组织大家进行学习，学习材料的来源，一方面是通过秘密发展的狱警传递进来，一方面是狱中同志自己编写，杨献珍同志就翻译编写了共产主义读本。关于狱中的基本情况，我1944年出狱后已经向山东局和渤海区组织上进行过汇报，并多次接受了组织的审查，此处不再多赘。

1978、1979年，胡耀邦和宋任穷同志都先后找我了解当年狱中的情况，我很坦诚的、实事求是的做了汇报，也申明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但是，1978年夏天中央组织部同志送来薄一波写的材料，材料中说：“在自首书（即《反共启事》）上签字是根据党的指示。”“刘格平所以不签字，是因为他被判的无期徒刑，签了字也出不去。所以他拒绝执行党的指示，置抗战大局和其他同志的安危而不顾。”“刘格平拒不执行党的指示，因此多坐了近十年的牢房，最后还是靠组织营救，可能是通过交换战俘而出狱的。”“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履行一定手续出狱的情况，我在延安时专门向毛主席做过汇报，还按毛主席的要求写了一个名单。毛主席看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我看到这些文字后感到十分蹊跷，因为有些事情我压根就不知道，有些事情则完全不属实。为此，我做出以下说明。

大约是在1936年7月，狱中的党组织开会，说党有指示，因为外面迫切需要干部，让狱中的同志在不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原则下，可以履行一定的手续而出狱。当时，中共中央设北方局领导北方党的工作，这个“党



指示”的含义，应该是指党中央或党的北方局，而履行所谓手续，实际就是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我听后追问这个指示的来源，有人说是监狱外边的人联系殷鉴同志传进来的。我当时就认为这件事靠不住，因为殷鉴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狱中党的秘密组织对他一直有所保留，现在怎么能轻信他的话呢？我还提出，如果签了反共启事，一经公开，影响很大很坏，反而无法为党工作。大家听后都表示赞成我的意见，绝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这件事似乎到此就结束了，我没有再听到过类似的事情。狱中关押的人虽然常有流动，但因为有刑期到了而出狱的，也有监狱之间转入转出的，所以离开的同志并没有引起留下来的同志的注意。我从没有看到过，也完全不知道有中央或北方局的指示，也不知道竟然有那么多人签写了《反共启事》还进行着绝对保密。自然，也就不存在我“拒绝执行党的指示，置抗战大局和其他同志的安危而不顾”的问题。

如果说我是无期徒刑不管用，那么薄一波称自己是“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的重犯”，岂不是更不管用吗？这里，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确被判无期徒刑，但因宋哲元和其母过寿而被“大赦”，先减刑为15年后又被减为10年，从政治犯被改为军事犯。我记得好像宋哲元过的是50整寿，这样的事情难道薄一波同志真的那么健忘？还有，我1944年4月底刑满被释放出狱，这一点薄一波同志虽然不一定知道而情有可原，可是却又编造出“交换战俘”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来。

再有，按薄一波同志所说，似乎没有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者仅我一人，他的这种误导使事情的真相被隐瞒。康生就曾借此大做文章，认为“刘格平拒不假投降又坐了8年牢的动力不是马克思，而是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在起作用。”这是对我们党的极大污蔑，我向中央提供所知道的情况并要求中央必须澄清。当时在草岚子监狱中，南、北两监共关押政治犯90多人，如果原来的犯人走了，还会再补充新的犯人。这样，前前后后应有一百几十个人，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没有签字的同志有很多。在我的记忆中，和我一起被捕的胡恒熙、杨德然同志就没有签字，解放初期我还曾为杨德然同志做过证明。原来与我同监的李有山同志，后来转到南监又和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子久同志（还健在）住在同一监房，他也没有签字。张连云、韩培义，还有一个同志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拒绝签字态度坚决，后来通过我们多次与敌人斗争，这三个人于1938年提前获得释放。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黄同志，虽然身患重病也绝不丧失共产党员的节操，坚决拒绝签字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他去世后，狱友们还为对他举行了哀悼活动……。因为年代久远，有很多好同志我已记不住姓名。至今在世的，除我之外还有原属八机部现归中组部管理的干部韩培义同志。

在诸多基本且又严肃的问题上，薄一波同志向组织的汇报竟与事实大相径庭。（略）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件事或不知道，或从未认可过。我的这一判断还有一个依据，据说中央批准这一举动的有少奇、柯庆施及张闻天同志，可是1936年以来的许多年，却从未见到少奇、柯老或张闻天同志对这件事有任何提及。目前唯一的材料，是少奇同志1967年4月14日对此事的书面说明，其中称：“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样看来，少奇同志对这件事情也是似知非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奇同志处境困难的时刻，把这一举动的责任完全推到少奇同志身上，逼迫少奇同志，这不恰恰是一种不顾他人安危的落井下石行为吗？

对于1936年几十名同志签写《反共启事》而获释出狱一事，中发（78）75号文件表示由中央承担责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中央的这个决定。但中央的态度以及（78）75号文件中有明显缺陷，我有责任提出。第一，签写《反共启事》这一行为，应属一种变节行为，否则也就没有必要由中央承担什么责任，这是十分清晰的逻辑。那么，当事者是否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呢？没有这样的认识还去堂而皇之的指责别人，这是对党的纯洁和党性原则的赤裸裸的践踏。第二、阅读（78）75号文件，感觉太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薄一波同志所说，曾经就这件事给毛主席写过材料，毛主席看后批示：“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还有1967年4月14日少奇同志关于此事的说明文字，文件中为



什么都没有将其作为附件呢？（78）75号文件中说“文化大革命”前30年中，也就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对这批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那么，这些“已有结论”的文字，如果作为附件列出，岂不最有说服力？第三、中央在为签写《反共启事》的同志承担责任的同时，是否考虑过那些没有签写《反共启事》的同志的感受和态度？且不说（78）75号文件最应该有这些同志的证词，仅是现仍然健在，神智和头脑完全清醒的韩培义同志，长期被污蔑为“神经不正常”，我则被污蔑为“拒绝执行党的指示，置抗战大局和其他同志的安危而不顾”、“穆罕默德主义”、山西还有材料说我是因为与大家不合群而白白多坐8年监狱等如此恶极之污蔑，难道就不需要澄清吗？为什么（78）75号文件中对此只字不提，还将涉及此问题的所有文字删除？

耀邦、仁穷同志，还有许多同志，都希望我能向中央表示一个态度，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承认错误做个检讨。我知道，这都是领导和同志们的好心。但我考虑再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是当年拒绝签写《反共启事》，还是后来如实向中央请示和反映，都是坚持党的原则，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实在没有什么错误可以承认。反思起来，不论是山西的混乱，还是我受命于中央出来主持山西工作，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毫无疑问，我有我的局限性，包括在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滞后；对山西干部情况不了解，依靠和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与在一起共事的张日清、袁振、刘志兰等同志沟通的少而批评的多等缺点，但是这些构不成所谓“政治野心”。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既然中央对向敌人变节的行为都能承担责任，为什么却对涉及全党性的问题要去追究个人责任呢？特别是，在任何组织中都会受到不耻的对敌变节行为，在今天竟被颠倒黑白，这岂不是自取其辱？这些年来，每想至此，总感对不起那些维护党的尊严，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而宁死不屈的无数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从这一点上说，我的申诉更是为了他们。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至于我个人，如今已近80高龄，能够仍然享受着无数同志和战友用生命及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已感足矣！唯想唯愿无愧党性！无愧良心！

以上申诉，恳请中央受理。

刘格平1981年5月于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1981年刚刚入冬，刘格平突然便血，被送医院急救。便血是刘格平的一个老毛病，过去也曾经有过，解手时出血，晕倒，那时年轻，看上去没有这次那么严重，这次出血出得让人害怕，人的整体情况不好。以前限于检查手段，一直没有检查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唐山时医生曾经怀疑是癌，到北京后其他病比较严重，肠道方面不太明显，也就没在肠道方面多做检查。在北京，高干就诊的医院也是分等级的，刘格平虽然是行政3级，但属于被审查、犯错误的干部，组织上批准看病的医院是北大医院。医院的医生非常负责，住院治疗后出血止住了，可是高烧不退，一时查不出病因。加之医院的病房设备比较简陋，特别是暖气不好，让丁磊心中又急又怕。于是，她再一次瞒着刘格平，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乌兰夫、习仲勋写了个报告，并请他们转呈邓小平。报告的大意是：我们受审查许多年，唐山地震使家毁人亡，现在老两口相依为命，但既无户口又无住房，看病亦无保障，请求中央能够给予过问解决。没想到，报告送出去刚几天，乌兰夫、习仲勋就先后来到医院看望刘格平。乌兰夫来时心情非常激动，他详细询问了刘格平的病情，并关照他一定要好好治疗，保重身体。乌兰夫说道当年在北京时两家经常共度周末，也说道他在文革时被下放到湖南……两人情深意长，千言万语都难表述。走时，乌兰夫对丁磊说：“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就是。”丁磊多年没有听到这么亲切的话语，激动的流出了眼泪。习仲勋与刘格平在中央党校分手后，已经是17个年头了，他一进医院病房就与刘格平的手握在一起，许久没有分开。丁磊和丁力、丁明姑侄，还有丁力的爱人刘荣都守护在刘格平病床前，丁磊介绍说这是我哥哥的孩子，习仲勋听后对丁磊说：“你兄长 in 宁夏受了罪，但现在好了，我在宁夏班子的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字。咱们能过来不容易啊！能再见面也不容易啊！现在你们要把身体搞好，把孩子们教育好。”

很快，中央就批准刘格平转到北京医院看病。经过仔细检查，终于查清肠



内有息肉，造成肠道大出血，于是顺利进行了手术，使大家悬着的心踏实了很多。

这次住院，变成了让丁磊感到很欣慰一件事。一是解决了刘格平长期的病患和看病的问题，二是有了中央给刘格平在北京安家的明确的态度。原来，丁磊的报告直接送给乌兰夫的秘书后，乌兰夫立即给习仲勋打了电话，因为报告的抬头是给乌兰夫、习仲勋两人的。习仲勋经过认真考虑后对乌兰夫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格平同志的成见是很深的，所以格平同志的问题总解决不了。咱们既然在这个位子上，不能总这样吧。我看这件事不能按正常渠道办，咱们想办法直接找耀邦同志。”于是，他二人在一次公务活动时，找机会把丁磊的报告递给了总书记胡耀邦，乌兰夫对总书记说：“一个少数民族老同志，现在没家没户口，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这样对待呀。”习仲勋补充说：“我看这件事，你批我办，有什么事咱共同担着。”当时，习仲勋还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胡耀邦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在北京建户口，在北京给住房，在北京医院医疗。”唐山地震后，7年没有家的刘格平，在胡耀邦、乌兰夫、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下终于又看到了“家”的希望，这时他已近80高龄。

刘格平病愈不久，1983年2月初，中共中央给刘格平下了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这10个字，让刘格平足足等了14年；这10个字，对饱经酸甜苦辣、生死离别、颠沛流离的刘格平来说，字字都似千金。老两口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坚信我们的党！他们感谢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庆幸能活着见到有结论的这一天。毕竟，潘复生、刘建勋等同志，都是含冤九泉之后才得到结论呀！

1983年4月，中央提名刘格平为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使刘格平的组织关系也得以恢复并且有了单位，按中央的通知，丁磊的组织关系也安在了全国政协。自此以后，他们生活和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刘格平夫妇的注意力，主要盼望的是能尽快有自己的住房，刘格平也开始了撰写回忆录的工作。

当时，侄子丁力正在北京跟从白寿彝教授编写回族史，丁力的爱人刘荣也在首都师范大学进修外语，每到周末他们都回到万寿路7号的家里。丁力陪白寿彝先生多次看望刘格平时，白老先生反复动员老人家趁有空闲的时间留下一些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文字东西，他还特别批准，丁力的任务就是帮助刘格平整理回忆录和访谈录，帮助查资料。但到刘格平真正开始回忆，真正动手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难度很大。首先，刘格平所需要的资料大多是解放前甚至是民国初年的资料，还有许多是党内文档，并非从图书馆就能得到全部满足，而以他们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也只能实现泛泛、一般的资料控制。于是丁力与刘格平商定，一边录音回忆一边进行文字写作，留下线索以后再去核实查证。这样，由丁力对刘格平进行回忆采访录音，然后根据采访的线索去查阅去核实，再反馈给刘格平。刘格平则坚持每天定时定点写几个钟头，写出的手稿再由刘荣负责誊写清楚。据丁力说，在誊写过程中，发现老人家手稿中许多词句、用语、表意都不太清楚，特别是口语化的地方太多，虽然他们在誊抄时也帮助改正了一下，但老人家很倔，有时你改了他又改回去让你重抄，有时已经誊抄完了他又加入一大堆新的内容，有的地方还要与他磨合许多次才能搞清楚原意。但不管怎么说，刘格平终于完成了他对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回忆。后来，刘格平和丁磊将这个回忆中关于建国前28年战斗历程的内容，又整理了一本20多万字的回忆录，题名为《艰苦奋斗的28年》，还将回忆于方舟、张隐韬、胡恒熙三位革命英烈的内容撰写了传略，为老战友、建国后同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李锡九撰写了回忆文章。在刘格平逝世7年后，由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把他的这些手稿整理、编纂成30多万字的《刘格平文集》，于1999年9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刘格平的访谈中，最为珍贵的是他对党的民族工作的得失以及对文化大革命前后一些经历的回顾，特别是他对所经历的“文革”后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反对自由化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反思，对我们研究那个时代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4年6月，已是80岁高龄的刘格平携夫人丁磊，回到沧州。他首先去了南皮县烈士陵园，当他回顾四周都没有找到1922年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张隐韬的墓碑时，一丝凄凉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掠过，他默默地静立片刻后，对陪同而来的地、县领导说：“我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张隐韬不仅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南皮县的骄傲。它为革命而英



年牺牲，我们怎么能忘却他呢？”随后，他找到了张隐韬的家乡，访问有关亲友，到村南一块棉花地里，寻找烈士的坟墓。当人们告诉他这是张隐韬墓茔时，刘格平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连鞠三躬。接着，肃立默哀，足有十分钟。他从侄子丁力包中，取出为此行准备吃住花销的、仅带来的2000元钱，亲手交到地方领导的手中作为捐资，再三叮嘱要尽快把烈士的遗骨移入南皮县烈士陵园，立碑纪念。回到县城，刘格平还亲笔写下了“张隐韬烈士之墓”7个苍劲端庄的大字。中共南皮县委编撰党史的同志，在得知张隐韬是中共早期党员后，引起高度重视。他们开始四处搜集有关张隐韬的史料。

回北京后，刘格平又多方打听，并告知地方的同志，张隐韬的入党介绍人罗章龙还健在，担任国家博物馆的顾问，请尽快找他了解张隐韬的情况。1984年底，经罗章龙证实，在1922年春天由他介绍张隐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毫无疑问，张隐韬是我党“一大”时期的党员，也是沧州地区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86年，南皮县烈士陵园内修建张隐韬烈士冢并立碑，由刘格平题词。因为刘格平的提示，南皮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1988年在县档案馆偶然发现署名“仁超”的两本日记，“仁超”正是张隐韬的笔名。随后又获知，这两本日记在“文革”时就曾被发现，但因为张隐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这两本日记无人细看即被当作“反动材料”上交，后不知下落。从日记的时间可以断定，日记应为3册，现仅存一、三两册，共5万余字。其中第一册记载张隐韬在1923年8月1日至1924年3月23日期间的革命活动、生活、学习情况及入学黄埔军校的经过，约2万多字；第三册真实地记载了张隐韬自1924年6月25日至9月4日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参加北伐的情况，约2.8万字。根据日记的记载，我们确知张隐韬于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陈赓、左权以及胡宗南、宋希濂为同期学员，而从日记中记载的张隐韬进入黄埔军校的过程，更可以获知毛泽东当时与黄埔军校的关系和所承担的角色。日记中所记载的与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王尽美、罗章龙等人的交往，还记载了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张继等人的部分活动，为了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将张隐韬日记中关于入黄埔军校的一段记载，选释于下：“（1924年）3月14日，晨时至沪，因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自宁至沪之途中均行于夜时，其间之农村景状，也未能看及。寓于吴淞江岸之大安旅店。与其纲等去环龙路之国民党执行部，讯其去粤情形。毛泽东君谓已考过一次，你们来迟，须暂待两日，听本部的通知，我们遂回寓……”对此发现，新华社专发了通稿，1988年4月《人民日报》也作了专门报道。张隐韬的两册弥足珍贵的日记，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刘格平身为一个既无权又无势的老共产党员，为了寄托对先烈的哀思，为了教育后人，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使曾经受到误解的革命英烈张隐韬得以昭雪，其革命情怀感人至深、令人震撼。

1988年，刘格平夫妇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住房，他们分到了位于万寿路甲15号一套近300平方米的住房，在海军服役的小女儿刘永勤，虽已成家且有自己的住房，但她与在对外友协的爱人王宏强商量后，还是全家搬来与老两口同住，以让老两口晚年安享天伦之乐。可以说，磨难了一辈子，颠簸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的刘格平，终于能有了宁静的生活，终于能安度晚年，这是他的愿望，更是丁磊和全家人的愿望。



1992年3月25日，丁磊及子女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刘格平遗体告别



1992年初，刘格平因腿病、感冒又住进医院，但随即引起旧病复发。3月11日上午9点多钟，刘格平走完了他光辉、坎坷又充满悲剧的一生而归真，终年88岁。这个噩耗传出后，中央许多部门和领导送来了挽联和花圈，许多刘格平的战友、朋友和亲属也都来吊唁，各式挽幛、挽联、花篮布满了吊唁大厅。在正面悬挂着的大幅照片下，刘格平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党旗——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含笑面对人生。

几幅显赫的题词，概括了刘格平的一生：“杀头不折腰，气节高千古。谷牧题”“格平同志是回族人民革命之先驱。钱正英”“格平同志是坚持原则的好同志。赛福鼎艾则孜”“格平同志深受各民族的尊敬和爱戴。阿沛阿旺晋美”“格平同志为我党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文瑞”……

按照回族的习俗和刘格平本人的遗愿，丁磊向全国政协、中组部、中央办公厅请示，拟将刘格平送回河北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他的家乡实行土葬。中央批准了这个要求。

1992年3月26日，为革命奋斗了70年的老共产党员，一生坚守共产主义信念



刘格平遗体运回故乡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安葬，途经自治县时当地政府为刘格平举行追悼会



孟村回族自治县干部群众参加刘格平的追悼会



刘格平陵园建在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

北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矗立一座民族风格的建筑，建筑门楣上方镌有“刘格平陵园”五个金色大字。陵园里有刘格平雕像及墓碑，记述了刘格平的生平和革命业绩，陵园四周种满松柏树木，气氛庄严肃穆且生机勃勃。这里已是津南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每逢“清明”之际，来祭扫陵墓和到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成群结队。

刘格平的革命精神会永远牢记在各族百姓的心中。

的回族革命者，按照穆斯林丧葬方式在家乡下葬。

刘格平去世后，在他的家乡大堤东村、小堤东村、刘石桥村、赵石桥村4个村委会共同努力下，经县教育局同意并报请县委批准，成立了格平小学、格平幼儿园。同时，在河



# 回忆与纪念

寻 觅 真 实 的 刘 格 平





## 痛悼我革命的启蒙导师刘格平

王连芳

听到格平同志病重的消息，我匆匆赶往北京，可是，格平同志没有等我——他走了。他的夫人告诉我，格平病重期间几次念叨着我的名字。70多岁的人了，什么没经历过，什么没承受过，可是我无法承受这一现实，我哭了。多少年来，第一次痛苦地哭了……

春寒料峭，北京阴霾的天空，仿佛也在为失去他而悲哀！我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静，写下几行短短的文字，寄托我的无限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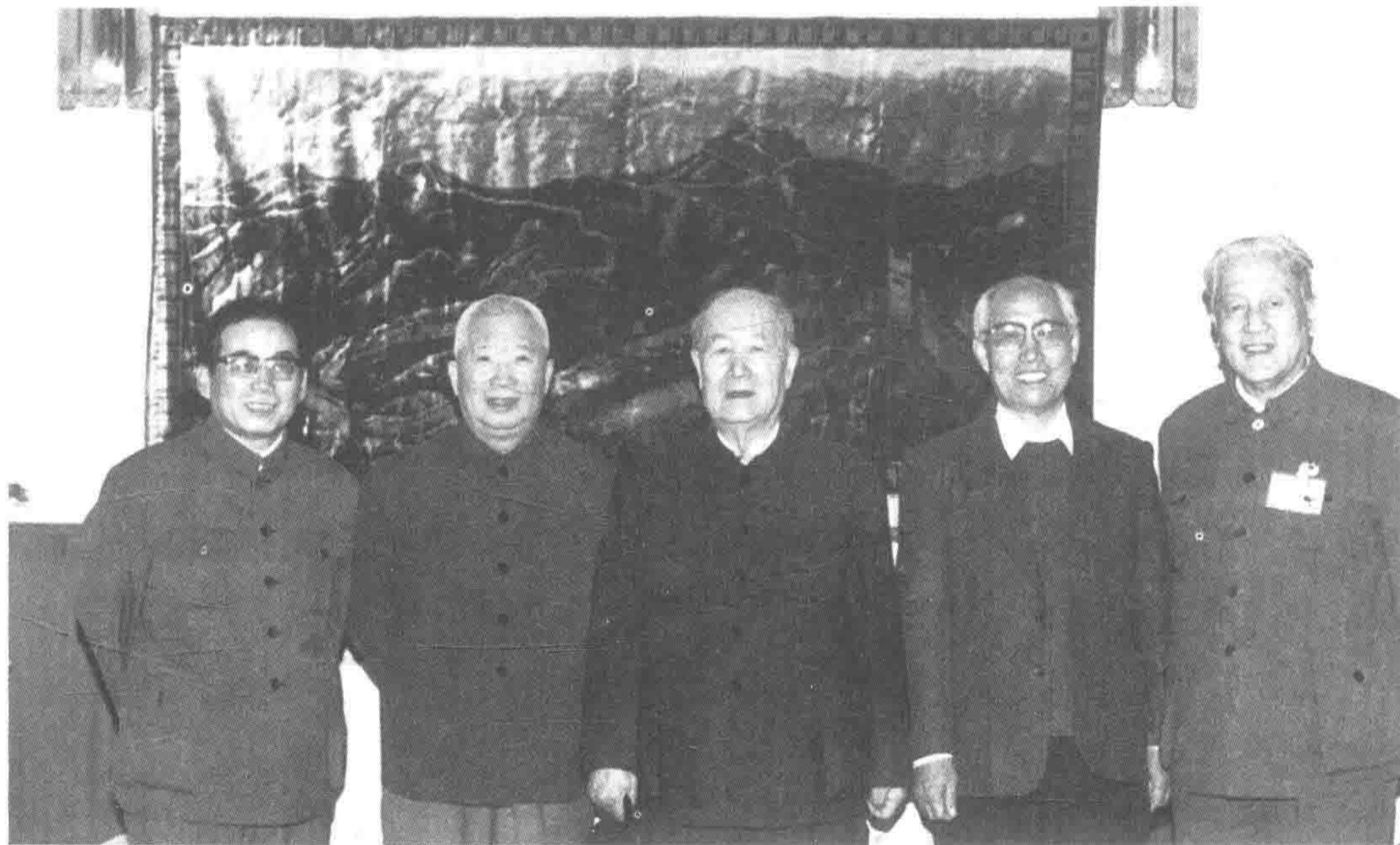
旧中国的津南大地，军阀混战，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政治上实行残酷统治，经济上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上贫瘠的盐碱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广大回汉人民在饥饿、寒冷和痛苦中呻吟，有的因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倾家荡产；有的受地主残酷剥削而卖儿卖女……尤其回族人民，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加之受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制约，生产门路狭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许多人被迫铤而走险，加入绿林。结果，有的被关入牢狱，有的被官府追杀，枭头示众……

漫漫长夜，脚下是一片艰难的沼泽，前方没有一丝希望的曙光，津南回汉人民的出路在哪里？这时候，一批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与革命者，向那个万恶的社会发起了进攻。在那批革命队伍中，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回族青年，年仅18岁，他就是刘格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平同志。格平出生于当地闻名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排行第三被尊称为“三少爷”。他厌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地主少爷生活，在苦闷和求索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愤然背叛封建家庭，于1922年，在天津由共产党员张隐韬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从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开始到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直至创立津南特委，他把革命的火种撒遍津南大地，为津南的革命斗争打下了了的基础。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回汉农民武装，是其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刘格平很早就强调，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先与张隐韬同志搞兵运工作，想通过策反改造旧军阀的军队，掌握武装力量，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结果，他们失败了。但他绝不灰心，继续与张隐韬一道，转而深入津南各县组织津南农民自卫军，自卫军队伍达1000余人，曾一度占领盐山、庆云县城和乐陵县城北部地区。但由于训练无素，党的力量薄弱，加上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自卫军被反动军阀扼杀在摇篮之中，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张隐韬同志也壮烈牺牲。经过津南农民自卫军武装斗争的再次失



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曾在渤海区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相聚，左起：刘树生、傅继泽、刘格平、王世延、王连芳



败，使格平同志不仅感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建立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的极端必要性。他于是深入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注意发展工农党员，短短两三年时间，党便在津南建立了特委。接着，他于1934年再度发动庆云县马颊河民工暴动，攻破县城，痛打旧公安局长，吓得旧县长不得不低头认错和签字画押，答应民工们的合理要求。在暴动胜利后组织农民武装过程中，遭反动政府的突然袭击，刘格平同志和十几位党员同志被捕，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从那以后，广大回汉人民开始觉醒。并开始懂得只有回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军阀、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因而革命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再也扑灭不了。不仅搞得反动统治者日夜不宁，不断受到人民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打击，而且锻造了一大批坚强的革命同志，著名的领袖人物，汉族出身的马振华、贾震、邸玉栋和回族出身的刘子芳、王俊峰、李安民等同志，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勇敢地肩负起革命重任，开始了新的战斗，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一起，彻底推翻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 二

刘格平同志曾3次被凶恶的当局逮捕。第一次是参加革命初期被北洋军阀逮捕；第二次是1928年6月，在组建革命武装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第三次是1934年4月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时被捕，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他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北平陆军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敌人多次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逼他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供出“同党”，但他坚贞不屈，发出“宁把牢底坐穿”的誓言，以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多次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斗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被捕后押解北平路过盐山时，暂押在县城监狱，党组织考虑到我年纪小，不容易被敌人怀疑，暴露身份，特派我去探监。那是一个清晨，我赶到监狱中，那里已挤满了人，几辆马车停在监狱门口，格平同志和其他几位同时被捕的同志正被押上车，格平因被视为要犯，特别给他带上铁镣，其他几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位同志则带着木镣（俗称木钩子）。格平同志一出狱门，便神态自若地向群众微笑致意，他的左手因被敌人打掉了一个指头，用白毛巾裹着。伪警察边吆喝开群众，边扶格平上车，格平同志怒吼一声：“不用你们！”不顾伤痛，自己上了车。我因年纪小被人群隔开，无法接近他，只能站在一旁含泪送别。当我将目睹的一切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后，同志们无不感动，含泪宣誓，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1944年4月，刘格平同志刚刚刑满出狱，在与上级党组织还未接上关系的时候，他利用在天津二哥家休养的时间，开展了学生运动，并积极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50多名青年团员、党员，为天津地下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一大批骨干队伍，他们中的一批人还被带到渤海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在那里锻炼学习，又被派回天津开展地下工作……

刘格平同志就是这样，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战场，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

### 三

我就是1933年那个艰难的岁里和格平同志相识，并结下了亲密的革命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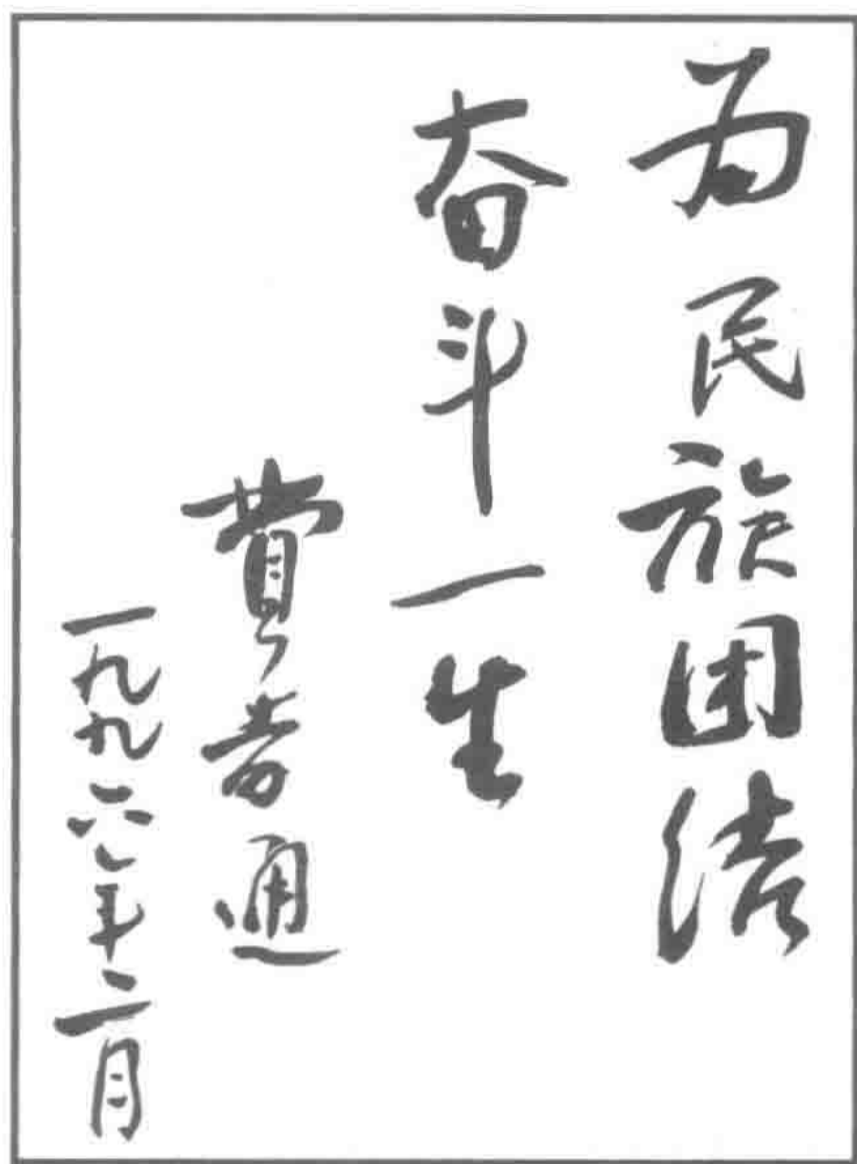
我出身于一个回族小地主家庭，家原住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不甘当亡国奴，愤然举家迁至津南盐山县。父亲最崇拜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和他孤胆杀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英勇行动。他常说，中国如果有1000个安重根，小日本准完蛋！他希望他的儿子中也出个安式的人物。二哥在沧州第二中学读书时，在格平同志教导下，思想进步，曾发动和参加二中的学潮，还常把丁玲、蒋光慈、郭沫若、鲁迅等进步作家的书籍拿给我看。对我倾向革命，向往进步有重要影响。但是，真正使我投身革命的，则主要是格平同志。面对当时的社会黑暗、九一八后亡国灭族的威胁，目睹黄河决口，几百万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我幼小的心灵里结下了许多解不开的疙瘩。特别是当我亲身感受和看到回族被压迫、被歧视，许多回回被以“回匪”罪名逮捕、被枭头



示众时，心里无比愤恨、苦闷和迷惘！1933年早春的一个日子里，有一个看上去像个大知识分子的“亲戚”突然到我家来。当时，我只是个13岁的小学生。他一见我，就微笑着抚摸我的头，并亲切地问我：“长大了要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回回太受汉人欺压了，长大了我要为回回争口气。”他赞许地点点头说：“你很勇敢，不错。”接着又问我：“你们村里有多少个汉人，多少回回？”我回答：“汉人多，回回少。”他又问：“汉人中有多少穷人，多少财主？”我说：“穷人多，财主少。”紧接

着他又问：“你有汉族小朋友吗？”我回答：“我很多，都很够朋友。”他笑了，然后问我：“你的这些朋友和他们家里人欺负你吗？”我一时答不上来，脸有点红。接着，这位亲戚边引导边给我讲了欺侮回回的不是全部汉人，而是汉人中的统治者和国民党，汉人中的广大劳苦大众，和回回一样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只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回回才能翻身，汉族人民也才能解放。这一席深入浅出的“大道理”，解开了我幼小心灵里的疙瘩，使我从狭隘朴素的民族感情中逐渐醒悟过来。我从心底佩服这位“亲戚”。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父母常常谈论的传奇人物刘格平。自那次谈话以后，我成了格平同志的一位忠实的小听众，他常常用身边的一些生动事例，给我讲新思想、新主张，使我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我的心逐渐豁亮开来。就在那年，我被他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记得当时学生已放暑假，格平同志藏在西隅小学校教师卧室内进行革命活动。因为我年纪小，组织上分配我给他送饭，接着，又成了他的秘密“小交通员”，他把党的秘密文件和信件捆在我的肚子上，由雇工赶着驴送我到外村给一些同志送去，我一生的革命道路便这样开始了。

当时格平同志培养的革命战士很多很多，我只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



费孝通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们都是我的老师和兄长，没有因我二哥以后的叛变而歧视我，相反，他们主动关心鼓励我，和我联系。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的革命建设时期，都成了领导和骨干，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 四

据我记忆，格平同志因为出身回族，早在他开展津南革命斗争时，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他却遵守着回族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尊重汉族同志的生活习惯。他经常说，这是联系回族群众，引导回民革命的需要，因而给回汉人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人们都很信任他，尊敬他，认为他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回民英雄！当然，他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还时时刻刻利用回族干部这一身份，主动为党开展回民工作。在结束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后，他于1945年到了华东中央局担任民运部副部长，他借那机会立即着手组建了山东回民协会，并担任主任，用山东回协的名义及时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回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同时不断发布山东回汉人民团结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动人消息，给当时各根据地回民以极大的鼓舞。此外，在他领导下，还把山东各战区的回民抗日武装和回民支队组织在一起，进行整顿和训练。这些部队随着回民地区减租减息和参军运动的开展，不断得以壮大，成为当时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一些领导同志曾考虑在此基础上成立回民纵队，只是由于党中央为了爱护和尽最大限度保存这批回民骨干力量，才取消了这一打算。

新中国成立时，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立即与李维汉、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工作领导人一起，筹建和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各少数民族从此正式结束了长期被奴役、被歧视的历史命运，开始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时代。1950年五六月间，正当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总理日理万机的繁忙时刻，却没有丝毫忽视民族工作，及时委派刘格平和费孝通、夏康农以及冯乐进、王连芳、杨辛等同志组成中央民族访问团，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无限关



怀和慰问，分成三个分团，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深入艰苦的云、贵、川、康等省的广大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访问。其间，访问团向西南各族人民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问候，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解决各族群众的一些生活困难，极大地鼓舞了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为当时的民族团结、对敌斗争、边防巩固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访问期间，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动植物学家，以及民族干部，不仅在艰苦的工作实践中完成了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期望和重托，而且自己也得以锻炼成长，成为民族工作的领导和骨干，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全面展开打下了组织基础和创造了良好条件。访问结束后，刘格平在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期间，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他又与同志们共同筹建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并担任自治区政府首任主席和区党委书记。

革命的征途是曲折复杂的，但是，正如组织上在给《刘格平同志生平》中所说：“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他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他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虽在反地方民族主义中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格平同志，不愧为党的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之一和早期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格平同志，各族人民永远怀念您！

安息吧，我革命的启蒙导师！

（作者曾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怀念格平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

丁毅民

刘格平同志于1992年3月11日和我们长辞了，我痛感失去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师长、战友和知己，不禁无限悲痛。

1945年秋，我和他在山东省临沂市相识，当时他出狱不久，到山东筹建“回民协会”，我是鲁中回协的负责人。在他去世以前的47年里，我们在一起工作或交往，感情甚深。他为党的事业70年如一日，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的坚定，对中国共产党赤胆忠心，顾全大局，胸怀坦荡，爱憎分明，遇事冷静、忍耐而有韧性，他含冤无怨，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些优秀品质都使人十分敬佩！

—

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中觉醒最早的优秀青年之一。他1904年8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堤东村一个回族大地主的家庭，到南京上学时于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1年南京军校毕业后他又到天津工商大学补习班学习，1922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在大堤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第一个点燃了津南革命的火种，从此他就背叛了地主家庭，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刘格平在津南一直领导着反帝、反封建、反霸、反对新老军阀的斗争。早在1925年春，受党组织的分派到河南省的国民第二军开展兵运工作，取得了军



官身份，参加了北伐战争，同年秋他和地下党领导人张隐韬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张任司令，刘任副司令兼参谋长，遵照党的指示，向全国发表了武装起义的宣言，做了在我党领导下的中国北方第一次武装斗争的尝试。农民军发展到3个大队，1个骑兵手枪队，共1200多人，声势很大，广泛开展了革命斗争：同年冬刘格平到天津，又组建了工人起义军，自任总指挥，配合国民第二军击溃了奉系军阀张作霖部，打击了军阀势力。但国民第二军、三军的反动势力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断壮大，又恨又怕，便对农民自卫军组织了围攻，当时由于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行，农民自卫军被击溃而失败，张隐韬壮烈牺牲，刘格平化装脱险到天津。

1926年7月，刘格平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月间就以中共顺直省委军事委员和津南特派员身份，回到津南地区创建党的工作。先后建立了沧县省立第二中学、泊头省立第九师范、堤东区、河间、献县、盐山、庆云、沧县、乐陵、宁津、泊头、南皮、盐山杨马连等县、区、学校一大批党组织。中共津南特委建立，刘格平任特委书记，领导了津南、鲁北广大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大革命中，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又派刘格平去武汉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冬，刘格平返回津南，首次发动了献县东部数千农民借粮斗争，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发表了八七会议决定，中共顺直省委依据八七会议精神做出了“实行土地改革，打倒一切新旧军阀。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的决定。



著名教授白寿彝（左）与丁毅民畅谈刘格平光明磊落的生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刘格平遵照顺直省委决定，领导了“改造绿林武装”的工作，创建了一支300多人的“津南革命军”。1928年春，又组织了庆云、盐山一带的农民，建立“津南革命第一支队”，发动了庆云大暴动，攻占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这是共产党在北方又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刘格平趁势又到河间、献县一带发动武装起义，被坏人告密而被捕，被判刑3年，暴动也被镇压下去。

刘格平出狱后，1931年6月，党组织决定派他去晋、陕开展17路军的军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刘格平在西安团结回族中有声望的代表人物冯瑞生先生等，组建起“回教抗日救国会”，成立“回族青年读书会”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长戴季陶到西安大肆鼓吹“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要求学生只能在校读书，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还侮辱陕西人，引起了各界的不满。刘格平以“回教抗日救国会”和回民为依靠，趁机发动了西安的广大学生和各界进步力量，开展了“驱戴运动”，赶走了戴季陶，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2年刘格平回到沧州，领导了津浦沿线党的工作，发动武装斗争。1934年4月，他又领导了三四万人参加的马颊河民工大暴动，砸了县警察局，缴了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向刘格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家属



保安队的枪，逼迫国民党县长答应拨款修河停止向农民摊派，释放被捕人员，取得了重大胜利，震撼四方。中共津南特委又依据形势发展，决定“重建自卫军，创建北方苏区”，刘格平在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从此开始了历时10年的狱中生活。

刘格平的早期革命斗争可以说明：他从开始就依靠回族人民，深入到回族中去开展工作，是在艰苦、英勇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回回民族领袖。他背叛了地主家庭，坚决地和农民站在一起，进行了反封建、反霸的斗争；他一开始就开展兵运，注意紧紧掌握武装斗争这一“法宝”，创建革命武装，打击封建势力和新老军阀，轰动北方；他是津南、鲁北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也是创建革命武装和创建北方苏维埃最早的、影响最大的领导成员之一。在北平、天津、保定反动势力最强的战略地带进行斗争是十分艰难的，但他却把革命的火种播遍了津南，波及鲁北，起了燎原的作用，他的光辉事迹永远载入史册。

## 二

刘格平在狱中英勇斗争了10年。他被捕时坚贞不屈，被打残了左手，带着重伤，先后被关进庆云监狱、沧县监狱、北平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一大批革命者，分南北两狱，刘格平任北狱的党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领导了狱中的英勇斗争。

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治犯进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都不能使具有远大革命理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屈服，使得当局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在斗争中刘格平练就了一副硬骨头，一种坚贞不屈的性格，一种不怕杀头的英勇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敌人不肯罢休，把他作为最“顽皮”的犯人对待，从5个人一间的牢房里分出来单独关押，以利诱欺骗、封官许愿、让“朋友、亲戚”规劝等手段妄图使他投降背叛，都被顶了回去；敌人又以杀头相威胁，刘格平视死如归，毫不畏惧，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展开不屈的斗争。

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震惊了当局，鼓舞了狱中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为了将来对党、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胸怀大志的革命者们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办起了“自修大学”。敌人严禁他们学习，他们就开展绝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在环境极恶劣的情况下，坚持了马列主义著作等学习。

当局发动劝降、诱降活动，要政治犯们在“坚决反共，效忠党国”的“反共启示”上签字，刘格平和张良云等30多位共产党员，坚决拒绝，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宁愿坐穿牢底也不签字，同敌人进行了更顽强、更艰苦的斗争。

当同押一个监狱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吉鸿昌慷慨就义时，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悲壮诗篇惊呆了敌人，而这种“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大家宣誓“学习吉鸿昌，誓死不投降”，就这样，刘格平等同志又坐了8年监狱。

七七事变后，刘格平在狱中领导了新的斗争，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敌人改换了监狱，更加强了监禁措施。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国民党政府迫于大势，只好将刘格平无期徒刑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1944年刘格平刑满出狱。

刘格平等同志在敌人面前横眉冷对、铁骨铮铮、坐穿牢底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不愧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党组织领导人。他出狱后，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

在刘格平同志85岁寿辰的祝寿词里，在他逝世后的挽联、挽词里，对他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气度作了以下的评价：

“精英马骏（回族）是先行，继有沧州举赤旌；唤醒虎龙惊顺直，坐穿狴犴壮津平”。“丹心耿耿，光照汗青”。“燃千点星火，燎原万里，看五星红旗，东起升”。“对敌人横眉冷对，大义凛然，铁骨铮铮，高风亮节；对党无限忠诚，光明磊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有一首诉衷情的词中写道：

“霜欺雪梅花益香，寒去自留芳。泪尽赎公无计，仰天哭断肠！七十载，功垂史，德益彰。血泽千秋，骨润万代，永驻春光”。



这些评价是客观的，恰如其分的，不仅是对刘格平艰苦、曲折一生的敬佩和敬仰，更是对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个英烈的写照，是对后人的重要启迪。刘格平永远活在各族人们的心里！

### 三

刘格平同志出狱后，即接受党的任务，转战冀鲁，再接再厉。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了天津抗日爱国运动和党的建设工作。1945年5月，调山东开展民族工作。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山东省“回民协会”、鲁中、鲁南、渤海地区的“回民协会”，发动并领导了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出现了不少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把小股回族武装组编并扩建了鲁中回民支队、鲁南回民支队、渤海警备第七团等回民武装，转战鲁南、鲁西、鲁北，一直到参加解放战争，多数编入野战军或警备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南下解放武汉、贵阳等不少战斗。1945年9月，刘格平



中组部副部长武连元向刘格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家属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被任命为华东中央分局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2月，调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渤海军区副政委。刘格平到职后，坚决打击敌人的武装破坏活动，镇压反革命，安定了渤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开辟新区工作，都得到中央的肯定，还在支援淮海战役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迅猛发展，1949年2月，中央决定刘格平任渤海干部支队第一书记兼政治委员，率干部南下，后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参与了新区开辟建设和培养干部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都被选为人大常委、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等。在建国后近10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主持民族工作，遵照中央指示，率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考察访问，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赞许。

1957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刘格平担任筹委会主任、工委书记，进行了大量的筹建工作。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或立，刘格平被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代理第一书记。自治区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自治区的开发和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但是，由于极“左”错误路线的推行，1960年开始了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刘格平和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1973年经中央决定作为“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1960年秋，刘格平调离宁夏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秋中共山西省委被冲击无法工作，1967年1月，刘格平应召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和他谈了主持山西工作的决定，不久即任命刘格平任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又任革委会主任、



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他曾先后被选为中共中央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混乱中，刘格平坚决本着“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

则，拒绝批判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林彪、陈伯达、王洪文等极端不满，又惟恐天下不乱，制造了种种事端和严重的矛盾，使刘格平无法主持工作，便借口把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上万名干部调到石家庄办“学习班”，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亲自主持，对刘格平进行数月的批判后，下放到唐山陶瓷厂劳动，一去就是6年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刘格平在山西“文革”中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结论，被安排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格平一直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在加强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尽到了他应尽的责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在刘格平参与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政策贯彻最正常，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这是对刘格平在民族工作方面最公正的评价。他是党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之一。他受革命斗争的长期锻炼，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对党无限忠诚，严守党的纪律，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严于责己，宽厚待人，含冤而无恨。他的高尚品格令人钦佩，他的音容笑貌让人怀念。

刘格平同志与世长辞了，他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的品德。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70年如一日，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和敌人坚决斗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一直关心回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并一直重视团结进步人士，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组织领导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奋

格平同志為我黨统战工作和  
民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文瑞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马文瑞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斗的实干精神和魄力；学习他临终还关心着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的高度责任感；学习他一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他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努力工作，为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而奋斗！

（作者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悼念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格平

刘树生

刘格平同志是我所崇敬的优秀的民族工作者之一。我和格平同志相识较晚，是在1946年他召集的一次回民工作会议上认识的。但早在我青少年时代，他就是津南地区贫苦回汉群众中广为传颂的“红毛子”，是我心目中崇拜的一位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和格平同志又有过几次工作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党的忠心耿耿，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民族工作的倾心关注，对同志的慈祥亲切，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今年3月，惊闻格平同志逝世的噩耗，深感悲痛，痛惜我党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民族工作者。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生平事迹，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顾格平同志的一生，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他的事迹是如此突出，而在这平凡的一生中，却处处闪现着无比博大的胸怀和崇高伟大的精神。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千千万万像格平同志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战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

### 一、封建的叛逆

刘格平同志出生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中。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对自己封建地主家庭的反叛开始的。封建剥削是几千年来压在中国农村劳苦大众头上的一把沉重枷锁。20年代初，孟村县大堤东村的劳苦群众开始了砸碎这一枷锁的斗争，而领头人竟是当地一户大地主家中的“三少爷”刘格平。当时，在斗争十分残酷的条件下，他深入贫苦农户中，发动组织农民群



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刘树生向刘格平家属表示慰问

众，领导他们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他用布蒙着脸，带领群众同他其家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其答应减租减息；他组织长工开仓分粮济贫，并亲自站岗放哨……这些故事在津南农村是妇孺皆知，我小的时候，曾把他视为杀富济贫的好汉，参加革命以后，知道了格平同志的真实身份，知道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从而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求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认识了要救民于水火，救国于贫弱，必须首先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于是，首先向自己的地主家庭进行了斗争。这中间，有选择也有放弃。就个人而言，选择的是一条艰苦危难的道路，放弃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一择一弃的坚决和彻底，显示出了格平同志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品格。

### 二、革命的火种

刘格平同志在南京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十七八岁就勇敢地投



入了革命的洪流。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到家乡后，一直在津南地区从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在一片干薪的津南大地上，第一颗革命的火种出现了，在广大农村迅速跳跃着，播下了一串串星星之火。从此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津南广大农村中传播，津南人民开始走上了觉醒的道路。在他的领导下，津南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团支部，随后又创建了第一个党支部，组建了中共津南特委。在党的领导下，津南人民投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洪流。

### 三、民族的英雄

刘格平同志是我国早期觉醒的回族优秀青年之一。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回回民族才能结束遭受历代反动统治者惨重的民族压迫的历史，获得民族的彻底解放。他经常在回汉群众中宣传，欺压回回的不是整个汉族，而只是极少数汉族的统治阶级。汉族劳苦大众也和回回一样，遭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回汉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他始终坚定地团结回汉群众和干部一起进行斗争，就是在狱中也从未间断，用自己的斗争实践，指明了回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为此，刘格平深受津南地区回汉群众的爱戴，不仅把他视为回族人民的英雄，而且把他视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他的引导和培养下，刘子芳、王俊峰、李安民和马振华、贾震等一批回汉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津南地区革命斗争的骨干。

### 四、不屈的战士

刘格平同志最令人崇敬的是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1928年6月，他在津南准备组建革命武装，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他立即投入了新的斗争，在山西、陕西开展兵运工作。并在西安领导过驱逐戴季陶的斗争。1934年4月，他再次在庆云县领导了津南地区的马颊河民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暴动，攻破了县城，后在组建武装的过程中遭反动派袭击被捕，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牢窗生活。在暴动中他曾受伤致残；在狱中，更遭受了各种残酷的折磨，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斗志，积极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漫漫十年，铁窗烈火，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不妥协，不投降，坚贞不屈，怒斥敌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浩气壮歌。出狱后，身残体弱，没有休息一天，立即又投入了新的斗争，在天津发动学生运动，并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团员……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工委书记、山东省回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等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 五、顾全大局的模范

新中国建立后，格平同志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而欢欣鼓舞，并为发展和巩固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呕心沥血地工作。可是，在60年代初，他却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格平同志这样一个全身心为各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共产主义战士来说，遭受这样的委屈，比在敌人的监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更难受。然而，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讲过一句怨言。有的同志为他抱不平时，他还劝导这些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始终坚信党会把是非曲直搞清楚。在此期间，他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尽其所能地做一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同志们树立了一个顾全大局的榜样。

### 六、各族人民永远怀念的优秀的民族工作者

民主革命时期，格平同志就在回汉干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新中国成立时，刘格平同志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他与李维汉、乌兰



夫等同志一起参加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次年，他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跋山涉水，对我国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访问，为解决民族问题，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贡献。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他担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他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于同年8月担任自治区第一届人民政府主席。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为国家的振兴而由衷地高兴，不顾年迈体弱，仍尽力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日子里，他仍保持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建设，想着各族人民的发展，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们了！”

正如组织在刘格平同志的生平介绍中所说的：“刘格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各族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刘格平同志不屈不挠、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将流芳千古，与世长存。

（作者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刘格平同志是新中国民族工作奠基者之一

底润昆

刘格平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回族乃至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全党革命老前辈之一。

刘格平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做过农民工作、兵运工作、城市工作。他工作中接触的群众不单是回民，但因为自然的社会关系，他多数还是在回民地区和回民群众中工作，并且亲自组织过回民读书会、救国会和回民协会等，为我党的民族工作创造了经验。所以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少数民族中特意请了乌兰夫、刘格平及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参加。乌兰夫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刘格平就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主任由李维汉兼任（李当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副主任中，乌兰夫当时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日常主要在内蒙古，中央民委的主要工作他们都参加，但日常不能在中央民委工作。平时在中央民委的主要是刘格平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中央任命刘格平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主管民族工作，同时任命刘格平为中央民委党组书记。他在民族工作中的责任就更繁重了。

我是1952年到中央民委工作的，开始在第三司，不久机构调整，我到政法司，1953年又调到主任办公室（也叫党组办公室）。1954年第一届人大后成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格平当选为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当时仍是中央统战部主管民族工作的副部长），原中央民委主任办公室和政法司部分同志，随格平到全国人大民委工作。后来我又做过格平的专职秘书。1958年我下放劳动，



格平去了宁夏，我劳动结束后留在全国人大民委，此后格平虽然仍兼任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但从此就不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后来，格平也显赫过，也倒霉过，因为不在一起，都没有直接牵涉到我。因为我知道他一些历史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在他最倒霉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人都有缺点错误。但他坚贞的革命精神和忠实地为党工作是铁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也颠倒不了的。所以，我一直把他看做值得尊敬的老领导、老前辈，不时地去看望交谈，他也把我作为老部下和正直的朋友看待。特别是他的晚年，我们的来往就更随便一些，他们老两口有时也到我家串串门。我们之间都无所求，我们的来往清淡、自然而亲切。

刘格平在60年代以前，在中央民族工作机构负有较多的责任，从制定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建立中央民族工作机构，到开展各项工作，应当说他都参与其事，都有他的心血和贡献，我仅就直接参与和了解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记录一二。

### 刘格平参加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的制定

几千年来，中国是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各民族是不平等的。1949年格平作为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参加了代行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研究制定，特别是参与民族政策部分的研究制定。《共同纲领》一改过去旧社会的民族压迫制度，把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下来，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作为国策确定了下来，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央民委成立后，格平和其他同志一起，认真总结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和在其他地方初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且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52年2月提请政务院第122次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

1953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格平和中央民委其他同志一起，起草第一部《宪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法》民族部分，主要意见都被《宪法》起草委员会采纳。《宪法》根据建国后几年的经验，进一步充实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充实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规范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和自治权的行使。这是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保障。

1954年之前我国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从最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到乡一级的自治地方都叫自治区。另外，城市有的也建立了自治区。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城市统一性强。自治机关不便行使自治权，县以下的民族自治地方因为范围较小，人口较少，自治机关职权有限，也不便于行使自治权，有名无实。所以从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开始，自治地方规范为三级，即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相当于设区的市的自治州（它的范围相当于地区，因地区不是一级政权，所以没有提相当于地区），还有自治县。县以下设立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民族乡不能完整地行使自治权，不算一级自治地方，但在工作上和干部组成上要照顾当地的民族特点。另外，原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主要是解决自治地方的建立和保证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方面的问题，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还不具体。因此，格平自从主持全国人大民委工作后，即着手起草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始称作民族区域自治要点）。到1957年反右前夕，共修改出8次稿，并经全国人大民委会议审议后发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所有自治地方征求意见。在这几年，格平为此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每修改一次，他都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逐字逐句的推敲。但是反右开始后，由于“左”的思潮日渐严重，有些人对党的一贯的民族政策发生动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到干扰，这个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只好暂停下来。这一停就是20多年。“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连全国民族工作机构都取消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重申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全国人大民委和其他民族工作机构。当时乌兰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是国家副主席，党中央让他抓民族立法工作，成立了以乌兰夫为组长的中央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经过几年努力，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后来一段，格平虽然没有再参加自治法起草工作，但他开始起草自治法的功绩是不能磨灭的，而且他始



终关注此事，自治法通过后，他非常高兴。

### 格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彭真的安排，开始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刘格平工作中很注意调查研究，1954年全国人大民委成立后，他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商量后，提出人大工作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工作怎么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咱们的老传统，先抓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95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彭真突然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苏和格平，让全国人大民委在家的全体同志参加，在中南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开会。彭真根据《宪法》、《组织法》讲了人大的性质、任务和工作，特别是讲了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接着他说，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是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干革命工作，什么事都要靠调查研究。大家总在说“政策”、“政策”，政策是怎么来的？政策是从情况来的，先有情况，后有政策。

你只要把情况反映上来了，中央就能拿出政策来。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真实情况，政策就有了。前不久黄炎培写信给中央，反映江浙沿海一些地方把渔船主当做把头斗争。他说，这些渔船主都有航海、捕鱼的经验，每次出海都是亲自领航掌舵。把他们当做把头来斗争，渔船就不能出海了，渔船出不了海，鱼从哪里来？中央派人到江浙去调查，证明黄炎培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于是中央同省里研究修改了对渔船主的政策。少数民族的情况，比渔船主复杂得多了，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布置工作，不调查，不研究，怎么行？当天会上决定，人大民委首先调查研究，彭真当天特意同人大民委全体同志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以表饯行叮嘱之意。根据彭真的意见，全国人大民委当年派出分赴云南傣族、景颇族、四川彝族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几个调查组。当时一些民族地区面临着如何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因此那次着重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作了调查。

1956年春，彭真找张苏、刘格平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他说，最近在中央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毛泽东主席还说，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形态、封建制形态，及这几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现在世界上还不知道其他哪个国家，都保留这几种社会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我看，这件事就请彭真主持吧，由全国人大民委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专家、干部进行调查。彭真说，毛主席讲得很好，我当时就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彭真说，这件事是全国性的，就叫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吧。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都要搞。当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同时展开。跟汉族差别大的应该先调查，边疆的先调查，即将进行民主改革的先调查。彭真说，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定要深入。上个世纪，美国有个摩尔根，为了调查印第安人，多少年就住在印第安人部落里，甚至做了印第安人的干儿子，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后来，他写了《古代社会》这部著名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部著作，马克思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根据此书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书的副标题就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研究成果而作”）。同志们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搞好，要向摩尔根学习，做当代的摩尔根，即使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儿子，也在所不辞。

中国共产党早就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撰写出《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蒙古社会经济问题》等著作。格平在渤海区翻印《回回民族问题》时还写了序言。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2年，先后派出4个赴民族地区的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分赴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调查，或者检查当地的民族工作。当时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些专家、学者也对一些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情况做了一些



调查，写过一些材料和专著，但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

在彭真传达毛主席指示，并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做出布置后，格平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开展这一重要的全国性的调查工作，1956年6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请少数民族较多的省、自治区民委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和几个地区民族学院的领导同志、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组织、计划和草拟的调查提纲，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彭真，得到同意，并要到了专项经费，开始了全国性的调查工作。当时明确了调查工作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为主，成立了有格平为组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参加的调查领导小组，在全国人大民委成立了调查办公室。当年就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200多人参加，第一批调查了20个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第一手资料约1500万字。

1958年，格平到宁夏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组织，调查工作继续展开，又新增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8个调查组，共16个调查组，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到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没有派调查组的省，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按照调查提纲提供所需材料。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组前后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特别是还专门按民族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科学纪录片十几部，保留了少数民族活的生动的材料；并且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宝贵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的基础上，当时已确认的每一少数民族都写出了《简史》、《简志》，或者《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些史志初稿共写作出版57本，为我国少数民族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第一批材料，比较详细地、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历史和现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状，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历时10年，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保存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各条战线一样，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重新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从1979年开始，在原来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当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志，不少人又参加了编写工作。《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五套丛书，相继编成出版。迄今共403部书，约1亿字，已全部出版。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全面系统介绍各民族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丛书，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毛主席提出，彭真和刘格平亲自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后来据此写出的著作，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我国民族学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史料，这次调查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示出来。



1989年，刘格平夫妇与底润昆（左2）、胡振华（左1）两家合影



### 格平强调从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革、改造

解放初，全国少数民族工作坚持慎重隐进的工作方针，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说民族工作要坚持党的原则，但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切照搬照套汉族地区的做法。这也是从经验教训得来的。比如全国解放前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开始的时候下边有的同志，在牧区也采取汉族农业区土改的办法斗牧主，结果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生产受到破坏。后来乌兰夫他们提出，牧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或者对牧主经济经过办牧场的办法进行改造，即对牧主和城市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实行赎买政策。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和自由放牧，取消了牧主的封建特权，又使经济不受破坏。牧业经济发展，牧民生活提高。全国解放后，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北，个别地方出现了“左”的倾向，不正确地对待宗教，在牧区和农业区一样进行改革，结果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和生产的破坏。当时中央派习仲勋和刘格平专程去帮助地方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4年云南提出在存在着农奴制的傣族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并报中央，刘格平对此非常重视，1955年春他直接率全国人大民委工作组到云南，我参加了这个工作组。我们先在德宏州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云南傣族地区还存在着土司制，即农奴制。土司是农奴主，百姓就是农奴。土司就是土皇帝，集政治、经济、文化一切权利于一身。土地全部归土司所有，农奴领种份地，向土司交官租。农奴对农奴主还要负担劳役和人身依附。这里的土司在农村还设有“岗头”、“伙头”（相当于乡长、村长等），为土司统治服务。另外，还有土司兵，镇压农奴的反抗。但这里除土司外，还没有地主。这里的土司，是统治者，又是代表人物。解放后，我们把他们作为团结对象，在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建政中，他们已被安排，有的当了州长、副州长，有的当了县长、副县长，以及其他职务。与此同时，我们在农村广泛派驻了工作组，开展了群众工作。在全国的革命形势下，当地群众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始出现了自发的反官租斗争，并且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后来在农村积极分子中开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始组织民兵，民兵开始向土司兵借枪，逐步地实行“枪换肩”。这时候，土司们已经感觉到难以为继了。刘格平经同云南省委和中央统战部研究，认为可以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试点。在党的领导下，自治机关进行协商，对民族上层做好团结教育工作，用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所谓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就是对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通过安排他们的工作，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通过发工资和补贴，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他们放弃对农奴的剥削和特权。农奴背靠背地诉封建压迫之苦，但是对农奴主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刘格平领导的工作组与云南省委工作组共同在德宏傣族地区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试点。当时也很清楚，民主改革本来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平是相对而言，为防万一，当时也请解放军进行配合。在边疆一线和进行土改的地区驻有坚强的部队，敌人就是想反对也不敢轻易行动。当时也清楚，和平协商土改必定有它的不彻底性，但它首先解决土地问题和特权问题，遗留问题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解决。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顺利完成试点。云南省委和中央统战部共同向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中央的肯定。1956年云南胜利完成了所有傣族地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1956年在云南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并在全云南傣族地区进行改革的同时，四川省存在农奴制的藏族地区和存在奴隶制的凉山彝族地区，也准备采用和平协商办法进行民主改革，但开始不久，农奴主和奴隶主就掀起了叛乱。此后中央两次派刘格平去四川，帮助地方研究解决平叛和改革政策问题。后一次是1956年10月中央派出以王维舟为团长，刘格平等人为副团长的赴四川藏、彝族地区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团结束后格平留在甘孜县，与四川省委派的工作组共同进行平叛改革试点，1957年初才回京。四川藏、彝族地区的平叛改革，1958年底才完成。

四川藏、彝族地区的叛乱并不是说明中央肯定的和平协商土改的失败。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它有两种可能，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有少数反动农奴主、奴隶主困兽犹斗，宁肯孤注一掷，不愿轻易放弃特权。何况，当时西藏少数农奴主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和操纵的四川农奴主，与人民为敌。另外，我们自己也有教训，与云南相比，四川藏、彝区，特别是藏区，有它自己的特点



和复杂之处，我们对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没有很好的研究分析，而且准备不足，一是对上层教育协商不足，二是干部政策思想准备不足，三是群众工作准备不足，四是武装部队准备不足。开始麻痹，一闹起来又措手不及。刘格平在四川期间，坚决按照中央慰问团行前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叛乱分子以政治争取为主，武装打击为辅，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坚决打击。就是在叛乱地区，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仍然采取和平协商和赎买政策，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

刘格平对自然保持着某些原始公社制地区社会进步问题也很关注。云南省委提出这些地方阶级分化不很明显，不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格平1955年和1956年两次派全国人大民委调查组，到云南佤、景颇、傈僳等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肯定了这些地区的直接过渡。这些民族基本上都在山区，过去政治上主要受坝区傣族土司和其他民族统治者管辖。内部虽有山官、头人，有些特权和轻微剥削，但社会生产水平低，还没有形成地主经济。这些地方通过民主建政和坝区傣族地区民主改革，解决了政治上的问题，内部经济上民主改革的内容不多，所以这里就不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阶段进行，而是强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走互助合作道路，逐步解决山官、头人某些特权和轻微剥削问题。刘格平把调查的内容和意见报告中央和有关部门，受到肯定。后来这些地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扶持下，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同全国人民一道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 格平非常注意疏通各民族的关系，团结各民族人士，加强民族团结

解放初中央民委刚成立，格平和其他同志就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西北、西南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带去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疏通民族关系。许多民族地区由原来的封闭状况或者由土司统治的割据状态，进而成为各级党政领导下的一部分，通过派驻工作组、医疗组等，办好事，交朋友，原来有些民族间互不相信，相互对峙，很快就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帮助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的新型民族关系。

1950年春，刘格平接到了中央的通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访问团：首先派出的是到西南的访问团，由刘格平担任团长，费孝通、夏康农担任副团长。中央希望抓紧进行准备工作，尽快成行。接到这个任务后，刘格平等人立即着手与当时的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余单位进行了联系，抽调了100多人，于5月中旬开始系统学习了民族政策方面的有关文件和知识，了解了西南诸省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随时整装待发。

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格平在参加会议期间与毛泽东主席相遇，一见面，毛主席即热情地问道：“首席代表先生，这次有劳你了，准备得如何呀？”因为刘格平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曾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的身份做过大会发言，所以毛主席这样称呼他。刘格平知道，毛泽东主席说的是民族访问团这件事。他向毛泽东主席表示，一切准备得很充分了，大家精神饱满，信心很足，一定能圆满地做好这项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

起初，刘格平以为毛主席不过是随便问一下而已，谁知几天以后，在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临近闭幕时，毛主席亲切会见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及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副主任，他在听取了李维汉主任关于民族工作方面的汇报及刘格平关于访问团的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与我们有隔阂，对我们有误解，加上西南残余国民党匪帮的捣乱和破坏，你们不可掉以轻心。你们又是很光荣的，因为你们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希望你们能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作一个良好的开端。毛主席指示：访问团一是要依靠当地军政领导；二是一切工作要坚决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三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犯下的罪恶，要赔礼道歉，要说对不起。毛泽东主席担心大家不理解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我们既然有勇气从反动派手中接过整个国家这个烂摊子，当然也要有勇



气接受欠债了。要向少数民族兄弟说一声：“对不起”，要把过去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的历史宣告结束。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展示了人民领袖的博大胸襟和气魄，使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情都豁然开朗。毛泽东主席还愉快地接受了大家要求他题词赠言的请求并拱手向大家说道：“民族方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们！”

过了几天，周恩来总理又亲自来到了访问团，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访问团领导研究了工作原则和一些具体问题，最后确定了访问团出发的时间。周总理还特别带来了毛主席和朱德、少奇、总理、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14个大字，苍劲有力，渗透着毛主席对祖国的挚热和对各族人民的寄托。

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访问团出发之前，文教委、民委、文化部都先后为访问团举行了晚会，李维汉、王维舟、邓颖超、郭沫若、沈雁冰等领导出席了晚会。

7月2日，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120余人，带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满怀激情地从北京出发，分赴西康、四川、贵州、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同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社论《送西南访问团》。访问团在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支持下，对川、康、滇、黔各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访问工作，沟通了民族间的情感，融洽了民族关系，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兄弟民族过去所遭受的痛苦致以了深切的慰问，还征求了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各种政策的实施意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于1951年3月回到北京。访问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与毛主席的直接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后来刘格平同其他同志一起又派出中南调查组，调查某些地区出现的违反民族政策的事件。毛主席在1953年3月16日对张执一、马杰等带领的中南民族调查组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当即作了批示，并作为党内指示发至全党。毛主席这个指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批判大汉族主义》。在这个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判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志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sup>①</sup>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3年在全国进行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对全国宣传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格平从20年代初参加革命就主要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有血肉联系，所以他非常关心各民族群众的疾苦。同时他也很善于做民族上层团结教育工作。他认真执行对民族上层团结教育的方针。他对民族上层首先是尊重，平等相待，决不盛气凌人，也不搞虚伪的，以诚相待。对需要帮助的也是循循善诱，启发教育，决不强加于人。所以许多民族上层把他看做值得信赖的领导和愿意接近的朋友。他对各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学者更加爱护，如喜饶嘉措和阿旺嘉措等在藏学中造诣较深的学者，实际上成为他很好的朋友。1954年达赖、班禅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后，中央让刘格平陪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历时半年多。1955年春，我们随格平同志从北京出发，途经武汉，逆江而上，过重庆，送达赖从成都返藏。这当中，格平同志向他们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的情况，讲解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当时他们都很年轻，还不到20岁，格平同志希望他们加强政治学习，走革命之路。并结合参观，用事实向他们进行实际教育。这一时期达赖、班禅不但在大会上举手赞成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有关政策，通过参观，还表示愿向先进地区学习，希望中央帮助西藏更快地发展。在成都告别时，达赖对参观访问和刘格平的帮助，都表示收获很多，十分感谢。达赖当时还把格平夫妇作为亲密朋友，对丁磊同志说：“刘部长（刘格平是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名义陪他的）岁数比你大一些，希望你对他多加照顾。”

后来达赖在反动上层的包围和策动下走向叛国之路，那是后话。那主要是他害怕和抵制迟早会到来的改革，铤而走险。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达赖在自传中就说，他们逃跑时带的电台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供给他们枪支弹药和经费。这是帝国主义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以

<sup>①</sup>《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5页。



后几十年达赖在外边越走越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是班禅大师一直坚持爱国爱教的立场。就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班禅大师还经常走访刘格平，带有请教之意与他畅谈民族工作如何开展等等，他们之间十分亲密融洽。

### 刘格平对成立回民文化协进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倾注了心血

回教自形成几百年来，历代有为人士都为民族的生存而努力，许多时候和许多地区成立民族团体，有时成立全国性的团体。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蒋介石开始，根本不承认回教，至多承认回教。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只承认回教是“生活特殊之公民”，而不承认它是一个民族。只有中国共产党，它从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出发，一开始就承认回教是个民族，在解放区许多地方成立回民协会和回民救国会等，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回民支队等回教武装。它们在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许多地方和伊斯兰教人士建议成立全国伊斯兰教群众团体。许多回教人士考虑到回教的分散状态，为了民族内部的联系，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回教群众团体。刘格平更了解伊斯兰教界和回教人民的愿望。

1952年刘格平任中央民委党组书记，他和党组其他同志研究后，以中央民委党组名义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得到中央批准。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53年正式成立这两个团体之前，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又向中央报告，明确提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各少数民族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旨在通过这个组织，在全国伊斯兰教徒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进行国际伊斯兰教联系工作。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为回民全国性文化性质的团体，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研究发展回民文化，向回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对正式成立这两个团体的报告批示：“拟予同意。”并经毛主席圈阅同意。

1953年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当时我在中央民委主任办公室工作，亲自参加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从筹备、成立，编辑出版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它的第一期会刊《通讯》工作。“通讯”二字就是格平题写的。当时国内许多回族知名人士都包括在协进会理事名单内。这个协进会的成立，实现了回族人民的愿望，受到热烈欢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可以作为联系全国回族的中心，或者说是基地，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作用就不大了，所以就取消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工作人员全部去宁夏，分配了别的工作。事后证明，取消这个协进会不一定合适，这不仅是因为后来由于极“左”思潮把格平同志错误地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把他赶下了台；而且自治区本来就是一级地方政权，它可以在回族联系中起较多作用，但它决不能代替全国性回族民间组织。刘格平对成立这个协进会有贡献，取消这个协进会也有责任。也有人说取消可能是一个失误。但不管功过，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央让刘格平主持筹备，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1957年春天我和王克陪他到昆明，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迎接来访的缅甸议长。陪同到重庆后，就告别缅甸议长，我们去了兰州，和汪锋同志（他当时也已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并任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一起，同甘肃省委共同研究回族自治区区划问题，并就此与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协商。

当时对自治区究竟设在哪里，有两种考虑，一是以临夏为中心，一是以银川为中心。临夏是全国有名的回族聚居区，当时那一带回族人口比以银川为中心那一带回族人口还稍多一点。但从发展看，它的条件不如银川那一片，银川市本身和银川地区回民不太多，但包括吴忠、西海固两个回族自治区回族较多。从发展来看，银川平原是有名的黄河前套，物产丰富。包头到兰州的铁路正在施工，不久就会通车。而且这一带煤炭等资源丰富，发展前途巨大，所以后来决定自治区就设在以银川为中心这一片。

然后就是具体区划了。按回民人口看，自治区包括银川地区和吴忠、西海固两个回族自治区以及南部的泾源回族自治县没有问题。问题是光这几个地方人口较少，当时共150多万人，回族只50多万。紧接南部的平凉地区和再南边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否划入，争议颇大。按回族地区连接看，划入并无不可，平凉回族较多对自治区还有好处。但是这两个地方划入宁夏后，甘肃东部的庆阳地区就同甘肃其他地区隔开了，成了飞地。何况庆阳是甘肃粮仓之一，许多



人又坚决反对把它划给别的省。所以有些人坚决反对把平凉、张家川也划入宁夏。对此问题，刘格平经过再三考虑，主张尊重甘肃的意见，说服回族同志，不要坚持非把平凉、张家川划入自治区不可。他说，我们是统一的国家，考虑问题不能单从回族出发，首先要从大局出发。不仅考虑回族的意见，也要考虑其他民族的意见。回族居住分散，这是客观事实。不划入平凉、张家川，自治区回族人口是较少，就是划入，回族人口多了一点，但也只占全国回族人口的几分之一。自治区不要只看人口多少，要看将来的发展，你搞好了，别的地方回族自然向你投奔，你搞不好，人多也没有用。这次协商，划界问题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协商后，刘格平和我们几位就乘汽车到准备划入自治区的一个地区和两个自治州的大部分县先走了一趟，进行了实地考察。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次宁夏之行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介绍宁夏的文章，叫《宁夏回族自治区漫游随笔》，准备在《旅行家》杂志发表，征求刘格平的意见，他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央批准了，全国人大刚刚作了决定，发表并无不可。宁夏回族自治区尚未成立，这篇稿子可能是第一篇打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牌子的。我和甘春雷是同村老乡，因此较熟，宁夏回族自治区刚成立，他回北京开会见到我，说他在图书馆翻阅杂志时见到我这篇文章，非常惊喜。我说我后来虽未去宁夏工作。这也算我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点贡献吧。

刘格平虽然到宁夏只有几年就不得不离开了那里，但他用满腔热血浇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对整个回回民族无限热爱，耿耿之心，以至终生。

### 刘格平和乌兰夫是亲密的同志和伙伴

刘格平阳乌兰夫解放前不相识，但他们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两位都是我党建党之初入党的老同志，第一届政协共同参加会议，参与决策基本国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建国之初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又都是中央民委副主任。

1954年以后，乌兰夫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委主任，刘格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50年代乌兰夫每来北京，总要到刘格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家看望，有时共度周末。60年代初刘格平受到不公正待遇，乌兰夫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被批判为“地方民族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好像要启用格平，但不久就又被打下去，被送往唐山劳动。乌兰夫被送往湖南“保护”，失去自由。后来乌兰夫开始工作早一些，但一直念念不忘老友格平同志。我在全国人大民委工作，同时任乌兰夫文字秘书，乌兰夫知道我跟随刘格平工作过，所以经常向我打听刘格平的情况，非常关心。

刘格平和乌兰夫共同为党的民族工作倾注心血。他们通过共同工作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都很诚恳。50年代，乌兰夫每来北京，常同刘格平说，他和李维汉、底润昆不能常在民委，日常工作请您大胆负责，重要问题我们共同商量。而且他们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乌兰夫每次来京，都要先打电话告诉刘格平，并且经常到刘格平家串门。他们每次见面，都像久别重逢，无比亲切，互相关怀。1982年冬，刘格平还未恢复工作，突然大肠出血，发高烧，住北大医院未查出毛病，又回不了北京医院，丁磊情急之下给乌兰夫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治病。乌兰夫当即转报中央领导同志，并立即到北大医院看望格平。两位老人久别重逢，无限亲切。两位老人见面后，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多年来的怀念之情。乌兰夫告诉丁磊说：“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丁磊说，这表达了老同志的深情厚谊。我很感动，当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这次会见不久，中央领导批示，让刘格平回到北京医院治疗，查清是肠息肉破裂出血，手术后一个月就恢复了健康。

1983年，中央决定提名刘格平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来是决定由乌兰夫找刘格平谈话，因当时正值乌兰夫高烧住院，临时改请童小鹏代表乌兰夫与刘格平谈了话。这表达了中央对刘格平的信任和关怀。

现在这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我们，我们这些后辈之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恩情。

（作者曾任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回族协会副会长，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缅怀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者刘格平

胡振华

1997年冬天，根据学校教学计划的要求，我带着我指导的专门为学习回族学而来我国留学的一位日本硕士研究生，先后赴河北省沧州市所辖的沧县、献县、青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及天津市北辰区所辖的天穆村等地，对当地回族人民的历史、现状、风俗习惯进行了短期的调查实习，还专门到马本斋母子陵墓和刘格平陵墓进行凭吊，深切缅怀他们光辉的业绩。

刘格平陵园坐落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所辖的大堤东村，这里也是刘格平出生的地方。那天下午。我们在县里几位同志和村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拜谒了陵园。在墓前，大家都按回族人民的传统习俗，举起双手做了“都阿”（阿拉伯语，“祈祷”），表示悼念。接着，我们走到墓后，向我的日本留学生一行一行地解说那块刻写着刘格平生平的碑文。这时，往日的回忆又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好像这位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人、曾任过我们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格平，仍然活在我们身边一样。

刘格平的名字，我是在新中国快成立时才听说的。那时我只有18岁，正在山东省济南市华东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该校后与山东大学合并）。记得那是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了回族人民中有一位代表，作为少数民族界的首席



杨拯民曾任全国政协秘书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以及在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时兼任副院长，后又于1953～1958年兼任院长的刘格平。

我更多地听到刘格平是在1951年秋，被山东大学推荐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维吾尔语专业，及毕业留校工作以后的事。我初来北京时，中央民族学院还没有现在的校舍，白天在国子监对面一个院子里学习，晚上回到雍和宫的一座大庙中去休息。在我们住的大庙后边，还住着一些跟随刘格平赴西南民族地区访问归来的干部同志，他们常对我们讲述刘格平任中央西南访问团团团长带领他们在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的见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同学是刘格平去西南访问时带回来的。他们也常对我们介绍刘格平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故事。这样，我对刘格平也逐渐地知道多了一些。但限于我是一名一般的大学生和后来成为一名一般的大学教师，了解的也只可能是与我有关的一些情况。

那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有三位：乌兰夫（蒙古族）、刘格平（回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1952年，刘格平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9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格平又被选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乌兰夫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格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因此，在1958年刘格平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以前，他一直在北京负责全国的民族工作。他是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协助李维汉、乌兰夫等中央负责同志抓全国民族工作的一位领导人。建国初期有关民族工作的不少政策文件多是刘格平参与起草、制订的，许多具体的民族事务，例如组织领导赴各民族地区的中央访问团，进行民族识别、语言调查、文字的创制和改革、部分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以及筹备民族区域自治等工作，都是有刘格平参加组织领导进行的。我国那一时期的民族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深受各族人民的称赞。这当中都含有刘格平所作出的贡



献。

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一名老学生，后又成为一名老教师，对刘格平参与起草、制订，并于1950年11月24日，经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这两个重要文件，有更亲切的体会。这两个文件是遵照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一指示精神，和根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及民族工作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制订的。这两个文件为建国以来培养大量的各级民族干部和办好中央及地方民族院校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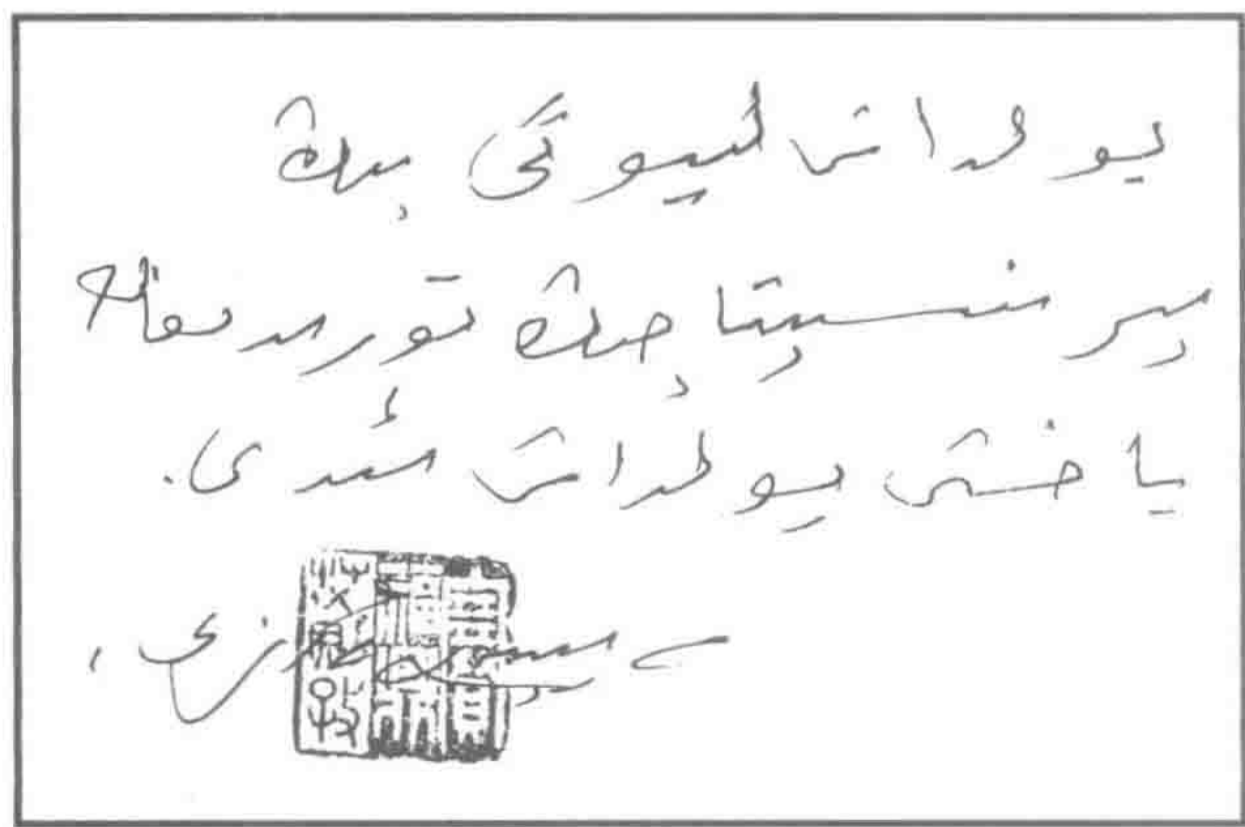
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干部一样，都是在这两个文件精神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还受到过刘格平的教诲。记得刘格平经常在中央民委工作的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深入中央民族学院开座谈会，做报告，讲形势，讲政策。迄今为止，他讲话时的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一带的乡音一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每当过年过节，他怕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学生想念家乡，常把他们接到中央民委去参加活动，平时也很关心他们的生活。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全体师生时，就是刘格平陪同的，并合影留念。

1951年10月12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邵力子任主任委员，陶孟和、刘格平任副主任委员。由于刘格平是中央民委副主任，所以，他实际上是具体领导这一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到1955年为止，先后派人壮、布依、水、苗、瑶、彝、傣、傈僳、景颇、哈尼、佤、蒙古、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的工作。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师生多批利用深入民族地区实习参加了这些工作。我就是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12月，被领导上派往天山牧场和帕米尔高原去学习和调查柯尔克孜语言的。这次调查后，我写出了调查报告，向领导汇报了柯族语言概况及柯尔克孜族人民对解决文字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从此，也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我一辈子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柯尔克孜人民文化教育事业。

1956年，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未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广泛而又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全国共组织了7个调查工作队，分赴各民族地区对我国各族语言、方言土语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科学调查，搜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在从北京出发前，我们都听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和刘格平等领导同志的讲话。这次民族语言调查为摸清我国民族语言状况，搞好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工作，开展民族语言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壮文方案等民族文字方案都是在这些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成果。当时，我们中央民族学院有好几百名师生参加了这些语言调查活动，通过这些实际工作，大家得到了锻炼与提高，现在我国民族语言学界的不少知名专家学者，也多是在这一时期里成长起来的。“文革”后，我国出版的几十部民族语言简志，也都是在这些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我自己就参加了当时民族语言调查第6工作队，担任柯尔克孜语调查分队的分队长，与其他7位柯尔克孜、汉、回族同志一起走遍了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村庄、牧场。我后来执笔编著出版并获奖的《柯尔克孜语言简志》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我迄今从事民族语文工作已46年了，我深深体会到，建国初期我国进行的全面又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是世界上少有的调查活动，在我国民族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参加组织领导这一项事业的刘格平和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的各族语言工作者都为此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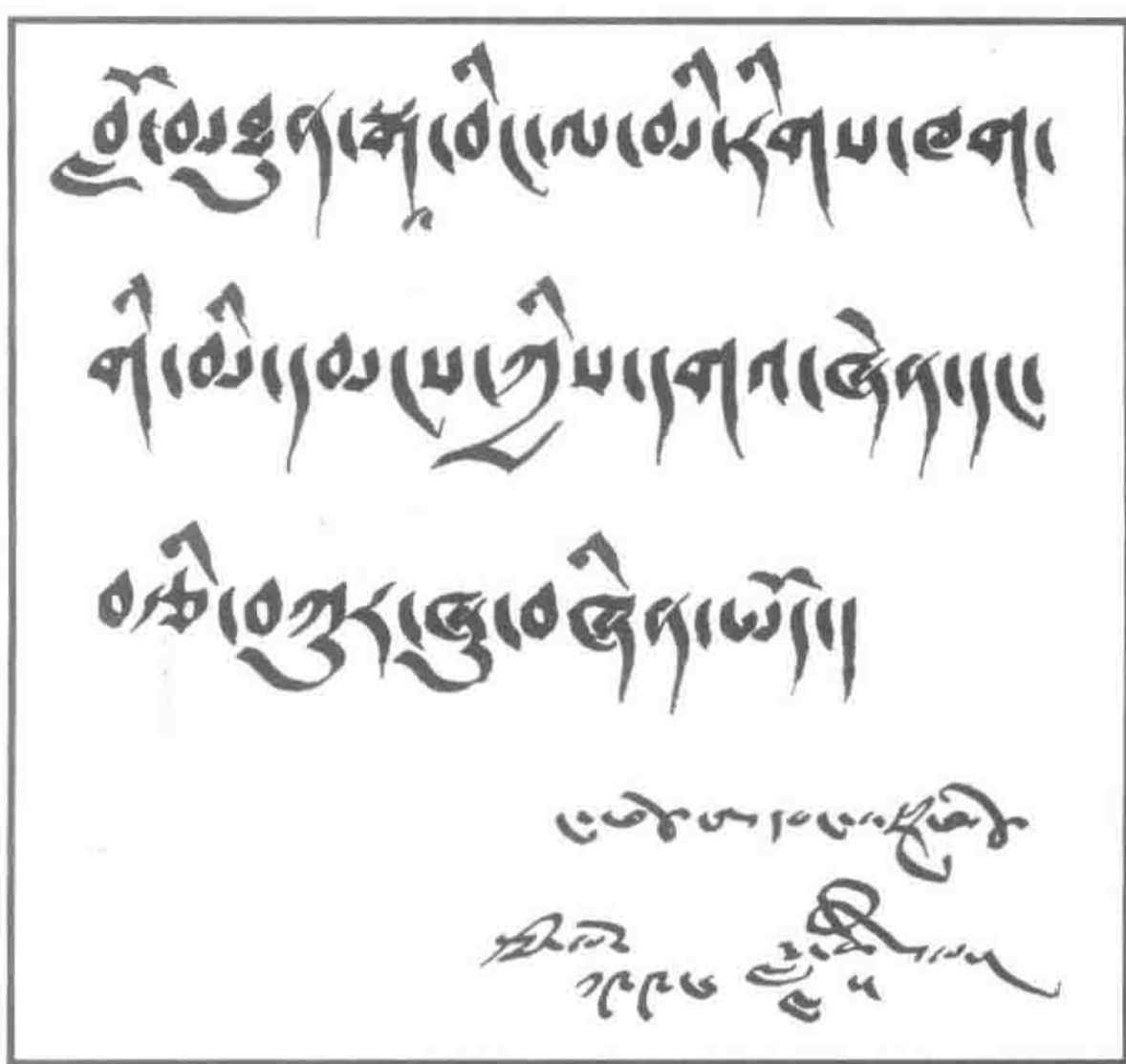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为刘格平题词；刘格平同志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好同志

在民族语言大规模调查的同时，作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格平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根据彭真的指示，又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地方上有关单位人员参加的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



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时间延续了好几年，也搜集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方面的资料。后来撰写出版的各民族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都是这些调查的成果。和民族语言调查一样，通过调查培养了不少民族学家、民族历史学家。我有幸也参加过一段柯尔克孜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为编写《柯尔克孜民族简史简志》搜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的题词：格平同志深受各民族的爱戴与尊敬

集了一些资料。我国那次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科学调查，它为促进我国民族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刘格平自1958年起主要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工作，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最早是刘格平组织领导的，他对这项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是大家忘不了的。

值得追忆的还有1953年5月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同年5月14日成立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中国伊协是由刘格平、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马玉槐、达甫生、白寿彝、马坚等知名人士发起筹建的。这个协会在对内团结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外加强与国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促进友好交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时，刘格平被选为会长。这个组织在当时团结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促进回族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发展也起了它应起的历史作用。该会编辑发行一份名叫《通讯》的刊物。记得我在国内第一次介绍生活在中国的东干人（回族）的文章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前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干族学者穆哈麦德·苏三洛来我国访问时，刘格平就是以中央民委副主任兼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会长的身份热情接待他的，苏三洛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回忆起刘格平、马坚、白寿彝与他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亲切友好的谈话。

“文革”后，刘格平从外地又回到了北京，虽年事已高，但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常去看望他，并改称呼他“刘老”了。他非常关心民族地区的发展。有时还回宁夏回族自治区看看，也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庆活动。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向他介绍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发展变化和我们一起批老学生的成长情况，他非常高兴。他对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非常尊重，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马坚教授、白寿彝教授等。1978年7月18日马坚教授逝世时，他还亲自到清真寺去参加了葬礼。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一个晚会活动，我见到了他，当刘老知道了我回学校没有汽车时，他硬是一定要用车先把我送回学校，他自己再回家。于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这样一位年迈的领导同志，如此平易近人，对待后辈仍是这样亲切关怀，使我铭记难忘，也使我对一生献身革命的刘老更加敬重。

刘老逝世已经好几年了。值得告慰刘老的是，您所关心的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大踏步地前进。您所关心的中央民族学院已发展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并进入了21世纪我国将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的行列。中央民族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文科为主体，以民族学科为特色，文、理、艺、管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您为祖国各族人民所做的一切贡献，也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各族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回族，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突出贡献专家，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忆刘格平同志

江 山

刘格平同志，是我所熟知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祖籍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他在津南创建党团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名震津南大地。建国初期在中央民委、在西南访问团，我跟随他工作多年，时至今日，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 在北京二三事

我是1950年3月，由山东渤海区党委调中央民委的。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央民委主任，他每两个星期到民委主持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当我第一次见到维汉同志时，格平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江山。”李维汉问：“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我回答道：“是汉族。”维汉同志听后风趣地说：“啊，原来还是汉族的江山！”当时，民委的人员不多，全机关只有一个支部。我任刘格平的秘书兼党组秘书，党组书记是乌兰夫。

刘格平待人宽厚真诚，从不斥责干部和工勤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无所不谈。对当年受尽迫害的狱友和革命的难友，感情尤为深厚。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对彭真

真正为理论在世界上占有  
一程，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出了  
在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列的  
东西可以称得上我们这通  
的理论。

刘格平

一九五九年九月廿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同志比亲兄弟还亲，怎么也叫不出彭市长（北京市）来。”这种诚挚的革命情谊，在谈论间溢于言表，真是叫人感动。古诗云：“将你心换我心，方知相忆深”，格平不正是这样吗？

刘格平是杰出的回族代表。他在北平出狱后不久，分配到华东局任民运部副部长。1947年渤海区整党工作结束后，格平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为张晔。1949年格平带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在上海建立“华东革命大学”，并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在1949年9月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前夕，上海市长陈毅见格平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又是老党员，便向中央推荐格平为回族代表。中央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并把格平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见到格平，问：“你是刘格平吗？”格平说：“是。”又问：“是回族吗？”格平又说：“是。”毛主席说：“你是回族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应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允许我们的回民党员不吃大肉。要注意保持回民的生活习惯，不然就没有代表性了！”这件事情，是事后格平亲口对我讲的，体现了毛主席对民族干部的爱护和关心。

刘格平非常爱护和关心民族武装的成长。新中国建立后，济南军区把山东省的几支回民武装合编为一个回民团，但不久又拟把回民团编散。格平得知情况后，马上给李维汉写信说明此事，维汉打电话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即给济南军区打电话，让他们停止编散回民团的工作。后来，回民团编入吕正操的铁道兵团，开赴东北修铁路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时，还接受了一部分铁道兵的转业干部。

### 组织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

中央民委建立后，全国民族工作从何处着手，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初，想先搞一个“民族工作指示”。为此，特地从青海省统战部调来周仁山负责“指示”的起草工作。在“指示”初稿尚未完成时，周恩来总理得悉情况后说：“现在还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发指示也难以符合实际情况。我看你们还是先下去看看为好。”根据周总理的重要指示，李维汉说，我们就从“上来下



去”开始吧。所谓上来，就是请下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内地来参观，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联络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况。所谓下去，就是组织中央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访问，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李维汉说：“就先从西南地区开始。组织西南访问团，刘格平任团长，费孝通、夏康农为副团长，并吸收各有关部局的同志参加，带领文工团、医疗队，到下面与各地方同志联欢，给群众治病。到重庆后，还可以再吸收一部分地方同志参加，扩大访问团的组织。”之后就开始筹备，原定在1950年5月1日出发，后因筹备工作来不及，直到7月2日才出发。

出发前进行身体检查，发现我有浸润型肺结核。医生说，至少也有半年的历史。我回来后躺在床上神情非常沮丧，刚刚还是一颗激动的心，现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时，人事司主任叶尚志来看我，问我的情况怎么样？还能不能去？我说：“工作需要吗？”，叶尚志说：“当然需要，刘格平还是希望你能去。”我说：“需要我就去。”为保护我的身体，格平指示我吃小灶，增加营养。当时干部吃饭包干，分大、中、小灶，我本来吃中灶，看到其他司局同志吃中灶，我单独吃小灶，真有些不好意思。

当时，北京没有直达重庆的火车。我们先坐火车到武汉，然后乘轮船逆流而上，7天后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受到地方干部和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团部驻在西南民委，民委主任是王维舟。其余人员分散驻各学校。此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政委让我们先参加会议，等开完会后再走。会议中间，邓政委报告了西南地区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司令员讲述了他同彝族领袖结盟的经过，使我们深受教益。

刘格平在访问团期间，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在与邓小平会面时，对小平非常敬重，非常谦虚。说明格平没有中央访问团团长的架子，尊重地方的领导同志。这种美德，没有长期的修养锻炼是做不到的。值得今天所有年轻的同志学习。

刘格平爱护干部，关心同志。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结束后，访问团分为3个分团：1分团去西康，格平兼任分团长，冯乐进为秘书长；2分团去贵州，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费孝通兼任分团长，杨辛为分团副团长；3分团去云南，夏康农兼任分团长，王连芳为分团副团长。其余人员分成三个部分，随各分团分别出发。我们1分团离开重庆时，在两路口雇了两辆商车，警卫人员坐在车顶上，团员坐在车内出发了。在简阳地区下山公路的右转弯处，由于方向盘失灵，车翻到一个两米深的沟里。车里的人没有受重伤，可是车顶上的警卫人员中，有一位摔出一丈多远，摔断了两条肋骨。车里的人爬出来，在路边拦住一辆过路的军车，让访问团的同志和伤员先走。我让格平也随军车先走，我等下一辆访问团的车，但他不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上了军车。时间不长，访问团第二辆车到了，我同他们一起奔向简阳。这时天色已晚，我看到格平一个人，还站在城外边引颈眺望，直到访问团第二辆汽车到了，他才和车上的同志一起进城，并说伤员已送进医院。看到格平这样关心、爱护同志，我们深受感动。在简阳住了一天，次日从新津渡过岷江，过邛崃等地到了雅安。雅安是西康省府所在地，省委书记是廖志高。省委想借访问团之东风，在康定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区，在西昌地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因此。把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找来，研究在康定地区建立自治区的问题。

刘格平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废寝忘食。在康定我们住在半山上的一座别墅里。一下车就忙着做访问工作和建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早饭后开始接见来防代表，同时分别派人到各处去慰问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赠送礼品，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吃饭。这是最繁忙的一天。就这样一直忙到9月底，于1950年9月30日建立了一个专区级的康定藏族自治区，颁布了“组织条例”，选择桑吉悦希（天宝）为自治区主席。第二天，一面庆祝自治区成立，一面庆祝新中国建立一周年，敲锣打鼓，游行祝贺，热闹了一天。

康定自治区建立后，我们回到雅安，与廖志高商议，雇好马帮翻越大相岭和小相岭直奔西昌。在离西昌8里处，我们与先来的同志会合。12月有8日进城后，我们弃马乘车在西昌街上绕行一圈，受到沿街群众的欢迎，锣鼓声，欢呼声，还夹杂着彝族人的欢吼声，连成一片，盛况空前。我们在西昌休息了一天，次日便开始了建立西昌专区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12月月25日开会时，访问团的干部坐在来宾席。刘格平团长首先讲话，讲述中央的民族政策，传达毛



主席对各族人民的慰问和关怀。会间，少数民族代表对访问团的礼品袋十分喜欢，特别是女同志对礼品袋里的各色丝线和小梳子、小镜子等物品反复把玩，爱不释手。会议在12月31日底结束。第二天，庆祝西昌专区联合政府成立，同时，庆贺1951年新年，敲锣打鼓，热闹了一天。

西昌会议结束后，访问团在西康的任务基本完成，但尚未进入彝族中心地区，看看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为此，刘格平又带领一部分访问团同志，越过几座大山，直抵昭觉县城。昭觉城是清代宣统2年修建的，是全国兴建最晚的一座县城，也是最小的一座县城。城垣纵横不过百米，城内只有十几户汉民居住，彝族群众住在周围山上。县府在县城中间，有前后两排房屋，中间为一个院落。房屋为县府人员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庭院为开会的场所。在县府住下的第二天，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刘团长在会上讲述中央的民族政策，传达毛主席对彝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第三天，召开了彝族人民代表会议，有200余人参加，最远有7天路程赶来的。会议进行3天，访问团和县府同志及彝族代表讲了话。会议决定成立调解委员会，订立了“团结公约”，还有访问团赠旗、赠礼等活动。在庭院开会时，群众在门外旁听，连对面城墙上也蹲满了人。会内会外，秩序井然，连咳嗽声都没有，可见彝族文明的特殊风采。

刘格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铸造了他顽强的性格。他襟怀坦荡，无私无畏，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仍泰然处之，若无其事，从不怨天尤人。对党中央、毛主席，他忠贞不贰；对工作尽心竭力，废寝忘食；对干部群众，他倍加爱护。刘格平同志那高尚的品德和忘我的精神，将永远教诲着后人。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2局局长，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悼念坚贞不屈的狱友刘格平同志

韩培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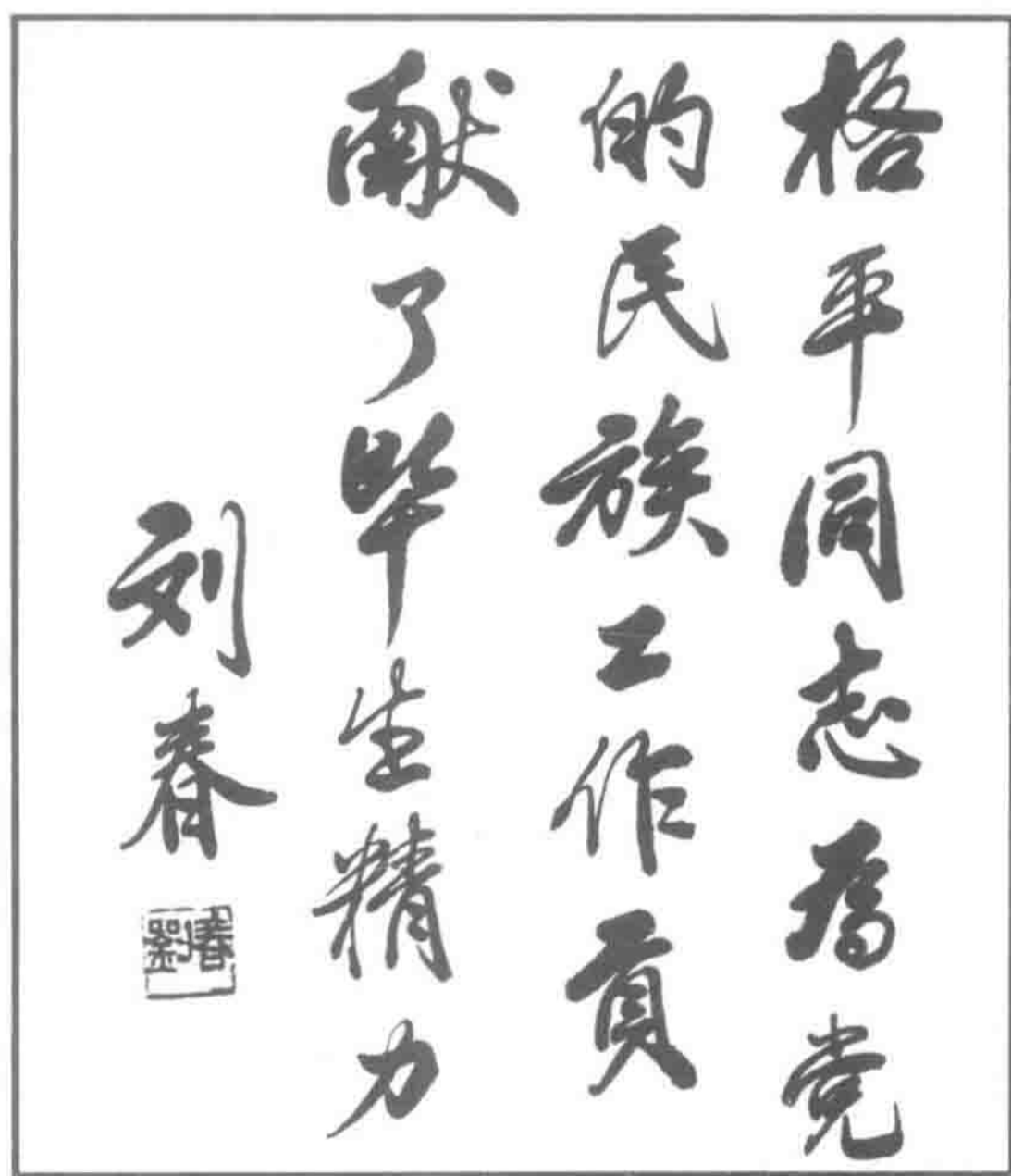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〇四生格平  
五四运动亲参加  
一九二二加入团  
从此献身闹革命  
原来阶级已背叛  
信仰马列主义真  
矢志反帝反封建  
深入农村把党建  
火种点燃遍津南  
特委县委亲手建  
发动穷人闹革命  
饥民“借粮吃大户”  
分得粮食到家中  
绿林部队被改造  
壮大津南革命军  
枪杆在手有武装  
一举攻占庆云城  
缴了民团枪数百  
反动势力丧胆魂

革命声势广传播  
人民觉醒了不得  
打破了宿命论  
再也不信神  
思想大解放  
决心跟党走  
打碎旧世界  
誓把乾坤扭  
工农团结紧  
敢和敌人拼  
消灭反动派  
奴隶变主人  
一九二五年  
隆冬数九天  
配合国民二军作战  
决心把奉军歼  
组成工人敢死队  
自任指挥上前线  
英勇冲锋不怕死  
攻占天津市中心



忆昔当年多壮烈  
英姿潇洒正青春  
一九三四正当春  
马颊河畔起风云  
反对摊派闹暴动  
鸡毛信传各村中  
三万农民齐请愿  
包围县衙庆云城  
群情激奋威慑下  
县长答应停挖河  
公安局长遭痛打  
夺了枪支来游行  
人民胜利多喜悦

穷人感激党恩情  
正在召开庆祝会  
欢声笑语齐沸腾  
敌军镇压突然到  
一片混乱四处奔  
格平受伤陷囹圄  
人被解到北平城  
宪兵三团阎王殿  
审讯逼供受酷刑  
坚信马列顶得住  
哪管酷刑或死刑  
百折不屈骨头硬  
无期徒刑已判定



刘春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押入军人反省院  
脚带铁镣步难行  
身受苦难不悲观  
为了革命不觉冤  
忠骨铮铮豪情在  
坚信共产主义胜  
战士自有战士愿  
愿捐身躯为明天  
狱中抓紧攻马列  
铁窗十年出牢狱  
正气凛然永挺胸  
出狱之后到渤海  
敌后抗战勇斗争  
日本鬼子终投降  
解放战争驰华东

建国初期进中央  
民族工作高水平  
虽然步入坎坷路  
是非功过后人评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十多年无愧党  
赤胆忠心贯长虹  
堪称党的好儿子  
回回民族一英雄  
惊闻大哥突然去  
悲痛欲绝早失声  
继承大哥未竟业  
余热发光永远红  
大哥，您安息吧，您的英名永垂千古！

（作者系刘格平坐牢并肩斗争到底的难友，曾任第1机械工业部机械局局长，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 刘格平豪气永存

李毓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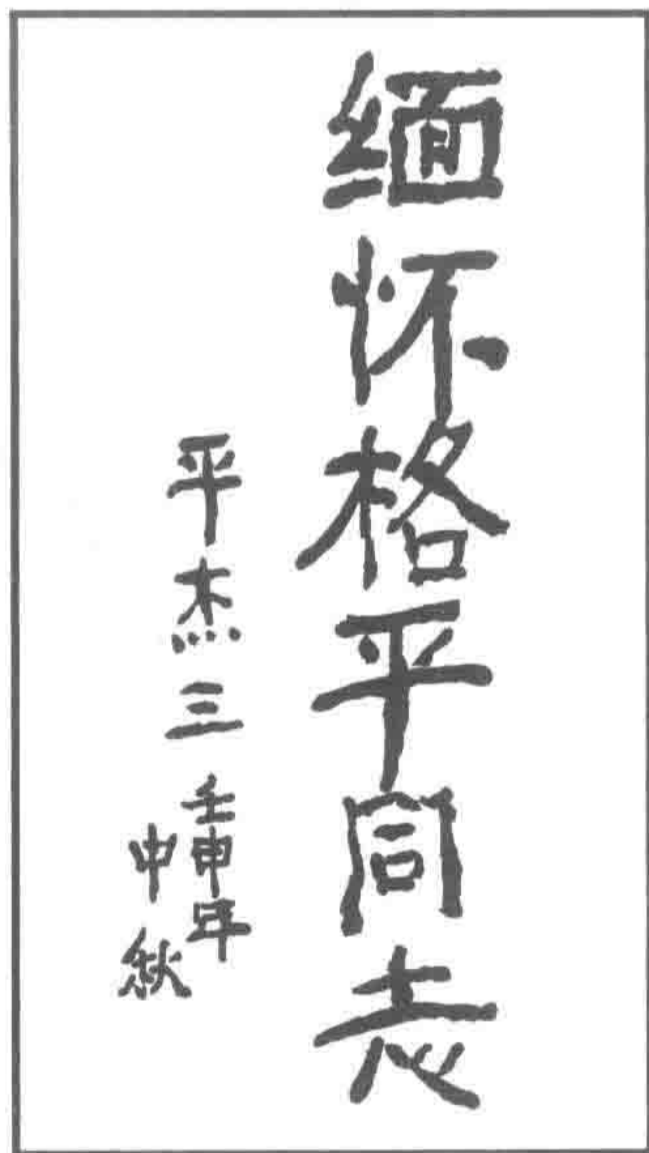
北国火燎原，  
格平敢率先。  
疆场内外撑铁骨，  
提携百族翩。

刚谦分敌友，  
功过何须言。  
笑若风生九十春，  
豪气留人间。

（作者曾任中国草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谷牧和平措旺杰夫妇到家中吊唁刘格平



平杰三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 忆格平往事

丁磊

1992年3月11日，我的亲密伴侣格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我们风风雨雨、患难与共、共同生活46年的每一个时刻，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思念之情，难以平静，仿佛格平又回到我们中间……

### 从相识到结合

我认识刘格平是在1946年夏天，那时他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东局回协主任，是大家十分敬重的领导人。当时我还是个刚刚20岁的青年，在鲁中回协工作。一次，格平来给我们作报告之后，派人找我去谈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把他当做首长，心里有些害怕，所以很拘束，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实际上他早已听人介绍了我的情况，是有目的地来

见我。因按回族风俗结婚必须是同族，而当时回民干部特别是女性干部较少，经过介绍和调查他已选定了目标，所以当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就直截了当地征求我对他的意见，并说华东局组织部已经同意我俩结合。当时我是又害怕又难为情，可是想想介绍人对他的情况介绍，两次见面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再加上组织上已经同意，自己作为党员也应服从，事情就这样



1988年，已是84岁的刘格平



定下来了。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他去看望了我的父母，并给我带来了许多战争年代比较珍贵的礼物：背包、围巾、毛袜、毛背心等，我很难为情，不好意思要，只留了一件毛背心，其余的都分给了同志们。

1947年10月10日，我到渤海区党委参加“三查三整”时，格平住在李家桥，我们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就在结婚当天，他接到上级指示马上出发转移，我们便又分开了。直到他担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后，住在何家坊，才不时地接我去团聚一下。一直到1948年格平率队南下，我们始终过着动荡不定、时聚时分的生活。

### 从上海到北京率访问团出访西南

1949年，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南下的刘格平到上海任华东革命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数月后，我也随南下部队经过苏州进入上海，在华东革命大学教务处工作。在上海解放初期，华东革命大学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以适应各方面工作需要。8月份，格平作为国内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大典，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0月中旬我调到北京后，我们住在东城区“大取灯儿胡同”的中央民委四合院办公室里，在外间办公，里间住人，在食堂吃饭（当时还是供给制）。虽然生活比较俭朴，还不像个家，但毕竟已经安定下来。我们在这里住到1953年。

1950年，格平受中央委派，率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从北京出发，访问云南、贵州、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工作任务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达中共中央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关怀，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查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试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次访问，党组织批准我随行，历时一年半，途中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有时乘车，有时骑马，有时只能步行，有时一整天见不到人烟。尽管访问期间的工作、生活都十分艰苦，但格平总是精神饱满地带领全团同志认真工作。在访问中，格平率访问团在西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藏族自治区，并制定了“组织条例”。访问团回到北京后，向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中央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和总结，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表扬，给予较高的评价。毛主席高兴地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是成功的”。有一条沿用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口号，就是当时应格平的请求，毛主席亲笔题的词。

中央经过3年对各地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工作实践，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

### 在北京正式安家

1953年，我们从中央民委大院搬入景山东前街3号的庄宅。这是格平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分的一套住房。有了自己的家，我和格平高兴得彻夜难眠。这套房子位置好，设备全，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南隔一条马路和护城河与故宫东北角楼相望，西边不远是景山公园。进院门后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小楼前有一个圆形花坛，楼上住人，楼下是办公室、会议室及餐厅、厨房等。格平非常喜欢。他请农科所的专家在院内空地上种上优良品种的果树、葡萄，几年后都结出了丰硕甜美的果实。全家人都很珍爱这些果树，精心料理着、呵护着。格平常用摘来的水果招待到家里开会、做客的中央负责人及朋友们。每当工作累了，格平就在院子里散步、活动。他除了去开会或到外地出差，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这里度过。直到1965年格平调往山西，我们才离开这个全家人生活居住了11年、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家。

### 动荡岁月

1957年，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任命格平为自治区筹委会主任。所以当年春开始了筹备工作，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划界问题。为“平凉的归属问题”与甘肃省协商；为“石嘴山的归属问题”与内蒙协商，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中央出面调解，最后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二是干部配备问题。中央拟让格平任自治区主席兼党委书记，格平考虑到宁夏地区汉族也不少，自己



身兼两职不一定对工作有利，向中央建议派一位汉族同志当书记。他从不把个人权位看得很重，总是以工作为重，为他人考虑，为事业着想。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前夕，陈毅同志曾代表中央三次征求格平的意见，要提名他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候选人，他都没有接受，他说自己职务已经不少，希望多提拔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他在担任中巴友协会长期间，曾有三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也都让给了其他同志。他不仅自己这样，对我的任用提级也同样严格，凡能让就让给其他同志，因此我从1949年到1960年一直是个普通科员。1962年全国精简干部时，他又首先动员我离职，这次我没有按他的要求办，因为我愿意去工作，不想只当家属。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刘格平以极高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自治区主席的工作。尤其他主管的工业发展很快，形势



1959年，刘格平和夫人丁磊在银川

很好，为自治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在他忘我工作之时，1960年5月，宁夏忽然刮起了一场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时间，大批干部被批斗被抓，格平首当其冲，也被轮番批斗，一切工作都停了下来。宁夏被整而死的有上千人。后来，中央经过调查，对此案做出结论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陷害案”。

1960年10月，按照中央指示，格平由宁夏调回北京，进入中央高级党校自修。刘格平没有因为被诬陷、被批斗、调离工作岗位而消沉，他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和毛选，写了数万字笔记，收获很大。1965年，刘格平在党校学习结束了，中央派他到河南新乡搞“四清”工作。不久，又由河南转到山西任副省长。省里派他到晋东南沁县搞“四清”。到1966年秋，十年内乱在全国开始，也波及到晋东南，格平才回到太原。从这以后，在那个失去一切正常秩序的年代，格平又经历了数次风风雨雨，曾任山西省革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当选为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不料，当年冬天，却进入以林彪为主任的“学习班”，又开始被批斗、审查。格平觉得自己像在大海波涛中漂泊的一叶小舟，忽而在峰顶，忽而跌入低谷，很难预料今后的命运。这也是那个动荡岁月中千千万万个干部的共同感受。

### 在唐山“劳动改造”遭遇特大地震灾害



1970年秋，刘格平在河北省唐山下放劳动时留影

1970年夏，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一大批老干部被迫疏散下放劳动。刘格平也是其中之一，他被送到唐山陶瓷3厂劳动，并改名“刘方”，我随他同去，我们的户口、行政、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河北省。到唐山后，我们住在陶瓷厂大院的两间平房内，总共约30平方米，里间睡觉，外间做饭，烧的是煤球炉子，冬天非常冷，夏天很闷热。刘格平虽然身体有多种疾病，仍然坚持每天到工厂劳动，他只要和工人群众在一起，就忘掉了一切烦恼。在劳动中，他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制造陶瓷技术，认真干活，得到工人们的好评。

回到家，他和我一同做家务，帮我抬水、倒垃圾等等。刚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刘格平去厕所问题。公共厕所脏、冷都能将就，但因刘格平人较胖，肚子较大，在茅坑上蹲不下，每次大便都十分困难，他又经常便秘，更增加了痛苦。二女儿回家看到这种情形，急中生智，写信给在上海工作的大女儿，买来一只南方用的“马桶”。约半米高，可以坐，又可涮洗，不用时就盖住，总算解决了这个看似不大却又令人头疼的难题。这只“马桶”，刘格平用了五六年，直到离开唐山。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刘格平仍不放松学习，抓紧时间看书，每天长达四五个小时，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每天还抽出时间写回忆录，练习书法及运动，生活紧张而有规律。



由于连续数年生活条件艰苦，又十分劳累，刘格平身体越来越差，曾患青光眼在工人医院做了手术。他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到1975年，格平的病情加重。当时工人医院怀疑他患了癌症，建议回北京诊治。我们向中央提出申请，经邓小平批准，刘格平才回到北京治病。因北京已没有我们的住房，只好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不料这一住就是12年。

1976年7月28日，是中华民族灾难日。唐山发生了7.8级特大地震，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和健康，其中就有我们的三女儿刘秀华。这个孩子勤奋好学，非常内秀，在内乱的年代无法正常上学，就参加了北京学生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行列。她3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因所谓的“家庭问题”被卡了下来，孩子内心苦闷，加上生活艰苦，后来就得了肝炎，因兵团无法很好地治疗和休息，只好请假回唐山家里治疗。这个不幸的孩子总是多灾多难，肝病刚刚治好，就赶上了大地震。当时我和女儿睡在一起，被地震震下床来，我头部被大衣柜扣住而大难不死，女儿却因睡熟了被结结实实压在废墟中，不幸遇难。刘格平当时正在北京治病，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失去了刚25岁风华正茂的女儿，失去了他心爱的书籍及大量读书笔记和收藏的革命文物。他的心碎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知道这时候用任何言语都安慰不了他，只有暗自落泪。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要纪念女儿，寄托哀思。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留下痛苦记忆的地方。

### 严格的家教

我们有4个孩子，格平喜欢孩子，关心每个孩子的生活和成长，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过问她们的情况。孩子们小的时候，每逢星期天他带她们去公园，夏天带她们去北戴河或青岛避暑，手把手教她们游泳。刘格平性格开朗、幽默，喜欢热闹，爱和大家聊天。我们这个大家庭使他感到温暖、幸福，有空就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和生活常识，讲为人处世的道理。他主张对孩子们只能说服教育，从来不许打骂孩子，因此孩子们都很崇敬他。

在政治思想上、学习上，刘格平对孩子们要求十分严格。他告诉她们：你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出力；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不要脱离群众。他从来不主张让孩子们进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认为条件太好，对锻炼、培养孩子们的吃苦精神和独立生活能力是没有益处的。因此，我们的孩子上学都是在普通学校度过的。有的学校路很远，刘格平也不许用他的专车接送，让孩子坐公共汽车或步行。当孩子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他嘱咐孩子要服从国家分配，因此几个孩子均分在外地工作。由于格平严格的家教，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点：上进心强，学习努力，吃苦耐劳，作风朴实。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两个是国防科研单位高级工程师，小女儿是海军中校。我感到格平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们为有这样的孩子而欣慰自豪。

多少年来，孩子们对格平都很敬重、孝顺，尤其在刘格平病危期间，她们从外地赶回来，轮流守护在病床前达半年之久，连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一致称赞说：“刘老的孩子真孝顺！”刘格平虽然走了，但他对子女的谆谆教诲，他本人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是孩子们的宝贵财富。

### 晚年生活

刘格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在革命征途上艰苦跋涉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职位和待遇，刘格平深感责任重大，一心想好好再工作几十年，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不畏艰险，没有私心，对于10年之内的5次调动工作都坚决服从，毫无怨言。这10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时升，有时降，跑遍6个省、市、自治区，刘格平都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指示执行，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刘格平在历次政治风浪中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甚至迫害，直到他快70岁时，极左路线的一些政治小丑还不放过他，还想给他戴上“叛徒”帽子，找不到证据也要挂起来等待审查，致使格平从1970年起就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从唐山到北京住中组部招待所，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副食供应（当时还用粮、油票、副食本），出门没有车，看



病不准去北京医院，经常靠老朋友的帮助来解决生活的困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处境中，格平仍然坚持每天按时看书、读报、写回忆录、练习书法，定时锻炼身体，生活很有规律。我深知刘格平的心思，他随时都盼望着组织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继续为国家建设出力。1983年，中央经过审查终于给刘格平作了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这就是等待了13年的结果。短短一句话，多么简单！而又多么沉重啊！随后，中央逐步给刘格平解决了交通、医疗和住房问题，户口也迁回了北京。1988年我们搬入了万寿路甲15号住宅，84岁高龄的刘格平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他高兴地拍着手说：“只要党的政策好，国家会越来越富强，生活会越来越好。”“我已经80多岁，能够活着，看着社会向前发展也是一种幸福。”刘格平的博大胸怀和乐观主义始终令人钦佩，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顺利时，他都能泰然处之，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刘格平晚年十分思乡、怀旧。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他热爱家乡，眷恋着这块生他、养他并送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土地，怀念家乡的各族人民。他曾说过：“要能在老家盖几间平房，晚年住在里边，喝着家乡的水，吃着从小爱吃的家乡饭，时常去赶赶集、串串门该多好！”1984年，他终于不顾80岁的高龄，让我陪他回了一次老家，看望父老乡亲及已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晚辈；出资改善了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家乡的回族乡亲要重建清真寺缺少资金，刘格平尽力给予了资金；在南皮县，资助为张隐韬烈士立碑。他特别关怀过去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及其后代，看到他们有人身体不好，生活困难，他十分焦急、不安，尽力给予帮助，并积极联系有关部门，通过组织给予彻底解决，这使许多老人和子女非常激动。

1992年初，刘格平病危期间，仍念念不忘家乡人民，仍把民族工作放在心上。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对到医院探视他的年轻干部说：“我已经不



1988年，刘格平和丁磊游北京紫竹院公园后留影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行了，今后的工作全靠你们了。沧州地区有优良革命传统，沧州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涌现了不少好干部，不能忘记他们！”又说：“你们要记住，多为少数民族做有益的工作！”这是刘格平最后的嘱托和临终遗言。

### 人间自有真情在

刘格平历经坎坷磨难，终于在1992年3月11日，走完了他88年的生命旅程。我与他共同生活了46年。他去了，再也不能陪伴我深夜聊天，再也不能和我一同散步，再也不能询问孩子们“有什么新闻？”再也不能……我感到悲痛而茫然，不知道没有格平的日子怎么过。

令我和全家人感动的是，刘格平虽然多年没有安排工作，几乎是深居简出，只与少数人来往，在他逝世后竟然有那么多同志、朋友为之悲痛不已。

根据刘格平本人的意愿和家乡群众的要求，经过中央批准，刘格平遗体安葬在他创建津南地区第一批党支部的地方——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为此，我们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仅通知了不多的熟人，出乎预料的是当天一大早就陆续来了很多人，在院子里静静地排起长队。当告别仪式开始时，刘格平在狱中的一位难友第一个哭喊着冲进大厅，老人已白发苍苍，刻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真情，看后令人心酸。随后人们陆续进入厅内，含泪向刘格平遗体依依惜别。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有90高龄的老朋友，也有普通干部，有军人也有学生，连孩子们的同事、朋友都来了，大约有七八百人。当遗体运到孟村县和大堤东村时，应乡亲们的要求，又安排了两次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每次都是1000多人。其中有认识的，也有素不相识的；有本地的乡亲，也有格平早年工作地的群众，听到消息从外地赶来与他告别。男人们强忍泪水，妇女们泣不成声。人们缓缓地从刘格平遗体旁走过，都想走慢一点，多看几眼这位沧州的骄子，回回民族的优秀儿子。后面的人却又催着挤着不得不向前迈步，记不清持续了多长时间。我透过盈满双眼的泪花，看到了父老乡亲对离开故乡70多年的刘格平，怀有如此真



挚而深厚的感情，我深受感动，我只想对刘格平说：“你是人民的好儿子，人民没有忘记你，你安息吧！”我们全家人万分感激所有前来参加格平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的同志和乡亲们。

鲁迅先生有两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是对刘格平一生为人最贴切的写照。刘格平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后代学习并继承发扬的。

（作者1942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人事局副局长，选自1999年9月《刘格平文集》）



沧州市爱国主义教育指导委员会石室刘格平陵园为沧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纪念格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喻俊民

2014年8月8日，是刘格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地怀念他，纪念他。每当想起我文化大革命中担任刘格平同志秘书期间的往事，心里对他的敬仰之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对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不移，为人光明磊落，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这一切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他教我如何去做人，如何去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这一经历也坚定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我一生亲身遇到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他是一位十分可敬的回族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可亲可敬的长辈。

—

1967年山西省“一一二”夺权后，有一天，我们太原工学院革命指挥部通知我到指挥部办公室。到了指挥部办公室，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让我到省核心小组报到。接着，我被一位不认识的同志带到省核心小组的办公室，他跟我介绍时说，这是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志兰。这时，刘志兰跟我说：“省核心小组决定给刘格平同志选一位秘书，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又是三好学生、班共青团支部书记，所以省核心小组决定调你到刘格平身边去做秘书工作。”我当时对刘格平根本不了解，不知道秘书工作具体是干什么的。随后，领我来的那位同志又把我带到刘格平的住处，这是一座二层小楼，门口有卫兵站岗。在一楼会客厅我见到了刘格平，还



有一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那是刘格平同志的夫人丁磊）。刘格平非常客气地问了我的父母和家庭情况，我都详细地做了回答。之后，就开始了我的秘书工作。这是我平静人生的起点，也是我后来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经历和艰苦磨炼的转折点。

做秘书工作是一项很累、很苦的差事，但又是要求很严格、很细心、很负责任的一项工作，绝不能有半点马虎。当时“文革”的岁月只有我一个人担任此项工作，平时既要考虑刘格平外出的安全，回到住处后，安全的事就交给警卫班去负责了，还要做会议记录，中央文件的传送，特别是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专线电话接听，这种电话是专用的并且加了保密设备的，每天要看管、接听，不能有丝毫马虎。到了1967年5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刘格平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工作需要，省核心小组决定增加一位秘书，是从空军某航校调来的，叫梁运安，是位现役军人，以后军队的事情就由梁运安按刘格平的指示去处理了。直到1969年，中央“七二三布告”发布后，我和省里的全部干部都被集中到北京昌平中央办的山西学习班，我的秘书工作才算基本结束。学习班是由一些军队干部和中央文革成员主持，林彪是学习班的主任。当时我还是未出校门的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即在学习班里陪同刘格平接受学习、审查和批判，因那时刘格平已年逾花甲，我还要照管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以及健康、安全等问题。

## 二

在跟随刘格平同志工作近3年的时间里，我深感刘格平不仅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又是一位让我很尊敬的高级领导，更是一位我人生道路上终身难忘的师长。他遇大事不慌，遇困难不推，特别是大事不糊涂，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的，对党的事业是绝对忠诚的，他对毛主席的感情之深、信任之深是绝对的。虽然刘格平出身于河北省沧县一个回族大地主之家，可他从小就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刘格平无论何时何地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冤枉，以及不公正的待遇，他都始终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是会坚持实事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求是的，从来都没有怨言。他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是1922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6年的中共党员，他是我党津南地区青年团的创始人，他是河北沧州地区党的创始人，他是北方农民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此被敌人3次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手指被打断致残，承受了灌辣子水、坐电椅和老虎凳等酷刑，使他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他仍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把牢底坐穿”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是很值得我们后人去敬仰和纪念的。



1967年，刘格平（左）在太原接见越南英雄代表团

在我做秘书工作期间，刘格平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在太原接待了越南英雄代表团一行，还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阿利亚一行，并陪同代表团前往大寨参观访问。在各派群众组织争斗不断的情况下，他周密安排，较好地完成了这次外事任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赋予了我解决各种矛盾和争斗的智慧和才干，其品德作风也教育和影响了我的进步和一生。

记得1967年7月，中央召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开会解决山西问题，我随刘格平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6楼。当时中央领导召集开会一般都在晚上，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有一天晚上，周总理主持会议，批评张日清同志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四月会议”后，对刘格平同志主持工作支持不力，在关键时刻没采取措施保护刘格平的安全。张日清矢口否认，并对此做出解释。当时我在一边做记录，听到张日清同志讲完后，我把在海子边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委员大会时，发生的围困刘格平的事情给总理汇报了一遍，这时我看到周总理认真听着，并没有阻止我的发言，我说完后，周总理立即批评了张日清，这时候参加会议的其他中央领导都批评了张日清，当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段时间，山西原来的驻军第二十一军已调离山西到了陕西驻防和“三支”“两军”，第六十九军刚到山西不久。张日清是中央树立的



军队“支左”的一面旗帜。会议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山西当前的局势，这才有了后来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这段毛主席的指示，事出有因，正在于此。会议结束后，回到京西宾馆住处，刘格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会客室，让我坐下，很慈祥地对我说：“小喻，这是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今天会议上你突然插话，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哪有你们秘书发言的权利，你不懂得，搞不好那是要掉脑袋哩。今天你是给总理说清楚了，没惹下麻烦，以后可不能这样，一定要做好你的秘书本职工作，注意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区别，今后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谨慎小心。”那时，我大胆直言，有失身份。刘格平为我捏着一把汗。他的教诲使我懂得了人们常说的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真实含义了，此后我说话办事更加注意场合和严密、谨慎了。

1967年，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后，8月初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回到了山西。刘格平和我是在8月上旬回到山西的。8月下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会后，山西的形势稳定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山西“支左”工作因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原主要由省军区独立师“支左”转为第六十九军负责。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参加中共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军队“支左”工作实际是由谢振华代军长<sup>①</sup>负责，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谢振华认为应该抓一批、处理一批，甚至对个别头头枪毙；刘格平、陈永贵（省革委会副主任）不同意这样对待群众组织，两人在此事具体处理上，产生了重大的原则分歧，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后来谢振华对陈永贵的意见也很大。因为陈永贵是坚决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的。“七月会议”后，陈永贵坚决支持刘格平工作。我和陈永贵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北京京西宾馆陈永贵住的房间里。有一天，《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王日东找到我说，要采访陈永贵，我就把王日东引到陈永贵住的房间，王日东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指示，要陈永贵谈谈对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陈永贵想了一下，就开始口述，王日东边

<sup>①</sup> 当时第六十九军军长是董其武，谢振华是副军长代军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记录、边提问。讲完后，王日东就走了。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见报，我一看，完全是陈永贵讲的原话。从此陈永贵给我留下了可敬而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农民，出口成章，为人和蔼可亲，耿直不屈。

谢振华对陈永贵从“七月会议”后有了意见。据我所知，陈永贵曾多次向周总理反映第六十九军的个别同志，特别是谢振华在“七月会议”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刘格平的工作，在“支左”工作中不能一碗水端平，致使山西的形势在“七月会议”后，群众组织不仅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大联合起来，反而对立情绪更大，矛盾更尖锐。这时，陈永贵多次给刘格平反映了此事，而且告诉刘格平他已向周总理、毛主席写了报告呈上去了。当时陈永贵担心，这样下去，山西的形势发展是不会好起来的。而后来事实也是如此，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升级，范围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波及电力、通讯、铁路等国计民生的行业里。党的核心小组开会，个别同志往往发难，使核心小组会议不是吵得没有结果，就是形不成统一意见，致使山西的形势发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有天晚上，刘格平开完核心小组会议后，心情很沉重，回到家后，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眼不说话。这时，我说，现在看来他们是要你把权让出来，干脆这样，你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一份



太原市群众欢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车上站立者左起：李富春副总理、阿利雅团长、刘格平政委



报告，你回北京算了，山西的事情就交给他们。这时，刘格平坐起来严肃地说：“小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有困难、有矛盾的时候不退缩呀，毛主席、周总理把我派到山西，我就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负责，不能一遇到困难和矛盾，我就要回北京去，那我还是共产党员吗？我就是累死也要死在山西。我们这些人，生是跟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死也是共产党、毛主席的人。”此时，他似乎觉得我对他的言谈还没理解，又接着说：“要把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作为首要的政治本色。作为共产党员的第一重任就是要铸就全心全意、表里如一、无怨无悔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刘格平的一席话，使我有生以来受到最大的一次震撼，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忠诚”一词的含意，理解了刘格平在敌人的监狱里不屈不挠，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英雄气概的真实动机和信念。

### 三

“七月会议”后，陈永贵曾向周总理、毛泽东主席多次反映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央告了谢振华的“御状”，而且陈永贵在核心小组会议上坚决支持刘格平，遇到分歧时，陈永贵的耿直性格决定了他首先发言支持刘格平的意见，但有时也忍不住，直言指向谢振华，弄得谢振华下不来台。陈永贵地位特殊，作风朴实，深得中央信任。他当时可以到北京直接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对陈永贵是爱护关心的，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省核心小组到中央开会时，只要周总理主持会，陈永贵在场，总理总是让陈永贵坐在离他很近的位置上，一见就有说有笑，只要是陈永贵向毛主席反映的问题，周总理都及时地告诉毛主席，并能很快



1967年10月，刘格平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阿利雅团长亲切会见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关心，这就使谢振华对陈永贵从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隔阂，这些局外人是捉摸不透的。

1968年10月，阳泉一派群众组织发现陈永贵站到了刘格平一边，便借着大寨展览馆陈列着陈永贵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扣押过的经历，给刘格平、谢振华写报告，称陈永贵当过伪代表，是汉奸、叛徒，还说陈永贵是河南逃亡地主。这些材料也散发到社会上，一时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为了洗清泼在陈永贵头上的脏水，在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因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怀英是陈永贵当年入党时的区委书记，对陈永贵的历史做过反复的调查和审核，刘格平让他在会议上将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证明陈永贵的历史没有问题，谢振华也在场。会后，张怀英向周总理、中共中央写报告证明陈永贵的历史是清楚的，说陈永贵是叛徒、汉奸和逃亡地主纯属诬陷。刘格平心里有了数，同意陈永贵在昔阳县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刘格平在工作中坚决支持陈永贵，直至陈永贵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002年，一个叫吴思的作者，撰写了《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本书，书中引用了有人在回忆录中记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外围组织等内容。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对陈永贵的声誉，在社会上起到了极不好的作用和负面影响。为此，陈永贵夫人和儿子陈明亮将作者吴思和《北京

青年报》告到北京市人民法院。2013年4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作者所写书中引用的材料，均系他人写的回忆录，非权威性文献记载，被告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事实的存在，故对书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判决两被告在《北京青年报》发文道歉，并由作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万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左1），陪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在太原参观



元，青年报赔偿2000元，被告不服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67年7月24日上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穿军装。刘格平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中央军委通知刘格平参加会议，刘格平的身份是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我随刘格平进入会场，刘格平入席后，我们秘书坐在最后边，会议由周总理主持。会上，武汉军区的参会领导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7·20事件”的当事人陈再道等人在第一排站着。会议开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出去休息时，吴法宪、刘丰等人冲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随之又将陈再道的领章、帽徽摘掉。这时，周总理的秘书立即告诉周总理，周总理来到了会场，制止了吴法宪等人的错误行为。

会上很多人都发了言，批判陈再道，指令刘格平批判，刘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左右才结束。会议结束后，我和刘格平回到京西宾馆住处，我看到刘格平坐在会客室沙发上不说话，思想很沉重。我说：“政委，会上那么多领导同志都发言批判陈再道，你为什么不发言批判？”刘格平说：“他们让我发言批判，我不能发言。陈再道同志我是了解的，是个老同志，解放战争时是很能打仗的，跟毛主席出生入死打天下，他是有功之人，像我们这些人不会反中央，更不会去反毛主席，我是不相信陈再道搞兵变的，我怎么能批判呢！”这次会议上刘格平的消极表现，加之文革中刘少奇的问题出事后，当时像他们这些人，在《人民日报》上都发表了批判刘邓路线的文章，上层多次暗示让他写文章表态。据我们秘书所知，刘格平没有经过我们秘书手发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文章，这就为刘格平后来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后来刘格平受到林彪、王洪文、陈伯达、康生一伙人的迫害，正好证明这一事实。

有一次，在中央开会时，王洪文见到陈永贵，当着陈永贵的面批评说：“你不好好当你的副总理，保那个不搞大批判的糟老头子刘格平干什么？”可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见，林彪、陈伯达和王洪文一伙与刘格平是水火不相容的。

### 四

在近3年的秘书工作期间，我随刘格平到阳泉、晋中和晋东南的沁水、晋城、长治等地区下乡视察工作，当时正处在内乱时期，各地方两派对立情绪还是比较严重的。负责省革委大院警卫工作的是山西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个连队，连长姓白，我们都叫他白连长，他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军人，每次刘格平离开太原外出到各地视察，他都要派一个班的人跟随警卫。刘格平知道后，让我把白连长叫来，刘格平当面给白连长讲，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在过去打天下最艰苦的时候，人民群众保护了我们，我们这些人才得以生存活到今天；跟随毛主席打天下，我们共产党掌权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反而害怕人民群众了，不相信他们了，这哪能行呢，我知道这是你们军人的职责，但不要去那么多人。”从此以后，刘格平每次到太原以外的地区调查研究和视察，都是白连长或者带上一两个战士跟随，刘格平曾告诉我们秘书，不能用警卫车前方开道扰民，只能悄悄前行。每到一地方视察结束，都要及时将刘格平的伙食费结清，把手续办完后，我才能安排刘格平离开。那时既交钱又交粮票，这事如今在大多数人听起来会认为那是假的，都可能是笑谈。每次视察完回到太原，刘格平都要当面问我下乡的伙食费结清了没有，并且跟我说：“小喻，你不要以为吃顿饭才几块钱是生活小事，但时间一长，养成吃喝不付钱的习惯就不是小事了。”此事虽小，但和如今搞腐败的人相比，对我一生的教育是极其深远的。

在我担任秘书工作期间，我还未大学正式毕业，学校每月发的助学金仅12元，我都交给刘格平家做饭的王师傅。在那近3年的工作时间，我是没领一分钱工资的。王师傅是位很善良、勤恳的回族老人，做得一手清真好饭菜，他跟随刘格平从北京到宁夏，又从宁夏到山西，是国家配给刘格平做饭的专职炊事员。因刘格平是回族，后来刘格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王师傅也被株连，孩子被赶出太原下放到临汾铁路局当了工人，女婿从部队团参谋长岗位被转业到了



地方，王师傅他老人家看到刘格平家庭四处分散之后，无奈返回了宁夏，不久含冤离开人世。

1967年8月的一天，山西无线电厂的厂长来到刘格平的办公室，把一台新研制的半导体收音机交给我。那时这样的高档收音机只有北京、上海才能生产，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刘格平外出回到办公室后，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精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把我叫过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山西无线电厂厂长送给您的，是他们厂研制的新产品，作为样品送给您的，请您试用。听我说完后，刘格平很严肃地告诉我：小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能随便收取别人的东西，特别是公家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这样的领导干部，更不能去劫取国家和人民的一分一文，贪污那更是犯罪的。你年轻，不知道，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的天津市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毛主席却决心处理了他们俩，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教育我们共产党干部必须牢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是要清楚这一点，不然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那样人民群众是会推翻我们的，你打电话让那位厂长把收音机拿回去，但不要指责人家。你就说，半导体收音机我看了，也试用了，很好，让他们尽快投入市场，解决山西无高档半导体收音机的历史。我立即按刘格平说的，妥善的处理了此事。

## 五

刘格平同志是一个背叛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逆子”，毅然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里来的。在解放前的艰苦岁月里，曾3次被国民党逮捕坐牢，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宁肯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不变节，不自首，三次坐牢



少年儿童来到刘格平陵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解刘格平革命战斗的一生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共13年。解放后，在革命建设时期，又多次受到打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前后共17年。在他一生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坐牢、受打击迫害前后共30年。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实，也不能不让人对他为革命无限忠诚品德的敬仰。对于那些在党内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多少受到些打击和冲击，事后便写文章怨天怨地，发表伤痕文学，夸大事实，伸手向组织要钱，要官，要待遇，甚至仇视共产党，丑化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人来说，刘格平的人格是多么的高尚，党性是多么的纯正！他对党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从不后悔，从无怨言。即使1960年在宁夏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党集团的头子，仍然坚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会给他平反的。后来的事实也如此，5年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刘格平和宁夏事件平了反。毛主席说：解放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两次错误路线中，刘格平都是正确的。中共九大以后，由于刘格平没有迎合林彪、陈伯达、王洪文一伙人的政治需求，没有写文章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特别是在武汉“五二〇事件”上，没有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在中央军委扩会议上发言批判陈再道，这就为后来被迫



1992年4月，山西大寨郭凤莲和北京市工商局长刘金铭到刘格平家中慰问，表示对革命老人的怀念



害埋下了隐患。也就是后来林彪、陈伯达、王洪文一伙借机山西问题大整刘格平同志，并以反军乱军之罪名列了专案。一整就是10年，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乌兰夫、王任重、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下，撤销了专案，中央为刘格平作了“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公正结论，恢复了刘格平的各种待遇。在这10多年的漫长审查过程中，陈伯达、王洪文一伙不准刘格平全家进北京，把他们下放到河北唐山陶瓷厂劳动改造。患病之后，在邓小平同志的过问下，才回到北京医院看病，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因此，逃过了唐山大地震一难，却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女儿。即使这样，10多年来，刘格平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而且在80高龄的岁月里，还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到河北、宁夏等地调查研究，为我国民族事业的发展谏言献策。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努力尽心工作，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毛泽东思想，忠诚于各族人民，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不愧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这正是：丹心一片谱春秋，参天劲松傲神州，踏遍青山人未老，高风亮节英名留。

（作者曾任中共山西省永济县委宣传部长、永济市电力开发公司经理，此文于2014年6月为纪念刘格平诞辰110周年而写）

## 革命老人刘格平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梁运安

刘格平老人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尽管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在他身边工作的牵连，受到过这样那样不公正的待遇和磨炼，但我至今不悔，仍然十分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他那忠诚于党，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他那赤胆忠心、顾全大局、含冤无怨的宽阔胸怀；他那爱憎分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贵品质；他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格平老人的光辉业绩，熟悉他的老同志都从不同的侧面做了回顾。我想就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进一步揭示他老人家为人处事的革命原则和风范。

第一，宁愿辞职，也不能让山西人民遭难。1969年7月，我跟刘老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北京军区领导主持，陈华堂（原济南空军司令员）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参加会议。一天，陈司令员在楼道见了我问：“你是空军（我原在空军某航校任职）的，怎么跟着刘格平？”我说：“刘格平是北京军区政委，跟着他工作是组织上决定的，况且刘格平是忠于毛主席和支持毛主席的！”我觉得陈司令员的话里有话，就把他的话汇报给了刘老。刘老说：“总理让我写个检查，赶快继续回山西抓工作，被我谢绝了！”刘老接着说：“山西的问题在军队，我就是违心地写了检查，军队不支持，个别人老拆台，仍然搞不好，只会给山西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我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党中央、周总理。他们不是要权吗？给他们好了，我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我宁愿不当这个官，也不能让山西人民‘打派仗’遭难。”就这



样，会议结束后，军队和中央文革的人就把我们留在京西宾馆软禁了起来，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长达三个多月。直到“石家庄学习班”接受批判。在学习班不顾回民的风俗习惯，强令60多岁的刘老睡地铺，吃大锅饭，天天接受审查和批判，深秋还没穿上棉衣，受尽了屈辱和折磨。

第二，不走“后门”，送女儿到黑龙江建设兵团锻炼。在刘格平和丁磊的几个女儿中，刘老最喜欢和疼爱刘秀华，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初中刚毕业的秀华只有16岁，刘老就要把她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有点将信将疑，信的是根据刘老的一贯作风，让闺女不留城市，下放锻炼这样做不足为奇；疑的是秀华年纪这么小，不在上山下乡规定之列。我就问刘老，刘老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经风雨见世面是好事。秀华虽然不在上山下乡规定之内，并不是就不能上山下乡。”事后我才得知，建设兵团因秀华年纪小不符合规定，不予接收，是刘老让办公室和建设兵团交涉，要了一个名额，才成行的。秀华到兵团后，在刘老的关怀和鼓励下进步很快，四年时间，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令人痛心的是唐山大地震时，正在唐山看望接受劳动审查的父母和养病的秀华，不幸被地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第三，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山西人很少吃鱼。一天，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张怀英主任的爱人，拿了三条斤把重的鱼交给我说：“老家来人，给我们带了三条鱼，我家不吃鱼，也会做鱼，扔了怪可惜。怀英说：刘老爱吃鱼，你给他送去吧！”我连想都没想，接到鱼转手就交给了厨师老王，没想到惹起了一场风波。刘老就餐时见餐桌上有他爱吃的鱼，当即问哪来的鱼？王师傅就说是小梁拿来的，刘老说，小梁从哪弄来的鱼，王师傅就说三条鱼我也没问。刘老说：不是几条鱼的事，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小梁在太原又没有家，肯定是别人送的，无缘无故为什么给我送鱼，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一定问清楚，你把小梁叫来。我急忙赶到餐厅，把鱼的来龙去脉说清后，刘老才动筷子。

第四，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中共“九大”期间，我跟刘老在北京参加会议，一天，刘老让我到“鸿宾楼”买鱼，“鸿宾楼”革委会马主任听我的口音像外地人，就问我：“是哪的人？”我说：“山西人。”“山西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革委会主任你知道吗？”他又问我。“怎么，你认识刘主任？”我反问他。

“何止认识，十多年前，刘主任是我们鸿宾楼的常客，我就是给刘主任买鱼的。”“哎呀，你怎么不早说！”他显得十分激动：“我和刘主任是同乡，都是沧州和杨柳青那块的人。刘主任在津南名气大着呢，很多故事在我们那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如背叛地主家庭，离家寻求救国路；巧化妆，带领佃户到他自家吃大户，减租减息；舌战伪警，带领民众砸县衙；拒写悔过书，甘愿把牢底坐穿……”马主任的一席话，有的我知道，有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更增进了我对刘老的敬佩之情。他说：“请你给刘主任捎句话，说鸿宾楼的老人很想念他，欢迎他到鸿宾楼做客”。回到宾馆，我把马主任的这番话学给了他，他说：“马主任说的事有真也有假，一方面说明群众的利益连着民心，只要为老百姓办了好事，老百姓会记你一辈子，念你一辈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老百姓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强烈愿望。”

几件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犹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一样。从这些小事中可以反映出刘老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质。这种人格修养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而是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革命老人刘格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曾为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干部，后任北京军区政委刘格平军事秘书，受牵连被转业后到河南省老干部局任处长）



# 刘格平年谱（1904—1992年）

寻 觅 真 实 的 刘 格 平





### 1904年 诞生

8月8日 刘格平出生于河北沧县大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一个回族、地主家庭。父亲刘垣三，字云镜，大伯刘余三，字慧安，都为晚清文武秀才，是当地回族刘氏家族中的佼佼者；母亲姓史，出身盐山县狼坨子（现属黄骅市），渔业寨主家庭，勤俭持家，操劳一生。刘格平兄弟3人，其排行老三，大哥刘重霄，二哥刘济安。

### 1910年 6岁

入私塾读书，从师秀才王嵩高。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国文、算术等。身处偏僻农村的刘格平，学习之余从常年奔波在外的父亲和教书先生的交谈中，听到一些外边诸如光绪被困、慈禧病死、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之类的时事，知道了孙中山、袁世凯等名人，虽年幼听不明白，但心中有了一种新鲜感，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也随之产生。

### 1917年 13岁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刘格平就读的学校搬到村北围子里老叔新建的房子里。

### 1918年 14岁

8月 刘格平出走到了南京，被招兵分配到北洋直系军阀李纯的部队当兵，随后考入南京随营军事学校，主要学习数学、步兵操典、兵制学、兵器学、制图学、城建学、旗语学等功课。在校期间，刘格平与同班的迟麟贞、张鉴堂两个好朋友共同订阅《申报》、《东方》杂志，从中了解世界政治、经济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情况，开阔自己的眼界。不久被晋升为下士。

### 1919年 15岁

5月4日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波及南京。刘格平暗中组织军校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终因学校当局控制甚严，未能组织起集体行动。

### 1921年 17岁

年底 刘格平于军校毕业，被派遣到军阀部队任排长，他认为在军阀部队任职没有前途，毅然辞官不做，乘车去天津找二哥处（刘格平二哥刘济安当时在津浦铁路总局当会计）谋个职业。刘格平在谋职过程中，看到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穷苦百姓饥寒交迫，帝国主义在租借地横行霸道、欺压华人，使他对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陷入了深沉的苦思苦想之中。

### 1922年 18岁

1月 回到离别4年的家乡，和家人共度春节。

2月 回到天津在兰秀山办的补习学校学习深造。主要补习数学和英语，二哥刘济安又请了一位名士张皋如，为格平补习语文。在这期间，刘格平结识了常来学校找同学小于子的共产党员张隐韬，并从他们那里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及一些宣传苏俄的材料、小说，从中吸吮新知识，接受新思想，逐步认识到改造中国不能用改良方法，只有起来革命，像苏俄那样，无产阶级联合广大贫苦农民，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刘格平心中萌芽。

9月 经张隐韬介绍，刘格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一步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和党的刊物《向导》及一些油印的进步资料，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先的空想世界转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世界，彻底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

秋 与中共党员于方舟接头，深受教育鼓舞。

冬 受党团组织派遣，刘格平怀着激动的心情，肩负革命重担，回到堤东村开展革命活动，撒播革命火种。他利用冬闲时节，找一些青年佃户交谈，宣传革命道理，并首先发展了为人正直、有胆有识、有正义感的回回盐帮队领头



人的堂兄刘子芳，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不久，又发展了家境贫寒、自幼受苦、在回回盐帮手枪队任队长的同族哥哥刘景泉，和盐山县杨马连村的表弟王俊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使津南这块沉默的平原大地开始有了星星之火。

### 1923年 19岁

2月 在堤东村刘子芳家中，刘格平主持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堤东团支部，刘子芳任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

是月 刘格平通过工作，又在堤东村附近的北小庄（今名正道村，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发展了同门兄弟刘义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 经父亲安排，到盐山县接受韩世亭老先生赐教，博览群书。期间，仍坚持开展团支部活动。

4月 刘格平在北小庄和刘义元发展了韩殿奎、张殿奎、张树林、韩凤奎4人入团。同时，在刘格平主持下，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小庄团支部。经过艰苦工作，刘格平他们在大、小堤东又发展了王锡山、刘树林、张凤臣等十几人入团，这些同志全是回族青少年，其中有学生，有盐帮手枪队队员，也有长工、佃户的子弟。团的力量在逐步扩大加强。

10月 刘格平在王帽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建立了团小组。

11月 相继在韩石桥、杨石桥、王石桥、新县、挂甲林多地建立团小组，津南团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 1924年 20岁

春 刘格平父亲刘垣三为了维护其地主利益，想组织一支地方武装，求助于在“贿选总统”曹锟手下任交通总长的刘格平表兄吴毓麟。吴给直隶省长王承斌写信，以“组织民团防匪”为由要枪，结果王承斌送给刘垣三100支新进口的捷克造洋枪。这样再加上刘家原来看家护院的20多人和枪支，新组成百余人的民团，刘垣三自任“团总”。

11月 刘格平对家乡回族、地主武装民团的政治方向、训练进行了改造。并多次在庆云县（今属山东省）的杨庄子、尚唐，乐陵县（今属山东省）的三间堂等村，向教师、学生、贫苦农民宣传进步思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925年 21岁

**1月**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奉军入关，在沧县、泊镇各驻一旅，旅长为胡毓坤、张宪。与直系军阀是冤家对头的奉军，听说刘家民团枪支是通过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红人吴毓麟、王承斌搞来的，刘家便成了直奉矛盾的一个集中点，加之又听说刘格平通匪、窝匪、宣传“赤化”，遂进行报复。他们命令驻孟村的金营长率兵包围了大堤东村，砸了民团局子，缴了民团全部枪支，逮捕了刘格平和其大哥刘重霄。那天刘格平遵父母之命，与姑表妹杨依梅结婚，还未入洞房，即被抓走。哥俩先被押到孟村，后转押泊镇张宪旅部。为了救刘格平兄弟出狱，在其父刘云镜托南皮郝庄前清秀才郝和斋与律师单玉竹说情救人的同时，当地团组织在刘子芳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营救工作。他们通过各村团员，以刘格平父亲名义，发动成千上万群众，天天到沧县、泊镇等地请愿闹事，给张宪施加压力。通过努力和斗争，最后刘垣三变卖家产，凑了两万大洋，刘格平兄弟才被释放。

**2月** 党组织决定派刘格平到河南国民第二军开展兵运工作，并给他转了组织的介绍信。

**春** 面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占据天津、直下山东的奉军形成的对峙局面，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团结、推动国民第一、二、三军，反对奉军，把奉军赶出山海关，配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扫清封建军阀势力，壮大党的力量的任务，派遣一些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刘格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天津党组织派遣，来到河南开封。在开封，刘格平意外地见到了同样受党派遣来搞兵运的人团介绍人张隐韬，接上了关系。

**5~6月间** 刘格平到国民第二军二师三旅史可轩部工作，被任命为上尉副官。不久，张隐韬等共产党员也来到史可轩部，成立了军人俱乐部，和部队的党组织也接上了头。张隐韬和刘格平通过军人俱乐部等，深入联系下级官员，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期间，刘格平还到开封、郑州等部队中去进行活动。

**9月** 国民军决定攻打盘踞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张隐韬、刘格平分析局势后一致认为，国民军大部是由直系军队改编，未经改造，不可能成为革命武



装。决定利用时局动乱之机，组织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装，在天津举行暴动，与国民军一起攻打奉军。刘格平和张隐韬分别到天津和津南组织队伍。刘格平到天津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支持，并在津进行了人员、枪支等各方面的发动准备工作。随后，刘格平经北京转车回到新乡，与张隐韬互通了两地活动情况，对下一步活动进行了商议，决定在天津以南、胶济铁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建立武装，发展自己的工人武装力量。

10月 刘格平暗带副官和警卫员，化装再次进津，秘密对300余人的工人起义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里应外合，见机行动。在这次武装暴动中，刘格平任正指挥，天津地下党派负责工会工作的袁子贞协助刘格平工作，任副指挥。

12月23日 暴动开始，刘格平指挥全副武装的工人起义队伍，分乘几十辆汽车，冲入奉军防地。神兵天降，奉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大部被俘，余部逃往山东。经一天一夜激战，缴获奉军大批步枪、机枪、山炮、马匹，取得了战斗胜利。尽管全部战利品被国民一军第6六混成旅韩复榘部收去，但这次由共产党组织的工人武装，隐蔽于敌人心脏，出其不意，空中开花，打乱敌人阵脚，扼守住战略要冲——金刚桥、红桥，为国民军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较早的工人武装斗争。

### 1926年 22岁

1月 在津南建立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的张隐韬，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起义宣言。宣言震动北方各省，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下令通缉张隐韬，消灭自卫军。自卫军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此情况下，张隐韬给刘格平发电，让刘快去。天津党组织即派刘格平到自卫军协助工作。刘格平回到津南，去了庆云、旧县、盐山等地，查看了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并和张隐韬商定将队伍拉到天津，与移驻杨柳青的史可轩旅会合，以摆脱自卫军的困境。期间，时刻关心乡团工作的刘格平回了一次堤东村，看到团组织已经扩大，团员已经50多人，在他的提议下，建立了团工委，刘子芳任工委书记，王俊峰负责宣传，刘景泉负责组织，汉族青年长工马田任青年委员，将十几个团小组改为团支部，统一由团工委领导。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小组，由刘景泉负责。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2月3日** 随自卫军从旧县镇出发，先到寨子（今属南皮县），后转战南皮。

**2月4日** 自卫军经南皮向砖河开进，准备在砖河乘火车直开杨柳青。但张隐韬率大部队行至南皮城北徐庄附近，突遭国民第二军弓富魁部截击。带领骑兵特务队在后掩护的刘格平，急忙前来救援。但未经训练的特务队临阵慌乱，不听指挥，四处跑散，刘格平的坐骑也被打伤。刘格平举枪阻击国民军，掩护张隐韬进入附近村庄隐蔽后，随即进村躲藏。身穿便装、学生打扮的刘格平躲过了国民军的搜查，但身着军装的张隐韬却落入魔掌。

**2月5日** 为营救张隐韬，刘格平在砖河乘车到天津找到史可轩，汇报了自卫军被“围剿”失败、张隐韬被抓经过，请史救助。虽史给弓富魁下书命令放人，但为时已晚，张隐韬同志当日在盐山县旧县镇西门外被杀害，年仅24岁。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早期尝试，为以后党创建军队提供了可作历史鉴镜的经验教训。

**春** 吴佩孚背弃“讨奉”总旨，改“讨奉”为“讨冯”后，刘格平随史可轩转入豫东与吴佩孚军作战。

**5~6月间** 史可轩在河南豫东战败后，刘格平辗转回到天津。

**7月** 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介绍，刘格平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被介绍加入国民党。

**9月** 刘格平作为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派出的4个中共特派员兼国民党特派员之一，到津南开辟地下党的工作。他首先来到津南地区的最高学府直隶沧县第二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经过工作，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支书郝树模，支委王佩琪、曲作民，并发展了献县南宫村人戈本捷、沧县卢屯村人卢冠英等二中学生加入共产党。根据中共“三大”提出的共产党员可以跨党的决定，刘格平介绍郝树模、王佩琪、曲作民3人加入国民党，建立了第二中学国民党分部，郝树模为负责人。与此同时，刘格平在泊头镇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发展了南皮县郝庄人郝树芬、南皮县金庄人傅炳瑞、南皮县四角楼村人姜春田、东光县大息庄人息英俊、宁津县人刘宪圣、宁津县王家纸坊人王建文等加入共产党，成立了津南地区第二个共产党支部，郝树芬为



支部书记，傅炳瑞为支部委员。刘格平还回家乡堤东村，介绍团工委3名领导成员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创建了中共大堤东党支部。刘子芳任支部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接着又在北小庄（今正道村）建立了党支部，支书韩凤奎。归堤东党支部领导。

10月 刘格平到献县杜生村与共产党员刘清廉接上关系，领导其发展党员，建立了杜生村党支部，支书刘清廉。与此同时，刘格平与在北京入党的吴桥县莫家场青年知识分子莫子镇接上关系，建立了莫家场党支部，支书莫子镇。他还到故城县，与在天津入党回乡的知识青年周浩然接上关系，巡视了建立不久的周浩然任支书的十里铺党支部。又在刘清廉陪同下到河间张寺营，与在燕京大学入党、在张寺营任职的青年知识分子聂嘉乐接上关系，建立了河间县张寺营党支部，支书聂嘉乐。

11月 刘格平利用亲戚关系，在庆云县杨庄子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支书杨智荣（回族）。与此同时，在盐山县邸楼村，与在天津入党回乡的知识青年邸玉森接上关系，建立了邸楼村党支部，支书邸玉森。他还经过艰苦工作，相继建立丁庄子（今属孟村县）党支部，支书丁芝兰；宁津县长官村党支部，支书马全振；盐山县杨集党支部，支书张鉴堂；献县相国庄（今属沧县）党支部，支书毕玉章；沧县火车站党支部，支书吴根邦；并在盐山东关中学，建立了以杨德然为支书的团支部。鉴于津南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刘格平决定成立中央津南特委筹备委员会，由其和刘子芳、邸玉森、刘清廉4人负责，邸玉森兼秘书。待机会成熟，正式成立津南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和推动津南党的斗争进一步开展。

12月 刘格平回到天津，按照党组织安排，担任军委工作。在此同时，刘格平和于方舟等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接受任务。党组织派刘格平作为北方区和顺直省的军事代表去武汉国民政府联系军事及如何在直隶响应北伐军。接着刘格平南下武汉前回到津南，将临时特委的工作进行了安排：津浦铁路以西由刘清廉负责，邸玉森主管铁路以东的工作，刘子芳主要负责沧县东南一带的工作。这次刘格平经南京转乘轮船到达武汉进行革命活动，并在武昌成立了回民协会。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927年 23岁

1月 刘格平在武昌组织发起成立回民协会，支持北伐。

2月上旬 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刘格平在武汉经和一些同志研究，决定找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面谈。此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刘格平便带着国民党左派王励斋、相文蔚的介绍信，乘轮船、转火车来到南昌。在总司令部，蒋介石召见了刘格平谈了半个多小时，没什么结果，刘格平便写信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经党组织同意，从上海返回到天津。

3月 刘格平在天津汇报完工作回到津南，根据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把大堤东党支部升级为区委，创建了中共沧县堤东区委员会。刘子芳任区委书记，刘盛萼、刘景泉分别担任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随着津南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加强党的领导，刘格平以中共津南特派员的身份，在刘子芳家中主持召开会，建立了第一届中共津南特委。刘格平任书记，刘清廉负责组织，邸玉森负责宣传，刘子芳负责军事。特委确定的任务是：在津南发展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工农革命，促进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特委机关报为《红线》（油印小报），由刘格平亲自撰稿、刻写，油印出版后，秘密发送到津南各地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声音，加强党的宣传。在建立中共津南特委的同时，刘格平根据党组织分布情况，又建立了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书记刘清廉（兼）；庆云盐山县委，书记邸玉森（兼）；沧县县委，书记刘子芳（兼）。为开辟盐山与乐陵两县交界地区党的工作，建立了盐山杨马连工委，书记王俊峰；宁津城东工委，书记马全振。

6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也在北方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顺直临时省委6月在天津成立。刘格平调顺直临时省委做军委工作。杨天然（河南人）接任津南特委书记，由于情况不熟，口音不对，工作不便，月余调走，复由刘格平任津南特委书记。

7月 在天津建立了津南特委与省委的秘密联络站。

9月 刘格平与刘清廉、李怀才、聂嘉乐在河间缴台头、景和、沙河桥一带建立了一批党的支部、党小组和联络站，使这一带党的活动出现了活跃局



面。

10月 因连年干旱，庄家歉收，地主趁机高利盘剥，囤积居奇，加之苛捐杂税繁重，农民生活甚苦。为启发农民的觉悟，反对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津南特委在党的力量较强的献县发动、组织和领导了“借粮吃大户”斗争，由刘格平、刘清廉直接领导，在杜生村成立“借粮”指挥部。从10月开始，先后在老庄子、后郭旺屯、后张绍、周村等村发动农民向地主“借粮”，献县反动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刘清廉等人被捕（3个月后释放）。“借粮吃大户”斗争，是党领导的一次农民运动，它启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觉悟，暂时解除了群众的困境，虽遭镇压，但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

11月 中共津南特委根据顺直省委改造绿林武装的指示，开展了团结改造绿林武装的工作。刘格平利用回族或亲戚关系，先后到了庄子、大坟台等回族村庄地主土匪武装去做工作，最后研究决定将鲁北阳信高浪头村、号称“杨三阎王”的土匪武装作为改造对象。刘格平与刘子芳亲自找杨三做通工作，接受改编，命名为“津南革命军”，并派了杨智荣为党代表，为队伍制定了约法三章和革命纲领。队伍不断发展，后扩大到400余人，曾几次与驻山东的奉军作战。后因队伍内部头头内讧，互相火并，部分人恶习不改等原因，队伍被拉垮，历经5个月的改编土匪武装工作，遂告失败。

是年 刘格平在中共津南特委建立后，注重加强领导和团结各县党组织，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建立武装，积蓄力量，如中共沧县县委抓起了盐帮手枪队，中共献县、庆云县委分别着手建立秘密武装民兵和民团，进行土匪武装改造工作等等，为等待时机成熟，组织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 1928年 24岁

3月 根据顺直省委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庆云县委书记陈一新、龙王庙村党支部书记胡恒熙在庆云、盐山一带建立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攻占了庆云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奉军张宗昌部2000多人包围了庆云县城，激战3天，因陈一新立场动摇，暗中拉队伍逃跑（陈后投靠国民党）而失败。津南特委开除了陈一新的党籍，由胡恒熙任庆云、盐山两县县委书记。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6月 根据河间一带革命形势较好的情况，中共津南特委决定在河间沙河桥一带建立革命武装，刘格平带5位同志分头前往。但行至沧县直隶第二中学时，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密，刘格平第2次遭逮捕，被判刑3年。在沧县狱中，刘格平借胡恒熙来探监之机，指示胡负责津南特委工作，并利用常到狱中看望的沧县二中学生王连璧、尹逸鹤，了解二中的学生情况和做好外面的工作。后王、尹发展为后补党员。刘格平还发展狱警毛德兴加入了共产党。

### 1931年 27岁

6月 刘格平在沧县刑满出狱。出狱后，刘格平回到津南，把庆云、盐山、沧县东南成立一个县委，由胡恒熙任县委书记，王连璧担任组织，马芳村担任宣传，刘子芳担任军事。后刘格平又到庆云县、马村高小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9月 刘格平到天津寻找省委，得知中共河北省委已经转移北平，便乘车北上，找到省委，接上关系，写了有关资料，向省委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情况。

9月28日 按照党组织通知，参加了在北平故宫太和殿举行的抗日救亡集会和游行。

10~11月 中共河北省委派刘格平到山西、陕西做兵运工作。刘格平先到了山西解县、沁县的国民党第三军刘汝明部，发展其表叔李振翌为中共预备党员。后又到了晋城、运城、潼关等地，最后到西安。在西安，刘格平一面与杨虎城部联系，开展兵运工作，一面在回民中成立了读书会，表面上带课教文化、教常识，实际上讲形势，宣传进步思想。读书会不断扩大，会员大部分是人力车夫和中学、师范的师生，并和当地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 1932年 28岁

1月 刘格平联络陕西回民著名人士冯瑞生，组织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还在西安市东大街青年会成立“陕西回族青年读书会”。

2~3月 刘格平到陕西省大荔县冯钦哉部独立营开展兵运工作，并经常来往于西安、华阴、潼关等地，活动于杨虎城部冯钦哉师的吴勉之旅和景行之营，后通过关系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有了联系，再通过南与杨虎



城司令部联系。经过艰苦工作，兵运工作有所进展。

**4月12~13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到西安给各中等学校师生训话，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奢言抗日者杀勿赦”。刘格平趁机发动指挥学生开展了一场驱逐戴季陶运动，把戴季陶轰下讲台，赶出会场，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推动了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7月31日** 刘格平等在中山小学礼堂举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活动，遭到警察的干涉。加之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断派人加强西安省党部力量，西安情况变化很大，刘格平遂决定离开西安。

**8月下旬** 刘格平只身来到湖北汉口，旋即到鄂豫皖苏区寻找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向他们学习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因红军转移，寻找未果，遂返回北平。

**9月上旬** 刘格平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回津南工作。他和先期到达的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重新建立了津南特委，刘格平做军委工作，沈士敏做宣传工作，吴建华做组织工作，邸玉栋做交通。为了尽快恢复各地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各项斗争，经过特委积极工作和努力，先恢复了庆云、盐山、沧县等县委，后相继在乐陵、无棣、宁津等县建立了县委一级的工作委员会。

**9月中下旬** 刘格平主持召开了盐山、庆云、沧县等县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发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决议》的行动大纲，布置了发展党的组织、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创造苏区的任务。

**11月** 刘格平在高湾组建中共高湾区委员会。指定杨正泉任书记，傅仙坊为特派员。

### 1933年 29岁

**4月** 根据河北省委4月2日的指示信，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村沈士敏家中成立。廖华主持会议，组织分工是：书记俞思荣，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刘格平，宣传委员吴建华，青年委员贾树清，交通邸玉栋。会议确定刘格平、吴建华分别负责津浦路东、西各县党的工作。

**5月28日**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由刘格平、廖华、沈士敏等组织津南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18名党员去北平参加河北省委举办的地下干部训练班。会上，河北省委针对津南党发展迅速的形势决定：将中心县改为特委，原中心县委成员分工基本不变，仅是吴建华改为组织委员，刘格平改为军事兼宣传委员。因津浦路东党的工作量大，设津浦路东中心县委，又名盐（山）庆（云）中心县委。始由刘格平负责，后由胡恒熙任书记。

**8月** 刘格平在盐山西隅刘玉章梨园主持召开津浦路东中心县委成员和部分党支部书记会议，要求继续组织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反对苛捐杂税；根据红军经验，各县建军委，抓武装，搞武装暴动。

**9月** 刘格平介绍无棣县五营村冯景恩（回族）入党，建立了无棣县第一个党支部。

**10月** 建立了中共无棣县活动分子委员会。

### 1934年 30岁

**4月** 庆云县国民党政府私吞马颊河修河公款后，又向群众重征修河款，勒令农民出工毁麦田挖河，群众怨声载道，愤怒至极，拒不上工。刘格平和中共庆云县委趁机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抗暴政、抗河工、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

**4月16日** 刘格平等30多人在庆云县城东区张家村召开县委扩大会，分析了形式，研究了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问题，决定公开号召群众反抗，做出了4月18日在庆云城东北东林庙会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的决定，并用散发鸡毛信的方式进行联络。

**18日** 庆云县反动当局为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先后逮捕了中共庆云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和县委书记胡恒熙，并且包围了东林庙会群众大会会场。刘格平、胡林晓等借戏台讲演，揭露反动政府的罪状，发动群众，向县城进发，举行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志。两万多群众的义愤填膺，最终迫使县长签字画押，答应了请愿条件，释放了胡恒熙、张笃骞二同志，抗河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9日** 胡恒熙组织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会后到马颊河工地游行，缴了警察的枪，痛打分局长，并宣布第二天在严家务召开大会的决定。当日晚，刘格平等人召集区以上党员负责人开会，决定借机进行武装暴动，建立苏区。



20日 严家务集上群众大会刚开始，就遭到全副武装反动军警的镇压。刘格平等指挥组织群众快速疏散，敌人对群众开枪射击，穷追不舍，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3人被击伤，刘格平、胡恒熙等17名党团员和斗争积极分子相继被捕，连夜被押往县城，分别关押在县公安局和县监狱。不久，被捕的刘格平等人被当局押解至北平，关进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监狱。在监狱里，刘格平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和电刑。但他和一起被捕的同志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坚贞不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与反动当局展开了英勇斗争。

6月 刘格平等被当局转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看守所，被关押一年多后，在北平分会撤走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刘格平以政治犯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8月 刘格平等又被转送北平市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他们继续进行狱中斗争。不久，他们又被转押进北平第一监狱，继续服刑。

#### 1935年 31岁

1~9月 刘格平被判刑后，被送至北平陆军监狱服刑。他和狱中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团结政治犯，发动普通刑事犯，和监狱当局开展斗争。为了争取改善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反对虐待犯人，刘格平和临时党支部领导开展了绝食斗争，迫使当局同意了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10~12月 刘格平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

#### 1936年 32岁

1~12月 刘格平被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继续服刑，他和监狱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担任北监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和政治犯紧紧团结在一起，带领政治犯一面同监狱当局开展斗争，一面利用狱中时光，加强政治学习，既学习党的文件，又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外文等，不断提高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为将来出狱能适应革命工作需要作准备、打基础。

#### 1937年 33岁

春 根据抗日斗争发展形势，刘格平和政治犯为争取出狱参加抗日以及提高狱中生活，同监狱当局再次开展斗争，并进行了绝食，迫使当局答应了部分条件。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8月**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格平等政治犯又被转送北平市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他们继续进行争取出狱斗争。不久，他们又被转押北平第一监狱，继续服刑。

### 1939年 35岁

**1~12月** 刘格平刑期由15年减为10年。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深陷囹圄，心系抗战，时刻关心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战况，坚定胜利信心，积极开展争取教育进步看守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加紧学习，锻炼身体，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多做工作。

### 1944年 40岁

**4月** 刘格平刑满出狱，回到天津二哥刘济安家。在二哥安排下，住在一位同情革命姓董的保长家中，悄悄寻找党组织开展活动。

**5月初** 离开天津，返回津南。他先回到堤东村，后和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取得联系，并遵照中共渤海区党委指示，在回民支队护送下，乘船到达驻在利津县境内的区党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恢复了党籍。

**8月** 为了开展大城市工作，根据中共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刘格平回到天津，成立了中共渤海区党委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任书记，深入学校、医院和小商贩、洋车夫中团结、发展进步势力，吸收了个别党员。还组织了以刘格平为主任的“天津市救国会”，以读书、办刊物等形式影响和联系进步学生、工人及周围的群众，并分批护送天津青年学生和统战人士去渤海解放区学习，为在敌后开展天津党的地下工作培养了力量。

**10月下旬** 根据渤海区党委指示，刘格平回到渤海敌后解放区工作。

**年底** 刘格平奉命调中共山东分局工作。

### 1945年 41岁

**春** 刘格平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学习、整风。

**7月13日** 渤海各村、区、县人民进行复选，选出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予选人向选举大会报告自己可以被选为代表的条件及其斗争历史。选举结果：刘格平、张永逊、张奎炳、于勋臣、刘冠甲、李洪洲、齐燕铭、傅炳翰等8人为正式代表；朱永顺、辛霞舟、马千里等3人为候补代表。其中代表



刘格平的简历是：“沧县人，是津南回民最爱戴的革命领袖，1934年领导津南人民罢河工斗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4年脱狱。”代表们于14日启程赴延。由于路途遥远和国民党当局的封锁阻拦，代表们未能抵达延安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8月下旬** 学习、整风结业后，刘格平受命组织建立了山东回民协会，并担任回民协会主任。

**9月** 根据中共华东局决定，刘格平被任命为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

### 1946年 42岁

**6~7月间** 受中共华东局派遣，刘格平前往渤海区指导镇压敌特工作，在去渤海路过禹城县、商河县时，审查、处决了一批敌特分子，镇压了敌特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对敌特斗争的开展。

**9~10月** 中共华东局派刘格平去鲁中三地委指导镇压敌特工作。他深入敌特活动严重的潍县镇压处决证据确凿的特务，加强民兵建设和县区队联防，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打击震慑了敌特。其做法被推广到附近各县。

**10月4日** 刘格平翻印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延安出版发行，他为该书写了引言。

### 1947年 43岁

**春** 刘格平从鲁中回到中共中央华东局。

**7月** 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和上级战略决策，刘格平随华东局机关转移至中共渤海区党委驻地——黄河以北惠民一带。

**10月10日** 在党组织的关心下，与1942年初参加革命、1944年1月入党的回族姑娘丁磊结婚，终生相爱为伴。

**10月中旬~11月** 刘格平参加了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并被中共华东局任命为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城工部部长。期间，刘格平深入渤海1分区，布置领导参军运动，短时间内超额完成任务，共有1.6万人入伍，为华野大军补充了兵源。

### 1948年 44岁

**夏** 中共渤海区党委派刘格平到1分区纠正在整党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搬石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头”、“扫地出门”等“左”的倾向，帮助恢复农村政权、党团和各种群众组织，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8月** 刘格平被任命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11~12月** 华东局为贯彻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召开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所属各区党委组织安排问题。会议要求每一个战略区抽调干部各组成一套区党委的机构（包括党政军民各机关）和下属若干个地、县、区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架子随军南下。要求渤海区除组建一个区党委的架子外，另组建4个地委的架子。渤海区党委内定刘格平等5人组成南下区党委，负责筹备组建一个区党委班子及各地委班子。按照序列，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

### 1949年 45岁

**2月**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正式成立，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治委员。原则上各地委南下干部分别组成大队，配备地专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大队下辖若干中队，各配备一套县级干部；中队下辖若干分队，各配备一套区级干部。全支队共4526人。

**3月上旬** 刘格平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第三支队所属二、三、四大队奉命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们经济南、泰安、曲阜抵达华东局党校所在地鲁南临城沙沟，和先期到达的一大队汇合，集中进行整训学习。在党校，全体南下干部除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文件、决定，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外，还倾听了饶漱石、刘瑞龙、刘格平、周贯五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在学习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自觉性，为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工作打坚实基础。

**4月上旬** 整训完毕，刘格平等率队伍继续南下，乘火车经藤县到陇海铁路新安镇车站，为保证和解放大军一同过江，队伍步行向南疾进，经沭阳，到淮阴，过淮安，奔扬州，直扑长江边。

**21日** 刘格平等率渤海区南下干部支队各大队，先后连夜随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奉命开赴丹阳。

**22日** 在丹阳，华东局领导同志向刘格平等传达了成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的决定，任命刘格平为副校长，学校组建工作主要由刘格平负责。

5月上旬 刘格平率部乘火车到达苏州城北的陆墓镇。

中旬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陆墓镇宣布正式成立。

6月 上海解放后，刘格平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陆墓镇迁入上海，开始招生。经过考试，第一批招生5000余人。

8月上旬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开学，学员入校，注册报到。

下旬 刘格平接中央通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刘格平是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并且参加了主席团，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25日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程序，由各单位代表发言。刘格平作为执行主席之一，和谭平山、刘伯承、蔡畅、董必武共同主持了当天的会议。

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刘格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发了言，表达了少数民族代表们的共同心声。毛泽东主席见到刘格平风趣地称他是回族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问他吃不吃大肉？刘格平说：“不吃，是习惯问题。”毛主席连声说好，要注意保持回民的生活习惯，允许我们的回族共产党员不吃大肉。

10月1日 刘格平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

1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刘格平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 1950年 46岁

1月初 刘格平率中央民委工作组赴山东回族聚居区了解回民生产、教育情况。

2月1日 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研究班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副主席、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和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到会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民族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策，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

**4月30日** 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研究班结业典礼上，林伯渠、乌兰夫、刘格平到会讲了话。

**6月10日** 中共中央转发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目前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宗教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

**6月1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展开，期间刘格平与毛泽东主席相遇。毛主席即热情地问道：“首席代表先生，这次有劳你了，准备得如何呀？”因为刘格平在参加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曾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的身份做过大会发言，所以毛主席这样风趣地称呼他。刘格平知道毛主席说的是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这件事，他向毛主席表示一切都准备的很充分。会议闭幕时，毛主席接见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及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副主任，他听取了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方面的汇报及刘格平关于访问团的准备情况汇报，并作了有关指示。

**7月2日** 刘格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派，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团团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率访问团离京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出发前，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为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送西南访问团》的社论。由120余人组成的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分3个分团，历时7个月，访问了云南、西康、四川、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各民族的关怀，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旧社会所遭受的痛苦给予了深切慰问，还征求了对中央各项政策的意见，融洽、增进了民族间的关系，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18日** 刘格平率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达重庆市，受到西南区各部门负责同志热烈欢迎。当晚，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亲切见面，并应邀参加即将召开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

**20日** 在下午召开的访问团团员大会上，刘格平做了动员报告。晚上召开



了记者招待会，刘格平介绍了访问团的任务和方针政策等问题。

27日 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召开，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8月9日 刘格平率访问团1分团到达成都，对四川、西康进行访问。

12日 成都市千余名回民在清真寺召开欢迎会，欢迎访问团到来。刘格平率领代表20余人参加，并赠送中央领导同志题字一套、毛主席纪念章40枚。

17日 刘格平率访问团到达当时西康省政府所在地雅安。

23日 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到西康军区司令部参加中共西康省委会议。

9月3日 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继续参加中共西康省委会议，主要讨论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自治问题，并具体研究讨论了在当时西康省所属的藏族地区建立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步骤及具体问题。

7日 刘格平到中共西康省委开会，讨论西康、康定两个地区的工作问题。

12日 刘格平率访问团到达泸定。

15日 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人6次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并摄影留念；还分别接见了机关团体代表和工商业代表。

23日 刘格平率访问团在康定活动，受到康定地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10月8日 刘格平率部分访问团成员出发到甘孜一线进行访问。

21日 经过10余天的访问，刘格平等从甘孜回到康定。

11月21日 西康省康定藏族自治州代表会议在康定山城隆重召开，刘格平等领导同志讲话祝贺，各族代表也都发了言（1955年以后，根据行政地位，康定藏族自治州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

12月1日 刘格平率访问团离开康定，向西昌进发。

18日 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刘格平率访问团到达西昌。

19日 刘格平参加了西昌专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议。

21日 上午，刘格平参加彝族及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向代表们进行了慰问，并集体合影留念；晚上，又参加中共西昌地委会，研究西昌专区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25~31日 西昌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刘格平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大会讨论研究了区域自治、联合政府和剿匪反霸等问题，通过了当地政府委员名单、几项决议和致敬电，宣布了西昌专区联合政府的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 1951年 47岁

1月9日 刘格平率团到达昭觉。

17日 刘格平率10余人离开昭觉，先期返回西昌，访问团1分团其他同志继续在彝族聚居的昭觉等县访问。

22日 应中共中央西南局邀请，刘格平乘飞机经昆明到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

2月 刘格平从重庆到昆明，会合访问团二分团同志，一起在云南进行访问。后又乘汽车到达贵阳，同三分团一起，在贵州进行访问。

3月 一、三两个分团会合，同乘汽车抵长沙，换乘火车返京。因刘格平急于回京开会，遂乘飞机先期到京。访问团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做了详细的工作汇报和总结。毛泽东主席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是成功的。”

10月12日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副主任委员。

12月14~31日 中央民委召开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董必武、刘格平、乌兰夫、李维汉都作了报告。刘格平的报告题目为《两年来的民族工作》。

### 1952年 48岁

2月 中共中央任命刘格平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刘格平被评定为行政3级。

7月 刘格平奉毛泽东主席派遣，与习仲勋专程赴新疆，帮助中共新疆分局处理民族问题及其他有关工作问题。

8月5日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闭幕。会议先后听取了习仲勋、刘格平、张邦英、包尔汉等同志的报告，并通过有关的决议。刘格平所作报告题目为《关于宗教问题、军队生产问题、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财经建设问题、文教工作问题的报告》。



14日 刘格平在西安为西北军区作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民族工作的4个特征、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怎样开展民族工作以及几个民族政策问题等。

9月9日 刘格平在中央民委机关作整党工作报告，就如何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检查思想，改造世界观提出要求。

11月20日 刘格平在广州参加民族工作座谈会，并对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民族之间的关系、区域自治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24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民族工作会议，刘格平到会作民族政策的报告。

年底 刘格平受中共中央派遣，赴广东、广西等地传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考察了民族工作情况。

#### 1953年 49岁

1月7日 刘格平就凉山工作问题作了讲话，并就干部的培养、娃子（奴隶）问题、文字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5月14日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刘格平当选为主任。他深入回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回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举办回族历史展览，调解处理政府难以解决的回族内部问题，编写中华回族历史。

是年 刘格平担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

#### 1954年 50岁

5月20日 政务院第217次会议，批准刘格平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953年完成的几项主要工作和1954年工作要点报告》。

9月15~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格平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10~12月 全国人大民委抽调部分驻会委员来京工作，并抽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及工作人员，组成秘书、法案和调查研究3个组，开始办公，首先开始起草民族区域自治要点（即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 1955年 51岁

3月9日 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任命刘格平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3月12日** 刘格平受毛泽东主席委托，陪同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达赖·丹增嘉措，到西南参观，最后送至成都，达赖一行返藏。一路上，刘格平结合参观实际，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共同进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殷切期望。

**4月** 刘格平从成都送走达赖以后，即带领全国人大民委工作组到昆明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社会调查，并同云南省委工作组共同在德宏傣族地区进行了和平协商土改试点，取得了成功，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得到中央的肯定。

**下半年** 刘格平到四川甘孜藏区进行调查，并协助四川省委共同研究四川藏区有关民族政策、土改等问题。

### 1956年 52岁

**春** 刘格平领导全国人大民委修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要点草稿。经过在全国第一届人大民委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后，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征求意见。

**3月** 彭真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苏和刘格平及全国人大民委其他同志，传达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刘格平在民族工作中的成绩，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刘格平参与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政策贯彻最正常，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6月** 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民委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和地方民族学院领导、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研究了调查的组织、计划和调查提纲。

**9月15~27日** 刘格平被评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八大会议，并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

**9月28日**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刘格平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组成中央慰问团，由王维舟为团长，刘格平等为副团长，前往四川、云南藏、彝地区进行访问。慰问团在川期间，刘



格平代表中央统战部与四川省委、甘孜州委就一些政策性问题交换了意见。慰问团工作结束后，刘格平及所带领的工作组和四川省委派的工作组在甘孜县藏族农村进行了土改试点，直到第二年春初返京。

### 1957年 53岁

**春** 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四川藏、彝区工作问题，刘格平参加会议，并向会议汇报了慰问团等有关情况，中央就有关政策问题发了文件。

**3月**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刘格平前往云南昆明迎接来华访问的缅甸议长，并陪同到重庆。然后告别议长，到兰州调查民族工作。

**4月** 中央委托刘格平主持筹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与中共甘肃省委共同研究回族自治区区划问题，并召集甘肃省各界代表人士对区划问题进行座谈，征求意见。然后到拟划入自治区的银川地区、吴忠回族自治区和西（吉）海（原）固（原）回族自治区及所属各县进行考察、座谈和征求意见。最后经西安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

**5月** 刘格平在京主持修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要点；研究起草和修改中央统战部民族工作规划等（因为全国“左”的思潮逐渐加重，在中央统战部一次部务会议讨论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要点起草工作暂停进行）。

**6月3日** 全国政协常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常委、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士座谈，大家同意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方案。刘格平参加了这次会议。

**6月5日** 在京各界回族代表举行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座谈会，刘格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政协扩大会议讨论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情况介绍，会上一致拥护建立回族自治区。

**6月27日~7月16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7月6日** 全国人大民委举行扩大会议，审议了乌兰夫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7月12日** 全国人大民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刘格平主任委员作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的审查报告》。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7月15日**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北京市民政局邀请在京各界回族代表1700多人举行联欢会，庆祝全国人大通过成立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刘格平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

**7月末** 刘格平到青岛参加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重要讲话。

### 1958年 54岁

**年初** 刘格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并担任了筹委会主任。

**8月2日** 在庆贺包头——兰州铁路接轨和临时通车的大会上，刘格平发表讲话，庆贺包兰铁路的建成，并向建设包兰铁路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铁道部第1工程局职工表示谢意和致敬。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银川市举行庆祝大会。刘格平在大会上讲话。

**10月23日** 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亲临银川参加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刘格平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和宁夏各族人民致欢迎词，并表示感谢。

**10月24日**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就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意义，刘格平对《宁夏日报》记者发表题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的谈话，并在《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10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刘格平当选为第一届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10月29日**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格平作了题为《苦干3年改变宁夏面貌》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宁夏地区的基本情况，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10月30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刘格平致闭幕词。

### 1959年 55岁

**4月18~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格平当选



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10月2日 《宁夏日报》全文发表刘格平在银川庆祝建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0月25日 《宁夏日报》发表刘格平《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一文。文章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基本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总结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一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号召宁夏人民团结起来，艰苦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10月27日 在全区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刘格平作了题为《为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今年跃进计划而奋斗》的讲话，回顾了取得的成就，总结了经验，并确定了今年各条战线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是年 刘格平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届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关于工业建设中党的领导和分工负责制问题；二、关于城市支援农业问题；三、关于自治区工业发展方向问题；四、关于依靠现有工业帮助新厂建设问题；五、关于抓好工业薄弱环节问题；六、关于做好外地支援自治区工厂、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七、党委、人大委员会各部门及时处理文件、信件，防止拖拉拖转问题；八、党的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问题；九、各单位关心干部生活问题；十、县委以上干部抓学习，防止陷入事务圈子问题；十一、关于民族问题。

#### 1960年 56岁

1月1日 刘格平在《宁夏日报》发表新年贺信，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人大委员会向全区各族人民恭贺新年，祝全区人民新年愉快，在过去一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群策群力，争取更大更好成绩。

1月27日 《宁夏日报》全文刊登刘格平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委向全区各族人民致的新春贺词，祝全区人民新春满堂红，夺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粮贸易、文教卫生、科学等各条战线的新胜利。

3月6日 刘格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办好工矿企业》的报告。报告共讲了7个问题：一、工业企业中党的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领导问题；二、城市和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三、自治区工业发展方向问题；四、依靠现有工业来帮助地方新建厂子的问题；五、做好外地来宁的工厂、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安排工作问题；六、关于工业生产问题；七、党的民族政策问题。

**3月1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银川召开，刘格平致开幕词。

**5月** 宁夏刮起了一股“反地方民族主义”之风，强加给刘格平的罪名是搞“独立王国”，把群众活动广场上的仿古门楼式的主席台蔑称刘家的“小天安门”，把倡导民族服饰、民族文化等等都蔑为地方民族主义。刘格平首当其冲，被停止工作轮番批斗。有上千名“回回圈”、“亲戚圈”被牵连，大部分人员挨整下放，个别被监督劳动或判刑入狱。直至1970年初，此案才经中共中央批准，彻底平反。

**10月**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刘格平由宁夏调回北京进入中央高级党校自修。刘格平没有因为被诬陷、批斗和调离工作岗位而消沉，他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摘抄和撰写了数万字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 1965年 61岁

**春** 刘格平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化名刘木，受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遣，参加河南省新乡地区的“四清”工作，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坚持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驻地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秋** 中央任命刘格平为山西省副省长。

**12月** 刘格平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往晋东南沁县农村开展“四清”工作。除了省上开会暂回太原，坚持扑下身子和社员群众学习、生活、劳动在一起。

### 1966年 62岁

**夏**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动了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6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向全国广播了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此鼓动下，北京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破“四旧”，横扫“牛、



鬼、蛇、神”。8月7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号召要把运动推向全国，发动群众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的反。在农村进行“四清”工作的刘格平，对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和活动不知底细，对于运动的全局更不了解，觉得自己是在宁夏挨过整、受过批斗的人，还是远离运动的旋涡为好。

**11月24日** 《中共中央电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此件在有关人士和红卫兵中很快传开。

**12月初** 来太原串联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找到刘格平，给刘格平带来了几张30年前的国民党报纸影印件，报上登着几个《反共启事》，总共有61个人的签名，问刘格平认不认得，想找他来求证。刘格平看到报纸感到漠然，他从来没看到过这些报纸！报上签的名字，他有的认识，但大多数不认识，可以肯定都是当时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于这件事，刘格平只是遵照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给中央写信报告了自己当年入狱、出狱的前后过程，决定对前来调查的红卫兵“内外有别”，只是对红卫兵早已知道的化名和实名的名单做了确认，他告诉学生们这可能是国民党的骗局，其他什么都不说。

**中旬** 时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来电话，通知刘格平马上来北京，说周恩来总理有要事需要和你当面谈。刘格平还想多问几句，但康生已放下电话，于是刘格平就喊妻子丁磊准备起程，急匆匆赶往北京。到了北京有人接站，直接送他们到招待所住下，让他们等待通知。之后，听说红卫兵和中央把薄一波、安子文等61个同志定性为叛徒，这和刘格平并无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证明了他没有在《反共启事》上签名。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对党的忠诚，支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

**12月23日** 刘格平在招待所守着电话机足足等了一个星期，这天下午接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到通知，说周恩来总理接见，叫他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到了大会堂也是先让等着，直到快半夜了才叫刘格平。进到小会客厅，他见到周总理及中央文革成员共十几个人。当时，周总理和刘格平虽说已多年没见，可也顾不得说多余的话：“因为事情太多，我就长话短说，毛主席叫你站出来。山西省委已经瘫痪，山西已经乱了，问题很严重。你赶快回山西，成立一个小组，找一些没被打倒的干部组成一个班子，把山西的工作管起来。要抓经济，山西的煤炭很重要，要抓煤炭，抓经济。”刘格平说：“我的情况您知道，到山西工作时间不长，这么大的事情，我干不好。”周总理说：“不要紧，毛主席支持你，中央文革支持你，我们支持你。你回去大胆工作。”周总理又接待其他人去了。刘格平和妻子丁磊于5日匆匆返回太原。

1967年 63岁

**1月上旬** 刘格平认为自己光杆一个，对山西又不熟悉，如何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他考虑必须首先联系副省长刘贯一。刘贯一听刘格平介绍了去北京的过程，感到山西的运动将会由无政府状态走入正常，他建议找一找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后来又联系了陈守中、刘志兰夫妇，商量如何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此时，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得到上面指令，让省军区支持刘格平，张日清主动找到刘格平联系“支左”问题。以上五位，被群众组织称为“五人小组”。

**1月10日** 刘格平召集“五人小组”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成员有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等。刘志兰任刘格平办公室主任。

**1月12日凌晨** 太原的几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夺了省委、省政府和公检法的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上午开会，得知山西省军区张日清政委和有的驻军支持了夺权，研究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问题。当晚，太原几个较大的群组织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起草和呈报了“山西革命造反总部指挥部一号通告”。

**1月24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1号通告，表示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



**2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并同意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刘贯一兼秘书长，刘志兰兼副秘书长。当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告夺权胜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驻晋第二十一军等部队也声明支持省城群众组织的夺权行动。后因第二十一军调往陕西，第六十九军进驻山西，增补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

**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批示了山西省军区张日清政委给中央军委《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报告。28日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红旗》杂志第4期，全文刊登了张日清的报告。以表示中共中央对刘格平为主任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支持。

**3月1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正式批准了山西省造反派组织的夺权，成为继上海市1月夺权后，成立的又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主要是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主任是刘格平。其他成员除几位老干部又增加了各军兵种的领导，还有著名的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和各地市有关知名人士，以及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革委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

**4月** 经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刘格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毛主席和刘格平、陈永贵握手留影，询问了山西“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刘格平简要作了汇报。

**6月** 山西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总趋势已经形成，以刘格平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的信任与支持。但由于驻军有关单位对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观点分歧，群众组织之间越来越对立。山西多地已有武斗发生，尤其是晋东南最厉害，军队的枪支流入社会，有的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

**7月** 中央为稳定山西局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了“七月会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以刘格平为代表的山西革委会成员、各地区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以及主要群众组织头头。会议肯定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批评有关同志不支持刘格平、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会议重点议题是肯定成绩，稳定局势，坚定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

**8月** 刘格平在太原接待越南英雄代表团一行访问参观。

**10月** 刘格平在太原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阿利雅一行，并陪同代表团前往大寨参观访问。

**11月7日** 经毛泽东主席批阅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文，以中共中央“中发（67）号文件”转发全国。刘格平接到此件，向陈永贵了解此件产生的经过，并立即通过各种媒体传达到山西省农村每个角落。他认为此件可以把农村基层干部从“批倒”、“批臭”中迅速解放出来，狠抓了各级党政组织的贯彻执行，稳定了当时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局。

### 1968年 64岁

**3月19日** 在太原五一广场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讲话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同时提出坚决支持以刘格平为核心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为此，一派群众组织有些人气得把麦克风砸了，会场大乱，刘格平和陈永贵被围在台上3个小时，最后第六十九军派部队才把他们解救出来。

**5月16日** 中央第四次召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进京开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和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参加，接见山西省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听取了刘格平的汇报，到会领导不断插话，批评张日清不支持刘格平。周总理在会上指示：“要求刘格平、张日清两人谈心，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9月28日** 在周总理批评、督促下，刘格平、张日清都写了书面检讨，在北京办了5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返回太原。陈永贵在北京只参加了20天的学习，即回昔阳、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之后，刘格平带领工作组深入太



原、阳泉、晋中、晋东南各地的两派群众组织，开展谈心活动，促进“三结合”、“大联合”。

10月 支持张日清一派的群众组织，发现陈永贵站到了刘格平一边，便借着大寨展览馆陈列着陈永贵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扣押过的经历，称陈永贵当过伪代表，是汉奸、叛徒，还造谣说陈永贵是河南逃亡地主。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怀英是陈永贵当年入党所在的区委书记，对陈的历史做过反复调查和审核，立即向核心小组的刘格平、谢振华等成员作了汇报，证明陈永贵的历史没有问题，洗清了泼在陈永贵头上的脏水。刘格平的心里有了数，同意和支持陈永贵在中共昔阳县代表会上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

12月 李雪峰、刘子厚、郑维山带领河北省军区驻冀部队的有关领导干部到大寨参观，刘格平一路陪同，并介绍昔阳县及大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还对陈永贵说：“我看到了张怀英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写的有关你历史问题的材料，有人给你戴汉奸、叛徒、逃亡地主的帽子，纯属捏造。身正不怕影子斜。不用理那些谣言，好好在昔阳抓农业生产！”

#### 1969年 65岁

4月初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格平、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为中央后补委员。

7月23日 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绝执行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交械，打砸抢者法办。”此布告，毛主席签写了“照办”二字。陈伯达、王洪文和中央文革成员等认定山西大联合搞不好的根子在刘格平和张日清。便把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上万名干部和群众调到石家庄办学习班，林彪、陈伯达、王洪文等亲自主持，学习班实行军代表管理，强制性地对刘格平进行了数月批判和斗争。安排第六十九军代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曹中南和陈永贵为副手。

#### 1970年 66岁

夏 刘格平被林彪、陈伯达以“反军乱军”、搞“个人崇拜”等莫须有的罪名解除所担任的党政军一切职务，下放到河北省唐山市陶瓷厂劳动改造。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中央文革”还设立了专案组继续对刘格平进行审查。

9月 刘格平被化名刘方，丁磊被化名丁石，一起把家搬到了唐山陶瓷3厂劳动改造。刘格平、丁磊对于上班劳动十分认真，每天准时到车间干活。虽然住处和行动，受到不明底细保卫干部的监管，但车间干部和年轻工人对年逾花甲的刘格平，仍然非常尊重和关照。近6年间，刘格平夫妇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 1975年 71岁

春 由于连续数年精神和艰苦生活条件的折磨，以及劳动的艰辛，刘格平的身体越来越差，患青光眼在唐山工人医院做了手术。他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病情越来越重，工人医院怀疑他患了癌症，建议回北京诊治。他向中央提出申请，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刘格平才回到北京治疗。因北京已没有他们的住房，只好住进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一住就是12年。

### 1976年 72岁

7月28日 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罹难者中就有刘格平的女儿刘秀华。当夜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和秀华睡在一起，丁磊被地震震下床来，头部被大衣柜扣住受伤而大难不死，女儿却被结结实实压在废墟中，不幸遇难。刘格平当时正在北京治病，逃过一劫。但是失去了刚25岁、风华正茂的女儿，失去了他心爱的藏书及大量读书笔记和有关文献资料。刘格平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达。

10月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审查刘格平的专案组。

12月底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刘格平被解除审查、劳动改造，全家返回北京，等待分配。

### 1980年 76岁

刘格平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接见和看望他所熟悉的乌兰夫、习仲勋、谷牧、陈永贵、费孝通、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马文瑞、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钱正英、杨拯民等一批



老干部、老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了思想交流。在此同时，他不仅挤时间回忆和撰写了于方舟、张隐韬烈士与李锡九、胡恒熙等同志的传略，和他本人参加革命28年的战斗历程回忆文章，还为沧州地区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供了大量党史和文献资料。在刘格平逝世后，由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把他的这些手稿，整理编纂成30多万字的《刘格平文集》，于1999年9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 1981年 79岁

5月 在著名史学家、教授白寿彝等诤友的劝解和敦促下，刘格平向中共中央写出了1.6万多字的《我的申诉和请求》，呈送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此件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涉及刘格平主要问题的脉络和刘格平的思想认识及所受的冤屈。

#### 1982年 78岁

冬 刘格平突然便血，在乌兰夫、习仲勋的关怀和帮助下，刘格平住进了北京医院。刘格平和乌兰夫是两位资深的少数民族干部，两人经历、命运相仿，渊源深厚，相互关心，相会与交谈场景感人。刘格平经仔细检查，终于查清肠里有息肉，手术顺利，清除了隐患。

#### 1983年 79岁

2月初 经中共中央组织审查结论：刘格平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顾全大局，“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中央决定提名刘格平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童小鹏受乌兰夫委托与刘格平谈话，表达了组织上对刘格平的信任与关怀。

6月4~22日 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格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 1984年 80岁

刘格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开始走上正规和正常。他除按照政协的安排参加一些会议和社会活动外，坚持在家看文件、看书和练习书法及接待朋友、群众来访。

#### 1989年 85岁

9月19日 刘格平深入到河北省沧州地区部分县、市视察。在孟村回族自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治县听取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就粮食生产、农业经济布局、搞好党风建设、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1992年 88岁

3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之一，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格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

2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的遗体按回族习俗在他的故乡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安葬。

29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宁夏日报》和《中国穆斯林》杂志等报刊，报道了刘格平逝世和安葬的消息。消息称：刘格平是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他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努力工作，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勇于奉献，忠于党和人民，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为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郭爱伶 陈瑾 整理）



# 后记

## AFTERWORD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征集资料、查阅档案、调查走访、确定提纲、认真撰写，十易其稿，《寻觅真实的刘格平》一书终于经中国发展出版社审编出版了。该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深挖的第一手资料和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洗刷了曾经涂抹在刘格平身上的污泥浊水，向人们展示了一位真实的刘格平，一位回民领袖刘格平，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刘格平，一个卓越的党的民族工作领导者刘格平，一个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刘格平。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是由宁杨锁（著名民营企业家、现任甘肃省晋商商业联合会会长）筹资发起，喻俊民（曾任中共山西省永济县委宣传部长、永济市电力开发公司经理）搜集和征编历史资料及进行通联工作。1967年3月，刘格平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学即将毕业的宁杨锁、喻俊民被选调到刘格平身边工作。宁杨锁担任省革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喻俊民任刘格平秘书。刘格平的优秀道德品质、严谨的工作作风、平实朴素的处世品格，使他们深受教育、很有感悟，在工作和人生进取中受益匪浅。后来宁、喻二位工作正式分配后，虽然变动较大，天各一方，但刘格平的人格和作风一直为他们所称道、所敬重。在刘格平生前，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鉴于政治风云的起伏和人事的变迁，致使社会上对刘格平某些革命经历褒贬不一，甚至误解。为此，宁杨锁、喻俊民经常喟叹：要是有一部正式出版的刘格平传记就好了。他俩广泛搜集资料，也约请陇上晋人的党史军史专家李敏杰（曾兼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学会副会长），和被誉“山药蛋派传人”的晋籍军旅作家郑怀盛编著一本较为系统、完整反映刘格平生经历的传记。于是便有了这本《寻觅真实的刘格平》付梓问世。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一书的传记引言和纵向叙述业绩的25个章节，由郑怀盛、李敏杰撰写，第二部分是刘格平生前战友、同事、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

撰写的回忆与纪念文章，第三部分是由郭爱玲、陈瑾整理的刘格平年谱。书中还收录了近百幅反映刘格平革命经历的珍贵图片和题词。全书以文带图，以图说文，图文并茂，生动地展现了刘格平传奇的一生。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撰写中，得到了宁夏军区党史办、山西省军区党史办、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民族画报》《宁夏日报》、沧州刘格平陵园纪念馆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宁夏图书馆原馆长、二级研究馆员丁力为此书的出版，搜集与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并对“引言”和一些章节进行了改写与补充；中共甘肃省委《党的建设》杂志社总编牛颖等，对该书作了文字审阅和修改。在此我们对诸单位和丁力、牛颖等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此书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编著者引用和参阅了：

《地浪天涛》（编著者翟玉琢，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刘格平文集》（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中共渤海区地方史》（李晓黎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百年华诞刘格平》（马鼎辉主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9月版）；

《美丽与坚韧——少数民族干部刘格平夫人丁磊传记》（作者丁粹华，2011年12月版）；

在此，我们对各出版社和诸位作者及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谢忱。

刘格平是一位比中国共产党诞生仅晚一年参加革命的回族智多星长者，他革命足迹跨度时间长，经历变化大，虽然我们对一些历史实事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查核实，终因水平和资料所限，难免有不当或漏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见谅。

2016年5月





## 寻觅真实的 刘格平

### 毛泽东主席关心刘格平

- ★ “你是回民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应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允许我们的回民共产党员不吃大肉。”
- ★ “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是成功的。”有一条沿用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口号，就是应刘格平请求，毛主席亲笔题的词。
- ★ “刘格平参与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政策贯彻最正常，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 ★ 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头子”后，毛主席说：“把刘格平调回北京，安排他到中央高级党校自修。”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说：“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

中国发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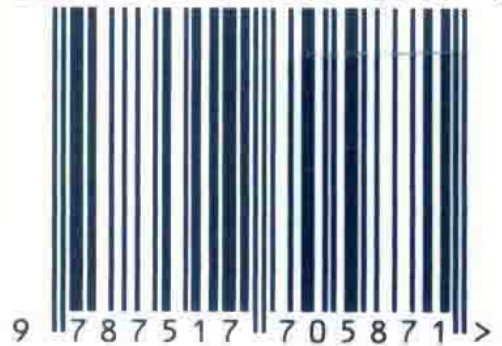
官方微博

微信公号



上架建议 / 人物传记

ISBN 978-7-5177-0587-1



9 787517 705871 >

定价：75.00元